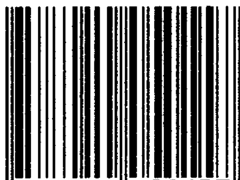
第六卷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ISBN 7-01-005015-5
定价:600.00 元(共八卷)

第六卷

(1955—1957)



艾思奇全書

中石林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1955.4）…………………… 1
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
——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55.8）………………… 10
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1955.12）………………………………… 20
一、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逆流 ……………………… 20
二、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 ……………………………………… 23
三、由不可知论的诡辩引到虚无主义 ……………………… 31
四、科学和理性的仇敌——“形而上学” ………………… 40
五、开倒车的历史观 …………………………………………… 62
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学习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1956.3） …………………… 81
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
——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1956.8）………………………… 118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118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141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 169
四、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92
生产发展的规律性（1956.9）……………………………………… 215
一、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 215
二、生产的第一个特征：生产的变化发展是社会
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240

三、生产的第二个特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
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248
四、生产的第三个特征：社会历史发展由自发的
运动到自觉的变革的过程…………………………… 28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1956.9）…………………………… 290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 290
二、社会的上层建筑………………………………………… 307
三、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内）的基础
与上层建筑………………………………………………… 340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1956.11） …………………… 347
一、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347
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351
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360
在中国科学院讲哲学（1954—1956）…………………… 370
第一讲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
世界观………………………………………………… 370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371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及产生的历史条件……… 376
三、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革命
的变革………………………………………………… 381
四、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党的世界观…………… 385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科学方法…………………………………………… 390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共产主义世界观
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90
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的历史形式……………… 396

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最高形态……………… 405
第三讲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408
一、只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才是科学方法……………… 408
二、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论的基本历史形式……………… 417
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431
第四讲　辩证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惟一科学的解释……………………………………………… 436
一、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 437
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 451
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注意的原则…………………… 463
第五讲　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467
一、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467
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481
三、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498
四、物质的运动有其自己本身的规律性…………………… 506
第六讲　物质和意识………………………………………… 514
一、物质是意识的根源……………………………………… 515
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537
三、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 545
第七讲　认识过程的规律性………………………………… 560
一、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562
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576
三、理论和实践……………………………………………… 594
四、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609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广播稿（1956）…………………………… 623
第一题 哲学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623
第二题 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 632
第三题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学习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645
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7.1）…………………………… 656
前 言…………………………………………………………… 656
重印说明………………………………………………………… 659
第一章 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要
研究哲学？……………………………………… 660
第二章 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
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两军对战的历史……………………………… 677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694
第四章 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性
…………………………………………………… 709
一、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709
二、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的根本属性……………… 714
三、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718
四、物质的运动有它自己本身的规律性…………… 720
第五章 物质和意识……………………………………… 722
一、物质是意识的根源……………………………… 722
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726
三、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 733

第六章　认识过程的辩证规律性…………………………… 740
一、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740
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746
三、理论和实践………………………………………… 758
四、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764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联系
和发展的科学……………………………… 773
一、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及其研究对象………… 773
二、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 777
三、辩证法要求对于具体问题给予具体分析……… 784
第八章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789
（甲）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 ………………………… 789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 789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796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807
四、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 813
五、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 ………………… 832
（乙）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的规律 …………………… 836
一、事物的质和量，质和量的统一 ……………… 836
二、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 …………… 841
三、量变和质变过程的具体分析 ………………… 847
（丙）否定之否定规律 ……………………………… 856
一、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 856
二、辩证法的否定和形而上学的否定 …………… 858
三、否定之否定 …………………………………… 861
第九章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872

一、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反映…………………… 872
二、本质和现象…………………………………………… 877
三、形式和内容…………………………………………… 883
四、必然性和偶然性……………………………………… 889
五、必然和自由…………………………………………… 894
六、因果性和目的性……………………………………… 898
七、可能性和现实性……………………………………… 903

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

（1955.4）

一

在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很光荣地感觉到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在引导着我们前进。为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正在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认真地向列宁学习，认真地领会列宁有关战斗唯物主义的一切指示。

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中自始至终都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的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曾彻底揭露了民粹派那些"主观哲学家"或"主观社会学家"的反动面貌。1908 年他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把流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反动最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驳斥得体无完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用很大的力量钻研哲学，写出了有名的《哲学笔记》，其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给我们做出了批判地钻研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的榜样。《哲学笔记》中《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从认识论方面揭露了唯心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给了我们一个批判和克服唯心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1922 年他给《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指示信，号召这杂志举起战斗唯物主义的旗帜，来坚决揭露并攻击所有"一切现代'僧侣主义的有学

位的奴仆'。"(《列宁选集》第4卷,第604页)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战斗唯物主义的最辉煌的范例之一。它是这样深刻、这样彻底地揭露和击破了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胡说,使得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都可以从这部著作里发掘出无尽的力量的源泉。

我们应该深刻地领会列宁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阶级意义的指示。列宁指出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党派性的斗争,它是社会上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思想领域内的集中反映。现代的唯心主义是为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不予以坚决的打击,它就要极力扩大它的影响,以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队伍,把各种工作和斗争引向主观盲目性的方向,使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失去指导作用,并由此导致革命力量的瓦解。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下述论断,对于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适用的。

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一斗争归根结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底倾向与观念形态。经验批判主义底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可以归结为:替信仰主义者在其一般地反对唯物主义,特别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忠实服务。

列宁之所以要下决心彻底粉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俄国已经表现了这种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恶毒作用。当俄国沙皇政府利用着1905年——1907年革命失败的局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革命政党加紧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攻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马赫

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竟然侵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来。一些立场不稳的党内分子竟成了马赫主义者，他们配合着反动派对革命的迫害，开始着手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和“修正”。而这种企图又采取了最狡猾和最危险的方式，那就是，他们在表面上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在暗中却力图摧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极端危险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揭露和粉碎，而任其扩大影响，那么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将会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根本变质，以至于成为效忠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集团，就像各国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克服了当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俄国党的危害。

列宁的这部著作还有这样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它把科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造成的危机之下解放出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上的新发现，使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构造的旧的看法遭受到动摇，由于自然科学家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正确地总结这些成就，有些人竟做出了这样荒谬的结论，说“物质消灭了”。这样，自然科学家因为不能用正确的世界观来理解世界，就在思想上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也就利用了科学家的这个弱点，把“科学”的招牌骗取到自己手里，把18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改头换面地假装成“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序言及第5章第2节)。这样，列宁在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就面临着要驳斥主观唯心主义对科学成就的曲解的任务。列宁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综合了从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宁所著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问世这整个时期内在科学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实在的成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一节）。指出这些成果只是说明我们对于物质构造的认识比旧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而不是证明唯心主义的“物质消灭了”的谬论。这些成果证明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证明我们对于物质的认识是无穷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就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地认识了事物的本质。

由于列宁正确地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帝国主义时期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二

自从中国的先进人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中间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党派斗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虽然继续探求革命的道路，并且终于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但另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资产阶级，却走上了坚决反对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动的道路。代表这些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们，接二连三地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哲学教授们那里搬来了各色各样反对唯物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差不多现代所有的一切最腐朽最反动的哲学流派，在五四运动前后都泛滥到中国来，主观唯心主义好像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开世界博览会。这自然是由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条件所产生的特殊情况：每个主要的帝国主义者不但在旧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有它的代理人，也在哲学思想上找到它的代理人。在这中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竟占居第

一位。这又是和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凌驾到其他帝国主义之上这一种趋势相适应的。胡适并不掩饰他在哲学上和政治上一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公开地把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把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对立起来。胡适的活动迷惑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吸引他们离开人民，离开革命运动，这样来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利益服务。实用主义的恶劣影响一直遗留到新中国来，它严重地阻碍着知识界和学术文艺界的许多人士走向人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就必须用很大力量来展开对它的批判斗争。

实用主义把自己假装作“最新的”哲学思想，但在实际上它是和马赫主义同样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早已指出过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反动的血缘关系。列宁说：“从唯物主义底观点看来，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底差异，是像经验批判主义与经验一元论底差异一样地极琐细和极不重要的”。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一样，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企图用“‘经验’掩盖了哲学上唯物主义的路线与唯心主义的路线，并且把两者之混淆不清奉为神圣”，但实质上却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验，否认经验中包含着不依赖人的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内容。实用主义也在经验的名义之下来否认理性，也就是否认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知识，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它把真理看做主观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不承认有客观真理，不承认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的联系。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同样地把现代科学的成果加以曲解，使它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面装潢，不同的只是马赫假借了现代新物理学的

名义，而实用主义则利用了进化论的招牌。它和马赫主义同样狡猾地在“科学”的假面具之下偷偷地来破坏科学。

和实用主义同时，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还把其他马赫主义的流派也搬到中国来，例如英国的罗素的哲学——以数理逻辑的科学招牌为标榜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曾流行一时而影响仅次于实用主义。与马赫主义稍有不同但同样信奉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哲学思想，五四运动前后也在中国找到了一定的市场。

还有更露骨地表现着反动面目的唯心主义思想，公开主张抛弃科学，标榜“精神文明”，叫喊着要回到古代的东方，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宣扬蔑视理性的柏格森式的“生命力的突进”，甚至于要求回到动物的本能生活等等，这些带有封建主义以至于法西斯因素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它的代表者包括梁漱溟和张君劢——，也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

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蜂拥出现的一幅简略的图景。应该提到的是：这些唯心主义的流派的传播者，常常是以“自由主义”的，“超政治”和“超党派”的“纯学术”面貌出现的，然而，不论人们口头上是怎样讲得好听，或者主观上自以为好像是多么不偏不倚，真正的“超党派”、“超政治”的哲学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自命“超政治”、“超党派”唯心主义哲学在实际上是为反动的政治党派服务的。自然，在旧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同帝国主义紧紧勾结着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如此卑劣狭隘，如此残暴腐朽，以至于连抱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人有时也感觉到不能完全依赖它，因而部分地也有人在政治上走到同它对立的地位，并且在全国解放后还有逐渐放弃了唯心主义思想的。但是，当着这些“学者”们在热中地散播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的“纯学术”的反对

锋芒不正是或明或暗地针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针对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因此就在实际上配合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革命人民的“围剿”吗？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不是一致地以反理性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热狂来迷乱人的头脑，并因此就直接间接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人的思想引导到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科学——所谓“力行哲学”“唯生论”等等——的方向上去吗？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最顽固最主要的代表，如胡适、张君劢之流，不是已经死心塌地地投靠了蒋介石匪帮了吗！

列宁批判马赫主义时候的俄国思想界中的情形，在中国也是有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到革命的思想队伍里来，要来“修正”和“批评”马克思主义。

三

正如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所指示的那样，目前正在我国展开着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外国帝国主义和一切已被消灭以及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千方百计企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和腐蚀人民，腐蚀革命工作干部和我们的党。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散布，就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必须对目前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其他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予以高度的重视。

如果有人把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看做仅仅是哲学界内部的事情，或仅仅是学术文艺界的事情，而认为同实际工作无关，那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曾发生过种种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唯

心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散布,必然会促进主观盲目性的滋长。列宁指出唯心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用“信仰主义”来为资产阶级服务。信仰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主观盲目性。如果任随资产阶级用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来造成我们工作中的主观盲目性,这就会严重地阻碍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就会在无形中帮助一切反动势力所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阴谋活动。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集中在胡适的实用主义等等方面,就以为问题只涉及胡适等人的活动领域,如历史、哲学、考据、文艺等领域。我们要注意到,五四以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散布的方面是比这更为广泛的,例如自然科学、工农业技术方面,由于许多科学家是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所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些方面也绝不会没有影响。问题是这种影响常常是不自觉的,因此,有些科学家虽然自以为是单纯的科学工作者,同任何哲学思想没有关系,虽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在科学本身研究方面决不是没有一定的成就,甚至应该承认有些人还有很重要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唯心论世界观的影响,有些人在讲授科学上带理论性质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使用了马赫主义一类的词句。有些工农业技术家在处理技术问题的时候,往往凭着自己主观的教条公式或主观的爱好来决定一切,而不顾是否适合客观的实际,还自以为是在做“真正”“科学”的工作。最近揭露的关于建筑方面和医药方面的错误倾向,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什么自信是崇奉科学的科学家们和技术家们和在这些方面工作中负领导责任的干部竟会受到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甚么他们竟会陷入这种不自觉的矛盾?那就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哲学问题不是仅仅限于哲学家才要考虑的问题,任何一种

工作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运用思想和钻研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某种哲学观点（唯物的或唯心的）发生一定的联系，而真正的科学思考，必然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一般地是有着自发的唯物论倾向的，但当他们不注意研究哲学问题，不注意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自觉地在工作中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而如果一个科学工作者不能自觉地在工作中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难免在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上成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自然科学和工农业技术工作的人员认真加以学习和领会：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党派性的斗争，是同一切学术部门和一切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斗争，我们要从这个斗争中来学会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学会在工作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武器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避免主观盲目性的滋长。这样，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之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就会一天天做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4月22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

——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955.8)

一

在恩格斯逝世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推荐他的未完成的伟大著作《自然辩证法》。这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第一，这本著作综合了恩格斯逝世以前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切重要成就，特别是19世纪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互相转化的规律，从这一方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奠立了不可动摇的科学基础。实用主义者胡适在诽谤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硬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进化论出现以前的旧思想。《自然辩证法》证明：这个在口头上标榜"尊重事实"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所使用的武器，恰恰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可耻的谎言。第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里，反复而详尽地论证了：自然科学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愈来愈迫切地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的武器，如何需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的影响。目前的中国自然科学界，一般地说，对于这一点，还是没有明确的理解的，应该从《自然辩证法》里来多多学习一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把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历史作了总结，指出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与宗教神学的权威进行残

酷斗争的过程中，是在突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重重障碍的过程中，才开辟了自己进步发展的道路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它发展的初期（16世纪），“它本身便是彻底革命的”（《自然辩证法》第6页），它必须在封建社会的精神压迫下，“争取自己存在的权利”。为着“向教会在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异端裁判所的牢狱”（同上）。经过这样的残酷斗争，然后它才“大踏步地前进，并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起点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同上）。

但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神学牢笼，并不是靠一次突击就能轻易粉碎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踏出它的第一步，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期。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自然科学界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又陷入了神学观念的圈套。恩格斯谈到那时的自然科学界的思想状况时说：

“科学界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从外面寻找和觅得从自然界本身所不能说明的推动力来做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力被当做物质的根本性质，那么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类别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着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创造主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而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力的假定结束了这个时期。”（同上书，第9页）

近代自然科学在它的16世纪的初期曾冲决了教会权力的网罗，才为自己开辟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到了18世纪牛顿时代，又必须冲决形而上学、神学的网罗，否则就很难前进。

如果有人不相信当时自然科学冲决形而上学和神学网罗是多么重要，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和错误观念对于科学的前进是多么大的障碍，那就应该仔细想一想恩格斯所指出来的这些事实。在1755年，哲学家康德已经写了《一般自然历史和天体理论》，以相当于“星云说”的理论说明了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不管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在后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上证明有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管康德后来自己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但他的这部早期著作的基本思想却是包含着天才的、正确的因素，他打破了牛顿的把太阳系看做是自从接受了神的第一推动力之后，就永远不变地照样运动下去的形而上学观念，用辩证法的发展思想来代替这个“僵硬的自然观”（同上）。但是，虽然一个哲学家已把形而上学观念打破了一个缺口，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却还不能通过这个缺口把自己的思想解放出来，这就使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迟了许多年。因为，如果自然科学在当时就能循着康德的著作里初步展开了的思想线索认真地贯彻下去，那么，像进化论这样的伟大科学发现就不必等到19世纪中叶才能完成了，其他许多类似的新的科学发现也可以更提早一些了。

二

为什么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与教会权力、神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才能顺利地向前进步？为什么自然科学如果掌握了哲学上的正确方向，就可以避免因为在无穷的歧途中摸索而浪费无限的时间和劳动？这是因为，一切科学的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不仅主要依靠经验，并从经验开始，而且更需要理论，需要用理论来综合所有的经验；不仅仅需要搜集、

校正和整理大量的实证的材料，而且更需要从这些知识材料中找出它的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性。科学的主要任务，正是要通过经验知识的研究过程，以达到在理论的形式上来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要完成科学研究的这个重要任务，要对于所研究的事物对象做出正确的理论说明即认识它的客观规律性，就必须有正确的哲学观点作为思想上的向导。恩格斯说：

“经验的自然科学收集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把它们加在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但是自然科学因之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能求助于理论的思维。但理论的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第 23 页）

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于它能够综合既有的经验和实证知识材料，而且在于它能够依据由当前的经验和知识材料所做出的结论，来对事物进行进一步的逻辑推断。正确的理论思维的逻辑推断，有可能提出目前的经验知识虽然还未充分证明，但却可以预期在将来一定能够获得充分证明的新原理。因而这样的推断就成为科学上的进一步研究的引导，并由此推动科学继续前进。许多科学上的假说，都有着这样的作用，这是一般自然科学家都能了解的。但是，自然科学家所常常不能了解到的是，哲学上的这种逻辑推断，往往比自然科学上的假说具有着更为广泛和更值得注意的意义。康德关于太阳系形成的学说就是一个例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还举了另一个重要的例子：还在 17 世纪末年，德国的哲学家笛卡儿就已经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

是不变的”（同上书，第 11 页），而在自然科学上，能量守恒定律是直到 19 世纪才得到最后的证明。所以，恩格斯说：“几百年前在哲学中已经确定了的命题，在哲学中早已被废弃了的命题，却常常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出现为全新的智慧，并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自然辩证法》，第 24 页）恩格斯指示我们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推动和指导的作用，说：“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去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继续前进。现在，近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取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便不能继续存在。”（同上书，第 18 页）

正确的理论思维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在思想上需要从哲学的学习中取得的武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伟大著作，从头到尾就只是要证明一件事：全部自然科学的成就表明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辩证地运行着的，因此，认识自然界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如果能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可以大大地增进研究的成效，就可以推动科学加快地向前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常常有这样的偏见：科学工作者无须乎关心哲学；不学哲学，固然不懂辩证唯物主义，但也不至于有唯心主义。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任何科学工作者，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只要一旦从事科学研究，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理论的思维活动，而一旦进行理论的思维活动时，就必然要——哪怕是不自觉地应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哲学的思维方法。不是唯物论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如果我们不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一定要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并且，就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自然科学家来

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世界观对于他们的影响，总是比较强烈得多，而要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总是更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武器，在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有着长期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势力。由于科学家平常只注意自己专门业务的研究，不能够通过哲学研究来辨认这些统治思想的毒害，他们必然要在思想上受到这些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世界观的侵蚀。特别是在现代，日益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及其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各方面思想领域中散布最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影响，把这作为它们拚命挣扎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这样的时候，进步的人们，包含自然科学界在内，就必须更加提高警惕，努力在哲学的学习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清除这些腐朽思想的毒害。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地吟味。他说：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08—609 页）

“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就阻止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这是思想战线上铁的规律。这是警告我们，不能减弱思想斗争和放松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这个原则，愈到现代，就愈加重要。自然科学家因为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不能综合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因而滚落到唯心主义的陷阱中。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曾批判某些科学家由于电子的发现

而做出“物质消灭了”的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列宁在四十多年前已经驳倒了这种谬论，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理学界还有人重复着它，而且对于中国的科学界也还有着影响，我们在最近还听到个别科学家有这类的错误看法。这就说明中国的自然科学界很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为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采取了这样一种狡猾的步骤：首先用经验主义的观点来曲解自然科学，力图使人相信科学研究仅仅是依靠经验方法，使科学工作者因此放松了理论思维的锻炼，削弱了思想斗争的能力，这样就可以轻轻巧巧地把他们引导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至于神秘主义的歧途上去。从19世纪以来，以所谓“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经验批判论”、“实用主义”等等名目为标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采用了这同一个骗人的手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举了一些最突出的例子，说明了经验主义对于科学的破坏性，他指出：在“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科学家中间，可以找到“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自然辩证法》，第29页）经验主义者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牛顿在晚年也埋头于解释“约翰启示录”。“和达尔文同时用自然选择建立物种进化论”（同上）的华莱士，竟轻易盲从一个“平庸的江湖术士”霍尔的骗术。应该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所散布的经验主义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而这种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在我们中国自然科学界也不缺乏受它影响的人。唯心主义者说：“人除了经验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人是达到他仅仅透过经验而达到的一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中，却有与

这类似的不可知论的论调："自然科学只研究经验，经验以外的东西则不能加以肯定"。实用主义者杜威把太阳、山河、大地都仅仅看做是经验的要素，否认物质是经验以外的客观存在。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人用类似的唯心主义观点来看物质，说："物质就是我看见的，我摸到的和我拿来实验的东西。这就是说，离开我的感觉，我的科学研究经验，就不成其为物质了。"所以，反对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界，包括自然科学界，是非常必要的。

三

中国现在已进入了自己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最近又通过了五年计划，这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科学计划。在改造自然即发展工业和农业方面，我们迫切需要自然科学界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我国的自然科学界现在人数还很少，他们是国家的珍贵的财宝。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在旧社会曾经历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苦，现在逢到了这一个能够尽量施展自己的能力的时代，自然是非常兴奋鼓舞的。然而，要发挥自然科学界的最大力量，就必须造成能使之发挥出来的种种条件，就要除去科学发展上的各种障碍。单靠热情和愿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正确思想，是帮助自然科学界发挥最大力量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必须除去的障碍。

我们的自然科学界中可能还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和哲学无关，认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于自然科学不会有什么危害作用。那么，现在就请让我们把危害作用再一次明确地指出来：第一，恩格斯曾指出过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曾经因为错误的世界观的障碍而推

迟了多少年。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以过去时代不能比拟的加快的速度前进的，因此也要求为它服务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能适应于这样的速度，如果自然科学由于思想条件的障碍而迟迟不进，那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不能容忍的巨大损失。第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科学技术的具体实践中会发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在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观主义和不负责任，曾经给国家造成许多惊人的浪费。对待中西医关系的错误的思想，在医药卫生工作上的危害性，不是也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吗？第三，身为自然科学家，由于不能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武器，往往不自觉地（例如在讲堂上）作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的义务宣传者，这难道也是无关重要的错误吗？此外，在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就很难完成学习任务，这不是很多人都亲身体验过的吗？

有些人以为，自然科学不会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因为自然科学只研究自然，研究技术，和阶级与阶级斗争无关，和政治无关。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固然，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指导着科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在方法上推动科学前进的哲学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改造自然的实际活动，是往往要通过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发展范围和运用方向，是决定于一定的阶级的需要的。目前中国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就必然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而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阴谋及资产阶级的反抗行为进行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力图否认这些真理，也就是力图抹杀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其作用就是要阻碍自然科学界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要阻碍科学的前进。

为着澄清上述种种不正确的观点，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向我们的自然科学界推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它能帮助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来武装自然科学，粉碎极端有害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使自然科学界能按照祖国的殷切期望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8月5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

(1955.12)

一、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逆流

梁漱溟的思想所代表的阶级方向，是很容易识别的。他在他最早的系统地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就有过很明显的表白。他说他之研究这些哲学问题是在1917年蔡孑民约他到北京大学去任教的时候，他“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于孔子持什么态度?”并且向蔡声明：“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2页)

大家知道，1917年，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在酝酿的前夜。在反封建的方面，新文化运动是以孔子的名字所代表的一系列的旧思想和旧道德作为斗争对象的。“打倒孔家店”，就是当时已经提出来的革命任务之一。梁漱溟却在这时候伸出头来，板着一副卫道者的面孔要“发挥”孔子的学说，这不明明是自觉地、狂妄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向新文化运动挑战吗?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

---

* 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继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唯心主义之后，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又一项任务。艾思奇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写了这篇长文，着重从哲学上进行了批判，没有对梁漱溟在历史上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作全面评价。在收入本书时，我们删去了联系批判胡风观点的段落。

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这个革命运动在文化上要求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旧道德和旧思想的支配势力，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作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不用说，这个运动要引起反动阶级疯狂的仇视和反抗。这些仇视和反抗的表现，除了当时反动统治者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日益加重的政治迫害之外，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反动思想的逆流，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逆流。逆流从两方面来：第一是从帝国主义和与帝国主义联系密切的大资产阶级方面来，胡适是这一方面的主要代表者，第二是从封建地主阶级方面来，梁漱溟就是始终坚决地以这个阵地为他的主要立脚点。胡适和梁漱溟，在某些枝节问题和形式问题上似乎是互相对立并且互相有所批评的，但在实际上却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着；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抵抗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反对人民和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终极目的都是，且不能不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在哲学上，他们都是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时期，正像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样，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自己向帝国主义服务的两大柱脚，而在思想上、文化上以至于政治上，则得到了胡适梁漱溟一流“学者”“教授”们的全力支持。就哲学来说，由蒋介石政府所直接御制出来的什么“力行哲学”、“唯生论”之类的胡说，和这些“学者”、“教授”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都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在许多方面和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更为

相像，这也是应该特别指出的。

梁漱溟曾经极力把自己称做革命者，甚至于不肯承认自己是改良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比起用改良主义的名义来公开反对革命的胡适似乎还更狡猾些。自然，我们应该考虑到，梁漱溟和胡适在政治上有一点是不同的：胡适已经完全背叛了祖国，公开投靠了美帝国主义，而梁漱溟则没有离开祖国，而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他在新中国几年来的伟大成就前面，还不能不进行一些检讨，承认自己的某些错误，承认“自己总是处在统治阶级这一边”，然而他还没有具体地承认自己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服务，这就是说，他对于自己的立场的主要实质还有所隐蔽，需要进一步加以揭露。

梁漱溟和胡适同样地在中国人民中间散布了最腐朽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只是形式上稍有不同。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买办——帝国主义直接培养的奴才，胡适特别从美国资产阶级教授那里搬了一块实用主义的招牌，拿来挂在他的中国分店的门面上。作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梁漱溟的主要努力，是力图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倒了的“孔家店”再建起来，所以他要贩卖一些以所谓“东方精神”为商标的货色，要歌颂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歌颂佛家的宗教思想和唯识哲学，但同时也对法国的柏格森，德国的杜里舒，英国的罗素以至于美国的杜威等等所谓“西方”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表示了倾慕之忱，这在形式上好像只是由于他在这些“西方”的哲学者中找到了与自己思想相似的某些共同点，而在实际上却应该看做是这样一种阶级内容的反映，即：现代中国的封建地主不但肯在君主面前下跪，而且也是愿意对帝国主义者称臣的。他们由于投靠帝国主义而和买办阶级有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思想代表者也要搬运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唯心

主义哲学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封建复古主义。梁漱溟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了一锅东西方各种反动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二、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

现代一切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主义者，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失去了他们先辈的勇气和自信，总是非常卑怯地采用种种方法来掩盖唯心主义的真面目，而不敢公开地承认自己是站在唯心主义的阵地上来与唯物主义作战的。梁漱溟自然也不是例外。他曾反省说：“我从不相信我是唯心论者”（《两年来我有那些转变》，见1955年10月5日《光明日报》）。他标榜他的思想是隶属于“生命派的哲学”范围。并且认为“生命派哲学”的出现，就是人类要走中国孔子的道路的标帜。照他的说法，好像孔子的哲学思想“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78页），他说：“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同上书，第179页）。所谓“生命派的哲学”，就是利用“生命”“生活”之类的名词上的极端烦琐的概念游戏，来掩盖唯心主义和反对唯物主义。这种手法在现代各国反动派的哲学教授们中间是相当流行的，不必说柏格森之流的明显标榜着的“生命派哲学”，就是形式上似乎与柏格森哲学有所不同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如马赫主义、实用主义之类，也同样喜欢在“生命”“生物”之类的名词上玩弄种种的花招。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第六章里面，就批判过马赫主义者的“生物学的游戏”。如果我们想一想后来的蒋介石政府也要特别御制一套叫做“唯生论”的说教，就可以知道，“生命派的哲学”已成了现代各国反动派所爱好的哲学标签了。

尽管使用了“生命派的哲学”的遁辞作为掩饰，但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仍是非常露骨的；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公开否认世界的物质的实在性，叫喊着要“把适才化为物质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他说：“盖本无所谓物质，只纳入理智的范畴而化为可计算的便是物质，在理智盛行之下，把一切所有都化为可计算的，于是就全为物质的。”（第263页）梁漱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是世界上先有物质的客观存在，而后才被人的主观的理智所认识，相反地，倒是先有了人的理智的范畴，先有了人的理智的“盛行”，然后原来没有任何物质世界的“一切”才被物质“化”了。这难道不是最露骨的唯心主义说教吗？

我们知道，唯心主义总是把真理颠倒了的，当我们用批判的观点来研究一下梁漱溟上面所说的一段话时，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面恰恰透露了一些与他的说法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说，人类的科学理智、理性，的确是唯物主义的无可辩驳的见证人，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是用唯心主义曲解了这样一条真理：由于科学的理性使人能够对周围的一切做出精密的计算，并以高度的准确性来认识其中的必然联系或规律性，这些规律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获得了确凿的证明，因而人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不能不确信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命题：要么就必须承认唯物主义的真理，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如果你是不反对科学，不反对人类的理性的话；否则，如果你要反对唯物主义，要坚持唯心主义，你就只能站到与科学、理性互相敌对的地位上去！

在这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命题之前，人们应该肯定那一个方面，才是正确的选择呢？很明白，凡是拥护科学的人，凡是具有健全的理性头脑而不为剥削阶级的反动偏见所蒙蔽的人，一定

要肯定前一个方面，一定要承认唯物主义的真理。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然而，以“肯用心思”作为自己的骄傲之点而反复多次地向人自诩的梁漱溟，却宁可选择坚持唯心主义的道路，并不惜由此公开地坚决地站到反科学、反理性的阵地上去！

前面说所谓“生命派的哲学”只是用“生命”“生活”之类名词上的概念游戏所掩盖的唯心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派“哲学”者并不是要确实地根据科学发展的成果，来阐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等等，他们所要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玩弄“生命”“生活”之类的字眼，把它们变成与科学概念毫不相干的空洞的形容词，用来粉饰他们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生命或生活现象是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早已证明，生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物质现象；恩格斯曾依据自然科学的成果给生命现象的本质作了一个十分正确的概括，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重要因素是在于与其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不断的新陈代谢。”（《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56页）作为自然现象的生命或生活现象，本质上就是如此。至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则是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决定的条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论证明白了的。然而，“生命派的哲学”者梁漱溟怎样来解释生命或生活现象呢？他说：“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4页）这是十足明显的唯心主义的武断，它在这样的两点上来玩弄概念：第一，它硬说生命是纯粹精神的现象——意欲，不惜为此抹煞当时已经成为常识的自然科学真理——即作为物质的一种形态的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作用；第二，就是他所说的意欲，也只是空洞概念，人们在这个概念里看不出那“意欲”是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它所要求满足的是什么。这里就只有一个死

的抽象——毫无任何内容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这样，在“生命”和“生活”等的名词上面行使了一番阉割的手法之后，梁漱溟就放手地把它们用来作为建筑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支柱，也就是要利用它们来把“物质的宇宙复化为精神的宇宙”了。于是梁漱溟说：“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以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0—71页）前面说过，自然科学早已证明生命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存在形态，在生命现象没有出现之前，以及在生命现象之外，还有无机的自然界的存在。宇宙是包括生命和无机自然界在内的总体，而生命只是这总体的局部。唯心主义——所谓“生命派的哲学”在宇宙和生命之间，在全体和部分之间画了一个简单的等号，这是连初级数学规律也违背了的十分荒谬的手法，何况还要把生命加上唯心主义的曲解呢？

事情还不止此。梁漱溟的唯心主义还有更进一步的特点。它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且相当公开地做出了“唯我论”的论断。当梁漱溟说“尽宇宙是一生活”的时候，他又从佛教的“唯识论”里借来了“事的相续”这一个概念，来作为他的所谓“生活”的内容的另一种注解。在前面他曾把生活解释作“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在这里他又说“生活即是在某种范围内的‘事的相续’”（同上书，第71页）。什么叫“事的相续”呢？他依照了“唯识家”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见解，说：“一问一答……是为一‘事’”。所谓“生活是‘事的相续’”，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内部精神的“一问一答”的表现。“一问即有一答——自己所为的答。问不已答不已，所以‘事’之涌出

不已，因此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同上）。生活既是“事的相续”，既是对于自己的问的“自己所为的答”的不断的“涌出”，这样一来，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成为纯粹主观内省的东西，就成为仅仅是一个人的内心不断地自问自答的过程。这种疯人式的不断自言自语的“生活”，也就是构成梁漱溟的“宇宙”的惟一原素。“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而生活都是“一问一答”的“涌出”。于是，宇宙的全部内容也成为纯粹主观内省的东西，成为人的内心不断地自问自答的表现。这样一来，梁漱溟就不能不把他的宇宙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十分露骨地暴露出来，就不能不钻到唯我论的绝路上去，就不能不强词夺理地把全宇宙硬说成是包括在个人生活之中，而说什么“生物或生活实不只以他的‘根身’……为范围，应包括他的‘根身’‘器界’……为一整个的宇宙……而没有范围的。这一个宇宙就是他的宇宙。盖各有各自的宇宙——我宇宙与他宇宙非一，抑此宇宙即是他——他与宇宙非二。”（同上书，第 70 页）

很容易明白，要按照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的观点来说明宇宙而不至于矛盾百出，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宇宙明明是在我们的主观之外客观地存在着，其中一部分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联，成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条件。而全部宇宙的内容，却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生活所涉及的范围之外，怎样能说宇宙就是“我的宇宙”或“他的宇宙”，怎样能说全部宇宙都包含在个人的生活之中呢？所谓“生物或生活应包括他的‘根身’、‘器界’……为一个整宇宙”，所谓“他与宇宙非二”明明是闭着眼睛胡说。由于这一类唯我论的胡说的荒谬性是过于显著了，因此，主观唯心主义者多半要设法避免直接把它暴露出来，或者当事实上不能不多少有所暴露时，就要生造出种种诡辩的遁辞，来迷惑人的头脑并

掩饰它的无法解决的矛盾。然而，使用了诡辩的遁辞的结果，往往反倒会暴露更多的矛盾。

梁漱溟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加以掩饰。他使用了类似马赫主义的所谓“原则同格”（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章，第三节）的手法：把“我”分劈成两个，一个叫做“前此的我”，或叫做“已成的我”，用来指周围的“物质世界”，一个叫做“现在的我”，用来指实际生活着的这个我自己。所以，“我”和周围世界一切事物的关系，就被梁漱溟看做是“现在的我”和“前此的我”的关系。也就是被曲解为两个“我”的关系：“我”和我以外的物质世界都是同一的“我”的表现，两者在“原则”上是“同格”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就是想用这样的诡辩来掩饰它的“唯我论”的矛盾的，他们惯于用纯主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只要在名词上耍几下花枪，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一切，就可以把宇宙“精神化”，使它巩固地成为“我的宇宙”了，看吧！我就是“现在的我”，物质世界也是“我”，而且是“已成的我”，在我未曾出世以前就有了那个“已成的我”，而现在不过是再加上了这个生活着的未成的我，一切既都有了“我”这个形容词，于是“我”就包括了一切，于是宇宙就成为“我的宇宙”了！你觉得有点不通吗？那只能怪你不肯“用心思”，不能欣赏唯心主义哲学戏法的奥妙！

但是，诡辩究竟还是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尽管加上一千个“我”的形容词，宇宙仍然是独立于“我”之外并且不依赖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而决不是“我”的原则上的“同格”。这只要一接触到人的实践，立即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因为在实践中，“我”的“意欲”决不是可以任意得到满足的，人的主观愿望，常常由于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或规律性相违背的缘故，而

不能得到实现。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一种唯心主义的烟幕都不能够完全遮蔽得了的，就是梁漱溟的唯心主义也不能例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著作里也透露了若干在他说来是无可奈何的关于世界的物质实在性的消息。梁漱溟也不能不感觉到：宇宙间的事情并不是真像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论断的那样，可以任人随心所欲地“一问即有一答”的。相反地，人们常常碰到许多客观的东西“为我当前的‘碍’”，使所“问”得不到所希望的“答”，换一句话说，就是使梁漱溟的“意欲”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应该指出：就是梁漱溟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些“碍”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十分巨大的。他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整个“已成的我”——“物质世界”就是一个最大的“碍”。在这个“已成的我”的前面，要使所答的能够满足所问的要求，就必须依靠“对于物质世界——已成的我——之奋斗”，而奋斗的成败关键又在于“知识力量”，“譬如当初的人要求上天，因为当时的知识力量不及所以不能满足，而自发明轻气球、飞行机之后也可以满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67 页）

第二，为“碍”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其他的有情”（同上书，第 74 页）。也就是其他的人和动物。照梁漱溟的说法，“其他的有情”，也不外仍然是“已成的我”，所不同的就是他们有一种所谓的“他心”，而对于我为碍的即是这“他心”；“他”不和我同意，我就没法满足自己的要求。在这里，我们应该举一个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最切近的例子，即广大中国人民对于想要恢复封建黄金时代来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梁漱溟都有了“他心”，所以他就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

第三，还有些“绝对不能满足者，此即必须遵循的因果必至之势。……譬如生活要求永远不老死，花开要求永远不凋谢，这

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绝对不可的，所以这种要求当然不能满足”（同上书，第 77 页）。这里又要举一个梁漱溟所没有举到的例子，即想要使历史开倒车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梁漱溟的要求当然不能满足。

这一切“为碍”的事实，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根本无法解释的。奇怪，为什么本来是“我的宇宙”里的一切事情，竟在我的实践中不肯服服帖帖地顺从于“我”，却偏偏要到处跟“我”捣蛋，甚至弄到使我根本没有办法呢？为什么不过是“已成的我”的一切“有情”，竟然会发生与我作对的“他心”？为什么“我”不能随心所欲地从“已成的我”的“物质世界”里获得满足，而一定要依赖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力量”？为什么“已成的我”里面竟会存在着许多“因果必至之势”而“我”对于它们竟绝对不能违抗？这一切问题，在梁漱溟的书里是没有解答的，因为他的“唯我论”的基本观点使得他没有办法可以解答。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些事实的存在，而无法解决这些事实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矛盾。因为要解决这样的矛盾，惟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主观唯心主义全部抛到垃圾堆里，而承认唯物主义的真理：宇宙不是“我的宇宙”而是在“我”之外独立地存在着的物质的实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着它们所固有的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因此，当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想要提出什么问题或什么要求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些问题和要求在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是否有着可以提出的根据？它们的提出和解决是否为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所容许？“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96 页），我们在生产中和阶级斗争中所发现必须要解决的客观事物的矛盾，——例如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

义经济的矛盾、个体农民经济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之间的矛盾等——就是我们正确地提出问题的根据。具体地分析这些矛盾，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在互相矛盾的对立两方面中确定哪一方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哪一方是我们应该反对的东西，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发展我们所赞成的和消灭我们所要反对的东西等等——，这些就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途径。如果我们能认真注意到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且使我们的问题和要求的提出和解决符合于这些原则，那么，这些问题就一定会得到所希望的解答，要求就一定会获得适当的满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按照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以实现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注意这些原则，不研究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的矛盾，而只是任凭主观的随意性任意提出问题和要求，并强求得到解决，那就一定要遇到严重的“碍”，一定得不到问题的回答和要求的满足。用人们日常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碰钉子”。唯心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就是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时犯了这一条最根本的原则错误而总是“碰钉子”的。这一切道理不是非常明白的吗？只要消灭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烟幕，那么，上面提到的矛盾就不成其为矛盾了。

三、由不可知论的诡辩引到虚无主义

唯心主义，特别是近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认识论方面，通常都是以“不可知论”作为基础的。它们否认认识是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反映，抹煞人类的理性“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提纲》，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2页），歌颂盲目行动，提倡信仰主义，散布对科学知

识——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怀疑空气。它们的社会阶级作用并不难理解，因为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知识的任务是要揭发事物的客观真理的，而社会科学知识所揭发的主要真理，就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其中包括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一切反动势力的腐朽性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这些客观真理的揭发对于反动势力是很不利的，因此他们就需要以“不可知论”来动摇人们对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心，这样就便于他们在人民前面掩盖客观事物的真相，使他们自己的肮脏面目与胡作非为不易被人随便识破。

我们知道，人类首先是依靠感觉器官，来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种种现象取得初步的认识，也就是感性认识。然后又以感性认识作基础，进一步运用理性能力，运用一系列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活动，来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种种现象的内部联系也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人类之所以要认识这些客观事物的规律，目的是为着拿来指导实践行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就使人类的理性“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使他所把握的知识之有可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一点获得确实的证明。认识是通过实践不断反复地由物质到感觉，又由感觉到思维的飞跃式的反映过程。不可知论的唯心主义的狡计，是在于以一套生硬的形式主义的逻辑，来抹煞上述认识过程各环节之间的辩证的联系，否认由物质到感觉又由感觉到思维的辩证的反映过程。它们的一切花言巧语总不出乎这样的公式：感觉只是我们感觉器官的主观印象，它和外界物质的本身不是一样的，所以不能算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理性思维的内容更只能算是我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抽象概念的活动，与具体的客观事物完全无关，也与具体的感觉经验无关。总而言之，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完全禁闭在自己主观世界之中，除了我们自己主观的感

觉，以及自己头脑中的一些抽象概念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知道。如果有人说在我们的感觉之外还有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那么，“不可知论”者就认为这是在谈论某种“超越”于我们认识能力以外的东西（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或者干脆说这只是“形而上学”的妄想（休谟主义的“不可知论”）（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所认识的世界就只是我的主观世界——这是不可知论；由此再进一步，就会引申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世界的一切都只是存在于我的主观领域里！

梁漱溟的认识论（他自己叫做“知识论”）观点，并不比上述的货色更新鲜些，并且也同样地充满着荒谬性和自相矛盾性。不过梁漱溟主要地是以推销“东方”牌的商品自任的，所以他就从“东方”的唯心主义工厂之一——佛教哲学——里去进货。他说：“我研究知识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据于‘唯识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00页）。“唯识学”就是佛教哲学里的“不可知论”。

“唯识学”的特点，就在于它自有一套关于认识论的术语，而这一套术语把“不可知论”的烦琐性表现得特别鲜明。——梁漱溟对于“唯识学”已加上了他自己的解释，并不完全是佛教“唯识学”的真面目，但他之所以能够利用它，就在于作为不可知论的它的本质，和梁漱溟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在这里暂时只根据梁漱溟的解释来进行批判：照梁漱溟的解释，“唯识学”首先是——用“现量”这个名词来代替感觉的概念。“现量只是唯识家所谓对‘性境’的那一种认识作用”（同上书，第101页）。而“性境”又是指什么呢？“如看见白布的‘白’即是‘性境’，‘白’是我的影像，……至于白布的自己……其是白非白，我们无从而知”（同上书，第102页）。这就是说，梁漱溟否认白色感觉是布的某一方面的客观性质的反映，这种论调，和他所谓的“西方”哲学

中的不可知论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这类论调，恩格斯早已给予过致命的驳斥（见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指出人类的实践行动（例如科学实验与工业），就是人的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最有力的见证，就是彻底驳倒不可知论的“奇想”的最雄辩的根据。这些，我们在此地已不需要再多加重复。我们只想指出这样一点事实，即：真理对于唯心主义者终归是无可奈何的“碍”，挖空心思，使用了一切诡辩来企图勾消唯物主义真理的不可知论者梁漱溟，在他不小心的时候还是会用自己的话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他说：“布的白否固不可知，而实有使我们生白的影像之能力；所以我所生之白的影像，要如布之所刺激而变生，才没有错。假如对于能生黑的影像之本质的刺激而变生白的影像，就是误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01 页）。梁漱溟没有注意到，感觉就在他自己的这段话（这样的话在他的著作里当然是极个别的）里顽强地声明了自己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权利。它坚决要求我们承认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真理：既然白色的感觉是由能生白色影像之“本质的刺激所“变生”，可见感觉是反映了“本质”的某一方面的内容了。所以，梁漱溟自己的这段话就已经向我们证明：“感觉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自体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结果”，“盐味是盐底客观特性底主观表现”（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45 页）。我们感觉盐味，即是认识了盐的本身的一种客观特性。我们感觉到布的白色，即是认识了布的一方面的特性。

梁漱溟的“唯识学”，是比普通的不可知论更为烦琐的不可知论。他把感觉和所谓感觉的“意味”，也做了极端形式主义的割裂，说：“感觉时并不晓得什么是茶味或白色，只有由味觉或视觉所得到茶或白色的感觉而无茶味或白色所含的意义”（《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第 101 页）。这个从“茶”或“白色”的感觉上硬割下来的“意味”，被他加上了一个特殊的“唯识学”的名字：“非量”。意思就是说这种认识作用是完全与事物的本质不相干的消极的东西。“譬如我们听见声音觉得甚妙，看见绘画觉得甚美，吃糖觉得好吃，其实声音在自身无所谓妙，绘画自身无所谓美，糖的本身无所谓好吃；所谓妙，美，好吃等等意味都由人的直觉所妄添的。”（同上书，第 106—107 页）因此，梁漱溟又把“非量”叫做“直觉”。以表明它是完全主观的内省作用。所以，梁漱溟所谓“非量”或“直觉”，是对于人类活的认识过程的双重的形而上学的割裂：既从客观物质割裂，又从感觉本身割裂，它的荒谬性是不难了解的。它要我们相信这一类极端烦琐的逻辑：(1) 茶的味不是茶给予人的感觉，或者说，茶给予人的感觉不是茶的味。试问一个有正常的理解力的人能够接受这样的论断吗？(2) 并不是声音使我们觉得妙，绘画使我们觉得美，糖使我们觉得好吃，而是我们凭空地“直觉”到妙、美和好吃。只要是多多少少在现实事物上“肯用心思”的人，就立刻会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驴叫就不会使我们觉得妙，流氓在墙上涂的画不会使我们觉得美，黄连不会使我们觉得好吃呢？“直觉”为什么竟不能在这些事物本身的性质之外为我们“妄添”一点别的“意味”呢？这些问题决不能由主观唯心主义得到答复，而只有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能给予答复。即：感觉和感觉的“意味”，决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件东西。感觉的“意味”，就是各种感觉本身的特点，就是事物的客观特性在人的感觉主观上的反映。感觉之为感觉，就在于它有一定的“意味”，每一种感觉都以一定的“意味”来生动地反映事物的“客观特性”。感觉如没有任何“意味”，就不成其为感觉，因为这就是等于说任何事物的客观特性也没有被感觉到了。

梁漱溟用“比量”这个名词来代替理性知识。“‘比量智’即是今所谓‘理智’，也是我们心理方面去构成知识的一种作用”（同上书，第103页）。我们知道，理性认识的作用主要在于要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来构成各种概念，以反映事物的本质。梁漱溟用康德式的“不可知论”观点来曲解这个过程；说：“我们构成知识第一须凭现量，但如单凭借现量——感觉——所得的仍不过杂多零乱的影像，毫没有一点头绪，所以必须还有‘比量智’将种种感觉综合其所同简别其所异，然后才能构成正确明了的概念”（同上书，第104页）。这里的问题是：梁漱溟把理智看做仅仅是“心理上”构成知识的作用，认为这种作用仅仅是对感觉的“杂多零乱的影像”赋予秩序，而不是比感觉更进一步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因此，他就把理智所构成的概念看做是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主观自生的影像，他把它叫做“独影境”，说这是“有影无质的”，是“非借于客观之物才变生的，而是我心所自生私有的”（同上）。如果说对于现量——感觉，梁漱溟还提到“客观”的来源，对于所谓“非量”，还说：“其影乃一半出于主观一半出于客观”，并且称之为“带质境”（同上书，第106页），那么，谈到“比量”——理智，梁漱溟就完全抹杀了它的客观来源。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指明“不可知论”的反对锋芒，主要地就是针对着人类的理性，归根结底也就是针对着科学的。当然，这样的谬论要想始终自圆其说而不陷于自相矛盾的地步也是不可能的。在梁漱溟自己的文章里就有这样的话：“这个茶的意义——概念——是多数之茶所共有的，故曰‘共相’”（同上书，第104页）。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在唯心主义者的作伪伎俩稍有松懈的地方，唯物主义立刻就会出来打他的耳光。梁漱溟的这段话只能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上得到正确的解释，即茶的概念是反映着一切茶

类植物的共同的本质。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梁漱溟的不可知论观点及其荒谬和自相矛盾的本质。现在让我们再简单申述一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真理，并进一步揭发不可知论的诡辩的根源。我们说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人的主观感觉和理性中的反映，这并不是说人的认识能力只等于一面消极反映外物的静止不动的镜子。认识是与人的实践密切联系着的运动过程，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由片面到全面，由现象到本质地，不断丰富、完全和不断深入地反映着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并不是，也不可能一次就穷尽客观世界的一切内容。认识的每一个别步骤，都只是反映着客观世界的某一个部分、方面，某一类事物的特征或本质，而不是客观世界的一切。这样，认识的主观和被认识的客观之间就有着一定的差异或矛盾，认识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反复不断地克服这个矛盾，使主观和客观经常保持基本上的一致，使认识的内容尽可能地具体、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

我们的感觉所认识的事物和引起感觉的外界事物本身之间，布的白色感觉和引起白色感觉的布的性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差异呢？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是，除了某些错觉或幻觉之外，这差异决不是原则上的差异，而只是部分与全体的差异。列宁曾引用狄慈根的话来说明这个反映论的真理："'世界自体'与出现于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底现象之间的互相差别，不过是全体与部分之互相差别"。"现象与产生现象的物之间的差别，不多不少地正如十哩路与整条路之间的差别"(《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7页)。显然，我们决没有权利把这种差别看做是绝对的差别，而将两者生硬地割裂开来，否认前者之作为后者的反映。相反地，我们的全部认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可以确信这

差异是能够逐渐地尽量缩小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识破不可知论的魔术家所用以蒙混人们的关键所在：原来他们的手法不外就是把感觉、表象本身和感觉对象之间的相对的差别不正当地加以夸大，把前者硬说成是与后者没有联系的纯主观的东西，以破坏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信心。

我们的理性认识所包含的许多抽象概念以及概念的系统——理论，与具体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差异呢？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是，除了唯心主义者和烦琐的学究们所虚构的不是“正确的、郑重的”而是“瞎说的”抽象概念之外，这差异也决不是绝对的差异，而只是本质和现象的差异，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差异。为着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普遍的本质和它们的贯穿全体的内部的必然联系，人们的理性思维把感性认识所提供的关于具体事物的各种现象材料加以综合的考察，撇去其中个别的偶然的和表面的因素，以概念、范畴、规律等形式（也就是比较纯粹的形式）把这些本质和内部联系反映出来，这就是概念的抽象性的真正的意义和作用。列宁说：“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的理念”）是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永久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底普通的规律性”（《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6页）。毛泽东同志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页）显然，我们决没有理由把理性概念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看做绝对的对立，硬说前者都是纯主观的抽象概念，是与后者完全无关的“独影境”，相反地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只要是“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例如一切科学的抽象，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劳动”之类的抽象等，都是“更深刻、更正

确、更完全地反映着”（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4页）客观现实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揭露不可知论者的戏法的秘密，原来他们是片面地，纯粹消极地甚至可以说是恶意地指摘理性概念的抽象性，把它们一概不加分析地——不区别是否“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例如梁漱溟自己的什么“意欲”“已成的我”“非量”等等“概念”，就是不正确的、不郑重的、瞎说的抽象，就只能是“独影境”）。——硬说成都是没有任何客观内容的空洞形式，其目的就是要引诱人们离开理性和科学，使其在行动中得不到清醒头脑的指导，使其走向盲目信仰的迷途中，以便反动势力来任意加以摆弄。列宁说不可知论者“压低知识，以便给信仰扫清地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4页）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我们还可以顺便提到梁漱溟的“唯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它通过它那所特有的一套烦琐的诡辩直接引导出不仅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且也是虚无主义的结论。这一个结论他叫做“现量直证‘真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6页），意思就是说凭借着自己的感觉就可以直接达到世界的本体，或者说世界的本体就存在于我的感觉——现量中。那么，要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妙境呢？据说只要通过两个步骤的工夫，第一步是，要使“现量”从“比量”“非量”分离开来，这就是说要抛却一切理智，同时还要努力使感觉变成没有任何“意味”的感觉。例如“看飞鸟，只见鸟，（但不知其为鸟）而不见飞，看幡动，只见幡（但不知其为幡）而不见动”（同上书，第122页）。但这只是第一步，还不够得很！要达到世界的本体，还需要更进一步，做到不但使感觉全然没有“意味”，而且要使“眼前面的人和山河大地都没有了！空无所见！这空无所见就是见本体”（同上）。于是，当我睁着眼睛却空无所见

的时候，世界就算是和我完全地合而为一了！呜呼！通常我们总以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如果敢于公开做出“唯我论”的论断来，说“世界就是我的感觉世界”，那就算是荒谬绝顶了，不料我们这里还有更加荒谬百倍的梦呓：“世界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世界，就是什么也感觉不到的我的感觉世界！”对于这种宣传极端蒙昧主义的所谓“知识论”，我们就不想，可以说也不必要——再多费笔墨纸张和读者的宝贵时间来加以辩驳了。

四、科学和理性的仇敌——“形而上学”

前面说过，列宁曾指出不可知论的作用是在于“压低知识，以便给信仰扫清地盘”。列宁又说：“哲学唯心论……是经过人底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底侧面之一而达到僧侣主义的一条道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9页）梁漱溟是个十足的信仰主义者或僧侣主义者，他肆无忌惮地宣传着封建复古主义的信仰，反复歌颂他所谓的以“孝悌”和“礼乐”为主要内容的“孔教”，他的这种僧侣主义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他的所谓“生命派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他就是曲解了人的辩证认识过程的某一些侧面而达到他的这种僧侣主义的。梁漱溟既然以“发挥”孔子学说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所以，在借用了佛教的“唯识学”来“压低知识”之后，他立刻就以最大的力量从古代“儒家”——主要是宋明时代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即陆王派“儒家”的旧书堆里，同时也从西方最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柏格森的哲学里，去找寻通向信仰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道路。

所谓“形而上学”，照梁漱溟一流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所使用的意义来说，就是研究宇宙本体的学问。前面说过，梁漱溟把宇宙

本体看做一个“不断变化流行”的“大生命”、“大意欲”，他的“形而上学”，就是他企图用来引诱人们走进他这一套关于“大生命”“大意欲”的谎言网罗——主观唯心主义的梦呓——里面去的方法论。

梁漱溟认为由儒家继承下来的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其大意以为宇宙间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什么是“调和”？梁漱溟认为“调和”就是“相对待两意味或两势力”之间的“调和”。说“相对待固是相反而即是相成，一切事物都成立于此相反相成之调和的关系之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73 页），梁漱溟认为这是“儒家”的——实际上就是他自己所要“发挥”的“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梁漱溟认为宇宙本体，——他所谓的不断“变化流行”的“大生命”、“大意欲”，就只能看做“中庸”、“平衡”、“调和”的东西。因此，他把“中庸”、“调和”、“平衡”等观点看做他的“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观点。

（一）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本质

现在就让我们来把梁漱溟的这些观点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要指出以下的两点：第一，应该肯定，梁漱溟的言论所涉及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包括某些较杰出的儒家哲学者在内，曾多少臆测到（常常是在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形式之下）宇宙的辩证法，即对立的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认识到一切事物是不断变化的，而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事物内部包含着对立面，包含着“相反”的“两势力”。但这认识是不完全的，特别是缺乏最重要关于对立势力的斗争性的观念。第二，它说明许多儒家哲学者，特别是以“孔

教”的卫道者的面目出现的梁漱溟，把古代哲学的不完全的辩证法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曲解，曲解为折衷主义，说事物的变化就是对立势力的“调和”，而不是对立势力的斗争，因而在实质上就取消了辩证法，并由此走向否认真正的变化发展的形而上学的道路（这在后面我们将要加以揭露）。这种折衷主义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庸思想的基础，它是旧中国统治者用以掩盖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借此来辩护封建伦理道德，巩固封建秩序的一种基本方法论，也是梁漱溟用来“发挥”孔子学说提倡封建复古主义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基本方法论。它把对立势力的“平衡、调和”的意义过分地加以夸大，而把对立势力的不平衡和对立势力的斗争性在发展变化中的决定作用一笔抹煞。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6 页）。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同上书，第 297 页）梁漱溟的所谓儒家思想的看法则与此相反，把“调和”、“平衡”看做绝对的，说：“由调和到不调和，结果又归于调和”。“不调和，其实还是调和，此下之调和与上之不调和又为一调和，如是之调和为真，盖两相消而无表示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175 页）“调和折衷是宇宙的法则，你不遵守，其实已经无时不遵守了。”（同上书，第 182 页）这一切诡辩的谬误，是不难揭发的。因为，“调和”、“平衡”和运动、变化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说“调和”、“平衡”是绝对的，就等于否定了运动变化的可能性。反过来说，如果要肯定事物是永远自己运动变化的，那就必须同时承认对立势力的不平衡性和斗争性是绝对的。梁漱溟的那套观点显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们不必到别的地方去找证据，就是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也可以发现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很响亮地打了他自己的

耳光："水流必求平衡，若不平衡，还往下流……有时得平衡即不流"（同上书，第173页）。可见"平衡"即现出静止状态，而"不平衡"才是运动的原因。梁漱溟一方面肯定了宇宙的"变化流行"，另一方面却把"调和"、"折衷"、"平衡"夸大为宇宙的绝对法则。因此，只稍一触到客观事实就不能自圆其说！

为什么口头上自称已看到了"宇宙的变化流行"的梁漱溟之流，实际上竟又要固执着和"变化流行"的思想完全矛盾的"调和"观点呢？这是说明剥削阶级的偏见对于人们的认识的限制的最好的例子。封建地主阶级所希望的并不是社会的真正的"变化流行"，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永久的稳定，他们的代言人把这种主观希望当成了客观真理，就硬说对立的势力之间应该是绝对地"平衡"和"调和"的。他们力图调和剥削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以避免过分削弱自己，而在压迫人民时保证力量的"平衡"。他们也向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讲"调和"，目的在于使后者安于被压迫的地位，叫做"安位不相夺"。陈立夫的"唯生论"也曾依据类似的立论根据宣传过要老百姓"安分守位"的反动思想。口头上表示赞成"变化流行"的观点，实际上却进行着取消"变化流行"的反辩证法的诡辩，这也是现代一切最腐朽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者常常采用的卑怯手法之一。

当然，对于我们上面的批判，反对理性和科学的梁漱溟不会没有话来加以搪塞。他可以武断说：你们的批评都是按照正常逻辑的规律来做的批评，而我的观点却不能受逻辑规律的限制。我讲的是生命的问题，宇宙就是生命，"宇宙总是向前生发"，而这种"生发"的道理——"调和"、"折衷"的"宇宙的法则"，不是用科学和理智可以究明的。要领会宇宙的生命，要懂得"调和"思想的妙味，另有"孔子"的一套特别的"形而上学"方法。这套

"形而上学"方法和正常的理智、科学都没有共同点。"凡是形而上学的说话都是全反平时说话法的，若不与平常说话相反就不是形而上学"（同上书，第 175 页）！你说我那"调和""折衷"的观点和变化流行的观念有着逻辑上的矛盾吗？完全对！逻辑上的不通正是它的妙处，正是"孔子"的方法的特点；"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同上书，第 182 页）！孔子的方法和柏格森一样，他主张"形而上学应当一反科学思路要求一种柔顺、活动的观念"（同上书，第 174 页），这样，梁漱溟就通过对辩证法的折衷主义的曲解，而把思想引向反科学、反理性的——僧侣主义的道路。

关于宇宙都是生命的谬论，前面已经有过一些批判，不必再重复了。这里只研究梁漱溟用以公开反对科学和理性的他所谓"形而上学"的方法。从上面引用过的梁漱溟的一些话语里，就可以估计到，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内容不外是：（1）"调和"、"平衡"、"折衷"的"宇宙法则"是超出人的正常理解力之外的，所以要反对用理性和逻辑来对任何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2）既然不能应用理性，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认识宇宙本体这一个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目的呢？梁漱溟的答复是：要通过某种神秘的内心力量——所谓"直觉"、"冲动"、"仁"、"情理"之类。

上面的（1），梁漱溟叫做"无表示"或"一切不认定"。"这形而上学之所以为其形而上学的，有一个根本的地方就是无表示。"（同上书，第 174 页）"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切不认定。"（同上书，第 180 页）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调和"、"折衷"的妙味。"调和"是"两相反的势力"的"调和"，"形而上学"讲"调和"，就是要"浮寄于两相反的势力之上而无根。"所以要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不能在两者之间有

任何确定的表示。“一个表示都是一个不调和”（同上），“一认定，一计算，在我就失中而倾欹于外了”。“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同上书，第181页）根据这些理由，梁漱溟就向人类的理性和科学举行正面的攻击了。理性或理智的特点，照梁漱溟的说法，就在于要“表示”、要“计算”、要“认定一条道理一直往下推”。由此他就断定，人们如果依靠了理智，就不可能达到他所羡称的“调和”、“折衷”的美妙境地。“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同上）照梁漱溟的看法，要在这个事实的“圆”里走得通，就必须排斥一切理智上的“认定”、“表示”、“计算”等，把法国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柏格森所臆造出来的莫可名状的什么“直觉”发扬起来，才能达到目的。就这样，梁漱溟举起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旗帜，来号召人们跟着他反对理性，并走上他那神秘的——正确地说，盲目的——直觉主义的道路。

梁漱溟反对人类理性的这些根据，究竟站得稳吗？这些根据的主要点是：“事实像是圆”，是“调和”，而理智则是“直线”，是“不调和”，因此理智在事实面前就走不通。究竟实际情形是否真的如此？

第一，如果说“事实像圆”，这应该怎样解释？这决不是如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所曲解的那种混沌而不可捉摸的意思，这只能是说一切事物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和绝对单一的东西，而是多方面的联系，多方面的因素的统一体，首先是相互矛盾的对立势力的统一体。说理智是直线，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只能说人的思维往往只看见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某一种联系，而忘记了其他的方面和联系，也就是说人对事物的观察往往犯片面性的毛病，而片面的观察是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全体，和事物的内部矛盾的，所以

才“走不通”。但是，难道人的理智不能克服这片面性的毛病，不能对事物作多方面的观察和思维，使自己不再走直线，而能够和事实本身一样地表现为辩证的“圆”的运动吗？这样的理智难道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身，难道还是“走不通”吗？应该知道人的理智是能够克服片面性毛病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辩证法的方法来进行思维和运用理智，而不能依靠梁漱溟的那种不可捉摸的所谓“形而上学”。相反地，我们还应该指出，“走直线”和“片面化”的毛病，只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点之一，也正是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真正实质。梁漱溟的“形而上学”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说要通过“直觉”来体会“变化流行”的宇宙本体，另一方面是要用反辩证法的即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坚持他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教条。前一方面是它的表面形式，后一方面才是它的实质，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加以揭露。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梁漱溟攻击理性所依靠的根据是极其脆弱的，他把有毛病的理智当做了理智的全部，而不懂得，或者是故意抹煞了世界上还有无毛病的“像圆”形的理智（中国早有“智圆行方”的成语，梁漱溟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可能是故意抹煞），即唯物辩证法的理智，它的最高的表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表现的思想的全面性，就是最明白不过的现实例子。看见病人不能吃饭，就说一切人都不能吃饭，把局部看做全体，这正是梁漱溟的逻辑，也就是片面夸大的，“走直线”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好典型！

第二，如果说“事实像是圆”，是否就是像梁漱溟所说的那种混沌而莫可名状的“调和”、“平衡”的状态，是否就无法用人的理智来对它的情况加以“认定”，并做出一定的“表示”。当然不是这样。事物是对立面的统一，这就是说它所包含的各种势力是

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因此这些势力的每一方面都是各有其可以清楚地指明的与其他方面相对立的特点的，并且它们在统一体中相互的基本关系也不能是所谓“平衡”、“调和”的状态，否则就不叫做对立势力的统一了。阶级社会的各阶级关系是不可能“平衡”的，因为总有一些阶级是统治者，而另外的阶级则是被统治者，统治阶级总是要用国家的权力来支持统治的，单单这一点也就说不上“调和”。梁漱溟所一再歌颂的旧中国的什么“伦理”的秩序，就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而经常引起农民暴动的不平衡的秩序。梁漱溟在他 1949 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里抹煞了旧中国农民暴动的革命意义（这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88 页），并且和一切反动统治者一样异口同声地给它加上了“乱”的恶名，这不就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不调和的态度吗？梁漱溟对待实际问题何尝真正采取“调和”、“平衡”的原则？他的这些好听名词仅仅是为着掩盖地主阶级的罪恶，以便于在人民中间散布他的有毒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罢了。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7 页）这就说明事物内部状态不是“平衡”、“调和”的。即使是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样的组织也不能简单地建立在梁漱溟的“平衡”、“调和”的原则上，否则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应该被取消了。

至于说到对于事物的状况是否能用理智加以“认定”，并做出一定的“表示”，那也是完全肯定的。遇事不能加以“认定”，并做出某种确定的“表示”，这只是由于对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茫然

无知因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莫知所措的不自由状态。恩格斯说:“犹豫不决是以无知为基础,在许多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可能决定中,表面上似乎随意地任择其一,可是实际上它正是证明自己的不自由,自己对于自己所应该支配的对象之屈服。”(《反杜林论》,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37页)只要是对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就一定能够准确地加以认定并“自由”地做出某种肯定的表示。尽管事物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它必然具有某种具体的性质,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事物的矛盾在任何时候都必有一个主要方面,认清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能够“认定”事物的性质,并对这性质做肯定的“表示”,例如以反动派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以后,中国社会就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在事物矛盾内容的全面观察的基础上做出这种理智的“表示”,并不就会陷于“不通”的“走直线”的僵局,恰恰相反,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各种情况下都能真正走得“通”。因为这种全面的而同时又有重点的矛盾的分析法,保证我们能够注意到:事物的矛盾状态及其主要方面都是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事物的矛盾状态及其主要方面变化了,那么事物的性质也就会跟着发生变化。而我们的“认定”和“表示”也就要有所改变。这样的思考方法,是不至于把一定条件之下所确定了的“认定”和“表示”看做绝对不变的确定性,因此也决不至陷于“走直线”的僵局,也是很明白的。辩证法要求我们的思维既要具有灵活性,又要具有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它既反对思想的直线性和僵化,也反对绝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失去了灵活性的直线化和僵化的思想方法,固然是形而上学的,否

认认识必须有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也仍然是“片面”的、直线化的思想方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列宁在论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时，曾说：“它正是这样地‘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在恶劣意义下的独断论，变为死的、凝固的、僵化的东西；但是它同时正是这样地‘确定’，以便最坚决和断然地与信仰主义及不可知论，与哲学唯心论及休谟和康德底信奉者们底诡辩主义区别开来。”（《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63 页）梁漱溟在“形而上学”的名义之下硬说对事物不应有所“认定”和“表示”，这正是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诡辩的一种形式，也正是想要叫人们对于人类的知识和理性采取形而上学的绝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观点，同样是要使人“走不通”，甚至于是要使人安于蒙昧无知，使人根本不“走”。

但是，真正绝对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主张绝对的怀疑主义的人，他在提出这主张时，就有了一种“认定”和“表示”。不过这种“认定”不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的认识，而是脱离了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主观主义的武断。武断和犹豫不决在形式上好像相反，实质上都是出自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无知。武断不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那种具有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的正确认识，而是思维的极端片面和僵化的表现。口头上反对“认定”和“表示”的梁漱溟，在他的实际的思想中间，却是充满着无数的武断的。梁漱溟在思想上一如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他所宣传的对理智的绝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实际上只是为着散布蒙昧主义影响而向别人提出的要求，并不是自己真正要自己遵守的原则。因为任何人除非根本不进行思考，要进行思考，就丝毫也不能离开理智的思考，不过有片面和全面的差别罢了。梁漱溟也决不能是例外。口头上向

人宣传“不认定”和“无表示”，而自己恰恰是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十分露骨、十分顽固地“表示”要“认定”一个东西：以封建复古主义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口头上叫人不要“计算”，“不要操心”，自己的肚子里却藏着非常复杂的计算，为垂死的封建制度的命运和反动派的统治操尽了心思；连他自己有时也得意忘形地透露了自己是“好用心思”的；而他用心思的方法，恰恰是片面、僵化的“走直线”的形而上学方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曾妄想利用“知难”两个字吓唬人民，说只有领袖才有“知”的本领，人民想要“求知”是枉费气力的，所以就不必“求知”，只要盲目地跟着领袖去“行”就够了。梁漱溟用他的所谓“形而上学”来贬低理性，不过是为着要使自己的形而上学的理智能独占一切，而用另一种形式“发挥”历来封建主所爱好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种愚民哲学罢了。

了解了这一层道理，就有可能进一步领略那被梁漱溟说得神秘莫测的“直觉”的妙境了。所谓“直觉”，不外就是用来渲染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道路并以引诱人们走向盲目信仰为目的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空名词。这条道路本来是梁漱溟依据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物质利益而并不神妙地用“理智”（正是他所谓的“走直线”的、“呆定”的形而上学的理智）“经营”和“计算”出来的，为着要在人民心中诱起一种盲目信仰的感情，就按照唯心主义的以精神、意识作为第一性的东西的原则，曲曲折折地把它说成是纯粹出自内心的某种非理智的神秘的直觉。“直觉”是什么？“直觉”在实际上就是宗教家杜撰出来的所谓“神的启示”的哲学别名。使用这类名词的目的是为着要吓唬老实人，说：第一，我梁漱溟的“形而上学”以及一切关于社会、政治的观点，都不是用理智“计算”出来的，而是“神授”、“天予”的。梁漱溟曾常以

“天生德于予”的圣人自居，这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吗？第二，人们也不要希望用理智来评判我梁漱溟的各种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只有通过直觉——“神的启示”才能真正为人所领会，没有幸运领受神的启示的人只有盲目地跟着我去信仰就行了。如果人们真的相信了这种哄骗，并因此就放弃了应用自己的理智的评判权利，那么梁漱溟就达到了掩盖自己的立场的目的了。因为只要稍稍认真应用一下理智的分析，就一定会把它的封建的反动的本质揭露出来的。

（二）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现在还要进一步看看，梁漱溟是如何渲染他那神圣化了的“直觉”的？它的本质何在？

照梁漱溟的说法，直觉的奥妙，首先就在于它是出自人的内心，就是出自所谓的“良知”或“本能冲动”（实际上也就是僧侣们的“神的启示”的别名）等等，“直觉”要求人们“向里用力”，而不要像理智那样把“心思力气向外用”（《中国文化要义》，第218页）。“向里用力”有什么好处呢？梁漱溟认为好处就在于：凭直觉“向里用力”，就能领会那“自然流行、日用不知”的“天理”，领会孔子孟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原则。梁漱溟在这里是把孟子的唯心主义说教作为自己的主要根据的；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梁漱溟硬说，如果靠理智“向外用心思”，则只能看见一些“呆定”的“客观道理”，“反倒成了形式”而不能领会“天理”，因为“天理不是认定的一个客观道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87页）。这样，梁漱溟就把他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尖锐地对立起来。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时，曾指出了这两条路线的对立本

质："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呢？恩格斯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论的路线的。马赫是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论的路线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页）梁漱溟的所谓"向里用力"的路线，正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即把物质看做是感觉和思想的主观内省的产物的路线；而他所反对的"向外用力"的路线，正是一切科学思想所遵循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即把物质看做感觉和思想的来源的路线。梁漱溟曾引用了《礼记》的《祭统篇》的一段话，把他所谓"向里用力"的唯心主义路线的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于心也"。梁漱溟自己也明白地表示一定要把"向里用力"当做是建立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根本方法，他以为只要"向内看"，宇宙就似乎能够"复化为精神的宇宙"了。他反对"向外看"，就是因为"向外看，一切皆物"（《中国文化要义》，第291页）。其次，梁漱溟认为，直觉的奥妙，还在于它是能够"超出利害"以求"真"，没有任何"计算"、"打量"，也就是没有"私心"，因此也才能够体会"自然变化流行"的"天理"，"如臣当忠、子当孝"之类。至于理智，那是要"打量"、"计算"的。而要"打量"、"计算"就通通谓之私心："理智是给人作一个计算的工具，而计算实始于为我"。理智要"分别一个物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88页），"理性是自顾的情绪的最高形式"，"智力与思辨……促个人主义之发达"（同上书，第256页）。所以，照梁漱溟的看法，理智是一切自私自利，伤天害理的罪恶根源，梁漱溟眼中的"西洋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所以弄到"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虽家人父子也少相依相亲之意"（同上书，第262页），就是由理智造成的恶果。"逼狭严酷，干燥乏味"，这就是梁

漱溟以极端痛恨的心情来诅咒理性时所使用的字眼。

让我们就把这两点拿来分析一下。直觉是出自内心，而理智则是“向外用心思”，这个形而上学的区别能否成立？我们说一半能够成立，一半却是骗人。能够成立的是梁漱溟所要想否定的这一半：理智是“向外用心思”，它使我们“认定”“客观道理”，使我们知道“向外看，一切皆物”。这一切都完全对。因为健全的理智，或理性，尤其是科学的理论，的确能够循着“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而正确反映（或“认定”）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能够证明世界的物质性。而这一切都是唯心主义者梁漱溟所害怕的，因此，他才要极力反对这“向外用心思”的“理智”。但他没有想到，当他这样反对理智的时候，他已在无意中泄漏了自己（以及现代一般主观唯心主义者）对于健全的理智所感到的慌乱心情和他之所以要侈谈“向里用力”的秘密。他好像是在向人作这样的自白：我懂得人们只要睁开了眼睛，就无法否认周围的一切都是物质的东西，所以我就要鼓励人们闭着眼睛去幻想，这样才有可能用我的把宇宙“化为精神的宇宙”的戏法去骗住他们。

至于梁漱溟所极力要想肯定的那一半，即把直觉叫做是出自内心的东西，那完全是骗人的谎话。只要撇开那许多烦琐不堪的空话，把它在“直觉”的名义下所“认定”了的那些具体内容稍稍加以考察，就立刻可以戳破这类谎话。例如，“仁义礼智”，“臣当忠、子当孝”，“孝悌的提倡，礼乐的实施”，孔子的“三年之丧”制，对祖宗的“祭礼”等等，都是被梁漱溟认为出自内心直觉的种种理想的美德：“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于心也”。但实际上真的有这一回事吗？只要是对于历史多少有些科学理解的人，都知道梁漱溟所歌颂赞美的这一切东西，都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是封

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由封建经济基础的“物自外至者也”，而非纯粹地“自中出于心也”。梁漱溟的书里有许多辩解，说这些思想、制度所表现的都是人和人的“伦理”关系，而不是封建的社会关系。这当然是十足的武断。首先这里面就有着“臣当忠”这一种封建的社会关系。此外还反映着封建的宗法族长关系。旧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和原始公社的宗法族长制度的残余紧密结合着的，也可以说宗法族长制度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利用来巩固封建秩序的。梁漱溟所谓的“伦理”关系，其实正是带着强烈的封建性质的宗法族长的关系，决不是他所谓的“人心所同然”的永久不变的“伦理”关系。难道“三年之丧”的制度也能成为“人心所同然”的么？孔子的弟子宰予的“心”，在这件事情上就坚决表示了不肯“同然”，何况近代的人心？自然，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任何一种思想、制度，都是要通过人“心”也就是人的意识来实现的，人在接受某种思想、制度（经济制度除外）时是多少经过自己的犹豫和选择的。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然而人们所选择的任何一种思想、制度归根结蒂还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某些方面的反映，所以人的主观的能动性也不能超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容许的范围之外。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的思想、制度的最后根源。而人心或人的意识决不是最后根源。但是，人们在依据某种思想、制度而进行活动的时候，对于这思想、制度的客观的物质根源通常是不会自觉到的，相反地常常以为自己的行动是纯粹出于自己的心愿和自己的选择，于是这些思想、制度的根源在人们的眼中看起来就好像是完全出自人心。这是人类生活反映在人的意识里时常有的一种颠倒的假象。唯心主义者就利用和夸大了这种假象，来否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第一性的决定的意义，硬说人心就是各种思想、制度的最后根源，

并把他们自己所拥护的思想、制度说成是惟一真正出于“人心所同然”的，以掩盖它的剥削阶级的本质，而便于在群众中扩大它的影响。这正是“走直线”和“片面化”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一种表现。梁漱溟把他所想要巩固的封建制度说成是出自人类内心的“直觉”，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的思想、制度当做是永恒的人性的表现，两种说法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一定阶级的物质基础的“外铄”反映，也同样是利用形而上学“走直线”的方法把“非外铄”的颠倒假象夸大成事情的本质，来迷惑人民以为剥削阶级服务。

再看第二点，梁漱溟所谓“直觉”是没有“打量计较”，专门“超出利害以求真”的，而理智则给人带来“逼狭严酷，干燥乏味”的“私心”。真的吗？在这里，首先应该指出梁漱溟对于人类理性是使用了一种在逻辑上“偷换概念”、蒙混事情的不正当的手法。他把个人自私的“打算”和科学知识上所不可少的周密“计算”两种不同概念故意混淆起来使用，制造出中伤理性和科学的借口。理智的运用是包含计算的成分的，特别是科学研究的理智，必须对事物的量的变化做出精确的计算，因为量和质同样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定性，不进行量的计算，就不能正确地、至少是不能精密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也就不能使我们的实践行动获得准确的思想指导。例如我们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出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改造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关于事情的质的规定性的认识，同时对于总路线发展的量的方面的计算也是我们的认识的不可少的方面，例如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时间的久暂，每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速度以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等等；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包含着极其

庞大的计算工作。没有这一切量的“打量”和“计算”，就不能正确地或精密地认识过渡时期的规律，就无法制定五年计划并使总路线的思想方向变为实践。可见，对于客观事物的量的规定性的“打量”、“计算”，是理性和科学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理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打量”、“计算”，这也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梁漱溟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遵守着正当的逻辑规律，他利用了“打量”、“计算”这些字眼上的双关性，偷偷地把科学的周密“计算”的意义改换成个人的自私打算的意义，于是就把他所谓的“西洋人”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损人利己的败行恶德——这一切资产阶级丑恶本质的表现——硬归罪到理智和科学的身上。这是现代一切最腐朽最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典型的诡辩！

（三）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阶级本质

但是，梁漱溟之诅咒科学和理性的“打量”、“计算”，还有其他的隐秘的用意，必须进一步加以揭露。

第一，资产阶级的确也曾为自己的利益利用过自然科学，资产阶级在它的进步时期，为着得到利润，曾利用自然科学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又利用科学技术来压迫工人阶级，来进行殖民地掠夺和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人类空前未有的痛苦和灾难。但这些罪恶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罪恶的本质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科学的“计算”引起的，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现代反动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叫嚣所谓“科学文明的破产”，其目的就是想把帝国主义时期反动派的一切罪恶用这个捏造的口实轻轻掩盖过去，以迷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及被压迫民族，包括旧中国人民。梁漱溟的上述论调，不过是站在中国地主阶级

立场上来为帝国主义思想代表者扮演一个帮腔的角色而已。

第二，科学和理智也不仅仅只是要人对于事物的量的规定做出客观的“打量”、“计算”，它同时还是工人阶级用来对自然界和社会腐朽势力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社会科学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能够正确地计较各方面的阶级利害关系，指导他们在实践行动中分清敌友，掌握正确的战略策略，因此，就不至于迷失道路。但是，这和个人的自私打算决不是一回事情，是谁也能明白的。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就能帮助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正确地分析社会的阶级矛盾，“打量”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能使他们提高觉悟，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力量发动和组织起来，以便对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任何时候也不要陷入反动势力的谎言网罗或受到他们的种种假象和骗术的摆弄。然而这样一来，地主阶级及各种反动势力所希望的“调和”和“平衡”就要落空了。梁漱溟说理智的每一个认定，每“一个表示都是一个不调和”，其实质就是指的这种情形。梁漱溟一生仆仆风尘，“十多年之中，或语或默，或出或处，或进或退”(见梁作《答香港骂我的朋友》)，都是为着要使劳动人民对于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统治（例如过去蒋介石的统治）采取“调和”、“平衡”的态度，要求他们“安位知足”，不要作“乱”。然而中国共产党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引导人们起来破坏了他的美梦。你叫他怎能不痛恨理性和科学，怎能不反对人民的“打量”和“计量”，怎能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呢？

第三，梁漱溟反对“打量”、“计算”，有时又是为着向封建地主阶级和反动派本身进谏的。地主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中间倒的确是充满着千种万样的个人自私的“打量”的。他们自己内部的勾心斗角经常使得他们相互间无法“调和”，并因此削弱了本身的

阶级力量，在与广大人民斗争的时候就得不到“平衡”。“逼狭严酷，枯燥乏味”，决不是理性和科学的特点，但如果蒋介石、陈立夫之流的集团中人也算得有“理智”的话，那么，他们那种阶级的“理智”倒的确是“逼狭严酷，干燥乏味”到了极点了。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然而这对于他们自己的阶级也是有很大不利的，因此梁漱溟就要以御史的态度向这些现代的君王们提出谏诤——表面上也叫做“批评”，也就是所谓“小骂大帮忙”的意思——，劝他们减少一些“理智”上的“计算”、“打量”，节制一些个人的“私欲”，要凭“直觉”、“本能”（阶级的本能）去领会那“超出利害打算”的“天理”。“天理”这名词的现实意义在实际上就是指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说要节制私欲来领会“天理”，就是说要减少一些局部的利害打算来照顾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不要只注意太小的个人“打算”，而要为整个剥削阶级作大的“打算”。梁漱溟的“直觉”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就是要为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者作全盘的大打算的思想活动。梁漱溟的这些观点的实质，对于地主阶级及反动势力来说，的确不失其为最美妙的理想。可惜“私欲”是剥削阶级的最重要、最强烈的本能之一，要希望他们对个人的私利不作锱铢必较的小打算，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两千多年“儒家”的“形而上学”者虽然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了千万遍关于“天理”、“中庸”、“调和”、“去私欲”之类的诤言，劝他们按照这些原则为自己的阶级作大的打算，但对于他们始终是“耳边风”，儒家的美妙理想终归是幻想，而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在实践中间一般地总是宁可算小账而蚀大本。梁漱溟继承了“儒家”的幻想，说教之勤也可算到了唇敝舌焦的地步了，但也终于挽救不了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

梁漱溟的“直觉”的神秘化的烟幕，到这里可以说已经完全

揭开了。梁漱溟为了把这烟幕渲染到最蒙眬的程度，还利用了其他一些儒家哲学中的漂亮词汇，如“仁”、“刚”之类。这些词汇实质上是“直觉”的同语反复，它的意义已不需要多加申述，所以在这里只简单的提一下：

首先是“仁”，梁漱溟在这个名词下面杂凑了许多宋明理学和佛学的观点。“‘仁’与‘中’异名同实，都是指那心理的平衡状态”。“仁之重要意味则为宋明学家所最喜说而我们所最难懂的‘无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90—191页）。“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我且说为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的一个状态，似乎可以分为两条件：(1) 寂——像是顶平静而默默生息的样子；(2) 感——最敏锐而易感且很强”（同上书，第188—189页）。“仁的生活”是什么呢？据梁漱溟说：“可以把他分作两条：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的宗教”（同上书，第206页）。“刚”，据梁漱溟说：是“很难作到的”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于欲望的计虑”（同上书，第311—312页）。所以“刚”也是一种和梁漱溟所谓的“私欲”对立的直觉作用。“枨也欲，焉得刚？”我们看看这些定义，就可以知道，梁漱溟的所谓“仁”和“刚”，和他的“直觉”是异名同实的概念。它所要求的具体实践内容，就是“孝悌”、“礼乐”之类的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关系，它所标榜的态度，仍然是假装要讲究“里面的力气”和“无欲”，即是向人民要求不要观察外面的“客观道理”，不要计算自己的阶级利益，要“稳静平衡”，“安位知足”，也就是要按照“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原则盲目地任随反动阶级去随便摆弄。违反这种原则的“状态”，就叫做“暴慢乖戾之气”。〔附带指出一下：在梁漱溟心目中，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就是“暴慢乖戾之气”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梁漱溟曾和所

有反动派人物异口同声地举了五四运动以后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为他诬蔑攻击的对象，说“这两年来的种种运动——注：指五四运动以后两年——愈动而人愈疲顿，……都只为胡乱由外而引逗欲望，激励感情，为一时的兴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13页）。〕另外一方面，“仁”和“刚”的那些定义，也同样可以说是要向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人们劝告减少太强烈的“私欲”以维护自己阶级的全体利益。“寂”和“刚”的标语，在实质上也可以解释为要求剥削阶级“稳定”、“坚强”地把握自己的立场，不要为太强烈的局部的利欲所动摇的意思。“寂”就能“感”，这是说稳定不动地把握了剥削阶级的立场，就能同时表现出一种敏锐而强烈的阶级感觉，随事善于照顾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善于为剥削阶级作最大的“打算”的意思。梁漱溟说：“欲念兴直觉即钝，无欲非以枯寂为事，还是求感通，要感通就先须平静。平静是体，感通是用。”（同上书，第191页）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者，梁漱溟是知道用最大的苦心来劝告自己阶级的人们力求保持稳固的阶级立场、敏锐的阶级嗅觉和强烈的阶级感情的。对于这一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倒可以引为借鉴：既然剥削阶级里总是有人这样处心积虑地在激发着他们自己阶级的斗争性，那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更应该时时注意努力，加倍地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提高自己的阶级警惕性，坚决消除在阶级斗争中的种种右倾麻痹情绪。

最后还要提到一点：在1921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对于理性和科学表示了最高度的仇恨的梁漱溟，到1949年出版《中国文化要义》的时候，却忽然大谈起“理性”来了。是梁漱溟的思想变了呢？还是因为“直觉”和“仁”之类的陈腐辞汇在新的情况下已失去了蒙蔽人的作用，因此不能不采用新的魔法？答案

是明白的，因为梁漱溟在这本书里公开做了声明：说自己的“见解大致未变，说法稍有不同”，显然他的“理性”只是一种新的烟幕了。梁漱溟看得见1949年的中国人民已经深知“理性”和科学的重要，公开地反理性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就把从前称为“直觉”、“仁”等等的东西，硬戴上“理性”的假面具，以图在市场上蒙混。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梁漱溟又进行了许多最生硬最烦琐的诡辩，首先是把“理性”和“理智”对立起来，把“理性”硬说成是非理智甚至于反理智的东西：“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中国文化要义》，第138页）这样一来理性竟不是理性，而只是一种感情了！究竟理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梁漱溟的回答是“清明安和”、“和乐恬静”等等的形容词。这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形容“直觉”和“仁”的“稳静平衡”之类的字眼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在“理性”这个字眼下面，梁漱溟再一次肆无忌惮地歌颂旧中国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表示拥护《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还没有提到过的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孔子的“正名”思想，甚至于对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也赞不绝口，甚至于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类保皇主义的调子也公开地唱起来了。与“理性”的“清明安和”相对立的东西，梁漱溟叫做“愚蔽偏执之情”和“强暴冲动之气”，梁漱溟用这些恶毒字眼似乎是在咒骂“理智”，实际上是想中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人民的革命运动。梁漱溟说：“人祸之所由起及其所以烈，实为愚蔽偏执之情与强暴冲动之气两大问题”（同上书，第120页）。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已基本胜利的时候，梁漱溟却大叫“人祸”，这不是偶然的，地主阶级及反动势力在自己还有相当支配势力的时候，通常是把人民的革命运

动叫做“作乱”；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在他们的眼中当然就是灾祸了。当时帝国主义的通讯社把蒋介石南京小朝廷的陷落叫做“灾难性的事件”，这和梁漱溟的“人祸”的叫喊声是互相呼应的。梁漱溟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可以说明他所谓的“理性”的风度。即：“内有自觉而外无所为”（同上书，第 290 页）。梁漱溟口中说出这句话来的真正涵义，完全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内心里包藏着极强烈的剥削阶级打算而在外表上装着淡泊无为的样子。真正是“夫子自道”！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梁漱溟的伪君子的两面派的本色，被他自己的一句话形容尽致了！

五、开倒车的历史观

最后，我们想专就历史观点这一方面来对梁漱溟的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批判。

（一）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梁漱溟的历史观点，一如他的一般世界观一样，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露骨地主张个别天才人物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否认“客观的道理”，也就是从根本上抹煞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说：“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出之成功虽必有假于外，而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原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227 页）他所崇奉的中国“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或“古圣人”，就是从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及现代中国的反动派和许多封建遗老们所崇拜的一

半出自神话传说的所谓“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他首先凭空提出一个武断的前提，说这几个人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由此做出自己所希望的结论：旧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比西洋文化要更高一级。他就是用这样的逻辑来为他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制造根据的。

主观唯心主义一般地是不能够完全单独站稳脚根的。梁漱溟要想使人相信他的封建复古主义，就不能不装出预言家的姿态把他所幻想的那条所谓“中国的道路”，硬说成是将要以一定的必然性代替“西方的精神”而在全世界兴起来的道路，彻底地遵守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则，说历史的发展方向完全决定于偶然出现的几个“非常天才”，而没有它自己的一定的必然性，那么，谁能保得定梁漱溟的说教一定能够成为事实呢？所以，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对于封建复古主义者梁漱溟也是有某些不便的。但是谈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对梁漱溟也有另外的危险，必须不要过分认真才行。因为，如果真要认真地去研究和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就不能不“向外用力”，去寻找这必然性之所以能成为必然性的客观的物质的原因，也就是要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去找出必然性的根据，具体地说，就是要接触到生产，阶级斗争，就要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向外看，一切皆物”。这不是很明白的么？一接触到这些客观的物质的必然原因，那么，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便要完全垮台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的精确性并且通过实践证明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也要向前进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激化起来，最后通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想要使世界由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退回到中古封建时代，是历史

的客观规律或“客观的道理”所不容许的，而代表中国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要想不被人民打倒而长久地维持其地位，事实证明已是不可能的。为着避免碰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怕的真理，梁漱溟也就不敢真正认真地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必然原因。不研究事物的客观的必然原因，是否也有办法把自己的某些观点说成是好像有着一定的必然性的呢？有是有的，但这办法就是要循着唯心主义的道路主观地虚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必然性的概念。列宁指出过两种互相对立的必然性的概念，说：“承认自然界底必然性并且从其中导出思维底必然性来，这是唯物论。从思维中导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来，这是唯心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4页）梁漱溟就是依靠从思维中主观地虚构的精神原理来引导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必然性，由此制造出一幅近似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图画，来弥补主观唯心主义的某些太容易被人识破的漏洞的，他的虚构大致是这样：决定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东西，是不与任何个人相干地，在宇宙中神秘地存在着的一种“精神”，一种鬼魂般地作祟着的“意欲”。由于不知什么原因，这“意欲”的活动发生了方向上的分歧，于是人类的生活，历史的发展也就出现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那“意欲”忽然想起要“向前要求”，于是就有了“西方化”的那种崇尚“理智”、“分别物我”提倡科学和民主的道路。“意欲”在中国又想要“自为调和持中”，于是就有了中国式“东方化”的那种崇尚“直觉”、“安分知足”、“人与人的尚情感而鲜计较”、“一切学术莫非玄学化，艺术化”的道路。“意欲”走到印度，偏偏又要“反身向后要求”了，于是就有了印度式“东方化”的那种“厌世”、“出世”、“超绝”、“神秘”的宗教的道路。

照梁漱溟的主观设想，由意欲要求的分歧所引起的这三条文

化道路，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三步骤”或“三层次”。“西方化”的意欲要求“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这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层次”或“步骤”；中国式“东方化”的意欲要求“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这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第二个“层次”或“步骤”；印度式“东方化”的意欲要求“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61页），这在梁漱溟看来应该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第三个也就是最高的“层次”或“步骤”。于是，在梁漱溟的著作里就出现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开倒车”的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必然前途原来是这么阴暗的：由科学、理性走向“玄学”、“直觉”再走到宗教、“现量”，由向前发展的要求进而“盘旋不进”、“安于现状”，最后是落到要“厌世”、“出世”。梁漱溟知不知道，设想出这样一套不长进的历史观点，对于人类的智慧和尊严是多么大的侮辱?！非常讲究“直觉”和“敏感”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他的“直觉”好像就特别迟钝起来，这说明他的“直觉”和“敏感”是带有反动腐朽的阶级性的“直觉”和“敏感”，与一切进步人类的“直觉”和“敏感”有根本的不同。他还根据他这一套退婴的观点，洋洋得意地向世界人类发出预言，说什么“古代的中国”“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以及“古代的印度”“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并且以十分确信的口吻，断定“此刻正是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现在的哲学采色不但是东方的，直接了当就是中国的”（同上）。封建复古主义的偏见，竟能使一个人迷失理性到这样的程度！

梁漱溟的这号历史观点，不但与全部过去人类本身的历史相矛盾，而且也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实践所否决。现在中国的确是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但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依循着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规律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决不是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所虚构的那种向旧封建中国的方向倒退的“过渡时代”；现代的文化是向着最高的科学、理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方向前进，而不是由科学、理性的光明世界走向玄学、宗教的阴暗境地。这在目前已是小学生也能知道的常识。梁漱溟的这号历史观不但在客观历史事实前面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单讲逻辑，也完全站不住脚。既然由科学、理性到玄学、“直觉”再到宗教、“现量”是一定的“步骤”或“层次”，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老早就分别走到了玄学、直觉和宗教、现量的境地，而不必经过第一和第二个“步骤”或“层次”呢？梁漱溟的答复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在“古初”出了几个“天分太高”的“非常天才”或“圣人”。然而问题又回过来了，既然偶尔出现的几个“非常天才”可以决定文化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那么三条道路之间的关系怎能看做是一定的“步骤”或“层次”的关系呢？归根结底，在梁漱溟的思想体系中，那戴上了合理的假面具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掩盖不了最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

（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梁漱溟如何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梁漱溟公开表明他不承认历史发展过程有任何客观的物质的原因，他自称是“释迦慈氏之徒，不认客观”而“只认主观的因”(同上书，第 64 页)。梁漱溟和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剥削阶级代表者一样，当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首先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加以一番曲解（或者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一窍不通，或者是出于故意曲解），把它说成好像是一种机械决定论

的样子，然后就向着这个自己主观上幻想出来的妖魔开火。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梁漱溟就用主观唯心论来反对被他机械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了。他说："那种唯物史观……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其实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这个话在夙习于科学的人，自然不敢说。他们守着科学讲求因果的夙习，总要求因的，而其所谓因的就是客观的因，如云只有主观的因更无他因，便不合他的意思，所以其结果必定持客观的说法了"（同上）。这里他所攻击的是这样一种机械论：把人类的文化看做仅仅是"客观原因"的消极反映，否认主观因素的任何能动作用。他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片面的唯物主义。

1949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已在中国获得胜利的时候，梁漱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才多少感觉到一点模糊的影子了。这时他在《中国文化要义》里，已不是抽象地谈"客观的因"和"主观的因"的对立以及"因""缘"之类的烦琐哲学，而是具体地谈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并且竟然已不能不承认经济的基础地位，也就是不敢再像从前那样根本否认"客观的因"的存在了。他说："经济诚然可说是一切上层建筑（道德、法制等）底基础；但必谓一切上层建筑都是被决定底，则亦不然。即如秦国当时，怕正是倒过来由上层建筑（新法）而促其经济起大变化罢"（《中国文化要义》，第33页）。在这里，梁漱溟的战术是：在自己的第一句话里表示承认经济是基础，而第二句话就把上层建筑的某些相对能动性极端地夸大起来，用以否定、推翻自己的第一句话，说经济不见得一定起决定作用，至少它的基础的意义在秦国是例外，也就是说，它不见得一定是基础，等等。梁漱溟

自己说过："凡是形而上学的说话都是全反平时说话法的"，诚然，梁漱溟的"说话法"的确是违反普通逻辑的"形而上学"的好榜样！

更有趣的是，梁漱溟的"形而上学"还有这样神妙的作用：它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前一段话里是梁漱溟的唯心主义的敌人，而在后一段话里却被梁漱溟引为思想的朋友；甚至于好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赞成梁漱溟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虽创为唯物史观，其持论亦不如流俗所传那样"。他说："根据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1890 年 9 月）即明白指斥如以经济为惟一决定因素即属荒唐；而肯定经济虽为根基，但其上层建筑如政治宗教等一切，亦同样地在历史过程中，有着他们的作用；而且亦影响于经济，有着一种交互作用，——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彼此间意见亦无甚不同"（同上书，第 36 页）。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决不是"无甚不同"，而是根本不同，就拿梁漱溟用自己的话很不确切地转述了的这段恩格斯的话来说，也和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根本不同的，因为这里是说：经济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交互作用，但究竟经济是"根基"，也就是恩格斯在同一封信里说的"最后决定的因素"（这一点梁漱溟却没有去引用）。指出经济是"最后决定的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难道能说是与否认经济的决定作用，甚至于否认任何"客观的因"的唯心主义思想有任何共同点吗？然而，为什么梁漱溟要说恩格斯的这些话和他的"意见亦无甚不同"呢？这不是因为恩格斯的意见真正和他的"亦无甚不同"，而是在他转述了恩格斯上述的一段话之后，立刻就加上自己的主观的引申和曲解说："经济不止无片面决定力，而且其势力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同上书，第 37 页）。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梁

漱溟的思想和梁漱溟脑袋里曲解了的恩格斯的思想“彼此间意见亦无甚不同”！

我们不怕麻烦地谈了这许多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目的是想说明一件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一个构成部分——的辩证性和全面性（同时也就是高度的科学的准确性）对于剥削阶级“学者”们的那种片面、“呆定”、“逼狭”的“形而上学”头脑来说，是如何地难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是一幅变幻离奇的蜃景，忽然像机械论，忽然又像唯心主义。当他们听说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原因时，他们就说这是机械论，因为他们的呆脑袋硬要在“最后的”和“惟一的”这两个不同的形容词之间划上等号，硬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机械地主张经济是“惟一”的原因。当他们又听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上层建筑也有它的相对能动性，认为主观因素对客观物质条件有一定的反作用时，他们就得意起来，说连马克思、恩格斯都赞成我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了，别人还能有二话吗？因为他们的主观主义耳朵把“相对的能动性”听成了“绝对的能动性”，把“一定的反作用”听成了“惟一”的决定作用了。剥削阶级的“学者”们常常就是这样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和根据这样的看法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梁漱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

为着正确地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并有力地批判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必要把梁漱溟所转述的恩格斯的原话引用一下。恩格斯说：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惟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

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经济状态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胜利的阶级在战胜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宪法之类——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现实的斗争在斗争成员的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这里存在着这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的运动是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些事物和事件：它们互相间的内在联系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于确定，使得我们可以把它撇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16页）

这是恩格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很简单的概括。这里说得很明白：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并且要反对）机械论，把经济看做惟一决定的东西的机械论，是“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是“作为必然性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因此它和唯心主义决不是“亦无甚不同”，而是完全不同，并且相反的。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上层建筑有一定的能动作用，这作用是“对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注意：是影响，而不是决定作用）”和“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注意：只是对历史斗争过程的“形式”而不是对实质、内容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和主观唯心主义者梁漱溟把“主观的因”看做惟一的因，把

"秦国"的上层建筑看做是不仅影响，而且决定着秦国历史变化实质的看法，不但不是"亦无甚不同"，而且是"根本的不同"、"截然的不同"。

再说一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第一性的"客观的因"，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第二性的因素。正如反映的影子只能由被反映的对象产生出来一样，上层建筑只能由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而不能凭空产生出来。它产生出来之后又对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的反作用，但这反作用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反作用——推进或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作用的范围和性质最后仍然为经济基础所规定。它的作用不能大到取消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而自己成为决定一切的东西，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所想的那样。"秦国"的"新法"，只是在秦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的，而不是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梁漱溟所想像的那样，好像是由商鞅之流凭空想出来的，商鞅之流的人不过是在当时比较善于观察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因而就反映了新的势力的要求。只有这样产生出来的"新法"，才能对于当时的经济、以至于整个秦国的社会历史发生很大的反作用，因为这种"新法"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新的客观的社会势力和经济条件作为依靠的，所以才能成为具有实际力量的东西。而它的这种反作用，它的力量，又仍然为经济条件所规定，这就是说，这种作用无论怎样大，但它的实质，仍不外是对于已经开始了的（哪怕是萌芽状态的）经济变化和新的阶级势力的要求的实现给予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使它由不显著的、缓慢的变化进入十分显著的飞跃的状态罢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已生长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或

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即合作社经济等），它在过渡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中表现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它的存在规定着我们国家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向，我国的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并且反映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情况的。这些上层建筑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基础起着极大的积极作用，它强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推动着我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然而这种积极作用所要求的目的和趋向，终归仍是由我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建成）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规定了的。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辩证的，它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交互作用，又指出这交互作用中存在着重心，即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交互作用说明事实的确“像是圆”，指出了交互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性，就在认识上全面地反映了这个“像是圆”的事实，而不至于成为“一条直线”，以至于“结果就走不通”。但交互作用中又有重点，说明事实决不是像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平衡”、“调和”状态，“平衡”、“调和”到仿佛使人无法捉摸，以至于对它根本就不能加以“认定”和有所“表示”。交互作用里面既然有了重点，就一定能够捉摸，一定能够加以“认定”和有所“表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就能做出这样的“认定”和“表示”：经济基础在它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是最后决定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原因。否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把经济基础看做惟一决定的东西，固然是片面的认识，只承认两者的交互作用而看不见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也是片面的观点，把两者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地

加以曲解，硬说上层建筑的相对的能动作用就是它的决定作用，这更是由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引导到了唯心主义的诡辩。梁漱溟之流的“形而上学”者的“理智”，总是喜欢望着片面的“一条直线”走的。听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当做历史发展过程的最后决定的原因时，他就把这条原则片面地划成“一条直线”，而断定它是把经济当做“惟一”决定原因的机械论；再又听说恩格斯指出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过程也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他又由此再片面地划另一条直线，然后做出他一心想要做出的武断，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和他这主观唯心主义“亦无甚不同”！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不可动摇的

唯心主义思想的秘密，就在于依据了剥削阶级的利益，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客观事物本身的多方面的联系，以及人的认识（为了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所本来应该有的近似于圆形或螺旋形的全面认识截成片段，并把某一片段硬划成“一条直线”。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一文里说：“从辩证唯物论底观点看来，哲学唯心论是把认识底诸特点、诸方面、诸界限之一片面地、夸大地、过度地（狄慈根）发展（吹肿、胀大）为与物质和自然分离的、神化了的绝对”。“人底认识并不是直线（也不是循着直线进行的），而是那无限地近似于一系列圆形、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这曲线底任何一个断片、截片、小片，都可以转化（片面地转化）为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一直线（如果只看见树木而不看见森林）就会导引到泥坑，导引到僧侣主义（在那里统治阶级底阶级利益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与片面性，死板性与僵化性，主观主义与主观盲目——这就是唯心论底认识论的各种根源”（《黑格尔

〈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9页)。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切谬论——首先是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这个谬论，都可以从形而上学的直线化这一点找到它的“理智”上的、认识上的根源。

梁漱溟1921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说成是与“西方”及印度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1949年的《中国文化要义》，自称“见解大致如前未变，说法稍有不同”(《中国文化要义》，第290页)。“说法稍有”什么“不同”呢？1921年，中国先进人士才开始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久，那时他还敢于放手使用一切唯心主义的术语，肆无忌惮地逞弄唯心主义的诡辩。1949年，全国人民广泛地开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为着要使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这样轰轰烈烈的思想前进潮流中多少具有抵抗的力量，以便再一次来推进封建复古主义的逆流，梁漱溟就也来谈论社会发展史，并且偷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个别词句，甚至于有时还以肯定的态度，但经过若干歪曲地来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原理。梁漱溟显然是想把这些作为“画皮”，以掩盖主观唯心主义的妖魔，使它便于混进思想的市场。这就是他所谓“说法稍有不同”的真义。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谈到了“何谓阶级”的问题，他肯定了阶级的基础是“剥削关系”，肯定了阶级发生的原因是“在一社会中生产工具（注：他并没有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把“生产资料”误为“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分家（注：这里他又把生产者误为“生产工作”），占有工具之一部分人不工作，担任工作之一部分人不能自有其工具，就构成对立之阶级”(同上书，

第155页)。他又承认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阶级之发生的决定作用,原始公社生产力太低,“社会没有分工,一个人劳动生产于养活自己外,不能有多余,阶级便不会发生”(同上书,第156页)。他甚至在一个地方肯定了阶级社会发展的有规律的程序,“从古代之奴隶制度,到中古之农奴制度,再到近世之劳工制度”(同上书,第157页)。然而这一切观点如果认真贯彻下去,那么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他的东方和西方截然不同的三条文化道路的公式,就要完全垮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压迫的无敌的思想武器,一切反动思想的代表人物没有不害怕和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不企图用一切方法来攻击和抹煞这个科学思想的。梁漱溟也不是例外,他不过是想用比较狡猾比较迂回的方法来攻击和抹煞这个学说罢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从来就是为着要使它有可能由此引申出否认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特别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这个结论,以便于他来反对人民反对革命,以保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统治。所以,梁漱溟的这些从历史唯物主义偷来而又写得歪三倒四的词句,不过是表面上装点门面的东西,为的是要应付一下局面,以便转弯抹角,把思想仍然引到主观唯心主义和封建复古主义的方向,而最主要的环节,就是要把中国旧社会“大致如前未变”地说成是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

转变办法有没有呢?有!就是前面说过的,把认识的“圆”中的某一片段划成“一条直线”!由“圆”转一个弯,就是直线!

第一条直线:这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圆”上画出来的,这在上面基本上已经讲过了。上层建筑有相对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基础能给予一定的影响。

梁漱溟把能动性的“相对”转成一个“绝对”，把“影响”转成“决定”作用，而且是对根本内容而不是对形式的决定作用。于是就得到了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秦国当时”的“上层建筑(新法)”，不是曾“促其经济起大变化”吗？孔子所集中起来而成为后来封建社会上层建筑构成部分的“形而上学”：“中庸”、“正名”、“孝悌”、“礼乐”、“修身”、“祭祖”等等的观念，更是起了决定一切的作用，使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得到了“调和”和“平衡”，“调和”到、“平衡”到把阶级关系变成了“伦理关系”，因而就不成其为阶级了，梁漱溟说：“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底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同上书，第173页)，这意思就是说：有了旧中国的一套上层建筑的“伦理”的装饰，就“不妨”把本来是不平等而有阶级的社会硬“说”成是“阶级不存在”了！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直线”已发展到这样的强度，以至于认为“说话”也似乎可以决定事情的实质。——因为他用的是“与平常说话相反”的“形而上学的说话”。

第二条直线是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系的“圆”上画出来的。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出现阶级剥削关系，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普遍规律在具体条件下有其特殊性。但这特殊性只是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不能说因为有了特殊性就可以否定普遍的规律。旧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这是说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比较起来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不是说有了这些特点，旧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就不存在着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我国目前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和苏联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所不同，但不论中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或苏联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这是总路线的普遍性，

决不能说因为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了特殊性而和苏联的有所不同，因此它就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梁漱溟又是怎样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呢？梁漱溟主张应该重视旧中国的特殊性，说：“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从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同上）。这话在字面上固然是对的，即好像是懂得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系的“圆”的。问题是在实际上，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头脑，使他一转眼间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这一点引成直线，使之脱离了普遍规律，并企图由此否认旧中国一般的封建性、否认其中的封建的阶级关系的存在。他本来已承认了普遍性的存在，说“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历史”（同上）。然而一个转弯，他又说中国由于有特殊性，因此“未构成阶级”。梁漱溟把特殊性的认识“吹胀”、“吹肿”，归根结底是为了要排挤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规律性总是有普遍意义的）的存在，让主观唯心主义找到活动地盘。“生命创造尤不如是整齐规律”，“读者有悟于其理，而不概执为规律，斯善矣”（同上书，第159页）。——这就是梁漱溟的目的。

第三，在以上两条直线的基础上，梁漱溟还画了其他许多个别的小的认识的直线，这里不能尽举一切，只谈一两个例子。例如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笼络人才来帮助统治的有特殊性的制度。梁漱溟由这个特殊性的“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达到了否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的结论：“任何人都可以读书；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作官。这样统治与被统治常有时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与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同上书，第168页）这里的“任何”就是“一条直线”，它抹煞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即能读书的人决不是“任何”人，首先决不是被剥削的农民（所谓“耕读之家”是地主、

富农伪装的农民)，而应考也有极严格的身份限制，这在梁漱溟也决不会不知道，但他对这些是“内自觉而外无所为”的。又例如，中国的“诸子均分遗产”制度，它能够使父辈集中地占有的大块土地分割为小块，这是有特殊性的制度，梁漱溟又把这“一条道理顺着往下推”，就说中国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不能大量地集中起来，因此就没有形成封建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他抹煞了一条普遍的真理：在旧中国不管土地大小，只要是占有土地来剥削农民并完全依靠这剥削来维持生活的，就构成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们的剥削就是封建剥削。而况，旧中国的土地问题的主要情况并不是在“诸子均分遗产”的制度方面，而是在不断有“豪强兼并”这客观经济事实上面，前者虽然可以使土地分散，但后者却以更强大得多的力量把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梁漱溟的“理智”走了直线，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事实就根本不谈了。最后再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梁漱溟说:“君临于四民之上底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同上书，第 170 页)。因为中国皇帝有了一个“君临四民之上”的带特殊性的幌子，就连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者这一个普遍真理也抹煞了。何况一般中国皇帝都有自己的广大的皇室庄田，这与一般地主阶级的成员在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梁漱溟对这样明白的事实也避而不谈。我们看，当着中国历史已经走进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 1949 年的时候，竟还有一个梁漱溟在那里追念他的“皇恩浩荡”的封建盛世!

梁漱溟的一切言论——历史观点及关于中国问题的言论等等——总不外是这一类形而上学方法的诡辩的产物!

（四）封建复古主义的破产

梁漱溟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些荒谬思想，是他的历史观点的主要内容。他依据这些思想，把旧中国的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和农民手工业者之间的阶级对立硬说成只是一种职业的区别，即他所谓的“职业分途”，硬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伦理的“调和”、“平衡”、“中庸”的关系，由此来掩盖他们之间的尖锐的对立和残酷的斗争。梁漱溟利用他这些主观虚构的思想，企图来向广大农民及其他被压迫人民进行所谓“安分守位”的封建主义说教，企图诱骗他们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所以，这些思想，是他用来反对中国革命人民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最直接的武器。

在抗日战争以前十年中间他所进行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他的上述反动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实践。在这个“运动”中，他以“乡农学校”这个好听的名词来组织一种以巩固地主阶级统治（间接地也巩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为目的的乡村政权机关。这个“学校”把绅士们摆在统治（校董、校长等）的地位，集中了行政、教育、经济和武装的全权。利用这个新的手法，梁漱溟以为就可以掩盖农村阶级矛盾，宣传“调和”、“平衡”、“中庸”等等封建教条，巧妙地来迷惑农民，控制农民，以达到剥削农民、反对农民并为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服务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山东之后，梁漱溟的“乡农学校”里的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绅士们，大部分都投降了敌人。“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它的思想基础——“调和”、“平衡”、“中庸”之类的封建复古主义的神话，就在实践中完全宣告破产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的广大农民，包括梁漱溟的“乡农学校”里的那

些学生（实际上主要是被统治被剥削的农民）在内，坚持了抗日战争。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一步一步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在新中国，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已失去了它的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人的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影响残余并没有随着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干净。所以，中国人民在现在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同时也有必要以坚决的战斗来彻底消灭梁漱溟一流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的残余。

（原载《哲学研究》1955年（12月）第4期；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7年，该社把本书和《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合并重印发行）

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

(1956.3)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伟大的实践力量，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发表以来的几个月中间，在全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里显示出了一幅非常生动辉煌的景象。成千成万的干部的眼睛空前明亮起来了，几万万人民中间潜伏着的创造积极性得到了解放。像不能遏止的无尽的洪流一样，像巨大的火山爆发一样，很短的时期里，全国各地的农村就进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由去年七月到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由百分之十四急剧地

---

* 农业合作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件大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决议》又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主要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艾思奇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的，自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编辑时，照原文收入，只作了个别文字的改动。

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又推动起全国各方面的革命改造的运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都进入了新的高潮;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使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的加速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工业农业生产计划的指标要大大地增长,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发挥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所预示的文化高涨的新中国的远景已经在望了。变革是这样地深入、普遍，以至于老鼠、苍蝇、臭虫、蚊子之类的害虫害兽，以及各种危害人民的疾病都有可能一步步地加以肃清。中国人民现在是抱着空前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自己在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走近幸福美妙的生活前途。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是在于它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地概括了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的经验，揭示出周围事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向人民指出当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已经成熟了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道路。使人民群众中间已经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历史要求变成他们的普遍的自觉的行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典故，可以用来作为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的譬喻。当着社会变革的各种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了的时候，及时地吹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东风”，就可以把人民群众中蕴蓄着的无穷无尽的积极力量鼓舞起来，使社会上出现惊天动地的伟大的变革事业。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于全国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就是正当其时地吹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风”。它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根本原理，依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参照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总结了我国农村合作

化运动的长期的历史经验，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经验，分析了当前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全国高潮就要到来，明确规定了我党应该对当前运动进行积极领导的方针，以及贯彻这方针的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规律。成千成万的干部在这个报告的帮助下进一步认识清楚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客观规律，认识清楚了我们依据这规律所应该遵循的斗争道路和斗争方法，因此就大大地提高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干部的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思想迅速地就成为千万农民的自觉的活动，就成为推动全国农村以及各方面社会变革的雷霆万钧的力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之所以能够把人民群众的这种无穷的革命精力引发出来，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原因，只是因为它里面所表现着的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科学的先进思想，它十分确切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真正切身的需要。农民群众用衷心感激的心情表示，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地善于为他们作打算的，这就是它的威力的根源。

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能够发挥这样强大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就理论本身来说当然也具有着科学的创造性。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涉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等问题。就像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之一，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之一。从学习哲学的角度上来读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会使我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获得许多非常生动和深刻的启示。

二

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的反映，是推动社会的革命变革的主观方面的指导力量。革命运动在它的前进过程中必须克服阻碍革命的旧势力的种种抵抗，这些抵抗的方法中，包含着各种反动的、保守的思想抵抗。为着贯彻革命运动中的正确的思想指导，革命理论必须对一切阻碍人民的革命自觉的错误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批判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发挥革命理论的实践作用所不可少的环节，通过思想斗争，克服各种错误的保守的或反动的思想的社会影响，把前进的阶级力量集中到一个正确的思想方向下面，才能够对于给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力量以致命的打击。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就具有着这样的重大意义。

从学习哲学的角度上来看，毛泽东同志对于右倾错误思想的批判，首先是在革命的领导工作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范例，是像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贯串着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斗争精神的范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就在于要求我们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认真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任何种类的唯心主义的倾向。恩格斯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别的唯物论不同的地方，这样说："新的学派所不同的，只是在这里首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论的世界观，这世界观已经彻底地——至少在基本点上——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识领域了。"（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7 页）列宁论到恩格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性原则时说："在他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是简要和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

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7页）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其他著作批判各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在哲学上总是坚持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的。

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唯物论的世界观，就是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贯彻“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的原理，贯彻“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就是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必须力求我们的主观思想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实际。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第141页）又说，唯物主义的意义，不外是要“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上而不是从什么幻想的联系上”（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页）把握事实。毛泽东同志在他以前的著作中曾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反复阐明过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他指出我们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努力做到“客观的看问题”，要经常注意“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则；注意到“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原则。（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他曾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6页）。他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23页）最近他又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里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

同志的这些指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严肃地对待唯物论的世界观”。——我们应该严肃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要加以贯彻。这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坚持力求认识“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唯物论路线，反对凭主观的“幻想的联系”来把握事实的唯心论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倾向。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工作中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发展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对行动给予正确的指导，使斗争的胜利得到保证。换句话说，在实际工作中所有的一切原则性的错误，都是在思想上违背了上述唯物主义道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党性，而走上了主观主义的迷途的结果。

一切原则性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两类：或者是表现为急躁冒进的“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或者是表现为保守主义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是在一定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之下发展的。新事物的发展条件在当时当地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而我们却过早地认为它应该出现，这就会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要求脱离客观实际情况，就会把我们引到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急躁冒进的“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当新事物的发展条件在当时当地已经成熟了时，而我们却看不见这些新的因素，以为事物仍然应该按照过去的老样子发展，这就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就会把我们引导到另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保守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同样都是不能认识事情的“本来面目”，都是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时离开了唯物论路线走上了唯心论路线，虽然它们是从不同的方面，脱离客观实际的。

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的错误，从哲学思想方面来看它的根源，是由于在主观认识上落后于客观实际，因

此就违背了唯物论路线和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迷途。“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是客观的实际，这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我们对科学的唯物主义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上来把握事实，那我们就一定会设法在工作中力求使自己了解事情的这个“本来面目”，就会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确切地反映这个客观的实际情况，依据这客观实际情况来正确地规定我们指导行动的方针，而这方针就只能是“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就是指示我们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些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却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在全国就要到来而且部分地区已经到来的高潮前面陷于“熟视无睹”的盲目状态，在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早已成熟了的新的发展趋势前面失去了弄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的能力，他们按照自己主观的、陈旧的标准，根据片面的材料来估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使自己的对于事物的观察远远地落后于客观存在，使事情的“本来面目”被“外来的”“附加”上的保守主义的主观解释所蒙蔽。他们用这种保守的观点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来规定领导工作的方针，而这工作方针也就不能不充满着许多“幻想联系”的成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们的主观认识和他们的这种主观领导的方针既然不能正确地反映运动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相反地，却落后于运动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就不能够“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使这个运

动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迅速地开辟自己的广大地盘，如像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以及后来党的六中全会决议所做的那样；相反地，他们对于正确的“领导”是“用各种办法拉它向后退”。他们的办法是“绕开社走”、“坚决收缩”、“勒令改组”、大批地“砍掉”等等的消极行动和粗暴处置。这种错误的领导阻碍了运动的迅速前进，引起了农民群众很大的不满，使工作遭到很大损失。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唯物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开始号召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时曾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5年版，第758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唯物论的党性原则之必须坚持，主观主义及一切种类的唯心主义之必须打倒，理由就在这里。

三

这里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很有经验的同志，竟在农业合作化这样重大关节的问题上对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情况的认识表现了盲目性？为什么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会违背唯物主义的原理而陷入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深刻的哲学的—认识论的回答：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

自己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一段话现在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大家都注意到，为着从工作错误中充分学到教训，有必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一段话的意义。在农村工作中犯错误的同志，他们是有经验的，在他们的错误没有被指出之前，他们凭着个人的经验，凭着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材料，就以为自己的看法已把握到了事实本身的联系，因而就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他们亲身在指导农村工作，他们对于农村的情况，是有过一些“调查”的，是根据一些事实材料来作估计的，难道这样还不能把握到事实本身的联系么？难道这样获得的认识还不能反映农村运动的客观实际情况么？然而，他们毕竟错了，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的错误观察误认为已把握到了事实本身的联系，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所掌握的那些“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的主流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只是那些非主流和非本质的东西。如果仅仅只是片面地注意到非主流非本质的东西，而看不见主流的和本质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本身的客观联系，就不可能正确估计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什么一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却去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呢？

也是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曾指出两种人的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说：“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

当政策。”（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758页）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这两种主观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同时，教条主义也并不只是存在于研究工作的人中间，在指导实际工作的人中间，也有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单凭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来对待问题，而这种教条主义曾在一个时期占据了领导地位，曾使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和破坏。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错误，是经验主义性质的。它不是产生于只注意空洞的“理论”研究，而是产生于对实际运动观察的错误。这种错误的特点，是在于把眼光限制在局部的经验范围之内，而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忽视了理论的指导，忽视了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认真学习研究，特别是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观察事物，因此才会只看见表面的现象，只看见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东西，而看不见事情的本质、运动的主流，看不清贯串事物全过程的规律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配合着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相应地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使之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是贯串过渡时期全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已确定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也是党的路线政策的一个基本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真理，它是正确地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正确地反映着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在过渡时期领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正是根据了绝大多数农村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农村合作化必然要获得农民的积极拥护。这是必然的趋势，是事情的本质方面和主流方面。如果真正在实际上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上述普遍真理，而不是只在口头上述说这个真理，那么当观察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努力从实际生活中去注意寻找那些能够表现事情本质和客观发展趋向的积极因素，而不应该过分强调和这些事情本质和客观发展趋向相矛盾的消极因素。当面临着农民群众对合作化运动表现了积极性的时候，不管同时在运动中看见了多少缺点和困难，就应该首先注意到，农民群众的这种前进的积极性是保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最主要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是能够战胜一切的新生力量，是事情的真正本质的表现；就应该认识到，运动中的许多缺点和困难，是在运动中必须和可能附带解决的问题，但决不会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由于农民走向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是事情的主流，因此这些消极的障碍，只要把农民的积极力量发挥起来，是一定能打破的。认识了这一点，就应该能够确定把“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作为行动的方针，而不是在缺点和困难的前面“张皇失措”，“因噎废食”，把“坚决收缩”“赶快下马”“用各种办法拉它向后退”，这一类消极办法作为指示行动的方针。

自然，倘若没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倘若不懂得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倘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党的路线政策没有认真的研究，要想从复杂万端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找出这样的头绪来，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并不是完全直接表现在现象上面，那些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常常是通过许多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甚至于通过某些假象，而表现在我们的眼前，仅凭感觉经验，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应用理性思考的工夫，是不可能把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东西做出明确的分辨来的。特

别是，如果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是从错误的立场出发，如果我们受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的影响（只凭个人经验来观察问题的人，是很难避免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就不但不能正确分辨本质与非本质，主流与非主流的东西，而且会把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反倒看做最主要的东西。尽管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已经部分地到来了，尽管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已经开始在群众的规模上表现出来了，我们的犯有右倾错误的领导者仍然要把运动中的某些困难和缺点特别强调起来，把它看做最主要的东西；而完全忽视了运动中真正主流的和本质的东西。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提到“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其中“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只有“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办起来不是非常困难的吗？没有富裕农民的合作，不是好像很难发展生产吗？抱着资本主义分子或富农偏见的眼光看问题的人，一定要认为这里的困难是最主要的，是不可克服的东西，一定要认为这样的合作社是完全不值得保留，应该加以“砍掉”的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说：“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经验主义的方法，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之下来深入领会事情本质的方法和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忽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仅凭个人经验和表面现象来看问题的方法，在结果上就是这样地有着“天渊之别”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经验主义曾有过许多深刻的批评。他说：“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

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页）毛泽东同志又说：“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批评，就是帮助我们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的关键。

四

为什么我们的认识中会有经验主义的错误？为什么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是不可靠的？这首先要研究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才能够得到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曾详细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指出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首先是获得一些经验的知识或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它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而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必须使认识进一步提高，由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和教条主义不同，经验主义的缺点，并不在于对周围的实际事物没有感性认识，相反地，经验主义者可能还有很丰富的经验知识，问题是在于经验主义者满足于经验，使认识停顿在片面的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停顿在事物的现象的方面，不能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不能通过现象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否认经验的重要性，相反地，它坚持

认识论上的这个唯物主义原则："认识开始于经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但是，理论是经验的总结，要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使我们的认识能"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飞跃的思维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无非是人类历史——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历史的大量经验综合思考的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经验，它所反对的是使认识停止于局部经验而不进行思考工夫的经验主义。如果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不把自己的思考局限于眼前的局部经验，而能把群众斗争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也就是依据"丰富的感觉材料"来进行思考，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运动的本质的东西，主流的东西，就能够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就能够从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知识中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的有力的证明。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不善于综合历史的经验，那么，哪怕个人的经验很丰富，也只能停顿在片面的、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而无法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克服经验主义局限性的具体榜样。他的论证的方法之一，是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到今天的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做了一个全盘的总计，由此来证明这个必然的规律：合作社一定能够大大发展并且也能够巩固，因此也就有力地驳倒了那些不相信合作社能够发展和巩固的"小脚女人"式的怀疑论。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全盘总结来暴露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使它和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是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学习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之一。

为什么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全盘的总结就有可能暴露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呢？理由是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是贯串着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的最根本的东西，而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只是暂时出现的现象或假象。列宁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浮面的东西，更加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牢固地'维持着，那样'稳坐着'。例如，河流的运动——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译本：第84页）因此，在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只依据局部的经验，如果我们所看到的是局部的现象，我们就难以分辨哪些现象是暂时出现的，"常常消失"的，"浮面的东西"，哪些是"牢固地"维持着的，贯串全体的，表现本质的东西；反之，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个人的经验，而能注意到历史的经验，如果我们概括了大量的现象，那么，那些贯串事物全体的表现，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就有可能在我们的主观认识上反映出它那"牢固地"维持着和"稳坐着"的姿态，而和"常常消失"的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由于运动已开始局部地进入高潮，在事实上已作为群众性的大量现象表现出来，而我们的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却茫然无知，这说明他们观察问题时所受到的个人狭隘经验的限制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用来概括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决不是仅仅依靠表面的现象材料的形式上的总计，哪怕有了大量的材料，如果只凭表面现象作形式的总计，仍然不能保证一定就可以撇开非本质的东西而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是因为，第一，现象虽然是本质的表现，但它本身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就把本质完全暴露出来。表现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经常是同时混合着出现。农民积极地要求合作化的时候，同时就提出一系列的必须解

决的困难问题，而许多都是领导工作者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新问题。虽然每一个困难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新的问题总是不断地提出来，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就会误认为困难好像是主流，好像是不可克服的。第二，前面说过，现象中间往往包含有许多的假象，这种假象的因素看起来好像是与本质完全相反的。因此，就更加把本质隐蔽起来，认识如果停止在现象的表面总计，就不能揭破假象，暴露本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告诉我们，贫农和下中农对于合作化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应该有积极性的，但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人，就可以凭着这些现象，说他们那种错误意见是反映贫苦农民，也就是大多数农民的呼声的。这就是事情的暂时的假象，因为就本质来说，“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同上）不会作这样的比较，不认识贫农下中农比较富裕的农民“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就不能够认识事情的本质。第三，革命的实践常常有这样的任务：在新生的东西还只露出一些萌芽，而没有形成大量现象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它的不可战胜的本质，预见到它一定要形成发展的主流的必然前途。目前农村合作化运动当然不是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但如果有了这种情况，那就很难采用大量现象的总计的方法，而必须完全依靠更根本的科学分析方法。以上三种情形，都说明只靠表面现象的观察和现象材料的形式上的总计（哪怕是大量的），决不能一定保证我们可以透过事物的现象，揭露其中的本质。这样的方法仍然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仍然只是停止在现象的观察方面，究竟没有真正超出感性认识阶段而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所以就不能区别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就不能真正揭露事物的本质。所以，科学的方法，决不容

许仅仅停止于表面现象的观察和形式的总计，决不能把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当做主要的方法。马克思在批评庸俗经济学者时，曾这样说过："他（马克思批评的庸俗经济学者——艾）所引以自负的，乃是在表面性前面的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那究竟还要科学干什么呢？"（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顾格尔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9页）

那么，什么方法才能帮助我们通过表面现象，揭露事物的本质呢？那就是要应用辩证的方法对事情加以科学分析，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在运用这种理性思考的工夫的时候，主要的环节，是在于分析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差别性矛盾性。就社会现象来说，首先要分析生产和阶级的矛盾性（就阶级社会来说）。因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源泉，生产的矛盾和阶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和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源，弄清了事物的矛盾，就能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向，弄清楚了社会的生产矛盾和阶级矛盾，就能够准确地判断社会发展的前途和革命运动的趋势。

毛泽东同志是最精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特别是阶级矛盾分析的方法来从现象中找到事物的本质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一篇杰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篇文章里，就像在目前《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一样，他直接以这种科学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同志。当然，那时的情形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不久，而现在我们是在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时期；那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处在最困难时期的时候，那时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还只是以赤色小据点形式出现的初生的萌芽，在强大的

反动势力包围之下还极不稳固；那时是对于这新生的东西的不可战胜性，它的必然能够开辟广大发展地盘的规律性，在事情的现象方面还看不出什么直接的表征来的时候；那时对于革命力量的观察研究还没有大量的现象可以作为依据，而革命实践的任务却迫切需要领导方面把事情的本质揭露出来，把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规律性揭示出来，以作为革命行动的向导，以统一党的思想和树立革命群众斗争的信心。在当时，如果只靠表面现象的观察和表面现象材料的形式上的归纳，那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到革命势力的不可战胜的本质和它的必然向前发展的规律性，中国革命人民就找不到明确的斗争方向，就不能使怀疑、动摇、悲观思想和混乱的情况得到澄清，就不能满怀信心地引导群众进行积极战斗，就要使革命力量陷于瓦解。就在这样危急紧迫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的万丈光芒投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来！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人们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页）他指出：“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同上）。“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同上）

毛泽东同志如何通过当时的现象而抓着事情的实质，如何能够断定革命力量“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呢？这样明确而坚定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文章里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答复，这就是：

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条件给予科学的分析，而首先是着重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里，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十分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存在于争夺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与各帝国主义者相联系的各派军阀统治者之间，不断加重赋税的反动统治者与广大负担赋税者之间，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之间，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之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这些矛盾使国货商人及独立生产者破产，广大农民及城市平民求生不得，士兵经常处于困苦之中，学生失学，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等等。依据这些矛盾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就做出了丝毫也不容有置疑余地的逻辑论断，说："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通过这些阶级分析做出了这样强有力的论断，就把事情的本质和主流鲜明地暴露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由此不但认识了本质和主流，而且对于现象的看法也完全改观了。当人们只注意到赤色小据点的孤立现象时，它给予的感觉是软弱微小的印象，当人们把它和全国各方面的矛盾现象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使人感觉这似乎软弱的"一点小小力量"中间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发展生命。毛泽东同志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通过科学的矛盾分析——阶级分析法使人对于"赤色小据点"的现象中所包含的本质获得了正确的理解之后，人们对于它的感觉也就更深刻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生动形象鼓舞了在当时最困难的条件下斗争着的革命人民的队伍，使他们满怀信

心地向着暂时还比他们强大得很多的敌人进行战斗。所以，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形势所作的那些逻辑论断在革命运动中就发挥了无敌的力量。同样地非常雄辩的科学分析，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也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说不只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两篇文章中，在每一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中，都有着这种科学的阶级分析的范例。

五

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我们也应该学到上述科学的矛盾分析法，也即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在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保证我们能透过现象去抓住事情的本质和运动的主流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我们说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要依据一定阶级或阶层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经济情况，来确定他们的特点，确定他们对于革命，对于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思想、态度和行动。人们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最根本的原理。依据一定阶级或阶层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其经济情况来估计他们在社会斗争中所采取的思想、态度和行动，这是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高度准确性的科学方法。应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一定能够正确地理

解某些阶级或阶层的本质，确定他们的行动的主要趋向或他们的行动中的主流的东西，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认识不至于为暂时的“浮面的”非本质和非主流的东西所搅乱。能够善于运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只要抓着一个或几个典型事例来加以具体分析，并参照大量现象（如果已存在大量现象的话）的一般的观察和总计，就可以揭露事物的本质和一般的规律性。不善于运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哪怕眼前摆着大量的材料，也还是免不了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革命时期对周围事变的发展之所以能做出高度准确的预见，就是由于他善于使用这个科学的阶级分析法。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不但用几年来合作社发展的数字上的总计指出了合作社能发展又能巩固的一般趋势，而且通过对合作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矛盾分析法，对合作社运动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做出了使人不能不充分信服的深刻的论证：第一，毛泽东同志首先对当前农民中的不同的阶层——贫农、上中农和下中农等的区别做了具体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证明了合作社运动的强大发展是事情的主流，因为这运动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由于他们的个体经济的限制，还处在贫困或还不富裕的困难的经济情况中，他们要使自己从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出来，除了联合起来组织成合作社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此他们必然要对合作化运动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的事情的本质。他们中间有的人也有动摇观望的情况，那只是极暂时的非本质的东西。第二，通过这种科学的分析，还找到了一些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的根源，使之与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例如农民中间对于合作化运动动摇较大以及某

些人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只是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少数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中的倾向；至于贫农和下中农中由于暂时觉悟不高而有的动摇观望的情形，则和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不同，因为前者在本质上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同志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个体农民的理解进一步深刻化了。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指出个体农民经济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的经济，个体农民本身是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阶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告诉我们，农民决不是整个地长久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农民中的大多数——贫穷的和比较不富裕的农民（贫农和下中农）是会首先离开十字路口，积极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去的。同时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在贫农和下中农的带头行动影响下，也要或迟或早地分别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由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贫农取得了主导的，优势的地位。工人阶级把贫农作为自己在农村中的主要的依靠力量，首先给予积极的帮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土地革命运动中，贫农是农村的"革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贫农又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革命先锋"，"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一个典型事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并且目前已被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大量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在"革命先锋"的行动影响之下，全体农民都会分批地被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的。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分析使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规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是既参照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经验，又完全符合于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苏

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对于农业集体化运动曾做出了如下的指令："稳稳依靠着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第359页）1952年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情况，曾这样规定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以前曾是贫农的新中农），联合中农，孤立富农。"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中国农村当前的阶级情况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使我们的指导方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更为确切的具体规定，即把贫农和下中农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依靠他们做出来的榜样去影响上中农，把他们分批地吸引到合作化运动中来，并共同对富农进行斗争。没有正确的具体的阶级分析方法，决不可能对农业合作化的路线做出这样确切的规定。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农民的经济情况及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以后，提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群众观点的问题和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的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从来都是在于依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并且在党的领导之下，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确地发挥起来的结果。这是我们的革命实践千百遍地证明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也是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断地反复指出过的真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这个真理也仍然充分发挥着它的作用，由于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还处在困难的经济情况中，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有着在党的领导之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向，这是客观的规律，也是我们能够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钢铁一般的保证。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又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

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了右倾的错误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这两条根本原理发生了怀疑，他们不但不去注意大多数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客观趋势，不知道爱惜他们的积极性，反而依据落后于实际的主观臆断来指摘当时合作社的迅速发展趋势，硬说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的认识使他们在思想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他们的工作落在群众要求的后面，成为前进运动的障碍。这样的错误思想，是很明显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所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和工人阶级的立场的。

所以，思想上的原则的错误，不仅仅是不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而且也是阶级立场不正确的问题。本来，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人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能分割的。重大的方法错误，总是有它一定的阶级根源。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这样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同志们的右倾错误，他们观察问题的片面性，他们对于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的忽视，不能说不是受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的影响。为什么这些同志在运动中偏偏要强调非本质、非主流的现象，而看不见运动中已经有着群众性的表现的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大多数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呢？为什么亲身从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工作并有着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的人，竟不能对农村的阶级情况做出正确的科学分析来呢？回答只有一个，就

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同上)“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的人，自然是不可能看见事情的这些本质和主流的。

六

阶级矛盾的分析和生产矛盾的分析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我们还必须就这一方面来作一些研究。

任何社会革命的任务的提出，它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的矛盾，也就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适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革命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应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立新的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得到进一步的强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和新中国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可以说也是只有依靠了这些规律才能得到胜利的。过去中国共产党所以要领导人民起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已不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也就是它已经成为中国工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

就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起来打破旧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国营经济中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把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个体私有制。因为我们指导革命的路线政策是依据了上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所以就能够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以及其他民主阶级粉碎了一切反动势力的抵抗，使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也是由于在新的条件下，又出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不适合的新的问题，出现了两者之间的某些矛盾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四种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即（1）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2）资本主义的私有制；（3）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4）劳动人民的半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在这中间，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暴露出它们与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合的矛盾，这个矛盾日益尖锐化，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改变这些生产关系使之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以解决两者的矛盾。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依据上述生产中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制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它的实质，就在于要改变与生产力性质不适合的生产关系，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全国的统治一切的经济基础。

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各项问题的时候，必

须与上述生产的矛盾运动的分析联系起来。因为阶级的矛盾正是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而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性，正是基于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对立性或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性。在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基础上有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的对立，在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相矛盾的基础上，有着贫农和富农之间的根本对立，还有着贫苦农民与比较富裕的农民之间要求和趋向上的一定时期内的对立，即或者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是走向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在新中国存在着并且不断发展着，需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分析并找出适当的具体解决的方法。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路线和政策，党的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就是为着解决这些矛盾而制定的。

只凭局部经验观察问题，不能正确理解或不善于分析生产的矛盾运动，和在生产矛盾基础上的阶级对立情况，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右倾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的思想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的生产矛盾和阶级矛盾，并且坚决地参加了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但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所出现的矛盾，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也就缺乏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斗争的足够的精神准备。例如有一个时期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不但不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地却在这些影响面前采取投降主义的态度。最近一些时期以来，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的条件已经普遍成熟了的时候，许多人却对于这个运动缺乏信心，不能积极地放手工作，来推动运动的开展。许多人在农业问题方面，对于农民的个体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特别注意得很

少，以为农民得到土地以后，都会顺利地上升为中农并走向富裕了。有一个时期，人们曾经有这种完全不看事实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说在新中国将不至于有贫农存在，即使有，也只会是极微小的数目，因此在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像苏联过渡时期所采用的那条路线——“稳稳依靠着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的路线，将根本不适合，而应该改为主要依靠中农，甚至于认为即使是富裕的中农，只要他过去曾经是贫农，也应该加以依靠了。他们观察阶级的时候完全抛弃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以为这些富裕农民既然是由于党所领导的革命之后而得上升起来，他们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的积极性就应该永远不变。这些同志完全忽视了，个体农民的经济地位既上升到富裕的地位，那么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的思想意识将不可免地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将会比贫苦农民更多地留恋私有制，更容易倾向于资本主义的自发性，而对于社会主义合作化则将抱更大的怀疑观望态度。这些同志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较富裕的农民有较好的劳动工具，因此应该把他们看做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依靠。他们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真理，即工具虽然是生产力不可缺少的要素，并且是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客观要素，但最重要的生产力还是人，是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劳动者本身。我们首先应该依靠的乃是最有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的人，有了这样的人，组成了巩固的合作社，就不怕工具缺乏的问题不能解决，生产力不能发展。这次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上各地同志所提出的许多事实材料中有这样一个典型：“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三十三户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

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页）这个典型证明了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果合作社的成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那么即使有较好的工具，还是不能很好发挥它的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的。自然，当我们已经有了对于农业合作化具有高度积极性的人，并建立了合作社以后，要求得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又必须接着就解决改进工具和各种农作技术的问题，要求得农业生产力的最高发展，还必须在将来解决农业的技术改革，即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但是，一个农业合作社是否应该和是否能够建立，并不是完全决定于工具，更不是要依靠富裕农民手中的工具。由于我国劳动力多，自然条件很好，这里面包含着很大的生产潜力，在个体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面，这种潜力没有发挥的地盘，一旦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它就会大大地得到解放，既能通过改进农作技术而迅速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也能相当扩大耕地面积，这是几个月来合作化运动高涨过程中已得到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在我国这样的条件下面，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必等待先有大量的拖拉机供给才能开展，而是可以在没有农业机械的情形下先开展合作化运动。在合作社的新生产关系之下，利用现有的以及改良的农具就可以设法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然后在将来再进一步进行农业的机械化或技术改革。总之，这些同志的看法的错误，是在于没有正确地认识或看不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条件之下所出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必须解决的矛盾；如果说他们也感觉到有矛盾的话，那么他们在实质上是按照富农或比较富裕的农民的眼光来看这矛盾；即把资本主义方向而不是把社会主义的方向当做解决矛盾的道路。因为，如果不注意到大多数农民在个体经济的情形下仍有困难，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根本利益坚决引

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那在实际上就是听任他们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即只能求得少数人的富裕并以绝大多数农民的贫穷破产为代价的发展生产的方向。他们没有认真想一下，在我们已存在着国营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方向与生产力强大发展的要求并不相容。他们的眼里所看到的主要只是富裕农民，因此也就容易受富裕农民的影响，而对合作化运动这样伟大的革命事业反而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的倾向。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新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分析了个体农民经济与新中国生产力发展性质的矛盾，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迫切的必要性、可能性以至于必然性，批判了一些同志对合作化运动怀疑动摇的错误，为我们指出了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以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生产关系，在新中国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它的不适合性：第一，它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首先是它的很低的生产率和很低的供应商品粮食的能力不能适应由于工业发展而迅速增长的粮食和原料（棉、麻、油料等等）的需要，其次是它不能为将来重工业所制造出来的大量农业机械开辟必要的使用地盘，再次是个体农民的较低的购买力（由于生产力很低的缘故）不能为与重工业的强大发展相应地日益发展轻工业，开辟广大的交换市场。所以，“我们不能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的相应的配合，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速度。第二，农民的个体经济对于农业本身的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为着解决个体农民——首先是贫农和下中农——自己发展生产的困难和生活的困难，在新中国的条件下必然

只有走合作化的一条道路。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有时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上两点,说明农民的个体经济与新中国工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如此地矛盾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是如此地必要。如果不积极地把广大农民群众中已经开始露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高潮引向胜利,那么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都会要觉得难于前进。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是恰当地依据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来给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强大的推动。

七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通过逐渐过渡的道路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总路线的一个方面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要采取的道路当然也是一样。逐渐过渡的道路,或旧质逐渐消灭和新质逐渐积累的道路,就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来说,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经过若干层次的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造成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在这飞跃的全过程中,生产关系是适应着生产力的一步步的量的增高和性质的变化,而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由

旧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过渡到全新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当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还没有出现以前，我们已在一个时期之内大量发展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和互助组的联合组。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也指出，要在合作社不发展的地区建设一批新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仍然要以互助组的发展作为准备条件之一，这就是："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农业生产互助组使农业生产力初步得到提高，使从来习惯于个体经营的农民开始习惯于集体经营，培养他们进一步集体化的兴趣和能力，锻炼出有一定经验的干部来，使运动自然而然地易于上升到农业合作社的阶段。我国农村目前已开始走向全国普遍进行半社会主义性质农业改造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任务将在今年内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在这期间，全国各地一些地区的合作社，将同时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上升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已经使农业生产力显著地提高起来，它便于合理使用土地，提高耕作技术，推广新式农具，不但显示着比个体农业更大的优越性，而且提供了比互助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只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中级发展阶段，我们的全部任务，是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将一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提高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即类似集体农庄制度，这个任务将在明年基本上得到实现。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逐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个发展步骤都起着它的作用，这就是说，由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生

产关系每一步前进，都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予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从这里推动起来的较高的生产力又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造创造条件。这个规律是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所依据的根本原理之一，同时也应该作为我们指导工作和检查工作的指南。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5页）。我们可以预想到，一个合作社建立起来之后，它的生产率必然会要提高。如果在事实上竟不能提高，那么，首先就要考虑到这个合作社的建立是否完全名副其实，社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符合于这种生产关系所要求的原则，其次就要注意到生产的经营管理和农作技术的指导是否符合于发展生产的要求。毛泽东同志论到如何使合作社增产的问题时，把"自愿互利的原则"作为保证增产的第一个条件。这就是说，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来解决社员中间的耕畜、大农具、土地报酬、社员投资、社员的副业、留给社员的土地以及社员成分等等的问题。要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面来建立农民之间的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关系，使农民逐步学会善于把局部利益和全体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逐步克服农民的个人自私的观念，增长社会主义的意识。这些问题的合乎上述原则的正确解决，即是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得到正确的建立，就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给于了强有力的保证，就可以顺利地改进生产的经营管理和农作技术的指导。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如果安排这些问题的时候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那就是合作社的新的生产关系没有名副其实地完全建立起来，这就不能提高社员的生产的积极性，不能达到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那就是说，这样的合作社必须依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就上述种种问题重新加以整顿。

这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逐渐过渡的过程，乃是一种有

准备有计划的逐步飞跃过程。不能用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把逐渐过渡曲解为不包含任何飞跃形式的纯粹缓慢爬行的运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批评了一些同志的“爬行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庸俗进化论，就是把逐渐过渡曲解为纯粹的缓慢爬行，因此才认为飞跃形式就是冒进。事实上，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逐步前进的办法包含着若干飞跃步骤。“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样的步骤完全是健康的发展，决不能估计为“冒进”，这是半年多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的。

所谓飞跃即是迅速的质的根本改变，它本身不是量变，但却是以短时期的量的扩张作为不可少的附属标帜的。最近两年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3年冬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为1954年的十万个，又由1954年的十万个发展为1955年上半年的六十七万个，1955年底又发展为一百九十多万个，每年发展的数目都远远超过预先决定的计划数字而且是愈来愈快，这是非常明显的迅速扩张的标帜。一切革命运动高潮到来时，没有不是采取迅速扩张的飞跃形式的。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是逐渐过渡的过程，它在1930年左右也有过类似的跃进的情形。迅速扩张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偏差，但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半年来的运动高涨的情形已经完全证明，这种迅速的飞跃并不妨碍运动的健康

性，其中虽有缺点或错误，但并不是主流，只有如毛泽东同志所谓被“胜利吓昏了头脑”弄得张皇失措，“前怕狼，后怕虎”失去了清醒的理智，失去了反映客观真理的能力，把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主流的东西和非主流的东西完全弄颠倒了的人，才把革命的正常的跃进运动误认为“冒进”。

人们曾担心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怕不能巩固，这曾是“冒进”说的理由之一。这种担心也是被事实驳倒了。事实是虽然我们在发展开始的时候，就应考虑到巩固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发展，所谓巩固就成为空谈。要巩固，这是说要在量的迅速扩张过程中来求得质的巩固，所以要把发展和巩固的工作辩证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与检查和整顿的工作相结合。发展的辩证规律告诉我们在发展的渐进线中必然包含着许多使渐进线中断的关节点，我们的发展是依据着这个客观规律的，它不容许成为不顾质的巩固的盲目的发展和没有任何间歇的纯直线的发展。为着避免盲目的发展，发展的数字按照实际情况加以一定的控制，“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既然是掌握了量与质，发展与巩固的辩证的联系，所以就一定能够把运动健康地导向胜利。

必须在迅速扩张过程中来求得巩固，而不是在没有发展的情形下来空谈巩固，这道理，在有些人曾经觉得似乎难于理解，事实证明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质的巩固的条件，虽然在发展的当初就应该尽量考虑到，但真正巩固的充足条件是只能在量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别的不说，单就群众的觉悟和干部的经验来说吧，这两个条件，自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所必要的条

件。但是，这样的条件要怎样才能创造出来呢？难道不是要在运动中，在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使群众和干部受到许多实际的锻炼之后，才能创造出来的么？难道说完全脱离了运动，完全脱离了斗争，单单在训练班的课堂里教一教“理论”，就能够使群众的觉悟真正有所提高，使干部的经验真正充实起来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有很多生动的实际例子证明这个道理。就“群众的觉悟”方面来说，像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一个典型，由于该社的领导者能够在运动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正确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包工包产，分配生产资料，组织副业等等的具体活动中逐步地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克服农民的个人自私观念，使农民觉悟得到提高，因此在条件很困难的山地小村里：“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见该书上册，第 44 页）就“干部的经验”方面来说，有些干部最初对于合作化运动也是完全“不懂”的，后来干部们在运动中首先学通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后来又“深入到社里去实验和体会吸收实际经验，充实领导能力”（该书上卷，第 8 页），于是“干部就由不懂到懂”，掌握了丰富的新的经验。很明显，不开展实际的运动，不使群众和干部在斗争的火焰中受到锻炼，要想显著地提高他们的觉悟，高度地充实他们的经验，是不可能的。被群众运动的胜利开展“吓昏了头脑”的人们，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用正确的认识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然而首先是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没有实践，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经验，更不可能掌握由大量经验综合而成的理论。不能希望在陆地上把游泳学好了才下水游泳，要学会游泳，必须一开始就到水里去，这是老早就有人用过的比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全国高潮将要来临的时候，却高叫运动“超过

了群众觉悟的水平"，"超过了干部经验的水平"，这正如当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要下水去学游泳的时候，别人却阻止他说：你这样做就超过了你对于游泳知识的水平了。这不是很滑稽么？经验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个人的经验，然而对于群众的经验，反而不能够加以信任，这正是他们不能不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的话值得再重复一遍："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并由党给予积极的领导，使他们在斗争的烈火中把自己的觉悟和经验锻炼成熟起来，这是我党历来用以战胜一切敌人和完成任何困难任务的最根本的方法和最锐利的武器，是最近几月来党中央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之迅速走向轰轰烈烈的高潮的强大动力。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放下这个方法和武器，任何时候也不应忘记这个强大动力。

（原载《哲学研究》1956年3月第1期；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

——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

(1956.8)

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文艺界的同志们!按照文联学习处的计划,我从今天开始,准备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做一些解释。我所要讲的总题目是: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或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在这个总题目下共包括四个小题目: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阶级和阶级斗争;四、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文艺界的同志们的面前来讲这些问题,对于我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多少需要联系文艺方面的实际。但我很久没有研究文艺问题了,新出版的作品看得非常少,这个知识上的缺点,目前一下子也没有法子补救。因此,我讲的许多意见,只能算是供大家学习和讨论的参考,其中可能还会有错误,希望大家不客气地给予批评。

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

* 本文原是艾思奇同志1956年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哲学讲座的讲稿,现根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8月版排印,删掉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字样。

在这个总题目下包含三个小题：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3.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现在就先讲第一个问题。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为什么要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列在第一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的最根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解答，规定着社会历史研究的不同方向。正如在一般的哲学上，围绕着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的关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的争论把全部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围绕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不同的观点，也使社会历史的研究区别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方面来，首先就在于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问题，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来说是第一性的东西，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社会意识则只是第二性的东西，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说："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 页）列宁说："意识一般地反映存在——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题。我们不能看不到这个命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即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是有直接的和不可分离的联系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32 页）这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根本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而这对立的根本点就在于一切种类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都有这个共同点：就是这样或

那样地从唯心主义的观点上来回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把社会意识说成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而社会存在只是社会意识的产物。

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我们所批判的这些反动思想的各种错误观点中间，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正是我们所要批判的一个根本焦点。特别是在文艺方面，事情更容易明白。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它和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有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正是各种不同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分歧点，因此一切不同的回答都逃不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对立的方向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怎样回答这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者说：文艺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文艺形式上的反映，文艺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说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个回答规定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的一条根本路线、根本方向，这条根本路线、根本方向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路线和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他们对于上面说的根本问题给予了完全相反的回答，他们说：文艺是，至少主要地是各个作家的主观精神的产物，文艺作品的内容，是人的头脑里任意制造出来的"空中楼阁"，而不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美的泉源不是存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而是存在于人的主观、"直觉"之内；因此，是人的主观，

作家个人的天才决定着文艺的发展，而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最后决定着文艺的发展等等。这些回答规定了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的另一条根本路线——反唯物主义的路线。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美学思想方面来说，首先就是要在文艺这个社会意识部门里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

就拿胡适来说吧，胡适写了许多关于文艺作品的考证以及其他方面的论文，从这些论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那里面贯串着一条总的路线，就是要从各方面把文艺作品解释成为作家的个人经验，个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极力抹煞它们反映社会存在，反映客观现实的重大意义。譬如像《水浒传》这样的作品，是反映封建时代农民战争的一部杰出的创作，里面所描写的许多人物都是当时人民中的真正英雄的典型，因此几百年来人民对于这部作品非常喜爱。我们看胡适是怎样评价《水浒传》的呢？他曲解了《水浒传》的意义，把它硬说成是人们发牢骚的产物，他说："水浒传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意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回寇立大功后反为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一肚皮的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水浒传考证》）胡适对于《水浒传》的这种看法，一方面表明了他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文艺观点，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种反动文艺观点的阶级作用，这就是否认《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是人民中的真正的英雄典型，硬要像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一样地在这些人物身上加给强盗的恶名！

再就《红楼梦》的问题来看，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大家都

知道，《红楼梦》的内容，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矛盾的。胡适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对于《红楼梦》的内容的来源，有两条似乎矛盾而实际上一致的解释。第一条是把《红楼梦》看做作者曹雪芹个人的“自叙”传，第二条是把《红楼梦》的内容看做作者主观地任意构想出来的东西，他引了钱静的话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弟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这两条解释看起来是相反的，其实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把《红楼梦》看做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感情或“兴会”的产物，否认它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不难看出胡适的这种看法和他的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怎样密切地联系着。我们对于胡适的文艺观点的批判，首先应该揭露他的这个唯心主义的实质，然后才能在其他问题上打中要害。

胡风所散布的那些文艺观点，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个根本问题上也正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完全相反的。如像许多同志已经揭露过的，胡风否认文艺创作的泉源是人们的社会存在，是人民的现实生活，而把这泉源归结为“主观战斗精神”，归结为作家的“自我扩张”。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是怎样来曲解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呢？他把文艺创作的任务说成好像并不是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相反地要用作家自己的主观精神去和现实对象“搏斗”，去征服这些对象，使它变成作家“自我扩张”的工具。他有时甚至于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主张作家的主观意识就是创作的主要泉源，用不着什么生活经验。他说：“作者苦心孤诣地追求着和自己底身心感应融然无间的表现的时候，同时也就是追求着人生，这追求的结果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密云期风习小记》）胡风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所喜爱的含混

名词“人生”，来玩弄他的诡辩。这个名词可以解释为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的生活。利用这个双关的意义，他就把作家个人的“人生”或个人的所谓“身心感应”和全部社会的“人生”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好像一个作者只要表现了自己个人的“身心感应”，就已经和全部人类社会生活拥合到一起了。根据这些荒谬的理由，胡风就得出了他的荒谬结论：文艺用不着反映社会存在，作家的创作不需要什么“生活经验”，有了作者个人的“身心感应”就有了一切！这就是胡风所散布的反动文艺思想的最根本的要点！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根本原理，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要首先从这个问题研究起。什么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各种矛盾运动，其中最基本的是生产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矛盾运动等。人们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政治、宗教、文艺以及哲学等等的思想形式，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这些矛盾运动的。文艺是用典型的形象，集中地来反映这些矛盾运动。“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凡是真正有生命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没有不是不深刻地反映了或是暴露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的。这个原则适用于中国和外国的全部文艺史，从诗经、楚辞、唐诗、元曲、水浒、红楼梦一直到鲁迅以及新中国的文艺作品如《保卫延安》、《龙须沟》、《三里湾》等等，从普式庚、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一直到苏联的许多新的创作，从小说、戏

剧、诗歌到雕刻、绘画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都可以说是毫无例外。全部文艺史证明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证明真正创作的泉源是存在于人民生活中,存在于他们物质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一个文艺作者如果一旦拒绝了这个反映社会存在，反映社会矛盾运动的任务，他的创作力量就要归于枯竭，他的作品内容就要变成空虚的和虚伪的。这些事实就驳斥了唯心主义者的文艺观点的荒谬，驳斥了他们把创作泉源归结为创作者个人的主观意识的完全无稽。全部文艺史证明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原理才能够为我们的文艺创作指出一条最广阔最深远的道路，而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则是为着要阻塞文艺创作的真正泉源，扼杀艺术的真正生命，阻碍我们革命文艺的前进道路。

人们的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不是采取纯粹“客观主义”的形式，而是站在一定的社会实践立场上，站在社会斗争的一定地位上来反映的。政治、法律思想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社会的阶级矛盾,而主要地是反映统治阶级或革命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意志。哲学思想不是纯客观地反映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本质，而主要的是它还表现为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文艺也不是纯客观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运动，它还同时反映着作家自己的阶级立场，作家自己的社会观点。作家不但描写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典型化的矛盾运动，而且对于所描写的矛盾运动还表示着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同时他的这种阶级的政治态度，对于他的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深度和真实程度也会有着很大影响。人们既不是直观地认识世界，而是通过自己实践过程——首先是生产和阶级斗争来认识世界，因此，人们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他们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要受到他们的实践立场的限制，首先受到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地位的

限制。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对于文艺来说，是不是也能适用呢？应该说，文艺既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既然是一种认识现实的形式——通过典型的形象来认识现实的形式，它在基本上也要受到上述认识原理的约束的。这就是说，作家的阶级立场，作家的世界观，对于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矛盾真实程度和深刻程度，是有影响的。一般地说，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或对于腐朽制度采取反抗立场的作家，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一致，他们的作品是比较能够更深刻地、更真实地反映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反过来说，那些为反动腐朽势力服务的作者，由于他们的立场是违背着社会生活的前进发展的趋向，他们的作品就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相反地还常常要掩盖这矛盾运动。这个原则，可以从文艺史上找到大量的事实作为证明。就中国过去的例子来说，只要举《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作为对比就够了，前一部书的作者曹雪芹由于采取了反对旧封建制度的立场，就能使他的作品成为一部极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矛盾的伟大的创作。后一部书的作者是以谄媚封建制度为自己的任务的，尽管他使用了很生动的语言，由于他的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矛盾做了许多人为的粉饰，我们读了以后很容易感到它的虚伪和空疏。俄国在19世纪中间前后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文艺家，这些文艺家从普式庚起到托尔斯泰为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不反对沙皇专制的。我很同意老舍先生在先进工作者会议上所说的话：高度政治热情对于文艺作者是推动创作活动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在今天的时代，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进

步的世界观，是帮助作家联系人民，和善于反映人民生活中的矛盾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曾有过这种特殊情形，一个作家在政治的倾向上是属于保守派的，而在他的作品里却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的矛盾运动，并在事实上否定了保守阶级和赞扬了先进的阶级。法国的巴尔扎克就是一个这种特殊的例子。这个特殊例子，能不能用来根本推翻上述的一般原理，说即使抱着反动世界观，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作家，也可以写出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当然不能。因为，如果巴尔扎克真的把自己的创作事业完全用来为反动的贵族阶级服务，他决不可能获得那样大的成就的，他所以能获得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于他在创作活动中已在实际上突破了自己的保守立场和反动世界观的限制。巴尔扎克的特殊例子，正是上述一般原理的特殊的表现和例证，根本上没有违反上述的原理。

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优秀的文艺作品必定能在内容上真实而深刻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同时又能反映着社会上的进步势力的要求和希望。而要达到这样的反映的目的，需要作家敢于站在一定时代的进步立场上，站到进步的世界观方面，从反面来说，就是要像巴尔扎克那样，敢于突破反动的立场和世界观。进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这样的创作方法都和进步的世界观密切地联系着，或者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基础，这就是我们的真理。

2.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前面我们已经讲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最基本的原理，现在再进一步研究，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社会的意识

（例如文艺）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究竟是包含着一些什么内容？

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具体地说，首先就是生产的矛盾运动，而阶级矛盾运动就是在生产发展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矛盾运动。文艺这种社会意识是怎样反映社会存在呢？一般来说，就是用典型的形象来反映一定社会人民的生产活动，生产中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以及阶级矛盾关系，把人民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的美集中地表现出来，使人民从文艺作品中能够深刻地强烈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和斗争。

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否只是指生产和生产的矛盾运动呢？是否还可以把其他的条件，例如地理人口条件也算在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内呢？答复是：地理人口条件之类都不是对于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这样的条件只能是生产。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也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并且是经常有着重要影响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它们都不是对社会意识、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社会的变化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条件。

地理条件包括各种自然条件，如气候、物质资源等等，它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或者是能提供某些顺利的条件，或者是能够给予阻碍，它也能对社会意识（包括文艺）的特点的形成给予一定的影响，但它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社会的发展和变更的根本趋势，以及社会意识的根本的本质。例如如果想要用地理条件的变化来说明文艺的变化发展，那一定是要失败的。变化迅速的社会制度及社会意识现象，不可能在变化十分缓慢的地理条件中找到它的决定的原因。相反地，地理条件的作用的性质和范围，倒要决定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并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的地大物博

的条件，只有在人民的革命斗争获得胜利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帮助社会进步的作用，而在旧社会就受到很大限制。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前提。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人口数量的多寡对于社会的性质和面貌，以及社会意识的根本实质也不能起决定作用。相反地，社会制度的性质倒决定着它内部的人口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有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经常听见的所谓人口过剩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有一种认为社会的进步程度和人口的密度成正比例的反动思想，斯大林已透彻地反驳过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最流行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种人口论是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作辩护的学说，它硬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大量失业现象，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粮食的增长，因而造成所谓“人口过剩”。而要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似乎只有向外侵略的一个方法。

对于社会性质、社会面貌以及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为着要维持社会生活，要能够从事科学、艺术和政治等等的活动，首先要有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要把这些物质资料生产出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决定意义就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过去时代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往往也片面地接触到生产的决定意义的问题。如中国的《管子》书中有“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话，《孟子》书中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话。费尔巴哈也说过：“要是你因饥饿和贫困而在身体内没有营养，那么在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品了。”但是，过去的这些思想家，最多只是一般地意识到物质生活资料对于人类生活、人类意识的重要性，他们从来也没有认识到物质生活资料

的生产，不仅仅是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源泉，而且，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对社会的性质、面貌、社会意识等等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为什么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为旧中国的生产方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为什么新中国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因为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成为主导的，并且逐渐在成为统治一切的生产方式。这就是说，生产方式怎样，社会的性质、面貌和社会意识等也就是怎样。要正确认识某一种社会的性质以及它的社会意识是怎样，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生产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要根据它的生产、生产方式的情况来下判断，而不是要根据它的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政治制度来下判断。

生产方式既然是决定一定社会性质的根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变革社会的革命运动的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要改变生产方式。一种革命运动是否得到胜利以及胜利是否彻底，都取决于生产方式是否已被改变和改变得是否彻底。我们说中国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没有得到胜利，就是由于它没有使中国的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改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在于它彻底消灭了旧中国的上述生产方式。社会上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保守势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本质，都在于要用各种方法来反对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就要我们弄清楚什么是生产？什么是生产方式?

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动物谋取生存的活动不同，动物谋取生存的活动，是完全依赖自然条件——动物自己本身的有机体构造和周围自然界的环境条件。动物的生活，是动物的有机体跟周围环境的纯自然的联系。人类社会的生产，也必须和自然界相联系，

但在本质上不是依赖自然条件来进行的。人类只有在下述的条件之下才能进行生产：第一，必须使用某种人造的工具来进行一定的特殊的劳动活动，才能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第二，为着进行生产，人和人之间必须发生一定的不依赖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人类进行生产所必须依赖的这两个条件，就构成生产，是生产方式的两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或两个有机地互相联系着的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的生产力，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原素的统一体。生产、生产方式的这两个原素都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纯自然的产物，它们是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动物谋取生存的活动区别开来的根本的条件和标帜。

生产力就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各个不同社会的生产力，具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取决于两个要素：(1) 劳动者使用来作用于自然界以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工具；(2) 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使用着劳动工具以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劳动者。任何社会时代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表现在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的提高上面。要使我们的新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除了必须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前提之外），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在于要抓住这两个要素使之不断地变革和进步，也就是要改进工具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内容，或中心环节，就是在于改进工具，改造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这正是符合于上述基本原则的。

马克思指出劳动工具是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尺度。它是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的客观物质条件。所以劳动工具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另一方面，掌握工具的劳动者则是创造工具、赋

予工具以活力并实现生产活动的原动力，没有劳动者，工具就是死的东西，并且也无从产生出来。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劳动者看做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就在于劳动者的自觉的劳动活动，就在于他们在生产中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轻视劳动者，不把它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的错误的传统观念，是旧社会里破坏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因素之一。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有些同志眼睛里只看见富裕农民手中的一些较好的工具，以为只有依靠它才能发展农村生产力，而忽视了贫苦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和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忽视了具有自觉性的劳动者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决定作用，因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所以，新中国的文艺，应该反映从事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典型。

生产关系，是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而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所以凡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形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的。生产关系中的最根本的东西——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如果说生产力所回答的问题是用什么工具生产的问题，那么生产关系回答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

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1)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 以前者为基础的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3) 完全以前两者为转移的生产品的分配形式。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三个方面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中的最根本的东西。它对于生产关系的形式起着决定的作用，生产资料或者是归全社会所有，或

者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不同的所有制就规定了不同的生产关系，或者是不受剥削的人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或者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或者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关系。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就说明为什么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生产方式的变革或改变生产关系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就是要把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转变为另一种所有制（或者是采取暴力的方式，或者是采取和平的方式，依旧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是否反抗这种改变而定）。同时也就说明，革命任务实现的彻底与否，就取决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实现完全的改变。在革命的斗争中，如果对于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改变不采取坚定积极的态度，就是对于革命的斗争不坚决或动摇的表现。在革命运动的各个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于在这方面的不坚决而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例子。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基础上来认识和纠正这方面的错误。这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任务之一。

3.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指出和这相反的唯心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当我们坚持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同时又应该注意不要把这个基本原则的理解加以简单化、庸俗化。这里所说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就是说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把生产、经济看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惟一的决定因素，看做是产生各种各样社会意识现象（包括文艺在内）的惟一能动的原因，以为社会意识现象（例如文艺）所反映的惟一的内容就是生产、阶级斗争，而不反映任何其他东西，

否认社会意识及其他社会现象有任何能动的作用（例如政治、哲学对于文艺的作用），否认各种社会意识现象之间及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就是机械论的观点，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要反对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是最全面、最深刻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本身是如此正确、完善和无懈可击，使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思想上来进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只能采取一些卑劣的欺骗手法，他们不是堂堂正正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攻，而是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曲解，把它曲解成一种好像是没有什么稳固基础的东西，然后向它举行射击。他们曲解的方法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硬说成好像是一种机械论或庸俗社会学，然后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机械论或庸俗社会学，以为这样就算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丑角幻想用《封神榜》上杀害赵公明的办法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没有能力来和他们所反对的英雄本人进行战斗，于是就自己扎一个草人来象征那英雄本人，再把箭射到这草人身上，以为这就可以把英雄本人也附带害死了。

人们都知道神话决不是事实，但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行为却常常做到和神话一样。不论胡适、胡风都用这种神话的手法来进攻马克思主义。胡适把历史唯物主义叫做“经济史观”，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把经济当做历史发展的惟一决定的原因。胡风把三十多年来党对文艺的正确领导诬蔑为“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支配。梁漱溟也曾用过同样的手法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那种唯物史观……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是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识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这些唯心主义者以为打击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缺点，就算是打

倒了一切的唯物主义，就可以使唯心主义永久站住了胜利的阵地。他们以为人们似乎是这样愚蠢，以至于连草人和真人的区别也分辨不出来。其实，这些阴谋者即使射中了机械论的片面性，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生气勃勃，毫无损害的。何况机械唯物论即使有片面性，但在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点还有它的一面的正确性，唯心主义却完全颠倒了事物的次序，主张意识居于决定的地位，它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反对唯心主义，同时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当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但决不是把它当做惟一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社会意识现象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能动作用，虽然它们不能最后地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并不把它们看做完全被动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者，曾多次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区别。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里说："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惟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恩格斯在给斯他尔根堡的信里，又这样说："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历史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条件。……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都建立在经济上。但他们在自己之间互相影响着，并且对于经济基础又有着反作用。决不能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惟一能动的原因，而其他一切都只是被动的结果。应该说，在归根到底总是给自己开辟着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有着相互作用。"（同上书，第104页）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如果有人认为"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矛盾论》）

什么是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依照上面恩格斯所讲的话来看，意识的能动作用，包括以下的意义：第一，社会意识现象本身发展的历史继承性；第二，各种意识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第一，什么叫做社会意识现象的历史继承性？这就是说：社会存在的变更发展，虽然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变更发展的根本方向，但社会意识的变更和发展，总是从历史上已经存在了的旧的社会意识所提供的材料出发的。新的意识现象的出现，总是在旧的意识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结果。例如新中国社会生活变更了，使得艺术上需要“推陈出新”，但“推陈出新”正是指中国旧有民族艺术的改造和发展，不能完全离开民族遗产来凭空地谈“推陈出新”。所以艺术的发展虽然归根到底是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但艺术的形式本身却有着相对独立的前后继承的规律性。恩格斯在给史密特的信里论到哲学的问题时这样说：“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它从它的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经济在这儿并没有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它只决定着现存思想材料的变更方式和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9—90 页）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来源的分析，也说明了社会意识本身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物质根源，是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在历史上起独立作用的阶级力量的成长，但是列宁指出，除了这些客观

的社会物质根源之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还有着它的思想的来源，这些思想来源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先行的思想就有着这样的继承关系，它就是从这些思想出发并加以改造和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的成果，就思想方面来说，如果没有过去全部人类的思想发展的历史，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社会意识的继承性，说明我们对待社会意识的问题，决不能采取割断历史的态度。这就是说，在我们创造和发展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不能对旧时代的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绝对地加以否定，否则就要犯错误，就要使新的东西的发展也受到阻碍。毛泽东同志说到“五四”以来文化界有一种错误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对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采取“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看法的。这种割断历史的看法在新中国也出现过许多例子。医药和卫生方面的王斌思想就是最突出的典型，由于在一个时期卫生部门的这些领导人把中医当做所谓“封建医”一概加以否定，对于中国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几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文艺上对民族形式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也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新中国的文艺家们几年来对于旧艺术遗产加以整理、改造、提高，已创造了许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说是崭新的东西。自然，对旧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不能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采取一切皆好，不加分别、不加批判地无条件地接受的态度，必须“推陈”和“出新”。但如果没有任何旧的文化遗产作为出发点，那么，“陈”既无从“推”起，“新”也不能产生出来。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完全新形式的东西，也还是国际上的文化遗产和一部分

民族文化遗产的综合地继承和发展了的结果。

第二，社会意识各部门的相互影响，也是社会意识本身的相对能动性的一种表现。这就是说，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不仅只决定于生产、经济、阶级斗争的发展，不仅对于某一种社会意识的过去历史遗产有着继承性，而且还要从其他的社会意识部门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例如文艺的内容，不只要反映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的人和物的典型，而且也会反映当时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斗争等等。把唯物主义原理庸俗化、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内容只反映生产、经济以及阶级斗争，至于这种社会意识的历史遗产以及其他意识部门的影响，对于它是毫不重要的。目前文艺界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对于克服文艺上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有着很大的意义。把某一种典型人物，简单地仅仅归结为经济发展的要求或某一阶级的普遍性的表现，仅仅归结为事物的本质的反映，这是一种庸俗化的观点。作为一个典型，自然要反映，而且归根到底一定要反映某种经济要求或某一阶级的本质，但典型究竟不是科学概念，不是用比较纯粹的一般的形态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形象来表现一般的本质，一个典型必然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复杂的历史内容，否则就不成其为典型。贾宝玉不是简单地反映封建制度下面的反封建势力的一般要求，这个典型同时还受到它自小生长起来的家庭生活习惯以及旧社会的各种思想遗产的影响，例如佛、道思想的影响，不能说对于贾宝玉这个典型就是不重要的。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结果，在文艺批评上的流弊就是对于作品不给予深刻的具体分析，只根据一两个简单的经济公式和阶级公式，随便拉上一些与公式相符合的材料，就对作品和人物的价值做出论断和估价。这种错误方法在创作上就产生形式主义或公式主义的倾向，描

写人物是从概念公式出发，而不是刻苦地在实际生活中寻找生动的材料，塑造真正活的典型，人物的对话好像是在课堂讲理论，而不是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的对话。自然，典型是要在具体形象的特殊性中表现一般，脱离了特殊性的一般性，就不能算做典型。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以为典型就只是特殊的，不必要在里面找出一般的意义，这又走到了另一个简单化的偏向。例如把李后主的作品价值归结为某些一般的公式，如爱国主义、人民性之类，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以为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人们所爱好，只是在于他的某些特殊的感伤情调和特殊的写作技巧，其中没有任何一点与人民共同的东西，这仍然是片面的。

因此，一般的理论原则的学习，正确的世界观的掌握，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是必要的。一个作家首先要在人民的斗争的烈火中去求得丰富的生活体验，同时又必须把握多方面的社会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找到塑造生动典型的充分材料的来源。但是，一个作家如果再能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对于他的创作就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如果他能这样做，他就更善于从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中去集中那些最主要的东西来进行创作活动，也就是更善于通过具体的典型来表现一般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一致性，就表现在这里。胡风一方面反对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另一方面又反对人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把正确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联系起来。这就是一方面想使作家和他们塑造典型的无限丰富的泉源割断，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在创作上失去正确的思想指导，一句话，就要使作家陷于十足的主观盲目性。

第三，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它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恩格斯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

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否认社会意识的这种反作用，只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机械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反对机械论的。

但是，社会意识终归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是有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的社会意识，也是有矛盾的。因此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同样是有矛盾性的，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有着正相反对的两种情形。有进步的社会意识，它反映着社会存在中的革命的、进步的势力的需要，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是积极的，它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有反动的社会意识，它反映着社会存在中的保守的、反动的势力的需要，它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是消极的，它迷惑人民，使人民在行动中失去正确的方向，阻碍他们积极地来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两种相反的社会意识和它们的两种相反的作用，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互相斗争着。而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的情形下，就要取决于进步的、革命的社会意识战胜保守的、反动的社会意识。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进步的社会意识反映着革命阶级的要求，进步的社会意识对代表反动阶级要求的反动社会意识的斗争，对于社会革命变革胜败，特别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旧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但要用国家政权的暴力以及种种物质力量来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也要利用旧的社会思想来麻醉人民，使人民丧失要求进步和变革的自觉性，使人民在精神上失去反抗力量，借此来达到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变革的目的。如果不打破这种旧思想对于人民的麻醉影响，就不可能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的斗争，就不可能克服反动阶级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变革的障碍。因此，在革命变革的前夜，首先总会出现一个文化革命的时期，它扩大新的社会思想影响，并克服旧的社会思想在人民中的麻醉作用，这样为革命的胜利准备思想的条件。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就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思想条件的一种文化革命。它的主要功绩就在于批判了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中国的旧思想，并散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使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具备了思想的和干部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虽然社会存在中间已没有阶级的对立，但仍然有着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的矛盾，因而在社会意识领域里仍然有新的和旧的，积极的和消极的，进步的和保守的东西的斗争。例如在苏联的文艺界里，有一种无矛盾论的思想，它反映着社会生活中一些人们的保守自满的趋向，在文艺创作上形成了一种消极的趋向，并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的进步发生了阻碍作用，因此就受到了批判。在新中国，为着克服和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障碍，也不断地有着新旧社会意识的斗争。例如一年多来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这个斗争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深入更普遍起来，因而就积极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社会思想领域的斗争有可能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以便更进一步地发挥社会意识的积极作用。就文艺方面来说，新中国的革命文艺是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为改造旧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它对于社会存在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文艺的作用是在于“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

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胡风所散布的文艺思想，极力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其目的就是要麻醉新文艺的积极作用，使文艺变为消极保守的东西，借此来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对胡风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彻底批判，我们对胡风文艺思想斗争的胜利，是革命文艺界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目前中国文艺界已经肃清了胡风派的思想影响，全体一致地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大批的作家走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体验生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胜利已使革命文艺开始走向新的高涨，并开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前次我们已经讲过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并且简单地解释过什么是社会存在。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存在首先就是指对于社会历史、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或生产方式。生产或生产方式包含着两个不可少的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包括文艺）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就是生产或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次我们就要进一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具体内容。这个问题要分三个小题来讲：1.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3. 生产矛盾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

1.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总的来说，都可以这样看，即在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首先是生产不断地向前发展，生产的变化发展引起社会意识的各方面的变化，从而也就使社会的面貌、性质发生变化，因此，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

因此，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人类社会的生产是怎样发展的。

人们为着维持社会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取得各种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生活上和生产本身不断地提出的各种消费需要——生活上不断地要求供给生活资料，生产方面不断要求供给工具、原料等生产资料。人们进行生产决不是简单的像机械一样地永远重复旧的动作，生产的活动决不能长久地被原有的规模和性质所限制。劳动者使用一定的工具进行某一种类的劳动，在反复地再生产的过程中，劳动者掌握工具的能力，他们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日益积累和增长起来。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积累和增长，使他们能够对劳动工具加以改进，因此也就引起了劳动本身性质的改变，引起了生产力在发展水平和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在过去时代绝大多数场合是完全由劳动人民自发地进行的，在这种场合下生产力的发展多半是比较缓慢的。但在许多场合，例如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场合，由于有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他们概括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即对自然斗争的经验)，揭发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利用这些研究的成果来自觉地改变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技能，使生产力迅速地显著地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人员的研究工作和工农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日愈密切地结合起来，使生产力更加无比迅速地发展起来。

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发生了变化，那么生产过程中的人和人的关系——生产关系，也迟早要跟着发生变化，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的发展，最后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变化。新中国几年来的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终于引导到农业、工商业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个高潮就是生产关系改变的高潮，即由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进到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高潮，和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变为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最后将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工商业）的高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综合起来，就叫做生产方式的变更。在生产方式的变更过程中间，社会意识的各方面现象也先后地发生变化，从而也就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和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直到现在人类的全部社会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的社会形式：一，原始公社制的；二，奴隶占有制的；三，封建制的；四，资本主义制的；五，社会主义制的。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形式，是以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作为基础的。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表现着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五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是按照由量变进到质变，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规律而循序上升的五个生产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人们所处的社会的情况，是决定于人们的生产的情况，不是决定于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唯物主义指出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的物质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把这原理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指出人们所处社会的情况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客观的物质生活发展过程，这个客观的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条件，就是生产，所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个真理，说明了唯心主义者的所谓“英雄造时势”的观点的谬误，指出造成一定时势的决定力量，决不是什么英雄伟人的个人，而是生产发展的一定的情况，人民生活的一定的情况。

“英雄造时势”的谬误观点的表现形式之一，叫做“暴力论”，

这种观点把某种社会制度的形成看做是一些偶然出现的“侵略者”、“征服者”应用暴力强制施行的结果。例如德国杜林就有过这类谬论，他认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是“抢夺或暴力的结果”，恩格斯批判杜林的错误时，指出杜林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恩格斯说：“财产先应由劳动产生出来，然后才能被人掠夺。”（《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页）事实上是先有生产的发展，才能有私有财产，有了私有财产，才会有暴力和掠夺。在原始公社社会的末期以前，由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也不曾有掠夺。社会主义社会以财产的公共所有制为基础，由此也就消灭了人掠夺人的根据。

所以，一种“时势”的形成，最后是决定于生产的情况，而不是决定于“英雄”、“征服者”和“暴力”行为。同时，生产的主体是劳动群众，说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也就等于说在社会里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换一句话说，要真正了解一种社会的性质是怎样，要了解一定历史过程的发展情况怎样，首先应该研究在这一社会或这一历史过程中劳动群众从事生产的情况怎样。所以，从事情的实质上来说，“时势”的真正的创造者，首先是生产者，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我们说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个原理又可以进一步引申说社会历史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有人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诬蔑人民群众，说他们身上充满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够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证明劳动人民恰恰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完全是荒谬的。

这里必须指出，说社会历史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这意思决不是说，劳动人民可以凭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任意创造历史，任何一个个别的劳动者都可以成

为创造时势的英雄。这样的看法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的是千千万万在生产中的劳动人民群众，而不是任何劳动者个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群众是生产的主体，而生产是对于社会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劳动群众之所以能成为创造时势的决定力量，就因为他们共同执行着生产这一个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任务。所以，劳动群众是依靠着他们的生产实践这个客观的物质条件来创造历史，而不是依靠自已主观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历史。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发展的情况不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就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劳动群众。奴隶、农民和工人阶级这三种劳动群众，他们虽然同样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他们所从事的生产的发展情况不同，在他们的劳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形式也就有所不同，而他们本身对于历史所能起的作用也有所差异，例如奴隶和农民能够推翻压迫他们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但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工人阶级却不但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能够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原因在以后说明)。所以，要了解劳动人民为何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决不能只凭某几个劳动者主观上如何想法来作评判，而要根据广大劳动者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不能把一切劳动人民笼统地看成完全一样，看成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一样的。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民，当然有其共同点，但更重要的是还要依据各种不同的生产发展情况，来分清楚各种不同的劳动人民的不同的特点，例如工人和农民，就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是农民的领导者，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这里暂时不再进一步说明。

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并且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观察和解决实际工作、实际斗争中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说，要能够正确地评判社会历史上的问题，要能够正确地解决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必须从生产发展规律的研究着手，必须首先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正确地领导劳动人民，使他们在工作中处处获得辉煌成就，在斗争中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党的一切战略策略以及工作的方针、计划和办法等等，都是从社会生产发展的科学规律知识出发，从劳动人民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出发的。新中国五年计划之所以能获得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拥护，这个计划之所以有可能提早完成，就因为它不是由国家领导人的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于对当前国家各方面的情况，首先是当前国家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劳动人民生活的情况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依据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十分审慎地制订出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原理，在这里也起着作用：指导工作的政策、方针、计划、办法等（这些都是属于社会意识的），如果是能够正确地反映生产发展的情况及劳动人民生活的情况，它就一定能够获得劳动人民的拥护，就能够把劳动人民的斗争积极性发动起来，通过他们的努力而使政策、任务、方针、计划等变成现实。最近半年多来党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走向高潮的过程，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上面的原理怎样应用到文艺问题上来?应用到文艺问题上来，就必须注意到文艺的特点。文艺反映社会存在，也就是归根到底要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发展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但

它的反映是经过曲折的，而并不是直接的道路。如果依据上面的原理，做出这样的结论，说归根到底只有描写生产和劳动人民的作品，才可能成为好作品；或者说只有在思想上世界观上了解了生产和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的作家，才可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来；或者说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时期，文艺才能发展，在生产落后的情形下，文艺也一定落后。如果这样看的话，那就会把上述原理弄得简单化、庸俗化了。这样的结论就不能概括文艺历史的复杂情形。过去历史上的文艺作品，除了民间文艺常常直接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活动之外，许多杰出的、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都不一定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大多数的作品所直接反映的是阶级矛盾中的各种典型人物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典型事物，并通过这些间接地曲折地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情况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在《红楼梦》里我们除了贾家和乌庄头的关系等次要情节上可以隐约地直接看见当时劳动人民的部分情况之外，其余我们只能通过贾家内部以及他们有关的各种社会势力的斗争间接地，而且要在一定社会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推测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中国画里虫鱼翎毛花卉，当然不是直接反映生产及劳动人民生活的。但这类绘画常常通过歌颂人民生活中的这些普通实物，间接地也就歌颂了人民的乐观主义，歌颂了人民生活。中国有的旧艺术作品是对生产及劳动人民的生活采取否定态度，表现某种厌世出俗的思想的。但是就是描写山林隐逸的中国画，也是对于腐朽社会制度的一种抗议，和对于自然的田园生活——一种歪曲了的人民生活——的歌颂。所以，如果简单地认为好的艺术品只能是直接反映生产及劳动人民生活的，那么在这一个公式主义的框子下面，就要有许多文艺上的历史遗产被粗暴地砍掉了。

至于文艺本身的发展情况，和社会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以及社会意识发展的情况都有联系，不是简单地、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发展的情况的。如果简单地说文艺的发展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那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落后的俄国能产生许多伟大的作家，而生产发展的美国在文艺上反而落后了。

但这决不是说，文艺不能和不应该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活动。不是的，恰恰相反，文艺是能够而且应该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在过去历史时代，由于剥削阶级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歌颂统治阶级及其生活的作品占据压倒的地位，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文艺受到统治阶级的限制，不能发展成为主要倾向（虽然在民间文艺中不断地大量地产生着反映这方面的内容的东西），这也使过去的文艺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今天，人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已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情形已和过去完全相反，文艺应该直接歌颂劳动人民，歌颂生产者群众，在这方面已不但不会再受到阻碍，而且还要得到国家的鼓励。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文艺方针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文艺的内容应该以反映工农兵的生活、生产和战争活动为主体——但也不排除其他阶层的生活。在生产和战斗中忘我地活动着的工农和士兵，应该成为文艺里的主要的英雄典型，与人民生活有联系的各种事物，应该作为各种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文艺运动，可以估计不久的将来文艺将有空前强大的高涨，而文艺的高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将起强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以工农兵为英雄典型和歌颂人民生活和他们周围的事物的作品，并且今后一定还要大量地创作这样的作品，虽然我们也同样需要描写其他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和事物的作品。目前，我们的文艺家在塑造工农兵正面人物典型方

面似乎还不够有充分把握，在这方面虽然比以前有很多进步，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立场、观点、方法方面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接近工农兵，努力体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要求和情绪，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为了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善于塑造劳动人民的生动典型和善于歌颂人民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所必须的条件。一个文艺工作者，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生产发展规律是否能够创作呢？当然也能创作的，特别在过去时代是如此。因为文艺不一定要直接写生产，并且它是要通过具体形象来反映社会存在的，它不需要直接用哲学原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作为创作方法。但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是有一定的统一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产发展规律，可以使文艺作家掌握观察事物的基本方法，帮助作家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哪些是主要的东西，哪些是次要的东西，从而也就能在创作过程中为自己规定正确地选择题材和主题的方向，对自己所塑造的各种典型形象赋予正确的理解。文艺是用感性的形象来反映社会存在的，但如果我们有了科学的理论知识，就可能使我们所写的感性形象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个认识论原理，也可以应用到文艺上来。旧现实主义，甚至于自然主义，都能把社会矛盾在许多具体感觉形象中表现出来，但作者自己对于这些矛盾，并不能正确地深刻地加以理解。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则要求作者努力对作品内容赋予正确的理解，这样就能使作品对社会存在，对劳动人民的创造活动发挥更大的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目前社会的变化发展极

其迅速的时代，在劳动人民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社会生产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于作家是更重要的。

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前面说过，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此，理解生产发展的历史，是认识社会、认识历史的根本关键。要怎样才能正确理解生产发展的历史，这就要研究生产本身的矛盾运动规律，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因此我们在这一节里就要研究一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怎样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呢？要认识一种矛盾的总的特点，必须先把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特点研究清楚。要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总的特点，必须先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各自的特点加以把握，然后依据两方面的特点综合起来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样就能认识它们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先说生产力。生产力的特点是在于：它在生产中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同时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谓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就是说它是不断地在发展变革的过程中，不像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以后就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相对地固定起来，基本上不发生变化。生产力的这种特点很容易理解：在每日每月和每年的生产活动中，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都在不断地增长，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增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使劳动者的工具获得或大或小的改变，在有专门的自然科学技术帮助的情形下，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使工具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像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情形。劳动工具是规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的客观物质条件，它的每一次显著的改进,都要使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获得新的性质。因此，生产的变更发展总是从生产力开始，而一般地是从劳动工具的变更和发展开始的。

举例来说吧，在原始公社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原始人就在很长的时期里不断地发展和改变他们的生产力。在工具方面，由粗制的旧石器时代，到精制的新石器时代，最后又发明了金属工具，在这中间还发明了弓箭、陶器等等。随着工具的改变，在劳动技能方面，从最初的简单的采集到狩猎，再进到原始的畜牧和农业，而手工业也在有了陶器、精制的石器，特别是金属工具时开始萌芽了。在这中间所发生的变更，不但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高了，而且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狩猎时代，生产力的性质表现在以下的一些特征里：(1) 劳动的集体性质；(2) 社会分工的缺乏；(3) 劳动生产率极低，社会成员消耗最大的劳动却只能获得维持最贫困的生活的物质资料，没有任何剩余劳动的产品。但是，当人们已经有了精制的石器尤其是金属工具，并且有了畜牧业和农业的时候，生产力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的性质就表现为与上述各点恰恰相反的特征：(1)劳动的集体性的规模逐渐缩小，由以氏族全体成员为单位的集体劳动进入到以家族为单位的劳动，而最后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劳动的方向；(2) 开始有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分工，以后又有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3) 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已开始能提供若干剩余劳动生产品。这些就是在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已显著地发生了变更的情形。

再举一个例子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面，生产力的发展就经历了以下的显著的变化过程：最初资本家所剥削的对象，是使用手工工具在自己家里进行个体劳动的家庭手工业者，以后资本家又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再进一步，在蒸汽机发明后，就发展成机器工业。在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水平不但空前迅速提高了，而且性质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性质的变化，就是生产过程由个体性质走向社会化的方向，走向社会公共性质的方向。以前可以由个人分散地在各自的家庭内进行生产的，后来却变为如果不把成千成万的劳动者按照严密的纪律组织在一个企业里，就不能进行生产了。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发生了根本改变的情形。

以上说明了生产力为什么是生产中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现在再说明，为什么生产力又是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在于：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首先是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变更，然后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新的性质而由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是决定于内容并且要适应于内容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也是决定于并且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怎样。生产力在生产中就是这样起决定作用的。

再用上面所说到的例子来作说明吧。原始公社最初的生产力发展情况——劳动的集体性，缺乏社会分工以及没有任何剩余劳动等，很自然地要求人和人之间在生产中建立起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包含着三个方面：(1)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 氏族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同志互助关系；(3) 生产品的平均

主义的分配形式等。在上述生产力的性质的基础上，只能有这种生产关系形式，并且也只有这种生产关系形式才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生产关系，那就是意味着生产力不能正常发展，社会生活不能正常维持下去。但是，当原始公社发展到了后期，生产力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劳动的集体性规模缩小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出现了，劳动的剩余生产物也开始产生了，这时生产关系的形式也就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劳动集体性的缩小，特别是在有了农业时，生产已不再是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来进行，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来进行。于是土地就要分配给各家族来使用，其他生产资料也就不再是由氏族共同来占有，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来占有，财产的私有制就由此逐步产生出来。劳动的社会分工，引起了交换的必要，要进行交换就必须互相承认劳动生产品为对方所私有，这样交换的发展就巩固了私有制度，并推动着公有制的破坏。私有制的出现，就使社会逐渐发生贫富的区别，同时富裕的人就在经济上取得优势地位，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经济的优势地位，主要是利用自己手里所握有的生产资料，利用贫人失去生产资料的困难情况，来对贫人进行剥削。这种可能，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多少提供了劳动剩余生产物，就成为现实了。原始公社末期在农村公社内部的奴隶使用的发生，就是由这些原因决定的。这些就是在原始公社里因为生产力的性质的改变，而产生与这种生产力性质的变化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变更的情形。

再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子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它把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个体的分散的农业手工业小生产变为逐渐集中起来的大生产，如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富农的较大块土地的经营等等，使生产力的性质逐步发生改变，使生

产力的水平大大提高起来。在当时来说，只有在资本家的私有制形式下才能够对生产力引起这样的改变，所以它是完全适应于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生产关系，所以这种生产关系是适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的。以后，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工业生产。大工业生产使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起来，使生产变成从来未有过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使生产过程普遍地获得了社会公共的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根本的改变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成为不适合的了。最后就引起了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消灭，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它的地位而出现。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适应于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力的内容而产生出来的社会形式。

为什么我国农民在去年秋天以来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遍地卷入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里去呢？就其最根本的客观原因来说，仍然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改变。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里说得很明白：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摆脱了封建剥削以后，情形虽然比较好得多，但是仍有很大的困难。由于人口众多，已耕土地不足，时有天灾以及经营方法落后，生产力仍然很低，一般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或不富裕的。要克服这些困难条件，就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的性质仍然停止在个体经营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要克服人口多，已耕土地不足，各种天灾以及经营方法落后的困难条件，非使生产力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不可，也就是非使个体经营的农业改变为集体经营不可。改变生产力的性质的这个要求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也必须发生根本的变革，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高潮，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就是适应着这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在党的正确的主观指导下实现了的。

苏联文艺家尼古拉耶娃所写的《收获》里，有一段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的生动描写。那里写一个以“五一”命名的集体农庄，在头一年的时候，是用马拉农具收获的。这时农地是分成一块一块分别由各个工作队担任耕作，每块地之间挖沟为界，到第二年收获的时候已使用拖拉机了。农场最初仍然把土地分成一块一块的用沟界隔开。但是，当拖拉机手弗洛斯亚驾着联合收割机走上农地去工作时，她很快就发觉用这样大的机器在分成小块的土地上一块一块地收割是很不方便也很不经济的，来回转弯费时费力，机器不能痛快地开驶，汽油的消耗也较多。在工作中敢于打破常规的弗洛斯亚，在机器向前行进的时候，毅然地跨过了界沟，把小块土地并成了一大片来进行收割，这就引起了许多有保守思想的人们的反对。但是，当农庄主席质问她为什么要打破大家原来规定的界限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这样做可以在一个劳动日内做三四个劳动日的工作，这样就把反对的意见驳倒了。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在生产中由于工具的变化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中原来较小规模的互助合作关系就要变成大规模的，这也是说明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是有着决定作用的。

上面已讲明了生产力的特点——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在再研究生产关系的特点。已经说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作为一种形式，总是相对地固定的，所以，比起生产力来，生产关系就带有一些保守的性质。一种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会保持基本上的不变性，而在这中间，生产力却不断地向前发展了。

所以，生产关系虽然是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而产生的，可是它在发展过程上却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在发展上落后于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的矛盾。这个矛盾产生这样的一种发展规律：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最初是和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愈来愈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以至于生产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新的根本的变化，而生产关系仍然基本上保持旧的形式，这样，生产关系就由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变为不适合的形式了。这时，如果要想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除了使生产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革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同时，由于生产力究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状态也不能长久存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自然而然地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引起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就是引起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生产关系由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变为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又由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经过根本改变而成为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形式，这就是生产发展的辩证法，生产的矛盾运动规律的主要表现之一。

上面已经引过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这个矛盾运动的规律。当原始公社的生产力还在使用石器和狩猎的时代，生产关系是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然而在原始公社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生产力就向前发展了，工具继续改进，由狩猎进到了畜牧和农业的时代，这时生产力就具有新的性质，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对于这种新的生产力就成为不适合的了，随后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的变化，出现了财产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是适合的，生产力向前发展，

进入了机器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没有变化，而生产力已经具有了社会公共的性质，生产关系就变得与生产力的性质不适合了。这个矛盾终于推动起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建立起来，生产关系又变得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了。

不能够因为生产关系在发展上落后于生产力，就把生产关系看做是生产中纯粹消极、被动的因素。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生产关系是被决定的因素，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虽然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已经说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很容易了解，在文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内容虽然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但形式对于内容，决不是无关重要。相反地，形式是内容赖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一种艺术作品如果有了最适当的形式，它的内容——它所反映的事物的矛盾运动就会充分地得到表现，如果一部作品没有采取适当的形式，它的内容的表现就会受到限制、阻碍。所以，适合的形式，对于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也有着类似的重要的反作用。当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互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时候，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能发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可以说它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决定力量。当生产关系已经远远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并成了完全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陈旧的形式时，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发生阻碍的作用，生产力就要受到破坏。

新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有着显著的表现。苏联在革命前是欧洲的落后的农业国家，

革命后只经过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成为欧洲第一位的先进工业国。中国在革命胜利前是比旧俄国更落后得多的、工业产值只有百分之十七的落后农业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才四五年间，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工业产值就增长到将近百分之三十。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可以指望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从生产力的两个要素——工具和劳动者——的进步和增长上看出来。最近由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全国高潮，农民个体私有制普遍地改变为半社会主义的或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已经推动着农村生产力开始高涨起来，而这种高涨的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第一，新式农具的需要空前地增加了，以至于国家必须对制造农具的企业部门提出很大的计划任务，如在去年底就提出要在1956年内更加大量地制造双轮双铧犁等新式农具的任务等；第二，农村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了，农村中出现了大批的能够创造先进经验，高度掌握劳动技能的农业劳动者，由于劳动被合理地组织起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利用率都大大地提高起来，以前有许多劳动力在农村里无法利用，农村人口不断地流入城市，合作化运动高涨以后，这种趋向就停止了。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面规定了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巨大任务。任务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附带地连苍蝇、蚊子、老鼠以及各种困难的疾病也要一起加以消除。由于有了农村新生产关系的强大推动力，这些巨大任务并不使中国农民觉得为难，相反地却获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在工业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面，工人中间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高起来。在劳动竞赛中提高生产力的中心关键，就在于工人们自觉地改进工具设备，改

进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

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旧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发生阻碍和破坏作用，这可以由资本主义的恐慌的例子明显地看出来。在资本主义恐慌时期，工场关门，商业停顿，大量的产品由于没有销路，资本家就白白地把它毁灭了。在这里，生产力的破坏主要地也表现在它的两个要素的浪费方面：例如像原子能这样无比强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早已发明了，却始终还没有能正式应用到生产方面，而掌握原子能较迟的苏联反而首先建立了原子能发电站。就劳动者方面来说，在美国，经常有千万以上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只这些例子已经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是遭到了如何可惊的浪费，其他可以不必提了。

在旧中国，农民受到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弄得连生活也不能维持，因此也就无力来改进工具，更不用说采用新式工具。至于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在十分贫困的情形下也无法认真加以掌握和提高。土地改革为农民解除了封建剥削，农民的生活情况和生产情况就比较好得多了。但是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仍然限制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个体经营的农民没有力量充分采用进步的农具和科学的农作技术，特别对于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是如此，只有实行合作化以后，才解除了这些限制。

以上的例子说明，生产关系如果成为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陈旧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要起阻碍和破坏作用，而所谓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在实际上主要地也就是对于生产者群众，对于主要生产力的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的摧残和破坏。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陷入了尖锐的矛盾的时候，劳动群众就无法好好地进行生产，甚至于无法生活下去。这样的情况和条件，自

然而然地就要把千万劳动人民推动起来进行摧毁旧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生产关系不能长久处于和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合的状态，为什么生产力会具有着一定要使生产关系适合于自己的性质的决定作用，为什么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后一定要迟早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使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合的新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力量使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一定会起这样的决定作用？一句话，就是千万劳动人民的力量，生产者群众的伟大力量。因为腐朽的生产关系总是要妨碍和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是千万劳动人民都努力要求加以改变的。千万劳动人民共同起来要求和共同起来斗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力量既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结果旧的生产关系就一定要被摧毁，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就一定要变为现实。例如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生根本改变，就是由于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结果。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劳动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为什么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者群众的历史。

3. 生产矛盾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史的过程。它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看做人们的主观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有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硬说只有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才是依循着某种规律性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完全决定于人们的偶然的“自由意志”，没有什么客观规律性。胡风在通讯里，说到有一个大的意志支配着中国，这就是利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类

社会历史和自然界历史虽有本质的不同，但决不是没有共同之点。两者的共同点是：不论自然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都是客观的物质运动的过程，它们的变化发展都是依循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的。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有什么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呢？主要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在自然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完全自发地、盲目地发生着作用，而在人类社会，人们的自觉意识，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却有着重大的影响。

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更，最初总是按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自发地进行着的。这就是说，在旧的社会，旧的生产方式里，生产力的性质最初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新的生产力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出现，生产关系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这些发展过程，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着的。

我们知道生产是人的活动，是劳动者的创造活动，它的主体是劳动者。为什么又说它的发展过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进行生产活动不能不依靠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首先是工具，人们不能任意选择这些客观条件，他们只能依靠他们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存在的条件。马克思给安能科夫的信说："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却决定于人类所处的情况：即由以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和在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过去世代的生产物）的社会形式所形成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人们既然只能依靠既成的条件进行生产活动，所以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发展趋向，他们所掌握的生产力的性质，他们的适应于生产力性质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就都不

是他们的主观意志可以任意选择或任意改变的，也就是说，这些过程都不是依赖于他们的主观意识而是依一定的客观规律自发地进行的。第二，当人们努力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能的时候，他们的主观意识自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上他们的主观意识所考虑到的只是某些眼前的目的，他们决不会预想到生产力的这些改进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他们不会预想到生产力会在性质上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生产关系也会随着发生怎样的改变，而这对整个社会又会引起多大的变化。例如英国技工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决没有想到这个发明会引起“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普遍地社会化，并因此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说明生产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对于直接从事改进工具改进劳动技能的人的主观意志来说，是完全独立地、自然地进行的。因此，我们说历史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生产者群众所创造的历史，这决不等于说劳动群众能够凭着他们的主观意志来任意创造历史的。他们的这种创造活动的趋向和性质，是由一定的现成的社会条件所规定，并遵循着为这些条件所规定的一定的规律性的。有些关于历史事实的文艺作品，由于作者缺乏这种历史观点，把过去的农民描写得就像今天的工人阶级一样，或者描写成凭个人的意志来创造历史的英雄，这就不能不歪曲了历史真面目，违背了文艺应该正确反映现实的原则。所以，研究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对于文艺工作者理解各种不同劳动人民的不同的基本特点，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不能因为生产发展过程最初是自发地进行着，就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说人的自觉意识没有任何的作用。生产发展过程虽然始终是依一定的客观规律进行的，但不能说这种规律性的活动是像自然界的情形一样，永远只是自发地盲目地起作用的。这

是自发论的错误观点，是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偶像化了的错误思想。应该说，即使是自然界现象的客观规律，也只是在没有人类社会时和这些规律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才是完全自发地盲目地起作用的。当自然规律被人们所认识，并把这认识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时，自然规律也就成为被人们自觉地利用来改造自然的规律知识了。至于说到社会发展的规律，生产发展的规律，那么，生产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只能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是自发的。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情形下，如果仍然处于自发状态，就不能前进。这种情形，特别在阶级社会里最为明显。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体现为互相敌对的阶级势力——前进的势力与腐朽的势力。社会的腐朽势力的利益是和腐朽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因此，当生产力已发展到使旧生产关系成为完全不适合的形式时，当生产关系必须要发生根本的改变时，社会的腐朽势力仍然要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来保存旧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使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形成，受到严重的阻碍。由于腐朽势力是处在国家统治者的地位上，他们能够利用强大的国家的物质力量来阻碍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也能利用统治者所垄断的文化教育工具来进行麻醉人民的宣传活动，从而在精神上阻碍人民起来和旧生产关系和旧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因此，这样的阻碍，单凭自发的发展过程，是不能克服的。这时生产的发展就必须迟早要进入自觉的运动过程，也只有进入自觉的运动过程，才能克服旧势力的阻碍。所谓自觉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通过新的社会意识，新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来得到实现的过程。新的社会意识，新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等，是反映着生产发展的新的需要，反映着生产力向前进步的要求以及建立新的

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每一历史时代的先进的思想家观察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创造出与当时条件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意识，再把这种新的社会意识向着社会的前进势力进行宣传，打破他们中间由于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不自觉状态。由于有了新的社会意识的指导，社会的前进势力就能够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使他们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目标，并在这一个共同的明确目标之下组织和集中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自觉地向着社会腐朽势力的堡垒举行进攻，这样才有可能克服后者的阻碍，使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变革，为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强大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地盘。例如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就是要通过工人阶级的自觉的行动，也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组织和发动起工农联盟的大军，才能够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腐朽社会势力的阻碍，实现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任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用具体的典型形象来反映生产发展的这种自觉过程，也就是工农兵的自觉的斗争。

生产发展的自觉过程，决不能看做是否定了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全凭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意性的过程。相反地，在这个过程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仍然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和自发的过程不同的，只在于生产的客观规律在自发的运动过程里，是没有被人们认识的，人们对于它是盲目的。因此它是离开人的主观意志而自发地起作用的，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行动常常不能和历史规律性一致，常常要发生错误和偏差。但在自觉的过程里，生产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或多或少地被社会的前进势力所认识，人们在这样的认识的指导下，就能自觉地按照历史规律的方向去行动，

就能尽量避免错误和偏差，这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通过人的意识而成为人们自觉的活动。所以，社会的先进势力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然后才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前进，如果他们只凭主观的意志任意行动，而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他们就要丧失真正的先进势力的资格。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他就不能在群众中起先锋队员的作用。进步的文艺，由于它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对于人民的自觉活动是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的。19世纪俄国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应该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革过程中以及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启发工农群众以及其他进步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自觉性，因此它必须直接地或间接地正确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产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运动，必须反映工人农民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前，生产的发展总是由自发的发展进到自觉的过程。而自觉的过程主要是出现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觉的发展过程就成为生产发展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主导的特征。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以前，或者是如像原始公社那样，社会还处在野蛮时代，还没有具备能够反映生产发展规律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或者是如像阶级社会那样，社会的统治者都是以保存现有生产方式为自己的利益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偏见使他们不能认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而劳动群众一般地都是处在穷困愚昧的境地，也没有力量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生产的发展一般地只能是自发地进行。只有到了社会生产的矛盾发展到极尖锐的程度，旧的

统治势力已经十分腐朽，自发的发展过程已遭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时，然后才会出现一些代表进步势力的先进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反映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然后才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使社会生产的发展走上自觉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形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在这里，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是保守的势力，而是最革命的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领导社会的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武装的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保证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经常能获得精确的关于生产发展规律知识的指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日益全面地为人所认识，日益充分地被人利用来为社会谋福利，所以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成为完全自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机关等——的特点和任务，就在于要对生产发展过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给予正确的自觉的指导，如果它们不能这样做，如果他们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各方面的工作陷于自发的状态，它就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的意义。反过来说，如果它能正确地执行它的上述的任务，充分发挥它的上述的特点，那么它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各方面生活的发展，就会成为极强大的推动力量，最近一年来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的空前迅速高涨，就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国家对于生产的自觉运动的强大指导作用的很好的证明。

应该指出，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过程完全是自觉的，这只是就它的总的方向和本质的方面来说，这决不是说，在具体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中，任何自发的状

态也不存在了。不是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生产力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也常常会是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自发地产生出来，而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和领导方面的自觉的指导，常常也要在后来才能实现。社会存在先于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要证明这种情形，例子可以找到很多。在苏联，例如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这样，斯大林曾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开始的，由下层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管理处方面的任何督促”（《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45 页），以后才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加以总结、推广，使之成为自觉的运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里，生产发展之所以仍然存在着自发的情形，可以由两种原因来说明：第一，领导机关虽然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使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在总的方面来说始终贯彻着自觉性，但作为领导机关，不可能对于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过程的具体细节都能处处注意得到，因此在具体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过程中，新事物在人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的情形下常常自发地产生出来，这是很自然的。第二，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以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过程中，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过程中也仍然永远有着先进与落后、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矛盾，这个矛盾也不能不反映在领导机关中，因此，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最革命的势力，不会像旧社会的腐朽的统治者那样把保存旧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利益，但领导机关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员中间，也常常有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指导和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道路的情形。他们或者是由于骄傲自满，

麻痹了对新生事物的感觉，或者是由于受到了某些惰性势力以至于腐朽势力的思想影响，对于新生事物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不能对生产中和社会中的新事物的发展给予自觉的指导，相反地还要加以阻碍，某些生产部门中领导者对于劳动者的先进经验的推广不加重视甚至加以阻碍，就是说明这种情形的明显的例子。

以上两种原因，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的过程，仍然存在着自发的情形。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情形和旧社会有原则的不同。第一，这种自发的情形，不会像在旧社会那样长久停留，一定要到生产方式的矛盾达到很尖锐的程度才被迫地引到自觉的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发的运动是能够及时地转到自觉的指导方向的。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由自发走向自觉，不像在旧社会那样要受到腐朽势力的严重阻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暴露不至于成为对抗性的。对社会和生产发展的自觉的过程虽然必须经常地和惰性力量、保守思想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主要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劳动竞赛之类的和平形式，不至于发展到冲突的地步。以上两点告诉我们，虽然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仍然存在着自发的情形，但自觉的指导，是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总的来说，就其本质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自觉性的。

恩格斯指出由阶级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飞跃。”所谓“自由的王国”，就是指社会生活能够获得自觉的指导。而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其中的主要条件，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能够应用这个武器，来正确地认识生产发展的规律，生

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了这些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工作，就可能及时地觉察到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自发地出现的新的东西，就可以迅速地把它们转变为自觉的运动，就可以迅速推动生产和各方面生活的进步，使社会获得它应有的高度的福利。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的任务，主要地也就在这一点。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从来人类的历史，除原始公社以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纷杂迷乱毫无规律可循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阶级斗争的原理，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出了它的有规律的发展线索来。马克思主义的党，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方面主要地就是应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革命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够规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来指导工人阶级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最有力的革命思想武器，就为着这样的原因，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和唯心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没有不集中力量来反对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胡适、胡风都是如此，梁漱溟先生也是显著的例子。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已经有一些人初步地认识到了。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梯埃利、明涅、基佐等曾经用“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前后的历史事变。但这些历史学家只是片面地认识到一个历史阶段上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没有

全面地把握到阶级的本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和这不同，它揭发了阶级的本质，阶级产生的原因和阶级斗争的全部历史规律。马克思曾概括地指出自己的学说的特点说："我的新的东西，是在于指出：(1) 阶级的存在，只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结合；(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向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专政本身只是作为达到一切阶级的消灭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1 页)

下面我们就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最重要学说加以解释。我们的解释共分为三个小题：1.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2.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3. 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掌握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现在开始讲第一个小题。

1.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差不多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外表上极力否认社会上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在实际上却是想把某一种阶级剥削制度说成是万古不变的东西。例如梁漱溟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想把旧中国的封建阶级制度说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这些唯心主义的虚伪观点，一方面肯定原始公社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定时期之内产生的现象，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产生的现象。就全部人类历史来说，阶级社会所占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由原始社会末期到现在最多不过六七千年的时间，已经到了消灭一切阶级制度

的时代了。

现在让我们先解释一下阶级这一个概念的意义，然后再说明它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为什么要先解释阶级这个概念呢？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这个概念常常有不正确的认识。最容易碰到的错误认识，就是把阶级和等级混淆起来。阶级决不是等级，等级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在奴隶社会里或封建社会里出现过的那种人身从属关系的等级制度，如公、侯、伯、子、男的等级，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等等，这种等级制度的特点主要是在法权上道德上规定了上面的等级对下面的等级有在人格上加以支配的权利，而下面的等级对上面的等级有在人格上从属的义务，在这里面，同一阶级中间也可以划为不同的等级，如同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可以划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等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也带有某种人身隶属的等级关系的特点，同时阶级的关系也具有等级的意义，如贵族和平民是不同的阶级，同时也是不同的等级。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从表面现象上看起来，等级和阶级是混淆难分的，在这里，等级的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这是使得当时研究社会历史的学术界不能够揭发社会阶级关系和创立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之一。等级的另一种意义，是职业上或工作上的，在同一工作中由于经验、资历和贡献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等级的待遇和报酬，这是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仍存在着的必要的制度，这当然不是阶级。以前曾有些反动分子，为了造谣破坏，利用一部分群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弱点，故意把这种必要的等级制度混说成阶级制度，从中进行挑拨。所以在这一方面也应该区别清楚。

阶级关系不是人格上的从属关系，也不是职业上和工作上的不同地位。阶级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上的地位的不同而形成的

各种社会集团。所谓经济地位不同，就是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生产关系的性质，首先是由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所以，人们的经济地位，首先又决定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中的地位。在阶级社会里，一部分人占有了全部或大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全部或部分地丧失了生产资料，因而前一部分人就在经济上居于支配的地位，就有可能利用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前一种人就成为剥削阶级集团，后一种人就成为被剥削阶级集团。

列宁说："所谓各个阶级，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所谓各阶级，就是由于彼此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团能占得另一集团劳动的各个集团。"（《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92页）

知道了什么是阶级，也就了解阶级是如何产生的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在这里面，人们分裂为在经济上（首先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居于不同地位的集团，分裂为经济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集团。这样的分裂，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水平和性质规定了的。恩格斯对于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曾做了一个一般的概括，他说："当社会劳动成果的总量用来供给社会全体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所剩无几的时候，劳动差不多占据着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最大部分时间的时候，这时候，社会必然分成各个阶级。"（《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情况，相当于原始公社末期有

了农业和畜牧业以后，一直到大机器工业开始出现的时期。这个时期，生产力比原始公社有所提高，即在生产中能多少提供剩余的劳动产品，但是这种剩余劳动产品数量很少，而要实现这样的生产，必须使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最大部分时间投入劳动过程，只有极少数人能脱离生产劳动，从事政治、文化、科学的工作。这是使得社会上少数人可能占据优越地位来统治和剥削大多数人的最根本的原因。此外，生产过程由集体的转为分散的以至于个体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生，使财产私有制度产生和巩固起来，使社会分裂为贫人和富人，而阶级剥削制度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实现出来的。

最初的阶级剥削制度是原始公社末期所发生的奴隶的使用。开始时，奴隶是仅仅由战争的俘虏来充当的，以后由于贫富的分化加大才使得公社内部的成员也有一部分变为奴隶。奴隶在开始时只能由俘虏来充当的原因，是由于原始公社内部的同志互助关系的巩固传统不容易很快打破。最初的奴隶，是在农业公社内部作为各家族内的辅助劳动力来使用的。奴隶所有者也从事劳动，这叫做家内奴隶制度，这是原始公社末期即农业公社的奴隶使用制度。这是过渡性质的制度，奴隶还没有担当生产的主要任务，原始公社制还是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形成正式奴隶占有制社会。正式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形成，是在奴隶被大量使用，并担当了主要的生产任务，而奴隶占有者成为脱离生产劳动的奴隶主阶级，并专门依靠剥削奴隶劳动产品来生活的时候。奴隶占有制度主要地是存在于古代世界，如中国的殷代，西洋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地方还有它的残余，如中国的四川（原属西康）的彝民地区，就有这种情形。

奴隶占有制下面的基本的对立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在

使用粗糙的工具来进行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情形下面，奴隶主强迫下面进行的奴隶的集体劳动，比起农业公社的族长支配下的劳动来，能够提供更高的生产率，这就使得奴隶主成为社会上据有最大财富的、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级，并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奴隶的剩余劳动使一小部分人能够脱离苦重的体力劳动，专门来从事政治、文艺、科学等等的文化上的创造活动，使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这是奴隶占有制度在历史上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奴隶占有制度是一种最残酷的剥削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以至于奴隶本身，而奴隶则毫无所有。因此，奴隶在生产中毫无所得，生活上也没有任何指望，对于劳动感不到丝毫兴趣。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需要把粗糙的工具改为较精巧的工具，而为了掌握这样的工具又需要劳动者能够获得较高的劳动技能。对于劳动不感任何兴趣的奴隶劳动，既然是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因此奴隶占有制度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消灭奴隶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才能进一步发展，而这新的生产关系，就是包含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的封建生产关系。

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面，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地主阶级占有了主要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生产者是地主阶级在实际上仍然可以任意支配并加以剥削的农民，但他们已能够占有自己劳动所必需的某些工具，并且可以有自己个人的经济。这样的阶级制度，是适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情况的，因为这时生产力的水平已有提高，生产力性质也有一定的改变：工具是比较精巧的便于个人使用的手工具，而各种劳动技能也比较奴隶制时代更复杂更提高了。占有自己的工具并且又有自己的经济这个事实，使农民觉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多少有了能够富裕起来的指望，因此

他们对劳动就发生了兴趣，不像奴隶那样缺乏自动性，这就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来掌握较精巧的工具和较复杂的劳动技能，使生产经验积累起来，这样就使生产力进到更高的发展水平。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面，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其残酷的程度在实际上和奴隶占有制度下面的剥削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民在这种剥削下面普遍地穷困破产，生产上和生活中都毫无指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仍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下的生产都是个体的小生产，个体的小生产本身，对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天仙配》这个戏里描写董永的主人故意为难他的老婆，要她一夜织锦十匹，幸亏她是仙女下凡，靠了七个仙女姊妹的帮助，算是完成了任务。这个戏在神话的形式上反映了个体小生产的限制性——只有在幻想中的神仙帮助下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较大的生产任务。要在实际生活中而不是幻想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较大的生产任务，只有在生产力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只有个体的小生产改变为较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生产时，才能够做到。要进行生产力的这种改变，依赖地主阶级是做不到的，因为地主阶级就是依靠剥削个体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为生活的，这种剥削制度就是建立在小生产的条件上的。至于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仅仅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发生困难，更不用说把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在封建社会下，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就不能不由另外的新的阶级来担任了。这个阶级，就是城市里的资产阶级。

城市是在封建社会里逐渐生长起商业和手工业的集中地区。在这里，资本家最初投资建立手工业工场，把手工劳动者集中起来进行生产，这就开始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

特点，就在于它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作为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无产阶级则是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在法律上不是隶属于资产阶级的等级，形式上和资产阶级是平等的，然而他们在经济上除了向资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谋生的道路，因此在事实上就不能不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支配并受他们的剥削。资产阶级为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所驱使，把封建时代的个体生产改变为集体生产，使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使用手工工具的工场手工业进到使用机器的大工业，使社会生产力空前迅速地提高起来，并使生产力的性质普遍地社会化。社会化的或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建立生产工具和生产品归社会所有的、没有私人占有和没有剥削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要求和资本家的私有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同时，在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集中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大军，形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无比的力量。无产阶级担当着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是资本主义制度里所产生的资本主义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除了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任务之外，同时还担任着实现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的任务，即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任务。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实现这个任务，是由于生产发展的情况决定的。在大工业生产的情况下面，恩格斯所说的必然使社会分成各个阶级的根据已经没有了：社会劳动成果的总量中，用来供给社会全体所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不是所剩无几，而是剩余很多了；劳动已不再需要用去社会极大多数人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而是所用的时间大大缩短了；由于机器的生产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者来操纵，因

此工业劳动者不再是像奴隶和农奴那样长久处于无文化状态，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任务已不再是极少数依靠剥削生活的人们的专门权利，劳动人民也逐渐地有机会向这方向发展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这里，剥削制度已被完全消灭，但还不能说已消灭阶级，因为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区别还存在着，其所以要作为两个阶级加以区别，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还有所区别。工人阶级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而农民则是属于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虽然总的来说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仍有具体的本质上的区别。只有当生产力更高地发展了，以至于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可以像工业一样进一步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时，也就是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农民和工人的本质的区别才被消除，才可以说完全消灭了阶级。

2.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更，以至于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或阶级矛盾运动来实现的。每一个阶级社会，都有着它所特有的两个主要的互相对立阶级，构成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该怎样来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呢？这必须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加以分析，才能够说明。

在阶级社会里（这里我们把工人阶级专政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暂不算在内），剥削阶级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每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都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使这种生产方式尽可能地巩固不变。因此，当这种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当生产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消灭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以便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地盘这个任务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要用一切办法来维持旧的生产关系，阻碍新生产关系的建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如果被剥削阶级不起来进行斗争，社会的生产就不能向前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就要停顿下来。只有通过被剥削阶级与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使生产力发展，使整个社会前进。在这个斗争中，被剥削人民的胜利愈更彻底，社会的进步就愈更迅速，他们在斗争中失败了，社会的发展就要受到严重阻碍，但只要有了劳动人民的群众斗争，社会就会多少有些进步的。

例如旧中国的封建社会，首先就是由于经常有着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才能够逐渐进步的。毛泽东同志说在旧中国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在一种阶级社会出现的初期，剥削阶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使生产力向前发展。但他们仅只是在有利于自己的剥削需要时才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对于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力的轻视和压迫行为，却又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为着自己的私利组织奴隶劳动，发展了比原始

公社更高的生产力，但他们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使得奴隶对掌握工具和劳动技能毫无兴趣，并使奴隶肉体生命遭到无情的摧残和浪费，使社会的生产力不能继续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关心农业生产的收成，有时也组织一些如像水利之类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设施。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更厉害地阻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页）

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组织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使社会的生产力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空前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在资本家的私有制基础上和各个资本集团盲目追求利润的条件下所发生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恐慌，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许多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由于不符合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要求而弃置不用，阻碍了生产力更大发展的可能性。并且资本家在企业里采取某些技术改革的措施，常常也是由于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当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而斗争，并取得一定胜利时，资本家就采取新的技术来加强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就相对地提高了剩余价值的剥削程度，而事实上就把工人阶级斗争所得的果实抵消了。马克思指出：1852年以后英国的"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仅只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战斗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就是指这种情形而言的。此外，资本主义社会里经常存在着的大批失业工人的现象，说明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这种最重要的生产力遭到了

巨大的浪费。

不能一概否认：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在一定时期有某种积极的作用（例如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没落的时期曾经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特别是这些阶级中有些人物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活动，对于历史进步也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否认这一点，就是缺乏历史观点，就不能正确说明在阶级社会里的许多历史现实。描写历史事实的文艺作品，必须掌握这个历史观点，才能不违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巴尔扎克的作品之所以算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也只是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进步这一个历史的现实。但是，虽然我们必须对剥削阶级的看法采取这种正确的历史的观点，但我们更要注意到，被剥削的生产者群众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剥削阶级只能在历史的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起积极的作用，生产者群众则是生产——对社会历史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主体，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本的创造者，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以他们的劳动和斗争为最根本的决定力量。当劳动群众为着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积极地起来行动时，社会历史就会发生迅速的变革和发展，当他们的斗争行动沉寂下来的时候，社会的进步也就要延缓下来。

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有不同的情况，并且对于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结果也不相同，这也是必须加以注意到的。

在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里，奴隶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是使奴隶占有制社会崩溃并使历史发展前进一步的动力。但奴隶是对于生产的进步没有兴趣的阶级，它不是和更高的经济形式相结合的阶级。奴隶阶级在斗争中推翻了奴隶主阶级和破坏了奴隶占有制社会之后，奴隶阶级自己也随着同归于尽，他们并不能成为

建立新社会推动生产发展的主人。代替奴隶占有制社会出现的，是以地主阶级为统治者的封建社会。在这里，农奴劳动者代替了奴隶的地位作为生产的主体。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能够严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以至于能够摧毁封建社会，使社会向前进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但是，农民阶级同样不能使自己成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主人。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的结果，从来不外乎以下的三种情形，如果社会生产仍然是个体分散的小生产，没有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出现，那么，农民暴动或者被地主阶级所镇压而归于失败，或者即使暂时得到了胜利，推翻了一个封建朝代，但归根到底另一个朝代的地主阶级又利用了农民斗争的果实而使自己掌握了统治。中国过去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结局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9 页）其次，如果社会上已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且资产阶级也正在对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时，那么，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就要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这就是说，当农民起义推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资产阶级就代替地主阶级成为统治者，并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如果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那么，农民的斗争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获得最彻底的胜利，并且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一直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不论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都能以他们的斗争来推动社会前进，但他们自己却不能成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这主要是由于前面说过的历史条件——生产条件决定的。过去反映农民斗争的文艺作品，结局一般都是悲剧的性质，甚至在神话幻想

中也不能有喜剧的结果，这不是偶然的。《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的结局就是完全悲剧的。《西游记》用神话形式描写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出色的反抗性格的典型，但结局是被统治者征服了。

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时期都不是和更高的经济形式相结合的阶级，因此不能在自己的手里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奴隶是使用较粗糙的工具并且是被迫地劳动的生产者。农民则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并且是私有者，它本身没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的要求，因此也就不能自己走向废除剥削制度的方向。在解除了封建剥削而又不废除个体私有制的情形下，农民只能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方向。也就是说他们中间会发生贫富的分化，少数人变为富农，即变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大多数沦为贫农或雇农，即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和奴隶、农民都不同。工人阶级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近代的大生产相联系的阶级，而不是和落后的分散的小生产相联系的阶级，近代大生产使工人阶级具有最集中、最有组织和最有纪律的特性，也就是使它成为最强有力的劳动阶级。工人阶级不是私有者，而是一无所有的阶级，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没有任何需要顾虑和需要保留的东西。他们的无产者的地位，加上他们所联系的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共公性质，在他们面前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所以，工人阶级和过去的奴隶、农民不同，奴隶和农民的斗争只能推翻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为后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社会的出现扫清道路，工人阶级则不但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扫除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应该和能够领导一切劳动人民，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

工人阶级要领导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国家政权夺

取在自己的手里，否则工人阶级的这个历史任务就无法实现。在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情形下面，即使工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也不能够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而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是根本相反的制度，以保护私有制度为自己的生死利益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时候，就要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来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内部，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旧社会里只能产生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只有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够开始来建设社会主义和消灭剥削制度。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对剥削者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没有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所创设起来的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要使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经过自发的阶段到达自觉的阶段，自发的斗争和自觉的斗争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有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自发阶段，就是指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情形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工人阶级虽然在进行斗争，但斗争的目的只限于某些眼前的局部的问题的解决，不知道自己阶级的远大的历史任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知道自己的斗争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也不知道为完成这些远大任务所应采取的正确的步骤、方针、战略和策略。不但如此，在自发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运动既然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指导——也就是说，运动处在盲目的状态——因此，就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被资产阶级

分化、利用，使工人阶级归于失败。所以，工人运动中的一种自发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这种思想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否认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这种思想就是想要使工人运动永远停顿在自发状态，以便资产阶级可以依据自己的利益来任意加以支配。胡风在文艺上强调要写群众自发的行动，反对文艺作品反映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的指导，就是利用反动的资产阶级自发论思想来反对工人阶级、反对革命的一种阴谋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共产党，就是为着使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上升到自觉阶段，就是为着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明确地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以便能够坚决、彻底地为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列宁在创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就曾经坚决地和经济主义派的自发论思想进行过斗争。由此可见，反对自发论思想，坚持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们的斗争具有高度自觉性，这是保证工人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帮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斗争中提高自觉性。因此，和胡风的谬论相反，一定要描写人民群众的自觉的斗争，也就是要描写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当然在这里也要避免简单化和公式主义，即以为每一个作品都一定要有政治委员出现才算是有了共产党领导，一定要使作品中的人物口中说出一大篇抽象的理论才叫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该注意，文艺是用具体的形象来反映客观存在的，文艺反映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斗争，不需要这种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作法。

3. 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的中心任务在于掌握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给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即阶级分析的方法。有了这个科学方法，才使我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无限错综复杂的现象找到了正确研究的线索，列宁说："一个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趋向与另一部分人的趋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各种矛盾；……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一种规律性。这种线索就是阶级斗争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几个社会内全体组成员趋向的综合拿来研究，才能对这些趋向的结果做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趋向，是因为每一社会所分成的各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卡尔·马克思》）

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里说："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这些都说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在方法上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使社会历史的研究提高到真正科学的地位，使我们能够从无限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找到它的发展的规律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科学方面许多人运用这个方法来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获得了不少的成绩。这样就粉碎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的不可置信的胡说：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是完全决定于人的主观的自由意志，没有任何客观

的规律，并根据这个错误的理由，硬说社会历史的研究不能成为科学。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由后来的反动派分子和战犯张君劢等人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中传布开来的。它在旧中国一直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种反动观点，直到新中国开始成立的时候，在许多知识分子中还有相当的影响。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这种反动观点也逐渐被清算了。

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正确性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革命的实践。在中国革命这样异常艰苦和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指导人民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且能够领导人民在各方面的斗争中战无不胜。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工人和农民自己本身具有伟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共产党能够予以自觉的指导。没有科学的正确的指导，尽管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具有伟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终归只是一种自发的潜在力量，它的战无不胜的性质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并不能够直接成为现实。只有共产党给予了科学以指导之后，这种可能性才成为现实性。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科学的指导，从方法方面来说，主要地就是善于应用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分析矛盾的方法，具体应用于阶级社会历史的表现），来正确地了解情况，分清敌友，决定战略和策略，然后以此为基础，来正确地规定斗争的步骤计划和方法，这样就能够给群众的斗争指出明确的目的和道路，就能够克服人民群众自发运动的盲目性，使他们得到头脑清醒的指导，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和最有效地发挥出来，使他们的战斗获得胜利。

只要看看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很容易了解这里所说的道理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第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了一个对于革

命的战略策略指导上和革命的胜败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的斗争道路的问题。

如何应用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不能离开生产情况,并且是要以生产发展情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情况作为依据的。阶级不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各种社会集团。所以,对于任何阶级的分析研究,都不能凭着一个死的公式来下结论,而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决定一个阶级在某个历史阶段中的活动趋向的根本条件,就是生产条件,就是这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同一个阶级,它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一定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它的一定的活动趋向。但是,由于生产发展过程的时期不同,同一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因此它在历史过程上就有不同的活动趋向,就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不同的作用。例如,同一个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面以及在工人阶级专政下面,它的活动情况和它的作用各有不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即使是剥削阶级,由于它所联系的生产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情况,由于这种生产关系有上升的时期和没落的时期,因此这个阶级也有它的进步时期和它的反动时期,它在某些情形下具有进步性,某些情形下又具有反动性。有一种主观主义的非历史观点,他们在自己头脑里设想了一个主观的死的公式,用"剥削制度都是不合理的"一句简单的话,否认剥削阶级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有任何积极的作用。这种错误的观点在前几年我们曾经批判过。要

正确地具体地认识一个阶级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活动趋向和作用，一定要首先研究这个阶级在当时所联系的生产的发展情况，以及它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一个阶级所联系生产的具体条件，决定着它的具体要求和行动趋向。依据有关的具体生产条件来确定一个阶级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或某一革命运动中的行动趋向，是可以获得像自然科学一样准确的结果的。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这样分析的，特别是其中分析当时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小资产阶级三个阶层对革命的不同的态度，可以作为学习阶级分析的很好的典范。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东同志就是依据当前中国农民在生产中所处的具体情况，正确指出新中国农民就其本质方面来说是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这个在一年来的轰轰烈烈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的科学的估计，是我们学习上述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最近的范例。

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无限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科学方法，但这科学方法的意义，只在于提供研究的基本线索，而不能作为排斥一切的惟一的公式。在应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一定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自然必须依据各阶级的活动趋向来理解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性，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外的其他实际存在着的重要因素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同志对于过去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除了首先明确指出这个战争的阶级性质之外，同时也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地理条件。有时在一定的具体历史事变中，某些重要的偶然因素，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马克思写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对于拿破仑第三的个人特点的作用，也加以认真的具体分析。所以，应用阶级分析法

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如果把一切事变都简单地仅仅用阶级的原因来解释，而对于实际存在的其他的历史因素根本不加考虑，这就要犯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

如果在一般社会历史研究方面应用阶级分析方法必须避免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那么在文艺工作上，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上就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在文艺工作上，应不应该注意阶级分析的方法呢？掌握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文艺工作有没有好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上来说，对这个问题应该给予肯定的答复。当然，如果人们不准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工作，如果人们在文艺创作上不准备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否则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很必要的。问题是在于要避免上述的偏向，即不善于把阶级分析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线索，而只简单地把它作为排斥一切的惟一的解决问题的公式。

在我们的报纸杂志上我们看到许多讨论古典文艺作品的文章，它们都企图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文艺批评的。我认为这种努力的总的方向是对的，这些文章中有的的确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例如把作品的价值片面地仅仅归结到某些阶级观点上，如人民性、爱国主义之类，忽视了构成文艺作品艺术价值的其他条件，因而就把任何一种多少有价值的作品都生硬地贴上人民性的标签。对于这样的倾向有人提出批评，我觉得也是对的。当然，一种在历史上早已证明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它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或情感在某些方面一定具有着为人民所共有的某种特征，忽视了这一点，也可能是片面的。

在这里顺便讲一讲我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

文艺是社会存在的双重的反映，既反映作家的社会地位、阶

级立场、阶级观点，又反映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客观存在和阶级矛盾运动。前者对于后者是有一定联系的。由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不同，对社会存在、对阶级矛盾运动的反映也就有所不同，或者是正确地反映，或者是歪曲地反映，或者全面，或者片面，或者以纯粹的空想代替现实。文艺史上存在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也存在着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反动的空想虚构之间的斗争。现实主义的文艺是趋向于力求正确反映社会存在和阶级的矛盾运动的。而革命的浪漫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以间接的形式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现实主义的以及反动的纯粹空想和虚构的文艺是力图歪曲和掩蔽社会存在和阶级的矛盾运动的。我们赞成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文艺，同时赞成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和联合。我以为文艺史上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与哲学世界观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并不就是唯物主义，但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文艺不是用概念来反映现实，不能用哲学理论形式来表现唯物主义观点、即力求使主观正确反映客观的观点，它用具体的形象来体现这个观点。所以，说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创作方法，和一定的世界观没有一致性，我认为是片面的看法。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致性，就在于它是要力求正确反映社会存在的矛盾或阶级矛盾运动的。旧的现实主义文艺家，自然在理论上并不理解社会的阶级矛盾，更不知道阶级矛盾的分析方法。甚至于也常有在政治立场上是保守的，然而他们通过具体形象的概括，或多或少地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运动，反映了社会的前进趋向，能够这样做的旧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创作活动和他们的政治立场，就表现了矛盾，这个矛盾我以为不仅仅是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矛盾，同时也是世界观

本身的矛盾。他们的创作方法体现了进步的世界观，突破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上所体现的保守的世界观。世界观的矛盾，在过去的哲学家中间也常常存在过的，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他的辩证法核心的矛盾，也就是世界观的矛盾。社会意识是很复杂的现象，哲学家有世界观的矛盾，文艺家的世界观的矛盾，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的哲学家和文艺家多半是出身于和生长于剥削阶级环境的，他们的这种地位使他们在反映社会前进运动的时候还常常保留着保守的方面。

说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有着不同的情形。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它是一种创作方法，但也不能仅仅只看做一种创作方法，而应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文艺创作方法上的具体体现。我们不能直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创作方法只能是用具体形象来概括和反映现实的方法。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用来观察事物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因此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不应该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一致的。作家如果有意识地应用阶级分析方法，他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现实，更好地在创作里反映现实。当然，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创作过程，通过复杂的艺术劳动。仅仅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世界观，并不就能成为很好的艺术家。我们不反对作家们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方法来进行创作，也不否认一个作家即使不懂得阶级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能写出相当好的作品。但我们要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觉的结合，新中国的作家有很多就是在这条路线上努力前进着，并且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在这里，

让我们举一段毛泽东同志的话来作结束：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有什么作用？这是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里区别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问题之一。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颠倒的观点出发，从社会历史的表面现象出发，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决定于历史上偶然出现的极少数具有特殊天赋的人物的创造活动。例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梁漱溟就认为“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天才之创造”。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理，指出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这就把握了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上述根本问题的明确有力的回答。我们今天就要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说明。我们的说明分为三个小题：（1）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3）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领袖的作用。

1. 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某些表面事实上看，特别是就过去阶级社会历史的某些表面现象来看，唯心主义关于人物作用的观点似乎好像是对的，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通常好像都是处在平静的或者消极的状态里，而在历史舞台上积极活动的主要地只是一些帝、王、将、相，——统治者和征服者一流的人物，好像这些人物的活动就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向，而历史也就是这些人物的历史似的。过去的历史家，绝大多数都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写历史，因此就把这种观点巩固起来。但如果我们只要稍稍深远地来应用一下我们的思考力，就不难了解这样的观点是不能说明历史现实的。首先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人物的活动无论有着如何复杂的具体特殊性，其中总可以找到某些一定不移的趋向，这些趋向单用人物偶然出现的原因是得不到说明的。为什么过去中国几千年来翻来覆去总是帝王将相在统治人民，而不会出现别的统治形式？为什么以前的中国不会偶然地出现这样一个杰出人物，由于他的决定作用，使得中国在一千年前就有了议会制的国家形式？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要经过多次的“改朝换代”，而且至多每隔二三百年总有一次“改朝换代”？为什么不会偶然出现一个杰出人物，由于他的决定作用使一个帝国朝代建立长久一些？为什么像孔子这样杰出的人物所理想的稳定不变的封建社会终归是幻想？为什

么秦始皇帝这样的英雄所梦想的万世帝国只到二世就灭亡了？只要随便提出几个这一类有关历史的全面性的问题来思考思考，就可以看出，表面上好像只是少数统治人物任意活动的历史舞台中，实际上却存在着不是用少数杰出人物的力量可以说明的一定不移的秩序和规律。

中国过去时代也曾有过一些思想家，企图比较深刻地来考察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问题，在这些人的思想中，人民的力量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许多写历史的人都把人物的成败归之于“民心”的得失。他们已多少猜测到人民的力量比任何杰出的人物的力量都更大得多。但是，由于过去历史家仍然是抱着唯心主义的观点的，他们就不能从这些猜测的看法做出它应有的结论来，也就是仍然不能认识到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他们常常把“民心”的得失这一件事反过来又归之于人物的是否英明，所以他们最后的结论还是杰出人物的个人活动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势，还是“英雄造时势”。这当然是颠倒的看法，因为较英明的人物之所以能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英明本身，而在于他的眼光使他善于去争取到“民心”，这恰恰证明决定的力量在人民而不在个人。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所以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1) 任何时候，社会的存在都必须依靠着种种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而任何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劳动群众生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那不要说一年，只要几个星期，就会因饥饿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6 页）没有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创造活动，社会就不能存在。(2) 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情况，即他们的生产

方式，规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在人物活动的表面现象背后，千万劳动人民每日每时地在使用着和改进着劳动工具，积累着劳动经验，提高着劳动技能，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并适应于这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性质，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产生了某一种社会形式的基础。一切政治、文化以及人物的活动的基本趋向，都是决定于这个基础。千万劳动人民的手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一切政治、文化以及人物活动的根本性质也就不会改变。在小生产农业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任何激烈的政治风云变化和任何杰出人物的活动也不能跳出封建的政治形式和封建的社会形式范围以外。就是在封建社会形式和封建政治形式的范围之内，多少激烈的变化，如像改朝换代这样的变化，也还是劳动人民积极斗争的结果。旧的朝代是由于它的腐朽专横引起了农民的广泛起义，才会垮台的。新的朝代的统治者，不过是利用了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登上王座。但是在改朝换代的变化中，由于劳动人民没有把自己的生产情况——生产方式加以根本的改变，所以朝代虽然改换了，社会和政治的面貌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社会的革命的变革过程中，劳动人民力量的决定作用更显示得明白。革命是由于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地破坏了劳动人民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状态，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劳动人民暴动的结果。奴隶暴动打垮了奴隶占有制社会，农民暴动打垮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是依靠农民暴动的力量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否能够胜利以及胜利彻底与否，决定于是否有农民暴动的配合以及农民暴动的深入广泛程度。没有广大农民从下而上的起义行动，是中国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工人阶级领导了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就获得了彻底的胜利。革命运

动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突破腐朽生产关系的运动，而劳动人民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所以革命运动在实质上就是劳动人民自己亲手打破那束缚自己发展的腐朽生产关系的斗争行动。

在过去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虽然归根到底是创造历史的惟一的推动力，但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以及种种社会的原因（小生产的停滞性局限性，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劳动人民的分散、无文化状态，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等），劳动人民在一般的情形下很少以积极的姿态把自己的创造历史的作用直接表现出来，在表面的历史舞台上积极活动的是少数帝王将相一流的人物。在那种时代，尽管政治上像走马灯似的有许多人物的频繁的活动，社会的进步终归是非常缓慢的（除了劳动人民起来暴动的时候有比较多的变化之外）。列宁说："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极少几个贵族和小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工农群众则尚在沉寐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0页）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非常迅速，和过去的时代完全不能比拟，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现代是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在这个革命运动里，各国劳动人民以工人阶级为首，积极地、自觉地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发挥了它的战胜一切的力量，任何坚强的腐朽势力遇到这个力量都要迅速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个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前，由于资产阶级不能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来进行斗争，几十年间都没有使革命运动得到真正的，即使是部分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不过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就获得了全国性的彻底胜利，并且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首先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政

权，然后由工人阶级应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领导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来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地自觉地行动起来，那是一步也不能实现的。几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能够比较顺利地迅速地得到实现，这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它一贯奉行的群众路线，就是由于它善于发动、组织和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共产党坚决地反对有些革命工作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这种人往往把自己看做创造时势的英雄，以为工作的成绩就是自己个人的功劳，遇事独断独行，忽视周围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有这样的观点的人，如不改造思想，在工作中总是一定要碰钉子的。

现在，还需要就人民这个概念的意义做一些说明。

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发展变更的。首先应该注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构成人民群众主体的生产者群众也不同（如奴隶、农民、工人阶级等），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奴隶和农民的暴动曾摧毁了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并没有成为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新社会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结果，是由一种新的剥削制度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出现的工人阶级，才不但领导农民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进一步建设了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次，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剥削阶级也有站在进步运动方面来反对反动势力的。如资产阶级就参加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并且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经还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就可以算为

历史进步运动中的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任何时候，剥削阶级都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力。资产阶级在他们革命的时期只是依靠了和利用了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力量才走到统治地位上，当他们一得到了统治地位，就反过来压迫工人和农民，从而转变成与人民敌对的势力了。剥削者只能在一定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暂时走进人民的行列中，只有生产者群众永远是人民的主体。第三，在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界，即全体公民，他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共同一致地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而斗争。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进步的知识界，即为劳动群众和革命阶级服务和反对腐朽势力的知识界，才能算入创造历史的人民的行列。为反动派服务的知识界是反人民的。知识界担任着脑力劳动的任务，在科学、文化艺术方面进行了创造的活动，因而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于人民有所贡献。然而，进步的科学、文艺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创造的泉源，归根到底仍是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人民在自己的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积累了对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经验，获得了初步的、零散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创造了初级的艺术作品和其他文化财富。而知识界在科学、艺术和文化方面的创造，归根到底不外是劳动人民所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些初步的自然和社会知识以及文化艺术财富的总结、加工和提高的结果。自然科学归根到底是生产——广大人民与自然界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文艺以及其他进步文化领域在最后的根源上来说也不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成果。自然科学家、文艺家，以及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界中的人物，在知识和文化的创造上不是没有作用的，甚至于还可以说是有很重大的作用，但他们不能凭空地把知识和文化创造出来，他们必须依据劳动人民

早已创造出来的素材，然后对这些素材进行专门的加工，才能够创造出系统的科学知识、高级的艺术作品和其他文化财富。在没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以前，从事农业的劳动人民为了量地的需要，已经创造了许多零碎的几何知识，欧几里德把这些分散零碎的知识加以加工整理，才使它提高为一门有系统的数学科学。文艺的发展史证明，每一种新的划时代文艺创作的出现，不但内容是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而且形式也是人民生活中已创造出来的文艺形式加工整理的结果。所以，只有善于从广大人民生活中吸收创造的泉源，善于综合（直接地或间接地）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知识界，才能够在科学文化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只有善于从劳动人民群众中去寻找创造的泉源，才能在科学文化方面进行最有价值的创造的活动。新中国文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发掘了各地民间文艺潜力，使人民文艺运动出现不断蓬勃高涨的趋势，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生活，与人民所创造的初级的知识和文化泉源完全隔绝的知识界的人，要想在科学上、文化上有真正很高价值的创造，一般地说来，特别是就现在说来，总是不可能的。

2.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民群众是惟一的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并不因此就否认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相反地，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不但不应该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而且应该重视他们的作用，肯定他们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加速和延缓有着一定重大的影响。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主义的“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是有根本区别的。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不等于把他们的个人活动当做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终归是人民。历

史发展的根本方向、趋向，即所谓“时势”，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决定的，任何杰出人物的作用不能根本改变这个方向，即不能根本改变人民已造成的“时势”。杰出人物的作用，只在于能够对人民所创造的时势的发展进程给予一定的有力的影响。杰出人物的作用，决不是在人民群众之外的另外一种创造历史的个人作用，他们只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总过程中间作为一个有力的因素而起作用。一定历史时代所需要的杰出人物的存在，能够对于历史的前进运动给予有力的推动作用，加速它的发展过程，使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反之如果缺乏这样的人物，人民群众的力量的发挥就要受到较多阻碍，历史的进程就要或多或少地延缓下来。所以，一个杰出人物的生存和死亡，对于历史的发展的根本趋势虽然没有决定的作用，但也决不是无关重要的。南宋时中国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金人的侵略，决定了金人终归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岳飞的存在使这反抗力量得到很大的发挥，他的死亡使这反抗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

杰出人物的作用，相当于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有很大的作用，但不是最后决定的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东西是社会存在本身，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只能给予一定的影响，而这影响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又决定于社会意识如何反映社会存在。能够正确反映社会存在的发展要求（或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前进运动就能发挥积极的有力的推动作用，否则，社会意识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存在的前进发展的要求，而是反映了腐朽势力的立场，它对于社会存在就不能发生积极的推动前进的作用，而只能给予阻碍的作用。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决不是偶然出现的，纯粹由自由意志所产生的思想和行动，而是反映着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社

会存在的。杰出人物的作用，就决定于他们的思想行动反映社会存在的能力或认识“时势”的能力。我们说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指那在思想上最能够认识他们所处时代的周围事变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以自己的行动，努力通过宣传的和组织的活动联合起一定的社会力量来推动事变发展的人们。中国的老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这样的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前进运动，就能给予有力的积极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杰出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能越出这个原理之外。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他的时代的一定的阶级的儿子。他的思想行动并不是纯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时势”，而是从他的阶级立场上来反映那时势的。杰出人物之为杰出人物，并不是说他有超于社会之上和超于阶级之上的天生的特殊能力，而只是由于他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集中地表现了他所代表的阶级的观点和要求。因此，他的反映社会存在的能力，他的认识“时势”的深度、广度以至于正确程度，都受到他的阶级立场的限制。他反映他所代表阶级的积极方面，也会反映后者的消极方面，甚至于也会反映后者所受到的其他阶级的影响。例如农民战争中的英雄（如《水浒传》中的英雄，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领袖，太平天国的领袖等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集中反映了过去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强烈的革命要求，也反映了农民的小生产的局限性和散漫性，有时也还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给予农民的某些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作用，也就决定于这种反映的情况。农民战争的英雄能率领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受到严重的打击，但任何杰出的农民领袖也不能把农民组织成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他们的斗争

不是失败了，而是终于得到了胜利，那么结局也只有两个：或者是胜利的果实为其他的阶级所取得，或者是虽然由他们自己来组织政权，而这个政权迟早又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没有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封建时代，农民暴动的结局都不外是这样的情形。任何杰出的农民战争领袖对于历史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能超出农民阶级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

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并从而受到一定阶级的限制。每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都只能是从这个时代的劳动人民中或这个时代其他的还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中产生的，并且作为两者的阶级代表而出现的。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多少正确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活动趋向，才能反映人民所造成的“时势”的发展趋向，从而也才能够对时势的发展给予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任何时代的杰出人物都是和一定的阶级势力相联系，从他的阶级的斗争中生长、锻炼出来。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由于劳动人民或一定的阶级势力的需要。杰出人物之所以为自己的阶级所需要，是由于他们是自己阶级中间最有斗争锻炼最富有经验的人物，是由于他们的丰富经验使他们最能够集中本阶级的思想和要求，他们比自己的阶级中其他的人都看得更远一些，在斗争中更坚决更勇敢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阶级指出行动的方针、办法，使整个阶级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来对敌对势力的堡垒进行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每一个阶级都需要自己的有能力的领袖。当一个进步阶级中间锻炼出来自己的杰出的领袖来，就要受到本阶级和进步群众的热烈的爱戴。

杰出人物既然是一定阶级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

因此，只要这个阶级是进步的或具有着某些积极性的，只要它由于斗争而需要产生自己的领袖，那么这种杰出的领袖一定能产生出来，一定能够从本阶级千万人的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说明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是人民的需要创造自己的英雄。人民需要各种各样的英雄，人民有了某种需要，适应于这种需要的英雄一定会产生出来，如果曾经产生出来的一个杰出人物已经失去了，一定会再出现第二个人来代替他。这个历史必然性和个人出现的偶然性是结合的。某一个人恰恰成为这时代的杰出人物，是有偶然性的，这样的人为历史所需要而且一定要出现，是必然的。恩格斯说：“一个这样的伟人，恰恰就是他在这一定的时间和所与的国土里出现，这事自然是纯粹的偶然。但假如我们撇开了他，那就需要有代替的人，而这代替的人就会被找到，不管是否顺利，他迟早总会被找到。拿破仑，恰恰是这个科西加人，他成了军事的独裁者，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法兰西共和国需要着他，这是偶然；但如果缺少了一个拿破仑时，一定会有人来顶替他的角色，那也是可以证明的，即只要有需要的话，这样的人就随时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5—106 页）

一般地说，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的积极作用，决定于两个主要条件，第一，决定这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反映时势，反映人民的要求，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正确程度。这反映的正确程度，是有阶级限制的，只有代表进步的或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阶级势力的人物，只有当他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能够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能够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才能够对历史的前进运动起推动的作用。否则，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一旦违反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如果他们由进步的阶级

立场上转到反动的阶级立场上，那么，他们也就会由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变为反对历史进步的人物，那时，他们最多只能暂时对于历史的前进运动发生若干阻碍作用，但终于还是要一败涂地。第二，杰出人物的作用还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行动在人民群众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和他从人民中所得到的支持的多少程度。人民群众究竟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任何杰出人物的作用，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表现出来。杰出人物决不能依靠个人单枪匹马创造历史，而一定要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才能有所成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作后盾，任何个人都会一事无成。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曾出过许多杰出人物，他们受到阶级立场的限制（如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中的人物），不能成为人民的领袖，甚至于还要采取反对人民的行动，因此他们虽然能够对于历史的进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这影响也还是要通过劳动人民的力量才能表现出来），但那影响是很有限的，同时他们的阶级立场的某些消极方面，对于历史的进步又起了阻碍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但为着巩固自己阶级的统治，对于战国时代文化上“百家争鸣”的盛况开始采取压制的措施，这又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作用。过去也有些人物，虽然是劳动群众的领袖（如奴隶暴动和农民暴动的领袖），但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他们所领导的劳动群众本身历史的发展不足的限制，他们对于历史的进步虽然有相当的推动作用，——如打垮奴隶制度，打击封建制度，甚至于在过去来说可算是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究竟还是很有限的。只有近代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他们站在最革命的阶级立场，创立与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经常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从来的任何杰出人物都远不能比

拟的伟大作用，领导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开辟了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

在反动阶级中间，是不可能产生出对于历史发展起积极作用的真正杰出人物的。反动阶级也需要自己的领袖，他们中间也会锻炼出为他们所需要的某种富有反动的经验和决心的人物来指挥他们的共同行为。这些人，如像墨索里尼、希特勒之流，往往具有高度的骗子流氓的个人才能，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但不能够反映，而且完全违背着历史发展规律，违背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违背着广大人民的要求和趋向，一句话，他们是在根本上不认识时势的。因此，他们虽然可以利用反动阶级所据有的各种有利条件——统治地位，物质财富，统治者所垄断的种种文化、宣传教育工具所发挥的欺骗作用等等——来反抗人民的前进运动，来暂时巩固反动派的统治地位，使历史发展进程多少延缓下来，因此这些人物暂时也可能在表面上显得好像是“一世之雄”的样子。但这种局面决不能撑持得很久，这类人物的“英雄”面貌很快就会被人民的力量所戳破，他们迟早要一败涂地，变为一个最可耻的小丑。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所以，反动阶级中间决不可能出现真正杰出的历史人物，即使是曾经站在进步立场上表现了某些特出才能的人，一旦走向反动阶级方面，也会变为庸碌无能的。

杰出人物对于历史过程的作用的基本原理，适用于各种工作中的干部——包括文化和文艺工作干部。一个工作干部，如果把自己看做创造时势的英雄，以一种“非我莫属”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所担任的工作，认为离了自己个人，工作就要垮台，这是完全错误的。有经验的优秀干部是革命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不是先有优秀的干部才有工作，而是先有工作，在工作斗争中逐渐创造出

优秀干部。少了一个优秀干部，工作和斗争中仍然会涌出另外一个新的优秀干部来补充他的位置。所以，世界上决没有那种为某一种工作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惟一的优秀干部。但是，这并不是说，干部的选拔，对于工作没有重要意义；并不是说，随便什么干部，对于工作所能发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工作干部的成熟程度是有差别的，富有经验的优秀干部比缺乏经验的干部在工作中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对于工作任务的完成更为有利。所以，为了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是非常地需要优秀干部的。正如一个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变过程能起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一样，一个工作部门的优秀干部的存在，对于这部门的工作任务的胜利完成，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苏联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曾经先后提出过两个口号，在"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实现之后，接着就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为着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任务，首先需要进行工业中的技术改进，在技术改进已准备到相当的程度，掌握技术的干部的存在与否，对于技术力量的发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文艺工作的任务必须有优秀的文艺工作干部，才能完成得很好，这是大家都了解的。

要成为一个在革命工作中能够起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干部，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主要地（不是全部）需要具备以下的条件：第一，正如真正杰出的人物只能是从进步的阶级势力和劳动人民中间产生出来一样，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革命工作干部，必须严格地注意自己的思想修养，经常在思想上行动上站稳革命阶级的立场，站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反对一切落后的以至于反动的思想的影响。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代表革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才不会在工作中发生动摇，才

能够坚决贯彻革命工作所提出的方针、任务；例如文艺工作干部如果不注意思想意识的锻炼，如果不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如果相反地在自己的身上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滋长起来，如果他失去了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热情，在生活上和工作上陷入到追逐个人名利，甚至于腐化堕落的境地，那他也就会失去了饱满的创作精力，就会在文艺工作上失去积极推动前进的能力。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第二，正如一个杰出的人物必须认识时势，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趋向一样，要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工作干部，必须力求精通工作，也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工作发展的规律，认识与工作有关的各方面实际事物的变化情况和规律。作为一个干部，对于工作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愈更正确和清楚，他在工作中就愈更能够发挥主动作用，愈更能够胜任愉快地担当工作任务并使它顺利地实现。但是为着要能够精通工作，认识工作的发展规律和与工作有关的各方面实际事物的变化情况和规律，就必须注意第三个条件，那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去取得认识和力量的泉源。要认识工作的规律和有关的周围事物的情况，个人的学习研究努力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依靠个人的学习研究是非常不够的。个人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总难免带有片面性，只有集中多数群众的各方面的知识经验，才能够对于工作和事物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同时，要圆满实现一个工作任务，必须发动有关的群众并依靠他们的积极性来进行。就整个社会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一个工作部门来说，与这一工作有关的各方面的群众是实现工作任务的主力，只靠少数干部的努力，要希望能真正实现某一项重大的工作任务，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依据多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指出一个革命工作干部要能够领导群众去很好地完成任务，必须在工作中善于联系群众，或善于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一方面要善于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情况，倾听群众对于工作的意见，把群众的分散的意见和经验加以整理集中，使之变为有系统的领导方针，然后把这种从群众中总结出来的领导方针再向群众宣传，使之成为群众自己的行动方针，这样就能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把工作任务彻底完成。正如杰出人物只是作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有力推动因素而起作用一样，一种工作任务的完成是要通过有关的群众的手来完成的，干部的作用只在于对群众的创造行动给予正确的指导而已，而要能掌握正确的指导以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量，就必须在领导工作中采取上述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或“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方法。

3. 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袖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作用，由于出现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而开辟了完全新的局面。过去劳动人民每日每时为社会创造物质的和文化的财富，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并由此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改变，在社会腐朽势力阻碍着新社会的诞生的时候，劳动人民起来斗争，为新社会的产生扫清道路。但是，过去的劳动人民——奴隶和农民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的限制，由于他们的分散和文化落后的状态，始终没有能够成为新社会的自觉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斗争，在他们的劳动的

基础上，来建立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他们只能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起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自从世界上有了大工业的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以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就有了根本的改变。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大工业条件，在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为着实现这个任务，工人阶级就要领导全体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来和旧社会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如果说，过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采取不自觉的，多少消极的姿态来进行的，他们在社会革命时期的积极的斗争行动也被其他的阶级所领导或利用，而斗争的胜利果实就落到剥削阶级的手里，自己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得到真正的解放，那么，在现代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劳动人民就以日益自觉的充分积极的姿态进入创造历史的舞台。他们的斗争不仅仅是为着给新社会扫清道路和粉碎旧社会反动腐朽势力的阻碍，而且要追随着工人阶级积极起来建立消灭剥削、贫困以至于消灭一切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使他们脱离剥削阶级的影响，不让他们的劳动和斗争的果实再被剥削者所利用，不让剥削者再有机会能在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残酷统治，并借此来巩固剥削制度。相反地，工人阶级在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之下推翻了剥削阶级的政权之后，就要接着建立自己的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彻底实现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以至于消灭一切阶级的任务，也就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所以，工人阶级的出现，使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使他们的这种作用由不自觉的行动变为自觉地彻底解放自己的斗争。一切社会的腐朽势力都不能不害怕劳动人民的这种自觉的行动，不能不用一切方法阻碍这种自觉行

动的开展。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反动统治者就是这样的，而在人民已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获得胜利的国家，如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被打倒了的反动残余势力也仍然企图干这类的阴谋活动。

工人阶级的这种创造历史的新任务，是空前地艰巨，空前地复杂，而又是空前地远大。只要回想一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很容易明白，由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始到获得全国的胜利，在二十八年中间，是经过了多少困难、复杂、曲折的惊天动地的斗争，而在斗争获得全国胜利时，对于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任务来说，还只能算是万里长征开始走出了第一步。自工人阶级掌握了中国的国家领导权以来，又经过了七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又经过了多么激烈的变化，克服了多少困难，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又获得了多么惊人的进步！然而，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来说，我们还只是在进行着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我们今天的成就虽然很大，但离开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还差得很远！工人阶级就是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完成这样空前地艰巨、空前地复杂和空前地远大的创造历史的任务的，而工人阶级对于这样的任务的实现，是具有着充分的决心和信心的。

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事业既然是空前地艰巨、复杂和远大，为了完成这样的事业，工人阶级就需要有自己的杰出的领导人物，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工人阶级需要能够在思想上行动上正确反映工人阶级的这些历史任务并且能够指导他们和一切人民共同来彻底实现这些任务的领袖人物。这样的人物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锻炼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中的伟大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创造历史的作用和过去劳

动群众有根本的不同，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和过去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和劳动群众的领袖也有根本的不同。过去的杰出人物只是具有比普通人民多少更正确地观察和认识当前的“时势”发展的趋向的能力，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能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只能在一个时期和在某些重大事件上能推动历史前进，他们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情况对于杰出人物的要求也是很有限制的。有些人物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者，他们和劳动群众是脱离的，他们常常走到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反动方面，这对于他们的历史上的前进作用给予了更大的限制。工人阶级的领袖在指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候不是仅仅依靠对于一般“时势”的大体上正确的观察和估计，而是依据系统的关于社会发展和生产发展的规律的科学知识。马克思和列宁就是这一个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创造者和发展者的最大代表，只有掌握了这种系统的社会科学，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才能指导工人阶级实现他们创造历史的任务，因为这样的任务不是仅仅要在一个时期和在某些重大事件上推动历史前进，而是要在极长远的时期不断地实现无数地重大任务。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的科学知识，就不能正确地全面地反映这样远大的历史任务，就不能指导人民实现这样的任务。所以，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必须同时是最坚强最勇敢的革命者和具有深刻的观察力和细密的分析能力的科学家。比起过去历史时代的任何杰出人物来，他们不仅具有更大得无可比拟的作用，而且他们的作用的性质，也是有根本的不同的。

过去的杰出人物常常自命为“先知先觉”，把自己放在人民群众的头上，甚至于脱离群众。工人阶级的领袖却不同，工人阶级

的领袖和人民群众必须自觉地、经常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惟一决定力量，充分知道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他们就能细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到群众中去学习各方面的斗争经验。他们又知道，群众的意见、要求和经验，是分散的，不集中的，必须应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分析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把它们改造成为系统的指导行动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才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斗争。工人阶级的领袖的任务，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把群众的这些意见、要求和经验等正确地集中起来，反过来又拿去指导群众，他们是群众的指导者，同时又是群众的学生，他们最善于向群众学习，因此才最善于教导群众，使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断地提高起来。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果在任何时候忘记了上述的原则（如像斯大林在他领导苏联的后半时期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那么他们也会要犯错误，会使工人阶级事业的进步遭到很大的阻碍和损失。

如果说过去的杰出人物一般地都是以个人领袖的姿态活动的，那么，工人阶级的领袖始终是作为集体的成员活动的。工人阶级首先是在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进行斗争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也是工人阶级的集体的领袖。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中的最有觉悟的人们，它把最有威信，在群众中最有影响，最有斗争经验的人，选拔出来组织领导的核心，来主持党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马克思、列宁就是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最伟大最杰出的领袖人物。工人阶级领袖在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集体领导的方法，反对个人独断。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这样的远大、复杂

和困难，要仅仅依靠少数的个人来对这个事业的各方面情况加以正确的反映和指导，是不可能的。任何少数个人，哪怕是最杰出的人，如果只靠个人的力量来指导这样的事业，也难免要犯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毛病。只有通过集体，通过整个工人阶级的党，才能保证使领导工作联系各方面的广大群众，才能够全面地反映无限复杂的工作和斗争情况，才能掌握各方面工作和斗争发展趋向和规律性，并给予正确的指导。

工人阶级非常需要自己的杰出的领袖人物，衷心地热烈地拥戴自己杰出的领袖人物。因为这样的人物通过党的集体能够充分了解他们的要求和趋向，对他们的工作和斗争给予有力的指导，把他们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尽量地发挥出来，使他们的工作和斗争得到胜利，使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用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没有这样的杰出的领袖，他们在工作和斗争中所遇到的困难就要大得多，并且往往要遭受很多可以避免的损失。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杰出领袖人物的热爱和拥戴是完全应该的。热爱和拥戴自己的领袖人物，不同于个人英雄崇拜。个人英雄崇拜是用迷信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杰出人物的作用，把这样的个人看做是在人民群众之上的天生的惟一创造历史的力量，把人民事业的命运看做是完全地决定于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个人英雄崇拜的观点把某一个人的思想看做是天生地正确的，好像他不需要倾听群众和集体的意见，好像他的头脑是天生地能够完全代替一切别人的思想，好像群众和集体对于他只应该一切惟命是听，而不应该对他提供任何自己的意见。个人英雄崇拜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统治下和小生产基础上所产生的腐朽思想的残余，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观点完全是对立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加以克服，那就会使领导脱离群众，不论对群众和对

领导来说，都会发生极其有害的作用。对群众来说，这种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会使得群众中间失去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会滋长起等待杰出人物来解放自己的消极观点。就领导集体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会产生个人独断的作用，会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使领导思想发生片面性和主观性的毛病，破坏正确的领导。所以，对于负担着最伟大的改造世界任务的工人阶级来说，这种思想是有着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为着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凡是有这种思想影响的地方，必须坚决地起来克服它。

（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生产发展的规律性*

(1956.9)

生产发展的规律性准备讲三次。这个提纲比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提纲要短一些，原因是，有关社会发展历史过程这一部分，没有写进去，就是凭口来讲。

一、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则

为什么要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讲起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里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领域里面的结果。所以，讲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注意到唯物主义的原则，首先不要忘记我们是用唯物主义原则来解释历史的。

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里面来，首先就要

---

* 这个讲课速记稿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稿，中央党校曾铅印给学工人员学习参考，但没有标明时间，也没有注明是给哪个班讲的，只注明艾思奇本人未曾审阅。根据讲课内容所提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不久，大约在同年九月。我们这次整理，是在中央党校铅印稿的基础上，略为做了一点文字加工，改正了个别文字上明显错误之处。

肯定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的社会精神生活。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讲到这一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一段引用了马克思这句话。所以，讲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讲起，这就需要先把社会存在弄清楚。

什么叫社会存在呢？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有的著作来看，始终坚持的一点：社会存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生产，或者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一个东西。同样，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也是一个东西。能不能说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除了生产、生产方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呢？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来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生产，不是生产之外的东西。作为社会存在，能够决定社会意识的这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生产，就是生产方式。

对地理条件、人口条件我们怎样看法呢？

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人类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自然条件，或者叫做自然的物质条件。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最低限度的人口，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一个国家需要有一定的地理环境，一个社会不能够建立在大海上，也不能够建立在沙漠上，经常需要一定的、适合的地理条件。所以，地理条件、人口条件是人类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一种自然条件。

能不能把这两个条件就叫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研究。这种说法比较不够缜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是这样提的，地理、人口条件也是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种提法值得考虑。首先是我自己认为这样一种提法科学性不够缜密。如果

说地理、人口是物质条件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是决定社会意识的，是社会自己本身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就有值得考虑的地方。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讲到社会存在时，就是指生产，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找不出充分的根据来说明地理、人口也是一种决定社会意识的生活条件。所以在我的提纲里说："人们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存在就是生产、生产方式。生产、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是社会生活经常需要的自然条件，但不是对于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把地理、人口条件跟生产、生产方式加以区别。

这样加以区别有好处，就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内因是最后的决定原因这个原则。我们说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社会精神面貌的，是讲社会自己本身内部的原因决定一切，而这个内部原因只能够是生产。只有社会内部的物质条件能够作为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性质最根本的原因。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对社会来说是外部条件，是外部的自然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地理、人口条件也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地理、人口条件也对社会起决定作用呢？有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的看法，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这样看。马克思认为决定社会意识的东西只能够是生产，只能够是生产方式，不能够是地理条件、人口条件。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对人类社会生活有影响，因为它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有的时候有很重大的影响，但是不能够成为社会意识以及社会性质、社会面貌的决定条件。这一点斯大林的著作里也讲过的。我不是说斯大林的著作有原则性的错误。不过，把地理、人口条件也叫

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概念方面有不够缜密的地方。概念上有点马虎，有时也会在理论上引起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在报上看到有的文章认为，过去的历史学、社会学也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过去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也可能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报上有冯友兰、朱伯昆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原则表示要考虑。这种精神是好的。不过，不管是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他们都在许多地方反复地讲过：过去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总是唯心主义的，总是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方面。这样一种讲法是不是偶然的呢？也不会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全盘研究后得到的结论。现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提出来一个怀疑，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过去的历史学上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个问题了呢？是不是过去的历史学上都是唯心主义呢？他们说：也许在外国历史上是这样，但是就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来看，就不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学家就可能有唯物主义观点。也许中国是特殊的。那么，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学家有两派：一派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派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肯定的答复，他们认为过去历史上有人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理由在什么地方呢？

从他们的文章里来看，理由就是过去曾经有过一些研究历史的人主张决定社会发展，决定社会性质，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的东西是地理条件。比如，管子讲过地理条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条件。他们认为像这样一种了解历史的方法是跟唯心主义了解的方法相对立的。唯心主义把一切了解为天命的结果。这种地理论者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跟唯心主义相反，是用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种意见对不对呢?

我想如果把地理和人口也叫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主张地理条件、人口条件能够决定社会的这些人就算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所以，如果我们说这种说法是对的话，那就要有附带条件，必须先在理论上肯定地理条件、人口条件也是社会本身的一种物质条件。可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够作这样理论上的肯定。因为地理条件是社会外部条件，不是社会自己本身的社会物质条件。因此，根据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去说明社会性质的变化这种观点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观点并没有摸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这种观点仍然是把社会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把社会当做自然来解释，不是抓住社会自己本身的原因来解释社会，没有注意到社会本身的特点，没有抓住社会的特殊性，而用一般自然的特点来解释社会。这种观点就是和生物社会学观点没有什么区别，认为社会和生物一般的特点是一样的，最多有一些具体的不同。

所以，用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来说明社会的这种观点，最多可以说这是历史家坚持了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就是在自然观方面他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因此，他解释社会时也解释成一种自然，用自然物质条件来解释社会。所以，严格说来，这种观点是对自然界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讲的那些原则还是对的，就是过去的历史家从来没有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中去，没有根据社会自己本身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社会，因为他没有找到这个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我们讲过用地理和人口来说明社会生活的这种观点最多是坚

持了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观点，没有摸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门。我们为什么说是最多呢？因为有的时候唯心主义者讲历史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承认地理条件的作用。但是用地理条件来说明社会生活这种观点还是要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的。冯友兰先生的文章里面讲到：管子认为地理条件决定社会。怎么样决定社会呢？他的理由是这样：地理条件规定人的性格，人生在某一种地理环境里就有某一种性格，而这个性格又决定社会发展的性质。我们看一下这个理论主要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种理论实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按照这种理论来讲，人的性格规定社会性质。人的性格是由地理条件决定，可是社会本身的情况是由人的性格决定的。所以，这种观点还是认为意识决定存在，是把人的意识叫做性格，不同的性格规定了不同的社会。

实际上，这种观点不仅是中国有，在西洋也有，我们看到康士坦丁诺夫的教科书里就有这种例子。有一种理论叫做气候论，就是说北方冷、南方暖，因为气候不同，民族性格就有不同，因此社会情况就有所不同。有一种帝国主义学说认为南方热，物产丰富，因此这个地区人的性格就很懒散，这个地方的人都不进步，是生下来应该被统治的民族。这个理论恰恰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多半在热带。所以说，这种理论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由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唯物主义观点，因为他用自然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可是他不知道社会自己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这种观点是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

至于人口问题也是这样，也是形式上好像是唯物主义的，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马尔萨斯首先主张人口论，认为人口情况决定社会情况。他认为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粮食是按照算数级数来增长，今年一倍，明年两倍，后年是三倍，可是人口是

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就是按照一、二、四、八、十六这样的比例增长的。他伪造了一个数字就得出结论说：人口总是增长得太快，粮食增长得太慢，这样社会上就经常发生人口过剩的问题。由于人口过剩，人和人就不能不竞争，强者就必须侵略弱者。这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刚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产生的理论，它完全适合于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需要。一直到现在，帝国主义还把这种理论当做他们进行侵略的武器。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张争取生存的空间，他们说：他们的人口太多了，要在世界上争取生存的空间，这也是人口论的一种。这种观点形式上好像是用自然条件来说明社会，实际上是用人类之间生存竞争的欲望来决定社会发展的情况。由于人口过多，生存竞争的欲望就成为决定力量，就使得社会发生种种的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都是用这种理论作根据。

在 1947 年底、1948 年初，蒋介石政府快垮台的时候，美国来了一个农业考察团，到中国后被蒋介石招待了一番，回去之后按照人口论的公式做了一个结论：说中国人口太多，粮食不够，这是中国社会的情况。他们说，粮食问题是中国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怎么办呢？他们提出可以有三种办法来解决：一个办法就是节制生育。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中国老百姓太落后，不能接受这个意见。第二个办法就是大批地由美国供给粮食。怎么样供给呢？当然是要钱，中国一定要和美国做买卖。第三个办法就是内战应该继续下去，就是人工地减少人口的办法，也就是要向美国购买军火、粮食。这就是人口论对帝国主义的好处。帝国主义为什么需要人口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不管地理条件或是人口论，如果把它当做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那就错了。我们说，这些观点就是用物质条件来说明社

会，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那样看的话，马尔萨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美国的农业代表团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还有什么气候论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这么说，历史唯物主义者就太多了。

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历史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因为费尔巴哈把自然条件也当做一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是，按照上面那种观点来看，费尔巴哈的历史观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这样来看，那么恩格斯就错了。我们可以找一些费尔巴哈的书来看一下。我们翻译的有《宗教的本质》这本书，这上面讲到宗教的产生是由于自然，人类宗教崇拜的对象主要是自然。他举了很多例子，他说，最古的宗教就是崇拜自然界，有的崇拜太阳，有的崇拜火，有的崇拜某一种动物，或者某一种矿物。有一个地方的宗教崇拜盐。这些宗教所以产生，就是人感到需要依赖自然，因此就把某一种自然的东西当做自己崇拜的对象。所以说，宗教是起源于自然。这个也可以算做是地理条件论。

可是，为什么恩格斯不说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点有唯物主义因素呢？相反的，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里，根本没有提到费尔巴哈讲到自然的问题，因为费尔巴哈的观点主要不是这一点。费尔巴哈解释宗教最主要的观点是：人有一种依赖感，因为人弱小，要依赖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关系，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了这种感情就产生了宗教，这些才是他主要的观点。所以说，他是一种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人的感情决定宗教的性质，宗教和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感情决定的。至于自然是一种外部条件，首先是由于人有一种依赖感。如果把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人口条件都叫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都叫做决定社会的条件，那么很多我们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人都成为历史唯

物主义者了。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都应该翻案，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了。

所以，我想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应该把地理和人口条件叫做自然条件，不应该叫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应该叫做社会存在，因为它不是社会存在，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应该是有区别的，这样更科学些，这样更可以减少误解。

我们这样一种提法是初步研究的结果，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

在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本书里，开头就讲宗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他说："人的本质或上帝……真正说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在第二段里又说："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同上书，第2页)在这本书里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谈到宗教和自然的密切关系，关于自然讲了很多。

以上说明了我们对于那些认为用地理、人口条件来说明社会、历史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些观点形式上是用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但实际上，一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时，它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或者是用性格来说明社会发展的情况，或者用生存竞争的欲望来说明社会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归根结底是唯心主义的。

我们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的人，他们的思想中间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都没有。我们只是说，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那种系统的，能够跟历史唯心主义对立起来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路线。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总是一般在自然界方面跟唯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涉及到历史领域时，他们就不能拿出一套真正唯物主义的路线来跟唯心主义斗争。

所以，不是说他们没有唯物主义，没有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历史的企图，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这种企图，想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中去，但是这种企图没有成功。他们没有找到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这种企图没有实现。

可是个别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也不是没有的。过去的历史家、哲学家中间也是有的，没有是不可能的，是不合理的。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社会精神生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从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哲学笔记》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第三篇“关于概念论”中说，黑格尔也有一些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因素，比如有的地方他注意到工具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又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里讲到美国的富兰克林（美国第三任总统，是一个大科学家）发明电现象的本质，而且用试验证明成功了。他用一根传电的线放风筝，等到打雷闪电的时候，他就用手去碰线，结果就有电花出现，他就证明闪雷是有电的。我们今年就要纪念这个人。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句话第一次由他讲出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没有说人是说话的动物，他把人的特点归结为制造工具。这种人不能说他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是这句话里面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因素，他没有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懂得人会制造工具，所以他就片面地了解社会。过去的人对社会的认识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只能片断地认识社会，过去只能片断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这种人是有的。中国的地理论者管子认为地理决定人的性格，这种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有些观点是很庸俗的。还有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杰地灵。这就是地理论。这就是说，因为家乡的风水好，就出了英雄豪杰。安徽凤阳的风水好，结果出了一个朱皇帝，他把风水带到南京去了，凤

阳的风水就不好了。所以人们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所以，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片断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还是有的。再比如，孟子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唯心主义接近主观唯心主义，叫做“万物皆备于我”，我就代表万物。这句话是孟子第一个讲的。可是孟子讲到历史问题时，有时也有片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有时能够片断地看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意识。孟子说：一个人的职业很要紧，一个人的职业如果是制造弓箭的，他的思想就有一点毛病，他就惟恐不伤人，因为他就是要制造箭来伤人的，人被杀死的多，他的生意就好，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军火商人惟恐不打仗。可是制造盾牌的人就惟恐伤人。两个人的职业不同，思想就不同。还说：棺材店的老板惟恐人不死。这就是说，生活条件决定人的意识，这一点就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总的来讲他是唯心主义，但有的时候他片断地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

在历史上，有的时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会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批判各种哲学思想时要有分析。有的可能主要是唯心主义，但是有些唯物主义因素。有的也可能主要是唯物主义，但有唯心主义因素。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有唯心主义观点。所以，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也接触到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片断地认识到真理。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人类思想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所以产生是因为过去人类思想里已经有许多片断的真理，马克思把这些东西总结起来。所以，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突然产生的，以前的人根本没有接触到，这样说也是不对的。不管中国、外国，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有的，在 19 世纪 30 年代就有过阶级斗争的观点。

所以,我们否认过去的历史学上有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并不否认以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可以片断地认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些观点跟唯心主义观点有斗争。我想在报上对冯友兰先生提出的问题就应该这样来解决:不能够说过去历史学上有一个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但是,要承认过去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有过片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二)生产、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是什么呢?

生产是一种活动,一种人类社会的活动。这就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取得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一种活动。人类要维持社会生活就必须要有吃穿,必须要有种种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物质生活资料从哪里来的呢?从自然界来的。怎么样从自然界取得这些物质资料呢?就是要通过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就是人们从自然界取得自己维持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一种社会活动。

这样一种活动包含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发生关系,就是要克服自然,改造自然,要解决人和自然界的矛盾。自然界是不会把现成的生活资料提供给人类的。要从自然界找到物质生活资料就要改造自然,所以人和自然要有联系,不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就不能够生产。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才能够进行生产。一个人孤立地去进行生产是不可能的,要以整个社会为单位来进行生产,人和人要结合起来才能够生产。要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也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人和自然要建立生产的这种关系,那么人和人之间也要建立一定的关系。这

两方面的关系少一方面也不行。人和自然不发生关系，那样就没有什么生产了，可是人和人没有一定的关系，一个人去进行生产，这种生产也是不可能设想的。

那么，个体生产是不是个人生产呢？

个体生产是讲生产过程上可以采取个体的形式，并不是说整个生产是孤立的，个人和社会可以割裂开单独进行生产。这是说生产经营的方法可以是个人的，绝不是说人和人可以割裂开。所以，凡是生产都是以社会为单位进行生产的，而生产总是和自然发生一定的联系，这样，生产活动就包括两方面的关系。

辩证法告诉我们：活动就是一种联系，运动就是联系，运动就是在联系中的运动。生产运动有两方面的联系，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人和社会的联系，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缺一方面也不行。

因此，研究人的生产就一定要研究两方面：人和自然怎么样在生产过程里联系，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怎么样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就叫做生产方式。人和自然怎么样联系，采取什么方法联系，人和人之间又采取什么方法联系，这些具体的方法就叫做生产方式。

生产是讲一般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是讲人和自然界的联系以及人和人联系的具体方式，具体的、历史的方法。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发展不同阶段的标志。每一种生产方式是表明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研究生产，研究生产活动，也就是研究生产方式的变化。所以，生产和生产方式在斯大林的著作里是并提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要研究人的生产，就一定要研究它的具体的生产方式。

研究生产活动是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人和自然在生产过程

里是怎么联系的，人和人的相互联系又是怎么样的，就是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所以，研究生产也就是研究生产方式，这是没有区别的。

首先，我们要研究生产力的问题。

生产力就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自然界的联系，就是人和自然界矛盾的运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就是人和自然的联系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性质又决定于什么呢？主要决定于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人用什么工具来生产，用什么方法使用这种工具来进行生产，这是规定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人怎么样去解决他和自然的矛盾，首先决定于他用什么工具，其次决定于他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工具如果是进步的，他的生产力就高，进步的工具就规定了更高的生产力。同时，他使用工具的方法如果是进步的，生产力也能提高。

什么叫生产力呢？

生产力就是人从自然界中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也就是解决人和自然界矛盾的能力，也就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就决定于工具和人怎么样使用工具。所以，生产力的要素有两个，也就是说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能力，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的要素有两个：一个是工具，一个是善于掌握工具的人。

关于生产力的要素这个问题是有过争论的，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大多数人认为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也有人主张生产力的要素是三个，除了人和工具之外，应该还有劳动对象。一般来讲，劳动对象是自然的东西，但有一部分劳动对象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如，纺织厂的棉花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一般来讲，劳动对象是自然的。说它也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这种理论是不是对呢？不对的。虽然现在还有人坚持这种理论，但

它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把自然条件看做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部分。生产力是社会的生产力，规定这个东西的应该是社会自己内部的因素，不能说自然条件也起决定作用。所谓要素就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

这个理论所以不对还有另一个原因：劳动对象这个东西是生产力发生作用的对象，并不是生产力本身。把一个生产力应该发生作用的对象看做是生产力本身的一个要素，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部队战斗力的要素是什么呢？是武器、士兵和指挥员的品质。那么，能不能说我们战斗力的高低也决定于敌人呢？敌人是我们战斗力发生作用的对象，我们战斗力的高低是决定于我们的武器、士兵和指挥员的品质，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们的战斗力总是这样大。敌人对我们的战斗力的发挥有一定作用。比如，遇到很弱的敌人，我们的战斗力就不能够充分地发挥。如果遇到强的敌人，我们的战斗力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敌人这个对象对我们战斗力就是有这样一点作用，不能说我们战斗力的高低决定于敌人。是不是说，敌人强一点我们的战斗力就很低，敌人弱一点我们的战斗力就很高了呢？是不是遇到强的敌人就把我们吓跑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呢？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偶然的情况是会有的，但基本的战斗力不会决定于敌人。生产力的问题也是这样，劳动对象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对象。地理条件好不好，劳动对象好不好，对我们生产力的发挥可以有一定的影响。条件不好，我们生产力的发挥就受到限制，条件好，生产力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有了机器、工人，但是原料运不来总是窝工，这并不等于我们的生产力降低了，而是生产力浪费了，潜力没有办法发挥，但这并不等于劳动对象决定生产力。

所谓要素，是指经常起决定作用的条件。生产力的高低，它的性质，它发展的程度只能是决定于工具和人，不能决定于劳动对象。如果说生产力可以决定于对象，为什么旧中国不能发展生产力，新中国就能够发展生产力？地大物博，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在旧中国也有机器，也有劳动者，可是旧中国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它不能够跟机器和人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原因就是地理条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一定时期也有一点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影响。有了工具，有了劳动者，如果地理条件不好，生产力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力本身的水平，发展程度受地理条件的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否认生产力的要素是三种的说法，要肯定生产力的要素就是工具和人。这个人是一种具体的人，是善于使用工具的人。有了人，如果他根本不善于使用工具，也不能成为生产力的要素。人善于使用工具能力的大小，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肯定生产力有两个要素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在理论上应该这样肯定是正确的，在实际行动里肯定有两个要素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肯定了这个理论原则后，可以知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推动生产力发展时，我们应该抓住什么环节。要发展生产力，这里面就有许多环节，生产关系的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经营管理也是重要的环节。但是，单就生产力本身来说，要推动生产力发展需要抓住什么环节呢？就是要抓住改进工具的环节，还要提高掌握工具的人的能力，提高他的生产技能，要抓住这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环节。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抓住这些环节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利用劳动竞赛

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法。奴隶占有制社会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就是用鞭子鞭笞劳动者；在封建社会中也都是利用残酷压迫的办法去推动生产；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利用饥饿的办法。我们社会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依靠自觉的办法。列宁在《伟大的创举》这篇文章里说：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是靠棍棒纪律来维持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是靠饥饿纪律来维持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是依靠劳动者本身底自由自觉纪律来维持的。这就是说依靠劳动竞赛。劳动的自觉性是劳动竞赛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们要注意怎样使用劳动者的自觉性。过去我们企业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总结里面有一条，就是通过劳动竞赛进行增产节约的中心环节，就是改进工具，改进劳动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要抓这三个重要的环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发挥这两个要素的作用。改进工具，这是发挥工具的作用，改进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这就是发挥劳动者自己本身的作用，就是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的问题。

苏联工业化时有两个环节：1928 年时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就是改进技术装备，改进工具。到 1932 年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就是号召劳动者掌握技术。两个口号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工具问题，一个是劳动者的问题，这两个口号决定了工业化的整个过程。这两个口号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撇开决定一切这个问题来看，至少首先抓改进工具，然后又抓劳动者掌握技术这一点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必须看准生产力的两个要素的作用。

在实际工作里肯定这个原则，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去抓提高生产力的中心环节。当然也不能忘记其他问题，如果只是抓住这

两个问题，其他工作不管，那就不好。但是，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这两个环节来进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必须明确生产力要素的实际意义。

关于生产力要素的问题，附带有一点讲一下。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继续。所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使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做更深入的了解。本来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应经常注意这一点。注意到这一点就有好处，可以使我们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能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单依靠学习辩证法要求深入了解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运用才能深入地了解。以后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过程里，就能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了解得更深刻。

上面我们讲到生产力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中间的关系怎么样呢？

生产工具是规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力的性质的一个客观物质条件。掌握工具的劳动者是生产活动的主体，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生产工具既然是规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的一个客观条件，那么，我们只要看使用的是什么工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估计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所以说，对过去社会的研究，只要知道它使用什么工具，就可以大致对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其社会面貌，做出估计。

生产工具是能够规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限度的一种客观条件。在使用一种生产工具时，生产力可以低一点，也可以高一点，但是这个高低是会有一定的限制的，这是客观上规定了的。比如，

使用手工工具时，生产力无论怎么样提高，总是不可能超过使用机器时生产力可能达到的水平。用手工业机器纺纱、织布，很熟练的工人可以织很多，但是无论如何它赶不上机器生产。在农业生产上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现在基本上是手工劳动，不是机械化的农业。这样也能够提高生产力，但是要提高到使用机器那样，还是有困难的。

所谓生产力发展的高低，是指劳动者在一定单位时间内能够生产多少来算的。

生产工具大体上能规定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性质表现为许多特征。简单说来，有的生产力具有集体性，有的生产力具有个体性。像原始社会的生产是集体性的。封建社会的生产是个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生产是集体性的，也叫做社会公共性的生产过程。这些生产力性质的区别，大体上是由生产工具规定的。原始社会时使用最粗的石头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进行集体生产。封建社会中使用比较好的手工工具，这种工具就适合进行个体生产，而不适合大规模有组织地生产。使用手工工具可以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像农业、手工业合作化。但是，大规模的、有精密的劳动分工的生产是手工工具所不能适合的。在使用机器时，就不能没有组织地进行生产。所以，工具就规定了生产力不同的性质，也就规定了不同的发展水平。这就是说，生产工具能规定生产力的界限。

在使用一定的工具时生产力能够增加到多大的程度，就取决于主体，即取决于劳动者。善于掌握工具的劳动者可以使这一个工具所规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最大限度，可以把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如果不善于掌握工具，也可以使生产力降得很低。所以，技术是不是熟练在生产上有很大的作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经验

和技能对生产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要提高生产力，或者是改进工具，或者是劳动者善于掌握工具。劳动竞赛中出现的一些模范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创造工具或改进工具的模范，一种是提高劳动技能，创造生产经验的模范，再没有其他的生产模范了。像王崇伦、张明山改进工具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很多；郝建秀，她没有改进工具，但是她改进了操作方法，结果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那么，劳动者和工具究竟哪个重要呢？

我们说两个都重要，各有各的作用。工具是一个客观条件，它规定了生产力发展的一定范围，要想超出一定的范围必须改进工具。可是有了工具没有人掌握也不行。有了工具要使它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就要有人掌握。当然，比较起来，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是生产力活动的主体。但是，有了人还要有工具，没有工具，只是人也不能够生产。可是有了人就能够制造工具，人积极起来就能发挥工具的作用。

在合作化运动以前，有些干部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认为贫农不能够发展生产力，只有中农才能发展生产力。理由是只有中农才能掌握比较好的工具，贫农没有什么好工具。所以，组织起来如果是以贫农为主，不以中农为主，生产力就不能够提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农业社会主义高潮》里毛主席推荐了一篇材料，是21户贫农，没有什么工具，但是他们最后可以找到工具。这就是因为有人，所以人就是生产力最重要的要素。但是，生产工具也是很重要的要素，是一个最后决定生产力范围的客观条件，也不能够轻视它。

我们中国今天的农业生产不能实行机械化，这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现在没有这样多的拖拉机。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我们发展生产主要是设法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生产经验，也附带

地改进工具。组织起来后，就能很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单干的时候，个人有的经验不能够交换，组织起来集体劳动可以增加生产，可以交换经验，使生产力提高。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中指出:要使中国农业发生根本改变还需进一步实行技术改革。所以，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合作化是在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搞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合作化运动也能够提高生产力，能够使我们的生产潜力大大发挥起来，像我们12年农业发展纲要所指出的，可以使有些地方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到500到800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没有机械化以前也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

但是，没有机械化以前，还说不上我们社会面貌的根本改变。要想使中国社会面貌有进一步的改变，就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之后，就不仅是单位面积提高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提高的问题。现在单位面积为什么能提高呢？是加工，增加劳动日，一亩地从前用20个工，现在因为集体化了，就可以用30个工，这种生产力的提高是增加劳动日得来的。当然，同一个劳动日可以增加生产，但是，这种生产的增加有一定的限制。机械化后就不同了，它不是一个单位面积的问题，一个劳动者现在可以耕30亩，一个大机器可以耕300亩。所以，生产力性质要发生根本的改变，还是要改变工具。

但是，在工具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的情况下，要发挥劳动者的潜力，提高劳动技能，积累生产经验，充分发挥各方面生产经验的作用，也就是发挥生产力主体的积极作用。从生产力的提高中特别可以看出劳动者的重要性。

下面讲生产关系的问题。

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结合的方式，这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人和自然结合的方式决定于工具和劳动者这两个要

素。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生产关系是解决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生产力是解决在生产过程里人和自然的矛盾。

生产关系有种种历史的形式。生产关系的历史形式主要是决定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同，那么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就不同，人和人的矛盾关系也就不同，也就是生产方式有所不同。

生产关系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生产资料是归劳动者集体所有，还是归私人所有，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的形式。生产资料可以是劳动者集体所有，社会所有，也可以是个人所有。个人所有也有两种，一种是劳动者个人所有，一种是剥削阶级个人占有，或者是剥削阶级集团所有。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生产资料包括工具以及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条件。这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就规定了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方面：社会上各个集团相互之间的关系，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讲生产关系常常是指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关系。实际上，更根本的一方面是所有制的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就规定了生产过程里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人和人的相互关系。

这种在生产过程里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规定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一种是劳动成员之间同志互助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中间还有过渡的关系。这两大类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哲学上研究问题时，总是做一个最高的概括。概括的结果只有两大类：一个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一个是同志互助的关系。通常讲生产关系就是指这种

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相互关系。

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是阶级剥削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归剥削阶级个人或者剥削阶级集团所有，才产生的。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呢？

因为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它就利用生产资料作为一种剥削手段。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可是，劳动者要想进行生产，必须要跟生产资料结合。（生产方式就是劳动者跟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生产资料被剥削阶级掌握，劳动者怎么跟生产资料结合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劳动者要受剥削者的剥削。剥削者把这些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作为剥削的资本，剥削者要生活下去，就要使劳动者跟他的生产资料结合，就是采取剥削的方式来结合。

所以说，在生产过程里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讲经济上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此外，还有政治上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社会成员之间同志互助的关系，是在另外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下产生的，就是生产资料不是由剥削者所占有，而是由劳动者集体所有，或者是由社会所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人可以利用生产资料来剥削人，劳动者就不需要被迫跟剥削者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是跟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它的结合就不需要用剥削的方法，不需要通过剥削的方式来结合。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剥削的关系，就不会有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生产资料归大家所有，劳动者在生产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被强迫、受统治的必要了。这样在劳动者中间自然就会建立同志互助的关系。

在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情况下，劳动者之间可能建立一定的同志互助关系。在旧社会里，个体农民也可以做到这一

点。不过这种情况是有限的。因为虽然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但它是私有制，生产资料还是归个人所有，因此这里面可以产生剥削的因素。在这一范围内他不一定剥削人，可是生产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它变成富农就要剥削人，统治人。所以，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建立同志互助的关系。超过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也有变成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可能。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带有两重性，它本身是劳动者，但又可能成为剥削者，这是他们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不同，又由于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关系不同，因此，生产的分配的形式也就有所不同，这就是生产关系的第三个方面。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下，生产的分配是一种形式，在同志互助的关系下，生产的分配是另一种形式。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下，生产品分配的形式总的说来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形式，统治者用剥削的形式来分配生产品，劳动者是在被剥削的形式下来分配的。当然，这里剥削的形式不同，那么分配的情况也就不同。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用地租的形式掌握生产品，农民就是得到地租之外很少的一些剩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所得到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劳动者分配的形式是工资。不同的剥削制度下，有不同的分配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志互助关系的分配形式里是没有剥削形式的。但是，这种同志互助间的分配形式有各种各样的。在原始社会，大体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就不是平均主义的。所以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并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分配是按劳取酬的形式，共产主义是各取所需的形式，按劳取酬又有具体的形式，工人是得到工资，农民是取得一部分实物和一部分工资的形式。

生产关系就包括以上这三个方面。一般来讲，生产关系就是在生产过程里人和人的关系，或者是生产过程里社会集团的关系。更深刻地来讲，这种关系是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如果更详细地讲就是上面讲的三方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产关系里关于人和人相互关系这一部分，除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和社会成员间的同志互助关系外，还有一个两者之间的过渡关系。这种过渡关系是指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苏联哲学界有过讨论。最初一个时期有人主张这种过渡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过渡到阶级社会的关系，这就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农业公社。但是，在农业公社里已经开始使用奴隶，所以，已经开始向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过渡了。这是讲由同志互助的关系过渡到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是由无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有阶级的社会。另外一种是由有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在这里就有不同的意见。以前苏联教科书上说：过渡关系就是指由个体农业过渡到集体农业的关系，我们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就相当于这种过渡的关系，个体农民经过合作社变成集体农民，就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按照这种讲法来看，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过渡关系，特别是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但还有一点统治与服从的残余。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情况下，对抗性矛盾在消灭中，但是还有一点对抗的因素，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变成劳动人民，但他还有资本主义的一方面，是跟工人阶级对抗的。这不是说资产阶级本身又是对抗的，又是不对抗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在本质上是对抗的，但是在公私合营之后，资本家过的生活已经有一部分不是资产阶级的了。这种关系是一种过渡的关系。

我们认为这种了解是合理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是一种过

渡的关系，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的关系，这样了解是对的，我们肯定这种意见。不过，康士坦丁诺夫的新教科书也和旧教科书不同。旧书和我们的意见相同，新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就含混了。他说：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又有资本主义的，又有社会主义的。但是，过渡的生产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就没有讲清楚。因为对资本主义不能够叫做过渡，这种关系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消灭它。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过渡，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同志互助关系。所以，只能够说过渡时期经济里有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不能笼统地说：过渡时期的经济整个来说是过渡的生产关系。我们是这样的看法。苏联没有公开写文章进行争论，但是康士坦丁诺夫的书上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含糊，恐怕大家看了发生疑问，所以顺便提一下。

二、生产的第一个特征：生产的变化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这个题目分两部分来解释：一部分是讲生产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另一部分是讲生产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生产的变化、发展所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首先因为生产是维持社会生活的根本源泉、根本条件。没有生产，就没有维持我们生活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料，人不能够生存，社会就不能够生存，只有经常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才能把生活维持下去。这种消费的需要，首先是生活消费的需要，如吃、穿等。另外，生产本身也有一定消费的需要，如工具、原料等。所以，要满足这两种消费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取得人类社会的需要。但要向自然界中取得这些资料，不是现成就有的，这就需要人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就是改造自然，就是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要把

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种物质改变成为适合人消费需要的物质。这是人和动物生活不同的一个特点。动物生活是依赖现成的条件来维持生活，人类就不能依赖现成的自然条件来维持生活，而必须经过生产。

资产阶级有一种社会学，叫做气候论。这种观点认为热带地方自然界的物质资料很多，所以热带的人就享受现成的自然界所产生出来的各种物质资料。所以，热带的人就是不劳动，不进步的。这是对热带民族的一种污蔑，好像热带民族过的是野兽生活一样，好像他们的生活不需要通过生产来维持。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人类生活处在任何一个环境里，要维持生活总是要进行生产，总是跟动物有原则的区别。动物可以不要改变自然，可以依赖自然界的现成条件来维持生活；而人类一定要改造自然，人类的消费是不能中断的。社会生活天天提出各种新的消费需要，所以生产不能有一刻停止。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信里讲到这样的话，他说：人类社会只要停止劳动一个星期，全社会就可能因为饥饿而灭亡。这个道理是很容易了解的，没有生产就不能够供给人类社会消费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这样的社会就不能够存在。所以，生产首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一个不能停止的连续不断的过程。

生产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生产过程，主要表现在各个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上。生产不是永远按照同一方式进行的，这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一种动物它维持生活永远就有一种方式，比如，蜜蜂维持生活永远是依靠它的酿蜜器官，它维持生活的方式是不会变化的。人类社会生活不同，人的生产方式会变化的。在历史发展过程里，生产方

式由一种进入到另外一种，由比较低级的进入比较高级的。由于生产力进步，使得生产力性质发生变化。生产力性质变化了，生产关系也就跟着变了。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都变了，那么生产方式也就变了。

生产由量变到质变，首先是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生产力量的发展引起它性质的变化。原始公社由于劳动技能提高，生产增加了，于是由粗糙的石器生产进入到使用金属工具生产，由全氏族的集体生产进入到可以以家族或者以个人为单位来进行生产，这就是性质的变化。生产力性质变了，生产关系就跟着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机械工业大大发展起来。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变成集体生产，集体生产又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于是，生产力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跟着，生产关系也就变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革，这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表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我们历史上有过五种基本生产方式，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生产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五个基本阶段。我们中国就要走入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一个阶段。

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首先它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可是又不是简单的连续发展，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所以，观察生产时，我们也要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研究生产过程要注意到生产如何经过量变到质变，然后由低级到高级，我们应该用辩证法观点来研究它。

现在我们国家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农村里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也完成了。完成这样一个变革，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全国合作化

运动的高潮没有到来以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没有到来以前，在一些人的思想上有一种爬行思想。从思想方法的实质上来讲，就是缺乏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生产，缺乏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观点。这种思想就是没有注意到合作化运动是一个飞跃，是一个迅速的、根本的变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是这样。这些变化都是到了条件准备到相当成熟的时候，它就要发生迅速的变化。爬行思想认为这种变化应该是慢慢来的。这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

庸俗进化论的特点就是它好像并不否认质变。一般形而上学发展的观点是否认质变，仅仅承认有量的变化，这是旧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点。到有了进化论之后，这种仅仅承认量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行了，所以形而上学就不能不采取庸俗进化论的形式，表面上承认质的变化，但认为质变是一种慢慢的变化，不是迅速引起根本变化的发展过程，把质变看做是慢慢爬行的发展过程。这是 19 世纪后半期 20 世纪初期流行的一种发展观点，是一种变相的形而上学发展观。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里，这种爬行思想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是，在实质上这种思想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思想，没有把生产方式的变革看做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量的准备到了足够的程度的时候，就要迅速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把斯大林所讲的逐渐过渡这个思想公式化了。过渡时期是逐渐过渡，是经过几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经过劳动互助，又经过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又经过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加工订货，又经过公私合营。逐渐过渡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总之，都有飞跃。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以前，有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用量变到质变的观点来观察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农

业合作化中有一个公开的右倾思想，怕合作化发展快了，要进行收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在表面上是"左"但实质上是右的思想，就是不愿意接近资本家，好像是阶级立场非常稳定，对资本家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实际上是不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努力促进工商业改造高潮的到来，不注意到我们国家应该自觉地、主动地去推动这个高潮。所以，对生产发展的过程，应该也要注意到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这种辩证法的思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过去了，我们中国过渡时期生产关系改变的问题基本上完成了，在没有完成的地方进行工作时就要注意到以前的经验。因为我们总结以前的经验，就可以指导以后的工作。

对生产本身变化发展的过程就做这样的了解。

另一方面我们就要说明生产、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的书上说：生产、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的一个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它对社会的性质和面貌起决定作用。因此，生产、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当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

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怎么样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呢？

首先，生产变化的过程引起社会精神生活变化的过程。生产发展了，生产发生变化了，那么人类社会思想也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人类思想发生变化后，就可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观点来改变各种社会制度，改变各种政治制度，主要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的变化首先是生产的变化，生产的变化就是经济制度的变化。经济制度变化引起了人思想观点的变化，主要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变化，然后再进一步是宗教、文艺、道德上的各种变化。思想体系发生变化之后，人就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来改变

各种政治法律制度。

所以，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来。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以前，在生产过程里先有变化。生产过程发生变化之后，然后就产生一个文化革命，以新思想批判了旧思想，然后很多人在新思想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建立新制度。比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了工业，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然后才有“五四”文化运动。当然“五四”运动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可是，如果中国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俄国革命也不可能引起“五四”这种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时候，比如说在满清末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到欧洲去留学，孙中山也到世界各国去过，孙中山并且知道资本主义是不对的，可是辛亥革命以前没有出现“五四”文化运动。欧洲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俄国革命，已经有了巴黎公社，但是这些搬到中国来也不能适用。到了中国经济发生变化后，主要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工人阶级壮大了，这时有了“五四”运动，就能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了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经过1918—1920年，就使得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组织起来，就产生了共产党，就开始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制度。然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又进行革命斗争。

由“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个过程就说明生产发展如何引起整个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如何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这种基本规律到处都是一样。法国革命以前先有资本主义制度，然后有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运动，然后是法国革命。这个基本过程对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适用的。

所以，生产、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是整个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要正确地了解社会如何发展，首先就要研究生产。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就叫做生产的观点。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就要从生产方面去找根源。观察任何社会问题，或者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总是要从生产里去找最后的根源。

这样的观点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它的一些原则、观点的了解是容易的。但要紧的不是去了解，不是简单地去了解这些原则，而是要把这些原则掌握起来，变成我们的方法，就是在生产问题上，要把生产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当做我们的方法。任何时候，观察任何社会问题时，首先要从生产方面去注意。

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历史学家就不懂得这一点，不懂得观察社会问题首先要从生产、生产方式的变革观察起，所以，他们总是要犯错误。

生产、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决定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发展。这个原则就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首先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根本上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又是生产者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我们说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个意思就是说：生产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并不能说生产的历史就能够代表全部人类社会的生活。除了生产历史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历史是各方面的。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点就是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就是研究历史首先是研究生产的历史。不注意到历史有各方面，这是错误的，这是片面的观点。如果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把历史解释为简单的生产历史，他写历史的时候就是写生产，不写其他的东西，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就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就犯了只注意生产不注意政治文

化的片面性的毛病。如果是写经济史，可以只写生产，但是要写人类整个的历史，就不能够这样写。其实，就是学习经济学，也不能够完全脱离政治和文化。马克思的《资本论》常常涉及政治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就是研究经济也不能够把经济跟文化、政治脱离开。所以，不能把历史简单地了解为就是生产的历史。

可是，如果我们不强调历史首先是生产的历史，那么就不能够抓住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这里提问题要有一个分寸，一方面要反对把历史简单归结为生产这种片面性。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不注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环节这种片面性。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多半是喜欢把生产、政治、文化并列起来看。比如实用主义就是想用这种并列的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当做历史的中心的这种观点。胡适把他这种观点叫做多元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决定力量是生产。胡适说：决定历史的东西不仅仅是生产，而政治、文化也决定历史，各种条件都起决定作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叫做经济史观。他们曲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简单地把历史归结为经济，也就叫做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的看法：当然，经济、生产是一个决定的条件。可是生产的决定作用这个原则并不否定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虽然坚持了生产和经济是决定的条件。而经济决定论就是否认政治、文化的作用，认为经济决定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是这样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叫做经济决定论，就用多元的历史观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我们绝对不是经济决定论，但是也决不是那种经济、文化、政治并行的所谓多元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者是把经济生产看做是首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首先是生产发展决定历史的发展。然后，马克思主义者又承

认政治、文化对经济也有它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它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环节上，在一定的范围内，政治、文化也会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比如，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要进行革命运动，需要无产阶级自觉地起来，这时理论就起决定作用。资本主义发展到没有无产阶级自觉的运动就不能使社会前进，不能使生产发生变革因而需要自觉的革命运动时，理论就起决定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认为生产是最根本的、经常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政治文化思想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在某些环节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说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应该这样来了解。

三、生产的第二个特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我们已经讲过，生产的第一个特征告诉我们观察问题的生产观点。生产观点就是把历史首先看做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运用这种观点来观察问题时，就是首先要从生产方面去找问题的根源，但同时又不要忽视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作用，这就是一般生产观点的基本原则。

另外，生产的第一特征也告诉我们观察问题的群众观点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我们肯定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群众的历史。

这样一个历史观点跟过去传统的历史观点完全对立。过去封建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观点主要是把历史看做是英雄人物的历史。这种观点过去很流行，就是现在也经常影响我们。可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被历史假象所迷惑的一种观点。由历史

上表面的假象看来，好像历史的确是伟大人物创造的历史。本来伟大人物在历史上也有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过去历史上比较突出，特别是由于剥削阶级历史学家的渲染。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总是把它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渲染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一种历史的假象，再加上历史家的渲染就使得我们长期一种印象，历史完全是英雄创造的，而不注意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过去的历史很少写劳动群众，有的时候也写劳动群众，因为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劳动群众的作用的确很明显，这时不能不写。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有农民暴动。我们传统的历史家也要讲到农民暴动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不能不写。他不写农民暴动就不能显出来大人物的重要，他写农民暴动是为了显示他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旧小说里的《西游记》为了显示天宫的力量，不能不把孙悟空描写成很有力量的反抗人物。如果他不把孙悟空写得有本事，就不能显示出天宫的力量。

当然，也有一部分历史家对劳动群众的作用稍微看重一点。中国汉朝的司马迁，因为他对汉朝的皇帝不满意，所以在他写的《史记》中，就把跟皇帝对立的人物写得比较突出，把陈胜、吴广写得很英雄。这是特殊情况。一般正统历史家，他写历史就是压低农民群众的作用。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历史上群众受压迫，他的作用不容易显露出来。剥削阶级骑在群众头上耀武扬威，它的作用就比较突出，因此就有一些假象。剥削阶级里的英雄人物，好像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假象推翻，按照历史的真正面目，按照自然的真正面目来认识历史，指出生产者、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首先是劳动群众，而不是伟大人物。伟大人物有一定的创造作用，但首先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然后历史上的

英雄人物在劳动群众创立的基础上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够抹煞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分地夸大。

为什么说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劳动群众是生产的主体，生产决定历史，但是生产依靠谁来推动呢？依靠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担任生产的任务，所以，他在历史上也起决定作用。

要了解历史是什么样的，就要了解这个历史过程里劳动群众是怎么样进行生产的。劳动群众生产的情况不同，历史发展的情况也不同。为什么在过去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到了20世纪革命之后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些英雄人物，凭空造出来的革命？当然不是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生是因为劳动群众的生产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生产过程里有了大工业，劳动群众中间出现了无产阶级，然后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来讲，历史上劳动群众的生活情况怎么样，生产情况怎么样，历史也就是怎么样的。劳动群众是用石头工具生产，就有原始公社这样的制度。劳动群众用金属手工工具进行生产，是小规模地进行生产，就必然要建立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劳动群众中间如果没有进行一种机械的集体生产，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首先，劳动群众的生产情况决定历史面貌。要了解社会情况，历史情况，首先应该了解劳动群众如何进行生产，他们进行生产的条件怎么样。

此外，还要注意到任何时候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劳动群众。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劳动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作用就会很显著。由一种生产方式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要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要把整个地球倒转过来，要做出这样大的事业，首先就要群众起来参加，群众如果不需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改变。为什么资产阶级不能够推翻

封建制度？这不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力量能够做到的。资产阶级利用了农民不满意封建制度这一点，然后才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生，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够再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

所以，历史的变革是劳动群众自己创造的，历史的发展是劳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情。特别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是劳动群众要求解放自己的一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众参加的愈积极，那么这个变革就愈彻底，劳动群众活动的少，变革的彻底性就会差一些。我们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法国大革命最彻底，那就是因为劳动群众参加的最广泛。有些革命是采取改良的形式实现的，不是很彻底，这就是由于劳动群众没有很积极地参加。中国的辛亥革命劳动群众就没有广泛地参加，所以辛亥革命就没有成功。

在平时，不是在生产关系变革时，劳动群众的作用不显著。可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依赖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说，不管是文化、政治的发展，它总是建立在生产上，生产如果不发展，那么文化发展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平时，历史发展快慢的速度也决定于劳动群众在生产过程里的发展速度。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停顿呢？就是因为小规模的个体生产本身发展速度比较慢，又加上统治阶级的剥削，使得劳动者没有力量发展生产，社会进步就慢。

上面这些就说明为什么历史首先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理由就要运用群众观点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观察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劳动者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毛泽东同志有一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参考。要肯定群众是历史上第一个创造者，做工作要依靠群众，要把我们工作的任务看做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

情，要发挥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作用。

这次“八大”邓小平同志把群众路线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立场、观点，一个方面是方法。立场、观点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把历史看做是群众自己的历史，因此把我们的一切工作任务看做是群众自己的任务，要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动工作。所谓方法的方面，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这里讲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解决立场、观点方面的问题，至于方法问题也应该联系着了解。

总之，这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树立群众观点，要反对英雄造时势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是一种被历史表面假象所迷惑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要反对这种思想就要树立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就是要能够充分了解到历史是生产者群众的历史这个原则。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做进一步的发挥了，因为以后还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讲。我们在这里只是提一下，引起大家的注意。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环节之一，或者说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要树立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

生产的第二个特征主要是说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这个规律。

这个规律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这里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另外一个讲法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还有一种讲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几种说法都可以。这里我们不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我们不用这个公式。这个公式虽然是对的，但是往往概括性不够，不能概括某些具体情况，容易引

起误会。比如说，我们现在农业里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可是我们的合作社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生产力很落后，还是使用旧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关系是先进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公式就不完全适合了。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发展起来之后，它的性质就会完全跟生产关系一样了。但是，在目前来说，生产力跟生产关系这两方面还不完全一样，生产力性质是很落后的，而生产关系是先进的。所以，我们一般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这个说法概括性比较更大一些。或者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没有合作化以前，我们的生产力就是个体劳动的生产力，是很低、很落后的生产力。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也就要求合作化了。生产力虽然很低，但是按照它的需要来讲，它需要合作化，单干已经搞不下去了，特别是对贫农来讲。农村的生产力不是一种像工业那样社会公共性的生产力。按照它的性质和现状来讲它是很落后的，可是按照它的需要和情况来讲，它需要合作化。因为它不合作化就搞不下去了，就不能够前进。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合作化运动生产能够搞起来，而且能够基本上完成呢？就是由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讲法是错的。按照总的原则来讲，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从总的原则来讲是对的。但是要概括一些具体情况，还是用我们的说法更好一些。

还有生产的第一个特征和第二个特征之间有一定的关系，需要说明一下。

生产的第一个特征说明生产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生产的第二个特

征是要进一步说明生产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要由低级到高级，要由量变到质变，为什么会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的第二个特征是说明生产发展的内部原因，也就是要说明生产过程自己本身矛盾的运动。所以，生产的第一个特征一般地指出生产是发展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生产的第二个特征就进一步分析生产发展过程的内部原因。

那么，应该怎么样分析这个内部矛盾呢？

毛主席的《矛盾论》是告诉我们如何分析矛盾的一篇最全面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部分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矛盾总的特点，一定要首先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点，这是分析矛盾一个最根本的原则。研究生产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就是运用这个方法来研究生产过程。要了解生产、生产方式发展的特点，就要首先研究生产各方面的特点，就是要研究生产关系的特点，要研究生产力的特点，然后再总起来了解整个矛盾的特点。所以，讲生产的第二个特征时，首先就要讲生产力。

生产的发展总是从生产力开始的，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开始，所以生产力在生产的两方面中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为生产总是先由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然后生产关系才发生变更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就是说，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比较起来，生产力更活泼、更革命。

这里面也有一个分析矛盾的方法，就是分析矛盾虽然是一个个方面的分析，但是分析任何一个方面的时候，总是要跟另外一个比较着来分析。比如，要了解生产力的特点，就要把它跟生产关系比较着来研究。

生产力有什么特点呢？

生产力的特点就是它比起生产关系来说，它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它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以，分析矛盾，分析任何一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关系中分析。

对任何矛盾的分析都是这样。对无产阶级怎么样了解呢？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要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要了解这个矛盾，就要一方面分析无产阶级怎么样，另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是怎么样的。可是，研究无产阶级时，就要把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关系联系起来分析。无产阶级是什么阶级呢？是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向资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分析时要有联系地进行分析，不能孤立地分析，要和对方比较着分析，否则，分析就成为孤立的，就脱离了总体，也会犯错误。所以说，分析必须以综合为前提，在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

研究生产力的时候，要了解生产力的特点，就要把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比较着来研究。生产力的特点主要在于它跟生产关系比较起来，它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谓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意思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更经常一些，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不等待生产关系就前进了。生产关系总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在一定的情况下，它是不变的；可是生产力没有一个时候会停止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进行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里天天积累经验，有了经验就能改进工具，改进了工具劳动技能就提高了，生产力就逐渐进步了。无论生产力的发展多么缓慢，它时时刻刻总是有进步的。而生产关系是比较缓慢的，或者是相对不变的，生产关系一般来说就是这样。所以，事物的内容比较活动，是经常变化的，但形式总是相对不变的。

什么叫内容呢？矛盾的运动就是内容。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是

一个矛盾，可是生产力本身又是人和自然界矛盾的运动。这就是人改变自然，从自然界中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一种矛盾的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发展是决定于它的两个要素：生产工具和掌握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人类改变自然，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这种矛盾是经常变化的。人们天天在改变自然，积累经验，同时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能。可见生产力是时时刻刻在活动的。生产关系是形式，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形式，它是相对固定的。一旦形成一个生产关系，长时期就不变了。所以，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是指发展过程，是指发展内容来说。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是说，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内容就需要什么形式。当然，需要是一回事，实际上能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是另一回事。有的时候，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已经很高了，但是生产关系还不变，这种情况是有的。形式可以不适合内容，但是形式迟早要适合于内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就是形式一定要适合于内容。有的时候不适合，但是迟早一定要适合。所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

在没有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农业的生产关系是一种个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于农民发展生产的需要。按照生产力的内容来说，它要求由个体生产变为集体生产，否则生产就不能前进。由于有这种要求，所以合作化运动就能够发展起来，由个体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就适合于农民所要求的集体劳动，集体生产。现在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民的劳动技术还是很落后的，但是按照生产力的性质来讲，合作化之后，生产力的性质也是集体性的，跟集体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所以，现在不能说我们的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性质完全不适合，因

为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在合作化之后，生产基本上是集体劳动，集体劳动跟集体所有制，形式和内容是一致的。有了一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么就一定有某种生产关系来跟它适应，因此就可以说，生产力在生产中间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力怎么样，生产关系也就怎么样。这是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矛盾一方面的特点，是生产力这一方面的特点。

其次，我们讲到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有什么特点呢？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种发展形式。这种形式对生产力来说是被决定的东西，可是它又不是完全消极的被决定的形式。一种生产关系产生之后，它对生产力又有一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新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它又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场所。一般来说，一种新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原来的生产力跟它比较起来，就显得范围狭小了。因为新生产关系开辟了广大的地方，原有的生产力就不能够占领这个地方，因此就显得新生产关系比起来生产力更先进一些，我们应该肯定这一点。

所以，一般说，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又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则绝对化，认为只有生产力才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只有生产力才起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一点作用也没有，如果这样来看，那是机械论，是一种片面性。

总的来讲，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动的因素，又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就是在新生产关系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生产关系又会显得更先进些。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起推动作用，原来的生产力就显得比较落后，生产关系就能发挥

一种力量来克服原有生产力落后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产生我们“八大”结论里所讲的新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是一个事实。

这种话虽然经典著作里没有讲，但是，经典著作里讲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时，实际上也有这种意思。新生产关系有一种先进的推动作用，能够克服生产力落后的状态。生产力是被克服的，所以，它对生产关系所开辟起来的广大发展的可能性有一种阻碍作用。所以，它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我们是应该肯定的。

为什么腐朽的生产关系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呢？

这里面可以找到种种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腐朽的生产关系会妨碍生产力两个要素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应该根据生产力的要素来说明。一种腐朽的生产关系首先不能保证劳动者改进工具，甚至不允许他们改进工具。其次，就是不能推动劳动者来充分发挥他的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一切腐朽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都有这种阻碍作用。比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就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个阻碍作用就表现在对工具，对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这两方面。为什么它会阻碍这两方面的发展呢？理由也很清楚，一个地主把农民剥削得很穷，农民就不可能有力量再来改进工具。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所以停顿很久，就是因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使得农民没有办法把原始工具比较快地加以改进。农民当然愿意改进他的工具，可是剥削制度不允许他这样作。在个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农民生活很苦，要改进工具是困难的，要使用新式工具就更困难。他被迫不能不用旧工具来进行生产。所以说，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工具的改进是有妨碍的。

资本主义社会对生产工具的改进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就是在

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工具也有一定的改进。但是这种改进是片面的，像生产军火的工具可以改进，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工业方面的工具改进时就比较困难。由于生产过剩，机器停下来，每日机器只能开动60%，不能全部开动。对劳动者生产经验这方面来看也是这样，旧生产关系会阻碍劳动者发挥他的生产经验，提高他的劳动技能。理由也很容易明白，因为在旧的剥削制度下，劳动者简直就没有什么希望，因此他对生产就没有很大的兴趣。农民本来应该对生产有兴趣，因为他有自己的土地、房子，可是地主把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抢走了，每年剩下的也吃不饱，穿不暖，这对他的生产情绪有很大的打击，他也就没有兴趣来提高生产。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最大的阻碍作用就是打击劳动者的生产情绪。奴隶社会就严重地破坏劳动者的生产情绪。封建制度下，劳动者本来应该有积极性，但它还是被剥削制度所破坏。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样，工人是被逼迫着进行工作的。

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就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就有可能改进工具，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改进工具，有可能使劳动群众累积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发挥他的积极性。一般来说，除了奴隶制外，新生产关系能够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奴隶制初期，让俘虏活着，让他工作，这样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可以积极劳动。但对整个奴隶制社会来说，是打击劳动者的情绪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有自己的经济，在初期，剥削少一些，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中国每换一个新朝代的最初几年，生产力总是发展得很快，就是因为剥削比较轻。资本主义初期，工人出卖劳动力也是被迫的，但是工人最初出卖劳动力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积极劳动，增加工资。这种希望也刺激工人劳动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开辟了最广大的地

方。这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具体内容。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是在这两个要素上起作用。所以，要了解一种社会是不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能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就要看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工具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在这个社会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没有提高的可能。抓住这个环节就可以了解这个社会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我们运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个原则来观察社会问题所要掌握的一种具体方法。

关于生产关系这方面的作用就讲这些。

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因此就产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个原则、一个矛盾规律。这种矛盾所以产生，就是由于这个规律在起作用。

这个原则能不能看做是绝对的东西呢？

不能够。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这是一般的原则，不能看做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不能说，生产关系的发展绝对落后于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定要落后于生产力。没有一本经典著作在这个原则上加上绝对两个字，因此我们就不能这样来了解，如果这样来了解就是形而上学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原则我们都不能用形而上学的原则去了解，不能把它绝对化。

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是一种一般的矛盾关系，因此，它有一定的相对性。说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就是说一种生产关系形成之后，它的发展比起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就是落后的。一种生产关系一旦形成之后，它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它内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一种生产关系形成之后它就相对地稳定下来，大体上就不变了。而生产力就要变，或者

变得快一点，或者变得慢一点，但是总是在变；而生产关系大体上是不变的，因此发展就落后了。在这里，一个相对不变的东西跟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比较起来，这个相对不变的东西当然要落后。这里讲落后，就是缓慢的意思。有一个原理，讲差异就是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中间有一些差异，这就是矛盾。我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起推动作用，开辟了广大的地方。尽管如此，它已经相对地固定下来了。而生产力同时就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农业方面就由手工工具向新式农具发展，再进一步就要机械化，而生产关系大体上就是高级合作制。尽管它有推动作用，可是它本身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在发展速度上它总是比生产力落后一些。

一个新生产关系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它就落后于生产力。所谓落后就是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的意思。速度上有差异，而这个差异就发生矛盾。怎么样发生矛盾呢？生产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性质逐渐变化了，原来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或者完全适合，或者基本上适合，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性质就不适合了；而生产关系还是不变，生产力的性质也就跟生产关系不一样了，统一性也就没有了，可是它还是要同时存在，这个统一性就很少了，这就是一个矛盾。在性质不变以前已经有矛盾了，发展速度有差异也就有了矛盾。有了性质上的变化，矛盾就更加明显、尖锐了。那时统一性也就消失了。所以说，统一性是相对的，只是有的时候某些方面有统一性，而在生产力性质已经变化，而生产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矛盾的两方面也就没有统一性了，这个时候矛盾就尖锐了。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在性质上没有统一性，因为生产关系是私有制，而生产力是社会性质的。这

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本质上没有统一性。但是，在新生产关系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要互相依赖。最初，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家庭手工业，以后是工场手工业。在这些阶段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基本上适合，因为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很小，虽然是集体劳动，但是它没有使生产发展为社会公共性，还没有成为分工合作的社会体系。工场手工业可以比较孤立地发展，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体系，形成社会上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个时候资本家的私有制是适合的。一个资本家投资建立了一个手工工场，就在资本家的统治下发展。那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是适合的。等到发展到大工业时，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生产关系仍然是资本家所有制，可以说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生产体系，生产应该是社会的，而生产资料是资本家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尖锐的矛盾。集体劳动跟资本家所有本来就有矛盾，但在手工工场时，基本上是适合的，有了大工业后，在本质上就不适合了。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不适合，就使得生产的内部发生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就需要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变革，生产关系相对不变的情况就要中断，由一种生产关系迅速变成另外一种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赶上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情况下，就不能够说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时候，就要说生产关系通过迅速的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是讲生产关系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它跟生产力比较起来，它的发展就要落后。可是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情况下，生产关系还是可以赶上生产力，还是能够经过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不能说生产关系的发展绝对落后于生产力。这样的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了解，是一种片面的了解。说

生产关系发展落后于生产力，主要是表明为什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会发生矛盾，想要说明这个原因，因此就提出这个原则。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运动就是生产发展内部的根源。这个矛盾是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的。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由于生产关系发展落后于生产力，所以生产关系的形式由适合于生产力性质变成为不适合生产力性质，这样就暴露了矛盾，产生了矛盾。

矛盾的解决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斗争，这个斗争表现为人的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使生产关系重新适合于生产力。这样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就能够解决，对立的两方面就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统一，就是生产关系跟生产力有一个新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一建立起来，立刻又向矛盾的方面发展，立刻生产关系又落后于生产力，又逐渐暴露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是生产发展、生产方式变更的内部源泉。这个矛盾运动、产生的基本原因，也就是矛盾产生和矛盾解决的基本原因，就是生产关系一方面在发展上落后于生产力，可是另一方面，它又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尽管它落后，但它迟早要适合生产力。这就是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基本原因。

讲完这些之后，有一个问题要附带说明一下。

可能引起一个问题，就是生产发展的内部根源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运动，那么，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又在什么地方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就是生产关系。这样就引起一个问题，就是外因决定内因。所以，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是在生产力内部，就是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相互关系。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生产力发展的根源还是在内部，还是在生产力本身。生产力是什么东西呢？生产力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的矛盾，人要求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要求克服自然。人和自然矛盾发展的决定要素就是工具和人自己本身，但是矛盾的性质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根据。因为人需要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就要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能。在生产的过程里，就有了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据。如果没有其他外来的阻碍就可以发展。但问题是这种人和自然的矛盾不能离开社会来解决。人要跟自然斗争，人和人之间一定要建立社会关系。所以，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力内部矛盾的运动就不能够开展。因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一种推动作用，或者阻碍作用。对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是外部的东西，但它是生产力所不可少的东西。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发挥一定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说，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无论如何生产力发展的根据还是生产力自己本身。因为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是要通过生产力自己内部的因素才能发生的。这叫做外部原因通过内部原因起决定作用。我们讲到生产关系怎么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通过生产力本身内部的原因才能发挥作用。生产力发展的根据是生产力自己本身，主要是看生产工具能不能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能不能提高。

还有，我们“八大”决议中讲到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现实的矛盾。先进制度基本的东西就是生产关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新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对这个矛盾怎么样了解呢？

要了解这个矛盾先要注意到我们读这个文件时，不要把后一句话和前一句话脱节。文件上讲到先进的社会制度跟落后的生产力现实的矛盾，讲到这一点以前有一句话说：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的农业国的状况的矛盾。应该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了解。先进制度跟人民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是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的人民在旧中国，在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以前，我们已经有了把中国建立成为新工业国的要求，可是这个要求不能够实现。当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那么，这种要求就成为现实可行的要求了，就变成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了。在旧社会里，这种要求只是一个脑子里面的要求，不能成为实际的东西，到了新社会，就成为实际可行的了，使旧的农业也可以变为现代机械化的农业。

先进制度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脑子里面抽象的可能变成实际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遇到一种现状，就是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发展先进工业国的可能性跟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有了矛盾。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是落后的，而我们的制度又开辟了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现实的，是实在的，不光是脑子里面想的。

为什么是现实的呢？

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了，所以，我们研究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现状的一方面，也要看到劳动积极性普遍的提高这一方面；而劳动积极性这方面是主导的方面，落后的农业国这方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暂时存在的东西，不是一个必然的东西。在旧社会来说是一个必然的东西，从将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不是必然的东西。必然的东西是劳动者的积极性。所以，这个矛盾应该解释成为在先进社会制度下所开展起来的发展工业生产这种可能性跟

落后农业国现实性的矛盾，落后的农业国这个现实性是要被克服的。所以说它是一种阻碍作用，是对我们的要求起阻碍作用，所以是一个矛盾。

把前后这样联系起来就容易了解了。这就说明生产关系在它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先进作用的。对这种作用如果说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了，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切可以考虑。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会，好像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需要。

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不需要太多的争论，争论得太多就变成一种抠字眼的争论了。问题是对这个意思怎么样了解，新生产关系是有一种先进作用，因为它开辟了广大的地方，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实在的，不是空的，是目前生活里实在存在的一个东西；而生产现状是落后的，可能性就要跟现状进行斗争。这跟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原则并没有什么矛盾。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认为新生产关系总是对生产力起强大的推动作用，生产力是被推动的，生产关系是主动的东西，所以生产关系就有先进作用。这跟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这个论点没有什么矛盾。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是讲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它的发展速度落后于生产力，新生产关系起推动作用是讲新生产关系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虽然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的发展还是落后于生产力。因为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它就稳定下来了，而生产力是一直在发展。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生产关系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就是矛盾的基本的方面，能够对发展过程起推动作用，起决定作用，而落后的农业国这个现状就不能起决定作用，因为落后的农业国要被克服，先进的工业国一定要实现，因为新生产关系开辟了这种可能性。这样，新生产关系起了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变革时期，新生产关系是主要的。在没有变革的时

候，改变生产关系是主要的。改变之后，新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是主要的。我们现在的新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要进行种种工作使新生产关系建立得更好。比如，分配制就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合作化搞起来之后，分配搞不好就不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秋收之后就要好好地搞分配。这就是要好好地建立新生产关系，使它能够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刺激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在我们新中国主要矛盾里的主导方面当然是生产关系，因为它是一个决定的力量，是规定社会性质的，规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上面已经把生产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在理论上做了一些说明。现在根据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过程对生产的矛盾运动做一些具体的说明。比如生产关系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如何起反作用。不说明历史的过程，对理论原理就不会有深刻的了解。

总的来说，人类历史经历了生产发展的五个基本阶段，也就是经历了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这五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性质各有不同，生产关系也不同。

最初的人类社会是原始公社。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的情况怎样呢？这主要是讲生产力的性质。当时主要是用石头工具，到原始公社末期才有金属工具。生产力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原始公社有五十万年到一百万年的时间。石头工具有前期、后期。前期是很粗糙的，是打制，把一块石头打破以后，利用破片作工具，又叫做旧石器时代。后期是磨制，使它光滑，又叫新石器时代。在原始社会中，除了石头工具以外，还发明了使用火，后来有了弓箭，最后发明了陶器，以后逐渐能炼金属。

原始公社的主要生产技能是狩猎，它占最长的时间。到末期只有一万多年的时间中，有了畜牧和农业。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性质有什么特点呢?

要了解性质，就要弄清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基本特征，然后把基本特征综合起来，就表明这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在方法上讲，就是观察问题要注意到联系、发展、量变到质变、矛盾运动、发展的曲折性、否定之否定。这是质的规定性。我们要用这种方法了解原始公社的质的规定性，把握质就是把握基本特征。比如了解这个人的品质如何，不能根据脸上的特征，说这个人生得漂亮品质就好，汪精卫生得漂亮，但他是最可耻的。要了解这个人的品质，就要抓住这个人的社会特征。中国离匈牙利很远，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卡达尔欢迎苏军，拒绝联合国干涉，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兄弟国家中最有声有色的一种表示。卡达尔能表现出这三个特征，就能够确定他的政府是革命的。这就是把握质的方法，去粗取精，把粗糙的东西撇开，把基本特征综合起来，就可以肯定质是怎样的。

原始公社生产力的性质怎样呢?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特征：

第一，是集体的。生产力要依靠集体劳动才能表现出来，使用石头工具打野兽，要把比大象还大的猛犸打死，没有集体劳动是不行的。这种集体劳动基本上说是一种简单的合作的劳动，或者叫单纯合作。

第二，是没有社会分工。因为整个社会就是一种劳动——狩猎，到了末期有了畜牧业、农业，才有初步的分工，这是社会分工。

第三，生产力非常低，低到全部劳动日消耗以后，仅仅能够

维持最困难的生活，没有剩余劳动。

这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力的性质。这种生产力性质是不是一定要有原始公社那种生产关系？我们说，很自然地需要有原始公社那种生产关系。单纯合作的集体劳动、没有社会分工的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力很低，必然要产生生产资料原始公社的所有制。因为劳动是以整个社会为单位，很自然要把生产资料当做公共的，在那种生产力情况下，不可能认为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是合理的。生产工具在使用时被个人占有，可是他死后仍归公社。森林、土地、猎场是公共所有。因此人和人的关系当然是同志合作关系，分配当然是没有剥削的，而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生产关系恰恰符合当时生产力的性质。

阶级社会的国家受了外来的侵略、剥削，还可以生存，像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生活还是维持下来，但最后翻了身。有些原始民族，像非洲、美洲的原始民族，遭了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乎完全灭亡，印第安人就几乎完全灭亡了。这样低的生产力是经不起剥削的。

原始公社的分配是平均主义的，但生产力稍微发展以后就有些不平均了。比如打死野兽以后，可以先割下自己喜欢的一块，别人再割，但基本上还是平均的，不然就不能维持。

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残余遗留很久，中国封建社会就有公社制度的残余，一直到现代，偏僻的农村还有这种情形。大家庭有个家长，到外面赚了钱回家，进门就要把箱子打开让大家看，就要分配，如果把箱子拿到自己屋子里，就要受批评。

这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原始公社中生产力逐渐发展，有了畜牧业，小野兽捉来养，变成了家畜。后来出现了农业，最后金属工具也产生了，发明比较

精巧的工具，最后手工业有了萌芽。到了有冶金的时候，手工业专门化了。

原始公社末期，首先有畜牧业、农业的分工，最后有手工业分工的萌芽。这时生产力性质变了，和原来原始公社几个基本特征完全相反，向对立的方面转化。原始公社基本生产力的性质是单纯合作的集体劳动，以公社为单位，到有了畜牧业，特别是有了农业以后，集体劳动的范围缩小了，最大限度就是由一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由整个氏族、整个社会的生产变成一块一块为单位的生产。畜牧以大的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农业也是如此。以前狩猎是几百人去打，现在只要二三十人就可以了，生产就缩小到以家族为单位。

生产力提高了，多少就有了剩余劳动。这几个特征就是原始公社的对立面，不转不行，这是很自然的。从事农业生产不缩成小块不行。社会分工也是很自然的，生产力提高后，有了剩余劳动更是自然的。

生产力的变化，很自然地在生产关系方面不能不有所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转入原始公社的反面。

首先所有制逐渐变化，原始公社末期发生农业公社，基本上还是原始公社制度，可是跟狩猎时期不同。土地名义上是公共占有，但使用是按家族分配，起先是轮流分配，以后就固定分配来耕种，所以占有制无形中有了改变。家族内部实行公有制，可是家族之间土地各有占有权。

所有制在原始公社末期开始变化，农村公社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制度，已跟早期原始公社不同，有了向私有制转化的萌芽。虽然公社占有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实际支配的有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占有，家长制度是在农村公社产生的，家长有比较高的职权。

在向私有制发展中，社会分工起什么作用呢？它就使社会中发生了交换，从事畜牧的部落或氏族要和从事农业的部落进行产品交换。中国古代的神话就反映原始公社末期的分工。比如有神农氏、伏羲氏。神农氏，实际上是指氏族，专门搞农业，所以叫神农氏；另一个氏族叫伏羲氏，就是征服野兽的，是从事畜牧的。不同的氏族只能生产一部分东西，相互之间就要交换。交换有一种条件，互相把东西当做对方自己所有，这无形中肯定了财产私有制。农业公社、畜牧公社出面交换的人多半是家长，家长就成为财产所有者。有了农业公社以后，家长的权比较大，而且财产好像变成家长的财产，家长就发展成为后来的剥削者。

交换引起私有财产的必要，引起私有观念。在很长的时期，名义上不是私有的，实际上成为私有的。工具不能不是家族私有，生产品也是家族私有。在家族内部是公有，家族中家长又是主要的。男性中心社会主要是从农业公社开始，男性家长成为家中的代表人物。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有了剩余劳动，有了剥削的可能，因此在农业公社、畜牧公社中开始使用奴隶。奴隶最初不是由氏族内部发生，而是战争的结果，那就是把俘虏变为奴隶（公社内部的传统不允许把自己人当做奴隶），这样就开始有了剥削。

这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简单情形。

原始公社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在农业公社时代开始有了奴隶，这种奴隶的使用逐渐发展，后来破坏了原始公社，就出现了奴隶社会。

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要破坏原始公社，为什么奴隶制度能占优势？在奴隶主强迫下，大批奴隶的生产劳动要比原始公社小规模集体劳动效率高。奴隶制度最初是产生在原始公社末期，大规

模使用奴隶的是原始公社的一些领袖人物，专门打仗的人，氏族长老一类的人。他们利用在交换中的代表地位，利用战俘进行劳动，就可以成为最富有的人，使他们能够占有大批奴隶，可以脱离劳动，专门支配奴隶进行生产。这样一来，奴隶主的经济地位比一般公社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奴隶主变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特别是因为部落战争的结果，氏族领袖掌握了军队，原来军队是为了保护本氏族的，后来军队变为站在本氏族上面的武力，后来又形成了国家。

原始公社到了农业公社以后，就必然转变为奴隶制度，因为使用奴隶的生产力比原始公社的生产力高。一般可以这样了解，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转化，根源就在于生产力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集体劳动的性质变为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力性质。这种生产力分散的趋势，使劳动人民趋向于分散、没有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便于占有比较大的财富的剥削者来统治劳动人民。

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特点，就是劳动者的经营是分散的。奴隶社会不同，在奴隶主支配下的奴隶是集体劳动。但有些国家的奴隶社会，比如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但下属的生产，个体劳动占很大的成分，特别是在初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奴隶制不能占领一切方面。这些劳动者也是被奴隶主所支配的，奴隶主的剥削方法就是税收。

生产进入手工业、农业时代，劳动发生了一种分散性，使得劳动者的力量也分散，因为缺乏自己的组织，所以受外来组织力量的统治。奴隶制度所以能产生，是和生产力发展分不开的。

不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劳动者起来暴动反对统治者不能得到最后成功，就是因为劳动者缺乏组织，很容易瓦解。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奴隶社会中，生产力比封建社会低一些，所以集体劳动还占优势，一般使用的工具不是很进步的，因此奴隶主的强迫集体劳动就比一般劳动者小规模的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更大，能提供更多的生产品。因为他有可能来剥削剩余劳动，所以奴隶主就脱离劳动，并养活一批人来从事政治、文化的活动。奴隶制度一方面是残酷的制度，如果说原始公社是野蛮时代，是由于文化低，说奴隶制度是野蛮时代，则是因为不把人当做人；但奴隶主由于剥削剩余劳动可以养活一批人来从事政治、文化、科学、艺术的活动，所以开始有了文化，恩格斯把奴隶时代叫做文明时代的开始。

在奴隶社会中生产力有了分散的性质，可是分散的性质没有到极端，集体劳动是主要的，不过不是全社会为单位的集体劳动，而是以公社为单位的，或者是奴隶主统治下的奴隶集团为单位。封建社会的生产单位就进一步分散了，生产工具更进步了。奴隶制度基本上是铁器，中国那时有没有铁器不大了解，没有证明。战国时代有进步的铁器，奴隶时代可能已经有了铁器，封建时代开始能够普遍地炼钢。奴隶时代的铁工具是很粗笨的，所以要集体劳动。封建时代就可以通过改进了的铁工具而进行个人劳动，这说明已有了相当高的生产力。

封建社会是个体生产，充分发展了个体生产的特点，农民可以以五口之家为单位耕种土地；手工业者一个人就能维持一家的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性质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可以由个人来进行生产。生产力提高了，社会分工更多了，生产部门也多了，但大体上是农业和手工业。

在这样一种生产力性质下，生产关系很自然地要有所改变。封建社会的所有制，除了地主以外，还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生产工具的个人占有制。奴隶社会中已经开始有个人占有制，但除

了奴隶的劳动以外，一般是组织在公社中的小规模集体劳动。

奴隶社会是轻视劳动的社会，所以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效能的积极性不高。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也没有能很快地发展。

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极端分散的性质，很自然地产生了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劳动者占有工具，他的经营也是个体的，占有自己的经济。剥削形式是地主剥削农民。地主通过土地占有强迫农民把生产的一部分归地主所有。这种制度也是在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必然要产生的。

在封建社会中，生产是劳动者个人经营，那么地主怎能使劳动者受他的剥削呢？这是因为劳动者的生产分散，组织力量不强，地主阶级能比较便利地来统治劳动者。地主阶级掌握强大的经济力量，又有武装的国家的力量，劳动者除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起来暴动，得到一点胜利就又分散了，地主又来统治。

两重性的所有制也是很自然的，一方面是地主占有土地；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分散经营，劳动者又占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这是阶级社会发生以后，为什么生产关系跟生产力适合的具体内容。

大体上可以看到，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能够产生，主要是决定于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基本的特点，就是由整个社会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变为小规模的劳动，最后变为个体劳动。这就产生了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以后由阶级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又开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在封建社会末期，城市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开始把个体劳动组织起来，最初资产阶级是把家庭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由于个体组织集体化，是跟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分不开的。没有新的生产关系，个体劳动就不能集体化，没

有富农，手工业、农业就没有办法集体化。因为劳动者喜欢个人劳动，另一方面劳动者资本很小，他自己无法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要投资，这只有富农、资本家能够投资。由生产发展来看，封建社会由个体生产组织集体化，必须要有资产阶级，在那种情况下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跟新的生产力性质是适合的。在那种情况下，除了资本家投资使劳动集体化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斯大林讲，资本主义最初时候的生产关系也是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情况的。这话是对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个体生产走向集体生产，虽然那时资本家的私有制跟劳动者集体生产已经有矛盾。德波林认为那时没有矛盾，只有差异，这是错误的。尽管有矛盾，那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在那时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为什么中国在1949年解放以后还要有个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方面呢？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广大的地方为个体生产所占领，所以我们要领导农民进行合作化运动。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各方面的个体生产者，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不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妨害，城乡交流就要受到阻碍。在封建社会个体生产的情形下，发展生产力在一定的时候非有资本主义不可。我们的国家是利用了这种历史的规律。有些国家一下子就把资本主义打死，我们就搞得好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使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使生产力的性质大大改变。改变过程从工具方面讲，首先把手工业集中起来，然后把手工工具变为手工机器，进一步就发明蒸汽机，建立了机器工业体系。这就使个体劳动变为分工合作的集体劳动，再进一步变为机器的分工体系。这种发展过程使得生产力的性质

发生根本的变化，个体劳动变为简单合作的集体劳动，小规模集体劳动变为社会公共性质的集体劳动。

建立大机器工业以后，生产过程变为社会性质。在工场手工业时代，还不能说生产过程已有了社会性质。到了机器工业建立以后，生产过程才有了社会性质。各工厂之间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各部门之间有严密的有机组织的关系。这种性质和原始公社集体生产的性质不同。原始公社是简单合作的性质，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说，已经是公共性质的了。

现在整个世界的生产，实际上打成了一片。中国对外贸易跟世界各国有许多联系。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己建立经济体系，可是不能不跟别的国家有来往。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相互配合才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建设上有过错误，就是每个国家都想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注意到生产的公共性质，没有注意到苏联、中国是大国，可以搞个完整的体系；但比较小的国家应当把生产的社会公共性质的规律应用在国际中，使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的指导原则。

在这种情形下，生产力性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适合，因为生产关系是私人占有，而生产过程的规模是大的，是没有限制的。生产关系太窄小，而生产力是更广泛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多少有些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有所改变。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一个资本家可以投资建立手工业工场，最初的机械工场也可以由一家投资。但以后企业的规模大了，个别资本家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企业，所以以后出现了股份公司、各种企业联合，最后出现了金融资本。美国有许多资本家，大小资本家上面有银行资本来调剂，资本主义本身也不能不集中。

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不是完全没有改变，这种改变使得

一些改良主义者制造一些错误的理论，说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和以前的资本主义不同，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了，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即用和平的办法推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家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资本主义虽然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有所改变，但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虽然个别资本家经营变为资本家集团的经营，可是经济统治者、政治统治者仍然是资产阶级，所以生产关系是相对不变的。生产力是飞快发展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机会主义者把生产关系的若干改变看做是根本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生产力有了性质上的改变，个体生产被消灭了，小规模分工合作的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也变成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力性质上起了变化，但在资本主义没有垮台以前，生产关系、生产力还是同时存在，还有一定的互相依赖性，还有一定的统一性。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质上的统一性没有了。

为什么统一性是相对的呢？因为统一性在对立面能够成为完全的统一性或基本上的统一性时间很短，有矛盾就需要解决，对立面就要破裂，最后变为新的事物。

资本主义发展了大工业以后，很自然地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适合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尽管资本家私有制已经集中化，以资本家集团为单位经营生产，可是资本家之间还有利害冲突，它就妨碍了社会某种性质的生产力的发挥。现在我们的生产力是世界体系的生产力，可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家集团，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就妨碍了全世界生产力公共性质的充分发挥。苏黎士运河问题，由于英法资本家

集团的利害冲突，就来个侵略，苏黎士运河停顿了，经济交流发生了障碍。有些企业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美国就不能建立像苏联那样大的水电站，因为建立大水电站要有很大的地方受水电站资本家的支配，而且煤的销路要减少，火车运输就要蚀本，铁路资本家会不满意。我们荆江分洪水闸三个月建立起来，英国约翰逊大主教去参观，他说：这真太快了，我们要三年才能建立起来。在美国，这问题光是在议会上吵架就要吵三年。如果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公共所有，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全社会生产体系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因，这是生产力的要求。

总的来说，可以看到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如何适合生产力。

生产力的性质，大体上由原始公社的集体劳动性质逐渐变为阶级社会分散的性质、个体的性质，以后由个体性质的生产又逐渐变为公共性质的大生产。这是生产力性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和生产力发展过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氏族集体所有制变为带有剥削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再进入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整个过程中，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总是走在前面一些，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以前，生产力已经开始走向分散，规模变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以前，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社会的公共性质。从总的过程来说，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但生产关系落后到一定的时候，经过一定的变革，就赶上生产力。当生产关系赶上生产力的时候，它对生产力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工具改进了。生产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事，每个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都使得劳动人民在

生产方面能前进一步。

现在研究历史上的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有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作为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这些规律作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

我们党和国家就是运用这个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来指导我们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怎样运用这个规律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工作呢？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受到了旧生产关系阻碍的时候，我们就要努力来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我们过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现在也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从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妨碍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使民主革命得到了胜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国家又碰到了一个主要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妨碍我们生产力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有两面性，一方面帮助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平衡的。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生产关系还能够帮助生产力的发展，最初的时候多少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由一些。最初几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大一些，最后两年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逐渐减少，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减少，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增长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矛盾，国家工业、商业、合作社商业的发展，总是要采取排斥资本主义的步骤来发展，不排斥资本主义，我们

就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一开始就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有矛盾。矛盾越来越尖锐，去年底已经是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来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但还有些残余。

经过两个革命，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新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就是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代替了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个体所有制也曾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大的地盘。生产关系显得很宽广，而生产力现状还很落后。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劳动者的积极性没有任何限制，启发了劳动者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新生产关系的先进作用，来努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前是要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现在不是要消灭生产关系，而是要巩固先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能顺利地发展。

新的生产关系只是基本上建立起来，还没有充分地建立起来，没有最后巩固起来。生产关系还不是很完备的。合作化运动以后，我们采取种种措施来巩固这种生产关系。巩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方法，就是要注意到几个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到新生产关系本身的特点，按照这个特点来很好地建立它；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固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新的生产关系要巩固，也要依赖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就是说，一方面要正确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推动生产力发展，就要正确地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是要按照生产关系本身的原则来建立。

生产关系包含几个方面：所有制形式，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

关系及分配形式。我们一定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从这几个方面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工商业方面，我们一定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国家所有，采取赎买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农业方面，我们一定要建立集体所有制，采取逐渐过渡的办法，由半社会主义形式进入高级合作社形式，使劳动者由个人私有逐渐过渡到集体所有。

社会成员的同志互助关系更重要，在农业方面我们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贫农、中农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这是符合同志互助关系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各集团之间，应该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剥削关系，而是同志互助的关系。

分配形式，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工业是工资制度，农业是农产品、劳动日的分配。按劳取酬制度应该作为我们建立合作社生产关系的很重要的原则。如果在分配上不能遵守这个原则，那我们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可能充分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中央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以后，到现在秋收以前，强调搞好分配，要使劳动者觉得分配公平合理。这样就可以发挥推动生产力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自流的，是要人去掌握的，搞得不好，对生产就没有刺激作用。哥穆尔卡说他们的合作社生产力没有单干的高，这就成问题了。苏联有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如果有这种情形，就要检查生产关系是不是很好地建立起来了，检查各方面是不是符合原则。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道理来看看中央文件为什么要强调自愿互利的原则，为什么强调分配，都是有理论根据的。

我们要善于运用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作用。要运用这种作用，就要善于正确建立这种生产关系。有的地方是形式上建立了这种生产关系，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这

种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如果建立得好，生产力就能发展。同时生产关系要巩固，也得要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关系也不能巩固。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的，是建立在生产力之上的。基础不巩固，上层建筑迟早要瓦解。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以后，要很快地抓住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能巩固生产关系呢？因为生产关系就是财产关系，财产的占有、分配关系。要能很好地占有财产，首先要有财产，财产要多，愈多愈好分配。占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生产力发展了，分配就多，分配多，积极性就高。农民，农产品多，分配多，就愿意参加合作社。资本家为什么锣鼓喧天地搞？这和中国的特点有关系，中国大资本家很少，中小资本家单干时所得不多，合营以后有固定工资，比他自己搞更稳固一些。我们也是利用这点来安排资本家，使资本家觉得各得其所，不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反的，拥护这种生产关系。所以毛主席说在合作化以后必须增产，必须比单干户高。

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生产关系。尽管生产关系的原则很好，可是生产力不发展，原则也是空的。所以一方面要利用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作用，好好建立生产关系，另外，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巩固生产关系。

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规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和发展生产力的。我们要注意到新的生产力的社会公共性质，这种原则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工农业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方面要求得平衡，由国家控制各方面的生产，使各个部分能按照一定比例配合发展。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是从生产力社会公共性质出发所产生的规律，生产力本身不产生这样的规律。我们在建设工作

中必须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就必须善于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来调节各方面的生产（轻重工业，工业与农业，农业中的粮食作物与技术作物等），相互配合，不能过分强调一个部门，看轻一个部门，而使我们成为联系很好的体系。掌握这个体系是不容易的。各部门中有矛盾，部门内部也有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要调节矛盾，使生产力的公共性质能充分发挥。好的国家计划的特点，就是这种计划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公共性质，可以把这个原则作为工作的指南针。

四、生产的第三个特征：社会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到自觉的变革的过程

首先，我们应该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把生产发展过程看做是物质的客观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认识不认识，不管人愿意不愿意，总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这种发展规律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在旧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有了新的性质，然后生产关系跟着改变。我们应该这样说，首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然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生产力总是在旧的生产关系中发生变化，有时可以在旧社会中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有时在旧社会垮台的同时产生新的生产关系。

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说得简单一点，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中产生。这个说法可以概括一般的情形，但不能概括特殊的情形。这里面有个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在资本主义中产生，都是在资本主义消灭的基础上产生。

这个过程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当人没有认识这个过程的时候，还是要进行这样一种过程，叫做自发的过程。如

果能认识这个过程，并根据这个认识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带有自觉性。

当然这个自觉性主要是劳动群众的自觉性。认识过程如果仅仅是少数学者的认识，不能变为群众的行动，还是没有生产力的自觉过程，这也是要注意的。这也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原则的一种表现。没有群众的自觉，就没有真正的自觉。生产本身就是群众的生产活动，群众就是生产的主体。

生产、生产力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一定要表现为人民群众行动的自发性走到自觉性。这种自觉，常常要通过少数人的认识，少数人认识了这个规律，经过宣传，逐渐变为群众的认识，产生认识的自觉过程。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先经过自发的过程，然后进入到自觉的过程。在社会主义以前人类的历史大部分是自发的历史，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是片面的。就是最高明的历史家，多半是认识政治表现、文化表现，对生产历史上的作用，以前的人不大认识，因此也没有人掌握生产规律的知识来指导群众，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所以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主要是自发的，就是带盲目性的。不是认识这个过程，去推动这个过程的发展，而是自然而然的活动。生产者不知道前途，指导生产的人也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生活是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经济。

恩格斯讲，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人类历史，只是经过了一个序幕，没有真正的人类社会。

过去生产发展的自觉阶段仅仅是在革命变革的时期。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有新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人民还完全处于自发状态，那就不可能知道应该把生产关

系加以改变，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它用物质、思想、精神的方法来努力巩固旧的生产关系。它用一切办法使人相信旧的生产关系是对的。在旧思想的广泛影响下，就会使劳动人民处于自发的状态，使劳动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跟旧的思想作斗争。到了应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时，如果不跟旧的思想作斗争，劳动人民就不知道应该起来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在社会变革以前就会有些先进人物提出一些先进思想向社会宣传，跟旧的思想作斗争，告诉人旧的生产关系是不对的，应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个新的思想一出现，就表现为一种思想革命运动，表现为新文化运动，这种新文化运动如果得到胜利，会使相当部分的群众自觉起来，懂得应该破坏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生产关系。

经过一个文化革命以后，就会产生人民的自觉的革命活动，这种革命活动就要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在政治上发生的冲突，一般是暴力冲突。完全没有暴力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的阶级是用暴力维持旧的生产关系。所以自觉的生产过程，一定要引起暴力斗争，引起旧的统治的垮台，新的政权的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要靠新的阶级政权来加以巩固，加以发展，生产的自觉运动一定包含一种思想变革运动，加上政治变革运动，加上新政权代替旧政权。

所以，现在只讲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完全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原则错误。有人说尼赫鲁的政权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不同意这个说法，说尼赫鲁统治下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的“八大”报告也讲到这点，资产阶级能够锣鼓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有绝对的必要。

所以，无产阶级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力量。它使生产由资本主义生产变为社会主义生产。自觉运动里的中心环节，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任务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但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为没有政权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

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也就是由和平的生产发展过程进入政治变革的过程。

在过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自觉过程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在社会变革时有一种过程，其次自觉的高低也有历史的限制。比如资产阶级革命自觉的过程比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自觉程度高一些。它有一套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有整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时期，所以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到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一定程度上利用规律指导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自觉性，越早就越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时候，奴隶的自觉性很片面，奴隶仅仅知道要打垮奴隶制度，不知道应该建立什么新制度。奴隶的领导者也是这样，奴隶的理想多半是要回到原始公社去，这是倒退的理想。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里，也有些以封建制度为理想的思想家。郭沫若的看法，春秋到战国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那么孔子就是这时的先进思想家，具有封建社会的理想。当时的人对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多少有些自觉，多少猜到了旧制度不对，看到了新制度的好处。郭沫若说，孔子的主要思想就是把人当做人，仁者人也，这表示要解放奴隶，但要维持等级制度。

原始公社垮台到奴隶社会建立，也有某种自觉的斗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描写了这种过程。奴

隶国家的产生，有代表奴隶国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出现。

过去的生产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不过程度不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生产的发展过程要成为充分自觉的。过渡完结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建设是自觉的，因为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有科学，不像从前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思想家，只有社会思想，没有社会科学。无产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规律全面掌握了，能够指导一切劳动群众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完成以后，又能够推动生产的发展、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应该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才进入了自觉的历史过程。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这就是说历史的必然规律能被人完全认识，人能掌握必然规律。所以应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不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一点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没有概括进去，但我们应该肯定这点，因为恩格斯讲了，我们是自由的王国。

无产阶级国家根据科学观点指导生产的发展、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我们认识清楚了新生产关系的性质，按照它的原则来建立。生产力的发展是认识了生产力的社会公共性质，有计划地来推动它的发展。很好地调节生产的自觉性就表现在国家的计划性领导上。

有没有自发地过程呢？不能说没有一点自发的东西。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自觉的，但在具体情况下也可以有自发的情形，因为人的认识总是落后于现实，主观反映客观，客观总是走在前面。生产过程里新的东西总是走在前面，人的认识总是走在后面一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好处，就是人能比较及时地认识新的东西。整个社会的自觉性并不取消意识落后于存在的规律。

因此我们的具体生产活动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新的生产力先产生了，然后领导才赶上去，从个别活动来看，仍然是自发到自觉。否认这点就会产生主观主义，好像人要怎样就怎样，国家要怎样就怎样。自觉性不能取消唯物主义的原则。社会的领导要经常注意赶上新东西的出现。比如新的先进经验怎样产生呢？多半是一个劳动者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它会不会变为自觉的，这要看领导。领导差一点，看不到新的东西，自发的过程就拖得很长，生产的发展就受到损失，领导好，就立刻加以试验、推广、研究，就会很快地把自发变为自觉，使生产力的发展更快一点。生产关系也是这样，农业合作化，三户贫农自发地坚持合作社，领导很快地抓住了这个典型，加以推广，就变为自觉的。

苏联小的集体农庄变为大集体农庄，往往是由一两个劳动者冲破这个界限，然后才变为自觉的。《收获》这本小说就描写了这个过程。最初是小块土地分散耕种，第一年用马拉农具，收割的时候，割倒以后，一群人在后面把它捆起来。第二年换了拖拉机，但仍然划成小块，仍然有界沟。驾驶拖拉机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开得很高兴，一面唱一面工作，结果拖拉机过了界限，他震动了一下，他说："管他妈的！"这样搞下去，农庄的人生气了，报告主席说，他太调皮了，把界限打破了，这怎样工作呢？农庄主席就问拖拉机手为什么把界限打破，他说打破界限一天能做四个劳动日的工作量。主席只好向大家解释：这样做效率提高了。这是自发的，一高兴就把界限打破了。在生产中，常常有有勇气的人不自觉地打破成规，好的领导就能及时把它变成自觉的。

我们国家在生产中要经常注意先进经验，要采用劳动者的合理化建议，这都包含有要善于使自发变为自觉的原则。

今后农村合作社、工矿企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

哪里？

这个矛盾就是新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现状的矛盾，不克服这个矛盾，生产关系就不能巩固，迟早要垮台。

这个矛盾又可以解释为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可能性和落后现实性的矛盾。因为新生产关系的特点，就是开辟了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可能性，启发劳动人民高度的积极性，这就和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发生了矛盾。

按照“八大”决议来说，就是人民要求建立先进工业，要使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就要克服生产力落后的现状，如果坚持落后的现状，就对人民的积极性泼了冷水，阻碍了积极性。

这里所讲的生产力，仅仅是讲生产力的落后现状，不是讲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发展的可能性是跟新生产关系一致的。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956.9)

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讲里分三个大问题来说：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

二、社会的上层建筑；

三、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内）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

首先要讲的题目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社会它是直接把生产关系当做自己的基础的。生产关系是生产的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决定社会的面貌、社会的性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是生产，是生产方式。可是对社会面貌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这就是说生产关系怎样，社会就是怎样的。生产力起不起决定作用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是，生产力不能够决定整个的社会性质、社会面貌。生产力是通过生产关系对社会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所以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生产和生产关系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里，生产力对社会是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对社会、对历史的发展是起直

* 这份讲课速记稿，讲得比较简明。讲课时间原未标明，大致和《生产发展规律性》一讲相同，中央党校曾铅印给学工人员学习参考。这次只做了少许文字加工。

接决定作用的。所以必须要弄清楚这一点。

生产关系对社会的发展起直接的决定作用，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能不能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呢？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生产关系才能够规定社会生产的性质和面貌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犯错误。提纲上讲到高度工业发展的国家为什么不一定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原因就在这里。

在俄国革命以前，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团体有这样一种论调：他们主张只有高度工业发展的国家，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如果生产力发展不到高度工业化的程度，这种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迟一些。根据这一种论调看来，只有英、美、德这些国家才有可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俄国跟中国就不能设想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第二国际中很流行。那时改良主义在工人政党中很流行。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俄国革命就无法解释，中国革命也无法解释了。中国的生产力现状是落后的，但我们一天天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如英国、美国，而德国只实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事实，就必然得到这样的结论：社会的改变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改变。不能够说生产力的性质怎样，社会的性质也就怎样。而只能够说生产关系怎样，社会面貌、社会性质就怎样。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得很高，有高度的工业化，可是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生产力是比较落后的（但这个落后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落

后到一点工业都没有。我们解放的时候，有百分之十的工业，而且很集中，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可是因为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就改变了。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可是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落后的农业国只是就现状来讲是暂时的情况，并不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生产力的性质不能直接决定社会的面貌，而只能起最后的决定作用。就是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一定新的形式，那么生产关系才跟着改变，社会也就跟着改变，但并不一定立刻就改变。生产力是对社会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所以过去我们旧中国有许多好心肠的人希望发展科学改造中国，始终没成功。辛亥革命以后有很大的一批人，现在在新中国工作的很多科学家，从前都抱有这种理想，但他们的理想没有成功。因为在旧中国，首先科学工业不能发展，就是科学工业发展了，生产关系不改变，仍然是不能发展的。科学工业救国论，现在就可以说得通，现在我们国家就需要科学工业，因为有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性质。这种科学工业救国论曾经被反动派所利用。虽然提出的这种思想是好的，但是蒋介石利用它使青年的思想离开政治，这样可以帮助他的统治。

在 1927 年以后，托派陈独秀离开了党，他有一种理论，就是根据生产力的性质来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这种理论曾有许多文章来为它进行宣传。我们党的理论界的人给了他们一些反驳。托派的理论主张中国的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占支配地位，1927 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以后的工作怎样呢？工人阶级的工作就是帮助资产阶级上台，上台以后，工人阶级再作合法的运动，争取民主选举，争取关税自主，在合

法运动中慢慢积累力量，然后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的理论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1927年以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统治制度。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那是根据生产力的理由来说明的。他们并不是说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很高了，而是说中国已经能够使用机器了。他们着重在新的工具出现这一方面。他们有这样一种理论：使用帆船表明封建社会，使用轮船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帆船是封建社会的标志，轮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中国沿海大江有轮船了，因此中国的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他们这种荒谬的理论认为，不但是生产力决定社会的性质，而且认为生产工具也可以决定社会的性质。他们不管轮船是谁的。我们中国的主要轮船所有权是英帝国主义的。甚至有一个托派搞理论的人曾经这样来叙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之所以能够进步，全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新的工具输入到中国来，使中国进步，中国的进步是依靠外来的力量。

我们党内当时搞理论工作的反对这种外来论。现代机器在中国主要是帝国主义所有，不能够决定中国社会本身的性质。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当然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为了帮助同志们了解历史，所以提一下。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判了雅罗申柯，他多少有一点论述生产力的思想。他这种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生产力理论。在他看来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国家、政府是直接作为生产力的组织者，好像苏维埃社会是直接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上，国家直接解决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关系没有什么作用。他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

力有矛盾，即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矛盾。但总的说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限度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产关系就应该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变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一个总的表现。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新中国的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标志着什么？我想也可以根据上面讲的来答复。中国将来生产关系的发展会慢慢落后于生产力。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将来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果到了那时生产关系不变，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可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没有到共产主义时代，也会有矛盾的情况。在中国合作化运动中，建立了以区为单位的合作社，这是冒进了。有的是一个乡建立一个合作社，但最方便的是一个村建立一个合作社。将来机械化了，技术改革了，以区为单位建立合作社也许就不困难，但也只限于平原的地方就比较方便一些，山区并不好搞。但一般来说那时如果还是以比较小的乡、或村为单位组织的合作社就显得太狭小了。这就说明生产关系会落后于生产力。现在是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将来由生产力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

雅罗申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就没有作用了。这是不对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是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的面貌也进一步地改变。就像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里说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社会的面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以后，它才会改

变。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对社会的性质起直接作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力是起最后的决定作用。

因此我们说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关系上面，不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力上面。这样，生产关系就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盖房子打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工人直接打桩的基础。基础的下面还有东西，还有地球。能不能说房子的基础就是地球？如果这样说就是笑话。房子的基础并不是地球，房子的基础是支持房子的那一块地方。生产力虽然是最后规定社会的面貌、性质，可是它并不是直接引起上层建筑的现象；上层建筑也并不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力上面。成为上层建筑的支柱的是生产关系。每一种社会都直接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础上。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所谓生产关系的总和应该这样了解：

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指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社会各个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前两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种意见认为所谓构成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指的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只构成一个生产关系。这种说法是每一种社会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作为它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以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基础是可以由几种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而不是由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总和构成的。一个社会的基础可以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的生产关系总和而成为带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对基础也应当具体地了解，不能够单纯

了解为一种社会只能够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照前一种说法，旧俄国的经济基础只能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封建主义不可能作为它的基础，因为它主要是帝国主义。按照这种意见认为占有最重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够构成经济基础。照后一种说法，主要的次要的同样都能够构成经济基础。

这两种意见哪一种比较对呢?我看还是后一种意见比较对。经济基础可以由几种生产关系总和而成。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有它的三个方面。我看这样一种看法比较正确一些。因为我们用理论解释社会生活不能够单纯化、片面化。理论是一个原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指导方向。我们解决问题要肯定它的复杂内容。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说，一个社会只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比如《资本论》是专门讲资本主义社会的，讲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那是在理论上讲问题是可以比较抽象、比较单纯来理解的。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分析问题就应该肯定这个复杂的内容，不这样就不能够解决问题。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面貌呢?你总得从它的基础上来了解，一定要肯定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是构成我们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不肯定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就不能够说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如果照前一种意见来看，旧中国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因此旧中国的性质还是封建的社会性质。这样，就不能说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为你没有肯定它的基础——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是旧中国的经济基础。既然把旧中国叫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那它就是建立在几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像旧俄为什么叫封建帝国主义？因为它不但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而且在它广大的农村里封建的生产关系还占优势。不肯定这一点，不肯定它的基础上的两重性，也就不能够肯定整个社会的两重性。其他像日本、德国这些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所以这些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首先还要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补课，虽然它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可是要革命还得先搞民主革命。

所以我觉得后一种意见比较正确，肯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可以包含几种生产关系类型。当然也有只有一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比如美国，它的基础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美国基本上没有经过封建制度，所以它是纯粹的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英国也可以这样说，英国很早将封建土地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形式，成为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了。

所以每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它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的，这一句话并不是解释为只有一种生产关系构成的。在俄国，旧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建筑在地主阶级上，另一方面建立在财政资本家上。财政资本跟封建地主阶级同时统治着旧俄国沙皇制度。蒋介石统治的政府，有封建地主的支持，同时又有官僚资本的支持。所以说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可以只有一种，但是也可以有两种以上。除了统治的生产关系以外，每一种社会它可以包含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或者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些可以不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经济基础可以有两种以上，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算经济基础。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所有大大小小不管重要不重要的各种生产关系，同样都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说也不对。比如我们中国大凉山就有奴隶制度。那里的奴隶主是轻视劳动的。奴隶社会奴隶参加劳动，奴隶主不参加劳动，轻视劳动。大凉山的

奴隶制度能不能就称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或者是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呢？在新中国来说它是残余，在旧中国来说也是一种残余。它是不占统治地位的。它是在一个小的角落里保持这种奴隶制度的。所以说这种奴隶制度不能够构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也不能够构成旧中国的经济基础。

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的社会里可以产生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如果不占统治地位，也不能够成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比如在旧俄沙皇制度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阶段。它跟西欧的英、法资本主义有联系，依赖于英、法资本主义。但它占统治地位，所以它跟封建制度构成为沙皇统治的生产关系。但是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如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旧资本主义制度，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关系已经形成，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因素，而且是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纺织工业里出现得很多。现在的荣毅仁家族的资本，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家的。这些民族资本主义在旧中国能不能够称为经济基础？这些资本主义在旧中国没有构成经济基础，构成旧中国经济基础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是受排斥的，没有占统治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占重要地位。所以民族资本主义没有构成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它只是一种新的经济基础的因素。那时虽然有了这种生产关系，但它不能构成新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对社会的作用问题应如何理解呢？

这个问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做了一些规定：经济基础是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

这一句话要解释。在苏联的教科书上有些解释，在康士坦丁

诺夫的书上也有过解释，我认为解释得还不很够。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就是指的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解释我觉得就不够了。这样解释对旧的经济基础的作用就概括不了，只能够概括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推动的作用。可是旧的经济基础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一种作用，旧的经济基础也会对社会有一定的服务作用，但也有破坏的作用，会破坏生产力。但对一些阶级来说，它也有服务的作用。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破坏的，对财政资本家来说是起了服务的作用。既然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就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经济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在生产关系里为社会服务，发展生产力可以同经济密切联系起来。但是单单发展生产力这一点来看，还不算经济。比如提高技术，不一定就是经济。经济要表现在分配上、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发展了生产力之后，生产力跟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联系，我们才把它叫做经济。

所以把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仅仅看做为了发展生产力这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真正接触到经济那个字。究竟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上起什么作用，生产力有什么用处，在生产关系里有什么用处，这种解释没有涉及。所以我想应该有所解释。

所谓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一种经济它能够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基础服务的目的受一定经济关系的限制，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经济，因为它服务的目的也不同。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来服务的。

所以基础不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经济目的的。这种经济目的是具体的。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

经济目的。经济基础就是满足发展生产力，满足一定具体社会的经济目的、或者叫做一定的社会需要的。所以不能够只看做发展生产力，而要看做发展生产力主要达到的目的这一方面，否则不叫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

所以各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不同的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总的原则上讲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但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在各个社会里有所不同。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什么作用，怎样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呢？

在原始社会里，当时的社会在经济上就有一个任务，就是需要维持公社社员最困难的生活。但是生产力很低，公社成员的生活很困难，需要有一定的与生产力发展情况适合的经济关系来维持一定的经济生活。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原始公社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维持和发展当时最低的那种生产力，同时使得生产的成品能够保证全体成员的最低生活，而且使当时的生产能够有发展的余地。当时社会为经济服务的目的是整个社会的，全社会的成员需要有一个共同服务的目的，就是维持全体成员最低生活，使当时的成员能够生存与发展。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它的所有制特别是它的分配制能够保证当时这种经济上的目的。公共所有制、同志互助的关系、平均分配，可以使得全社会的成员大致上不致饿死，大家都可以维持生活，而且有可能向前发展。

如果原始社会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没有这种同志互助关系的这种生产关系总和，如果它里面有剥削制度，它就不能够在社会生产力很低的条件下使全体成员生存下去。在生产力很低的条件下，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可以使全体成员生存下来，而且使社

会发展起来，这表现当时的生产关系跟生产力基本上适合。因为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基本适合，生产关系的总和才能够对社会有利，能够维持社会的生活，而且能够使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作用。

阶级社会里的情况与原始公社不同。在阶级社会里，在生产关系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剥削阶级。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出现一种需要首先满足剥削阶级的要求。因为它占统治地位，它就利用它的统治地位使社会首先满足它的需要。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利用它的统治地位要求社会首先满足它自己的需要。

所以，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服务的主要作用，首先是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它有一定的方法来满足它的需要，就是用剥削劳动群众的方法来满足剥削阶级的需要。剥削阶级是不劳动、不生产的。经济基础就是保证不劳动、不生产的阶级能够通过剥削方法来满足它的利益。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一般说来都有这样的作用。

当然，这种经济基础也要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需要。完全不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需要，劳动群众就不能够生存，不能够生存也就不能够生产，那么剥削阶级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所以这种经济基础，它一方面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需要，同时用剥削劳动群众的方法它首先满足统治阶级自己的需要。这种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能用这种方法来满足这样社会的需要，因为构成它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就是这样的。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以剥削阶级为主的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使剥削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从而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因此在分配上就有优先权。生产关系本来的性质是这样，因此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在分配

上的作用也是这样，即首先满足剥削阶级的需要，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再来满足劳动群众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

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这种作用，同时也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斯大林讲过："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34 页）以这种方法集中起来残酷剥削劳动群众的方法来满足财政资本的需要、满足最大限度剥削的需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讲得很清楚，这一个基本规律，也就是这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一种表现。

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就是：用经济外强制的方法来剥削农民以及其他劳动群众来满足地主阶级的需要。

奴隶社会也是这样，奴隶社会也是用一种残酷的经济外强制办法来剥削奴隶群众。把奴隶当做牛马来满足奴隶主阶级最大限度剥削的需要。

每个剥削阶级都有它最大限度的需要，而办法就是剥削这一个社会的劳动群众。所以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的这种作用，同时也是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在阶级社会里为统治阶级服务，也是这些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保证使生产力能够不断有所发展，也就是用高度的技术不断地把生产力装备起来，使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同时也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需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是跟阶级

社会不同的。在阶级社会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剥削阶级服务。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为全社会服务，像原始公社一样为全社会服务，而方法与原始公社不同。原始公社没有什么高度的技术装备。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使生产力不断用高度技术装备起来，使生产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全社会服务。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什么把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为什么把个体农民改造为集体农民？因为改造了以后，我们也就建立起来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们利用这个基础使它在经济上为全社会服务。资本主义如果不消灭，我们这个经济基础就不能够为全社会服务。经济基础就要有一部分为资本家服务。个体经济如果广泛存在，就不便于使经济基础为全社会服务。因为每一个个体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它为个人服务。他不轻易把粮食卖出来，搞不好他就不卖了。特别是高度的技术装备，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够实现，也不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使得能够在经济上为全社会人民服务，使得全社会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起来。没有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经济基础的改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我们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

我想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这个公式应该这样具体解释。这样解释的实际意义就很大，也比较全面一些。

根据以上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基础的作用是随着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不同的服务目的。如果经济基础只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那就太笼统了。这样的解释

是抽象的。每一个社会都能够利用，但不能够具体利用。可以这样说：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各个阶级社会有不同的经济目的，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是有阶级偏向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有阶级偏向。因为上层建筑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在阶级社会里，为什么政治上总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在经济上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就是属于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所以政治上剥削阶级一掌握政权，它就用政权巩固基础，使基础为它更好地服务。

所以经济基础如果不变，它的服务作用也不变。在阶级社会里，如果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根本改变，那么要想使这种经济为人民服务也就不可能。如果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能够想出一种办法使经济为工人阶级服务，它就是一种空想。在封建社会里，想找一种办法在封建制度下使地主得到利益，而农民也很好，使社会在经济上既为地主服务也为农民服务，这样的空想家是有的。中国的孔子——儒家——就有这样的理想。儒家有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想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使社会能够为全体人民服务。理想是很好的，但究竟是理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改良主义不对。我们不研究生产、不研究经济，我们也就觉得改良主义不好，因为我们是革命者，旧社会不经过革命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研究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以后，我们就进一步知道改良主义之所以不行，是在经济上决定的。如果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想在旧的经济基础上找到改变的方法使得它的经济服务目的有所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比如，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既为资本主义服务，又为工人阶级服务，这是不行的。

在英国流行这样一种改良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组织一些工人合作社，就能够改变工人的生活。

这叫做基尔特社会主义。其实这只能算做行会，不能算做合作社。英国工党里有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广泛组织消费合作社，通过这种合作社使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一种思想是完全破产了。实质上，这种改良主义的合作社，是代表工人贵族，代表资产阶级化了的少数工人的思想。这些人生活的提高，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真正为工人阶级服务了，而是这些人是被资产阶级收买了。

所以要使社会的经济能够为全社会、为全体人民服务，就必须改变决定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变，而想使社会的经济能为全社会服务那是不可能的。要资本主义和平走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工党是想从资本主义走入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以为煤矿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哪个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资产阶级的国家，得到的利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是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服务。只是最大的资本家企业是由国家代他经营的，利息仍然是资本家的。尼赫鲁也是搞国家资本主义的。他在国际和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在国内欺骗人民，把当前的印度也叫社会主义。实际上它是和英国类似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是通过国家首先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在世界上许多人看不清楚这一点，认为印度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高士写的文章就揭露了这一点，它并不是真正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因为它这个国家的制度并没有改变，它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不可能为工人阶级服务。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幻想，即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点。资本主义要长入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条件下，才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改造为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

的领导下也是要经过斗争的。在中国，要经过“三反”“五反”的对抗斗争。而斗争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就是和平的道路。我们这种和平的道路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也是经过斗争的。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革命的改造，然后才能变为社会主义。

中国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简单一点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区别不大。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仅仅看做民族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就没有。但中国过去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有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带有一半资本主义这种性质的社会。

所以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过渡以前这里面就有资本主义，但不单纯是资本主义。

蒋介石的政权算不算资产阶级的政权呢？

蒋介石的政权是四大家族的政权，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它又和封建地主相结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写道：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是它的经济基础，那么它的政权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它就是四大家族、大资产阶级。不能够说蒋介石的政权仅仅是封建的政权，不能够说它仅仅代表地主阶级。

所以我们的过渡就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讲一般的原则时不必说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封建是经过民主革命打垮了，我们主要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封建主义不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可以撇开封建主义这一方面。实际上革命是两个阶段，民主革命把封建打垮了，然

后是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就讲到这里。

二、社会的上层建筑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直接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和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所以上层建筑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社会结合的特点，就是直接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和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

上层建筑这一种社会结构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

它主要包括一些思想意识形态、及政治法律等制度。那么这些政治法律制度是体现了哪些意识形态呢？意识形态不能够平行存在，它是寄托在政治法律之内的。所以意识形态和法律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统一结构。比如艺术这个东西，它有艺术思想、艺术观点，可是艺术观点要表现出来，它就要寄存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要有一个文学团体，一个出版社。政治法律思想体现在一定的法律政治制度里面。所以上层建筑是包括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跟这个观点相适应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这些东西：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主要是指它的观点，而不是指它的许多材料。有些材料并不一定就是上层建筑。比如，艺术材料不一定是上层建筑，艺术观点是上层建筑。像音乐作品不一定是上层建筑，绘画不一定是上层建筑。有些东西是有永久性的，如齐白石的画，从前的人觉得好，我们也觉得好。上层建筑主要包括一些阶级意识观点。社会的观点带有主观性。凡是反映客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上层建筑。齐白石画

的虾，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客观的东西，只要反映正确，永久是生动的。所以上层建筑主要是跟这些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一些观点。这里面没有科学。马克思和斯大林在讲上层建筑的时候，都没有讲到科学。我们应当注意，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它不是主观的反映，所以它不是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直接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是依靠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经济基础如果发生变化的时候，上层建筑也就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这算是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规定的。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最后一段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话：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是依赖于经济基础的。这个公式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讲得比较简单一点。他说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当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的时候，然后它的上层建筑也就随着变化和被消灭。当新的基础产生的时候，它也就会产生新的上层建筑。这样讲比马克思讲的精密程度差一点。斯大林讲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就跟着变化，新的经济基础产生，上层建筑就产生，经济基础消灭，上层建筑就消灭了。这样讲，有些具体情况就不能概括。比如说：基础消灭了很久，像宗教这样的上层建筑并没有消灭。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这么久，宗教并没有消灭。但还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上层建筑就建立起来了。比如中国的革命，先把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然后再来建立基础。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产生而产生，随着基础消灭而消灭，这个公式一般说是

对的。如果概括起来说，还是马克思说的好一点，即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上层建筑有的在基础变化以后很迟才发生变化，有的也会很早就变化了。

总之，上层建筑总是产生并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比如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是氏族集体所有制，氏族成员的互助关系以及平均分配的共有制度。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有宗教、艺术、道德的观点以及各种民族的制度。原始的宗教、艺术是反映这样的制度，并巩固这种互助关系的集体所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的。原始的宗教把这种制度当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社祖先规定一些习惯、规矩，把这些东西都看做是神的规定。比如说他们把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同志的互助关系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的本性也体现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同志的互助关系。原始的艺术是反映生产的，比如跳舞、唱歌综合在一起，表现了他们的生产、打猎的互助关系等等。图腾思想就是一个氏族的标志，他们把某一种动物看做是一种祖先。这种图腾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某一氏族崇拜某种动物，就把这种动物当做它的祖先。图腾的对象是偶然决定的。某一氏族以熊为祖先，或者以鸡为祖先来巩固它的生产关系。同一个氏族的人，有同样图腾的标志，它身上画一些花纹，有了共同的图腾、同一的花纹就表示是一个氏族，要互相帮助，建立同志互助关系。氏族上面有部落。氏族制度跟图腾是分不开的。图腾是氏族的标志。氏族是同一血统为单位的标志，婚姻只能够在氏族以外，氏族之间可以通婚。氏族制度本身决定了它的生产力的规模，所以生产力很低。氏族只能以血统为单位，扩大了，生产力跟不上，生产力不能够维持。生产力规模小，社会组织的规模也比较小。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只有以氏族

为单位的共同生活是比较适合那种狭小的生产力规模及那种生产关系的。因此，原始公社只有这样一些东西：原始的宗教、艺术、道德、图腾思想。原始公社当时没有政治法律制度，因为没有统治阶级。如果要用政治法律，那么它的习惯就是法律。这些习惯在领袖人物的头脑里记住了，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是跟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有关，这是由于他们生存的需要。因为生产力很低，如果不是坚持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够生活下去。原始公社一个人离开公社就不能够活下去。这一种制度的保守性很大，因为这种制度是跟生存密切联系的。所以当时的道德、宗教观点以及氏族制度都把这种生产关系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阶级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又是以道德习惯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在原始社会里不需要加在社会上的政治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

在阶级社会里，除了宗教、艺术、道德以外，有政治法律观点以及政治法律制度，还有哲学。哲学在原始公社里，可以说是没有正式的表现形态。正式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在原始公社是不存在的。原始的宗教、道德观点包括有哲学的因素。有神论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因素，但不是唯心主义哲学。一切东西都有灵魂，原始社会万物有灵的观点是后来唯心主义萌芽的基础。原始公社的上层建筑一般来讲没有什么正式哲学思想，只是宗教的观点里有这种哲学思想的因素。在阶级社会里有哲学的思想，所以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宗教、艺术、道德以及适合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国家以及政治法律制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上层建筑在思想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是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主要上

层建筑。除了这个思想方面的上层建筑以外，还有跟思想方面的上层建筑相适合的工人阶级的政权。上层建筑的政权、思想观点加上适合思想观点的政治、法律制度，成为总的上层建筑。

基础跟上层建筑的关系，首先是有经济基础，然后有反映一定阶级的思想观点，通过思想观点又产生出一定的政治法律。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这样的：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些前提条件，这就是工人阶级与大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没有出现，它就不能够首先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发展成熟了，它跟生产关系发生了主要矛盾，这就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反映了工人阶级思想的科学观点。工人阶级按照这种观点，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就使工人阶级成为政治化的组织。这种组织推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然后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工人阶级政权。

工人阶级有了政权，就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工人阶级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立刻就建立自己的基础。一般来说，社会主义的基础跟它的上层建筑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用工人阶级取得的胜利掌握生产机器。革命一方面掌握政府机关，一方面掌握银行、铁路、军火、工厂。所以大体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同时产生的。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革命里，新的上层建筑比较基础完成的快一点，因为它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够建立经济基础，政权如果掌握得不好，那么基础也不好建立。

说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没有基础就能建立起上层建筑，这是不大符合事实的。上层建筑建立的稍微早一点，上层建筑的时间比较快，基础建立的时间比较慢。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的基础和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差不多是同时的，不同时建立是不可能的。

巴黎公社就有一个错误，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工人阶级没有很快地掌握银行，没有很快地去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掌握了政权就迟疑了，这是一个错误。以后俄国革命时，首先是掌握政权，但同时把银行、经济机关很快地抓到自己手里。没有一点基础，上层建筑是站不稳的。没有基础，上层建筑不成其为上层建筑。在新中国解放城市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进城就掌握了政府机关，同时也接收了经济机关，首先是银行，不把它掌握在手里那就很困难。

所以上层建筑是决定于基础的。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完全没有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

现在讲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

矛盾是有统一性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的，但是有统一性，是互相依赖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为基础服务。

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讲道："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学和其他的观念替社会服务，并且替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5页；又见：《斯大林文选》，第544页）他这只是一般地讲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而不是讲为一个社会服务。具体地讲那就是原始公社的上层建筑是为当时的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阶级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上层建筑怎样为基础服务呢？主要是帮助基础的巩固、帮助基础的形成。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没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这个基础也不能够巩固，也不能很好地发展形成起来。

原始公社如果没有它的原始道德观点、宗教观点，那么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就不能够巩固。这种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志互助关系，是不能违背的，违反就要受到惩罚。

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有阶级的偏向。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它的经济基础虽然是腐朽了，它的上层建筑还可以帮助它维持下去。比如美国和英国都是这样。按照它的经济基础来讲，是可以垮台的，因为它的生产力很高，在经济方面它的生产力比苏联还高，苏联是两三千万吨钢，美国一万万吨钢，人口比苏联少一点。美国钢的生产力是很高的，而所有制是少数资本家的，是很狭小的。原子能是一种很好的生产力，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很好地用于工业上。因为如果把原子能利用到工业中去，就会使资本家的利润减少，所以只能用到军火生产上去。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它的上层建筑比较坚强，生产关系就还没有垮。

说它们的上层建筑比较坚强，这主要是指在思想意识方面它们统治的比较强。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观点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很大。我们看一看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苏联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巩固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来说本来是很好的事情，美国有一些工人认为这是坏事情。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消息：当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美国工人曾拒绝搬动苏联的货物，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改良主义的影响很大。在思想上旧的东西相当巩固，所以美国的共产党不够发展，恐怕只有十几万人。美共曾受到白劳德的挫折，在克服了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后才有所发展，但最多不过十几万人。一万万多人口的国家共产党人只有十几万人，这说明工人阶级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大。资产阶级不但用军队、法律来统治人民，而且还用思想来统治人民。思想统治有时候比物

质统治还厉害一点。美国共产党对苏联问题的看法都有些混乱，究竟苏联出兵对不对，他们内部不很清楚。当然最后还是会清楚的。

至于另一方面，物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在美国是比较巩固的。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军队没有受到挫折，相反的，它发财了。统治者有钱可以收买劳动者，同时它在国家暴力方面有力量可以维持。所以上层建筑比较稳固，是由于在物质方面、思想方面，劳动者都被它麻痹了。劳动者不能够起来革命，所以革命不能够实现。因此，要想推动任何一个革命，就要先进行思想革命。推翻旧的上层建筑在思想上的统治，新的思想建立起来，才能使新的革命组织如工会组织成立起来，再来发动和组织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英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工作很艰苦。我们中国不同，旧的统治很腐朽，不仅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很尖锐，同时旧的上层建筑也很腐朽。俄国的沙皇统治已经引起各民族的痛恨，所以各民族对它的制度没有一点幻想。在思想上，俄国有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宣传，后来又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有一百年的革命宣传，使得旧的思想旧的封建专制在人民中完全破产了。沙皇军队又腐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败仗，前线受到很大的挫折，后面就不稳。1905年的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日俄战争俄国被打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的，在东普鲁士战场上，十几万人被俘虏了。我们中国的情况更清楚了，统治者一百多年的丑恶面貌在人民中完全暴露了。广大人民对它没有一点幻想。蒋介石是罪大恶极的仇人，所以人民的解放战争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军事力量的建立使它的军事力量垮台了。上层建筑垮了台，经济基础就维持不住。

所以尽管生产力发展很高的国家，按照经济基础来看，它的

革命条件已成熟了；但按照它的上层建筑来看，它还没有到直接革命的时候。因为直接革命的形势是人民不愿意照旧被统治下去了，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在美国，许多劳动人民没有觉悟，可以生活下去；上面也有力量统治下去。所以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作用是很大的。一个落后的国家尽管落后，如果它的旧的上层建筑瓦解了，生产关系还是可以改变的。有了新的生产关系才可以有新的上层建筑。说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的那一种理论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新中国胜利以后，还要巩固我们的上层建筑，运用我们的上层建筑来巩固我们的经济基础。在我们国家胜利以后，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要加强我们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都屡次指出政治、法律工作的重要、上层建筑工作的重要。在我们新的国家里，有些人认为国家好像很重视经济工作，因此搞政治、法律工作的人就不安心。过去曾经批判过这种思想。如果政治工作搞不好，经济基础是不可能巩固的。经济工作中有违法乱纪的，就靠政治、法律工作去监督检查才能解决问题。

思想工作也是上层建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新中国的思想工作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发生许多错误。像匈牙利事件、波兰的波兹南事件，都是上层建筑工作没有做好。在这方面群众的思想那样混乱、敌我不分，这是新的上层建筑方面有缺点。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在上层建筑方面要反对客观主义，要反对敌对思想。对旧的上层建筑、旧的政治、法律残余要加以反对，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

上面我们首先讲到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随着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要或迟或

早的变化。第二，上层建筑对基础有它的反作用，它能够帮助基础巩固和形成起来。第三，上层建筑是指跟基础相适合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观点以及各种政治法律制度。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意识及政治法律制度不是当前基础上的一种上层建筑。这些东西有些是过去上层建筑的残余，有些是将来上层建筑的萌芽。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合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也还可以有封建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残余。比如，英国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它的政治法律制度里就有封建制度的残余，有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有爵位（像艾登这些人都是有爵位的），有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日本、法国也有这种情况。这些就是封建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残余。这些残余被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所吸收，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结合起来，帮助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时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工人阶级政党。这些能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呢？不能这样说。只能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了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因素。

所以，上层建筑仅仅是指正式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中成为上层建筑的仅仅是指跟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些社会意识形态观点以及政治法律制度。有一些思想意识观点，政治法律制度不是跟当前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而是旧经济基础上面所遗留下来的上层建筑残余，这些不能算做当前的上层建筑。我们新中国有封建思想，这种封建思想不能说是新中国的上层建筑。苏联有宗教，也不能说这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些都是旧上层建筑的残余。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旧社会的上层建筑为什么能够在新

社会留下来呢？

原因就是上层建筑虽然是跟着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可是它的变化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先有经济基础，然后才有上层建筑，或者先有经济基础的各种因素，然后上层建筑的因素才会产生。先有无产阶级和大工业出现，然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出现。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原理的正常表现。如果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消灭以前消灭，那就违背唯物论的原则了。或者说上层建筑能够在经济基础产生以前产生，那也是和一般唯物论的原则不相符的。因为我们讲过，工人阶级的政权多多少少比上层建筑出现的早一点。但是，严格地说来，也是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而且工人阶级政权要成为一个上层建筑，就要建立起经济基础，如果不建立起经济基础，这个上层建筑就是空的，就是不稳固的，要垮台的。

所以，每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指跟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应该跟旧上层建筑的残余以及新上层建筑的因素加以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苏联有一种新的意见。这种意见还不能肯定它已经是结论了。有一个卡马林同志在《哲学研究》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同一个社会里可以有两种以上的上层建筑。按照我们上面的讲法，同一个社会里正式的上层建筑只有一种。除此之外，都是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或者新上层建筑的因素。按照他的说法，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新上层建筑的因素都可以叫做正式的上层建筑。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那么就要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跟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比如，美国政府所宣传的一套思想观点，那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但是除了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之外，美国还有一般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各样的上层建筑。这个资本主义

社会的各种上层建筑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包括工人阶级政党。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有无产阶级上层建筑，其中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是占统治地位的，是政府所支持的统治阶级的观点。还有一些不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那就是工人阶级政党以及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说法，同一个社会就有两种以上正式的上层建筑，不过其中有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

这种说法现在还不一定就是结论，我们现在不把这个说法加以肯定，因为这种说法对某些问题就不好解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那么无产阶级这个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可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已正式存在了，这样就不好说明，而且也不符合唯物主义的原则。因为经济基础根本还没有形成。不能说有无产阶级就有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为它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同志互助的社会主义关系不存在。这种生产关系不存在，就不能说这种基础已经存在了。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一种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说无产阶级这种同志互助的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上层建筑，这就很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来加以解释。所以，这个观点我们暂时不肯定。我们还是认为每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跟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合的这些意识形态观点以及政治法律制度。此外，就是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或者新上层建筑的因素。

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同一种经济基础上面，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才是它的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消灭了，那么上层建筑也就要消灭。可是在旧社会里可以产生新上层建筑的因素，这

种新上层建筑的因素跟现有的正式的上层建筑进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就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思想观点、资产阶级政权进行斗争。这种新上层建筑的因素跟旧上层建筑斗争的结果，可以推动旧上层建筑崩溃，从而也就帮助新基础的形成。上层建筑总是跟当前的基础相适应的，当前的基础如果崩溃了，上层建筑也就会崩溃。问题是旧上层建筑的完全消灭要迟于经济基础，旧经济基础完全消灭了，但是旧上层建筑在新社会里还要长久地存在。每一种社会里，它可以有旧上层建筑的残余，同时也有新上层建筑的因素。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新社会成立之后，我们还要注意到跟旧上层建筑进行斗争。就是旧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垮台了，完全没有了，可是还要注意到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还在起作用。因此，上层建筑的斗争应该长久一些。旧基础已经消灭了，如果不注意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进行斗争，就会妨碍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所以，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把封建的经济基础完全消灭了，另一方面也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消灭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以后还要完全、彻底地消灭。消灭这个基础之后，我们有相当长一个时期跟资产阶级各种上层建筑残余，跟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所以，在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不能简单地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停止，必须要坚持跟旧上层建筑残余进行斗争，也要注意到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如果不注意这个斗争，如果希望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都是错误的。对待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进行斗争，那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如果希望一个斗争就完全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打倒，那就是过分的冒进了。

现在这个斗争还在继续。我们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这

个斗争就继续不下去。因为哲学问题，科学问题都需要通过细致的、理论上的判断过程才能解决。唯心主义可以有各种形式，有些唯心主义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没有“百家争鸣”的办法使各种意见提出争论，那么也可能假唯物主义就占了统治地位，真正的唯物主义反而会被带上一个帽子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们经过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提出“百家争鸣”的办法，经过这些迂回曲折的办法来跟唯心主义进行斗争。这也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先是进攻，然后通过迂回的办法，最后达到进攻的目的。不是这样就不能彻底进行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因为一个进攻之后，有各种唯心主义就用种种办法隐藏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开放一点自由，不让各方面展开争论，就没有机会对真正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百家争鸣”实际上是反对唯心主义的一种艺术。

这个话在我们党内这样来讲，如果跟民主人士这样讲，他听起来就不顺耳。他说：你这个“百家争鸣”是让人家露出来头再来打。但这是一种误会，因为民主人士中间也可能有唯物主义思想，我们要“百家争鸣”，也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好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黑暗面。我们讲马克思主义，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把唯物主义变成教条主义，党外人如果掌握材料，就能够提出一些好意见，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唯心主义反掉。所以，用“百家争鸣”反对唯心主义，不是反对哪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用这种办法是批判各方面的各种唯心主义。

由于一个社会除了正式的上层建筑之外，有旧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所以我们要注意跟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进行斗争。解放以来，我们一直是进行斗争的。但是这种斗争不能冒进。所以一方面要反对投降主义，一方面又要反对急躁冒进。

最后上层建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层建筑跟生产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基础来跟生产发生联系。生产发展要影响上层建筑也是通过基础来影响。我们开始时就讲过：生产力不能决定社会面貌，直接决定社会面貌的东西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社会的面貌主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面貌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的特点。

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社会面貌。如果从生产力水平来说，美国的生产力够得上社会主义水平，但是它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上层建筑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它的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美国这种生产力如果要使上层建筑改变，首先它应该引起经济基础的改变。这种高度的生产力应该通过无产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破，然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反过来说，上层建筑对生产的影响也是通过基础。上层建筑首先巩固经济基础，然后这个经济基础按照它自己的作用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比如，美国的上层建筑都是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按照它自己的途径为社会服务，或者按照它的基本经济规律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经济基础的支持，经济基础提出要求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所以它按照这个方向来发展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是直接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通过基础来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好像这个原则不明确。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国家直接规定五年计划，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就直接影响生产力。

经常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不仅在中国有，而且苏联也有人提

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有的人给予肯定的回答。比如雅罗申柯就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不需要通过基础，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意义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的人企图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提问题的人好像就觉得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此我们就需要解释一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作用于生产也是通过基础。首先，不能把我们的五年计划看做仅仅是生产的计划。当然主要是发展生产的计划，但是不能看做是单纯发展生产的计划。在我们的计划里，都有关于改变生产关系的计划，或者是调整生产关系的计划。比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包括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农业的计划。这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完成了，小农经济的改造也完成了。我们的计划中还要注意到分配问题，至少这一点在计划里永远也不能没有的,那就是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完全消灭了，我们的计划中就要规定努力去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来提高人民的生活。那么，从实质上来说，我们计划中总的方针、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任何时候，社会主义社会里计划中的指导方针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计划不能违背规律。计划一定要用高度的技术来装备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不断发展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所以，任何时候社会主义计划中的总路线都是有目的地发展生产的路线。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的分配。

如果我们抛开这个目的单纯讲发展生产行不行呢？

如果抛开这个目的单纯讲生产就是盲目的生产，没有目的的生产，这样的生产跟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很小。当然资本主义的生产仍然有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得到最大限度

的剩余价值。没有目的是不可能的。计划总是要有一个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要有一个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一个计划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制定的，这个目的就体现了经济基础，体现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就是分配，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一个分配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人的同志互助关系，也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

所以，我们的计划是按照基础的性质，根据基础的特点来定的，不是撇开基础来定计划。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里面有具体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按劳取酬。社会主义的分配办法，这些都应该规定在计划里。

如果我们的计划里没有这些方面，那么计划本身不仅是盲目的，而且这种计划如果拿到劳动群众中去，也不可能很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劳动人民看到计划时也考虑到分配问题。如果这个计划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单纯要工人、农民发展生产，那就要出很多问题。有一些国家，像匈牙利、波兰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从理论原则来说，我们可以归结为生产计划没有考虑到基础的问题，没有根据基础的要求来考虑生产计划。他们没有注意到发展生产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里发展生产。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要正确地使计划适应于基础的要求，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主要是没有注意到分配问题。他们强调发展重工业，强调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忘记了发展工业，发展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样就不能刺激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反而会破坏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至引起了波兹南事件。如果正确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来从事我们的计划工作，这样就不会发生问题。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问题，也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可以直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好像政府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看法，是一种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错误看法。我们定计划时要考虑到生产关系的特点。违背了经济基础的要求，计划就会落空。

上面关于上层建筑的一些特点讲完了。这些特点都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讲到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这本书一般还是好的，就是讲到爆发与逐渐过渡有些问题，把质变只归结为两种，太狭小了。另外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规定有些不精密的地方。比如说，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这样的提法不够精密。除此之外，其他原则都是好的，不过他自己没有论证，所以我在这里加以解释。

现在讲关于上层建筑的各种特殊性问题。

这里主要是讲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即各种意识形态怎样表现为上层建筑。这些意识形态就包括政治、法律观点、道德、宗教、艺术、哲学这许多社会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有各种各样的特点。

先讲政治法律观点和各种政治法律制度。

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直接用来进行统治的一种思想工具、物质工具。这种思想工具就是政治法律观点，这种物质工具就是政治法律制度。这种物质工具是体现了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上层建筑对统治阶级来说，有直接的服务作用。

法律是什么东西呢？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每一个阶级社会的法律都表现了这个统治阶级的意志。

政治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的关系。

政治法律是统治阶级统治的观点，它要统治谁、联合谁这就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就是统治阶级要怎么样来进行统治，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统治。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是直接反映基础，同时又直接为基础服务的。基础本身就在经济上为一定的阶级服务，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法律观点直接反映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观点，直接来为这个阶级服务，也就是直接来巩固这个基础，来帮助基础形成。用什么方法来巩固基础，来帮助基础形成呢？那就是用政治法律观点，用政治法律制度这种物质力量来巩固基础。

我们新中国的政治法律观点，就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治观点，就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现。在我们的政治法律观点里就规定了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工人阶级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意志，这一点就表现在我们各种具体的法律里。如果有违背我们意志的行为发生，我们的法律就要去制裁。

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依靠国家的强力来作后盾，它始终带有强制性。宪法规定之后，我们法律里就包含着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我们要实现这个观点，而且一定要实现，如果有人没有实现这些观点，那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以国家强力作后盾的。违背我们政治法律观点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就一定要反对。

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这种上层建筑，是直接和经济基础联系的，因此它的寿命跟经济基础差不多，也就是说，大体上是跟着经济基础的产生而产生，跟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比如，旧社会的那些政治法律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地要

把它消灭，对这种旧政治法律观点的消灭比宗教快得多，比消灭旧的道德观点也快得多。旧的宗教、道德观点遗留在新社会的时间很长，政治法律观点也要遗留一个时期，但总要比较快地消灭它。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次司法改革运动，比较快地消灭了旧的政治法律观点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现在完全消灭了，因为现在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人参加我们的工作，所以这种思想影响还是存在。

在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这种上层建筑里，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永久的东西，就是说新社会的无产阶级从阶级社会的政治法律观点中可以吸收的东西不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收的。我们对旧的国家制度加以彻底的粉碎，它的政治法律观点我们也要完全加以否定。这也不是说绝对的否定，因为旧的政治法律观点中，统治阶级为了自圆其说，它就要隐蔽阶级统治的面貌，不能露骨地把剥削阶级的面貌公开地暴露出来，它要采取公平合理的面貌出现。还有些政治法律学者在主观上觉得应该使政治法律成为公平的东西。因此，在旧的政治法律观点里也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利用。在旧社会用公平合理的这种假象来欺骗人民，可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过来。他说法律不允许人压迫人，不允许有不公平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利用。

也还有这种情况，有的旧政治法律观点曾受到人民斗争的影响，这些也可以被我们利用。这就是统治者在规定法律的时候，由于人民的斗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能不有所让步。因此，旧的政治法律观点也有一些个别的东西能够体现人民的要求，这也是可以被工人阶级所利用的。我们以后学习《资本论》时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英国工人因为有了比较长期的斗争历史，英国在1830—1840年间就有了宪章党运动，这时就有了工人阶级

的政治斗争。由于工人起来斗争，统治阶级就规定了工厂法，在这里面，规定厂主对工人的剥削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乱用童工，不能随便延长工作时间，不能乱扣工资。统治阶级为了延长和稳定它的统治，为了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做了某些让步。所以，英国的工厂法就反映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要求。

所以，总的来说，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来制定法律，但是这里面也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这样对工人阶级多多少少就有利，工人阶级就可以利用。现在世界人民讲和平，这是人民的运动，但资产阶级统治者中也有反映。艾森豪威尔也不能不讲和平，今年他的选票比较多，原因之一是他抓住了和平的口号，表面上主张和平。他本来是要搞战争，但由于人民和平的要求这样高，他不能不表面上来讲和平。这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中有它片面的东西可以被我们所利用。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法律制度这种上层建筑对新的阶级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吸收的东西。但是，有个别的东西可以被利用。总的来说，我们要把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观点根本推翻，把它跟国家一样打碎，只是利用它极个别的东西。

现在讲道德。

道德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各种行为的规范。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一定阶级的行为的规范。所以，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它会有不同的道德观点，会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在阶级社会里一般总是有对立的道德观念。统治阶级总是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是最好的道德行为；但是在被剥削阶级中就把财产公有看做是最好的道德。我们旧中国的下层社会里讲义气，这就是要互相帮助，在财产方面要互通有无。这种道德观点跟统治

阶级的观点不同。这种义气在统治阶级中间是没有的。统治阶级专讲利害。统治阶级讲仁义，但是那是表面的东西。

每一个社会有每一个社会的道德观点，每一个阶级有每一个阶级的道德观点。真正的道德是什么，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是好道德呢？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样看呢？

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道德时，是按照历史观点来观察的。列宁在《青年团底任务》这篇演说里讲到什么是道德。他说：道德就是要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准，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按照历史观点来看道德。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观点，如果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道德，就要根据当时的条件来看。某一个阶级的道德观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进步的，有推动人类生活向上的力量，这就是比较好的道德。

共产主义道德在阶级社会里还是有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在无产阶级出现之后有的，是集体主义的道德，没有任何个人主义观点。这种道德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对过去的历史人物我们就不能用共产主义道德去要求他们。比如，宋朝的岳飞跟秦桧进行斗争，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他这种道德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点，它的目的是想要维持正统的王朝。岳飞和秦桧比较起来，岳飞的道德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他的观点能推动人的生活向上，不是使人堕落。他的行为长久地成为人民的一种典型，经常鼓舞着人民。所以，这就是一种比较高尚的道德。但岳飞没有一点共产主义道德，相反的，他有消极的一面。他为什么自己牺牲呢？就是因为有消极的一面在影响着他，如果他对皇帝有反抗的勇气，坚决反对下去，他就不会死。可是，在坚决抵抗侵略者这一点来说，他是高尚的。所以，我们用历史观点来看历史上某一些人的观点，

看他是不是对人的生活有向上推动的力量，如果是这样，就是好的道德观点。如果他的道德观点使人的精神腐化，这样就不好。

在过去的历史上，尽管是统治阶级里面的人，我们还可以分成正派人和不正派的人。岳飞就是正派人，秦桧就不是正派的。是不是正派的，就看是不是有比较高尚的道德观点。“三国”上的关云长这个人有弱点，但是为什么老百姓崇拜他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些道德的因素能够鼓舞人民。还有刘备，他始终一贯，被曹操俘虏之后，找到机会又跑回来。这里面不是没有缺点，如果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讲，缺点很大，被敌人抓去，又给敌人做了一些事情，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在从前来说，这样的人就很少了。“三国”里面那样多的人物，能够有他这样始终一贯的人就很少，多半是变来变去，被谁抓去就投靠谁。

道德跟政治法律观点有些不同。政治法律观点是依靠国家的强力来做后盾，带有强制性；道德观点它是依靠习惯来维持，依靠舆论来巩固。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不需要政府来审判他，周围的人就会审判他。秦桧做了坏事情，没有哪个政府惩罚他，但是几千年来老百姓的舆论惩罚了他。这个惩罚就是在岳飞坟前铸了一个秦桧的铁像跪在前面，老百姓路过就撒泡尿在他头上，这比法律上的惩罚可要厉害得多。

德国有一个诗人叫海涅，他做了一些诗骂专制的皇帝。他说：你这个皇帝不要高兴，你做了很多坏事情，这里没有人惩罚你，没有比你更高的一个政权来惩罚你。但是我这个诗人要惩罚你，我把你关在我这诗的地狱里，用我的诗句来咒骂你。在诗的地狱里，你永远也不能翻身，永远都有人知道你的丑样。像秦桧就是被关在文学的地狱里，永远不能翻身。

道德是依靠舆论来维持的。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方面

依靠政治法律来巩固它的统治，巩固它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依靠道德观点来巩固生产关系。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要宣传共产主义道德，要用共产主义道德来巩固我们的生产关系。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在舆论上造成一种反对个人主义的浓厚空气，使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成为人民普遍的舆论。这样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比较有利。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青年中用了一些力量来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但是还不够，因为在青年里面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影响的，一直到现在还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道德是阶级的，但是道德它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即正义的观点。各种不同的阶级道德中间，也往往有些共同点。所以，道德观点里也有一些普遍因素可以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永久性。比如，岳飞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屈服的这种精神，在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里是封建道德。但是这个封建道德里有对侵略者不屈服的这一方面，这一点就带有永久性。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讲，它有消极的一方面，但是它积极的方面我们也要肯定。所以，对历史上的道德我们要有分析地来看，不能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原封不动地接受旧的道德观点，不能把岳飞看做是我们理想的人，我们应该肯定它积极的一方面，指出它消极的一方面，但是不要一笔抹杀。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上说的：不要好就一切都是好的，坏就一切都是坏的。

我们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应该是过去的人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各种道德观点的综合。所以，我们也能够汲取过去历史上人们中间一切好的行为。一切精华我们都可以汲取，并且加以发展，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继承性。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才有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但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要成为一个体系，就

要适当地采取过去人们认为的确有积极意义的某些行为规范。比如，对侵略者不屈服，过去也有人讲和平，为和平斗争。这些人的道德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应吸收到我们新的道德观里面来。

下面讲宗教。

宗教这个东西，马克思说是人民精神上的鸦片。这里面有两重意义：一方面说明宗教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宗教当然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它是从人民的生产条件中产生的。当然产生宗教的生活条件是落后的，由于人民在剥削的情况下非常痛苦，生活上没有希望，再加上人民没有文化，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宗教观点虽然是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可是它是使人民消极的东西，是一种麻醉性的东西。人民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又没有办法，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来麻醉自己，所以马克思把宗教叫做人民精神上的鸦片。

如果一个人的宗教观点很深，他就觉得不必反抗下去了，认为反正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就这样忍受下去算了。宗教对人民可以麻醉到这样的程度，为了来世人民可以倾家荡产。西藏的宗教就发展到顶点，老百姓宁肯做叫化子，自己所得到的一点东西都要供奉到喇嘛庙里。所以，宗教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在人民中间是有害的东西，是人民消极方面的反映，可是它又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东西。

这就说明我们必须要消灭宗教。社会主义要建设成功，就一定要消灭宗教。但消灭宗教绝对不能冒进。宗教有些接近道德，它在人的生活与习惯里很巩固，而且有时它的巩固性比道德更深一些。所以，反对宗教不能采取冒进的态度，要从人民生活条件根本的方面去解决。所以，总的来说，宗教带有消极性，对人民没有利。

在各个时代，宗教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我们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中说：最初基督教是在奴隶和破产的自由民中间产生的。由于不满意罗马的统治，有一些人就宣传基督教来联合人民、反对统治，结果耶稣就被罗马帝国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以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把各派基督教的领袖召集起来，这个会开完之后，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把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这样基督教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基督教本来是由于人民对皇帝的不满产生的，有时也组织暴动，但是以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罗马帝国想把基督教变成为世界宗教。最初它把各氏族的神集中在罗马供奉在一个庙里，这样使得各氏族都把罗马看做是一个最高的统治者。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很成功，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这是统治者人工地把宗教集中起来。可是以后统治者利用人民自己产生的宗教、基督教，就利用成功了。这样一个历史情况说明：宗教发源于人民生活中间，到以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在一定时期，宗教也成为人民反抗的旗帜。中国历史上的人民暴动，几乎每一次都用宗教作旗帜，大多数是用道教作旗帜。人民举行暴动，用宗教作旗帜，这也说明人民非常不成熟，有消极的方面。这种宗教的斗争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对宗教我们要看到它有这种历史的作用，一般讲它是被剥削阶级所利用，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也成为人民斗争的旗帜。那么宗教本身是消极的，但是在宗教的旗帜下提出了一些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又有进步的一方面。

现在讲哲学的问题。

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是一定阶级对整个世界总的观点。我们说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因为原始公社时没有一定的、正

式的哲学。正式的哲学是在阶级社会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里，一定的阶级按照它的阶级观点来综合整个世界各方面的知识，把各方面的知识综合起来，对这个世界提出一个总的看法，这个综合受到阶级立场、观点的影响。所以，哲学总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这种观点受阶级立场、观点的限制。

哲学基本上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里又有各种各样的。不管哪个世界观，每一个时期的哲学观点都是对世界各方面知识的总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对各方面的知识都做了最高的总结。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每一个哲学家的知识都非常丰富，都代表当时知识的最高峰（这是讲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中国的孔子是一个哲学家。孔子的知识最丰富，他把所有当时的知识加以总结，世人所应该知道的东西，他差不多全都知道。代表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是知识最丰富的人物，如果不这样，他就不能把当时的知识加以总结。黑格尔把自己的著作——《逻辑学》叫做百科全书。因为这里面综合了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讲："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38 页）毛主席把哲学放在最上面，哲学概括了人类对自然和对社会知识的全面。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点，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哲学有互相对立的两大营垒：唯物论与唯心论。每一个时代的唯物论都是进步的，唯心论一般来说是反动的。但是就哲学内容来讲，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只要是这个时代代表的哲学，它的内容就很丰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

者，可是它的唯心主义体系里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哲学就要注意到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把唯心主义加以否定，可是它的唯心主义体系里面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很多是很有价值的。在唯心主义里面，可以找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批判唯心主义如果采取简单否定一切的态度是错误的。有些唯心主义是可以简单地否定，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我们不能轻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典唯物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都有缺点，可是不能因为它有缺点而一概否定。它综合了当时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知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所以它带有永久性。在批判时应批判它消极的方面。

现在讲艺术。

艺术的特点就是用生动的、具体的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与科学、哲学有区别，科学和哲学是用概念，用理论形式来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也是一种反映，但它是用形象，特别是用典型的形象来反映现实。好的艺术作品里面都会描写一些生动的、典型的人物和典型事件。鲁迅的《阿Q正传》就把“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贫农阶级的典型性格非常突出地描写出来，描写他革命的方面，也描写他落后的方面。所谓典型，就是把它最重要的东西非常突出地集中起来，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它。齐白石画的虾，并不是按照虾的每一条脚画出来的，而是把虾最主要的特征概括起来，所以看上去比真虾更真一些，真的虾没有那么吸引人。

生动、典型这是艺术水平高不高的重要标志。比如，一个小说的艺术价值高不高，就要看他写的人物是不是很典型、生动，这是评判艺术价值的主要标准。我们新中国一直到现在所写的小说有些是很好的，但是比得上《阿Q正传》的还没有。能够写出像《红楼梦》那样的小说也还没有。并不是说新中国的文艺不行。新

中国的文艺前途很远大。但是因为新中国只有六七年的时间，要作家把新人物很生动地概括出来是不容易的。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经验才能概括出《水浒传》这本书来，描写农民战争英雄典型的没有第二本。中国几万万人的国家，几千年来农民的暴动只能概括出来一本书，所以，最高的文艺作品是不容易写出来的。俄国19世纪出了一大批作家，写了很多很好的文艺作品。俄国革命所以先成功，跟出现这些文艺作品也是有关系的。当然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基础变化了，但文艺作家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主要是它的观点，每一个作家都有一定的观点来反映现实。这个观点就代表一定阶级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比如，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农民观点，有些地方相信宗教，在这些问题上，托尔斯泰代表农民的意识。中国的《水浒传》也是代表农民观点。《红楼梦》据说有资本主义因素，这点还有争论，但至少它有反封建的观点。《西游记》中用神话的形式来反映现实，在艺术上有它成功之处，但它的观点是反动的，它把孙悟空这个反抗人物描写成为猴子。所以，艺术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有阶级观点。

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所以叫做上层建筑，都是因为有一定的阶级观点。

艺术除了有一定的阶级观点外，主要的特点是反映现实，而且是生动地反映现实。所以，艺术就有永久性。凡是很好的艺术作品，尽管它写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可是它能把一定的人物非常生动、非常典型的写出来，它就能够永久保持下去。典型的东西，任何时候的人都会认为它有价值。齐白石画的虾，任何时候没有人反对它，因为他能够反映这些东西。我们说《西游记》是反动的，可是《西游记》描写了一个孙悟空，描写得非常生动、典

型，反映了反抗的性格，反映了反封建的性格。在封建社会里，任何人见了皇帝都要下跪。孙悟空见了玉皇大帝说：你这个老头，给我一个官做罢。在封建社会里敢这样写，就是反映了真实。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有这样的农民领袖，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是皇帝也不放在眼里，认为不过是个老头子。

为什么一个有反动观点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有这样的价值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他非这样作不可。他是作家，他不能不这样作。《西游记》的作家为了要写出天宫的力量，他就不得不把反抗人物也写得了不起，把孙悟空写成神通广大的。写出他的反抗性格，目的就是要衬托出天的统治是有力量的。可是结果有些方面跟作者原来的意图相反，就是从人民看起来，最值得爱的就是孙悟空，因为他有鲜明的反抗的性格。而天宫里面的一些人物是糊涂的。为了征服孙悟空，动员了多少天兵天将都没有办法，结果是如来佛最后解决了问题，这是一个最高的神。所以，作者在主观上有他的阶级观点，另一方面他要忠实于艺术，他就要写得非常生动。

所以，艺术价值就是它的典型性。我们对旧艺术作品的批判也是要这样分析，就是把阶级观点跟艺术价值加以区别。凡是有艺术价值的，它的观点并不一定很好。但要紧的是它典型的东西，这种典型就有它的人民性。尽管写的是地主阶级，如果写的的确是很典型，哪怕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写的，它也有人民性。艺术的价值主要是在于艺术性。每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有它政治的方面，都有它的阶级观点。我们对过去的艺术是这样的看法。对今天的艺术的要求就不同，对今天的作家我们就不能说你的立场可以马虎一些，只要写得真实就可以了。今天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个作家有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再

去很忠实地反映现实，他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更好。阶级观点跟艺术内容完全一致了，可以产生比过去时代价值更高的作品。过去的作品，阶级观点跟艺术的内容经常是矛盾的。《西游记》就是一个典型，作者的企图跟作品的效果有矛盾。对过去的作家我们不能那样要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既要忠实于客观现实，又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两方面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反映现实。所以，对过去的作家来说，我们要否定他的阶级观点，肯定他忠实于客观性这一点。对今天的作家，我们既要求他忠实于现实，又要求他掌握马克思主义。如果这两方面都有了，我相信能够产生出比过去价值更高的、数量更多的作品，也可以超过鲁迅，因为我们的新人物比阿Q要好。现在的问题是很好地描写一个共产党员的作品还没有。《保卫延安》里描写的共产党员非常生动，艺术价值很高，但是还要努力。可是中国过去几千年来只有一本《水浒传》是描写农民的。《西游记》是歪曲农民的形象的，把反抗人物说成是猴子。《白蛇传》中描写的反抗人物，都写成虾兵蟹将，都不是人，只有法海才是人。如果过去的人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可以相信就不会只有一本《水浒传》。

上层建筑大体上就是上面讲的这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说某一种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主要是讲它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整个来说，这是一个体系，围绕着一个阶级观点的体系。比如说，哲学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内容不管怎么样，它是有阶级观点指导的。围绕着这个观点构成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就成为一个上层建筑。又比如，艺术所以成为上层建筑，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根据阶级观点来反映现实，也成为一种体系。宗

教也是这样的体系，各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用它的观点来解释宗教，使宗教成为思想体系。围绕一定的阶级观点的思想体系，就成为上层建筑。

对这个体系如果加以分析，其中有些带有永久性的因素，把这些挑出来就可以成为以后上层建筑的一种继承性的因素。所以，研究各种上层建筑体系要注意到它整个的东西，它的观点和各部分的区别。黑格尔的哲学整个来说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它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如果分析它的内容，它的各个部分有很好的东西，特别是有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因素。所以，我们否定旧上层建筑，说旧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消灭或迟或早的要消灭，这是指整个体系来说，指它的观点来说，这并不是说其中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一点价值。比如，我们把房子的基础毁坏了，这样就坏了整个房子总的结构，那么是不是这里面的砖、瓦、木头就没有用了呢？还是有用的，以后盖新房子还是可以利用。所以，对上层建筑要有分析的态度，不能说上层建筑随着旧基础而消灭，因此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思想体系的继承性，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旧上层建筑要消灭，可是新上层建筑的建立就要利用旧上层建筑的各种材料。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三个来源，就不能构成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否定了三个来源，否定了英国的经济学，否定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些不是无产阶级的，可是马克思利用了它的材料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继承过去上层建筑中一些积极的东西，当然也要否定过去上层建筑中不好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学问我们还是要很好地继承下来。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团结旧知识分子。我们所以能够团结旧知识分子是因为他

们感觉到我们还看得起他们，认为他们有些有用的东西。北京大学有些唯心主义大师、专门讲反动唯心主义哲学，解放后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了。可是我们还尽量团结他们，尽量利用他们的长处。比如，有些人的英文很好，就给他一定的翻译工作，有的人就翻译了黑格尔哲学。现在没有别人能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贺麟就能翻译；金岳霖讲罗素哲学，在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时候，他可以用几年来学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原来的观点，这样一来他就能写文章，我们没有办法批判的东西，他就能批判。我们讲这些问题，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对待上层建筑要用分析的方法，这样才能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来为我们服务。

关于科学的问题有一点要说明。

马克思和斯大林都没有把科学列入上层建筑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科学一般来讲不是上层建筑。为什么呢？因为上层建筑它是这样一种东西：按照一定的阶级观点所构成的一种思想体系，不管它的内容怎么样，它是反映客观现实的，它主要的东西是阶级观点。那么科学就不同，科学主要的不是阶级观点，科学不是按照某一个阶级的观点所组成的思想体系。科学是严格地反映客观世界规律性的一种学问。科学是一个长期有继承性的学问。它可以为几个阶级所使用。上层建筑它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科学可以为各种阶级服务。

这里讲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因为社会科学它总是直接跟人的行动有关系，跟阶级斗争有关系。所以，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不能掌握社会科学，也不愿意掌握社会科学。所以，社会科学就是阶级的科学，社会科学可以称做上层建筑。

当然还有人主张社会科学不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意见认为它

还是上层建筑。社会科学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完整的社会科学。资产阶级也有一些片面的社会科学知识，像英国的经济学、法国历史学家的阶级观点，但是他们不能掌握完整的社会科学。完整的社会科学就是一个阶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自然科学本身不是上层建筑，可是它在阶级社会里也有一定的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个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一个科学家他要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来解释自然科学，来总结自然科学。如果一个科学家只是一般地讲自然科学，他这个学问就不是上层建筑。可是如果有一个哲学家把他的科学做出哲学的总结，从科学研究的成果里做出世界观的结论来，那么他这个科学就跟上层建筑联系起来了，就有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个并不是讲自然科学本身。另一方面就是自然科学在实际运用时，他按照阶级利益来使用。比如，美国不是把原子用在生产上，而是用在军火上。自然科学成为阶级的工具，这是讲谁运用的问题，不是讲科学本身。所以，自然科学有一定的上层建筑的作用，但它本身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不是一个根据阶级观点所构成的思想体系，它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反映。社会科学所以是上层建筑，就是因为掌握社会科学必须有一定的阶级观点，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就不可能掌握完整的社会科学。

三、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在内）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关于这一部分，主要的只讲一、二两个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怎样来理解呢？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一个单一的基础，就是只有一种生产关

系作为它的基础。可是这一种生产关系是由各方面的生产关系综合成的。一种生产关系又有种种方面。比如说，社会主义所有制它就不是单纯的一种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是单纯的），它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人和人的关系一般是同志互助的关系，但它最根本的是工农联盟的关系。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也不是各取所需。按劳取酬不是平均主义，各取所需也不是平均主义，只有原始公社的分配才是平均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思想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方面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体系。这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体系中间又包含各方面上层建筑的因素。比如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这一点并不排斥批评与自我批评。另外还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文化上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因为社会主义内部有各种民族，所以要有民族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要注意到扩大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以前的了解不全面。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列宁讲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讲到扩大民主的问题，但是在苏联有些搞理论的人讲到无产阶级专政时，不能和扩大人民民主制度相结合。这跟苏联有一个时期过分强调专政这一方面有关系。斯大林领导下的这些缺点跟理论上多少有些片面性有关系。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要反对“斯大林主义”。一反“斯大林主义”就来了一个扩大人民民主，就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了。所以，现在匈牙利就提得比较正确了，要专政，也要民主。我看铁托反“斯大林主义”有点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至少是不注意这一方面。反动派就利用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来进行挑拨，搞反抗阴谋。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方面，首先

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要注意到扩大人民民主。我们中国现在就全面地提出了这一点，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一方面讲专政，另一方面也讲民主，很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些问题。

这里主要是讲过渡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要介绍一下。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帮助基础的形成和巩固。过渡时期是怎么样呢？在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建成以前，有一个过渡时期。没有过渡时期是不行的，因为无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时候并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得到政权后，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政权时经济情况是复杂的，所以基础问题也是复杂的。

列宁过去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就指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有五种经济成分。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有五种，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还有个体劳动者的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是由四种所有制构成的，这是我们宪法里所规定的，就是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劳动者个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多种成分的经济说明过渡时期的经济情况基础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此，就有了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做经济基础？如何根据经济基础的概念来了解过渡时期的基础。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那么，能不能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是五种经济成分的总和？就是四种所有制的总和？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两种意见：

我们的意见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正在变化中，没有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一定的经济基础。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这样一种情况：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正在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在形

成，所以实质上是两个基础。这两个基础有联系、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基础的形成，资本主义基础的消灭。资本主义基础是旧基础，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基础是新基础，这是无产阶级得到政权后开始创立的。简单地来说，就是把过渡时期的基础看做是正在变化的基础。实际上两种基础正在斗争，一种基础在形成，一种基础在消灭。这种意见是苏联一般教科书上的意见。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是五种经济成分的总合，就是四种所有制的总合。过渡时期只有一个基础，就是过渡的基础。这个过渡的基础就是几种生产关系的总合。

这两种意见产生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如何来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两个意见的分歧。为什么前一种意见主张有两种基础呢？因为前一种意见根据的理由是上层建筑对基础服务，是要巩固自己的基础。因此，我们要肯定哪一种生产关系是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那么就要看这种上层建筑是要巩固和形成哪一种生产关系。这个原则是在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里讲到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一出现之后，就要成为极大的力量，积极地来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并且采取一切办法来帮助新制度，来清除和消灭旧基础。根据这个理由，就应该说我们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要来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基础，同时要消灭资本主义基础。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这个专政和思想能够巩固和形成社会主义基础，同时消灭资本主义基础。它要形成两种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它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通过农业合作化来形成这两种所有制。另一方面，它又

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个体所有制。那么，这种情况按照斯大林的原则来说，我们的上层建筑形成了自己的基础，同时又消灭旧基础。所以，我们的上层建筑对四种所有制不是一视同仁的，有两种所有制我们要把它巩固起来，另外两种所有制我们要把它消灭。

因此，就不能够说四种所有制都是同一个基础，而应该说四种所有制构成了两种基础。在我们过渡时期，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了社会主义基础，这个基础正在形成，我们的国家在帮助它形成。资本家所有制跟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构成资本主义基础，而我们国家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它。我们国家进行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促进了新基础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促进旧基础的消灭。所以说，基础是两个，这两个基础又有联系，又有斗争。这就是前一种意见的主要理由。

后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们党的政策来看，我们当然要促进社会主义基础的形成。可是在促进社会主义基础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又要团结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积极因素，又要照顾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安排。所以，我们不仅对社会主义基础做工作，而且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做工作，凡是我们做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基础，因为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在过渡时期，上层建筑为社会主义基础服务，也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因为它照顾资产阶级，安排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要消灭它，但也是为它服务了。既然四种所有制在过渡时期都被服务了，所以，应该说四种所有制都构成过渡时期的一个基础。

这就是两种意见分歧的主要理由。

我个人赞成前一种意见，理由就是我们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

消灭资本主义，照顾和安排资本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手段，并不是实质。从实质上来说，我们国家并不是把资本主义当做自己的基础，因为我们所要形成和巩固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要去巩固和形成资本主义基础。照顾和安排是暂时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根除它、消灭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生死斗争的关系，是一个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一个不调和的斗争。所以，我们的上层建筑绝不是把资本主义基础也当做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只是社会主义，这就叫做不是一视同仁。

不能说凡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基础。基础是讲我们自己的立脚点。而我们的立脚点主要依靠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愈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愈巩固。最近几年来，因为合作化发展了，资本主义改造实现了，因此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多存在一天，我们政权的巩固性就不够一天。虽然我们要利用它，可是它存在的时候总是有威胁我们的一方面。所以，照顾并不是把它当做自己的基础，而是为了消灭它而采取的一种照顾。

后一种理由多少有一点认为上层建筑对基础有些一视同仁的味道。当然后一种意见也没有否认上层建筑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他们把对资本主义的照顾当做是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基础服务。实际上这种暂时的照顾并不等于是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服务。比如，对战争俘虏我们也要照顾安排，但这不是对他服务，也不是使得敌人更加巩固起来。所以，后一种意见如果对的话，就跟斯大林的原则有矛盾，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里面讲的有矛盾。当然斯大林的意见也是可以考虑的，所以争论还是可以开展，如果有时间还可以讨论。但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里已经过去了。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理论的总结比实际生活要迟一点。实际生活

过去了，对它要做一个很好的理论的说明，将来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必再争论了。总之，根本原则是没有人反对，我们国家总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一点，所以，在主要问题上并没有分歧。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1956.11)

问题有两大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现在分几个大问题讲一讲：

一、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二、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现在简单说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专家讲过，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一般规律和动力的科学，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当然是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不是研究历史各个方面具体规律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美学等等。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总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一种哲学，它是研究一般规律的，它的任务是要为各种具体科学提出一种方法、提出研究问题的根本方向。

一、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

我曾经说到地理和人口不能归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以内，就是说我提出的意见是多少有点修正斯大林说法的意思。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修正，是不必要的。

---

* 这是艾思奇在1956年11月24日，给中央党校学员（记录未记是什么班次）所做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按速记稿整理，只做了一些文字加工。

我的意见没有写成文章发表，在课堂上提出这个意见，大家考虑考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因为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常常抓住书本上名人写的东西，不敢怀疑。因此发生一种情形，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上所说的，人的思想拴在一条线上。所以为了使我们的思想开展一点，使我们在学理论的时候避免教条主义，讲课的时候不妨把争论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介绍一下，把值得考虑的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考虑，大家不同意就算了。

提出反面的意见，考虑一下是有好处的，要有对照面，然后才能发展，认识才能深刻。没有光明，就不懂得黑暗的坏处，不提出反面的意见，正面意见的正确与错误就不容易显出。我们用对立统一的法则展开我们的思想，因此有时要主动地考虑反面的问题，当然已经千百遍证明过的就不需要怀疑了，要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辩证唯物主义，这就错了。一些个别原则，一些新的原则，不妨从反面考虑考虑，使思想开放一些。

我提出这个意见，不是做结论，说斯大林的说法不对。斯大林用地理、人口和生产比较，那种比较还是对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有决定作用，地理、人口有重要的影响。他指出这点并不错，我没有否认这种解释，我们要把生产看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但我们决不否认地理、人口对社会发展有很重大的影响，考虑具体社会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地理、人口条件。中国地大物博，这就使中国占很大便宜，这点对我们的革命有很大影响。从前抗战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国，所以能持久，像埃塞俄比亚等小国，一打就打掉了，大国就有回旋的余地。人口众多也是一件好事，虽然现在要节育，可是人口多很好，不要拖拉机也可以搞合作化，如果地广人稀，想大规模地搞合作化，没有机器是有很

大困难的，至少不会这样轰轰烈烈。人口多，帝国主义就害怕，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一去帝国主义就害怕，说人海又来了，认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口多也有坏处，人口太多，粮食的增长跟不上，不容易很快地超过人口。

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不对的，一般地说，粮食的增长可以比人口快些，苏联就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但我们人口太多，生殖力大一些，如果不限制，粮食的增长就会慢了。我们需要粮食比人口增长的更快一些。12 年农业发展计划，有的地方，粮食增长一倍，500 斤增加为 1000 斤。12 年是不是人口就增加一倍呢？不能。因为一年增加 1000 万，10 年增加 1 亿，12 年增加为 7 亿，不会增加一倍。所以人口总比粮食增加得慢些，但我们希望粮食增加得更快一些。马尔萨斯的说法是错误的。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粮食一、二、三、四、五这样增加，而人口是二、四、八、十六、三十二的增加，如果这样的话，粮食就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加。我们不这样看，粮食的增加是一、二、三、四，人口也是一、二、三、四，而且比粮食增加得小一些。我们希望粮食增加得更快一些，使生活更好一些。我们的节育政策的理论不是马尔萨斯的理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环境提出来的问题。

人口是有影响的，基本上人口多是好的。当然对于反动派来说，人口多不好，蒋介石就是觉得老百姓太多，一造反就没有办法；对于革命来说，人多是好的。不否认地理条件、人口条件的作用，而且有很大的作用，问题是它不起决定作用。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否认，我们要否认的，只是名词问题，要不要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名词概括地理条件和人口？不要概括地理条件和人口，只是生产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社会物质生

活条件就是指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指经济关系。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这本小册子最后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公式。在这段话里讲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是解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方式，也就是斯大林讲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意识就是指政治生活及一般的社会精神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一般都是把社会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关系包括生产、生产方式、一般经济状况，精神生活包括政治思想、法律、宗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把地理、人口和生产并列起来，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内。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得到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把地理、人口看做是一种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社会生活必要的条件，而不要把它看做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社会存在，就是社会自己内部的物质条件，而地理是社会外部的物质条件，人口是生物条件，而不是社会本身的条件。

也有的同志这样理解，生产过程要和地理发生关系，所以是不是地理还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种说法有点理由，但还可以解释，就是生产是必须要和自然、地理发生关系，生产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地理条件，但在这种条件下，地理条件只是生产的一个因素，劳动过程的一个要素。生产过程需要有地理条件和人口条件作为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地理条件只是生产的因素，并不是独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条件作为独立的东西，不能成为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只能融化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生

产过程的一个因素。可以参加到劳动过程中，但不能单独成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生产、生产方式，地理仅仅是构成因素。

斯大林的说法，好像生产、地理、人口是各自独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几种都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中生产起决定作用，用一个名词概括三个东西，容易引起误会。我想是不是不要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概括地理、人口，只有一个生产就够了，因为在生产中已经包括地理、人口了。

这个问题究竟是个名词问题，如果这样用不致引起很大的误会，这样用下去也没有什么大害处，大家可以不同意，我只是作为参考意见提出来，大家考虑，我也再研究一下。要我下个结论，说我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错了，这也不行。如果我将来觉得对，就写文章发表，不对就算了。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的问题，多少人反复考虑多少次，我讲了一个意见，讲以前也反复考虑多少次。现在中央有了结论，三反五反以后看不到对抗性矛盾，现在没有对抗性矛盾了。中央也是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了这个意见。

要确定新的原则很不容易，要非常谨慎，没有最后确定以前不要把它说死，经过最后的证明，再把它当做公理，当做真理确定下来，经过多次实践，加上反复思考，最后得到真理。

对于我的意见有一点怀疑都不要肯定，还是照斯大林的讲法好。不轻易确定一个新原则，不轻易推翻一个旧原则。

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首先是生产力的性质怎样了解？生产力性质、水平、生产力

发展状况，这些名词如何了解，有什么关系？

生产力性质，就是生产力本身的一种特点。性质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集体性和个体性。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体上是由集体性的生产力向个体性的生产力发展，然后由个体性生产力向集体性发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原始公社是集体的，封建社会是个体的，封建社会以后，又向集体方面发展，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业。后一个集体和前一个集体不同，前一个集体是单纯合作，规模很小，是以氏族或农业公社为单位的；后一个集体性是分工合作，工场手工业的集体性是分工合作，机器工业是社会公共的性质，甚至把国际打成一片。

除了最基本的集体、个体发展性质变化以外，还加上有没有社会分工，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多点、少点，都参加到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定性里去。要具体地了解生产力性质，首先要研究它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然后加上有没有社会分工，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多少。

生产发展的水平，是讲生产力的量的方面的问题，是人类取得物质生产资料的能力有多大。量和质有联系，不同的生产力性质也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有没有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有多少，跟生产力水平、生产力量的方面有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包括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比如以前农业劳动是个体性质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但农民需要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要合作化起来，特别是贫农需要使劳动由个体变为集体。这种旧的水平、性质加上需要，就是农业合作化以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合作化。生产力发展状况是总的名称，包括生产力性质、水平以及需要等等。

究竟生产力的要素是两个还是三个？

肯定是两个，用不着再讲了。有些人认为是三个，是把劳动过程的要素和生产力的要素混淆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劳动过程是讲三个要素，因为没有对象，劳动不起来。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性质以及发展水平，是决定于两个要素。

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讲得好像不大明确，引起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原来我是这样讲的，生产力的发展是需要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但生产力之所以能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决定于生产力本身的内部条件，内部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仅仅是一种外部的推动作用。当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是密切联系的。可是对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是外来的推动力。这种力量起作用要通过生产力本身内部的因素，单单有生产关系，不通过生产力的内部因素，是发展不起来的。

内部因素是什么呢？我讲课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地方讲得比较含混。一方面讲生产力就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可是生产力有人和工具的要素。这里面发生了问题，究竟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内部根据是什么？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呢，还是人和工具的矛盾？这个问题需要明确地答复。

应该这样说，生产力是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矛盾的运动。但矛盾的解决是要通过工具的使用。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它的性质的决定条件，就是工具和人。

我们已经说清楚了，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因素就是生产力的两个要素，首先是工具，然后是人，是掌握工具的人。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性质如何，首先要问这个社会的人用什么工具来生产，然后再问如何使用这个工具来生产。这

两个问题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它性质的两个根本问题。

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两个要素起作用，不是生产关系能直接起作用。为什么两个要素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素呢？因为两个要素是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人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料，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是要通过工具，就是要善于使用工具，根据两件事情改造自然。

人和自然的矛盾运动，归根结底也就是决定于工具和劳动者的矛盾运动。人使用什么工具，如何使用工具，这个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矛盾。所以，现在就要明确地确定一下，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内部根据，就是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是通过这两个要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可能性。生产力的发展得到解放，但要怎样才能实现解放，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一定要抓住工具和人这两个环节。我们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农业合作化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是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呢？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这时生产力有了发展的可能性，得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要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要这种推动作用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就要抓住工具和人两个环节。如果不抓住两个环节，即使有了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还是不能发展。

农业合作化以后，中央有个农业发展纲要，里面主要是生产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农业的主要东西。我们现在不能立刻使用机器，也不必要，因为土地少，人口多，可是合作化以后，就立刻考虑适当地改善工具。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新的农村发展生产力，不要改善工具，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恰当。合作化以后，我们考虑生产力的时候，也就考虑到按照我们的情况、按照条件的

许可，适当地改变工具。有两种改进办法，一种是新农具换旧农具，一种是更好地使用农具。完全不改进工具，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事实。当然中国的情况主要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包括工具操作方法，包括劳动组织。

新的生产关系为什么能推动生产力呢？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改进工具比较容易，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经验、提高劳动技能也比较容易。旧的生产关系为什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呢？因为在旧生产关系下的种种条件使得不能改进工具，甚至原有的工具也要搞坏，同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生产经验不能积累，劳动技能不能提高。主要就是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穷困状态，使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社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生产过剩，机器停起来，劳动者大批失业。

旧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阻碍工具和人发生作用；新的生产关系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能推动工具和人充分发生作用。

有了新的生产关系，就要抓住工具和人的环节来进行生产，其中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是规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使用手工工具和机器，水平总有一定的分别，可是工具的作用要发挥起来，需要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不积极，有再好的工具也没有办法。工具是客观条件，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工具的发展，但人是最主要的。有了工具，就要看人善不善于使用，这是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一方面的表现。

如果讲到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应该说，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旧的生产关系，一般地说，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推动作用，特殊部门可以推动。但生产关系只是推动作用，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根据，还在于生产力内部，就是人和工具

的相互关系，这两方面使得生产力能不断地、或快或慢地向前发展。劳动人民对生产的积极性很高的时候，生产力发展得快一些，积极性低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就慢一些，但生产力本身有不断向前发展的因素。

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工具的发展，这是斯大林讲的原则。有的同志说，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工具没有很大改变，但生产力提高了，就是说斯大林讲错了。我看他的原则一般没有错，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思想方法问题，就是要注意一般原则的了解和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问题，要加以区别。如果只讲一般原则，认为一般原则是指把整个人类历史算个总账，最主要的问题应当怎样看。如果算总账，可以说总的来讲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生产工具，每个时期生产力最主要的、重大的质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决定于一种生产工具的根本改变。原始时代由旧石器到新石器，进到金属工具，由普通金属工具到能炼钢，生产力又进一步由手工工具进到机器，生产力大大飞跃一步。每个时期生产力发展划时代的飞跃，归根到底是由于工具的根本改变。这是讲个总的原则。

斯大林的著作是个很简单的提纲，只能讲主要的原则，具体运用就不能详细讲，因为提纲的东西要简单，有些地方就片面了，有些问题我们要原谅，因为这是个提纲。

这个原则总的来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适用的。要使中国农业发生强大的飞跃，归根结底还是要技术改革，不能满足于现在合作化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比过去提高很多，还可以提高，可是这个提高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无论怎样提高，比起旧生产力差得不会太远，要使生产力走得很远，还是要机械化，要解决技术改革问题。我们过去的生产力容易超过，因为那是古代的生产力，

如果不能超过，我们的工作就太差了。但我们要求超过很远，现在我们超过还是靠人多，生产力高，就是一个单位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东西比过去多得多。比如一个劳动力能种30亩地，我们希望将来一个劳动力能种300亩地，甚至1000亩地，用手工工具是做不到的。单位面积增产用什么方法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增加劳动力，一个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总的来讲，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在于工具的变革。问题是对总的原则在具体运用时简单化，不然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要提高生产力，就要立刻搞机械化，得到这种结论就是教条主义。具体运用的时候要因时因地、斟酌情形解决问题。总的方向应该机械化，但要看情形，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现在不能勉强解决。现在我们就是适当地改进工具，不能立刻机械化，然后加上人的生产经验的发挥，劳动技能的提高。

生产力的发展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工具，一个是掌握工具的人。现在工具不能大规模地改进，改进掌握工具的技能也可以提高生产力，不过单单改进掌握工具的技能，生产力的提高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没有到这个限度，人力没有充分运用，生产经验、劳动技能没有充分发挥。可是发挥人的力量的同时，要根据情况适当地改进工具。两个环节如果抓得好，生产力就能够发展，新生产关系的推动作用就能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如果不能抓这两个环节，尽管有新的生产关系，还是空的。东欧有些国家的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不能适当地解决改进工具和提高人的劳动技能的问题，生产力还是不能提高。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内因是根本的，但外因有重大影响。如果旧的生产关系不改变，虽然生产力有两个自己内部的因素，也不能发展。

有人问：新中国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新的社会制度指什么？新的社会制度，应该说是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各种法律制度，其中根本的东西，就是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可以说，新的社会制度，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关系。我们有了新的生产关系，使我们的生产力有发展的可能性，可是这个可能性需要抓住工具和人的环节，使它能得到实现。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变可能性为现实性，变今天新生产关系开辟的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可能性为现实性。

关于新的社会制度怎样了解的问题，《人民日报》有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一种意见认为新的社会制度不是讲新的生产关系，一种意见认为是讲新的生产关系。我认为不简单是新的生产关系，但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关系。

还有两个具体问题：蒙古这个国家由游牧生活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利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多半在落后的国家先实现的问题。

关于蒙古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我没有具体研究，只看过一些文章。从那些文章看来，那种过渡也不违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要凭脑子想，蒙古一定完全是社会主义。蒙古由革命胜利到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经过很长的时间，它们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恐怕有些地方比中国还要迟。它是在革命胜利后，逐渐在苏联帮助下发展一些工业，因为是国家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老百姓的游牧生活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有一部分牧场变成社会主义的，是现代的畜牧方法，使用机器，有一部分国营，有一部分集体经营，有一部分是私人的牧群，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

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不可能，但

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总是向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方面走。中国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不好说已经是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因为有些地方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还没有最后完成，农业合作化也没有最后完成，这都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相适合有联系。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是不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这也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就是对一般原则的了解和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的分别。讲一般原则，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具体运用的时候，它的表现很复杂。

落后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呢？因为虽然它落后，可也不太落后，总还有一些比较集中的工业。俄国有帝国主义经济，我们有蒋介石的官僚资本，我们不是阿比西尼亚那样的国家，我们有比较集中的工业，在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有资本家的私有和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力的矛盾。

为什么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胜利，我们这样的国家会先胜利呢？这是种种具体条件凑成的，上层建筑关系，国际关系。比如美国为什么不垮呢？因为它的统治者没有遭到严重的挫折，统治力量很大，特别是有钱，有钱就有办法收买、欺骗，使得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基础。我们这样的国家，虽然落后，又不太落后。同时由于落后，资本主义没有那样充分发展，可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更尖锐一些，生产力没有出路，首先农业不能前进，又有封建制度，又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能发展。

革命形势决定于种种条件，种种条件使得生产力没有出路，非爆发革命不可。美国虽然生产力很高，但由于种种条件，生产力还多少可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工业还可以发展，加

上上层建筑的支持，可以比较稳定下来。

基本原则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则，这不会错的，具体运用要考虑到种种复杂情况。凡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都要这样了解。

生产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这个过程算不算规律？有人说不算规律，客观存在是规律，自觉性是人的认识问题。规律是生产本身的发展，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看还是个规律，因为由自发到自觉这件事也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的事情发生，总是有点自发性，到了自觉，总是靠后一点。这个规律也就是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规律。规律就是基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固定不变的，是必然的。先自发后自觉，这是必然的联系，主观落后于客观也是必然的联系。

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声明一下，我们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把斯大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当做正确的。现在苏联、中国有些人对斯大林的讲法抱有怀疑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基本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斯大林的意见，一种是对斯大林的意见采取反对的态度。

斯大林的意见是这样的，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个比较狭窄的范畴，比起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来说，它是比较狭窄的，基础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社会存在就是指生产，就是生产方式。基础仅仅是生产关系方面，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和生产力没有关系，生产力不叫经济基础。基础仅仅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认为经济结构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斯大林认为，上层建筑也是社会意

识的一个方面，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什么是社会精神生活呢？包括政治、法律、宗教、科学、道德、艺术这些东西，也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所有这些叫做社会精神生活，上层建筑就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指仅仅为一定阶级服务的，随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那部分。

照斯大林这种说法，研究上层建筑的时候，要和社会意识形态加以区别。自然科学就不叫上层建筑，文学、艺术有些阶级观点是上层建筑，反映的现实材料就不是上层建筑。齐白石画的虾就不是上层建筑，但齐白石的观点是上层建筑。

在康斯坦丁诺夫的著作中就是这样研究的，一个东西要分成几部分，政治、法律是上层建筑，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辩证法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

苏联专家有这样共同的观点，精神生活属于材料性质的东西不是上层建筑，其他都是上层建筑，跟阶级观点密切联系的东西是上层建筑。我们从旧社会接受文化遗产，是因为把旧社会的观点取消了，所以可以接受。这个解释有许多困难，一个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上层建筑，争论不休。自然科学勉强有个结论，本身不是上层建筑，可是用世界观解释自然科学就是上层建筑。有人说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因为无产阶级掌握了，有人说不是上层建筑，因为掌握的是客观真理。吉谢辽夫专家认为不是上层建筑，可是别的许多专家认为是上层建筑。我们暂时认为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用这种观点解释问题，有许多困难。想要推翻这种说法的一种新看法正在生长，想把问题简单化一下，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是一切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解释几个问题，暂时是根据斯大林的说法来解释。

斯大林的说法也有困难，在解释许多具体问题的时候有争论。

关于什么叫做生产关系总和的问题，有两种了解。一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我们是赞成这种看法的，解释具体社会经济基础的时候，可以把经济基础看成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两种生产关系，每一种有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都包括在内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比较能解释具体情况。因为很多社会比较复杂，只能肯定它的基础也是复杂的，不然就很牵强。日本是君主封建帝国主义，它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另外，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它的基础，这样说比较容易了解具体问题。

另一种看法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只能是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总和，经济基础只能由一种生产关系构成，一种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总和为一个基础。照这种观点来看，任何一个社会只能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尽管成分很复杂。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基本阶级只有农民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基本阶级。这种看法在苏联相当流行，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只能由一种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它的基础，其他成分都不是基础。运用到中国，就是旧中国始终是封建社会。这种意见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很牵强。官僚资本主义也不是基础，毛主席写了文章指出，蒋介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个政府的经济基础，如果那个理论成立，毛主席这个文章就应当取消了。说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是基本阶级，也说不过去，人数少点，但作用很大。所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生产关系总和，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有的社会也可能只有一种生产关系作为它的基础。比如美国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只

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的总和。但有的社会不同，沙皇俄国至少是两个生产关系，旧中国是官僚资本、封建的生产关系构成了基础。旧中国还有奴隶制度，成分很小，就不算了，占主要成分的至少有两种。

关于过渡时期基础的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过渡时期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一个基础；一种是过渡时期有两种基础在变化、运动。是不是还有第三种看法呢？也有。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础，因为过渡时期是要建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当做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三个意见，头一种意见我们不同意，过渡时期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础，这种说法不恰当，和列宁的说法不一致。列宁说，过渡时期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

这个理论有两种，一种是过渡时期所有的经济成分构成一个基础，一个就是四种所有制构成两种基础。过渡时期就是因为有两种基础在互相生长、消亡。苏联的教科书赞成后一种意见，无产阶级国家把社会主义经济当做自己的基础，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斯大林的讲法。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讲法，就是后一种讲法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国家是把社会主义当做自己的基础，而把资本主义当做旧的基础。

斯大林讲，上层建筑要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采取一切办法消灭旧基础。资本主义是旧的基础，资产阶级是旧的阶级，我们自己的基础是社会主义。

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讲法，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把四种所有制统统当做一个基础。我们的国家是把四种所有制都当做自己的基础，没有分新旧，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斯大林的说法的。

现在我们暂时肯定斯大林的说法是对的，大家可以研究，现在还没有最充分的理由把它推翻。我们的思想不要拴在一条线上，要活动活动。

理论是要从实践来的，我们要在实践中考验斯大林的说法对不对。

我们讲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基本上是按照康斯坦丁诺夫的讲法，中国的上层建筑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和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当做自己的基础，没有把资本主义当做自己的基础，国家的任务是要帮助社会主义基础形成起来，巩固起来，而且帮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是这样做了，我们上层建筑的作用很大，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就是个表现，原来以为要十八年才能合作化，由于上层建筑能正确地反映基础，为基础服务，因此促进基础的形成，两三年就基本上建立起这个基础。

上层建筑帮助基础形成，巩固、推动自己基础的形成，同时就推动了旧基础的消灭。如果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就得不到这个结果。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在别的国家可以看出来，如匈牙利、波兰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怎样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说?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大，它是新的生产关系，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的问题是上层建筑不能很好地反映基础的情况，为基础服务，叫做官僚主义。铁托说苏联的制度成问题，铁托说是官僚主义制度，如果这样，铁托还是对的，苏联的辩护没有对准目的。如果根据基础的实际情况很好地反映到上层建筑，然后想出办法帮助基础形成，就不会发生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是不能按照基础本身的情况把它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公共性质，它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公

共性质，许多方面不能这样做，所以发生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律是这样一个规律，要有高度的技术装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没有按照规律办事，片面地强调高度技术观点，它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僚主义，上层建筑脱离基础。

中国在这方面搞得比较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正确地反映基础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具体情况，反映新旧的情况，然后制定正确的方针、计划，帮助社会主义的基础形成，同时促进资本主义的基础消灭。这就是在中国来说，我们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关于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也有不同的争论。现在我们所讲的意见，上层建筑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专政，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资产阶级思想，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的个别制度还存在，这算不算上层建筑呢？现在我们的讲法就是不算上层建筑，只算上层建筑的因素，或者是现象。另一种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制度也还是上层建筑，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消灭，就有它的基础，有它的基础，就有它的上层建筑。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思想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没有成为上层建筑体系，没有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只是参加政权，有些党派是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不是占主要地位的，所以不能说在无产阶级上层建筑之外，有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只能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些因素或现象。这种看法有人反对，你说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因素或现象也好，最多不过是加上两个字，这是名词问题。

还有些具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怎样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解放区也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它的基础也是多种成分，也有国营经济，也有合作社，也有个体私有者，也有资本主义。当时经济基础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大体上是五种，不过量的方面不同。在解放区中，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小资产阶级比较占优势，另外还有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经济基础也是两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资本主义因素。

这个基础也可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几种所有制合成一个基础，那种经济叫做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另一种看法，是把正在萌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基础都当做自己的基础。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以前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那时的政权，把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当做自己的基础，也把资本主义经济当做自己的基础。当然，当时国家站在领导地位，国营经济起领导作用，可是为两个东西服务，因为革命的任务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以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九四九年以前是工农民主专政。全国胜利以后，国营经济占主要地位，掌握经济命脉。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政权的性质变了，上层建筑变了，基础的发展方向也变了，以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发展以后是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发展。我们的政权到现在还是这样，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还有个问题，社会主义产生工人阶级贵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何在？

工人贵族是什么没有具体提出，是不是指拿薪水太多的人?这种现象不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而是由于官僚主义，是旧思想的产物，旧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使我们感到有功劳的人多享受点，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因此觉得有功的干部应该好好享受一下，应当和一般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等级方面差得太远。一方面是旧思想的残余，比如知识分子、专家的工资特别多，苏联有五万卢布的专家，这就是把精神劳动看得比体力劳动高，旧制度的残余影响我们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产生的，工人贵族这个名词是带括号的，不能和英国工人贵族的条件相比。那是帝国主义经济产生的，帝国主义者收买工人阶级的结果。在社会主义里，工人贵族没有经济基础。如果在过渡时期有资产阶级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捧来捧去的结果，一些干部就特殊了。

有同志问：派别的阶级基础何在?

也是这样。如果说是派别里有了离开共产主义的趋势，对共产主义起破坏作用，它的基础在资本主义方面，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工联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为什么叫它是共产主义里的派别呢?就是它基本上还是共产主义中的。铁托无论如何没有违背共产主义，可是他的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有破坏，他基本上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可是又反映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影响。为什么能证明是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呢?因为他的民族共产主义很受资本主义国家欢迎，这反映南斯拉夫的党没有自觉性，不了解这点，如果自觉了就没有这个问题，各国给他批评是会有好处的。这个批评有多大效果就要看以后了。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思想，要解决是不容易的。南斯拉夫有它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它和法西斯打过仗，铁托和他的群众有联系，

特别是军队联系得很好，他的军队都是长期和他一起斗争出来的人。他的思想肯定有错误，但要一下子纠正是不容易的。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同志说这两个概念不清楚。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指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社会面貌的决定条件，阶级斗争是生产的一个方面，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阶级斗争本身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经济基础是不是有阶级性？

有的专家讲没有阶级性，我讲基础有阶级的倾向，基础有阶级的作用。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一个基础没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新的阶级就用不着推翻旧的基础。如果资本主义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用不着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应该肯定，生产关系本身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有利于一定的阶级。

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主要是斯大林引的一段，研究了那段，就可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一些国家延长很久，如何从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讲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高利贷商业压迫农民，使农民的生产力不能发展，发展得很缓慢。因此经济关系变化很缓慢，压迫比欧洲的国家更厉害。一般说，封建社会都是很长的，因为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不容易。中国由于种种具体条件，上层统治厉害一些，还有民族侵略，这些问题要具体研究历史才能解决，可能地理条件也在内。地理条件方便，商业容易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快点。欧洲就是海洋很多，后来发现新大陆，商业突然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只能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能说生产力决定上层

建筑？

我们没有这样说，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是间接一点。

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上层建筑能否划等号？

有两种意见：划等号，斯大林的讲法是这样的。另一种讲法，是一切社会意识都是上层建筑。

社会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如果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无产阶级上层建筑因素？

理论科学如果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上层建筑，如果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上层建筑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有无产阶级思想，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因素。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在中国科学院讲哲学*

(1954——1956)

第一讲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

科学院学习委员会要我来向大家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因我对哲学没有研究好，自然科学也没有研究，所以可能讲不好，请大家批评。今天讲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题目——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也就是苏共党史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第一句话。

---

* 艾思奇应邀为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没有分开）全体科学家、科学工作者讲哲学。从1954年到1956年，共讲了11讲，这里收入的是其中的7讲，即第1、2、7、8、9、10、11讲，中间3至6讲，是讲辩证法的4个特征，因已有党校内讲课稿，为避免重复，没有收入。我们收入的7讲按顺序重新排列。原来7、8两讲的标题是重的，我们将第7讲（现改为第3讲）的标题做了改动，其他均为原有。当时，他正在编写《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所讲的讲题、节题大体相同，基本观点也一致，但所讲具体内容却很不一样，他根据听课的对象是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做了许多说明和发挥，特别是联系到许多自然科学的情况，内容上颇有特点。所收入的7讲，均按当时中国科学院学习委员会整理的铅印记录稿，未经艾思奇本人审阅，我们整理时只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

在总题目下分四个小题来讲。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国革命所以能够胜利，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个过程还要继续发展，在过渡时期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后，还要依靠它，使它与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相结合，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长期的过程、不间断的过程，今后还要遵循这个原则进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马克思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呢？列宁曾经讲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都包含有普遍真理，但其中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斯大林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各方面的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战略策略等都是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问题的武器。我们虽然也可以说，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但其最根本的意思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也可以说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毛主席在《论

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内容，这就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根本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列宁曾讲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像一块钢铁一样；马克思自己也说，由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研究社会现象，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也说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论为出发点，由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就引出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是其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斯大林说辩证唯物论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和理论——辩证的方法，唯物的理论；这种方法、理论推广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研究就是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的学说，社会主义原理是根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来研究阶级斗争、研究无产阶级如何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忘记这三个组成部分。不能有这种想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只研究其根本原理，只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就行了，对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理论可以丝毫不注意。如果有人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他丝毫不研究，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联系实际呢？所谓联系实际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政治经济问题，解决如何在人类社会内实行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与中心环节，就是经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成社会主义再建成共产主义。因此，假若单纯为

研究哲学而研究哲学就会犯错误。也有人想：如果研究阶级斗争就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他部分，就需要注意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研究自然科学就可以不注意这些问题，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自然现象就行了。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研究自然科学也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变革，即改变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就是改变自然、改变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也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改变自然提高生产力就有自然科学的问题在内。如果自然科学家不愿意脱离实际，就一定要注意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事实上研究自然科学对社会主义建设不注意也不行，自然科学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发展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前途受到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限制。自然科学在旧社会里就不容易发展，在新社会就发展得空前的快，可见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变革分不开。不学辩证唯物论则已，要学就要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同时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是说要结合、要联系。

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时应结合到当前与我们生活有关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哲学对马克思主义是无关紧要的，可以采取这种哲学也可以采取那种哲学，这也是不对的。有这样想法的人现在也许已经没有了，但过去曾有过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问题上采取轻率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重视的人。历史上曾屡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曾有一批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不是辩证唯物论，可以是新康德主义的唯心论。号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说，可以用马赫主义的唯心论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他们认为恩格斯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可以用主观唯心论来代替辩证

唯物论。这些思想曾受到列宁的彻底批判。现在这种自觉的、有系统的、一方面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已找不到了，因为这种立场已被驳倒过好多次了，没有人再相信了。但那种不公开的、不系统的、不自觉的实际上这样做的人并不是找不到的。这种人虽不是有系统的这样做，像俄国经验批判论者那样说："恩格斯的思想已经旧了"，但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了主观唯心论，抛弃了辩证唯物论，这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用唯心论代替唯物论的情形是常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就曾有过这类事情。毛主席不断地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者虽然不承认是唯心论，但实际上就是唯心论——主观唯心论，或是各种形式的唯心论。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毛主席反对过用感想代替政策、凭个人心血来潮规定政策的人。抗日战争中毛主席对于主观主义进行了总的批评，批评了两种人：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在新中国建设中还有新的表现，就是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总之就是不按照实际情况来办事情。这些主观主义思想就是不自觉的唯心论，不自觉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可以不用辩证唯物论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认为三个组成部分可以缺少哲学这一部分。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对于这种人应该经常注意警惕。主观主义是很危险的，它从根本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来破坏马克思主义。

自然科学也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科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造社会也指导改造自然。自然科学要联系实际就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思想方法上、在理论基础上都应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研究阶级斗争的人应该学，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及在各个部门工作的人都应该学习的科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没有什么必要使得一位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有一个科学部门的知识，却是所有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所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第 783 页）斯大林又说："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结果也愈有效力；反过来说，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工作人员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们也就愈易蜕化变节，——这要算是一个定理。"（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第 782 页）这就是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任何人都应该学习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不能例外。有人说：过去也有科学家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也能有所发明，像牛顿以及俄国过去的很多大科学家。当然这是事实，我们也并不是说不学马克思主义就一点不能做研究工作，而是说在今天的社会中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要想使科学得到充分广阔的发展、跟上国家建设需要是不可能的。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科学要走弯路，虽然过去也有发明，但过去几千年间只有屈指可数的少数人，这说明过去几千年间多少人的天才都因走弯路浪费了。所以要充分发挥科学工作人员的才能，使每个人都走正确道路，不浪费精力而有贡献，就需要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苏联就是我们的榜样，苏联革命才三十多年，现在已有许多科学部门占世界第一位，在短期内产生了许多科学家，现在能有这样多

的专家来帮助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不影响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建设。如果苏联科学家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要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达到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及产生的历史条件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按照恩格斯、列宁许多著作所规定的定义就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即世界一切现象的最普遍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所以，世界一切现象最普遍的规律就是辩证唯物论研究的对象。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研究普遍规律。这是与科学规律比较来说的。每门科学所研究的只是一部分现象，物理学研究物理现象，化学研究化学现象，生理学研究生理现象，哲学则是研究世界上的有普遍性的现象的。科学法则虽然都带有普遍性，如生物学规律普遍适用于生物界，米丘林学说在动植物界普遍应用。科学是从特殊的、个别的、具体的现象中找出普遍规律用以指导我们各种具体行动。但各种科学法则的普遍性有一定限制，它们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哲学法则不同之处是适用的范围没有限制，是包括整个宇宙的。如唯物论的基本特征：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物质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些特征，是普遍的没有限制的。若说对物质的认识是有限制的，这就是康德主义，这是错误的，是唯心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没有不可认识的物质及规律，只有现在还没有认识的物质及规律，有些现在虽然还没有发现但将来终是可以认识的。辩证法的规律，由量变到质变，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是普遍的规律，是没有限制的。但具体表现又是有规定性的，如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某些范围内是爆发式的，在某些范围内又不是爆发式的，这是

规律的具体表现。但这些规律的客观存在从总的方面来说是不受限制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法则与其他科学法则的区别。

注意这种区别有什么意义呢？注意这种区别就可以了解不能把个别科学法则夸大为哲学法则；若夸大就一定要犯错误。这种错误，历史上的思想家就曾犯过。如机械论哲学的错误就是把自然科学中的力学规律，简单的直接的当做哲学规律。中国解放前也有人说哲学可以用科学来代替，特别是抗战前国民党走狗叶青说：哲学可以取消了。当然，这种胡说早已没有人注意了。还有一种思想是生物学的社会学，简单地用达尔文生存竞争的原则来解决社会问题，把生物学当哲学，把社会当做生物界，这是适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也有荒谬的人，将阶级斗争的法则搬用到自然界，这也会犯错误；但这是个别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了许多物理学家的错误思想。当物理学家们说“物质正在消灭”，他们意思是说：在以前自然科学把它对于物理世界的研究归结为三个终极的概念：物质、电子、以太，因为科学的发达，物质已经能够归结为电子，物理世界只剩下了电子及以太，自然科学走上了“物质的统一”。因此物理学家说：“物质消灭了”。列宁说：“‘物质正在消灭’——这是意味着我们在此以前所知道的物质界限正在消灭，我们的认识愈更深入着；从前看起来绝对的、不变的根源的那些物质特性正在消灭，这些特性现在显示为相对的，只是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91页）爱因斯坦认为宇宙是有限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符合，是与合理的科学思想有矛盾的。这种结论可能是将专门科学计算的结果当做普遍的法则，可以肯定是错误的；当做一个阶段的认识是可以的，但当做最后结论，当做

普遍原理就是错误的。

要把自然科学法则与哲学法则分开，并不是说两方面没有联系，两种法则有区别也有联系。理由是辩证唯物主义是普遍的规律，就必然与各门科学有联系。普遍的东西总是存在于具体东西当中，就像抽象的“人”是具体的“人”的普遍概念一样。普遍规律就是各种各样个别规律中包含着的最普遍的东西。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在各种科学之外的另外一种学问，而是各种科学中共同普遍的最本质的东西。机械法则不是辩证法则，但也包含辩证法的本质。有人认为机械论与辩证法是矛盾的，但是各种机械运动中都存在着矛盾，都可以找出对立方面。例如地球绕太阳是机械运动，但是其运动是向心力、离心力两种力的矛盾统一，两种力互相矛盾的不断产生不断解决就产生运动。所以任何科学的法则都包括辩证唯物论的法则，因而我们研究辩证唯物论就不能在各种科学之外去研究。辩证唯物论是各种科学成果的总结，不是谁的脑筋随便想出来的，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些地方有规律存在了。相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各种科学规律的概括与综合。因此，很容易了解辩证唯物主义是各种科学的指针，因为它本身是各种科学规律的概括，反过来就可以帮助各种科学研究找出正确的方向。

要深刻领会这个道理可阅读《自然辩证法导言》，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发现往往在一二百年前已为哲学所指出。如果科学家相信并坚持这一哲学原则，问题就解决得快一点。如物质不灭、能量不灭定律，是 19 世纪、20 世纪才在科学实验上确立的，但在 17 世纪笛卡儿就已经指出。又如进化论以及地球进化这种思想，在 19 世纪才为科学所证明，但 18 世纪康德就曾提出过星云学说。如果自然科学家研究哲学并相信哲学原则，太阳

进化等问题就可早些解决。因为哲学指导原则已经提出，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相当成熟，由于科学家不注意，问题的具体解决就推迟了一二百年。科学家若以为自己的实验就是一切，就往往会使科学走入宗教唯心论的反动道路上去。这就是要想在实验上解决一切问题，结果便会与宗教拉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中曾说过，有一个科学家与达尔文同时发现进化规律，但他相信灵魂，这是因为他不运用思想只相信实验。所以必须打破一种思想：有人说科学本身就是唯物的，因此我们就用不着研究唯物主义哲学，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实验并不等于唯物，实验主义也讲实验，美国詹姆士、杜威都讲实验，但詹姆士公开讲只要实验证明有用即使宗教也是真理。实验只能取得感性认识，是狭隘的经验，唯物论是经验的总结，是对物质的理性认识；假如说实验是唯物的，就是将感性认识等同于理性认识，就是说只要有感性认识就行了，用不着思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曾讲科学是有缺点的，要用思维来补救。列宁讲人要善于思索，毛主席也屡次教育干部要动脑筋要思索，不要以为有一点经验就了不起，要反对经验主义。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有经验主义，会认为实验就等于唯物；科学家都要实验，但不是每个实验结论都是唯物的。生物学上的摩尔根学派实验的结果就是唯心的，实验成果也可以总结成唯心论，得出宗教、迷信、灵魂来，所以把实验当做唯物的东西是错误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若研究哲学，有意识地利用唯物辩证法从事研究可以得到很多便利。苏联的科学家由于利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很多科学部门都成为世界第一，资产阶级生物学家微耳和不懂辩证法，在认识真理上受到限制，他的细胞学说就是唯心的；勒柏辛斯卡娅因为有辩证法作为指针，就没有受限制，她认为细胞不是生物形成

的最后基础，就像原子不是物质的最后单位一样。①当然，哲学同样不能代替科学，不能直接解决实验室的问题，但可以指出正确的道路，使我们少走冤枉路，所以，哲学是科学的总结，反过来又是指导科学研究的方法。

这样说是不是辩证唯物论的产生只是依靠科学发展的一定水平？不能这样认识，这是片面的。科学发展的一定水平只是辩证唯物论产生的条件之一，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惟一的条件，甚至于更不是最主要的条件，最主要的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出现和这一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单有科学水平是不可能出现辩证唯物论的。中国的科学水平比美国低，但因为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哲学水平就比美国高。哲学是上层建筑，它与阶级有密切的联系，辩证唯物主义不承认世界上任何东西是长久不变的，这就与任何带有保守性带有剥削性的阶级有冲突。他们想保存旧东西就不能领会辩证唯物论。无产阶级是没有保守性的，自己一无所有，对任何旧东西都没有留恋，所以只有无产阶级出现及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才可以创造辩证唯物论哲学。马克思与恩格斯所以能创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因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除了自然科学水平与无产阶级出现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外，还有哲学本身的条件——哲学发展的历史本身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过去哲学的积极成果，把当时哲学发展的顶点——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哲学加以批判改造，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在《辩

① 对勒柏辛斯卡娅的观点，是艾思奇当时的认识，后来人们有不同的评价。——编者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科学的辩证法，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神秘的带有公式主义性质的；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也不是辩证唯物论，是有唯心主义及宗教伦理杂质的；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清除了他的唯心主义的东西，提出了合理的东西，采取了费尔巴哈的基本的东西，抛弃了唯心主义的宗教的伦理杂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注意历史条件，关心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建设，要经常地概括自然科学的成果，(列宁、斯大林就是经常地概括自然科学的成果；列宁概括了物理学的成果，斯大林概括了生物学的成果。）此外，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也应注意研究过去中国的哲学。

三、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革命的变革

辩证法唯物论是在继承过去旧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与过去的哲学有联系，这种历史的联系不能割断。研究过去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领会辩证唯物论哲学，有哲学史知识的人研究辩证唯物论比较方便，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唯物论哲学与过去哲学的关系仅仅是量的发展，仅仅是简单的继承，简单的发展，这样去理解是不对的。辩证唯物论虽与过去哲学有联系，但辩证唯物论的出现表明了哲学发展的飞跃，是一种质的飞跃。辩证唯物论哲学与过去的哲学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以前的哲学都自称为科学的科学，所谓科学的科学，就是过去的哲学家企图站在科学之上，另外创造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这种哲学体系能够总括人类一切知识，找到这个体系以后，人类的

认识就可以结束了。过去的哲学家都有这种野心，想在自己身上结束人类的认识，希望从此以后人类不再使用头脑来考虑整个的问题，也就是说想一下子发现绝对真理。这种野心的最大的一次尝试就是黑格尔哲学。他认为他的体系是包罗万象的，他的认识是人类认识的顶点，不能再前进的了。回顾中国过去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如孔子就想结束真理。孔子以后，中国的旧哲学家都以为孔子是顶点，都想发挥孔子的思想到最高峰。这就是过去哲学的特点。这种特点就使得过去的哲学暴露出很大的缺点，最主要的是每一种哲学体系不但不能成为科学方法的指导原则，相反的它成为阻碍真理发展的保守的东西，每一种哲学都像挂了一个牌子说：此路不通。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的哲学对科学的发展丝毫没有帮助，而是，整个来说这种企图是阻碍人类认识前进的，因而其对科学的阻碍作用大于帮助作用。过去的唯物论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如许多科学家都以“原子论”哲学作为其研究的基础，希腊亚里士多德用关于物体的基本性质和元素的学说来帮助发展科学。伽利略就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这对他研究科学有帮助。过去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就反映了科学的需要，对科学发展有一定帮助，关于这方面大家可参考《人类认识物质的历史》和《人怎样变成巨人》这两本书。中国过去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论理论也一定和自然科学发展有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企图站在科学之上、在科学之外主观地制造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把各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加以概括，找出各种科学的普遍法则，把这些普遍的法则反过来指导科学，进一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所以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方法，是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的工具。辩证唯物论包括过去任何哲学的长处而又没有过去任何哲学体系的缺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马

克思主义不是要结束真理，而是要为真理的认识开辟道路。辩证唯物论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不断为真理开辟道路，使认识不断发展。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是这样反复地说明真理是无限的，说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现有的认识当做最后的真理，而是要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就是指导我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地前进。我们拿斯大林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作例子来讲，当时斯大林看到有些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公式主义的倾向，公式主义是阻碍真理前进的，如果把辩证法变成公式，就阻碍了辩证唯物论的前进。公式主义认为一切事物由量变到质变都是采取爆破形式的，但是在事实上还有逐步过渡的飞跃。斯大林看到这种公式主义的倾向，对公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性，是科学的思维方法。

以前的哲学都是少数人的、脱离人民的哲学，而辩证唯物论不是少数人的哲学，它是无产阶级群众为摆脱资本主义压迫而斗争的科学武器。辩证唯物论的出现第一次有了被压迫阶级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哲学。日丹诺夫认为有史以来，只有辩证唯物论哲学是和广大人民结合的。它与过去哲学在这一点上的不同有两点：一方面，研究辩证唯物论就必须关心人类的解放，关心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等。如果不如此，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陷入旧哲学的范围中去。旧哲学对人类是不负责的，是不关心人类解放的，它不想，也不可能解决人类解放的问题，因为旧哲学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哲学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易于接受，并且可以普遍宣传的。过去的旧哲学是个别人的，只为少数人所能掌握了解。哲学家们认为自己

的哲学只要有少数人懂得就可以了，并以此自豪。如英国的罗素就是这样的，他以为自己的哲学，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很了不起。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使革命干部和科学工作者接受，再进一步使广大工人、农民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当然，工人、农民要像我们这样以讲课的形式进行系统的学习，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使工人、农民具体地了解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点上做得很成功。譬如在农村中工作的干部常常说“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这些话，就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哲学的一些原则。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功，是与辩证唯物论的具体化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不能想像辩证唯物论只有知识分子才可以了解，一般群众也是可以了解的。毛主席在指导革命运动时，结合人民革命的实践，对辩证唯物做了普遍的宣传。现在，在中国可以这样说，辩证唯物论已掌握了群众，哲学已成为物质的力量了。

辩证唯物论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政策、干部作风有密切联系。我们要将哲学的原理贯串到革命干部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里面去，使革命干部从宇宙观到工作作风都浸透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教条，而是要把它贯彻到工作中去。如果只能背诵，这样好不好呢？毛主席说，把《资本论》读一千遍也不行，而是要联系实际。科学家要把辩证唯物论原理贯彻到科学工作中去，解决科学上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这才是最有成效的。学习辩证唯物论中的人如果只能背诵几个特征，不能实行，这就是言行不一致。言行不一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就是孟什维克的特点。所以辩证唯物论哲学是与实践与人民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科学。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但为科学发展开辟道路，

而且也为自己的不断发展开辟道路。

四、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党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是前面所讲各方面的总结。哲学是上层建筑，每一种哲学的观点都有阶级性，辩证唯物论也有阶级性，就阶级性这一点来讲，辩证唯物论与过去任何哲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辩证唯物论的特征，就在于辩证唯物论以外的一切哲学都力图隐讳自己的阶级性，都尽量装成没有阶级性，说是代表人类的；但辩证唯物论恰巧相反，公开地宣布自己的阶级性，公开宣布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哲学。在过去虽然剥削阶级也有时发发慈悲，替老百姓说说话，如孟子他本来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但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因为惧怕人民起来暴动，不得不这样说以缓和民愤，并不是说他就不代表自己的阶级了。剥削阶级的哲学不可能公开揭穿自己剥削的本质，宣传于自己不利的思想。如果资产阶级的哲学公开揭露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就是公开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来反抗自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辩证唯物论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没有冲突的，所以就能够公开的宣布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而且只有公开宣布才能武装广大群众集中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凡要学习辩证唯物论的人都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回避阶级性。有些人只想学一学哲学，不愿把哲学当做革命斗争的工具，这种人在革命胜利前很多，革命胜利后也还有人不自觉地这样做。所以，辩证唯物论本身宣布了自己的阶级性，要求学习的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这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分不开的，无产阶级十分需要辩证唯物论这个哲学，没有这个哲学，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就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作为自觉的阶级要能看清自己的前途，分清敌友，懂得战略策略，懂得联合谁打倒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一个自觉的阶级一定要对这些问题看得很清楚，否则，革命的胜利是很困难的。譬如明明无产阶级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如果看不清自己的前途，有人就会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改良也可以过得去，这就不能胜利。又如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农民，坚决反对当前的反动势力，可是，如果代表这个阶级的人，对农民认识不清，不愿联合农民，那也就会失败。孟什维克的错误就在于此，陈独秀在1927年大革命时不愿联合农民而迁就资产阶级，所以革命遭受失败。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对社会发展规律没有科学的认识，要认清前途、分清敌友、要正确解决战略策略等问题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是马马虎虎的事业，资产阶级可以和封建地主妥协，但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不能与剥削阶级妥协的。无产阶级要根本消灭阶级，消灭世界上一切黑暗势力，把全世界来一个大翻身，这是规模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事业，若不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就一定要走许多弯路，碰许多钉子，遭受失败。党在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惨痛经验，如因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把革命引向了失败，就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工人阶级需要共产党及自己的领袖，就是因为党与领袖能够更好地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方法来解决问题领导革命。因此，共产党就要把辩证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宇宙观，作为理论武器，斯大林说："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这是党在哲学思想上的要求。党外的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当然可采取

自愿的原则，但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义务，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都有“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的义务。如果一个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表现出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倾向，我们就说他违背了党的利益，没有尽到党员的义务。主观主义的倾向就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倾向，就是党性不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0 页）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党性。

列宁说：“任何哲学都有党性”，哲学的党性是什么？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表现在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并且和反对的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在历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其背后包含着阶级利益的冲突。辩证唯物论的党性就表现在公开声明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并为这目的与唯心论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研究辩证唯物论也一定要和唯心论作斗争，随时警惕唯心论的影响，在中国来说主要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学习辩证唯物论，就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的长期斗争，就是用辩证唯物论解决党性问题的最光辉的榜样。

哲学的党性、阶级性是否与科学性有矛盾？有人以为凡是讲党性、阶级性一定是主观的，这种看法对辩证唯物论来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党性与科学性是有区别的，所谓科学性就是说这种哲学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辩证唯物论当然是反映了客观世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因此，它是科学的。所谓阶级性，

就是这种哲学为那一个阶级利益所决定又服务于那一个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有矛盾的，资产阶级可以掌握自然科学的真理，但不能掌握社会科学的真理，资产阶级害怕阶级消灭，害怕真理，因此不能掌握真理。而无产阶级不怕阶级消灭也不怕真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真理没有矛盾，所以他可以掌握真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不是自私自利的阶级性，而是大公无私的阶级性，其阶级性与科学性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学习辩证唯物论不仅要注意其科学性，也要注意其阶级性。

学习辩证唯物论一定要坚持学习的党性原则与实践原则，要努力用这方法来解决工人阶级、广大工人群众实际斗争中所提出的问题，不管是社会变革的问题也好，改造自然的问题也好。党性一方面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另一方面是与反对的阶级作斗争。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经常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作斗争，若不注意这两方面就是白学，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只能背诵原则不注意实践，教条主义就是违背党性原则和实践原则的。

学习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不是仅仅一般的反对，而要反对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主观主义倾向。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规定了学习的原则就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是说学习要有目的，“实事求是”是说要着重实际，这恰是学习中党性的原则，也是学习哲学的党性原则。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同样要遵守这个党性原则，遵守党性原则并不是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不管党员非党员，学习哲学都要遵守党性原则。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要注意实际目的，学习的实际目的在科学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本身的实际问题，常常有许多科学理论需要用辩证唯物论来解决，没有辩证唯物论就会长期受束缚和限制，如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生物科学长期被束

缚，突不破摩尔根、微耳和的理论，但苏联的科学家以辩证唯物论作为认识武器就能解决现代科学中许多实际问题。学习苏联的科学研究成果也要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学。如天体理论、共振理论、物理学上的关于微观世界宏观世界等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当然，具体解决问题要凭实验，但如不运用辩证唯物论，就不易弄明白这些现象，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是科学的应用问题——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问题。如何能使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服务得很好呢？这是要辩证地解决的。在许多问题中，有些是可以直接解决的，有些则要间接解决，如果公式主义地解决问题就会犯错误。科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联系到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及联系群众的问题。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论理论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另外，研究自然科学也要注意与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如果要唯物论不占领阵地，唯心论就一定要去占领。要经常警惕唯心论的影响，因为在解释科学中的问题时，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对某些问题可以用唯心主义解释，也可以用唯物主义解释。在实际上，为社会主义服务中也有主观主义，这也是要经常与它进行斗争，不斗争就会为它所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悬在空中的，具体的总是表现在个人身上。所以学习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首先应注意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影响，发现后首先在自己的身上进行批判。当然也应该帮助别人，但一般的学习规律，批判对象应该是由近及远。我们党长期的经验证明，要学好马克思主义，要学好哲学，就不能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从 1941 年整风运动起，十几年来我党采用了这个方法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收到很大的效果。虽然我们不能将整风的方法原封不动的搬入科学院，但当我们在学习文件时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

作、生活，用文件的精神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一些批评，使自己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改造，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将辩证唯物论思想变成灵活运用的科学工具。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要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斯大林同志对这一问题早有解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观察自然和社会的科学方法、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运用辩证法，首先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马克思就是这样写成了《资本论》。恩格斯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也讲到他自己的方法是依靠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汲取并改造了的唯物辩证法，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后才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起来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基础的，因为只有认识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才能看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前途，才能从科学上弄清楚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法走到社会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知

识，要想正确解决如何争取进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有机联系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有了辩证法的科学方法，用这种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然后才创造出整个的社会主义学说。因此，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也有哲学，也有经济学，也有社会主义学说，但它们之间是互不相干的。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经济学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只有马克思才用这一方法把各种学说贯串起来，成为有系统的科学。

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从辩证法在三个组成部分中的重要地位，可以看出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掌握辩证法。因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我们正确了解经济发展规律，了解了经济发展规律，才能看出正确的争取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不用这个科学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在革命中规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历史上所有革命运动中的错误，不管是“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从方法上来说，都是违背了辩证法。我们中国革命中有过右倾机会主义，也有过“左”倾机会主义，他们错误的根源有各方面，若只从思想方法上来说，都是没有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正确解决问题，没有根据一切决定于联系、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来看待问题。“左”右倾的错误形式虽然不同，但他们在不懂得条件、地点、时间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资产阶级是和我们联合的，到末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资产阶级本身的两面性而要结束革命。情况变化

了，条件变化了，但陈独秀还用第一次大革命初期的观点来看问题，仍保持旧的观点，不看条件而要和资产阶级联合，结果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也是不看条件，凭空想、凭理想、走得太远。

方法一讲清楚就容易了解，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能很好地掌握，因为在平时工作中，不能经常小心谨慎地防止形而上学的影响，不能自觉地掌握辩证法，所以往往犯错误。学习辩证法就是要把辩证法的原则，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自觉地注意运用。这样做，就可以掌握辩证法或学会掌握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许多基本特点以后再讲。但是简单概括地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点可以和形而上学进行对比，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要从形而上学的反面就可以了解。斯大林同志讲辩证法的特征时，都是和形而上学对立起来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完全相反的方法。形而上学有各方面的特点，总的说来，形而上学在观察、研究问题时，总是带有片面性、表面性。譬如孤立地看问题就是片面的，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动植物的生活是和环境相联系的，而新达尔文主义却把动植物与其环境隔离开来，这就是片面的。割断联系是片面的，不注意运动、变化也是片面的。不分析矛盾既是片面的，又是表面的。因为矛盾是深刻的，不能从表面发现矛盾。在我们生活中，如果只看到好的方面，看不到坏的方面，在工作中只看到成绩，而看不到缺点，这就又是片面的，因而又是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就是形而上学方法的总的特点。

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学习辩证法的各个特征、各个范围、各个方面。如果简单明了地说明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任务，或者说中心任

务，可以说就是为了克服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这个说明可以概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整个特点。所谓克服片面性、表面性就是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深刻地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要只注意表面现象。帝国主义从表面看来是很凶的，若仅看到这一方面就是片面的、表面的。因为帝国主义虽然有凶的一面，但它还有脆弱的一面。譬如，美帝国主义表面是凶的，但也有脆弱的一面，这一面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充分暴露出来。不但暴露出它本身脆弱，而且也暴露出它的朋友关系也是脆弱的。帝国主义体系的联系也是脆弱的。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学会在观察问题时克服与避免片面性、表面性。学习了辩证法要想一点错误都不犯，是困难的。很好地掌握辩证法并不容易。我们学习了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只要能经常注意检查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片面性、表面性，发现了就及时加以纠正。能这样做，就是开始学会掌握辩证法，就会获得一定成绩。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除了和形而上学相反外，还要注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和唯物论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平常也叫做唯物辩证法，我们不能单纯说辩证法，因为黑格尔也讲辩证法，它是唯心辩证法。古代也有辩证法，但那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法，都不是科学的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是惟一科学的方法。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与唯物论分不开的。恩格斯给唯物论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引自《马恩全集》，第14卷，第651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论分不开，也就是要求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进行研究、认识。斯大林同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写道："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

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动的东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去？我们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创造的图画，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既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是什么？”（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5页）譬如，在我们的学习中，有些什么东西在产生？什么东西在破坏？可以说辩证法的思想在产生，形而上学的思想在破坏。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实际情况。辩证法要求观察问题的全面性、深刻性，这种要求的本身就是唯物论的，因为这种要求是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况的。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着的，是运动着变化着的，自然界是有内在矛盾的，发展是通过矛盾的斗争的。辩证法要求我们这样来研究自然，这是辩证法的要求，同时也是唯物论的要求。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是同样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涉及自然又涉及社会，研究自然界的规律是涉及自然，而自然科学的应用就涉及到社会。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复杂的，所以要求自然科学家在观察、研究问题时，保持全面性、深刻性，也就是要求客观性。

所以，总的来讲，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任务就是要避免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反过来说，也就是要求全面性、深刻性、客观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部分里就讲到这个问题。毛主席提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列举了辩证法的十六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求观察的客观性。

形而上学的思想是和主观性相联系的。片面、表面就一定是主观的，哪怕我们的片面是根据科学实验的。如果实验是片面的，也会引到主观、空想、唯心论的方面去。科学的每一实验并不能保证全面性、深刻性、客观性；相反地，有许多实验的结果往往在思想上引起错误的印象。有许多错误的学说，如果说它没有根

据，它一定能找到根据，问题是它的根据是片面的。任何错误意见都不会没有丝毫根据、没有丝毫理由的。不然，错误就很容易克服，用不着斗争了，问题在于它的根据，理由是否充分，是否全面、深刻、客观。如果不这样要求，只要求有根据，那么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可以找到根据。譬如灵魂学也可以找到一些根据。因此，我们要想同错误斗争，不在于简单否认错误的根据，而在于检查其根据是否全面、深刻、客观。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全面性、深刻性，同时也就要求观察问题时的客观性，即要求遵守唯物论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点，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不一定有这种特点。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在“绝对观念”的基础上，因而是唯心的，不是客观的。黑格尔自称全面地看问题，但在许多场合是片面的。古代的辩证法也有片面性，这是由于古代辩证法没有经过精确的研究，只是一种大概的估计、猜测。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严格要求观察的全面性、深刻性、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这种特点，所以是最正确的方法。应用这种方法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就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主席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就是在任何问题上都一贯保持全面性、深刻性、客观性。同时，为了保持能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不断地同形而上学进行了斗争。领导这个斗争的也是毛主席，他领导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唯心论，反对形而上学的运动。如果没有反对主观主义的运动，没有这一运动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革命成就，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一共经过了28年。28年当中，有过

右倾、“左”倾的错误，这些错误在前半段占了领导地位。从1921年到1935年，14年当中有过几次错误的领导，使革命遭到不应有的困难、挫折。1941年毛主席领导了整风运动，反对了主观主义。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从此革命就没有了路线性质的错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反对“左”、右倾，和形而上学地对中国革命片面的、表面的理解，反倒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是辩证法的胜利。没有辩证法的胜利，就没有革命的迅速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得到了胜利，革命也就得到了胜利。这些都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科学方面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家们没有辩证法的思想指导，至少没有自觉地掌握辩证法，即使有，也是科学的发展逼迫他们不得不接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进步很慢。苏联的自然科学进步很快，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科学家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了辩证法。米丘林就公开承认他的成就是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不开的。①土壤学家威廉士也是如此。苏联科学的每一种新创见都是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结果，有意识地同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进行斗争的结果。能够有意识地同形而上学斗争，这就保证了苏联自然科学的迅速进步。

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的历史形式

恩格斯曾经说过：“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17页）这就是说，人类的思想

① 艾思奇根据当时普遍公认的观点，对米丘林学派做了肯定的评价，后来科学发展了，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编者

也是发展的。所以研究人类思想也要有历史观点，研究人的思维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我们学习辩证法，研究辩证法本身也要这样来研究。即要研究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以前人类知识、思想的历史的长期发展的结果。马克思继承了过去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和过去一切学说根本不同，它们有质的区别，对过去的学说而论是一种革命的变革。但是，我们一方面固然要看到它的革命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和过去学说的联系，如果不这样看，就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只看到有联系而看不到有质的区别，就会得出结论：好像马克思学说中的东西都是过去已经有了的，马克思只是把以前现成的东西机械地结合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发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苏联曾经有过这种看法，例如亚历山大洛夫著的《西欧哲学史》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他没有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哲学在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日丹诺夫给他以严格的批判。很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也利用这种观点来曲解马克思主义。例如，杜林曾经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简单地接受了黑格尔的三段论式。列宁和普列哈诺夫曾反对了民粹派的米海依洛夫，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说的。在我们中国过去也有一些人学这种办法，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早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就有了，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早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就有了。在苏联大概也有这种情形，不然，斯大林同志就不会在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并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了。但是，如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哲学没有联系，也要犯错误的。因

为这样说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没有历史的联系。这种观点，在苏联也会有过。最近我看到苏联的杂志批评了那种割断历史联系，不敢提及过去的思想家，或对过去一概否定的错误看法。譬如说过去的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都是反动的，没有一点好的东西，没有一点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据的东西。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辩证法，要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上来看，要注意到本质的区别，也要注意到历史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人类思想历史上长期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产生以前已经有了辩证法的思想，但是问题是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辩证法有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古代哲学家的自发的辩证法，也叫做原始的或朴素的辩证法，这是人类历史最初的辩证法；以后又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以后又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辩证法，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

古代的辩证法叫做自发的辩证法，又叫做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法。这就是说当时辩证法的思想还未被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当做观察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只是人类初期一种自发的思想，即觉察到世界是运动变化的，相互联系的。这种辩证法在内容上是不清楚的，但在轮廓上大体是正确的，从某些方面看来却又是幼稚的。在外国和中国都有这种辩证法，如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在古代说来是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辩证法，掌握了运动、联系、矛盾，特别是强调了斗争，这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运动、联系？什么东西在斗争？则没有精密的研究，没有办法去说明与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他就说世界一切的特点是火，只有火是不断

变化、没有停顿的。任何东西接触了火都要变化。他掌握了火的特点，用火来解释辩证法，用火来形容辩证的物质世界，这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具体地说是幼稚的、虚构的。我国古代的辩证法，现在可以肯定的有老子的辩证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也讲辩证法，孔子也有辩证法的思想，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即讲求时间、条件。古代的哲学家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辩证法思想。整个来说，在古代，辩证法是占优势的，因为初期的思想家只是大概地观察世界的轮廓，观察世界的整体不加以分析，因此就能看到联系，辩证法也自然而然占了优势。但是，形而上学的因素也是有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限制。孔子就有很多形而上学的观点，譬如他规定了许多提法等等，就都是形而上学的。在欧洲也是如此，凡是唯心论的思想总是和形而上学相联系的。因为它总是要片面夸大一些东西，虚构一些东西。我国的老子是最富于辩证法思想的，但在某些观点上也是形而上学的，例如他总想回到原始社会。他的辩证法是倒退的，不是前进的。总起来讲，在古代，形而上学也是存在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自古就进行着斗争，但是，古代是辩证法占优势的时期，辩证法是哲学中主导的东西，主要的方面。

在古代辩证法之后，中间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在欧洲是从中世纪开始。但是，形而上学成为一种哲学，成了研究科学的一种方法，则是在十七八世纪。这时期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已发展起来，要努力推翻封建的统治；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也发展了，这时期形而上学的思想是适合于当时科学的发展情况，也适合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的。因为资产阶级是剥削的阶级，总是梦想他们所要求的社会是永久不变的。另外，当时自然科学处于搜集材料，分析研究的阶段，例如当时的

生物学，主要是对动植物的分类，这种分析研究，在科学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是必经的阶段，因为每一门科学都首先要把整体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弄清，然后再加以综合。这一过程总的来说是辩证法的，但因分析研究这一时期的整个过程已有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人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以为研究的方法就只是这样。把这种方法绝对化，认为它就是惟一的方法，把分析研究的方法与整个的认识过程割裂开来，而片面地加以夸大。当时哲学家们总结了这种经验，正式宣布这种形而上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惟一方法。英国的培根的归纳法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欧洲许多国家的哲学家都是片面地进行研究的。英国的经验学派把归纳法作为惟一的方法；大陆上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把演绎法当做惟一科学的方法，先有一个自明的公理，这个公理是不能证明也不需要证明的，但是可以由这一公理来证明定理及推论。这就是当时形而上学占统治时期的情形。当时哲学家认为世界上一切对象应该孤立地去研究，归纳是对孤立的经验进行归纳，演绎也是从孤立的无条件公理出发。这个时期形而上学占了优势，称为形而上学时期，但并不是没有辩证法的思想。这时期许多哲学家仍然有部分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不论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都有许多辩证法思想。培根感到物质在运动变化；笛卡儿创造了解析几何，第一次把运动观念应用到数学中；斯宾诺莎的辩证法更多，如关于自由和必然的正确关系就是他规定的。但是总的来讲，形而上学是占优势的。

形而上学在当时是否成为推进科学的方法？是否起着进步的作用？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中是有争论的，苏联也有争论，我们对这一问题不需要忙于做出结论，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形而上学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所处的初期阶段所产生的结果，不能认为形而

上学推进了当时的科学。科学是按照自己的辩证规律而发展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形而上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并不是靠形而上学的方法的推动，因为分析研究的方法并不仅仅就是形而上学。我们现在的科学工作也要进行分析研究，马克思写《资本论》也进行了一点一滴的分析研究，应用辩证法也要进行分析研究。而问题是在于怎样看待分析研究。如果把分析看做一切，就是形而上学的；如果分析是为了综合，就不是形而上学的。譬如分析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只简单地说有错误的东西也有正确的东西，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若把两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则不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就说过形而上学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用的，甚至是亲切的。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简单的判断，不进行全面地分析、综合，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不是什么科学研究。否则，就太麻烦了。我们对形而上学不是一概否定，它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作为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科学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要犯错误，所有科学上的错误大都是形而上学方法引起的。形而上学是和辩证法完全相反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形而上学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是必要的一种观察的方法，但不是科学方法。如果说形而上学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是不妥当的，只能说形而上学是把辩证法的一个部分——分析部分片面地夸大，绝对化了。把分析的方法变成一种孤立的研究方法，是违背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是不能动摇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19世纪时开始产生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其阶级基础也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十七八世纪时，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求革命，要求推翻封建，

因此它可以采取辩证法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它有一种要求，即在推翻封建后，它的理想社会是永久的，从这一方面看来资产阶级又是要求形而上学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更显著。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其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为什么黑格尔能发展辩证法思想?这当然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因。社会方面的原因是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也不满于封建制度现状，并且看到十七八世纪封建社会不断地垮台，感到变化、进步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可以产生辩证法的思想；另一方面，当时自然科学已有相当的进步，已开始可以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就中找出辩证法的因素。在黑格尔以前，康德已提出他的太阳系形成的学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例子。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产生辩证法的趋势。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只有德国的资产阶级要求进步。因为英国革命已成功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已成了统治者。法国革命也结束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成了统治者。当时比较主要的大国，只有德国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还企图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得到解放。更重要的是：当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机器已经发明，资本主义已相当发展，无产阶级已经出现为一个政治力量。因此，德国19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已有无产阶级参加，德国成为革命的中心。当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已结束，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尚未到来，只有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较积极，而无产阶级也开始参加斗争，这样就使得可能在人的思想中反映出辩证法的观念。

为什么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要求进步，但其进步性是很软弱的，原因是一方面德国的资产阶级还不很发展，在莱茵河以东封建势力占很大优势，德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还软弱，因而表现在政治力量上也是软弱的。

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把德国的资产阶级吓坏了，德国的资产阶级害怕劳动人民起来，事实上德国的劳动人民已开始起来斗争了。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想进步，但这进步又不敢充分表现在物质生活中。他们梦想进步，却把进步寄托在思想上，于是便把变化、进步看成是思想上的东西。而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物质生活中的力量。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精神的辩证法，理性的辩证法，而不是物质生活的辩证法。这是黑格尔辩证法很大的弱点，这弱点显示出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虽然他企图发展辩证法，企图系统说明辩证法，把辩证法说成是科学的方法，但事实上其辩证法是不科学的、不彻底的，是神秘的、奇形怪状的、被歪曲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首先在于：他不承认物质世界有发展，不承认自然界有发展，即不承认自然界的东西有其产生、发展、没落的过程。黑格尔只承认自然界有空间上的并列，认为有发展也只是逻辑上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没有的。自然界的一切从来就是如此，没有什么进化发展，以后也不会有新的东西。只有思想、理性是有新有旧有创造的。所以他的辩证法首先不能用于自然界，而且也不能彻底运用于人类社会现象。因为按辩证法说来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而他却认为普鲁士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永远再不能发展了，以此为当时的封建制度进行辩护。这就说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向封建制度投降。黑格尔的哲学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封建贵族辩护的，这是黑格尔哲学在政治上和阶级上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他的哲学中反映为唯心论体系与辩证方法之间的矛盾。

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核心是承认事物通过其矛盾斗争而不断发展。但这一核心在黑格尔哲学中始终没有彻底运用，并且也没有充分明确的表现。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它抽取出来，科学

地明确地表现出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带有公式主义的特点，主要是他把“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其哲学的主要规律。辩证法的主要特征是相互联系，运动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并不是“否定之否定”。而黑格尔却把“否定之否定”夸大了，把一切东西的发展都划分为三段，以便于他组织唯心论的体系。黑格尔的哲学分三大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每一部分又分三章，每一章又分三段，就是这样构成一套唯心论体系。这样运用辩证法是完全曲解了辩证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也讲“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主要的方法。恩格斯认为“否定之否定”不是主要证明的方法。列宁也一再提出“否定之否定”不是主要的规律。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撇开不讲，而采取了新的表述方式“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方法，是不需要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主要的东西的。黑格尔则把它夸大，而成为公式主义。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些缺点，马克思把它去掉，把它的核心抽取出来彻底发展成为科学的方法。

在黑格尔以后和马克思同时的有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辩证法。他们的辩证法是接近了唯物辩证法的。他们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赫尔岑曾说：“它从自发的斗争、从化学亲和力开始，以人类的自觉的大脑告终。”（赫尔岑：《自然研究通信》，1946年俄文版，第37页）即承认客观世界的发展。列宁说他们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但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对社会变化不能运用辩证法的观点，还没有找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还不懂得生产是根本的东西，还不能明确懂得阶级斗争。因此他们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而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代表俄国农民反对地主的要求，所以这种思想

可以说是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思想。这说明农民也可以有哲学，当然不是农民自己创造的，而是知识分子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创造的。可见以前说农民只能有宗教思想是不对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方向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为，如果革命胜利了，他们还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立场。中国的鲁迅的前期思想中也有许多辩证法因素，是接近于革命民主主义的。

在这里附带解答一个问题，在自然科学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运动，能否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是不可能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就是很好的证明，当时自然科学条件已经成熟，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所以只是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而没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能说单有辩证唯物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无产阶级运动就不可能产生历史唯物论。因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就不能有无产阶级运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不能找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社会主义始终是空想的，只有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才出现了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可以开始产生辩证唯物主义，但不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最高形态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最高形态的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用一句话讲清楚，那就在于它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以具有科学性，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发展和人类认识历史发

展的最高总结，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点是和以前的辩证法不同的。譬如古代辩证法是自发的、朴素的。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把自然科学拿来作一些例子，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科学的总结，是人类认识的总结；是总结了人类的文化史并且总结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的。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时，就是从这几方面找来源的。列宁也是这样，列宁在革命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写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总结了物理学上的成就的哲学方面的意义。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也是科学的总结。斯大林同志把不可知论作为唯心论的一个特征，因为近代科学中的唯心论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可知论。例如生物学的摩尔根主义认为生物变化是不可知的。斯大林同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辩证法中增加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非爆破的过渡形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紧密地联系当前的科学成就和工人阶级的实践经验，不断检查，丰富自己的原理原则，因此能经常保持高度科学的正确性、客观性，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其中是没有任何主观虚构的东西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高度正确性、科学性，因此它就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每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的具体的方法，有些科学可以实验，可以利用显微镜，有的科学就不能实验，例如经济学。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方法，但是不论哪一种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须把根本方法与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加以区别，不能认为学了辩证法就能解决一切具体问题。辩证法是科学方法的基本思想指导，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要和具体方法结合起来。只有具体的实验，没有辩证法，就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就会犯错误。若只有辩证法的原则，没有具体的研究，也不能解决问题。辩

证法是各种科学共同的，但每一种科学都各有其具体方法。辩证法的原理是普遍的，但在具体科学中有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即和具体方法相结合。一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另一方面经常注意辩证法原则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现成的公式，而是认识真理的科学方法。辩证法要求我们运用它时，具有创造性，就是说应用辩证法于实践过程中时，根本原理要坚持，具体运用要灵活。譬如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是根本的、普遍的，但从量变到质变这一过程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要用创造精神运用辩证法，要经常注意实践经验，不能把方法当成死的公式，要灵活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公式化、庸俗化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认识论，又是逻辑。所谓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有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有辩证的思维规律。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单纯是思维的规律。辩证的思维规律同时也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譬如矛盾法则一方面是客观实际的法则，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法则。辩证法又是逻辑，又是认识论。逻辑有时指形式逻辑，有时指辩证逻辑，这里所说的逻辑是指辩证逻辑。辩证法一方面是客观的法则，另一方面也是思想的法则。认识论就是关于人类认识客观实际的理论，研究人类认识的规律，也就是思维的规律，也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又是逻辑，又是认识论，所以辩证法的各特征是有逻辑联系的。斯大林同志关于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就是有逻辑联系的，从第一特征到第四特征表明认识逐步深入的各个阶段。辩证法的各个特征应该综合起来研究，不能割裂，不能丢掉某一特征。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家对联系这一特征已经掌握了，只是对矛盾没有掌握。这种说法似乎以为掌握了一个特征

就算掌握了辩证法。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实验室中的联系，只是联系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的联系，实验室的联系并不一定与客观实际的联系符合。科学工作者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必须全面地掌握辩证法的各个特征。

第三讲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一、只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才是科学方法

这个题目主要是说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关系。我们以前已经把辩证法研究完了，已经知道了辩证法是正确的科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所共同需要的最正确的科学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辩证法能成为最正确的科学方法？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因为不研究这个方法的来源就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对辩证法这个方法的来源没有正确的了解，就很难了解辩证法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是科学方法。

对辩证法的了解有两种：唯心的和唯物的。如果用唯心论来了解，那么我们对辩证法之所以是正确的就不能了解了。什么叫做唯心论的了解和唯物论的了解呢？唯心论的了解是把这个方法看做是人的主观凭空想出来的，主观是惟一的来源。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是主观的或客观的。唯心论是把主观摆在第一位。如果用唯心论来了解辩证法，就会以为辩证法是人的主观中凭空想出来的，或是人的理性、人的思想本身生来就有的一种方法、能力，这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辩证法是惟一的、正确的、普遍的科学

方法。因为我们哲学史上曾经有过一种理性派的哲学家，根据理性论的原则来考虑一切问题。有些理性派哲学家并不认为辩证法是科学方法，认为数学方法是最普遍的、最科学的、最准确的方法，所以一切研究都要按照数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们认为最普遍的科学方法是数学方法。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认为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是一致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纯粹依照自己的所谓理性，不依赖感觉，从自己的理性中找自名之理，叫做自名公理，数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自名公理。这种哲学认为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就是凭自己的理性，不依赖任何感觉、实验，直接凭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名公理。用这种方法来作为科学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否能成为科学方法呢？现在我们知道最普遍的科学方法绝不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绝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也不能成为科学方法的。因为根据哲学上长期研究的结果可以知道，即使数学上最基本的公理，也不是完全不依靠经验的。数学上自名之理也是通过经验，不过是通过很普遍的经验，用不着实验室里面的实验经验，把这种经验概括起来得出公理，这种公理概括客观世界一些基本规律。纯粹凭理性直接去找到一些原理是不可能的。认识总是从经验开始，通过经验然后上升为理性。如果说方法是可以凭人的理性能力凭空想出来的话，过去的哲学家曾想出很多方法，在没有辩证法以前，有些哲学家认为形而上学是正确的科学方法，可是为什么今天又能够证明形而上学不是正确的科学方法呢？同样，如果方法是可以凭人的脑子产生，那么各种方法都可以从人脑中凭理性想出来，为什么只有辩证法是科学的、正确的，而形而上学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了解了。所以应该唯物地来理解。根据唯物论来理解问题，辩证法不是人的主观、人的脑子、人的理性能力直接想出来的方法，而应该说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客观现

实本身的规律，辩证法本身就是一种客观规律，不过是一种最普遍的规律，不管是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依照辩证法规律进行的。按唯物论来了解，辩证法就是一种科学方法，辩证法之所以是正确的，就是因为辩证法本身是一种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反映，客观现实所固有的一种反映。

我们所应用来研究科学的辩证法是主观的辩证法。这种主观的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客观辩证法就是现实世界客观现实本身的规律，我们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样来理解就容易了解为什么辩证法是正确的了。我们如果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比较，就可以知道形而上学是不能反映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形而上学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是片面的、主观的东西。世界本来是不断发展、运动的，世界不是不变的，不变的东西是表面形式，是相对的东西，但是形而上学却把不变看做是最根本的东西，把不变的原则看做最根本的原则，所以形而上学的原则不能反映客观现实的规律，这个方法不是实事求是得来的一种方法，而是主观的方法，是与客观现实不符合的，是片面的。因为它把客观现实的某一方面夸大了，把相对不变、相对静止这一面夸大了，而撇开了真正变化的这方面，这个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与客观现实不一致的。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研究问题不能不出错误，因为方法本身与客观现实不一致。而辩证法则不同了，辩证法本身就是客观现实最普遍的规律，是一切事实本身共同的规律，它并不是主观的、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带有片面性的东西，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现实的各个方面。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那么辩证法也是说一切都是运动、发展的。客观事物不仅仅是发展，而且还有相对静止，那么辩证法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辩证法没有片面性。辩证法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客观的普遍规律，因

此把这个方法用做研究的工具，其研究的结果也会是正确的。

我们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和研究一切对象，就是说按事实本身的情况来研究一切事实。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讲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辩证法的特点，告诉我们辩证法是必须按照生活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即我们这个方法是要反映生活实际情形的，方法本身就是客观的，是反映了客观现实的规律。一切正确的方法都是这样的。辩证法是普遍的方法，因为它的本身是普遍规律的反映，具体科学中也是这样，总是根据这门科学的本身的规律来制定方法的。方法不能与客观规律相违背，所以各种科学有各种科学的方法，有些科学是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而有些科学则不能用实验室的方法，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是每一种都能实验的，如数学就不能拿到实验室实验。社会科学也不可能用实验的方法。实用主义认为科学方法就是实验室的方法，这就是不懂得客观现实的规律是要与研究本身的规律一致的。特殊的科学要根据这种科学特殊的性质来规定这种方法，科学的普遍方法要根据一切事物发展普遍规律来规定这种方法。因为辩证法本身是整个世界、宇宙总的方法，辩证法是这个普遍规律的反映，所以成为一切科学最根本的方法。因此我们研究辩证法时一定要与唯物论结合起来，注意到辩证法是唯物论的辩证法，这种正确的方法只是有唯物论的辩证法。

有没有唯心论的辩证法呢？当然也有，如过去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论的。过去唯心论哲学中也常常有辩证法的因素。唯心论的辩证法多半是把辩证法曲解了的，即不能完全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本来辩证法应该是反映客观现实最普遍的规律，但在唯心论者的手中这个辩证法就不完全了，因为唯心论哲学家按照唯心论把某些方面夸大了，某些方面忽略了，用主观的一些猜

想把它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他把辩证法基本上解释为死的公式，把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特别夸大，结果便成了死的公式，所以就不能作为正确的方法。虽然其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的，但因为受了唯心论的歪曲就变成了唯心论的辩证法，而不能成为科学方法了。

我们所要求的辩证法是唯物论的，这个方法本身必须是严格的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的规律。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方法发现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那么怎样办呢？是坚持我们方法的原来原则抑或加以修改呢？按照唯物论，如果发现我们方法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就要根据事实来修正这个方法，或者补充这个方法。像这种例子很易找到，如由量变到质变这个规律，原来是一般的讲量变到质变，质变是迅速的变化。但是斯大林在研究语言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如果机械的遵守这个规律，则与语言本身发展的规律不一致了，因此就提出新的原则来补充，就是由量变到质变这个质变的过程中，除了迅速的爆发以外，还可以有渐进形式。这就说明了我们辩证法方法是严格建立在惟一科学基础上的。

辩证法是一种唯物论的辩证法，其意是说这种辩证法本身是客观现实普遍反映的规律，是物质发展过程普遍规律的反映。这个方法的本身是有发展的，它可以跟着世界的发展而发展，不能成为死的公式。所以我们运用这个方法就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来具体分析客观现实，而不是要我们把它作为死的公式，以为公式中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发展、补充，一点也不能修正。当然，根本原则是不能修正的，根本原则是几千年来科学研究的总结。斯大林说，辩证法的四个特征是不可动摇的，就是有了量变到质变补充了一个渐进的方面，但也没有取消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因为这是科学的总结，是人类历史的经验的总结，为全部人类实践

所证明了的。我们不能像不可知论那样看法，即我即使有一千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如果有一千零一次发现了有一点点不大一致的地方，就要推翻一千次的证明。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一千次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就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如果一千零一次有差错，那就是条件不同了，而不是那一千次错了。全部人类科学历史证明了量变到质变这个规律，所以这个规律是不可动摇的，出现了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语言的变化是逐渐过渡的，好像这与以前不同，但这一次也不能否定以前的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还是不能动摇，问题是语言学的发展有其特殊条件，所以应该有所补充。我们在语言特殊条件下来了解量变到质变，就能够了解得更深刻。所以我们运用辩证法时总要时刻把它当做客观的规律，运用时要注意到根本规律是不可动摇的。但有时发生新的情况、新的条件也可以发展的，可以在个别问题上、个别观点上、个别细节上有所发展、补充。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把辩证法作为简单公式，以为有了这个公式，一切问题立刻可以解决，而要把这个方法作为研究的向导，研究的方针，按照这个方向去分析问题。譬如，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这个辩证法原则，我们不能以这原则直接解决一切科学的问题，但是根据这原则可以指导我们为科学研究开辟正确的道路，即有了这个原则对任何科学都看做是应该分析矛盾的，不过因为各种科学的矛盾不同，所以就要做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应该与唯物论结合起来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辩证法本身是客观现实反映的普遍规律，因此运用辩证法是不能把它当做死的公式，而要把它看做可以根据客观现实发展，在个别细节上得到补充的一种方法。把这个方法当做向导，当做研究的原则，而在研究时又要做具体的分析。

所谓唯物论又是什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就要注意唯物与唯

心的区别。从前有些人对唯物论与唯心论常常用一种错误的办法来区别，有一种看法是很错误的，认为注意物质利益的，就叫唯物论。凡是看到物质利益，只看到眼前利益，或者是生活腐化，专门讲物质享受的人就叫唯物论者。而唯心论是对物质要求一点也不管的，专门讲精神生活的就叫唯心论者，或者是凡是有远大理想的都叫唯心论者，因为他们不注意眼前的利益。这种观点是过去旧社会里经常宣传的，旧社会的反动派是用这种观点来欺骗人和污蔑唯物论的。我们不能这样来区别唯物论与唯心论，区别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如何看待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如何看待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问题。一切的唯物论都坚持一个原则，首先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即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一切唯心论都认为世界是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世界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马赫主义认为世界是我的感觉，实用主义认为世界是我所实验的对象，世界离不开我的感觉，物质是我所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拿来实验的。唯物论认为世界绝不仅仅是我的感觉，绝不仅是我所看得见、摸得着的，首先是在我没有看见、摸着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唯物论首先要承认物质是在没有感觉到和没有想到以前已经客观存在。然后是世界的发展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抑或先有精神后有物质呢？唯物论是承认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的。这与唯心论的先有精神后有物质是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唯心论批判，主要分歧是先有精神后有物质抑或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的问题。胡风思想与我们思想的不同，最根本的问题是文学思想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我们说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文艺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先有客观现实然后才有我们的主观创作。胡风说是先有主观精神，然后用这个主观精神去填入、拥抱对象的内容，第一是我的主观精神，然后用我的主观

精神去拥抱对象，主观拥抱得好，创作就会好。他认为唯物论的原则好像是正确的，但它是冷冰冰的，只有主观精神才能推动人的热情，才能使人有创作的灵感。我们说科学研究是根据事实材料辛辛苦苦研究的，而他说要等灵感来了才行。所以什么是先什么是后的问题是唯心与唯物区别的根本问题。唯物论认为精神是物质的反映，思想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唯心论是不可知论，认为人的认识不可能反映客观现实。

唯心论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承认客观实在的，所以认为人的认识本身没有什么反映；一种是虽然不敢否认客观物质存在，但认为这种物质是不可能认识的，采取怀疑的态度。现在的唯心论多半是采取这种滑头的办法，认为物质不能认识，这就是根本否认物质。所以这种不可知论是一种间接否认物质存在的思想。我们受其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普遍宣传这种观点。前一次我们讲过胡适所说的：我只相信我的经验，在我经验以外的我不知道，即我只相信我经验的东西，我的经验是否是物质的反映，我不能肯定，如果是的话，那就超出经验之外了。其最后的论断是我只相信我的经验，经验就是一切，真理也就是我的经验，我从科学上所得的也仅仅是经验，只不过是把经验排成秩序，至于这种秩序到底算不算物质本身的规律，这就不敢肯定了。因为要肯定的话，那是经验之外的事了。例如光线一秒钟三十万公里的速度，这是经验中得到的，虽然不是直接由感觉得到的，但是实验是可以的，那么胡适就会说这三十万公里速度是根据我的经验排列整理得出的一个结论，但到底它是否反映光速，反映这种物质的规律呢？我不敢肯定。因为我只讲我的经验，其结论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多少受到唯心论的影响，就会否认物质的存在，怀疑我们的科学真理是否能反映物质的规律。譬如现在电子、原子

存在与否的问题，我们凭经验知道有这种东西，科学假设告知我们有这种东西，但这仅仅是假设而已，到底有没有，我不敢相信，或者没有这种东西，只是我的经验告知我这样的假设有阴电子、阳电子，因为它不能看到，我的经验中没有直接看到这种东西，所以有没有这种东西我不能肯定。这种理论从逻辑上推论的结果就是否认科学的真理，最少对科学真理的客观性的这种信心发生动摇。虽然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假设，但这假设是否具有物质本身的客观性，我不敢肯定，就是这种论调，它是从认识论上动摇思想的一种论调。

所以，唯物论要维护科学，就要相信认识能够反映客观实在。当然这个反映不能是一下子得到完全的，因为客观事物比我们的认识总是丰富些，所以我们的认识尽可能反映客观现实，接近客观现实，而不能毫无遗留的反映客观现实。这是不可动摇的。总之，唯物论是坚持这个原则的。一切唯物论都坚持这个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对这个原则认识得更彻底、更完全些。马克思主义以前也有唯物论，有过许多种唯物论的形式，它们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的。

以前的唯物论也坚持这个原则，但不够彻底，其原因有二：第一，受到阶级的限制；第二，受到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唯物论是科学的总结，所以科学发展的水平是可以决定唯物论的内容，科学发展的程度不够，唯物论的发展程度也会不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是在科学发展水平不够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是不够彻底的。另外，以前的唯物论受到阶级的限制。因为人类认识世界是在实践中认识的，人总是有自己的立场，所以认识是受立场所限制的。过去的被剥削阶级没有自己的唯物论，因为他们太穷困了，没有力量来进行思维活动，思考哲学，发展哲学更

无可能，过去发展哲学都是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总有其偏见，这种偏见就使得唯物论受到限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就不受这种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在 19 世纪产生的，那时的自然科学大体上已全面发展到了高级的水平。在阶级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没有阶级的偏见性，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在哲学上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这哲学成了最彻底的、最完全的科学方法，同时这哲学成了人类的思想武器。以前的哲学是与人民无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民的。

我们现在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了正确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也要把以前的唯物论了解一下，即把以前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做一些比较。

二、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论的基本历史形式

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论有过三种形式：第一，古代的唯物论；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第三，资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革命中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论。第三种唯物论是人民的，但只是代表农民的要求的，还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的唯物论。

古代唯物论是什么样的唯物论呢？古代的唯物论是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中进步集团的世界观。这个原则对中国来说还不是完全确切的。在欧洲是很明显的。古代唯物论是与奴隶社会中从事工商业的奴隶主进步集团有关的，因而当时是进步集团产生了唯物论，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在中国情形就比较复杂，因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是什么社会还没有结论，比较占优势的意见是那时是

过渡时期，是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一种过渡的社会。如果是这样情形，即是说中国古代有奴隶占有制度，也发生了封建制度。因此要简单地说工商业奴隶主的哲学就很难说了。奴隶主是当时从事工商业的剥削阶级，在当时这种阶级是要求生产力发展，要求社会发展的，因此他们重视研究自然界，重视科学知识，其利益是与贵族与占有土地的反动集团对立的，所以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对立。古代的反动思想主要是宗教思想，与宗教结合的唯心论思想。古代唯物论是根据当时一些科学知识总结出唯物论的世界观，根据这个世界观来反对宗教的世界观——唯心论的世界观。

古代唯物论的特点是它主要的环节是研究世界的起源问题——世界是从哪里起源的和什么是世界的起源。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反对宗教世界观有关系的，因为宗教是讲世界的起源，认为世界的起源是神，神创造世界。唯物论反对这种世界观，就要找一种物质的起源来代替神的起源。古代唯物论差不多中外都有这个共同点，即要研究世界的起源是什么。不只是在欧洲，更古的还有希腊，比希腊更古的还有埃及、巴比伦等国，这些国家的古代唯物论最初都认为水是世界的起源，欧洲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也是认为水变化为万物，用水这种物质作为世界的起源，否定了唯心论宗教的认为精神是世界的起源这种思想。后来有些哲学家认为水是世界的起源这一点还不够，于是有些哲学家又有主张空气也是世界的起源，有些哲学家又主张世界的起源不是水或空气而是火，但是无论说哪一种是世界的起源都好像有点不大完满，于是索性说世界的起源是无定形的物质，最后合成一起说世界的起源是四种元素——水、土、火、气，后来再发展便把水、土、火、气都取消了，在古代唯物论发展到最高点是原子论。认为其性质是一样的，没有水、土、火、气之分，世界根本的东西虽然大小

不同，物质不同，重量不同，但是一样的都是原子。原子论是古代唯物论的最高点。

古代的自然科学家都是相信原子论的，阿几米德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他就是用原子论的原理来说明他所发明的一些自然科学上的许多原理，如水的浮力的问题，这只能用原子论来说明。然而那时的原子论唯物论是受到压迫的，奴隶主是反对唯物论的，有了唯物论的书籍都要烧毁，科学家只有把唯物论的书籍收藏起来作为研究唯物论的基础。以后，在近代唯物论还没有出现以前，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都是重新来看古代唯物论的书籍的，其中包括哥白尼、布鲁诺等。

中国也有古代的唯物主义，虽然哲学派别没有西洋的那样清楚，但有些唯物论派别也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思想有很多类似西方的情形，他们也研究世界起源的问题。

中国古代唯物论最早认为世界的起源是“气”、“混沌”。“混沌”就是无定形，与西洋的无定形是一样的。乾坤初开，混沌始定，老子的哲学大体上是这种思想。他有两句话：“有物混沌，先天地生”。在天地之前有一种东西叫做混沌。关于老子的哲学现在还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唯心论的，其理由是老子把“道”当做根本的理论，这等于把一种新的东西当做世界的原始，但是，我认为不一定如此，因为老子有一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最根本的还是自然而不是“道”。当然，“道”是最根本的，但“道”是跟随着自然、依赖自然的，“道”是自然的“道”，自然首先是混沌的，在天地之前就有这混沌的东西，当然这东西他说得很玄妙，但这只能说是古代唯物论的弱点，因为那时的唯物论还很幼稚。即使是“道”，老子的“道”也不是把它看做有人格性质的、上帝的意思这些东西，这种思想与当时的唯心论是对立

的，因为当时的唯心论主张世界的起源是天命。在老子的哲学中是否定天命的，所以他应该说是唯物论的。

后来，中国又有各种唯物论派别，主张阴阳五行等，这虽然有点不科学，但是他们是承认物质的起源，在原则上是唯物论的。后来唯心论的哲学家都想把阴阳五行推翻，把什么“理”、“道”摆在第一位。后来的“道”与老子的“道”不同，不是自然的“道”而是理性的“道”，把理性摆在第一位，也承认五行，但把它摆在第二位。宋朝的诸子学说就是这样的。这些说明了中国古代有唯物论，这个唯物论与西方古代唯物论基本特点是一样的，是从世界原始这方面来反对宗教，反对宗教的世界观。

当时的唯物论是幼稚的。因为是幼稚的，所以有些事情就说不清楚。幼稚的原因不能怪古代的哲学家，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有限，天文学数学只有初步发展，在希腊，力学有初步发展，自然科学范围很狭小，实验科学根本没有，没有望远镜、显微镜这种间接延长我们观察的感觉器官的仪器，所以，一切都凭直接观察，科学知识也凭直观，所以哲学也有直观性质，即凭日常的直接观察来解释一些现象，哲学也反映了这种特点。所以当时就用水来说明世界的起源，因为他们直接看到水很重要。西方许多国家如埃及、巴比伦等都是靠水生活的，希腊的工商业者发财也是靠水上贸易，于是凭直接观察的结果来解释世界，把水看做第一位，这也说明古代人是凭自己日常观察的现象来解释世界的起源，从日常生活中找出最重要的现象当做世界的起源，这就是古代唯物论没有思维的科学作为基础，只能依靠直观来概括出它的哲学思想，所以对物质世界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解释是很幼稚的，但我们不能怪古代人有这个缺点，缺点不是他们主要的，古代的哲学主要的东西是它的优点，主要是它创造了唯物论，开始提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

这个原则，坚持了这个原则，与唯心论进行斗争，正确的把当时的科学知识总结出来，在哲学上概括起来，把当时科学知识、对自然界的知识概括成自己唯物论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支持了科学，它在某些地方也解释科学和说明了一些科学问题。如我们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现在当然是看不起它，但是从前它也解释了一些问题，从前中国的医学就是靠它说明了一些问题的，虽然说明得不对，但可以作为解释许多经验的符号，经验本身是正确的，用阴阳五行把它固定下来，使这些经验能够流传下来。虽然这是应该批判的，但它也起了作用，没有它就不能把经验贯串起来，有条有理的记录下来，经验也就不能发展，有了这些唯心论的说明，它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

古代以后，人类社会进入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是长期停滞的社会，进步很慢，生产力很慢，在这种情形下加上封建统治者极力阻碍社会的进步，不关心生产，所以中古封建时代的唯物论不发展，封建时代统治的哲学思想是唯心论思想，而它是与宗教结合起来的。欧洲的中古时代哲学是公开的为宗教服务的，哲学的一切理论一定是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解释圣经。只能证明圣经而不能反对圣经。所以那时的哲学叫做经院哲学，就是教会中的哲学，寺庙中的哲学。中国也有这种情形，如西藏的宗教民族，就是只有那些喇嘛在研究哲学，哲学就是喇嘛的学问，为佛教服务的。这种情形有些类似西欧中古的情形，但是中国的情形比较复杂，中国的唯心论哲学一般不是在寺庙中而是在政府里面的，政府用孔子做招牌，用儒家的哲学而不是公开的主张那一种宗教，相反的，儒家派也有反对宗教的。中国的唯心论哲学与宗教好像不很密切，但事实上还是宗教性质的，几千年中国的哲学都是用来证明孔子的著作，哲学不能反对孔子，只能证明孔子。一般来讲，

哲学是为圣经服务的，在西洋是为基督圣经服务的。所以支配思想在封建时代是唯心论，且与宗教结合的。但这时期也有唯物论，因为有人民的地方即有唯物论，它代表人民的反抗，不过这是很不发展的。

在外国中古时代主要是阿拉伯有过唯物论，在欧洲寺庙中也出现过唯物论的萌芽，这是中古时代叫唯名论的，这种唯名论主张抽象概念是空洞的，只有个别东西是真实的。说个别东西是真实的，在那时就是反对上帝，反对概念，因为那时上帝是看做最高的概念。但这与实用主义的反对概念不同，实用主义是反对科学概念，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概念。实用主义之所谓事实也是一种主观的事实、感觉的事实，与唯物论不同，唯物论认为事实是个别真实的事实，事实是真实的，而上帝是空洞的概念，所以就有唯物论因素。

中国也有这种唯物论，汉朝有王充的唯物论，他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老子的唯物论主要是他的关于自然的这个概念，这一点王充发展了，他发挥了这个自然的概念，认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是上帝或神创造的，是由“无为”产生的，“无为”是什么意思呢？“无为”就是不是人做之意，不是任何精神创造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承认世界是自然存在的。老子的唯物观就在这点，王充发展了这个观点，这种观点在汉朝是针锋相对的与董仲舒的唯心论观点相斗争的。在六朝时代有过唯物论，范缜在反对佛学时用儒家的名义来反对佛学，但他的儒家学说不是唯心论的。他反对孔子主张的精神是主要的，物质依赖精神，不是精神依赖物质。他认为人死后灵魂就消灭，因为灵魂与物质是分不开的，物质死了，灵魂也死了，他用这种唯物论观点来反对佛学，这在当时有进步作用，因为当时佛学流传到中国起很大的反动作用，

破坏生产的作用,用灵魂不灭的学说使老百姓把希望放在来世,用这种学说向老百姓宣传，并使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阻碍。范缜代表了老百姓的反抗,发展了唯物论。中国因为有了这些唯物论者,所以没有受宗教的大害。中国对宗教有了唯物论的反抗因而没有发生普遍的害处，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有唯物论的传统，所以能够抵抗这种宗教的害处，如果中国有一种宗教在统治着，那么中国的情形可能不同了，我们的困难会更大些。这是封建时代唯物论的情形。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论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哲学。这种哲学主要出现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最初发生在英国,后来在法国、荷兰,最后到18世纪法国唯物论发展到最高点,所以大体上是在十七八世纪中发展的。这种哲学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需要发展工商业,要发展工商业就要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然科学。17世纪以前，自然科学随着工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发展。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科学有很显著的发展，这个发展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分不开，资产阶级要求这种发展，同时，要求打破阻碍这种发展的封建势力，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要进行革命斗争。当时的唯物论哲学思想是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密切联系的，每一国的唯物论思想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前产生的。

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国家是英国,在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得到胜利,这主要是17世纪中叶克林威尔所代表的革命运动，就在这个运动以前出现英国的唯物论哲学家，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唯物论哲学家——培根和霍布士。后来革命运动转移到荷兰、法国。荷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封建势力很小，没有经过激烈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就占优势。当英国的唯物论产生以后，接着即有荷兰的唯物论哲学，斯宾诺沙是代表唯物论哲

学的。后来18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是法国大革命，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革命，对封建势力斗争最激烈，动员人民最广泛，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峰。在法国革命以前有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狄德罗是它的代表。有许多哲学家都是对封建统治对宗教进行激烈斗争的，这是欧洲资产阶级的情形。

这时的唯物论一方面代表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为了反封建，就要反对封建社会的思想形态、观念形态，就是主要反对宗教，唯物论就成为对宗教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唯物论总结了当时的科学成就，根据当时科学的成就建立唯物论。那时的唯物论首先反映了科学发展更进一步的阶段。

古代的科学知识是很不完整的，严格来说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科学，只是片断的科学研究，特别是没有实验科学。到近代有了实验科学，成了科学发展的出发点，科学水平也很高，有些部门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主要是力学部门、天文学部门。数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数学有了高等数学、微积分等。当时的唯物论反映了这种科学发展的水平，这时的唯物论根据这种科学的基础就有了新的特点，不是用研究世界的起源来反对宗教，首先是根据科学研究，从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方面来反对唯心论，反对宗教的教条主义。

最初的唯物论，如英国的培根、霍布士的唯物论主要是提出科学的归纳法，当时在唯物论基础上得出归纳法，如何实验，如何从观察中得到真正的客观的知识，这是培根的唯物论的主要贡献。古代因为科学水平低，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不能从认识论中找到科学的根据，而近代唯物论已能够注意认识论这方面——真正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中世纪经院时代认为知识是上帝的指示，哲学应该服从圣经，为经院服务，知识完全靠上帝

的指示，靠纯粹的推理作用，知识的根据就是圣经，知识的方法就是用演绎法做出种种结论。培根就用唯物论来反对这种宗教的教条主义。知识不能单从书本中得来，知识要从观察实验中去找。如果没有观察、实验，任何新的知识都得不到的，培根第一个提出了反映论，而这种反映论坚决主张知识要从经验开始，要从感觉开始。经验主义、经验派最初是唯物论的，是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反对唯心论的，后来马赫这种经验主义变成了唯心论，把经验看成是不能反映物质的。但培根认为经验是反映物质的，感觉是反映物质的，我们主要是依靠感觉认识客观世界，用唯物论的认识论来反对唯心论的教条主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唯物论的主要环节。

唯物论的经验派哲学一直发展到后来，法国的唯物论发展了经验派的唯物论哲学（又名感觉论）的认识论，承认感觉是认识最初的来源，是直接反映客观情况的；感觉不只是我们主观的经验，通过感觉可以认识主观以外的客观世界。这是感觉论，是十七八世纪经验派的主流，唯物论经验派的主流。

欧洲大陆上也有理性派，认为认识可以不依靠感觉，凭理性可以得到真理的认识，这是笛卡儿的看法。这种方法在认识论上来说是唯心论的，但在理性论上来说是唯物论的，只要他们认为认识不只是依靠感觉，他们还是相信理性的，认识还是能够反映客观的规律。特别是荷兰的斯宾诺沙，他认为精神就是物质，与物质分不开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就好像一条曲线的正面和反面的关系一样，如果你从这方面看，这条曲线是向里面弯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曲线是在上面突出来的，弯进去和突出来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精神好像一条曲线的两方面一样，精神是经常适应物质的，人的认识也是认识客观的必然规律，虽然他取消了

感觉论这点有唯心论的影响，但是理性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同时相信人是不能依靠书本、圣经来认识真理，要依靠理性本身力量来认识真理，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又反对中世纪的唯心论。但理性派不是主流，不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主流，最主要的是感觉论。经验派的唯物论坚持相信感觉是物质的反映，从经验开始。这种思想是这时期唯物论的主要环节，这时期的唯物论对物质有了新的解释。

古代唯物论是靠日常观察，把平常看到的某一种物质现象或某几种物质现象当做物质的根本。近代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是那样幼稚了，因为这时科学更加发展，因此他们就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来找到物质的根本性质，结果找到了一种物质的根本性质，就是力学的性质，物质最根本的东西是力学中某些特征，例如它有质量，有不可入性，占据一定的空间，延长性等这类的物体性质。所有力学上物体的性质，他们认为是物质普遍的性质，特别是质量，质量是物质的主要性质。唯物论哲学家，如英国的洛克把物质的性质分为两种：一种叫第一位的性质，是物质本身的性质；一种叫第二位的性质，如颜色、声音，这些东西不是物质本身的，是人的感觉里面的东西。这是错误的。颜色、声音这种感觉虽然是人感觉的东西，但它还是物质本身某种特征的反映。这一点那时的哲学家太片面了，把机械力学的形式看做惟一的本质。那时的唯物论叫做机械唯物论，对物质的看法是机械的。同时，那时的唯物论用机械来解释一切，认为动物是机械，人也是机械，并且用这种题目写出整本的著作，这就成为这个时期唯物论哲学的特点，同时又有了它的缺点。它的积极方面就是从认识论建立了唯物论的坚固基础，从认识论上反对唯心论，也肯定了世界是物质的，克服了从前古代幼稚的解释，但是它的机械性这一点是其缺

点。机械性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性质，只看到物体，物质本身就看不出，这就看不出自己本身有什么原动力了。物体就是死的、固定的，看不出什么矛盾，看不出内在的运动的源泉，所以这时期的唯物论是片面的有缺点的，但有很大的成就，同时坚持了科学观点，在哲学上来肯定当时科学成就。当时科学上力学最发展，它就在哲学上肯定了科学成绩，巩固了科学研究的信心，所以对科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并且保证了科学，反对宗教的唯心论的世界观。这是十七八世纪唯物论的特点。

这种唯物论中国也有，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在十七八世纪发生，那时中国还是封建时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产生的，正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前的戊戌政变，那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也有了唯物论思想，这种唯物论思想大体上相当于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在什么地方相当呢？戊戌改良运动的代表是谭嗣同，辛亥革命的代表是孙中山，谭嗣同的思想可以说基本上是客观唯心论，但是有很多唯物论的因素，讲了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孙中山对自然界的解释基本上是唯物论的，相信自然科学，所以基本上是和十七八世纪那种唯物论思想一样。

十七八世纪唯物论的缺点除了机械性外，还有就是对历史、社会的解释都是唯心的。孙中山的思想就是这样，他对自然界基本上有唯物论的思想的，承认客观世界，承认自然界规律、科学规律是客观的，在认识论上一般也是相信要从科学研究得到知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唯心论的。对于自然界有唯物观点而对社会的解释完全是唯心论的，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唯物论与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的共同点。中国的特点是已经有了进化论，而十七八世纪没有进化论，所以当时完全是机械的东西，中国这时期

有了进化论思想，所以没有那样典型的机械性质的唯物论，但实质上还没有根本的区别。原因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相信进化论，但没有从进化论中做出辩证法的结论来，因为进化论本身还不能直接的做出量变到质变、矛盾的法则这些结论来。达尔文没有做出这些结论，资产阶级也没有做出这些结论。进化论思想在资产阶级中间大体上是庸俗进化论思想，不很知道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也不知道矛盾是运动的根本动力，至少是不认为是普遍的规律，但是强调了生存竞争。进化论对中国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严复把天演论翻译到中国之后，知识界受到很大的影响，都感到中国在生存竞争中恐怕会被淘汰，这种思想对中国进步势力给予很大的刺激，当时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都相信进化论，认为中国应该在生存竞争中争取优胜，不要被淘汰，所以就要努力。可见进化论思想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这种进化论思想应用到社会上就成了庸俗进化论，就是简单地把生存竞争规律应用到社会上来，不知道社会是阶级斗争，简单地注意到种族斗争的问题，把人类社会与生物性质没有加以根本的区别。虽然人类的生活有许多地方受生物的规律所支配，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是不受生物规律所支配的。人的生活、生理是受生物学支配的，是受生物规律一定的支配的，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是那种生存竞争的规律简单地所能说明的。所以这时进化论的运用是片面的，是形而上学的，是简单地用一种科学的成就来解释一切，所以说它是形而上学的，是片面的。这是形而上学唯物论一般的缺点。18 世纪的力学用机械论解释一切，19 世纪资产阶级唯物论用进化论解释一切，这都是形而上学的，是片面的。这种进化论思想，在“五四”以后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变成反动的了。这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唯物论思想中的一个特点，除了一般唯物论思想

以外，还有进化论观点。

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论主要代表俄国的农民。俄国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有一些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主要代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这时创立唯物论的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精神主要是代表农民，站在农民方面坚决反对沙皇统治，对农奴制度抱着丝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它与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有与封建制度妥协的倾向，如谭嗣同是改良运动中最激烈的，但他还是与封建势力有一定的妥协。孙中山是打倒了满清政府的，但他长时期与军阀打交道。而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不同的，对农奴制度坚决不妥协，所以它实际上是站在农民方面。这些哲学的思想是接受了一些辩证法的思想，在俄国来说是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

这种哲学思想在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有。中国的孙中山的思想中也有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因素。孙中山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但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虽然在那时是一句空话，因为孙中山是依靠资产阶级、依靠一些投机的军阀，但是他既然提出了这个口号，也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因素。比较纯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是前期的鲁迅。“五四”以前，鲁迅是反对封建势力，与封建势力不妥协，与资产阶级不相容的，而对农民是同情的。所以鲁迅前期的思想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此外，“五四”以后有许多知识分子也有这种倾向。鲁迅于 1927 年以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就完全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胡风认为鲁迅一开始就是代表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没有一点历史观点和发展观点。为什么胡风这样解释呢？其目的是为了把鲁迅抬出来作为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辩护，以为我是相信鲁迅的，我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认为鲁迅是有一

个转变时期的，不这样看就是反辩证法的。像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

“五四”以后，中国有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时是与资产阶级坚决斗争的，所以与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建立较坚固的联盟。“五四”文化运动思想大体上有三方面的人：一种是最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封建的；还有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代表，以胡适为代表。胡风在反封建文学上是很胆小的，他提倡白话文的口号是尝试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文学改革的口号，而胡适是提出文学改良的口号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大体上是这样，这些唯物论都是支持过科学，而且对科学起了推动作用，所以是进步的，它们是与唯心论进行过斗争的。

唯心论思想为什么会对我们有影响？为什么要用唯物论与它作斗争？因为唯心论思想是荒谬的，而这种荒谬性也不是没有一些根据的，它找到了一些根据，抓住了一些东西来影响人，散布其影响，首先它有剥削阶级作为其基础，有剥削阶级的维护和支持，此外，在思想认识方面，认识论方面，唯心论本身也有一些认识论的根源。认识人的主观与客观关系是主观本来要反映客观的。但是，人的主观总是有些不完全，由片面到全面，人的认识不能一下子掌握客观真实情况全面的认识，认识任何一个问题总是常常偏左偏右，正面想一想，反面想一想，然后合成为一个全面的东西。我们看到世界是运动的，但忽然又忘记还有相对方面。认为世界一切是运动的，所以便离开了相对静止方面。就是说要两条合起来才有辩证法。由量变到质变，在质变过程中有相对静止状态，这样就全面了。唯心论产生的原因是在认识过程还没有完全时，把某一方面夸大了。形而上学唯心论为什么会发生，因

为只看到相对静止这方面，把这方面夸大了，绝对化了，就变成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脱离实际便成了唯心论。马赫主义、经验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说世界就是我的经验，世界不能认识呢？这是因为对经验的片面看法。感觉、经验本来是两种东西，一方面感觉是我的感觉，总是与我的感觉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感觉又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它是两面的，感觉是由物质到感觉。所以了解经验要这样来了解，经验是由物质来的。唯心论的经验夸大了一方面，认为经验是我的感觉，既然是我的感觉，我只认识主观的一些东西，不能从感觉达到物质，夸大一面取消一面：我只认识我的经验，结果就成为唯心论。唯心论的错误是把某一段切开，割裂开来看做孤立的东西，这便成为唯心论。

我们批判唯心论是批判它的片面性，这样就可以找到其命根子彻底打垮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缺点是不能彻底揭发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揭发了这一点，所以彻底打垮了唯心论。

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其理由有三：第一，这个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第二，这个唯物主义是与一切科学成果联系的；第三，这个唯物主义能够推广到社会、历史方面。

古代唯物论有辩证法的因素，承认世界的物质是变化的，由原子变成其他物质，或由水、火变成为万物，但是辩证法的观点很不完全，多半由辩证法变成循环论，例如老子有辩证法思想，能够看出对立，特别是对立的转化——好的变坏的，坏的变好的，正面变反面等。但是这种思想结果变成循环论，认为社会由原始社

会出发，但还要回到原始自然经济的社会，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这样的循环论是很不完全，发展观点很不清楚。外国也有这种情形，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最高的，但还是循环论的，他认为火是万物的原始，但火最后又回到火，而不是无限发展的。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低级到高级，永远向上发展的，发展通过对立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强调对立斗争，这是古代唯物论很缺少的思想，这种唯物论辩证法是最完全的，所以唯物论也是最高的。

另外，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把一切科学成果作为基础的。如果只根据一种科学做出结论，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就会犯错误。例如，有些研究物理学的同志有这样一种思想，即辩证法是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可是爱因斯坦的某一个数学公式好像是说宇宙是有限的，这是否应该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来推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呢？根据唯物论的观点，我认为爱因斯坦这个公式就不能推翻辩证唯物论一般的观点，因为它只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一部分、一定的条件下面的宇宙问题的某种解释，不是一种哲学的解释，是有一定条件的，是宇宙的一方面的解释，如果用这个公式就想做出全部的结论，那么，这种方法就等于以前的机械论，或者说是以前的进化论。我们不能以一种科学结论来代替一切，它只是自然界或社会的一个方面，只能说明这一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一切科学发展的成果承认物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物质是由低级的形式发展到高级的形式，由机械物质的形式发展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形式，然后是社会的形式。

社会物质的本身是什么呢？社会物质本身不能用物体或生存竞争来代替，社会是经济形态，是经济结构，社会的发展基本上

是经济结构的发展。经济就是社会物质的本质，各种各样物质都有它自己的本质，各种物质的规律就是物质本身的规律，力学只能用于机械物体、大物体中，这种力学的一般规律，甚至于对于电子就不能用了，因为那又是一种电子物理学、原子物理学范围内的东西。这样的一个问题，有静质量与动质量的问题，静质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存在的，阴电子阳电子结合变成光电子，电子里面是有动质量了。这说明了普通的力学、大物体不是微观的物体，不是微观世界的力学，它的规律不能应用在微观世界里面，因为它到了那种条件中，电子的作用、物质运动又是一种形式了。阴电子与阳电子一结合，静质量就没有了，物质消灭了，这个论调在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已经批判过了的，但是，这个论调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如最近讲批判胡适以后，就有人提出：说自然科学证明物质不会消灭，但阴电子和阳电子结合就变成光电子了。这种说法列宁已经批判过的了，不过没有明白的这样讲，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物质消灭了”那一段就可以知道，那一段就是批判这个观点，就是说由于静质量没有了就是消灭了，这是错误的。因为静质量没有了，动质量还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它还是客观的离开人的意识以外的存在，这是客观实在的一种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尽管没有静质量，但它是客观的，所以是物质的。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重复已经被批判过了的唯心论观点，其原因就是因为还是把一部门、局部的成就和局部的规律当做世界普遍规律。我们绝不能用局部规律代替全部，普遍规律只能从各部分规律概括出它的共同点。机械力学的物质有静质量的形式，电子物理学中这种静质量形式就不能完全应用了。到了社会就有经济形态的形式，生物的生存竞争这种形式就不能应用于社会了。各种形式是各种运动自己特殊的形式，各种特殊形式概括起来归纳

为普遍原理，就是一切的运动形式，不管什么运动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人的意识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不仅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即使我们闭着眼睛，我们死了以后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唯物论不过是概括出这样一个结论来。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依靠一切科学成果做出一个总的结论来，所以它是最能应用于一切科学而不会发生矛盾的。机械唯物论之所以不完全，因为它是太片面了，因此它当做一个新的科学成就出来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把静质量没有了的这种现象看做是物质消灭了，这是因为科学家的唯物论观点还仅仅是形而上学唯物论观点，把一种科学的成就的结论当做一切，所以到新的问题发生时就解释不通，结果只好说物质消灭了。于是这就不能不成为唯心论的俘虏。唯心论之所以有机可乘，就是因为形而上学唯物论有片面性。认识的片面性是唯心论寄生的一种角落。辩证唯物论要求我们不要有片面性，要避免片面性，做哲学结论时要概括各种科学成就，一种科学成果只能当做一种成就，这样来看才能理解唯物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有时不知不觉会受经验批判论马赫主义的影响，有时会受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把物质看做某种固定的东西，这两种影响都是与科学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反对唯心论，一方面反对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要把辩证唯物论看做各种科学的概括，这样才能理解辩证唯物论，也才能坚持唯物论。所以只有辩证唯物论是最彻底的，是真正普遍的规律。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能够应用于人类历史上。能够应用于人类历史上的原因主要是发现社会物质的本质，发现了社会是经济结构，社会的基本形式是经济结构，发现了这一点以后，社

会的研究真正成了科学，提到科学的高度。在这以前，社会学完全是一种玄学，没有科学的价值，不管它应用什么观点，应用机械学或生物学的观点，特别是应用生物学的观点是很流行的，这种观点应用到社会上，结果就成为唯心论，把社会完全看做是一种生存竞争，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存要求，因此就有什么民生史观，认为生存要求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观点又与实用主义腐朽的唯心论观点联系起来。实用主义就是想把生物观点应用到社会的。

生物学的适应环境、应付环境是怎样的呢？应付环境是首先有一个主观的目的，按主观目的去应付，所以又是主观在先，这主观目的也还是生存要求。除了实用主义以外，还有柏格森的思想也是讲生命的，世界上人的发展就是生命的发展。胡风的文艺思想就是这种生命论，说社会的发展是靠老百姓有一种求生的野性。而我们说社会的发展是因为老百姓要求发展生产力，他们为了生活进行生产受到了阻碍，剥削阶级使其生产不能发展。资本家为什么要反对封建势力，因为它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而胡风却说纯粹是求生的野性，把生产取消了。这样一来，法西斯也有理由了，它会说我们因为要生存，我们的侵略是因为我们要生存于空间。凡是这种用生物学思想简单应用于社会上，就可以为法西斯辩护，所以，这些简单地把一部分理论用到社会上，在政治上就直接、间接与法西斯联系起来，我们反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中有这种东西。胡风在文章中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但其文章中都是一些什么“对象内容”、“生命”与“主观精神”、“自我扩张”、“野性”等，这些东西都是很抽象的。生存竞争是任何人都需要的，但是仅仅是生存就不能说明社会为什么会发展。因为老百姓要生存，反动派也要生存，如果生存就

是第一，就不能说明反动派的生存为什么是不对的了。所以如果不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本质来说明，就不能区别我们的生存和反动派的生存了。反动派也要生存，但他们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们的生存就应该取消，尽可能让他们快点灭亡，而劳动者是要求发展生产的，所以他们的生存与生产发展是联系着的，所以老百姓的要求是正当的。

我们并不是说社会上一点生物学的规律都不能应用，人类既然是动物，当然有动物的要求，生活要求是有的，但是单纯生活要求不能说明社会的变化，不能说明为什么要反对某些阶级，为什么要拥护某些阶级。社会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物质运动形式是经济结构形式，只有把社会的本质抓住，然后才会有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之所以是彻底的唯物论，就是把唯物论推广到社会上，把社会的物质形式指出来，这是过去的唯物论所没有的，不管是古代的、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者的唯物论都没有找到社会物质形式。所以说辩证唯物论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唯物论的最高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不要进步了，而是说它已经到了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还可以有进步，但不会有什么再根本的否定，因为它是最科学的了，它可以再充实再发展，但不可以再回到形而上学唯物论，这种唯物论形式是最高的了。

第四讲　辩证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惟一科学的解释

过去我讲完辩证法以后也讲过一次唯物论，但时间已经隔得很久了，现在再来讲唯物论时就不能够接着讲下去，因为那次所

讲的只不过是引言，而且讲完后中间又经过了许多的运动，那引言已经不够了，所以今天有必要从头来讲唯物论。有些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还需要解释的，我想在讲唯物论的过程中再加以解释，今天所讲的题目还是重复过去的题目——辩证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惟一科学的解释。

一、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研究哲学对我们来讲就是研究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在这里不多加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给哲学下定义，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可以对哲学有种种的解释，他们可以把哲学当做真理的学问，道德的学问和追求知识的学问。但是，按照哲学的观点和综合我们全部的哲学史的材料来看，哲学是人们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的体系。哲学不是一个凭空研究真理追求知识的学问，而是要求我们学会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认识以后去改造世界。哲学本身是提供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看法、理解和观点，把对整个世界的理解、观点综合起来成为哲学体系。因此，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与一般科学研究的问题不同，每一种科学只研究自然界、社会的某一方面和某一部门的问题，但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要涉及有关世界整体的一系列的问题。

所谓有关整个世界的一系列的问题是哪些问题呢？我们研究哲学的人大体上都可以提出来，现只就其中最主要的来讲。例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世界是物质的抑或是精神的？又如世界的始原是什么？世界由物质开始抑或由精神开始？从来就是物质世界或者有一个尽头，有一个最初？在最初以前有没有物质？物质是一种什么力量把它创造出来的？按照科学的原则来讲，物质

是不灭的，物质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是无始无终的。但是也有些科学家否认这种看法，认为物质有一个始原，在这始原之前没有物质，在物质以外有一种什么力量，物质是在那时被什么力量创造出来的。所以，世界始原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还有就是世界是怎样发展的？世界能否发展？如果世界不能发展，那么表面的各种变化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如果世界是发展的，那么它又是怎样发展的？它是一种像走马灯式的循环的发展抑或仅仅有位置的移动，数量的增减，或者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这种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还有就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人类认识世界是凭自己生来的聪明、理性或者是凭什么直觉去认识世界，或者是人用自己的感觉、理性来反映世界。这又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了。对于人如何认识世界这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即人的主观行动对于世界发生什么关系，人的行动能够对世界起作用吗？或者是根本不起作用。人在世界上其生活是命定的，对世界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是人能够改造世界，如果人能够改造世界，那么怎样去改造呢？这些问题都是有关整个世界的问题，或者可以说是有关人们对整个世界相互关系的最大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加以理论的解释就成为一个系统，这就是哲学。所以，哲学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各种看法的体系，也就是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观点，这就是哲学的定义，是哲学这门学问的特点和性质。

既然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是一系列有关整个世界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或者可以说是关于存在和意识的问题，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物质和精神究竟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东西，哪一方面是第二性的东西的问题。所谓第一

性就是最根本的东西。物质和精神有相互关系，在这相互关系当中那一方面是根本的，是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这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是世界是怎样发展的问题，而恰恰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呢？这个道理可以有种种的解释。我们可以从社会基础方面从人的认识世界的任务方面来解释，也可以从哲学的各个问题中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

首先，从社会基础方面来说为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哪一方面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们从社会阶级斗争方面来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主要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斗争，而哲学是阶级的世界观。哲学这种世界观不是凭空产生的，不同的阶级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革命阶级有必要改变世界，因为它要改变世界就需要比较正确的认识世界，由于这种需要，所以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革命的阶级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把客观世界看做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人的主观应该是第二性的东西，承认人的认识应该反映客观世界。因为它要改变世界，就要承认客观的真理，就要承认世界的本来面目，社会的本来面目，因此就要把客观世界摆在第一位，把主观摆在第二位，因此它不需要掩盖真理和蒙蔽世界的真相，因此它不怕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们都要认识真理，科学家就是要承认科学真理，因为科学有这个特点，所以科学家多半有自发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如果他不受唯心论的影响，他仅仅限于他所研究的范围里，那么他的活动是唯物的。可是问题是科学家有时会受到剥削阶级的影响，那么他在对总的世界的看法上就不一定把物质摆在第一位了。凡是真正

有科学态度和站在革命立场的人，他在斗争中和工作过程中是可以取得这种世界观的，就是把物质当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精神当做第二性的东西，他们渐渐锻炼出这种对世界的看法；而反动阶级的情形则不同了，它的要求是反动的，就是说它所要求的社会发展方向与我们不一致，社会要前进它却要后退。因为它们需要蒙蔽真理，需要用种种方法使人不能认识现实，因此它们就要对世界做出种种主观的解释，把世界解释成为不能发展的不能进步的。这种解释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而是根据一些主观猜想创造出来的。由于这种阶级的需要和偏见，就使得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能不把自己主观要求的东西和主观设想的东西摆在第一位，而把客观的东西摆在第二位了。由于两个阶级的要求不同，因此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就不同，进步的阶级要求认识客观真理，反动的阶级则要求对世界做出种种的主观解释。因此，革命阶级一定要把客观的东西摆在第一位,反动阶级一定要把主观的东西摆在第一位。所以从这社会基础上，从阶级斗争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其次，就是从跟社会基础有联系的，即从认识世界的需要本身也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和如何才能得到真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首先要解决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或者世界是在我们的主观中可以任意支配的，还有我们认识的真理是从哪里来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斗争是真理是从客观世界来的抑或是从人的主观里来的，这是哲学上一个从来就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在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争论：是“学而知之”抑或“生而知之”。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是动摇的，他有许多地方强调学而后知之，但有许多地方他又讲有生而知之的人。真理是从哪里来，这也包含物质和精神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如果真理是从客观来的，那

么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如果是生而知之就是说人的意识是第一性的东西了。

再其次，从哲学的一系列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哲学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的始原是什么，世界发展不发展，如何发展，人如何认识世界，这许多问题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联系的，这许多问题可以由一个问题贯串下来，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哪一方面是主要的。这个问题贯串在其他一切问题中，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不同，其他问题的回答也就不同了，它起着根本的规定性作用。如果你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那么所有的其他问题都要根据这个回答来安排方向；如果你说精神是第一性的东西，那么所有的其他问题也要根据这个回答来安排方向。例如，我们说唯物主义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这是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根本回答，因为它做了这样的回答，所以唯物主义对其他一切问题的回答都不能不服从这个回答，在讲到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唯物主义就要把物质当做第一性的东西，因此也就一定要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对世界的始原，世界的发展问题，唯物主义的回答是物质在先，物质永远存在，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出现的，精神是在后的。对人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唯物主义的回答是人是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反映客观世界，主观要努力服从客观。没有客观世界就没有我们的主观认识，不接触世界、不接触周围的环境就不可能有什么认识，因为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东西。唯物主义就是要把物质摆在第一位的。由于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贯串在一切问题中，所以它的回答就规定了哲学的方向、哲学的派别。如果我们对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是：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所有问题的回答都走上一条唯物主义的路线；如果相反的说精神是第一性的东西，结果我们对一切问题的回答都走上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

既然哲学的根本问题规定了哲学的两条相反的路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路线，那么能否有第三条路线呢？我们可以说没有第三条路线。原因是这个问题只能有两种回答。因为只是讲物质和精神这两种东西的关系，所以只能有两种回答。这两种东西或是这方面是根本的，或者那方面是根本的，再不能有第三种回答。所以，根据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所规定的哲学路线也只能有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这两条路线。因此，不管哲学的派别是怎样多，终归只能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我们区别它们的方法就是看这派哲学对哲学的根本问题如何回答。所以，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是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揭发唯心主义和识别唯物主义的一种试金石。既然对哲学的根本问题不能有第三种回答，所以哲学是没有第三条路线的。

有些研究哲学史的人可能会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在哲学史上好像有过第三种回答，这第三种回答就是指二元论。二元论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它把物质和精神看做是两种互相平衡的根本现象，哪一种也不是第一性的。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说：二元论是把精神和物质看做互相平衡的，精神和物质是两种互相否定的现象，没有联系的互不相干的现象。这第三种回答是不是真正的第三种回答呢？从哲学史上仔细分析这并不是第三种回答，因为它是这种性质的回答，即对前两种回答采取动摇的态度。真正的回答只有两种，如果不是那样回答就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两种东西必须有一样是最根本的东西，不可能有两种绝对平衡的现象。二元论是想避免解决这个关系问题，所以

就把这两种东西当做互相平衡的东西。可是二元论事实上在某一个问题上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则又把精神看做是第一性的东西了。虽然它把两种东西看做是互不相干的，但它又是分别的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唯物论的立场，而在那一个问题上却站在唯心论的立场上，它是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它是折衷主义，是企图调和绝对相反的两方面的斗争而实际上又不能成功的一种体系。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二元论的不中用，这就是二元论既然是把精神和物质看做是平衡的互相否定的东西，但最后它又不能不解决两种东西中间的联系，等到它要解决这样的联系时，它又往往倾向于唯心论方面。17 世纪的笛卡儿就是最典型的。他明确的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平衡的本质，这两种平衡的本质是没有联系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又不能不说明这种联系，那么如何说明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只好说是由于有上帝的存在，上帝使物质和精神互相适应。例如，人有物质的身体，另外又有精神，既然物质与精神无关，那么物质与精神又怎样联系呢？于是他就说物质与精神的联系是上帝的联系，他说上帝在人的脑子中摆上了什么“中和线”一类的类似生物的一种物体，这种物体就是上帝联系物质与精神的枢纽、关键，结果这种解释完全走到唯心主义方面去。所以，二元论的企图是不成功的。因为把物质与精神看做没有关系的互相平衡的东西的这种看法和世界观，是不能解释我们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联系，于是它常常要向唯心论让步，结果二元论本质上是向唯心论妥协的。所以，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只有两条，或者是唯物论或者是唯心论。

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何在？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站在我们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说，站在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变革世界、改造世界的立场上来说，我们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辨别我们思想

中的唯物主义的方向和唯心主义的方向，要学会在各方面辨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辨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反对唯心主义和坚持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是不是容易坚持？唯心主义是不是容易反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唯心主义经常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无形的影响。统治阶级利用它的统治和宣传工具来宣传唯心主义，而其宣传又是很巧妙的，而且它有几千年统治阶级的统治传统，在我们生活中私有财产还没有消灭，阶级还没有消灭，这些都是产生反动思想的物质基础。唯心主义是保守的，所以它就不能认识现实的真理，因此对于世界总是以主观来加以解释。反对唯心主义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要坚持唯物主义也不是容易的。一个科学家不学唯物主义也可能在某一个具体研究中有所发现，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列宁反对马赫主义，马赫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在物理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可是他做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他是最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代表之一。爱因斯坦是很伟大的科学家，在现代科学上是有很高地位的，可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问题却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科学的研究，如果只是拿它很狭小的局部的实验来说，我们不能说它一点东西都没有。例如，在遗传规律中两种性的潜在结合起来以后生出来的后代，性质方面都有一定的比例，总是可以划分为四份，四份中间有两份是这样，有两份是那样，这是不是事实呢？这是生物遗传方面的事实，他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问题是这个规律不是一般的规律，是一个片面的规律，如果由这片面的规律做出普遍的结论来，那么就是说新种不可能发生了。因为他不懂得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而且是唯心论，那么实验方面也不是完全抓住事实，虽然有一点是事实，有一点成就。但问题是只在局部方面在各别

问题方面抓住了一点事实，在一个问题上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并不等于能够坚持唯物主义。

我们有些科学家有这种看法，认为科学家是唯物主义的，用不着学习唯物主义。这两句话是否对呢？如果说不对，不行，如果说对了也有些过分。科学家是唯物主义的这一点要看如何解释，如果说自发的唯物主义对任何问题都能有唯物主义观点那就错了；如果说科学家只是在研究工作中的局部方面能够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不能不是唯物主义的，可是这并不等于他能坚持唯物主义，因为要能坚持唯物主义，不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在局部的问题上，而且要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也能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不会遇到新的问题便犯错误。科学家可以在他的很小的实验室中不犯错误，可是有的科学家超出了实验室就会出现大错特错，这就是不能坚持唯物主义。既然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又说可以不学习唯物主义那就错了。

学习唯物主义就是要使我们本来自发的唯物主义变成普遍的和能够坚持下去，不但在局部问题上在实验室中不会犯错误，而且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中做出唯物论的解释，使我们的思想一贯不犯错误。如果不学习哲学也会有成就，但成就会受到限制，按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得这样快的情形来看，这种很有限的成就是赶不上需要的。过去社会发展很慢，科学发展很慢，科学研究少一点，科学成就的发展慢一点也没有多大的害处，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进步得这样快，我们的世界观不能坚持唯物主义，研究的成绩、范围就很受限制了，这样就会落后的，遇到新的问题就往往会犯错误。我们今天研究科学的人不能与过去的人相比较，因为过去的人他们的情况不同，在十七八世纪时的牛顿有很大的贡献，但他在世界观方面是与宗教妥协的，他说上帝是最后

的推动力，可是现在我们还是说牛顿有很大的成就，不过在今天看来牛顿的世界观是应该批判的。爱因斯坦有很了不起的成就，可是他有些结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认为这是遗憾的，有些要批判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批判的。我们今天研究科学的人对自己的要求要比过去的人更高，要成为在专门研究领域之内整个世界观都是唯物主义的。所以，我们要坚持唯物主义就必须要研究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是依靠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研究一切问题的。我们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以外更要能在更大的范围之内看到真理，能够做出正确的解释。当然，每一个人要研究专门的东西，应该集中主要力量来研究专门的东西，但是如果研究专门的东西不能坚持唯物主义，有了新东西也无法理解。例如，在社会方面，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曾经是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他的著作是很好的，到了20世纪以后，俄国革命开始后有许多新的问题他都不能坚持唯物论，因此他就走到孟什维克那方面去，就犯了根本的错误。所以，学习唯物主义的必要性主要是我们的社会和科学不断地在进步，经常地出现新的东西需要我们来理解，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新的东西是不能理解的，是会犯错误的，这是很长久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自然科学方面也是如此。自然科学家曾经长期的是唯物论者，可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那就是把物质看做某种不变的东西，把某几种简单的属性当做物质永久不变的属性（主要是机械的属性）。认为物质就是有质量的，有不可入性的，占有一定空间的，这些东西就是物质的惟一的性质。这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曾经从十七八世纪以来长期是科学的一种观点，到了19、20世纪初期物理学上有了新的东西出现，放射元素出现了，电子物理学出现了，那时有许多新的现象是机械唯物主义所不能解释的，

如电子这些最细微的东西的性质与普通的物质的性质就不同了，科学家遇到这些新的东西不能理解，他就会陷入唯心论的泥坑。譬如马赫是物理学家，他就研究这些现象，结果他不能理解，可是他又是必须理解的，因为他不能盲目的研究而必须要解释，而他解释的方法又只有机械唯物论的方法，当他没法解释时就只好抛弃唯物论说物质消灭了。因为静质量没有了，阳电子和阴电子结合起来变成光电子，静质量到哪里去了就莫名其妙了，既然原来他们认为惟一的物质性不见了，只好说物质消灭了。这就是说明了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是很旧的。因为是很旧的而他自己又没有研究新的哲学观点，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不能解决新的问题，就不能坚持唯物主义，这就是不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危险性。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坚持了唯物论，他用非常丰富的例子证明了离开唯物主义就会犯错误，就会走到反动方面去。这种唯物主义就是坚持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所以，唯物主义本身不是不学习就能坚持的。因为唯物主义本身并不是简单的。

有人把唯物主义看得很简单，以为只要承认物质就行了，以为只要把自己研究的东西、对象当做物质就叫唯物论了，这样的了解未免太简单。因为这个问题有时是很复杂的，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怎样了解物质，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时所能理解的，需要很多的说明才能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现在我只是说明这一点，即要经过研究才能辨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才能坚持唯物主义，使有限的不自觉的唯物主义变成自觉的系统的唯物主义，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地理解问题。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如果没有唯物主义观点是不能正确理解的，或者只能表面理解。所

以，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将唯物主义弄清楚，因为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有些同志往往有这种看法，认为哲学好像只是研究纯理论的问题，它和实践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中自然会有唯物主义的。研究科学的人也有这种看法，认为只要埋头研究就行了，不要研究哲学。这些观点就是对唯物主义错误的理解，即把唯物主义看做与实际没有关系，与自己的实际研究工作没有关系，认为哲学是空洞的，只有研究室里的研究工作才是实际的。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哲学是一种比较高深的理论研究，但它绝不是和研究工作没有关系的。哲学的研究并不可以代替实际的研究，但是它可以帮助研究工作——在思想上加以帮助。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都必须运用思想，有许多问题是不能简单地从直接的观察来解决，而是要在观察之后综合这个观察的结果，用理性认识来加以理解的，这个理性认识如果没有哲学观点去指导是不可能正确的。有这样的科学家，他认为我只相信我所能够看到的东西，我看不到的东西我就不相信。有这种意见的人在他看来这好像是唯物主义的，实际上这种想法对不对呢？如果某一个人只相信他所能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他自己实验过的东西，那么科学就没有办法可以建立起来了。因为科学的研究首先还要研究别人的东西，有些东西是继承别人的，别人证明了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研究了，同时还有些问题是不能简单地用看来解决的，是要依靠推理来理解的，不是一定要依靠直接的观察，而是依靠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推理，然后下判断，这样才能正确。科学中特别是高级的科学中的问题都是如此，如物理学这样的科学就是靠观察的结果运用思想做综合的。如果不相信推理，只相信自己的感觉、经验，那么许多理论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

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就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意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这种见解在我们的科学家中不是一两个人有的，这些人这样讲时还以为是自发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了唯心主义，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有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可以作这样的证明。我们碰到有些人说：我不相信物质是无始无终的，因为我就看不见它是无始无终的，如果你要证明物质是无始无终的这个道理，请你拿给我看。这实际上是一种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调。物质无始无终或者说物质不灭这种原理是科学上早已确定了的，哲学上比科学上确定得更早。在科学上资本主义国家是普遍承认的（在能量转化法则发现以后承认的）；18 世纪罗蒙诺索夫已经确定了这个原则，但是在今天我们还有人反对，其理由就是按照他们的经验主义不能证明。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简单的依靠经验来证明。我们只能依靠经验作为基础来加以推理，如果不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就更不合理了。如果你不相信物质无始无终而说物质一定有一个开始，那么我们就要问你：物质是从哪里开始的？物质开始之前有什么东西？请你回答：是什么东西引起物质的开始，什么力量推动物质开始？从这个回答就很清楚地看到，若不是宗教、唯心主义的回答还会有什么回答。因为不相信物质无始无终，就是相信上帝创造世界，他的结论就更荒谬更违反科学了。我们说，物质无始无终还可以有经验作为基础来加以推理，可以找到证明，上帝创造世界，请问你看到了没有？或者不是上帝创造世界而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它开始的，那么请问你看到这个力量没有？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靠直接的观察，而是要按照合理的推论的。根据人类的经验和合理的推论，我们坚决可以相信物质无始无终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经验，不能依靠我所

看到的东西来解决，一定要依靠思想。当然研究要以经验为基础，再加上思想的综合加上推理。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这些经验主义的学派，就是想取消我们的推理和取消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科学不能进步和理解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哲学的研究对实际工作和科学的关系是从思想上帮助我们去理解和综合各种经验的成果。如果我们不要思想而片面强调经验或实验，我们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在许多地方上犯很大的错误。这个问题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很清楚。《反杜林论》的旧序和《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这几部分是说明学习哲学的必要性最精彩的文章，特别是说明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的必要，其中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没有理论头脑的科学家犯错误会犯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指出了那个与达尔文同时发现进化论的华莱士。华莱士本来是对发现进化论有很大的功绩的一个科学家，但他后来却相信灵魂学。为什么他会相信灵魂学呢？因为他的思想纯粹是经验主义的。他认为灵魂学也在进行实验，凡是能够实验的东西都是科学，所以这也是一门科学，结果有许多江湖的骗子把科学家也骗了。因为搞灵魂学的骗子也好像在搞实验，他们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搞出一些幻想一类的东西，使科学家居然也相信过去的人的灵魂出现了。所以，科学家没有坚强的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要想使科学研究一贯到底都不犯错误是很困难的，虽然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进步，但要赶上社会的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速度是很困难的，就是现在我们有许多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家要理解也有困难，当然，搞哲学的人也是如此。不过有些问题哲学家早在几百几千年前已肯定了的，但是以后的科学家还不肯相信。还有就是在科学上已经肯定了的发现，但科学家在局部的小实验中所得出的小结论就违反了科学的结论，这样的情形也是

有的。进化论这个法则就是要肯定无生物变成有生物，“种”是一定要变化的而且物种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进化论就是基本上奠定了这个原则。可是进化论出现后的生物学又说物种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变化那就是没有规律的。这些地方都表明了那些搞科学的科学家不能有正确的方法来综合过去的科学成就，所以就不能正确指导他自己的研究，因而使科学停顿在一定的阶段上而不能前进。这只是讲科学本身的问题，即由于错误的思想方法使科学本身停顿了，但同时还有副作用。科学家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会把自己的伟大发现做出唯心主义的结论来，结果这个结论就使他失败，而反动派也就可以利用这个结论与宗教迷信宣传结合起来，这样，科学家自己本来不想反对人民的，可是他做出来的结论却被反动派借科学家之名来反对人民，至少用来麻醉、蒙蔽人民，使人民变成愚昧无知。现代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几乎毫无例外都要抓住一门科学的成就来加以曲解。马赫主义者抓住了物理学，柏格森抓住了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来加以曲解，他们用科学作为招牌来宣传反动的唯心主义。

所以，我想除了一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必须研究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以外，研究科学的人也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其原因主要的是两点，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为了科学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因此科学工作者就应该能够坚持唯物主义。

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

把哲学发展的历史简单地叙述一下，目的在于说明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哲学与科学研究好像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看得出来，这样一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整个哲学的历史，按照日丹诺夫1948年在关于西方哲学史讨论会的发言，他对西方哲学史的讨论做了结论。他告诉我们：整个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生发展和完成的历史。这样一个历史，一方面是与唯心主义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同时唯物主义又是不断地综合了当时的科学发展的成果建立起来的。每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的性质、产生，都有两方面的基础。一方面是社会的。唯物主义总是与革命运动、进步运动分不开的，它或迟或早成为革命阶级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它总是把当时自然科学综合起来才能建立成功的。唯物主义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的，自然科学发展到什么地步，唯物主义就有怎么样的形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非常密切的，自然科学影响唯物论并决定唯物论的形式，哲学又帮助自然科学解释了许多自然界的问题。整个哲学历史是这样的。

唯物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书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古代唯物主义是原始的唯物主义形式。十七八世纪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最后是19世纪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发展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否定之否定这个规律过去没有讲，根据苏联教哲学的程序和教科书是没有讲的。苏联去年制定了一个新的哲学教学大纲，在大纲里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一个哲学基本的规律来讲解，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这个规律，只有斯大林没有公开讲这个问题。按照苏联人的看法，斯大林在联共党史讲到辩证法的第三特征实际上包括这个规律。斯大林当时主要是把与实际斗争有联系的几个特点提出来做些简单的说明，

斯大林讲的是简单的哲学概要，没有系统地充分地去解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以没有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单独一个规律来讲。如果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来讲，那么这个哲学概要就不够了，所以新的哲学教学大纲就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规定下来并且在讲解上基本是恢复了在联共党史出版前的系统。从前从唯物论讲起再讲辩证法，而在联共党史出版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先讲辩证法，再讲唯物论，甚至有些人专门研究辩证法，有些人专门研究唯物主义。现在新的教学大纲是先讲唯物论根本问题，再讲辩证法，然后讲认识论。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自然界、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中，这个规律都是起作用的，所以掌握这个规律是有必要的。

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是经过三个阶段，可以说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出现过三种形态。

古代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形式。这是与当时科学发展的情况分不开的，当然也是与阶级斗争的情况分不开的。当时的唯物主义是奴隶社会里跟工商业有关系的奴隶主阶级以及当时的进步势力所掌握的哲学。有些国家不是奴隶社会，如像中国春秋时代可能是封建社会也可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个时代西方是奴隶社会，东方可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个时期产生了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是当时工商业发展有关系的奴隶主阶级以及当时的进步势力所掌握的一种哲学思想。凡是赞成唯物论的人在经济上、政治上，是主张发展科学主张发展生产力的，主张民主制度的。这是古代唯物论的特征。古代主要是有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只有到了19世纪才真正形成，以前对社会只有某些片面的知识。古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很幼稚的，初步对自然规律有某些认识，但是还没有建立起独立

的自然科学的部门。不管东方、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是分不开的，哲学家就是科学家，他们研究各种自然规律并把研究的结果概括在自然科学里。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像近代以来这种一门一门的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是没有的。这种情形告诉我们：当时的人对于自然界的规律已经开始有所了解，不像原始社会时代用宗教和迷信观点去解释自然现象。可是认识很不完全，没有一门一门的系统的完整的自然科学，这种情形就影响当时的哲学，所以当时的哲学是朴素性质的。当时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而且承认世界的变化是由于物质本身在变化。这些哲学家努力用物质原因去说明世界。

最早用来说明世界的方法，就是把世界的变化归结为一种或几种最原始的物质变化。认为一切东西由原始物质造成的，各种现象可以还原为各种原始物质，这是当时最早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情形。在西洋希腊时代，有些人认为世界原始物质是水或是气或是火。还有人把它综合成土、水、火、气，并且说这四种元素是构成世界的一切的原始物质。印度古代所谓土、水、火、气，中国把它翻译为地、水、火、风。中国最早的观点是气，认为有阴气阳气。老子思想具有这种萌芽，它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服。他有阴阳两种对立的观点，认为气是原始物质，后来中国还有邹衍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思想。在欧洲原始的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原子论是古代的唯物论。原子论把物质看成是最微小的不可分的原子，原子性质相同，但形状重量不同，由于形状重量不同，就组成不同的物质。精神也是一种物质，是一种最精致的物质。这是当时的原子论。和我们现在的化学原子论是不一样的。可是它是现代化学原子论的一种先驱，虽然它有不合理的因素，但是也有

合理的基本思想。这些唯物论是有辩证因素的，因为它承认物质是变化的，物质的变化不是由于神的原因而是由于自己的原因。

唯物论是在与宗教唯心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古代有些哲学家尖锐地反对宗教唯心论。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神。如果人的样子像牛，人也把上帝看成牛的样子。那时对矛盾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有冷热矛盾，它使事物发生各种变化。中国认为有阴气阳气两方面，原始物质由阴气和阳气而引起的。老子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希腊哲学家甚至明显地把对立斗争看成是发展的动力，赫拉克利特认为火就是原始的物质。他明确地提出：斗争是万物之父。这些哲学有这样的特点，这些哲学总的来讲，它的观点是正确的。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是有联系的有变化的。但其解释是很幼稚的，究竟什么东西在变化就说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很幼稚的，不能做出最高综合的结论，因此它对变化的内容做出许多主观的解释，如金、木、水、火、土这些东西。阴阳五行思想应该认为在当时基本上是唯物主义思想，后来加上一些神秘的因素是要批判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是在这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当时科学发展水平只能综合成那样的唯物主义。它对科学有没有作用？是有作用的。虽然解释有幼稚的地方，但是它能够综合许多现象，贯串许多自然知识。因此，它能帮助当时比较幼稚的科学研究，解释了许多现象。

在欧洲来讲，古代德谟克拉特原子论，一直到17世纪以前都是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他的原子论是被当时统治阶级所禁止的，他的著作是不能公开出版的。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就知道17世纪以前的哲学家差不多都偷偷地研究他的原子论，并且利用它来说明许多现象。为什么水烧热了就可以沸腾并把壶盖子掀起来？唯

心论是不能说明的，而原子论却可以说明，因为原子受热就膨胀、分散，就把茶壶盖子掀开了。古代物理学家、水利学家亚基米德研究水的比重，他在解释其规律时，就是利用原子论。后来到16世纪左右，哥白尼、布鲁诺一直到伽利略都研究和重视原子论的学说，因为他们所发现的许多规律，只有当时的原子论才能比较充分的说明。水利学必须把水看成原子来说明水利现象，我们现在的水利学就是用原子学说分子学说去说明的。有那样一个粗糙的原子论就可以说明许多规律，不能应用原子论就不能贯串他们的发现。从古代希腊到16世纪以前差不多将近一千年中间，科学家不顾统治阶级压迫去研究原子论。德谟克里特的著作能够留存下来，是与科学家坚持研究他的学说分不开的，不然它的学说早就淹没了。我们中国有阴阳五行学说，贯串了我们的医学知识，解释了天文地理许多自然现象，当然有荒谬的东西，看起来是可笑的，可是它把我们过去祖先所发现的自然知识联系了起来，至少可以使它成为一个系统，这对于研究是便利的。虽然有些解释是错误的，但对某些问题能够有系统地加以解释。

我们应该小心谨慎用科学的系统来代替它，不能一脚踢开。经过仔细的研究，要把精华抓住，把糟粕去掉。过去的农学、医学、天文地理的知识，是我们认为很可贵的知识和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不能简单地否定它的意义。它在实践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保证了对民族的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使人口繁殖起来。这些知识都是靠这种旧唯物论把它贯串起来的。所以不能轻视，不能简单继承和一概否定。除了这些学说还有哪些学说可以帮助我们的祖先去研究这些问题呢？唯心主义是没有办法的，唯心主义是不能帮助我们去研究古代的东西的。孔子的学说对医学没有做什么解释，孟子也没有对医学农学或天文地理做过什么解释，儒家这一派人

的哲学，在自然知识的解释上没有给予什么帮助，也不可能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把世界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天命，归结为精神的原理，所以不能说明自然现象。当时的唯物论尽管是幼稚可笑，但是阴阳五行的学说还是用唯物论来贯串自然的知识。由于这种作用，它能把知识、经验保存下来，至少是系统的记录下来或作为符号把它系统地加以整理。古代唯物论在过去对科学有这样的意义。从这一历史可以说明哲学与科学不是没有关系，对于科学绝不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科学家不用思想，只要他用思想就要用一种世界观来贯串他的经验和发现。古代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到了近代十七八世纪的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了，工商业也大发展了。科学就进一步的发展，因为科学与工商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十七八世纪科学离开了哲学，科学已经独立发展了。主要是力学，机械力学，科学已经离开了古代原始的幼稚时期，并且有着很大的进步。所以唯物论采取了新的形式。这个唯物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唯物论，首先在英国发生的有培根，后来有霍布士和洛克。17 世纪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这种唯物论，因为英国是资产阶级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 17 世纪已经取得胜利，工商业的发展也最早。当美国在世界上还没占优势以前，资产阶级英国在世界上是占优势的。

17 世纪有了英国唯物论。到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法国，在法国革命前又有了法国唯物论。在法国唯物论之前还有欧洲大陆的荷兰的斯宾诺莎的唯物论。斯宾诺莎在荷兰产生是因为 17 世纪荷兰是工商业很发达的国家，资产阶级最发展的国家。这时的唯物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这个时候科学发展的结果。它也就是建立在这个时期科学的基础上的新的世界观。这个时期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

其原因是与科学分不开的。它脱离了古代那种随便用原始元素去解释世界的幼稚的情形。这时期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第一是肯定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它根据科学的研究的方法做了这样的结论。在英国首先建立了经验唯物主义的思想。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培根就是用经验派的唯物主义反对中世纪的唯心主义。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期对物质世界是用机械力学的观点来解释一切。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但物质的本质所包括的一些基本的属性主要就是力学方面所决定的，如质量，不可入性，占有一定的空间的性质。把物质看成是一种固定的物体，把物质的本质看成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包含某些基本属性。没有这些属性就不叫做物质，只要是物质在任何时候都有这种属性。因此那时的唯物论就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不承认物质本质可以变化，对物质本质是用机械力学来解释，所以又是机械论的。当时可以说是机械力学胜利的时代。力学在自然科学上，在工业上得到了胜利，而且在科学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应用到工业上、水利学上起很大的作用。天文学上用它来解释天体运动，总之什么都用机械力学去解释。哲学家依靠这种科学的成就做出总结，根据这一点就想用机械力学去解释一切现象，有些哲学家写了这样一本书《动物是机械》，法国唯物论有个哲学家写了《人是机器》，当时的哲学唯物论的形式，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时候的唯物论是有缺点的，形而上学、机械性就是缺点。用简单的力学规律解释一切，连动物、人类都要用机械力学去解释，这是错误的。可是这个唯物主义还是起很大的作用，在社会上政治上成为反对迷信、反对宗教很有力的武器。特别是法国革命前的唯物主义，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成为当时反宗教的无神论的基础。对科学的研究因为用机械学来解释世界，对于力学的发展

起了一些作用，它肯定了力学一些规律，并肯定了力学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因此科学在这一种世界观基础上就进一步发展，其研究的成果使机械力学得到更多的发展，力学的胜利得到了世界观方面的肯定，因此科学家就根据这种世界观进一步研究自然科学。这种研究可以解释生物中的一些力学现象，因为生物中间也有力学规律的作用，可是不能解释生物中的更高级的现象。在解释自然界方面也是有限制的，因为它把物质看做是不变的东西。认为物质的许多属性是不变的，质量是不变的，还有认为物质本身不会变化的，不会运动的，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物质最初的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一问题上，彻底的唯物论者坚持用唯物主义去解释运动变化，但有些自然科学家有点动摇了，如牛顿它在解释世界最初运动时，就承认上帝最初推了一把。法国唯物论者坚持无神论，坚决地用物质本身的原因解释运动变化，因此在法国就开始有了些辩证法的因素，开始接触到物质内部矛盾的发展。虽然并没有明显的做出这个结论，因为它要说明物质自己的发展，所以在有些哲学家的思想上，就开始有了些辩证法萌芽的因素。近代唯物论大体上是这样。

机械唯物论对当时科学做了总结，贯串和综合了当时的科学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特别是力学的发展。但还有很大局限性，在某些方面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因此哲学唯物主义要进一步发展，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就要采取更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近代的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高级的形式，要总结新的科学成就是不可能的。机械唯物主义不能说明许多新的发现，即使是力学的现象也不能充分的说明。它只能说明十七八世纪当时力学的成就，对更进一步的成就就不能说明了，像能量转化的规律就不是机械力学所能说

明的。19 世纪科学发现不能不使唯物主义采取更高的形式。按照恩格斯提到的三大发现，这就是：能量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使哲学的世界观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就不能说明这些问题。机械力学无论如何不能说明进化论这种思想。有了 19 世纪科学产生以后就一定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就使许多事情不能理解。19 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家中间还有许多保守的思想，所以在许多科学研究方面还有许多保守的结论，因为资产阶级科学家不能适应新的发现来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微耳和的学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把细胞看成是生命的最后单位，这样一来就限制了生物学的发展，这样，无生物与有生物的联系就不能研究了。科学本来在有了进化论以后就应该更有信心的去研究无生物与有生物之间的联系。微耳和的学说就截断了这个联系，无生物与有生物之间有个不可跨过的鸿沟就是细胞。

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所做出来的保守结论，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当然这不仅仅是科学本身的原因也还有阶级的原因。资产阶级可以需要物理学发展比较快些，但生物学的发展对它没有最大的利益，所以生物学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慢。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要发展大的农业，生物学发展就有很大的必要，因此说，这与社会原因有关系，而由于科学世界观的限制也是有很大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是科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另外一方面还有阶级的背景。没有无产阶级出现，是不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至少不能使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完整的系统的世界观。原因就是除了无产阶级外任何阶级都有保守性，资产阶级用不着讲，它是保守的、反动的。农民行不行，农民也有保守性，农民是有私有财产的。

19世纪在俄国曾出现过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代表农民的，他们的世界观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可是不是很完整地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不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释历史，对历史的看法还是唯心主义的，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决定历史的进步，不懂得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这就说明，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还不可能完整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它已经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了，因为它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以，不能成为最高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级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按照日丹诺夫的讲法，有两点。第一个特点是：它是人民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武器，要真正被劳动者所掌握来改造世界的一种世界观。从前的哲学是在少数哲学家的集团中间来研究的，要影响社会就要通过少数的统治者，少数领袖人物。辩证唯物主义要把力量变成群众性的，要使广大群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的一切革命干部都了解。所以，这个哲学特别需要通俗化，使最多数的人能够掌握，因为它是劳动阶级斗争的武器。另一个特点是：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在这一点来说也与过去的哲学不同，我们刚才讲过了。过去哲学对科学有作用，它能贯串人们对自然的各种发现，能够使它成为有一个条理，并且使这些知识有系统地保存下来，它对科学有这个积极作用。尽管对自然界的许多发现的解释是不够准确的，甚至连阴阳五行的思想也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只能解释现成的发现，不能够作为进一步发现新的规律，成为证明新的事物的工具。碰到新的事物它就要垮台的。金、木、水、火、土这些东西按过去自然科学知识，水是有用处的，可以贯串许多问题，现在我们就看得出，它不能够真正充分地解释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的规律，特别不能帮助

我们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而且新的发现出来了，它是不能解释的。这种旧哲学对于科学的作用如果打一个比方说，就好像热力学里面的燃素说一样。没有运用分子运动这种理论来说明燃烧现象以前，没有发现氧化，就用燃素论来说明，燃素论是能说明一些现象的。在一个时期，燃素论能够解释许多问题，可是氧化规律一发现，燃素论立刻就被打倒了。燃素论能够综合一些知识和说明一些知识，但不能指导进一步的研究。有了分子学说，原子学说，有了氧化的知识，各种元素化合的知识之后，原子这种理论，就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就有这样的好处，它本身不是简单的对现成事物的解释，它本身就是所有自然科学的综合。它本身就是普遍规律。这规律绝不是主观的猜测，而是客观的规律。所以掌握了辩证法的规律之后，对于许多科学研究，就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在科学上帮助我们进行研究。

唯物主义原理就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思想要反映现实，坚持了这样的原理，我们在科学研究上就尽量避免主观的猜测，这是唯物主义的作用。辩证法的作用就是：我们无论研究什么，要注意到内在矛盾如何引起运动，这个方法总的方向也就是指导我们研究一切问题。无论研究自然、社会，掌握了矛盾法则，把它当做一个总的研究方向，那就不会错了。无论研究什么要注意其对立的方面，注意从各方面看，如果不从对立方面看而只从单方面看，尽管可以得到一些成就，但总会得出片面的结论，这个片面的结论如果扩大起来就会变成错误。摩尔根学派的孟德尔的遗传学说，是不是规律呢？也是一个规律，但是它只看到一方面的简单的遗传的规律，忽视了甚至根本否定了另外一个方面，除了遗传之外还有变异的规律。抓住一个遗传的规律而抛开变异的规律不去研究。不承认和不相信有矛盾，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辩

证唯物主义的好处就是：它不仅对于科学做出解释而且具有科学研究的工具的作用，作为科学研究的总的方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是由于它是人民的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比较顺利地进行，能够使我们在思想上不至于发生阻碍，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

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注意的原则

我们刚才讲的历史，主要是想从历史上说明一下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使我们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了解到学习哲学以及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讲到方法问题，那是比较复杂的。我想只讲些学习时要注意的基本原则。

（一）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要克服这种思想，就是一个科学者以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为满足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是比较普遍的，我们这几年来都听到这种讲法。刚才已经提到一点，以为研究科学的人就是唯物论者，因为研究科学的人天天与物质接触，与物质接触就是唯物主义者。这些人以为辩证法可以学一学，唯物主义就可以不学。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如果辩证法应该学，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应该学，因为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是不可分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至多是机械唯物主义，向来对科学家起支配作用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把物体的某些基本的属性当做永久不变的，一般的自发唯物主义多半是这种情形。所以，要克服自发唯物主义和满足于自发唯物主义的思想，就要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文选》二集）这文章里说到，科学家为什么会被唯心

论所俘虏，就是因为没有辩证唯物论思想。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也这样讲到的。刚才我们也举到例子，自以为是自发唯物论者的人，实际上已经是唯心主义了。我们接触物质是不是就能说是唯物论呢？自然科学家接触物质就是唯物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就不是接触物质，那么社会科学家就很容易是唯心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马克思是社会科学家，因为指导革命就是接触物质。可是不单只科学家接触物质，唯心论者你说他不接触物质吗？不能这样说，因为唯心论者也照样是接触物质的，问题不是接触不接触，问题是接触物质之后对于物质怎样的理解。18 世纪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如果要我承认有没有物质，我是可以承认的，问题是我对于物质给予我的解释。唯心论者认为物质不是离开我们的意识的，物质是我的感觉的复合，存在就是被感知，我知觉的才是存在的东西，这种解释就把物质变成精神了。唯物论对物质的解释是这样的，物质是存在于我们主观之外的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为转移的。我们的科学家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也承认有物质，物质就是我看到的，摸到的，拿来实验的。这些说法都使物质与我离不开，我不看见的东西，我就不相信。如果我闭上眼睛，那么物质是否存在，我是不相信的。这种想法就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来：我活着这几十年，我看见了有物质，因此，我可以相信，物质是存在的，但是，人类以前是否有物质，我没有看见，我就可以不相信了。所以说自发唯物主义有时是虚伪的，有时是唯心主义的，有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碰到了新的东西就不能解释，或者它所解释出来的结果，就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有些已经发展的东西，它是不能阻碍的，因为已经发现了。可是新的东西未出现以前，它对于研究就给予很多阻碍，甚至有了新东西的出

现，因为它没有看见，因而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所以要克服这种满足于做一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

（二）学习唯物主义要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这是联系实际的问题。学习过程中要运用所了解的原理来理解自然科学的知识，但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不要根据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做出一个普遍的哲学结论。因为哲学是一个普遍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各种科学成就的综合，是概括所有科学的结果。要照顾到各方面的知识，如果撇开各方面的知识，仅仅注意自己专门范围某一部分的成就就做出一个普遍结论来，就会有危险，就会有错误，因为这样的结论是片面的。孟德尔就是根据他的遗传规律做出普遍规律来，结果认为所有生物就是这样地遗传下去，永远这样，新种发展的可能没有了。爱因斯坦为什么在世界观上有毛病呢？有些问题就是因为根据局部研究结果做出普遍的规律来。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就是这样，它仅仅根据力学研究的结果，想做出整个世界的结论来。把力学的属性当做一切物质的属性，没有概括一切部门的东西，当然，在十七八世纪也不可能概括，那个时候除了力学之外，其他部门还是处于搜集和分类排列的阶段，没有找到根本的规律。现在看起来就很明显，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就是这种世界观，就是让科学研究的局部的成就做出普遍的结论。不是根据科学研究各方面的成就进行概括，所以其世界观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我们刚才讲爱因斯坦这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我们一点也不能忽视的。可是他把时间、空间看成是有限的，就是一种错误的结论。这是向唯心主义宗教世界观让步的结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结论来呢？因为他仅仅根据自己研究的局部的成就而做出普遍的解释，按照他那局部研究的结果，计算出我们人类所认识的宇宙有多大的范围。但是我们根据他所研究的相对论的结

果，除计算范围之外，是不是还有它进一步的范围，这一点，他是不考虑的。相对论我是没有研究的，只是在有些已知结论中引申出来的说明，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可以肯定做出宇宙是有限的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其错误来源怎么样，是否是像我这样解释是可以研究的。因为我没有专门的知识，而只有一些关于结论的知识。列宁反对物质消灭了那种错误思想也是这样子解释的。为什么物质消灭了，因为自然科学家把自然科学某局部研究的结果所造成的关于物质构造的概念作为普遍的物质的概念。把某一认识阶段对物质构造的看法，当做普遍概念的看法，所以错了。不要把片面的东西夸大为全体的，不要把局部的东西拿来代替全体。这是我们联系到科学本身所要注意的问题。

（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工具，只是科学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因为它不包括具体科学研究，它只是科学研究思想的总的方向，总的思想原则。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原则，经常保持我们主观与客观的一致，经常注意到研究自然，社会的各方面，这就对了。至于要在具体研究中做出成就来，就得在这一方向上进行具体分析工作。并不是说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知识，具体科学知识就不要了，就可以解释一切问题，这样想是一种空想，没有这样方便的办法。辩证唯物论能够使我们在思想方向上不至于走错路，因此使我们在科学研究上比较顺利，但不能直接解决科学问题。每一科学部门的具体问题，还是要经过具体的专门研究，因为思想方法是不能代替具体研究的。如果抱着这种希望去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是会失望的。如果希望讲哲学的人，就能直接帮助完全解决科学争论的具体问题，那是困难的，没有这样的研究哲学的人能做这样大的事情。如生物学上的物种的变化，究竟是突变还是逐渐过渡，这个问题哲学上不能直接解决的，

但哲学提出这样一个方向来，反正物种是要变化的，这是肯定的。至于要经过飞跃，那么是爆发的，还是进化的，只有具体科学进行研究。有时要等到找到了真正实验的材料，才能够证明其他各部分的问题。哲学研究只能规定思想方向，这个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方向错了，就费力不讨好。中国过去有一个故事：有人要到楚国，买了一匹马，楚国本来是在南方，马的头应该向着南方走，可是驾马的人向着北方走，人家问他为什么要向北方走。他说：因为我的马非常好，而且我善于驾御，所以走得很快，向北方也一定能走到楚国的。实际上怎样呢？讲这个故事的人，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人的方向错了，他的马愈好，他的错误就愈厉害。辩证唯物主义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如此，有这样的作用，就是把方向规定了。方向对了，就可以使你到楚国去，但不是规定了方向立刻就可以走到楚国，还是要有好马，还要有好的驾马方法才能行的。所以在研究辩证唯物论时对它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够轻视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但也不能抱着过分的幻想，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幻想，这样子我们才能耐心的来研究。有时会有一种急躁情绪，研究来研究去，解决不了本部门的具体问题，就觉得没有意义了，就放弃这个研究了。这一点是要说明一下的。

第五讲　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一、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唯物主义首先要肯定这一点，这是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出发点。如果不承认世界本质是物质的，就根

本上没有物质了。这个题目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只是讲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而没有讲世界就是物质的呢？普通我们讲话讲得不精密一点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比较准确的说法还是说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较为好一些。因为这个世界是包括很多很多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不仅仅是限于物质的现象，在所有的现象当中还有精神的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精神的现象是一种现象。如果唯物论根本否认任何精神现象的存在，这样的唯物论就太简单了，这就有点庸俗了。庸俗的唯物论就是有这种观点，就是否认任何精神的存在，把一切都简单的看做是物质，把精神也看做物质，这是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要反对的。

19世纪欧洲庸俗唯物主义者把精神看做是一种物质，那就是什么摩莱萧特这些人的主张：认为人的脑子产生思想就好像肝脏分泌出胆汁来一样的，精神跟胆汁一样的是一种物质。这就是简单地把一种精神现象看做是一种物质。这种理解是庸俗的、不准确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不符合世界的客观情况。我们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也不否认世界上有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跟物质是有区别的，它并不简单地就是一种物质，精神现象是物质活动的结果，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精神跟物质是密切联系着的，脱离物质就没有精神，可是精神并不就是物质。

庸俗唯物主义实际上跟唯心论有接近的地方，或者说至少跟二元论有接近的地方，原因是它把精神看做也好像是一种独立的东西，把精神解释成物质，好像精神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胆汁从肝脏里分泌出来它就可以成为物质，人的脑子可以分泌精神，精神分泌出来以后就好像胆汁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承认精神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这种思想从客观上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精

神可以脱离大脑，精神可以脱离物质成为独立的东西。其实这种观点就是接近唯心论，因为唯心论的出发点就是把精神看做独立的东西，精神不依赖于物质。简单的把精神看做物质，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看起来好像是很彻底的唯物论，可是这个极端是太过火了，走到反动那方面去了，使精神脱离物质，做出精神可以脱离物质的结论来。我们的观点是：精神是世界的一种特殊现象，不能简单地叫做物质，可是这种现象一定要依赖物质而存在。精神现象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运动形态，物质的一种作用——反映作用，神经系统，主要是大脑的反映作用，可是这种作用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精神现象。

物质的作用与物质的本身是有区别的。不能把物质的作用跟物质的本身看做是一样的东西，可是物质的作用绝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中国的范缜在《神灭论》这篇文章里对于精神和物质的解释是很准确的。他把唯物论的基本原则解释得很好，他就是把精神当做物质的一种作用，他使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作比喻，他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就好像“刀”和刀上的“利”一样的关系，我们切东西时，有“刀”才有“利”，如果“刀”消灭了，“利”也就没有了。我们不能脱离“刀”来说这个“刀”的利不利。说到利不利时首先要把“刀”的存在作为前提。可是“利”是不是就是“刀”呢？也不能简单的划等号，不能说“刀”的“利”就是“刀”，“利”和“刀”是有区别的，可是“利”和“刀”又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利”是依赖“刀”而存在的。精神的例子也是这样的。精神现象应该看做是一种物质现象，不能简单的看做是物质，可是它是物质的作用，因此又是依赖物质而存在的。

由于我们要承认世界有精神现象，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的一切就是物质，而只能说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

的，世界的一切现象归根到底是物质的表现，精神现象也就是物质的表象，可是也不能简单地说精神现象就是物质。我们说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就是说世界上一切形形色色的现象的基础是物质的。世界的现象是很多的，在数量上是无限的，看起来是分歧复杂的，可是，归根到底都可以把任何现象作为物质的表现，所以世界有它的统一性。世界现象虽然好像很复杂，形式虽然多到不可计算，可是有统一的东西。什么东西统一世界？什么东西使世界的一切现象具有统一性？这个东西就是物质。物质是统一世界的基础，是使世界的一切现象具有统一性的基础。物质这个概念把世界一切东西统一起来，把一切现象贯串起来。有许多现象并不就是物质，可是它可以和物质联系起来成为物质的表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首先肯定这一点，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任何现象从现象的本身、从现象的表面来说，不一定就是物质，但从其根本上来说，它是带有物质的性质。精神从现象上来说，精神不是物质，可是各种精神的根源，各种精神意识的来源，从它的来源上来说，它是物质的，它的来源是物质。

本质是什么东西呢？本质就是最根本的东西，是贯串一切的东西，是一切发展变化中的主流。毛主席的农业合作化的文章讲到本质和主流的问题。本质就是一种最根本的性质，就发展变化来说，本质就是发展变化运动中最根本的性质。世界上一切现象中间贯串一切的、贯串全体的作为根底的那种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物质。

所以，唯物主义一方面要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把精神看做是物质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实在，和把精神看做可以脱离物质独立存在并且成为世界的本质这种观点，但同时也反对庸俗唯

物主义的否认精神现象是一种特殊现象，简单地把精神看做物质。庸俗唯物论之所以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它的理论在实质上（至少对精神的看法上）是与唯心论有共同的地方。

唯物主义主要的不是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而是反对唯心主义。因为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按照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唯心主义一定要把世界的本质看做是精神的，精神是一切现象的根源，一切现象包括物质在内都是精神的表现。精神是什么呢？唯心主义可以有种种的解释。有的解释成为世界理性，在西洋多半把精神解释成什么世界理性。现代的反动唯心主义它们所了解的世界精神的本质是感觉、经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把世界的本质看做是一种感觉性的东西，看做是一种经验，说经验是世界的本质，或者说感觉就是世界的本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唯心论是用天理、天命这些概念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儒家的学说——孔子的学说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天命、天理是世界的本质。孔子开始有天命这种思想，否认天理的观点，到了宋朝比较流行。还有就是这个“诚”，孟子开始有“诚”这个观念。“诚”者物之始终。“诚”是一切的根源，不“诚”就无物，物质的始终就贯串一个“诚”字。这种观点曾为反动派、法西斯所利用，他们就是讲这套哲学的，即一切都是“诚”的表现。利用这种观点向其集团宣传说你们要“诚”，至于为什么要“诚”，内容就不讲了，总之你们跟着我走，就要诚心诚意地跟着我走。这种没有内容的“诚”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内容的“诚”就是盲目性，盲目地跟着人走。法西斯哲学就是这样来解释“诚”字的。所以，在世界的本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又是根本对立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原理主要的是根据一个问题——物质和精神哪一方面是主要的，

根据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解决。

解释世界本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在解释世界本质的问题时，把精神摆在第一位，把精神当做第一性的东西，因此说世界的本质是精神。唯心论是不是否认物质的存在呢？一般地说，唯心论是不否认物质的存在的，绝对否认物质的存在，这种唯心论是很少数的，这是比较蠢笨的唯心论。因为如果它们根本否认物质，它们就站不住脚，谁也不会相信它们。所以，一般的唯心主义都是承认物质的，问题就是物质是不是第一性的，物质是不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它们否认物质是第一性的，否认物质是根本的，这样巧妙地来站稳唯心论的脚跟。我们一般的人都相信物质，如果唯心论者说根本就没有物质，那么他就骗不了人，可是他们首先却肯定了一般人所相信的观念，然后进一步再加以唯心论的解释，说物质是可以认识的，可是物质不是第一性的东西，不是本质的。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进行一些诡辩，使人们不知不觉的就跟着他们走。没有一种比较有影响的唯心论根本否认物质的，它们仅仅是把物质摆在第二位。例如，英国的贝克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也不否认物质的存在，而且还在他们的著作中主动地提出有没有物质的问题。他说：我可以承认物质的存在，问题是我承认物质存在以后，我要加以我的解释，用我的解释来了解问题。然后他进一步来说：我怎样了解物质呢？物质就是被我所知觉的东西，我知觉的时候它就是物质，我不知觉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马赫主义就继承了他这套诡辩，马赫主义也是承认物质的，问题是对物质加以它的解释，那就是物质是感觉的复合，物质是有的，但物质不是在本质上就有的，它是感觉的复合。

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主要的是物质第一或精神

第一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承认一方面或者否认一方面的问题。唯心主义是把物质看做第二性的东西，看做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东西。唯物主义反过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是本质的、主流的东西。一切哲学、科学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方向主要的就是这样划分：物质是本质的或者精神是本质的。如果我们说世界、物质是离开我们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就是唯物主义的；如果反过来说物质只是我所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么物质就是依赖我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物质就变成第二性的，这就是唯心主义。所以,唯物主义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要承认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而不是简单地说世界就是物质的。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解释，所谓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这个本质是什么，以及我们对于物质这个本质应该怎样理解，对物质这个概念如何理解。这是唯物主义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了解得不正确，我们唯物论的观点就站不稳。所以，我们承认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以后，进一步还要把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把物质这个概念弄清楚。

我们要把物质这个概念弄清楚就要回顾哲学史，回顾过去的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唯物主义的思考经验。自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出现到世界上来，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很早的古代唯物主义和我们现在的唯物主义不同，但也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唯物论的和有辩证法思想。可是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是古代的，是幼稚的。除了古代的唯物主义之外，还有十七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过去的这些历史都是表明了我们过去的祖先，曾经努力地想掌握物质这个概念，他们经过了几千年的努力，然而这几千年的努力是不是完全成功了呢？我们研究一下哲学史就可以做出结论来。根据历史的总结，我们可以说过去对于物质的

概念是掌握得不完全、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和过去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应该有所不同，当然也有许多共同的方面，因为都是唯物主义都是承认物质的，但是对于物质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一点是不同的。为什么会有所不同？为什么应该不同？这就是因为过去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没有完全站稳脚跟。过去的物质概念在一个时候曾经为唯物主义者所相信，可是等到科学一发展就证明他们的那种理解是错了。过去的物质概念比较片面和狭隘，不能真正概括总的物质概念。古代的唯物主义者总是这样来掌握物质的概念，那就是用一种具体的物质当做物质的本质，把某一种具体形态的物质当做物质的本质，他们不是直接找到物质的本质，而是以我们生活中仅仅看到的这种物质的性质来代替物质的本质。例如：古希腊的泰勒士说世界最本质的是水，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我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最初把气当做物质根本的东西，后来又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思想，把这五种基本的物质形态当做物质的本质。那样的解释是很幼稚的，是站不住脚的。它的幼稚性在古代是看不出来的，可是等到近代科学发展后立刻就清楚了。我们绝不能说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就能够变为万物，万物又还原为五行。科学的发展证明这是错误的。所以，物质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水、火，或者是土、水、火、气，甚至于还不能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来概括。所以，用物质的一种形态当做物质的最根本的元素，这是失败的。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考经验，经过后来科学发展证明了它是失败的。我们研究哲学史就是要研究和总结过去人类的思考经验，研究过去人类考虑世界的问题时，哪些思考方法是成功的，哪些思考方法是失败的。古代的唯物论者一开始就能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用物质来解释

世界的变化，从物质本身来找原因，这是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成功。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对物质的本质的了解是失败的。因为他们那时的科学还很幼稚，没有更好的理解物质的方法，他们的一切思考方法比较幼稚，用物质的某一种形态来代替物质，这是失败的。我们现在的人研究古代的唯物主义时，就很容易了解古代的那种物质概念是错误的，知道那样的一种物质概念是应该抛弃的。

其次，十七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主义，他们也有过对物质概念的理解，但是他们的理解和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同样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这一点他们是成功的。但是，物质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怎样理解能够概括世界的本性的物质？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理解仍然是狭隘的。虽然他们不是那样幼稚地把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当做物质的本质，但是他们却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把某一些物质的属性当做物质的最根本的性质。他们选择物质的属性是按照科学发展的程序来选择的。当时是机械力学最发展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机械力学的物质属性（也可以说是关于物质的属性，客观世界中物质的属性），当做物质的最根本的性质。这些物体的属性就是包括质量、不可入性、占据一定的空间等等。有些人就把物质简单地看做是质量，甚至这样来看，质量就是物质的一切。这就是十七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物质的各种形态都不会变化，物体的这几种属性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所以他们的物质观念是形而上学的。他们这样来思考物质，所以叫做机械唯物主义。那时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常常把物质的属性分为两类：一种属性是第一次的属性；一种属性是第二次的属性。第一次属性是指质量，这些属性是永远不会变化的；第二次

属性是声音、颜色、光、气味等等，这些属性是经常会变化的。他们认为可以变化的属性就不是物质的本质，要了解物质的概念就要根据这种永远不变的属性来了解。什么叫物质？物质就是有一定的质量的、占有一定的空间的、有不可入性的、作为一定的物体存在的东西，这就叫物质。用这种方法来概括物质这个概念，这就是十七八世纪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对物质的了解。

这个物质概念对于我们的科学界和一般人的影响很大。我们对于古代的那种物质概念很容易懂得应该抛弃，因为那些物质概念是很幼稚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十七八世纪的概念是片面的、狭隘的，还是应该抛弃的。事实上这个概念早已站不住脚了。自从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电子学说和原子物理学这些微观世界的物理学领域开始以后，这个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点就应该抛弃。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科学本身证明了这种观点是应该抛弃的。

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等到放射性元素发现就早已抛弃了这个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马克思主义者凭着辩证法的思想和合理的思维来推出明确的结论来，不能把物质看做仅仅是有永远不变的属性那种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在 19 世纪中叶已明确地了解这一点了，当然这还是一种哲学上从逻辑推理出来的假设，在 19 世纪中叶还没有实验科学的证明。可是 19 世纪末科学就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质量的形态可以变化这一点在电子物理学中已充分证明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质量的形态是变的，静质量可以变为动质量，由静质量的阴电子和阳电子结合起来就变成光电子，变为只有动质量的这种物质。在现象上和形式上来看好像没有物质了，光子好像已经不是物质了，因为它没有我们原先所了解的那种静质量了，那就是说没有了那种起惯性的质量。可是你说它

没有质量那不行，光子有压力，表示了质量，而且质量的变化是可以用数学的公式来计算，光子和电子中间转化的结果有一定的数字可以表现，它那质量形态的转化还是遵守能量守恒这种原则的。这一种科学的发现在实验上证明了旧的物质概念应该抛弃——物质是具有永久不变的那种质量特殊的东西这种观点应该抛弃。可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能完全抛弃，因为现在的人很多还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19世纪能够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人只是少数，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而大多数人的脑子中流行的观点，不是唯心论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一般的科学家多半是倾向唯物主义的，在19世纪来说，有很多勇敢的唯物主义科学家，根据他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出唯物论的原则反对宗教，如德国的海克尔这样的科学家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尽管海克尔倾向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唯物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主要是他的物质概念是形而上学的，他把永久不变的质量当做物质的最根本的特性，当做物质概念中最根本的标志。在科学家中这种思考的方法一直继承到19世纪末年放射性元素电子学说的发现，这种观念还没有打破。科学家普遍地没有学过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不能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克服形而上学。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受传统的唯物主义影响的。因此他们对于物质总是当做传统的思考方法来理解，这样一来，碰到新的科学发现时就不能解释，仍然以为物质是永远都有质量的，任何物质都要有质量，永远不会变化的，或者反过来说有质量才有物质，没有力学中的质量就没有物质这样一种观点。现在虽然发现了物质的力学性的这种惯性质量还可以转化，可以变为别的东西，可是有一种旧的成见又在那里障碍着——惯性质量如果没有了就不算物质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如何解决？科学家因为没有放弃他的旧物质

观点，结果只好说物质消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想的那种永久不变的质量消灭了。其实并不是物质消灭了而是他们认为永久不变的那个质量的属性消灭了。可是他们却以为物质消灭了，把物质和质量划一个等号。他们的物质概念是狭隘的，是仅仅与物质的一个属性相等。这就证明了十七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是狭隘的，这时期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世界的物质性的本质的理解是失败的，对于这种思考经验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应该放弃这种物质概念，放弃这种十七八世纪的这种对物质的了解。这种物质概念的错误，就是把物质的一种属性或一种构造形态就当做物质，他们没有想到没有尝试过这样来考虑问题，那就是物质的属性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属性，物质的构造形态也不仅仅是这样的构造形态，物质的属性和物质的构造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是千变万化的，变化的数目是没有限制的。这些在旧唯物主义者中是没考虑的。受这种唯物主义影响的科学家也就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因此发现新的问题时就不能理解。列宁把这叫做自然科学的危机。这个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科学传统的物质概念与科学所发现的新的物质形态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不能解决，所以自然科学就发生了危机，对自然科学各种发现的旧的理解就要破产了。旧的理解要破产，新的理解又找不到出路，所以如果不在物质概念这方面来一个革命，不在科学界人们的头脑中对物质概念的理解来一个根本的改变，要想把科学的理解推向前进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危机就只有把哲学的物质观点、物质概念加以改变，如果不改变，自然科学在危机面前就没有办法挽救。

所以，我们现在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在了解物质是什么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要回顾一下过去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过去的

唯物主义者他们失败的经验。我们现在思考物质时要避免重复过去他们的经验，要重新开辟一条理解物质的正确道路。今天我们了解了历史，就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而要树立新的物质的理解，关于物质概念的正确理解。

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作为世界的本质的物质的理解，是根据了历史的经验，既避免了古代的幼稚性，也避免了十七八世纪形而上学的狭隘性、片面性，确定和掌握了一个正确的物质概念，真正的认识到物质是一个什么东西，能够把一切物质共同的特征完全掌握。这个物质概念在列宁的著作里最明确地表现出来。列宁告诉我们，我们所谓的物质就是指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识在外界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是为我们的主观意识所认识的，但它的本身是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客观实在。

实在这个名字有两种解释，马赫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也讲实在，也承认有实在。但马赫主义者认为实在是主观的实在。实用主义者的理解也是类似的，他们认为实在就是经验的实在，经验就是实在。实在是和我们的主观分不开的，我的经验所达到的地方就有实在，我的经验不存在的地方就没实在。唯心主义讲实在的时候都是讲主观的实在，讲精神的实在，是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种实在。不是依赖人的意识就是依赖一种幻想的神秘化了的意识，或者是上帝的意识、天命、天理这一类的东西。物质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是唯心主义对于实在的看法。

唯物主义者肯定客观的实在，肯定我们的周围一切事物都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它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依赖幻想的普遍意识为转移的，它是自己本身自然存在的一种客观实在，这种客观实在就是物质。一切物质最普遍的、共同的标志和

特点就是它都是客观实在。客观实在这个概念就能够概括一切物质，是贯串一切物质的一个最普遍的概念。这样来规定的物质概念就能无所不包了，就能概括一切物质的形态、属性和构造。不管是哪一种属性的物质，哪一种构造的物质，反正它都有共同点，那就都是客观的实在，都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东西，都是能够被人的意识所认识的，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于物质概念的理解。这样的对物质的理解才是最完全的、最能概括一切的，也是最深刻的，最正确的物质概念。

这样一个概念既避免了古代唯物主义的幼稚性，又避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狭隘性、片面性，它是一个最完全的概念，是永远能够站住脚的。这就是唯物主义者对物质理解的最高形式，也就是物质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它可以概括一切，无论自然科学还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个概念都能把它包括在里面，再有新的发现它还是客观的实在，不是主观的东西，不是感觉，不是精神。承认一切东西在本质上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在，这是我们现在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观点。科学研究最根本的出发点也是这样的。

科学家要使自己的研究能够进行，要对科学研究有信心，就必须要承认你所研究的东西是客观的存在，而不是随随便便从感觉中得来的，不是受上帝所支配的，它有自己实实在在的规律。你认识了这一点才能够有研究的信心。如果说是受上帝支配的，那么他研究来研究去而上帝不让他这样做，这又怎样办呢？如果仅仅是我们的感觉，那么感觉变了它的特点就变了，就没有什么可以掌握的东西了。一切都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想要研究一个客观实在的规律和研究出一个公式来就不可能了。因为虽

然我们今天辛辛苦苦研究出一个科学的公式或者找出一个科学的原理来，可是有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来对我们说：这不过是感觉的东西而已，感觉变化了，你就完了。这样我们还研究做什么？所以，真正科学的前提是要承认客观实在。

这样一个概念是不是空洞呢？这个概念并不空洞。因为定义好像抽象，但是它是具体的抽象，实际上是不空洞的。从逻辑上来说虽然好像是平凡，但外延是最广的，外延能够包罗一切。物质是一个最普遍的概念，既然它是最普遍的，那么这个概念就一定要能够包罗一切才是正确的概念。古代的物质概念不能包罗一切，它只能包括水或者是金、木、水、火、土，十七八世纪的物质概念也只能包括力学的物质现象，而我们现在这个物质概念就能包括一切现象。所以这才是真正地树立了最完全的一个物质概念。我们对物质概念只能这样理解，至于其他的东西或者是物质的形态，或者是物质的构造、性质，这些都是不能概括一切物质的物质概念。如质量仅仅是物质在一定情况下面的属性，惯性质量是在客观世界里面的物体的一种属性，超过了客观世界这个限度到了电子、光子这种领域里面，这种属性就要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把机械唯物主义那种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当做主要的、真正完全的物质概念，因为它是狭隘的、片面的。

关于物质作为世界的本质，物质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这样来理解。

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没有直接讲到物质与运动的关系以前，我首先要讲到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物质的观点。唯物主义要承认物质的永恒性、不灭性、无限性。物质的永恒性、不灭性、无限性在意思上都是一

样的。这个意思是说，物质从来就是这样，物质就是客观实在。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质是永远存在的。物质是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没有开始创造的时候，也没有开始消灭的时候。世界永远是物质的世界。

这种观点从17世纪以后，在自然科学上已经得到了证明。在17世纪哲学上开始提出了这种观点，后来十八九世纪自然科学家在实验中证明了这种观点。在哲学上是凭逻辑、合理思维直接推论出来这种正确的结论的。哲学上的这种观点，还没有等到科学上实验的证明，就已经从合理思维方面提出来了。

在欧洲法国的笛卡儿显然是二元论，但是他对物质的看法是唯物论的。他第一个提出物质不灭的原则，他这个原则也是根据他的二元论来的。二元论认为世界本质是两种，精神与物质是平衡的，不是精神产生物质，也不是物质产生精神，精神和物质是从世界一开始就永远平衡存在着的。因此，在逻辑上就一定要承认物质是永恒的，不会被创造的，不会被消灭的。因为精神不能把物质创造出来，因为精神是和物质平衡的。精神也不能消灭物质。如果说物质可以被消灭或者说可以被创造，那么，就走到了唯心论。因为这样设想，物质在创造出来以前就有精神，谁把物质创造出来呢？当然就是精神。根据这种逻辑的推论，笛卡儿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物质不灭性、永恒性、无限性的思想，承认物质是永久存在的客观实在。

唯物主义者也跟笛卡儿一样的承认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客观实在。不过唯物主义者反对笛卡儿的一个观点，就是把精神与物质看成是平衡存在的。唯物主义者要把精神看成为物质的产物。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之一，就是唯物主义只承认物质是永恒的，不承认精神是永恒的，只承认物质是世界的存在的普遍本质，

不承认精神是世界的存在的普遍本质。能够永远存在的物质是不灭的、无限的、永恒的。但精神只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阶段，在物质的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存在。太阳里面就不存在有精神，地球上才有精神，地球上也只有在有人类的地方才有高度的精神。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总是把精神看成是无限、永久存在的，物质是可以消灭的，物质不是永恒的存在。这是关于精神与物质哪一个东西是第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表现在永恒性的问题上的一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

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处贯串着，永恒性不永恒性的问题也是贯串了这个问题。唯物论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的，所以物质是永恒的。精神不是第一性的，所以精神不是永恒的。唯心主义相反地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就是说精神是最原始的、根本的，所以精神是永久的，物质是暂时的。永恒性的对立面就是无常了。唯物论主张精神是无常的，物质是永恒的。唯心论主张灵魂是永恒的，灵魂是不灭的，而肉体与物质是无常的。唯心论认为有个无常鬼，这个无常鬼专门跟物质捣蛋的，与肉体捣蛋的。唯物论认为无常鬼是附在精神本身上，精神本身就是无常鬼。唯物主义不承认物质的无限性、永恒性、不灭性可不可以？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成为唯物主义，这是一个逻辑的结论。如果要肯定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那就一定要肯定物质是永久的。不肯定这一点，就自相矛盾了。物质如果不是永久的，那么，物质怎样成为世界的本质、成为最根本的东西、最原始的本质的东西？所以物质永恒性、无限性、不灭性这种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是分不开的。

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必须要承认这种思想，这是形成唯物主义

世界观的不可少的条件。所以这对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说是非要承认不可的原则。不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则已，要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就一定要承认物质不灭、物质永恒性这种观点。如果违背这个观点，或在这个观点上有点动摇，那么就立刻离开唯物论。因为承认物质是有限的，那么，接着逻辑上就要来一个进一步的推论，物质是从哪里创造出来的？物质既然是可以被消灭的，那么一定是物质以外有一个力量把它创造出来，这样，就立刻走向唯心论方面。物质永恒性这个结论，唯物主义者不是纯粹的靠主观的唯心的推论。唯物主义的创造，主要是靠概括科学研究的成果，根据实践的经验，根据实验，揭示出许多规律，来总结出自己的观点。

所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还须要实践的证明，科学上的证明。科学上能量守恒、质量守恒这个规律，在十八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上已经证明了。苏联后来的材料证明，更早一点在罗蒙诺索夫的科学研究中就肯定了这个规律。这个质量守恒、能量守恒的科学规律是物质永恒性、不灭性很好的证明。质量只能转变它的形态，能量也是只能转变它的形态。至于它的根本数量是不会变化的，转化了以后并不增加一点也并不减少一点。一种物质经过化学变化成为另外一种形态的物质，拿它变化前后的质量来比一比，并没有什么增加减少。法国的化学家就证明了这一点。能量转变的过程中在数量上不能有所增减这种规律虽然是有限的规律，可是证明了物质是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的，不能增加一点也不能减少一点。要增加就只能是物质自己增加，物质集中起来或者物质分散了。不能用人的力量或者别的力量把已经有了的有限的物质，就物质本身来说把它消灭。或者，从无中生有，创造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从无中生有、从有中生无这种哲学是不合事实的。

唯心主义是喜欢这种哲学的，唯心主义根据之一就是认为物质可以无中生有，又可以由有变无，由无产生又归于无。老子哲学之所以有时候使人用唯心论来解释，就是因为他强调无这方面。我们说老子是唯物主义者，但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有许多东西被人给予唯心主义的解释，而实际上他有些东西也有唯心论因素的。佛教哲学里唯心论成分是最多的。佛教我没有研究，也许其中有倾向唯物论的派别。但是佛教那种虚无观点至少是给唯心论帮忙的。因为它把无当做终极的东西。世界由无产生又归于无，这种观点在佛教里表现得最典型，它用这种观点想要证明佛学的思想。这种由无到有，由有到无的观点是一种诡辩，不是一种根据事实的全面的分析。

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实和现象呢?有些东西可以由无到有，由有到无，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肯定是有的。从前没有人，但后来人生出来了，而人又是要死的。这不是由无到有，由有到无的现象吗？就是有这种现象，所以唯心论才能得出它那种结论。我们不否认有这种现象，既然我们承认这种现象，那么，怎样来证明唯物论呢?刚才我们讲，物质是永恒的。物质是不能从无到有的。我们如何来证明呢？要证明这一点就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具体分析。就是说：我们承认由无到有、由有到无的现象，这是指世界物质方面的现象。但是物质还有另一方面现象，就是世界由有到有，并不是由无到有。世界的根本情形是由有到有。物质本身的情形是由有到有。那么，什么东西由无到有呢？物质的某种具体形态，物质的某种构造，物质的个别方面，是可以由无到有、由有到无的。物质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所以，由无生物到有生物，有生物发展到猿猴又变为人类社会，这是由无到有还是由有到有呢？根本说来是由有到有。也有由无到有的，就是物质的形

态产生新的东西，物质出现新的东西。一百多万年以前，没有人类社会。一百多万年或五十多万年以来才有了人类社会。这个物质的形式是最高级的形式。从前是无的现象，但现在已经有了。可是这种形式是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就产生的呢?人类的前身是生物、是动物、是猿猴。有了猿猴才有人类社会。如果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类，就永远不会有人类社会。所以，人类社会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生物发展转化成的，我们不能说物质可以被创造可以被消灭，只能说物质是可以转化的。所谓转化即是说：物质的性质、各种形态、构造是可以转化的。物质是一刻不停的转化着，可是转化不等于被创造、被消灭。

唯物论和唯心论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有尖锐的斗争。究竟世界上这些物质现象是创造出来的，还是转化出来的。唯心论者说：是神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世界理性创造出来的。中国唯心论者说：是天命创造出来的，天命是天理表现出来的。中国唯物论者说：没有什么天命，而是自然。老子的哲学就有这种思想。但他过分地强调了“无”这方面，使人找到了一个空隙把“创造”这个观念加进去。但它的主要的观点是自然无为，无为就不是有意识的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转化的结果。物质是永恒的、不灭的、无限的。这并不是否认了物质具体形态是可以产生、可以消灭。可是发生转化、产生也不是凭空的，是由以前的物质形态转化成的。消灭也不是绝对的消灭，而是消灭了一定的形态又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所以，关于有无的学说，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应该这样看：首先是由有到有，然后由无到有。物质的存在是客观的实在、是永久的。客观实在也永久在发展变化，因此物质也有转化。某种形态可以由有到无、由无到有。作为物质来说，是永恒的。而物质的具体形态就不是永恒的。无常的东西只是物质

的一些属性，一些形态和构造。物质本身是永恒的。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形态，一种作用。所以，精神是无常的。物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属性，可以转变为无限的属性，但无论怎样转变，作为客观实在的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是继续存在下去的。因此我们根据物质的永恒性，不灭性这个基本的观点，再加以世界各种变化的现象就得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物质是永恒的，永久在运动的。一方面物质是永恒的，另一方面物质是永久变化发展的。物质不能被创造，不能被消灭，可是又不是停顿不变的。变化的是物质的属性、形态、各种构造。不变的是客观的实在。作为客观实在，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但从来也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这些道理在自然科学上得到证明。十八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就证明了这一点。能量守恒、质量守恒规律证明了质量守恒、能量守恒作为客观实在，不能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任何人有天大的本领，都不能使它增减的。它的形态是可以互相转化，而且一定要转化。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这个转化的。因为永恒存在的物质没有一时一刻是能停止变化的。所以物质把运动看成是自己存在的形式。运动变化发展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物质是永久存在的，但是它的存在是在运动中间存在的，不是静止不变、永远不变地存在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物质是不可能不变的。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不可理解的。唯物论者认为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理解的，反过来也是，没有运动的物质也不可理解。没有物质的运动不可理解，我们很容易领会。没有运动的物质不可理解，这一点是难以理会的，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物质的观念仍然受到十七八世纪形而上学的传统的很普遍的影响。好像没有运动的物质我们可以理解，好像对于物质就应该把它看做是不运动的。物质就是有某些不变的属性，传统的看法是

这样的。这种传统的看法，使我们不能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很难了解辩证的观点。这种传统的观点应该要放弃，应该认为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不可理解的，不合理的。

设想物质不运动这种思想我们应该感觉到是不合理的。这个道理也不难说明。理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设想物质本身不会运动变化，那么，我们根据这一点做一些推论，但不要违背逻辑的规律做一些认真的推论，我们将可以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会得出一些违背我们自己原来唯物主义观点的结论。这个推论是很容易的。如果认为物质本身是不会变化的，接着就会来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是怎样变化的，怎样运动的。物质不会运动，物质本身就不会变化。那么，请回答：物质变化、运动的原因，到底到哪里去找。这样一问，结果就很清楚，由于不承认物质自己会变化，结果就是说：从物质本身找不出变化发展的因素、动力、原因。因此就可能到物质之外去找物质运动、变化的原因。这一找就找到教堂里面去，找到唯心论家里去了。只能走这一条路，不能走另外的路。所以就走到很荒谬的路上去。物质是不运动的东西，这种想法骤然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但根据逻辑推论推上几次，一问一答，它的不可思议的地方，荒谬的地方就暴露了。这样推论下去，除非向唯心主义投降，问题就解决不了。如果坚持唯物论，这样一推论，就自相矛盾了。所以仅仅从逻辑上、理论上就很可以理解，把物质看做是不运动的东西，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谬的理解。

物质本身就是要运动，运动是物质的属性。要了解物质运动的原因，要在物质本身内部去找，用不着在物质之外去找。物质自己内部就能使物质引起变化运动。我们这种观点，不但逻辑上这样可以推论，而在自然科学上或者在科学研究上都可以找到证

明。任何一种科学的发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要研究、了解物质为什么变化，就从物质本身去找。

牛顿就是因为受形而上学唯物论的限制，又不肯放弃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他不放弃物质自己不会变化这个观点，那个时候他也不可能放弃。所以，只好说是上帝推了它一把，上帝是第一个推动力。只好跟宗教妥协。但是，后来的拉普勒斯到底比牛顿高明些。他发现了星云学说。大家都知道，拿破仑曾经问他：你的关于天体的学说里面，为什么没有上帝。他说：我就用不着上帝，天体运动是用不着上帝的。天体运动就是在天体本身可以找到原因来说明。这就是唯物论的。这种观点说明：在 19 世纪初人的思想已开始向辩证唯物主义方向走。十七八世纪是形而上学，19 世纪初就转向辩证唯物论。科学家中间有这种思想，天体运动就是天体自己本身的性质，用不着上帝说明。

科学上证明，物质的运动都可以从物质本身去找原因。无机界的运动、生物界的运动，人类社会也可以这样说。哲学上从古以来与目的论的世界观是做了长期斗争的。科学的发现都是证明目的论的破产。生物学上有这种目的论，认为生物好像是某一精神力量规定了一定的目标，生物一生下来就是那样。结果进化论就推翻了这个目的论。在社会学里，资产阶级社会学说都有目的论的思想。好像社会就是要实现某种道德原则、理性，好像有什么人要安排某种目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就证明了社会不是按目的论那种观点在发展，而是按社会本身的规律运动的。社会的运动规律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坚持唯物论的观点，就必须要坚持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的属性这样一种观点。

所谓运动这个概念，是比较广泛的。哲学上讲运动，不是像自然科学家单独是指机械的运动。哲学上说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

式。这个运动是包括变化和发展，质的转变。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当然也包括机械的运动。但是机械的运动只是一种低级的运动形式。物质的运动形式，除了低级运动形式之外，还有许多比它更高级的运动形式。

按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的说法，世界上有五种运动形式：一种是机械力学的，一种是物理的，一种是化学的，一种是生物的，一种是人类社会的。我的提纲讲三种：无机界，有机界，人类社会。无机界又分三种：力学、物理学、化学。照现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好像还应该加一种，就是微观世界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的规律与机械运动形式的规律很不相同，不是化学的，也不是简单物理的，机械的，而是有它独特的运动形式。这种微观世界的运动形式，应该排列在哪一级是可以考虑的。刚才我讲到运动形式，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机械运动是最低级的形式。其次，物理形式比机械形式高一点，化学比物理又高一点，生物、社会又高过化学的形式。愈高级的东西就愈更复杂。微观世界的运动形式恐怕还不能说是最低级的，不是比机械运动更低级的。因为这个运动涉及物理、化学、甚至生物方面更深的内部运动。电子计算机的运动与生物的神经的运动也有相类似的地方。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分类，微观世界这种运动形式应该摆在化学和生物形式中间。还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研究。从前恩格斯那个分类，包括不了电子物理学这些运动。大概高级的形式之所以更复杂、就是因为高级的形式总是包括低级形式。低级的形式就不包括高级的东西。机械力学里没有生物的运动，生物运动里有机械的作用。所以，高级的东西都是更复杂的，更复杂的原因就是它包括低级的东西。

运动具有各种形式。运动是物质的一种总的存在形式。但运

动本身又有各种形式。运动形式基本上是恩格斯说的五种，或者再加上一种。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就是科学分类的自然标准，是科学分类，科学部门的区别。物质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它所研究的运动形式不同。在几种基本的运动形式里，还可以作更细的区别。一种运动形式里，还有更具体的许多运动形式。譬如说：物理学里面有光学、声学、电学，可以有这些运动的形式。科学研究要求我们根据每种运动形式的特点来加以研究，要求我们掌握每一种运动形式特殊的规律。每一部门的科学都是研究每一部门的特殊形式的规律。也就是毛主席《矛盾论》所谓的特殊的矛盾。每一种运动形式有它自己特殊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各种规律。每一种运动形式有一种特殊的规律，特殊的规律是由特殊的矛盾规定的。机械力学运动形式研究什么作用、反作用，离心力、向心力这一类矛盾的规律。化学研究化合、分解。规律的基础总是矛盾。研究各种运动形式的规律时，就要注意科学的原则，就是不能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不能够简单地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说明高级的运动形式。因为每一种运动形式都有其特殊的规律。

这些问题在自然科学上多半不发生问题，有时也发生问题。在社会科学上就常常发生问题，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科学，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简单地运用比社会更低级的运动形式规律来说明社会，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用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用生物学的规律来解释社会。这种社会学的错误，叫做生物学的社会学。这种错误最流行是在英国。英国的斯宾塞是第一个系统地企图把社会当做一种生物的有机体来解释。英国资产阶级喜欢利用生存竞争这个规律来解释社会。这种解释对于资产阶级的目的是有利益的。因为它这样解释就可以把英国资产阶级

当做生存竞争中优胜者，而殖民地是生存竞争的失败者，是应该受支配的。这种思想一直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实际上想用生物的规律来说明社会。因此，硬要把人分为优等的人种和低劣的人种。

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就是想要用最低级运动形式说明一切运动形式。法国笛卡儿有过机械唯物论的思想。笛卡儿写过一本书《动物是机器》。后来法国的唯物论者也有这种机械论的思想。法国唯物论者写了一本《人就是机器》。这些都是企图由低级运动形式来说明高级运动形式，或者说把高级运动的形式简单说成低级的规律。这种方法就离开了科学。科学一定要能够正确地抓住每一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

当然，高级运动形式里面包括低级运动规律，所以也可以用低级运动规律说明高级运动形式的部分现象。人的生活，可以用化学的规律来说明，也可以用力学的规律来说明，也可以用物理学的规律来说明。生物的规律是不是可以完全说明人类社会呢？人类某些现象是可以用某些生物的规律来说明的，但是这只能说明部分的现象，而且不是人类社会中最主要的现象，不是人类自己生活的特点。医生对于人要用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甚至物理学、力学来说明，利用种种低级的规律来处理人的身体的种种疾病或健康的问题。可是医学绝不能成为社会科学。

医学是社会学以外的科学，社会科学只能研究社会本身的规律。首先是研究生产的规律，然后研究在生产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层建筑的规律。如果对社会本身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不加以研究，只要用生物规律或机械规律来说明这样的现象，就一定会犯错误的，一定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微观世界运动规律应该比普通力学规律更高级，比力学形式更高级。因为它是更深刻的

变化、更深刻的运动。因为它不是物体表面运动，而是物质内部很深刻的运动。所以，对微观世界的理解中间发生的错误，多半是企图用普通力学规律来说明微观世界的规律，就会碰许多钉子，许多东西不能理解。

每一种科学应该有它自己特殊的主要的东西。低级的运动形式比较简单，所以就只研究低级的特殊规律。高级运动形式规律比较复杂，有时它也附带着比较低级的规律，应用一些低级的规律。但是它的主要研究任务就是揭发高级的运动形式本身的规律。这些规律不能完全还原为低级的东西。庸俗唯物主义者想用简单化学的运动规律说明精神的大脑的活动，这是要失败的。研究人的大脑活动、意识活动，可以采取许多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方法，可以采取许多普遍的生理的方法。巴甫洛夫实验狗，它主要研究了大脑的生理学。运用这一些意识运动之外的比较低级的规律来研究，是可以的，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简单规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些话：人的意识尽管将来化学可以做一些说明，可是在化学上只能够研究出在思想的活动过程中，起了什么化学变化，或电学现象的变化，可以相应的采取低级的东西来说明意识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化学的规律就不能直接揭发思维的规律。这只能说明思维过程中起了什么化学变化、电学上的变化。它不能以这些化学、电学的变化去直接表现思想。思想的特征要用思想本身来说明，因为思想这种东西不仅仅依赖大脑活动，还要依赖社会的活动、社会的实践，古代人的思想活动，可能与现代人的思想活动在化学上的规律差不多的。古代人思考问题时与我们现在思考问题时化学过程可能是一样的，但思想内容根本不同。怎样说明古代唯物论就比较低级一点，我们的唯物论就比较高级一点。能不能直接用电学的现

象、化学的现象来说明呢？不可能的。

所以，研究大脑的运动的巴甫洛夫的学说，仍然是生理学。巴甫洛夫把他自己的研究活动归结为生理学，这是非常科学的，巴甫洛夫不直接把他的学说叫做心理学，而是说他研究了心理学的基础生理学。但是巴甫洛夫不这样吹牛说：我已经能够掌握一切的心理现象，我的研究能够直接说明一切的心理现象。这是严肃的科学家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物质运动形式，我们就是这样看的。

关于物质运动的问题，还有一个质量与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高深的物理学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不能解答，现在只能在哲学上一般地来讲质量与能量的问题。

从前把质量看做就是物质，现在，不管自然科学或哲学，都肯定那样的一种看法是错误的。质量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它表现为惯性，能够发生引力。从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质量，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属性。质量也可以看做是计算客观世界的物质的数量的标准。在客观世界里可以利用质量的属性来计算物质有多少，但在微观世界里就不大能够适应。我们计算一种东西，首先利用它的一种属性来计算，而不是直接计算它本身。我们量米是一斗一斗地量。就是利用它可以堆积起来成为一个立体，堆积到一个容器里用斗来量。量布有多少，是量布的长度。就是利用它有长度这种属性。物质的数量常常利用它在某种情形下某种属性来计算它的质量。质量可以成为计算客观世界的数量的一种标准。在这种范围内可以说可以依靠它的质量来说明它有多少。所以，质量守恒这个规律就可以证明物质是不灭的，物质是不能创造的。

能量是表示物质运动的一种规律，是计算物质运动的量的大小的一种概念。能量并不是一种运动的实体，而是运动的表现。因

为物质与运动是分不开的，所以，能量与质量也是分不开的。计算能量时不能不把质量包括在里面，离开质量是不能计算能量的。能量这个公式，总是包括质量的。能量和质量这两个东西是物质运动中间的对立的概念。质量是惯性即对运动的阻碍力量。能量就是克服这惯性的动量。这两个概念表现了物质的运动是对立面的统一。能量守恒的定律，是表示物质运动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同时也包括着物质不能消灭这种意思。

有没有能够脱离物质的这种能量呢？这种能量是没有的，不存在的。能量是密切地与质量结合的，能量是以质量为基础的。能量本身仅仅是质量在运动中间的表现，是克服惯性的一种程度上的表现。所以，那种可以脱离质量的能量是不存在的。唯物主义者要反对唯能量的唯心论观点。它认为世界可以设想有一种能量可以与物质无关系，设想世界有两种本体：一种是物质，一种是能力。这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有这种观点。吴稚晖就是这种观点。认为物质之外还有一种什么神秘的能力。唯物主义证实了运动是物质自己本身的一种属性。能量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是物质的惯性的被转移、被改变、被克服的一种表现。所以，绝没有脱离物质或质量的能量，绝不能设想物质和质量之外还有一种什么神秘的能量或能力。

现代唯心论的一派唯能论认为：可以设想这种能量，设想世界上有一种可以脱离物质的能量。这种唯能论思想主要是曲解了现代的物理学的一些成就建立起来的。从前没有唯能论的。自从有了电子学说，放射性元素的研究，这些规律出现以后，有些唯心论就利用并曲解这些科学的成就，来宣传这种唯能论的唯心论的思想。其理由就是认为质量可以消灭的，质量消灭后只有没有任何质量的能量。这是一种曲解。把质量看做和物质相等的东西，

质量就是物质，而且是把惯性质量看做物质。所以，惯性质量没有了的地方，就认为没有物质了。其次，它不懂得质量是可以转化的。质量有惯性质量和动质量的区别，而且可以转化的。阴电子阳电子结合起来变成光电子，惯性质量没有了，但是还有动质量。质量还是按照守恒、不灭和形态转化而存在的。量的方面没有创造，没有消灭，还是这样的。所以，光电子绝不是没有物质的能量，而是物质能量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是从电子转化过来的，电子中间所消灭的质量变为动质量，还是按照着严格的比例的关系，不过惯性质量这种形式没有了。光是物质的一种形式，光是一种物质现象。这种道理本来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说里应该得到充分的证明。

爱因斯坦的学说是对唯物论辩证法有很大贡献的。前一次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有点批评，说他有点唯心论因素，只是说他受了唯心论的影响。因为他有些结论可以得到唯心论的结论，并不是说他这个科学的成就就是唯心论的。他的相对论只能证明唯物主义的正确，而且只能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因此也就只能证明唯心主义的破产，同时也证明机械唯物论的破产。爱因斯坦的学说，在哲学上有很重大的进步意义。问题是他这个科学、他本身没有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他就受唯心主义的影响。不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是不能掌握的。原因是传统唯心主义思想和流行的唯心主义势力比较大，它无形中要影响人。爱因斯坦承认，他在哲学上受马赫主义的影响，所以，对他的某些唯心主义因素的批评，并不是否认其贡献伟大的方面，绝不是这样的。首先应该肯定其贡献的伟大，把他的某些唯心主义因素当做次要的问题来加以批评，只有这样才是实事求是。因为尽管一个伟大科学家他多么伟大，也总还是人。一个人总会有缺点的。特别是生长在资本

主义社会里的人。世界上没有神仙，没有全能的人，没有这种人。恩格斯著作里还有个别词句有毛病，斯大林曾加以批评过。现在也批评了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唯物主义者是把人当为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具体人看待。爱因斯坦在世界观上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前一次我讲到爱因斯坦把世界看做是有限的，这个看法有唯心论性质。可是有同志不同意，提出意见并写信给我，我表示衷心的欢迎。有意见提出来，很对。因为我没有专门研究，所以，我很需要大家提意见来研究。提意见的同志认为：唯心论的因素不是爱因斯坦的哲学。关于世界是有限的这种思想，爱因斯坦并没有把它做出哲学的结论。把它做出哲学结论来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英国物理学家歪曲了他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爱因斯坦负责任，可以研究的。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讲爱因斯坦的全部贡献，而是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要负一点责任，因为他使唯心论找到一个空子。他把世界看成是有限的。当然他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把世界看成是有限的，他也认为可以设想世界是无限的。无限是什么意思，譬如，我们把一些东西堆起来，无限的堆下去，可以无限的堆满空间，因为空间总是占不完的。爱因斯坦的著作中设想了这个问题，设想可以有无限的思想。但问题在他的宇宙论里，他认为宇宙可以做出一个有限的模型来。提意见的同志认为：他说做出一个模型来，并不是真的东西，不是真的就这样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不是真的东西，模型是不是与真的东西根本没有联系，这是可以研究的。譬如说我们讲地球是圆的。理论上讲它的本质，地球大体上是圆的。地球究竟是不是圆的呢？具体讲起来并不是很圆的，但从本质上讲是圆的，至少是有圆的趋势。讲地球是圆的并不是错了，就地球的本质来说是

完全正确的。我们对地球做出它是圆的这种结论来没有错误，因为我们只讲它的本质，不讲它的具体的每一块的情形，因为科学理论一般是讲本质。既然在宇宙论方面爱因斯坦做出宇宙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因此爱因斯坦大体上是把宇宙看成有限的。虽然具体来讲，宇宙还有膨胀，对宇宙还有种种看法，但做了这个结论，就把宇宙的本质看做这样的东西了。所以即使本人不直接做出唯心论的结论，但是唯心论就可以利用。在认识论上爱因斯坦受马赫主义唯心论的影响是肯定的，因为是他自己承认的。在宇宙有限的这个问题上至少给唯心主义留下一个空隙。对这种科学的伟大的发现不能作轻易的最后的论断，我讲的不是结论，只作为意见，给大家考虑。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有毛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他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爱因斯坦的东西是不是最后的绝对真理了，我想，不应该这样讲，尽管他的贡献很大。如果我们的确能够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毛病，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考证他的缺点，使其缺点得到弥补。这样就可以开辟一条发展科学的道路。我前次讲的不是结论，这次讲的也不是结论。但可以提出来大家考虑，当然主要是给专门研究的人来考虑，不专门研究的人，不一定要考虑的。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有同志写信来给我，所以我做些解释。

三、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时间空间这个问题是与运动的问题分不开的，除非我们不承认物质是能够运动的。如果要承认物质是能够运动的，同时就要承认运动是在时间空间里面运动。所以时间空间和运动一样，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有物质就必然有运动，也就有时间和空间。能不能设想有一种物质，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运动的。它并没有

占据空间，也没有在时间上划分连续性？这样的物质是不能设想的。不在时间和空间之内存在的物质是不能设想的，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可以这样来说。

唯心主义者往往是不这样看的。唯心主义哲学常常认为世界或者只有时间或者只有空间，认为可以设想世界可以脱离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唯心主义哲学具有这种思想，因为唯心主义不承认世界存在有物质，不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我们中国对于法国的唯心主义者柏格森也很熟悉，他认为世界仅仅是在时间里存在，无所谓空间。世界仅仅是时间的连绵，空间只是我们人的主观的一种虚假的幻想。世界真正的内容，只在时间里发展，原因就是他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生命。这生命只是没有任何物质的一种仅仅要求发展的生命的力。因为不是物质，所以，没有占有一定空间，只在时间上连绵不断的发展下去。这是这一派哲学的看法。

还有黑格尔。黑格尔哲学认为自然界没有时间而只有空间。只有空间的距离，没有时间的继续。黑格尔的哲学把自然界看成是死的、不会变的，是跟绝对精神相反的东西。按其哲学体系讲，他认为是先有绝对精神。绝对精神然后表现为自然，外化成物质的形式的特点，是没有时间的发展，只有空间的距离。他不承认世界是能够发展的。这种唯心主义哲学，不仅仅是违背科学的，按常识说也是莫名其妙。但唯心主义就是这样来说明世界。

唯物主义者就一定要承认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的客观形式，是跟物质分不开的。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没有物质是不能设想有空间和时间，没有物质的运动也是不能设想，同样，没有时间空间的运动也不能设想。曾经有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认为，时间空间可以离开物质来设想。这就是说，把时间空间看做是物

质之外一种空的框子。物质钻到时间空间里，并在时间空间里运动。这种想法，对于许多人来说好像是对的，似乎时间空间是物质之外的框子，是一种死的现成的框子。现成的摆在那里，物质可以任意钻到里面去发展。物质本身好像没有时间和空间，而时间空间是用来容纳物质的东西。这是一种普通人的错误观念。可是这种观点在十七、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流行时，这个观点相当普遍，许多人相信这种观点。科学家也相信这种观点。牛顿对时间空间的观点就是这样看的。现在许多人甚至是研究科学的人也以为应该这样来看时间和空间。世界如果不这样看，有些人会以为反而是不合理的。我们说时间空间绝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有物质才有时间和空间。这对于普通的人来看或者甚至研究科学的人来看，好像是不能设想的。关于时间空间的问题，批判唯心论比较容易，而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是比较不容易的。

究竟怎样来解决和说明这个问题，怎样使人深刻相信，离开物质就没有时间和空间。这是我们讲唯物主义的问题时比较麻烦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自然科学上本来相对论已经证明了时间空间和物质就是不可分的。从这一点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贡献是很大的，通过科学的专门研究而把牛顿的绝对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推翻了。离开时间空间来设想物质那就会犯错误的，同样的离开物质来设想绝对的空间和时间也是不可能的。空间时间是随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是相对论证明了的真理。在科学上证明了的真理，普通人很不容易了解，要通俗说明时间空间不能离开物质这是比较困难的。相对论是比较高深的理论，用普通的语言，使普通人也能了解和相信，这是讲哲学的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科学这样讲，凡是现实的时间和空间是与物质结合的，在生活上设想的时间和空间不能离开物质。那样抽象的所谓

绝对的空间时间，离开物质的空间框子，是脑子里抽象的空想。

现实世界里，凡是接触到具体的时间空间，一定不能离开物质。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个意思就是说，时间空间只是物质的形式。哲学上有个原则，叫做内容决定形式。具体时间总是被内容所决定的。譬如，我们如何计算时间，总是以一定的物质运动为标准来计算的。或者运用地球绕太阳一周作为单位，或者用地球自转为单位，或者用钟表上的针走一点钟或一分钟为单位。没有一个具体的物质运动为标准就不能计算时间。天文学上计算时间，是以光年为单位的。没有物质的运动就没有办法去设想具体存在的时间。空间也是一样。我们处在什么空间，什么地方，这总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在地球上什么经纬度，经纬度第几度，总有一个物质的关系做标准。离开了一定的东西，离开了地球上的经纬度，就没办法设想是处在空间的那一点，没有办法考虑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联系到一些实际问题来谈时间空间的问题，就更容易了解些。譬如说，一切东西，一种事物，它的发展的速度如何，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像这样时间我们可以问一问，是怎样决定的。譬如，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究竟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这种运动的时间性是什么决定的？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很容易清楚了。很明显，我们党的中央最近规定在今年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明年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在三年内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是我们脑子认为应该这样就这样子规定，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脑子里曾经认为完成合作化时间要慢一点，去年有些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所想的，认为合作化要很慢地发展，他们对这件事时间观点是很慢的，后来中央纠

正了。最初在纠正的时候，正确的思想本身对于时间的看法也没有这样快。什么时候做出最后确定在两三年内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还是在运动高潮起来了以后，看到这个运动的确快得很。根据现在运动表现出来的速度，才能够比较准确的估计到明年后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合作化。如果没有运动高潮起来，我们只在房子里想，无论如何不敢估计得那么快。要想正确的认识一件事情的时间性，绝不能凭自己脑子的公式来估计。一定要根据事情发展本身的具体条件，根据物质内容发展情况，规定它要多少时间。所以时间跟物质是不可分的客观的实在。

空间的问题也这样子。譬如盖一个房子，盖一个礼堂，应该盖多大，能不能凭我们脑子里的主观决定。我们喜欢多大就多大，那是不可能的。决定房子要多大，就要根据房子的内容来决定。这个房子的作用是演戏，是演戏用的。那么，就要考虑到坐多少人，要照顾到光学、声学问题。离台后面太远了，戏台上的东西后面看不见。太宽了，两边又看不见台子。还要照顾到建筑力学，力学内容，声学、光学、用处等各种内容条件弄清楚了，然后才能大体上确定所盖的房子要占多少空间。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盖出来的房子可能太大或太小了，就变成废物，或者不能够做到我们所想要的发挥它的作用的目的。

解释时间空间的不可分性，用实际工作的例子来说明，就很清楚，什么是时间空间的物质的存在形式。这意思是说，这个问题要掌握得正确，就不能离开物质的内容。要估计到时间的速度，和发展的范围。做任何事情都要正确地估计到这两个方面，这就要根据物质的内容来估计。绝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根据这样的说明我们就可以批判唯心主义，也可以批判机械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最典型的就是康德的观点。康

德认为时间空间并不是物质自己本身的形式。照其哲学来说，物质本身我们是不能认识的，物自体不可知。虽然他可以肯定有物自体、物质这个东西。但物质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认为我们是不能认识的。既然物质不能认识，因此，物质本身有无时间性空间性，这个问题也不能确定。因此，时间空间就不能说是物质本身的存在形式。那么，应该如何了解时间空间？康德回答说：时间空间不过是我们自己感觉本身的一种直觉、一种直观形式。时间空间不是物质本身存在着，而是人的主观感觉有这种特性。人的感觉生来就能够把周围的世界当做一种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东西来加以感觉，而不是物质自己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反映到我们感觉里来，而是感觉自己要把周围的东西当做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来感觉的。康德认为时间空间是人的主观感觉的一种先天存在的直观形式。人一睁开眼睛就有这种时间空间的感觉，而不是靠外面反映来的。所以，照康德的说法，如果应用到实际生活方面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正确地掌握周围事情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用不着去研究物质本身的条件，只要根据我的感觉去决定就行。我感觉到一件事情在时间上要发展得多么快，在空间上扩大到多大范围，只要凭我的感觉就可以决定。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这种观点就是不对的。不仅不对，而且是危险的。我感觉到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这种理论的结论就是这样：一切凭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决定。有没有这种人呢？这种人是有的。普通人有这种主观思想，以为只要按主观感觉去干就行了，没有什么解释，没有理论。但是唯心主义就把这种有主观主义的普通思想概括成哲学的理论。就把这种思想巩固起来，所以我们要从理论上彻底地去反对唯心主义。康德把时间空间看成是直观形式、这种看法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并不是吃了饭没事做，

而非去搞些空理论不可，不是的。因为这种理论为主观主义辩护，所以，我们要反对，从理论上撤消主观主义的基础。

机械唯物主义没有把时间空间当做人的主观形式。而是承认时间和空间是在主观之外独立存在的。机械论把时间和空间看成是永久不变的现成的框子、空格子，物质自己本身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时间空间这个框子摆在那里，物质钻到框子里去发展。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它把时间空间看成不受物质影响的东西，固定的不变的空的格子，因此它就不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样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就是根据物质本身内容来具体掌握时间和空间。照机械唯物论的看法，物质自己本身没有一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相反的，物质为时间空间所决定。有多少时间就应该有多少物质，物质就应该要在多少时间里去运动。譬如说，我们开个会，我们可能有这种组织会场的人，他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一个会起码要开三四个钟头，会场起码要坐一千多人。因此就不管什么会他都排三个钟头，用一个坐一千多人的场子。或者开一个小的谈话会，本来五分钟就谈完，因为他规定了三个钟头，于是人们就坐在会场乱扯三个钟头。机械不机械呢，很机械。这是机械唯物主义。有没有这种人呢？这样极端的例子好像很少，但是多少接近这种情况的人是不少的，相当不少的。这些人脑子里客观存在的跟物质没有关系的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他认为是很唯物主义，认为不是主观的想法，而是客观的标准，应该如此。认为一个会没有三个钟头就不像话了，甚至连一个小小谈话会也要规定三个钟头。也许有的会要开七八个钟头，也只规定三个钟头。这就是机械论。哲学上的理论绝不是跟生活无关，仔细想一想，把我们实际方面普遍存在的情形想一想，就会知道理论有实际意义的。机械论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就

是为这种人辩护的。凡是机械地规定了时间和空间的人总以为非如此是不行的。像这种观点就不是物质决定时间和空间，而是时间空间决定物质了。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是把事物与客观物质情况相脱离的。这是我们研究时间空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了解它的必要性，就在这一方面。

空间和时间是不同的。空间是讲物质所涉及的范围，物质自己本身所扩大的范围。空间一般都是三度的，长宽高三度。时间是讲物质发展过程里面前后的联系，不是讲物质扩展的范围。时间没有什么三度，时间只有一度。相对论把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叫做四度空间。实际上时间和空间有区别。空间有长宽高。时间只有不断的向前继续。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在时间发展过程中，物质有循环的形式，但物质循环的形式不是时间的回头。时间是没办法回头的，它只能有一度，只有过去和将来。所以，所谓多度空间，这也是把时间空间结合起来考虑的。不是空间之外还有空间的另外一度。长宽高结合时间的连续就叫做四度了。因为不这样设想是不近情理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为什么呢！并不是有个神秘的时间是无始无终，因为物质是无始无终的。

有同志提出的问题说，时间没有终了，是可以设想。时间没有开始就好像有点难设想。提这个问题的同志意思大体是说，设想时间有开始是容易的，好像比较合理些，反而时间没有开始就很难设想。如果仔细想一想，我们设想的物质在时间上有个开始，是不是容易设想呢？我看，不见得容易设想。是不是比时间没有开始更容易些，不见得。要设想物质在时间上有一个开始比设想物质在时间上没有开始更难一些，更不合理一些。因为只要闭起眼睛来设想，时间有个开始，立刻就会发生问题。时间在开始以前有什么东西，开始以前还是时间。不是物质的话，那就是上帝

了。上帝以前又是什么，这样一来，上帝是无始无终了。要想反对物质的无限性，结果得出一个上帝的无限性。

只有设想时间没有开始，世界的物质从来就是这样子。这是最合理的讲法。每一个具体物质的发展是有开始的，这具体物质开始以前又有更早以前的物质，无限的想下去都是物质。有始有终是个别的物质，无始无终是物质的全体。物质的具体形式、具体构造、具体属性是有始有终的，都是可以转化的。物质的总体、整个世界的统一体是无始无终的。时间只有一度，没有始、没有终，一去不复返，因为物质本身是这样。客观实在永远就是客观实在。客观实在从来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任何人能创造的，也是不能够消灭的。我想，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就是这样。

四、物质的运动有其自己本身的规律性

辩证唯物主义根据各种自然科学的成就总结出一条原则，就是一切物质不仅仅是自己本身能够运动，而且这个运动是有一定的规律。要了解世界的物质性，如果不同时承认物质有自己的规律，这个了解就不能完全。

我们讲过物质这个客观世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物质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有自己的规律。运动的物质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种规律是物质自己本身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的主观意志所不能任意左右的。什么样的物质就有什么样的规律，每一种物质都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运动，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例如，自然界的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总是如此的。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而每一

种社会又有每一种社会自己的规律。

唯心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规律。唯心主义反对或者否认客观规律有各种方法，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客观唯心主义的如黑格尔哲学。客观唯心主义也把世界事情的发展看做好像有自己的规律，但是它把这种规律看做是某一种思想公式的表现，某一种思维公式的表现，好像并不是物质自己的规律。如黑格尔认为世界一切东西都是有一点必然性，可是这必然性完全是按照世界的理性的要求表现出来的。事实上他的所谓规律并不是客观规律，而好像有一个事先预定的目的，他不是承认客观规律，首先是承认一种和宣传一种所谓目的论的思想。一切的客观唯心主义都是这样的。好像世界事先预定了一个什么目标什么过程，而世界就是按它规定好的过程顺序达到那个目标。黑格尔的世界观就是这种，好像最初的世界精神要想表明自己认识自己，有了这个目的，因此就把自己先变为自然，然后再变为社会，社会的发展过程到最后就能认识自己，或者到一定程度就出现黑格尔这样的人，把绝对精神自己本身认识清楚了，好像世界的发展就是为了认识自己，理性就是为了认识自己。这实际上不是一种承认客观规律，而是为了把世界看做为了某种目的的一种预定的过程。这不是承认规律性，而是把世界看做客观某一种公式的工具。

特别是对于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学都是目的论，好像这个社会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初期的资产阶级认为这个社会是为了实现某种永久的正义。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从尼采起到柏格森这一类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好像人类社会是为了实现某一些优越的人的支配地位，优秀人种的支配地位。尼采就是主张要做

“超人”，争取要做“超人”的。“超人”就是掌握权利的人，能够压迫别人的人。后来这个哲学就被希特勒所发挥了，发挥成为一种优秀人种，这种糊涂的人而把亚利安人看做就是一种“超人”种，它是应该支配人类的。

我们中国也有一个梁漱溟。梁漱溟本来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后来他又用客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他说，社会的发展是为了实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名字叫做“意欲”，“意欲”有一个目的，它是要想向自己的内部钻得更深，因此人类历史第一阶段是向外发展研究科学，第二个阶段就稍为向内部来观察一下，就会发展玄学。发展科学就是走西方的道路，发展玄学就是走中国的道路。人类发展到最高的阶段是向“意欲”的最深地方钻进去。什么地方呢？就是宗教信仰。所以他断定世界发展到最后是要普遍信仰宗教的这样一种反动的世界观。客观唯心主义是说世界在表面看起来有一种客观必然性，有一种规律性，而事实上它把这种规律看做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为了实现世界精神一定的目的，因此它那种规律实际是一种公式，不是从物质自己本身里面去找规律，而是自己脑子中设想一种好像合理的规律，用公式来说明一切，我们思想中如果有公式主义，其思想实质就是接近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就根本不承认有规律性，根本不承认世界发展过程有必然的东西，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偶然是主要的东西，必然是表面的现象，不承认有必然性。主观唯心主义与我们最接近最熟悉的是实用主义，是胡适的实用主义。胡适公开地主张我们只承认偶然论不承认决定论。也就是不承认有什么必然规律。世界的发展是由许多偶然原因决定的，所以世界的前途是没有办法能够预见的。我们说世界一定要实行共产主义，他就以为不一定，

有什么原因使共产党也会垮台的。他这种理论的反动性就表现在这点，宣传使人们不相信客观规律，这样来使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心被打消。

这种偶然论的思想在近代科学里面有一些科学家还在宣传。如生物学上的摩尔根学派对于新种的发生认为是偶然的。如果新种的发生仅仅是偶然的，我们就不能希望用人的力量来利用生物发展的规律，使它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服务，我们就没法用人的力量按照发展的规律来培养新的物种，这样就剥夺了改造世界的信心和能力，也就剥夺了在生物界中改造生物的信心和能力了。所以，尽管这一学派在个别的实验中不会不是事实，可是它的总的方向是反动的、反科学的。个别的材料我们可以参考，这点不能抹煞，因为科学研究总要做一些实验，如果实验是经过很多时候反复实验的，它不会一点材料也没有，问题是他们抓住一个片面的事实做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来。

米丘林派李森科的学说有没有缺点？当然也有缺点，否则在苏联就不会展开这种批评了，可是这些批评还是要研究的，这些批评可以说不会是都不对的。因为即使李森科的学说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是有缺点，甚至于有个别的错误，但是问题是他的总的方向是对的，那就是他坚决相信物质有自己的规律①。生物界也是一样绝不是偶然的。生物界以外的东西有必然的规律，种的发展也是有必然规律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如果认识了，是不是认识得完全。生物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这是肯定的，为什么我们对它的认识会有些困难呢？因为生物学比较复杂些，因此它

① 这是艾思奇当时的看法。科学界对李森科学院有不同的评价。——编者

的规律也就更难以揭发。越是高级的规律就越难揭发，例如脑神经的规律就是很难揭发的，因此大脑的生理学发展得最迟，是不是它就没有规律了呢？不能说没有规律，现在巴甫洛夫的学说所揭发的规律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揭发的规律当然是很少，今后还需要很多人去努力，但是他揭发了大脑的一些基本规律这是肯定的，尽管很多东西没有揭发，未知的东西是有的，但这不等于将来就不能揭发。我们站在米丘林这一边来批评李森科学派主要是因为他的总的方向是对的，尽管他还有缺点。不完全的地方是应该批评的，不展开批评的科学就不能进步，科学发展的动力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物理学上，一些科学家也宣传这种偶然论的思想，主要就是电子学说中有人主张电子好像是有自由意志的，没有因果规律的，不服从因果规律的。其理由就是说电子很难观察，你观察它的时候你的仪器的作用就要影响它，使它原来的运动就观察不到。以这样的理由来说明电子是有自由意志的，微观世界中的变化是没有规律可寻的。这是过去物理学中相当流行的论调，这种看法是和物质消灭了的论调一样的，其来源是由于科学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机械性的。因此碰到微观世界的那种特殊的情形就有点唯心解释了。这个机械论主要的关键在于不了解主观的能动作用对于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也起影响的，这个影响并不等于否认了客观规律，而是说客观规律加上主观的努力，客观就会有所改变，但它仍然是规律。这不只是电子观察中主观与客观有一定的影响，在社会中更为明显。

社会生活有它的客观规律，但是如果革命势力这个主体的力量加上去，那么它那个规律会有所改变的。例如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的经济基础，如果仅仅根据经济基础

来看问题，就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但是，问题是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有了很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反对战争为和平而斗争的这种力量已很强大。那么这个主体的力量加到帝国主义体系方面影响着它，结果战争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当然，有帝国主义，那个经济基础还是存在，可是，有这个经济基础就产生战争的这种必然性就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社会生活的观察总是要在实践中观察的，我们要了解合作化运动，就要参加到运动中然后才能真正地了解它，可是一参加进去你那领导者的主体就参加进去了，而合作化的发展也就不同了。观察者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影响到客体，因此使规律也有所改变了。但这并不等于否认规律，而是说条件发生了变化使规律也有所改变。

过去物理学中的意志论是不懂得这一点的，以为只有离开观察的主体的电子运动才算是客观规律，如果观察的主体——仪器和观察者的作用——一加上去就不是规律了。因为它原来的规律有所改变，就改变成自由意志了。其实这个还是规律，不过加了一条件，那规律就有所改变。

现代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者用种种方法想要否认客观规律性，利用自然科学的种种困难（事实上也不是科学本身上的困难，而是因为科学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碰到科学上有新的问题在解释上的困难），做出否认规律性的结论来。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哲学都是利用进化论。由于生物会变化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时特别轻视微少的偶然的原因，由微小的变异变成大的种的变异这种理论为实用主义者所利用，认为发展都是偶然的，都是由偶然的原因引起的。柏格森用神秘的方法加以解释，认为生物之所以会变是由于神秘的生命力在起作用，生命力是没有规律的，是完全

凭自由意志盲目地向前追求的。你要找规律是不行的，你只能体会它这种盲目性。所以这种哲学是公开反对科学的。他们说科学太形式了，科学把一些事情都看成是死的规律，你要了解生命，你就要闭上眼睛像和尚念经一样地从内心里面去体会，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流动在时间里面的绵延是什么一种味道，他们是宣传这样的一种主张的，这无非是把世界说成一种盲目的、简单的求生欲望的活动的表现，最后就可以做出法西斯的结论来：生存第一、谁能够掌握权力谁就能生存，谁能够取得支配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这些政治上的反动结论是跟否认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而现代的这种否认客观规律的哲学思想是常常利用科学中的某些困难来加以曲解的。

辩证唯物主义坚决承认物质有自己的规律，这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左右的。因为物质有自己的规律，因此物质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你如果认识它的规律，你就可以利用这种规律来改造世界，如果你不认识这种规律，你就无法做出任何事情来。这些规律是物质自己的规律，不是什么有一定的目的的。规律从哪里来？规律是由物质自己的各种条件决定的，不是由于某种精神安排的。什么叫做规律？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很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这个定义，他说，所谓规律就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各种现象之间的辩证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所以规律并不是由于精神预先安排好的一种目的、一种步骤，而是由物质自己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一种发展的趋势。物质的相互联系就是具体的条件，有这样的条件就有这样的规律，如果条件变化了，那么另外的规律就来代替它。从前当帝国主义占优势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有了新的条件战争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

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偶然论，坚决坚

持事物有自己的规律性，但对这个规律性的了解还要跟机械唯物主义的了解加以区别。机械唯物主义对于规律的了解是简单化的。机械唯物主义不大能够注意到规律性的千变万化的这种性质，即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规律。所谓机械唯物主义就是以机械的规律来解释一切的。这种唯物主义，碰到了新的情况，它那种机械的规律就不能解决，就发生困难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意义还可以把它讲得广泛一点，我们说机械唯物主义企图用力学的规律解决一切，主要是讲十七八世纪的情形，以后科学发展了，科学界已经知道不仅有的规律是主要的规律，还有其他的规律，这时就产生另外一种在性质上类似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喜欢用低级的规律来说明高级的规律。低级的规律不一定是机械的规律、力学的规律，但凡是用低级的物质运动形态去证明高级的复杂的东西，在实质上这就是跟机械唯物主义一样的。从生物学规律来说明社会，认为人类社会也是按生存竞争的法则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碰到人类社会中比较复杂的现象就不能解释，结果只好用唯心主义来解释。譬如对生存竞争这就没法解释，结果就要补充一些别的东西，或者说什么人类社会还有一种新的原则——互助的原则，人类社会虽然有生存竞争，但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互助。这样的一种看法是有的。我们刚才讲到物理学中说电子有自由意志，这就是对物质的认识上有点机械论的因素。因为在这样的科学者的头脑中，是不大能够注意到运动规律会跟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的。大的物体的运动是可以用力学的规律解释的，可是细微的物体如微观世界中的电子这种微小的运动，简单地用机械力学的观点来解释就不行了。物质的物体缩小到电子那样微小时它的条件就变化了，本质也就变化了。数量变质量，由大变小，这就是一种新的条件直接发生变化，运动规律

也就不能简单地跟普通力学规律一样。由于科学家对物质在空间运动的观念是普通机械力学的观念，因此一到电子这样微小的物质运动就有很多现象不能说明，他就只好取消因果论，用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这种原则来说明。机械唯物主义对于事物的规律如果是用这种机械的观点来看，迟早是走不通的，走不通时往往就会滑到唯心主义那方面去。

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规律性问题上，一方面要反对唯心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就是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偶然论。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就是反对它不注意到规律性是依据条件而变化的，不懂得这个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规律的观点就是认为物质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预先安排的，不是偶然的，而是物质自己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因此要注意到条件变化规律也就会变化。这样一个观点对于科学研究有很重大的意义。科学家常常能够不自觉的运用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往往又会在某一个问题上就忘记了这个观点，就不能遵守这个观点，这样在一些问题上就会碰钉子。所以，把这个规律的正确观点弄清楚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第六讲　物质和意识

今天讲物质和意识。这一题分三部分：一、物质是意识的根源；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三、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讲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大致从这三方面来讲。

一、物质是意识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首先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这是研究这一问题时的最根本的原则。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第四题里已讲清楚了。

整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甚至可以这样讲，世界上除了物质和物质的运动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如果认为物质和物质运动之外还有其他东西，这种看法不是唯心论就是二元论。唯物论一元论的哲学。对于世界的本质，唯物论把它看成是物质的，用物质这个概念来概括世界的一切东西。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形态，都是各种各样的物质的属性。物质、运动与属性是不能分开的。在讨论中有的人把它看成是两件事情，这就使得有些问题搞不清楚了。物质是总的概念。这个总的概念包含有无限多样的物质运动形态和物质的属性。离开了各种物质的运动形态，各种物质的属性，就没有物质。

物质的定义是列宁所制定的。物质是客观实在，为人们的感觉所认识。所谓为人们的感觉所认识，是包括直接的认识和间接的认识。有些物质的运动不能直接被人们的感觉所认识，但经过科学仪器的帮助、科学实验的帮助或者经过实践、生产，是可以被我们的感觉所间接认识的。原子能是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但变成原子弹，原子能的功，动力设备，就可以在感觉上被人所认识。作为一种客观事物是直接或间接在感觉上被我们所认识的东西。这是一切物的共同点，这是物质的共同点。讲物质概念就是把一切物质运动形态，把它的共同点加以概括，物质概念的定义是包括一切物质形态和属性的。

物质运动形态和物质的属性就是物质的各种表现，或者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物质。说桌子就是物质，这是不很确切的，但也可以说桌子就是物质。说生产关系是物质，也是不够确切的。但生产关系也就是物质的关系，因为它是整个世界总体的一方面或一部分的一种表现。离开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和形式，就没有什么物质。整个世界就是物质和物质的运动，物质的各种各样形态和表现。物质运动形态和属性的变化，就是物质本身的变化。物质本身是会变化的。不变的是一切物质共同的特点，即作为客观实在这点是任何物质都具有的。它是一切物质的共同的普遍特点，是永久不变的。但是除此之外，物质本身是千变万化的。物质本身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变化，它的变化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属性。这些变化就是物质本身的变化。世界就是这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即客观存在的，通过我们感觉可以认识的客观实在的世界。除了这个不依赖人的意识的客观世界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另外的世界。从这一观念出发，不能不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物质是世界惟一存在的东西。除了物质和物质运动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意识是什么东西？意识不是物质之外的另外的东西。意识是物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第二性的东西，用哲学的名词讲，是派生的东西。因为世界上只有物质，从物质派生出意识的现象，所以意识是第二性的。由世界的物质性这一根本观念出发，必须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如果说：意识是物质之外的另外的一种东西，那么世界上就有两个平行的本质，这就是二元论。二元论再进一步就会成为唯心论。二元论在肯定意识独立性之后，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即把物质和意识加以比较，结果认为意识比物质更有活动性，更有能动性，物质是死的东西，

只有意识才是活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必然发生进一步的错误，即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上，认为意识是主动的，物质是被动的，这就走到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所谓第二性就是说意识没有独立存在的资格或地位。精神意识只是物质的附属品，是派生出来的东西。

坚决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最主要的就在这点。凡是唯物主义总是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精神看做第二性。而唯心论是把精神看做第一性，物质看做第二性。

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个原则我们讲了好多遍，但是讲唯物论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这个原则要在一切问题上坚持是不容易的。过去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都没有能够彻底坚持这个原则。一般地只能解释自然界是物质的，精神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谈到社会问题就把精神看成是第一位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比以前唯物主义有种种优点，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根本不同的地方之一是在坚持唯物论这个原则上最彻底最坚决。无论任何问题都坚持这个原则，主要的还在社会问题上坚持这个原则。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主义者不能够坚持这个原则。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贯彻这个原则。贯彻这个原则是不容易的。

我们在讨论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有人怀疑生产关系是不是物质或物质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物质的表现。讲生产关系是不能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只是生产的一方面。生产就是社会这个物质的最根本现象。生产就是物质的一种形态，是整个物质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整个世界物质发展的最高的一种表现，所以它是一种物质现象。物质的现象就是一种物质。如果讲话时说，生产

关系就是物质，就有点不确切。为什么不确切？因为这就把部分当做全体，把一方面说成是全体了。说得精确些，应该说生产关系是一种物质现象或一种关系，不能说就是物质。但粗糙些说生产关系就是物质也可以，不能说有什么根本错误。像我们说桌子是物质，这是不够确切的。如果说桌子是一种物质就确切了。光线就是物质也没有错，或者说光线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就更确切些。平常说话说得粗糙些，说这个也是物质那个也是物质，没有什么问题。更科学的精密地讲，应该把部分的物质现象叫做物质的东西。从总的，全部来讲就叫物质，从部分讲是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就是物质。物质的东西与物质没有根本区别，只有部分和全体的区别，各个方面和总体的区别。有这个区别所以就有两种说话的表现方法。把这两种说话的表现方法绝对分开就不对了。把物质本身和物质的属性分开是不对的。把物质本身和物质的表现形态当做两种事情也是不对的。物质的形态就是物质的表现，这样说就对了，当我们深入研究哲学时，往往在部分和全体，总体和各个方面分不清楚，有时把它们割裂，结果就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原则。认为生产关系就是物质，似乎有点难说，于是就把生产关系与物质加以形而上学的区别，再进一步就把生产关系看成好像是离开物质的一种主观形式。这样一来就走到了唯心论。

苏联曾经有一种少数派的唯心论（1928——1930年）即德波林的唯心论曾经主张：生产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是人的主观思想范畴的一种表现，他们把生产关系看成好像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概念，好像在客观实际中没有这种东西。这种思想叫做唯心论的思想。怀疑生产关系是物质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有可能产生向唯心论动摇的倾向。但不是说有这种思想就是唯心论者。生产关系与物质是一个东西，或者说生产关系是物质的一个方面，对

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就有离开唯物主义倾向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现象也是如此。物质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一方面的表现，与世界总的物质分不开，因为它是客观实在，是能通过感觉被人所认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要思索一下才能认识，要得到这个概念先通过感觉观察之后，然后综合起来成为生产关系这个概念。生产关系是客观实在，也是我们经过观察才能认识的。物质的东西是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整个人类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产的过程，所以生产是第一性的东西。社会的意识是生产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东西。这些问题将来研究历史唯物论时还可以进一步更具体地说明。我们提到这些问题，是因为在讨论中曾涉及到，而这些问题不能说已经最后解决了。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一点，即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坚决的，彻底的，无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一种派生的现象这样的原则。

怎样了解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一原则呢？对这一原则了解的方法有好几方面，也就是说要从几方面来了解。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个原则基本上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意义：1. 承认世界的发展是物质在先精神在后。世界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要承认物质在先，精神在后。2. 物质是主体，精神只是物质的作用。用中国老话讲，是体和用的关系，物质是体，精神是用。精神只是某一些物质的一种作用，不是一切物质都有这个作用，只有高级物质才有这个作用。具体来讲，具有脑神经的动物，才能够有意识的作用，精神的作用。3. 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意识这个字可以有两种了解：有广义的了解，有狭义的了解。广义的了解就是：凡能对周围事物多多少少有所认识的作用，就叫做意识。凡是有感觉的动物都可以说是有意识的。所谓有感觉

不是指那些没有专门分化的器官，如眼睛、鼻子、耳朵等来表现它的感觉的动物，而是指有各种各样的感觉器官，能够综合各种感觉器官的印象成为一种认识的动物。感觉器官有了分化的动物才有意识。低级的动物和植物具有对刺激的反应作用，给它一个刺激，就有一定的反应。一般植物也有反应快慢的不同。含羞草被触动一下，就会动起来。一般植物对太阳，空气，水分，也有反应，但这不能叫做意识。意识是有感觉的认识。有了分化的感觉器官，能辨别各种各样的感觉，而且能综合各种各样的感觉，通过脑神经细胞组织把各种感觉综合起来，形成对外界事物的一种具体认识或形成一种知觉，就是通常所谓有了认识。单细胞的东西，能够对有利的刺激接近，而对有害的刺激能够离开，逃避，这种叫做简单的刺激反应，它类似感觉，但不就是感觉。经过各种各样的分化的感觉器官综合各种感觉形成各种认识，把这叫做有了认识，这是对意识的广义的了解。

对意识的狭义的了解是指自觉意识，是与行动的盲目性对立的。所谓自觉意识是指能多多少少认识周围事物的规律性，而且按照规律性的知识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这叫做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可以说是只有人才有的。动物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动物只有感觉的认识。但是不能说它有意识。因为动物对周围事物虽然有感觉认识，但不能认识规律性。最高等的动物具有能够认识一些规律性的萌芽的能力，可以说具有萌芽的意识，但绝不是自觉的意识，因为动物整个生活是受自然支配的、是盲目的。如果把意识解释为自觉意识那就是指人类意识。

人类意识也是有历史限制的。人类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有充分的自觉意识。社会主义以前的人，在行动上不是经常有自觉意识的。相反地常常是盲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无

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外，其他都是具有盲目性的。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是资本家所不能支配的，看起来这些人也常常讲道理，好像满有意识，但其行动是盲目的。资本家有点自觉性是在什么情况具有的呢？可以说，自从有资本主义以来，恐怕只有在新中国这两年来的资本家才有点自觉性。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子就有了自觉性。资本家如果反抗社会主义改造，以为这样就很懂得自己是资本家，既然自己的前途要被消灭，所以就要反抗。这种反抗实际上是很盲目的，除了碰钉子和一败涂地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只有接受改造才算是有意识的，反抗的人就是在受盲目行动支配。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注意对意识有两种解释。社会科学方面讲的意识，通常是指自觉意识，就是狭义地来了解意识。马克思讲过，原始人，野蛮人差不多没有意识。原始人，野蛮人离开动物形态不久，所以严格地说，没有什么意识。只有掌握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之后，多多少少根据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来行动才算是有意识。当然，过去在生产方面就是原始人也不能说一点意识也没有，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根据自然规律有计划地来制造工具，但对社会的认识，自觉性就发展得很慢。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有了充分的意识。有些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觉得封建社会要打垮，因此就提出了一些理论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可以说，这是有自觉意识的。但资产阶级一上台就失去了自觉意识又按照资产阶级盲目规律来行动。所以，如果狭义的来解释意识，意识的产生是非常迟的。按广义地来解释，可以说世界发展到有了分化的感觉器官的动物就开始有意识。按狭义来解释，可以说世界有了人类之后才开始有意识，没有人类以前还不能说世界的物质

产生了意识，有了人类之后才能说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有意识的物质。

讲了这么多的材料，目的在于证明一点，即以整个世界来说物质在先，精神在后。承认先有物质后有精神这就是唯物主义。前次讲课讲到孙中山的思想，一般地说是唯物主义的，因为他很明确地讲到这一点。孙中山把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1. 物质进化阶段，2. 生物进化阶段，或者说有机界进化阶段；3. 社会阶段。这样来看世界发展的这种世界观，当然是唯物主义的。这种世界观与唯心主义相反，唯心主义总是想把精神放在第一性，用一切"理论"企图说明：没有自然界以前，就有精神存在，如果没有精神也就没有物质。一切宗教观点，客观唯心主义都是这样主张的。黑格尔主张：没有自然界以前，世界上首先有绝对精神——一种抽象的理论在活动，这种理论活动完了，然后变成自然界。他主张：自然界是有限的，自然界有一个开始，自然在开始以前是精神，是上帝。这种观点与唯物主义是相反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已经被一切科学发展所证明。科学每一种新发现都证明："自然界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唯心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自然界自己在变化，自己在发展。唯心主义与宗教思想企图用一切办法来证明它们的观点。可是它们的观点总被新的自然科学的发现所驳倒。

根据人类几千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做出这种肯定的结论：自然界在先，精神在后。凡是相信自然科学的人，很自然地就具有这种世界观。20 世纪以前的科学家或资本主义科学家，有一些人往往相信上帝存在。这是因为受了社会上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科学家不研究哲学，科学本身是反对宗教的，但科学家自己没有放弃宗教观点。

除了物质在先，精神在后这一点外，还要坚持一点即物质是

本体，精神只是一种作用，精神不是物质之外独立存在的。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第二性这一基本观点的另一方面就是:物质是体,精神是用，精神仅仅是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具有脑神经的物质才具有的一种作用，即意识作用，或精神作用。离开人的脑子有没有精神？离开人的脑神经就不会有精神。

凡是唯物主义者，一定自然而然地有这种主张。凡是真正严格地按照科学成就来概括世界上一切事物，在科学成就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人，都承认物质是实体，精神是作用。

中国古代最明确地从这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六朝时候的范缜。范缜明确指出：物质是体，精神是用。这位古代的唯物论哲学家，为什么能提出这种主张？因为那时佛教开始传播到中国，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有害的，因此这位哲学家就起来反对佛家的影响。当时是五胡乱华的时候，那时西北比较接近原始时代的民族，向南方进行侵略。这些各种各样的民族中间，有一些民族利用佛教来作为侵略的工具。在陕西起来侵略晋朝的符坚，就与佛家有很多联系。中国最有名的佛学家如久益法师就是在符坚那里做工作的。随着民族的侵略而来的就是宗教思想的侵略。范缜是梁武帝时的人，他来到了南京这一带。梁武帝把佛教当做国教。这种宗教对人民起着很大的麻醉作用，对生产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因为它宣传一种灵魂不灭的学说，说是人死后升天堂。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迷信传统。用这学说来迷惑人民，要人民向地主供奉，要人民向寺庙供奉。为了来世的幸福，老百姓有时倾家荡产，把全部家产供奉到寺庙里面。统治者用这种方法对人民进行高度的剥削。封建统治者平常对农民的剥削主要是按比例来征收地租,可是再加上宗教迷信的宣传,那么，除了地租之外就又加上精神压迫的推动，使老百姓把更多的

东西贡献给统治者。老百姓宁可不生产，宁可死掉也要为寺庙去供奉，这样对生产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以前西藏有些老百姓的情形就是这样，宁可讨饭，也要积累一些金子银钱，送到喇嘛庙去供奉。这就使得民穷财尽，破坏作用非常大。我们中国的宗教不像欧洲那样从内部发展起来，而是从外面进来的。中国有自己的儒家学说，读书人是相信儒家学说的。范缜就是站在儒家方面来反对佛教。孔子的儒家学说，本来也是统治阶级的东西，大部分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当它和佛教斗争时，它里面就产生了唯物主义，就起了进步的作用，至少起了保卫生产的作用。范缜的理论是针对灵魂不灭的思想，证明没有什么灵魂不灭的神话。它有一定的实践任务，就是使老百姓懂得不要为了来世去倾家荡产来供奉寺庙，人民要好好生产，在今世就可以得到幸福。范缜反对灵魂不灭主要是根据这种唯物主义的理论，即认为所谓灵魂不过是肉体的一种附属品，一种作用。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范缜做了一个很好的譬喻，好像刀和刀上的“利”一样。刀有一种作用，就是“利”的作用，它能切东西，所以“利”这种作用与刀子分不开，是刀子的一种副产物，刀子没有了，那么“利”也没有了。没有人能够说：刀没有了还能切东西这种话。肉体和灵魂也是这样，肉体死去了，灵魂也没有了。肉体是体，灵魂是作用。肉体死亡，灵魂也就消灭。没有什么灵魂不灭。按过去讲，这是一种典型的相当彻底的唯物主义。坚持精神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精神只是一种作用，物质是体，精神是用，这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另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与主观唯心论相反。主观唯心论把精神看做是主体，把物质看做是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主观唯心论的主要代表是马赫主义，马赫主义的老祖宗就是18世纪初英国的贝克莱。贝克莱

认为世界就是感觉。物质是什么呢？贝克莱认为：物质是感觉的复合。照贝克莱的话讲：物质是存在，存在就是被知觉的意思，物质就是我的感觉、知觉的表现。这观点与唯物主义完全相反，它把精神的东西当做体，把物质当做一种作用，或一种形态。

这种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以及现代也是经常出现的。明朝王阳明的思想就是这一类的思想。王阳明主张：天地是心，整个天地就是一个心，所谓物质就是心的表现。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看起来好像把实践和认识统一起来。实际上王阳明把知看成是主要的东西，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后来这一派人的学生，如明末的李卓吾也是这一类的思想。我们身体算不算物质？他说：我们身体本来没有什么物质，因为自己把它看成物质，所以就有物质了，把自己所见的看成是物质的，因此把别人的身体也看成是物质。梁漱溟也是这样主张，他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物质，只有我们自己把它看成是物质，所以才有物质。实用主义也是这种观点，认为实在就是感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不是很少的，而是在历史上以及现代到处流行着，只是形式上有种种不同。

最近英美出现一种最新的语义派的哲学，认为：好像是语言的意义决定一切。世界上发生的种种问题，好像是由于人把语言做出种种的解释，才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为什么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语义派哲学认为：这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创造了阶级这样的语汇，把这种对立的语汇放在各种现象上，放在这一群人和那一群人的身上，把人看成是对立的，挑起了社会的阶级斗争，语义派哲学认为：主体是语言，而且是语言的意义，从语言的意义出发，先有语言的意义，然后才有物质的现象。实用主义就包含有这种思想，这种

思想是从实用主义以及现代主观唯心主义里面发展起来的。从前胡适、梁漱溟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多多少少按照这一类意见来进行反对的。他们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者讲阶级斗争，讲来讲去，好像社会就有阶级斗争了。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里认为：社会的阶级斗争，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语义派的哲学就把这种思想更繁琐地加以理论化。这是人类繁琐哲学中再繁琐没有的了。语义派荒谬到这个程度，认为创造一个语汇就可以引起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思想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唯心主义在形式上可以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认为精神是主体，物质是精神的作用或表现。这是与唯物主义恰恰相反的，所以我们讲唯物主义时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对种种认为精神是主体，物质只是精神的表现的唯心主义。

关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个原则主要就是这样理解：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物质是体，精神是用；再加上一点，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如果问意识的作用是什么？回答就是这样：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三点合起来，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反的基本观点。

意识是物质的一种作用，这问题在哲学上我们现在能做出很明确的具体的回答了。这是与几千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不开的，也是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分不开的。从前的唯物主义往往有这样的缺点：或者仅仅是一般的原则上把物质看成是实体，把精神看成是一种作用，但精神究竟怎样起作用，是搞得不大清楚的，而且对精神这种作用是从物质中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从前的唯物主义也多半搞不清楚；另外，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作用从哪里产生出来，它对精神作用的内容、实质搞不清楚。范缜的神灭论的思想，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范缜肯定精神是物质的一种作用，但

这种精神作用如何产生他就搞不清楚。今天我们明确地认识到，精神是物质发展到高度阶段的产物。但是在范缜那时代就不能有这种认识，所以有些问题就不能回答。他写的神灭论的回答里，有一个问题回答得不完满。有人问他：如果灵魂只是肉体的一种作用，那么为什么活人有灵魂，死人没有灵魂，活人有知，死人无知？人死了肉体还在，但精神往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范缜没能很好地回答；回答得是很牵强的。他只能这样回答：活人和死人看起来好像一个人，其实是两种人，活人是活的肉体，死人是死的肉体，所以活人有知，死人无知。他没有物质进化的发展观点，由低级物质到高级物质如何逐渐产生精神作用，这点他是不了解的。精神的作用是人脑子的作用，他也是不了解的。古代人认为思想的作用是心的作用。精神作用来源如何，如何发展出精神作用是搞不清楚的。古代唯物主义也了解到这一点，精神是一种特殊物质的作用，但究竟是什么物质的作用，是搞不清楚的。古时有一种思想认为精神好像是某种精气的作用，古代希腊有一种原子论，认为精神是由一些精微的原子产生的。在中国孟子书上有一句话："心之官则思"。心是产生精神作用的器官，这器官为什么能产生精神作用？因为这器官包含有精微的东西或原子。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想解释精神是物质的作用这一问题，也解释得很牵强。这世纪的唯物论，对一切都是以机械力学来解释的。究竟如何产生精神作用，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了。在这些唯物主义者看来，精神是复杂的机械作用。一般讲，过去的唯物主义都有这样一种特点，即认为：精神作用好像是突然产生的，在世界上有某一种物质突然产生了精神作用，这种物质或者是由于它是复杂的机械或者是包含着精气，或者是一种精微的原子，因此产生了精神作用，至于这种精微物质如何产生精神作用，是讲不清楚的，解释得很

牵强的。所以这种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解释得不完满的。这种唯物主义被后来的唯心主义所驳倒。唯心论就出头来说：精神如何产生，只有一个办法来解释，就是说，精神是独立性的东西，比物质更活泼，更有能动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精神作用。从前的唯物论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精神怎样产生，精神的内容和实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与科学发展不够，科学知识水平很低有很大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能提供这种材料去替唯物论建立基础，使唯物论能明确说明意识、精神是什么东西。所以过去的唯物论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具体解释总是牵强，没有很好解决这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能正确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凭哲学空想，而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时代，科学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自然科学已有很高的发展，而且发现愈来愈多。社会科学也有了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如何使人类思想发展起来，这种规律也弄清楚了。有了充分的科学根据，所以在哲学上再加以概括，那么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弄清楚了。现在我们说明为什么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只要根据科学成就的发展一步一步来说明：从无生物到有生物，有机物开始有刺激反应作用，愈来愈高级的有机物就产生感觉、知觉这些现象，到了人类社会，人类就有了思想，思想在动物中是没有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这个问题以后再讲）。现在我们能够很明确地根据科学来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精神是物质的作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清楚了。精神是什么物质的作用，是怎样起作用，我们也搞清楚了。从前认为精神是心的作用，是精气的作用。现在我们知道，精神是大脑的活动，是脑神经的一种作用。从前的唯物主义有时倾向于庸俗唯物主义，把精神也解释成一种物质。现在用不着这样假设了。精神

是大脑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如何产生，在20世纪有了巴甫洛夫学说——脑神经生理学，说明了如何从简单无条件反射发展到条件反射，又如何从条件反射发生感觉和第一信号系统，第二信号系统。这样基本上可以了解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简单刺激到感觉到思维的脑神经作用。计算机进一步的发明还可以根据机械活动来理解脑神经如何活动。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各种唯心论所提出的难题都容易解决了。我们现在感觉不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困难。人死了为什么没有知觉？这是任何人都能解释清楚的，因为大脑停止活动了，当然就没有意识的活动。我们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很明确地肯定，意识是脑神经的一种作用。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附带说明一下，意识是脑神经的一种作用，但不能说意识、精神就是物质，把意识看成是物质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否认这一点。物质和物质的东西这两个名词不能完全分开，这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有许多物质的东西，可以粗糙地说就是物质，譬如桌子是物质，光线是物质。这是粗糙的说法。确切些，应该说是物质的东西。规律性也是物质的，因为规律性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规律性说成是物质，那就有点不好说。所以我们把物质的东西叫做物质，就是不确切的。这样就会把许多事情弄混乱了。桌子可以说是一种物质，规律性也说是物质就不好说了。声音是不是一种物质，说声音是一种物质这不好说。声音是物质现象这是完全可以说的。声音是物质的东西，规律性也是物质的东西。如果说规律性就是物质这是不好的。凡是物质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严格讲应该叫做物质的东西，但有些物质的东西可以粗糙地就叫做物质。但把有些物质的东西叫做物质就不好了。严格说，要把物质的东西与物质加以区别，要把部分与全体加以区别。但不能认为这是原则的区

别。物质是不能离开具体物质的东西来谈的。物质是无限多样的物质东西的总体。有些物质的东西马马虎虎就叫做物质，但有些是不能这样说的。世界上除了精神、意识之外，一切东西都可以叫做物质的东西。但是精神和意识就不能叫做物质或物质的东西。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我们讲到物质或物质的东西时，必须符合物质的定义。即必须是在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或客观实在。凡是说物质的东西或物质是指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独立存在，或说是客观实在或客观存在。客观存在是可以间接或直接通过感觉为人所认识的。但是精神和意识就没有这种情况，就不是这样子。精神和意识这种作用，虽然是物质的作用，但与一切物质作用有一个原则区别，就是任何一种物质作用是在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精神的作用是在主观之内存在的。任何人要领会精神的作用，只有凭主观内部来反省。精神和意识这种物质的作用是采取主观形式的一种作用。精神、意识之外，一切物质作用都是来自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和物质形态。精神与意识是主观形态。当然这主观也是客观的反映。但它是主观思想形态，不是不依赖人的主观而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主观意识。精神和物质严格区别，就在这一点。即客观实在与主观形式的区别。所以我们不能说精神是物质的东西，虽然精神是物质的作用。这是有原则区别的。

当然这区别列宁也曾说过，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区别，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有绝对性质。物质与意识的区别有一点是绝对性的，那就是哪一方面第一性，哪一方面第二性；客观第一，还是主观第一；物质第一，还是意识第一；存在第一，还是意识第一。即在认识论问题上，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是有绝对区别的，绝不能加以混淆。意识绝对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是有原则区别的。庸俗唯物主义为什么错误，就是把意识也看成是一种

物质。他们认为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所以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把意识看成是胆汁一样的一种客观形式的物质现象。人的意识绝不能从大脑中分泌成为独立的客观形式的东西，而只是大脑内部的一种活动机能，这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绝不能含糊，从前的唯物主义常常搞错了，他们解释精神作用时，接近了庸俗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好像是一种精气或精微的原子。

古代希腊有一个原子论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他基本上主张世界是物质的。他认为世界上一切物质是由多种多样性质的原子所构成。他主张：精神是由于有一种原子，它带有精神性质，这种带有精神性质的原子寄托在人或动物身上，就发生了精神作用。这些原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做“逻各斯”。这个概念有点更接近逻辑，更接近逻辑学上的逻辑。实际上是把逻辑的思维、意识看做是一种独立的东西，独立的原则。这种看法就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淆了，因为把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东西混淆起来不加以原则的区别。这种唯物主义名义上是唯物主义，但是实际上很容易倾向于唯心主义。这位主张“逻各斯”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虽然在当时是唯物主义的，甚至于是无神论的。他的那个主张有点接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认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人，相反地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上帝。阿那克萨哥拉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倘若人的样子像牛，那么上帝也一定像牛。但阿那克萨哥拉把意识看做是独立的原则，所以后来的唯心主义者就称赞他，特别是黑格尔在写哲学史时这样地写，他说，哲学发展到了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哲学才算是开始从粗鲁的唯物主义解放出来的一种萌芽，因为这个哲学开始承认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元素，这种元素是世界一切的元素中最活泼最能动的，古代希腊哲学的希望和光明就是从这个哲学家开始。从此以后才有

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唯心主义出来，越来越把这些精神独立作用夸大。

所以，唯物主义者在这点上是不能动摇的，绝不能把精神看做是一种物质，看做是一种物质的东西。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个原则的区别是要绝对的看待，要绝对的区别，不能加以混淆。一切其他的现象都是物质的，都是客观实在的，而精神、意识仅仅是主观的，仅仅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所以不能说它是一种物质的东西。

这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了，就是列宁讲过的在认识论上、在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上要把物质与精神绝对分开，那么离开了认识论为什么又不要绝对看待呢？这也是可以解释的。离开了认识论的问题，离开了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我们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区别物质和精神。

首先，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物质和精神是不同的，那么能不能说物质和精神可以分开呢？首先我们要肯定物质和精神是不能够分开的。物质和精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是同一个自然的两面，物质是体，精神是用。所以，在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加以严格的区别。但是如果谈到物质和精神能不能分开时，我们就说绝对不能，精神是物质的作用，所以精神和物质是不能分开的，因此就不能说有绝对的区别的。精神是物质的作用，所以作为物质的作用来讲，精神和物质是密切联系着的，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两件事情，如果这样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精神就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是大脑皮质的运动形态。如果不谈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说精神是物质的运动形态。当然，我们说到精神是物质的运动形态时，又要注意到不要忘记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问题，主观与客观的问题。精神这种运动形态与其他

任何运动形态有原则上的不同，有绝对的区别，这种运动形态是主观的运动形态，而其他的运动形态都是客观的运动形态。肝脏可以把胆汁分泌出来成为一个客观的东西，脑子就不能把思想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事情，它只能在脑子中主观的存在，这种运动形态是一种主观的运动形态，可是它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所以又不能说它与物质有绝对的区别。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讲，如果我们谈到思想时，绝对不要把思想和思想着的物质分开，谈到思想时就是考虑到思想是大脑的作用。有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别人的思想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别人的大脑的活动它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能离开别人的大脑的活动来说的。如果你抽象地说别人的思想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考虑到这个客观的存在是在别人的大脑中主观存在的，这样考虑就是错误的。我们仅仅是把别人的思想跟他的大脑联系起来才能说它是客观的东西，如果不跟大脑联系起来是不行的，如果说别人的思想离开他的大脑而客观存在，这就错了。他的思想对我来说是客观的存在，这主要是他的大脑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他的思想只能在他的主观里面才能够存在的。因为他究竟在想什么，只有在他自己的脑子中主观地完全知道，不能客观地暴露出来，如果要暴露出来就要经过他的大脑变为行动变为语言，才能寄托在物质中间被我们所感觉和认识出来。别人的思想被我们所认识，并不是这思想被我们的感觉所能认识，而是它的物质活动，他的大脑以及其他的行动被我们所认识。所以，如果我们说别人的思想也是客观的东西，就一定要跟他的脑子联系起来，跟他的物质的行动联系起来，才能说它是客观的东西，不能说思想本身是客观的东西。思想本身对别人来说仍然是主观的，仍然是在主观中存在的。所以，总的来说，思想这种东西是主观

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

离开了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离开了认识论的问题，我们说精神和物质的区别是相对的。首先二者不能分离，精神和物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分离，精神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还有物质的各种形态跟精神这种运动形态有没有绝对的区别？也不能说有绝对的区别。撇开了主观和客观的问题也不能有这样的区别。电灯发光，是电的一种运动形态，光是电的一种运动形态，思想也是脑子的一种运动形态。如果仅仅当做运动形态来看，思想和光线有没有区别呢？也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区别，如果不讲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如果讲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就有绝对的区别了，光是客观的，思想是主观的。撇开这个问题，思想是不是物质的运动形态？光是不是物质的运动形态？我们可以说思想是物质的运动形态，光也是物质的运动形态，这两种运动形态都是物质的表现。那么有没有区别？区别是有的，就是思想与光。但是没有绝对的区别，因为都是物质的运动形态，绝对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光是客观的，思想是主观的；光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光这种物质形态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形态存在，而思想这种运动形态就不行，它只能在主观内部来反映各种物质形态，它自己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客观存在。

所以，我们一方面把意识、精神看做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撇开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撇开认识论的问题，把它叫做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但是这种物质的运动形态就不能叫做物质的，这种运动形态与其他运动形态有绝对的区别，它本身不能叫做物质的东西。除了意识和精神以外，一切运动形式都可以叫做物质的东西，虽然它不是物质。桌子可以叫做物质，声音就不能叫做一种物质，可是声音还是可以叫做物质的东西。生产关系跟生产整

个联系起来可以叫做物质的，但是单是讲生产关系还不能叫做物质，生产关系就不能叫做物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合起来作为整个的生产活动，可以说是一种物质的现象。不管任何一种物质的形态、物质的作用和物质的表现都可以叫做物质的，就是只有精神、思想不能叫做物质的，原因是它没有客观的形式，没有客观存在的这种形式，如果把它当做客观的，只有把它同大脑联系起来才是客观的。思想可以利用物质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可以用语言、文艺作品、电影、戏剧等把它表现出来，但是思想的内容本身它还是要主观地来体会的。如我们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究竟有什么意义，各人的了解不同，为什么各人的了解会不同呢？因为物质的表现在各人的脑子中所引起的结果不同，所以各人的领会也就不同了。电影里面的思想可以用电影表现出来，但是体会这个思想还是要人的主观去体会的，这就是因为思想本身是一种主观的形式，它只存在于人的主观内部，而没有客观的存在，所以不能叫做物质的或者物质的东西。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把思想与一切物质或者物质的运动形态绝对的区别开来。

苏联有些学者还有这种看法，就是对于思想、意识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一种物质的运动形态，如果说它是物质的运动形态就会跟物质的东西混淆起来，因此连它是物质的运动形态也不能说。这种说法还占相当优势。但是也有主张只要撇开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主观与客观的问题，还是可以把思想看做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态，因为它是大脑的一种运动形态。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根据后一种说法来讲的，就是撇开了认识论的问题把思想看做是大脑的一种运动形态。如果说这种运动形态本身绝不可以叫做物质的东西，那么，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不能叫做物质的东西，这就是精神和意识。除此以外，一切现象都可以叫做物质的东西，都可以

用物质的这种形容词加在这些现象的头上。

思想本身虽然不能叫做一种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思想是物质之外的东西。我们所以不能把它叫做物质的东西，因为它是在主观之内存在的，它是物质运动中的主观形式。所以否认思想不是物质的东西并不等于在物质之外还有一种独立的思想，而这仅仅是因为思想是第二性的东西，是主观的东西，是物质的一种主观形式，是大脑的主观的内在的一种表现，所以它仍然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仍然不能离开物质。世界上除了物质与物质的运动以外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思想是物质运动之内的东西，是物质运动之内主观的东西。

这些问题在哲学中可以说是比较微妙的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焦点。我们对这些问题稍为有一点模糊就很容易倾向唯心论或者为唯心论所利用。所以要克服唯心主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能完全克服的。我们要花很多脑子才能够弄清楚这些问题，要弄清楚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物质和精神既要绝对地区别而又不能绝对地加以区别。在认识论上，在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上和主观与客观的问题上要绝对加以区别，但太绝对化了，又发生问题，会把精神独立起来，一独立起来，精神又活动起来了。所以，从另一方面撇开了认识论来讲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就要把物质和精神密切地联系起来，物质和精神就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体和用的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物质和精神就是实体和它的运动形态的关系，精神是一种运动形态与“关系”是一种运动形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都是物质的运动形态，精神不能叫做物质的东西，但又不能因此说精神是物质以外的东西。这些都是很微妙的，我们需要很好地去思考。我们对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很清楚地掌握住，我们和唯心主

义作斗争就有把握了。

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对这个原则的解释就是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意识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呢？除了它是物质发展的结果（意识是在物质之后的），除了它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之外，它的内容也是第二性的。意识这种运动形态是第二性的，是在物质之后出现的，是物质的产物。内容也是这样的，内容也是存在的反映。意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内容，意识的内容是从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所取得的，所以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首先要主张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然后还要主张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根源，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一切意识的来源是从物质而来的，一切意识的内容是从物质反映来的。

意识反映物质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最根本的观点，如果问能不能用几句话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说清楚呢？我们说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唯物主义就是反映论。

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包含两点意义：第一点意义是人的意识是能认识客观世界的，人的精神、意识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可能的；第二点意义是认识就是反映，主观反映客观。反映论包含这两点意义，这两点缺少一点都不能算是完全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缺少任何一点都会变成唯心主义。如果只主张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不主张人的意识是客观的反映，这不是唯物论，或者根本不承认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这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是主观唯心论。所以，首先要承认人的意识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还要肯定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主观上的反映。如

果单单承认人能够认识世界而不承认认识是一种反映，能不能是唯物主义呢？这不能是唯物主义的。因为也有一些唯心主义是肯定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人的主观可以认识客观。所以不能说唯心主义就是不可知论。

我们现在往往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一切唯心论都是不可知论，说唯心论就是不可知论，这种说法是把斯大林的唯物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有些说法过分夸大了。不可知论可能走向唯心论，或者倾向唯心论，或者引导到唯心论，但是唯心论不一定就是不可知论。恩格斯曾经讲过，就是不可知论（在19世纪中叶时的不可知论）还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所谓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就是它本来可以主张唯物主义的，但又不敢主张唯物主义，所以只好说有没有物质我不知道。实际上它不能不承认客观世界是实在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它本来可以成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可是由于宗教支配着社会，它不敢公开地承认唯物主义。这种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主要是指英国的赫胥黎这一类人。

赫胥黎是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很有功劳的人，他坚决相信进化论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他为了宣传进化论还跟宗教的牧师正面地进行过斗争。牧师说：你这赫胥黎真不知耻，承认自己的祖宗是猴子。赫胥黎说：我承认祖宗是猴子并不觉得可耻，可耻的是那些明明客观真理摆在面前还要把它抹煞来欺骗人的人，我们承认祖先是猴子并且自己更超过了祖先。这种辩论当时得到很大的同情。可见其思想实质还是承认客观规律的存在，反对上帝创造人。可是他在哲学上却说这些规律不是物质的规律，这些规律的背后是不是有物质我不敢相信。因为他究竟不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家而是资产阶级那方面的人。资产阶级是欢迎进化论的，因为资产阶级要向外进行侵略，它是要利用进化论的学说，特别是

生存竞争的学说。它们把英国的资本主义看做是生存竞争的“优胜者”，世界的“得胜者”，所以，它们拥护进化论，宣传不可知论。

一般地来说，唯心论是不可知论，因为唯心论认为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但又不能简单地把不可知论说成唯心论，因有些唯心论者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们反对不可知论，特别是黑格尔他很坚决地反对不可知论，黑格尔在其哲学中对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进行过尖锐地批评，其理由是：你们的理论错误了，把现象和本质分割开来了，其实你们如果充分认识现象以后就能抓住本质，客观事物的本身总是通过现象才能被你们所认识的。不可知论认为现象和本质是两件事情，我们人类只能认识现象，本质是不能认识的。而黑格尔认为从现象就可以认识本质，通过现象就可以认识本质，因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黑格尔坚决地批评了不可知论。所以，不能说任何唯心论都是不可知论。

问题是这些唯心论者虽然也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可是他们不承认认识是一种反映，认识只是客观物质在思想里面的反映。思想是主观的，物质是客观的，思想是在主观中存在的，思想只是客观事物的反映。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错误是在于不承认这一点。他所认为的人类认识世界是怎样认识的呢？他的理由就是：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思想，人的脑子也就是思想，所以用思想来认识思想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思想本身就是世界本身的一部分，因此用我们的思想来认识世界，这无非是思想自己认识自己，思想并不是主观里面存在的，不是客观事物、世界在主观里面的反映，而是它本身就在客观世界上存在。世界上原有一个客观的思想，那个思想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一个一个人的脑子中的思想，这一种思想是离开了人的脑子在人的头脑

还没有存在之前就有了的，人有了脑子之后，那个思想还是人的脑子的基础。如果有人认为：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这句话绝对化，就变成客观唯心论。如果把别人的思想不看做是他脑子的活动，而是简单地说他的思想对我来说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一样的了，因为除了承认脑子之外，似乎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思想。其实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客观存在的，思想总是主观的东西，别人的思想是主观的东西，我的思想也是主观的东西，思想是在主观中存在的，不能把别人的主观看做是我的客观。把别人的主观看做是客观，只是因为他的主观是他的脑子里面的主观，而他的脑子对我来说是客观的。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是因为世界跟我们的思想本来是一个东西，无所谓反映不反映，不过是一个东西的自我表现。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是因为世界精神在我们脑子中表现出来自己认识自己，所以就不是什么反映，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以，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还不是唯物主义的，还要进一步把认识看做是物质世界在主观里面的反映，就是说一定要坚持反映论这个原理，才能成为唯物主义的。

反映论的思想是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人的思想跟客观物质世界不是一个东西。当然思想对于客观世界有同一性，主观与客观可以成为一致的同一的。要怎样才能够同一呢？就是要使思想去反映客观世界，能够反映得正确就达到同一性。思想跟客观世界有同一性，但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不是等同性。唯心主义是把主观和客观世界看做同一个东西，看做等同的东西。唯物主义认为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用我们的主观去反映客观世界，可以做到有同一性，可以使主观与客观有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就是说不能任何时候都有同一性，而人反映客观世界不能把一切都反映完，

人认识世界总是由部分到全体，而且永远也不能把客观世界的一切认识得干干净净。可是，同一性是可以做到的，即我们不断地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规律。客观存在与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不同的，客观世界比主观世界是更大更丰富和更完全的，主观世界可以尽量地正确地去反映它，所以就能使主观和客观有同一性或者叫做一致性。人类认识的任务是努力使主观和客观能够有同一性，尽可能使主观和客观一致。唯心主义是说主观和客观本来是一个东西，我们说主、客观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可以努力使它求得一致，这是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论的区别，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

客观唯心论的错误，就是它把认识看做是同一个东西的自我表现——思想自己认识自己，所以把人的认识神秘化了，认为认识是世界精神在我头脑中的一种表现一种涌现，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思想，是和宗教一样把人的思想认为是不同的体系。唯物主义主张认识是要我们努力用我们的思想去反映客观世界。认识是要通过观察、研究然后把客观世界反映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来。可是唯心主义是另外的一种看法，认为认识是要凭我们的思想去体会世界的本质，如果有人有这种天生的聪明，那么他就能体会世界的本质，就能一下子把世界的本质都抓住了。因为世界跟自己的思想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如果自己的思想生来就和世界完全一样，他就能够把世界的真理抓住了。所以黑格尔自己才会有这种幻想，认为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是世界精神的表现，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了这许多年，是因为有了他才一下子把真理都认识清楚认识干净了。从此以后人类就用不着花脑子和想问题了，因为世界精神在他的脑子里面完全表现出来了。这种思想就等于得到上帝的启示一样的思想。

我们如果研究哲学史就可以发现这种普遍的情形。凡是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者，他们谈到认识的时候常常用类似上帝启示来表示他们的看法，甚至有些唯心主义者公开地主张上帝指示。在希腊有一个唯心主义者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他常常碰到困难问题时总是和别人说：你等一等待我与我的上帝商量商量。这种思想在中国表现在孔子的学说里面，从孔子开始认为有一种人是“生而知之”的，这种思想发展到最后特别是在宋明理学里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可以直接和天合为一体。怎样能够合一呢，这就很奇怪了，但是唯心论看来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天就是一个大的生命、思想，我也是一个生命、思想，如果我这个人得天独厚，那么我就可以跟天合为一体，我用一个什么办法就可以跟天合在一起了。这跟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样的，就是把世界看做一个大精神，看做跟人的精神是一样的，宗教永远是按照人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神、创造上帝、创造世界。唯心主义者是按照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精神状态来创造世界、上帝的。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这种思想发展到近代出现了柏格森的哲学。在中国以梁漱溟为代表，他主张世界是大生命，因此我们可以闭着眼睛从自己的内部来领会这种生命，他们把这叫做“自觉”，凭自觉来领会自己生命的流行，这样一来同时就领会了宇宙大生命的整体了。所以一个人就用不着去研究学问，用不着去观察、分析和努力去反映世界，只要闭着眼睛像和尚一样做功，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跟天地合为一体了。从前的张君劢也是柏格森主义者，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他怎样到法国去找柏格森，请教柏格森怎样才能领会生命，柏格森告诉他说：你要用作“功”的办法就可以领会生命了。这些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可以阻碍我们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去认识世界，因为他们用这种神秘主

义观点来宣传人可以凭自己的自觉或理性、情感就可以直接领会世界的本质，用不着科学和任何的观察、分析、研究。一切的唯心主义在本质上都或多或少近于神秘主义的思想。

所以，唯物主义者一定要坚持反映论。反映论的基本观点是：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在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人不可以靠自觉的方法和神秘主义的方法去领会世界精神，人可以认识世界，但要认识就必须经过努力，经过观察、分析、研究，总之就是要应用科学的方法。而这些观察、分析、研究还要通过实践，因为实践才能证明你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世界。我们经过观察、分析、研究把客观世界各种性质、形态和规律都反映到我们的主观中来，反映以后还不能简单地相信它是真理，要证明它是真理还要拿到实践中去考验，如果经过了考验，的确你的认识能在实践中成为现实，这样才能证明主观和客观有了同一性，主观和客观能够一致了。主观对客观永远不能完全认识干净，因此反映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反映论告诉我们一方面要反对不可知论，但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认识世界不是随随便便轻而易举的，不是靠上帝的启示靠神的启示，而是一定要通过科学研究和不断的努力，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到的。本来这种思想是科学研究的本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就是要按照这种程序去认识的。这种认识论的观点就是科学的观点。凡是在科学中宣传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就是想降低科学中的认识方法的作用，实际上就是阻碍科学的发展。有一些科学就是因为宣传不可知论而停止了发展。例如：生物学上有些部门因为受不可知论的影响，几十年来停止了发展，把认识画了一个界限，人的认识只能到此界限为止，超过此界限人要认识就没有办法了，除了某些问题以外，其他的问题只能凭偶然命运，不可知论就是这样的。

如果客观唯心主义在科学中有影响就会使科学的研究松懈下来，使科学变为非科学的东西。因为既然认为人不要经过观察、分析、研究，凭自己的脑子自觉地认识世界，这样一来艰苦的科学研究就不需要了，这就会使人的思想离开科学产生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不通过实践，不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凭自己主观上的几条原则，再加上自以为“聪明”的头脑随便想一想就来解决问题。这样对革命工作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自然科学中也有这种情形，这主要存在于技术的运用方法上，按照自己的主观去想，使得在工业技术上发生很大的错误。这种情形是实际行动中的唯心主义。这些人并不是不相信人能够认识世界，而是相信得太过分了，以为凭几条原则在脑子中想一想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就发生很多错误，使工作实际上离开了科学的原则。

唯物主义哲学对我们最大的实际意义就是反映论这个原则。我们研究唯物主义特别要注意反映论这个原理，因为这个原理对我们的实践有最密切的关系，在各种唯物主义的原则中具有实际意义。例如，时间空间的客观性的问题，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形式，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所以它是物质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把它看做是主观的形式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主观地来规定时间、空间，在实际行动中就会发生许多麻烦。这些问题都具有实际意义，可是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反映论的问题，承认时间、空间的客观性，就是承认认识时间、空间则必须去反映它，不是主观地随便去反映它而是真正地客观地去研究反映它。某一种行动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发展到多大空间的规模，也要经过研究然后才能正确地反映它。所以，反映论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

我们研究唯物主义主要的任务是要使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后能坚持反映论的原则，并且把这个原则变为指导我们的研究和行

动的方向，无论观察什么问题都应该注意反映论的原则。有了反映论这个原则就使我们一方面有信心；另一方面又能够虚心。有信心就是反对不可知论，相信我们人的思想能够认识客观真理；但是又要虚心，就是说客观真理是要我们去反映才能够认识，不是凭自己的“才子气”随便想想就可以认识，而是要经过观察研究才可以认识的。这个原则我们讲起来比较容易了解，但是要把这个原则变为行动和研究方针还要经过努力。恩格斯的所谓要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本质上就是要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反映论。所谓严肃的态度就是在一切研究的领域中都能够运用这个原则，观察任何问题时都应该想起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研究唯物论这部分时，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我们要注意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反映论上面来。我们以前所讲的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很多方面，都是为了要使我们承认反映论这个原则。我们讲到世界的物质的第一性，时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是物质的属性、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等等，其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认识这一点，即所有的时间、空间、物质、运动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你想真正了解它就必须去反映它，它是在我们主观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所以把这些东西叫做物质的，或者叫做一种物质，或者叫做物质的一种属性、形式、现象等等，都要加上“物质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本来是物质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认识了这点才能够真正反映它。如果你不努力去反映它，你就不能认识它了。

三、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

唯物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是：存在对于意识来说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一切唯物主义对于这个根本观点不能有丝毫动摇。

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个原理，大体包含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要肯定存在是意识的根源。首先有一个客观物质存在，然后有人的主观意识、精神。物质、客观存在在先，精神、主观意识在后。意识仅仅是物质的一种作用或是一种属性，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要肯定意识的内容也是存在的反映。意识不仅仅是由存在产生的，不仅仅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意识的内容也仅仅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意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内容。这些原理，凡是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都是必须首先肯定的。

肯定这些原理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要尽量避免主观主义，避免在观察和解决问题时从主观出发，而应该从客观出发。在观察和解决问题时，我们的思想、意见、办法都要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的情况。如果不能这样做，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倾向。

这些唯物主义原理是不是等于说要我们否认意识的任何作用？当然不是的，我们讲存在是意识的根源，还没有讲到意识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的问题。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原理，并不等于否认意识的作用。如果唯物主义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结果否认了意识的作用，这是不合理的主张。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这样的主张。但是有些反对唯物主义的人，他们硬说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认为唯物主义肯定物质第一性，因此得出一个结论，意识没有任何作用。反对唯物主义的人，为了要进攻唯物论，要使人相信唯物论是不对的，因此，就把唯物论曲解成不合理的、荒谬的思想。这种曲解，我们在唯心主义者的著作中、甚至在社会上许多意见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的。

在讲课提纲中提到了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曲解有两种。第一种是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庸俗人物的见解。所谓庸俗人物的见解就是指专门贪图物质享受的人的思想，即一种非常庸俗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可是有些反对唯物主义的人故意把庸俗人的行为与唯物主义拉在一起，把唯物主义说成是喝酒、赌钱、荒淫无耻、贪图物质享受的。庸俗主义者是常常有这种滥调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指出：德国有一个史达克，他把唯物主义误解为一种庸俗的思想。他虽然拥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可是他不是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来拥护的。他仅仅赞成费尔巴哈的哲学，因此就有了一种消极的结果，即使人忽视了还有比费尔巴哈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曾指出：史达克是崇拜费尔巴哈的人，对德国古典哲学末流还有留恋的态度，可是时代已经过去了，称赞费尔巴哈就未免有些不顾惜读者了。恩格斯说：要可怜可怜读者，不要把读者拉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去，要使读者能懂得更新的唯物主义。史达克并不真正了解唯物主义，特别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达克称赞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事实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达克的思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流派，他把唯物主义曲解，至少是误解成一种庸俗的思想。

史达克指出过费尔巴哈的哲学有唯心主义的思想。费尔巴哈的哲学是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可是史达克说的所谓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史达克说：费尔巴哈有理想、相信人类进步，因此费尔巴哈就是唯心主义的。那么反过来，唯物主义就是没有理想、也不相信人类进步，而只注意眼前的物质享受。恩格斯对这种思想给予批评说：史达克所表示的这种看

法是与资产阶级的庸人看法一样。资产阶级口头上讲理想，骂唯物主义就是吃喝、耍玩、贪图物质享受。恩格斯指出：这种庸俗资产阶级这样骂唯物主义，实际上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那种惟利是图的庸人的行为和生活。如果唯物主义真的像资产阶级庸人说的那样，那么就可以说，只有最腐朽的剥削阶级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点理想也没有、一点进步要求也没有，一心一意注意眼前的利益，这只是最腐朽的剥削阶级才有这种情形。当资产阶级还是进步的时候，还是有点理想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有一点理想，因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工人阶级教育下，懂得了社会的变化，接受改造，这就不是只注意眼前利益了。

唯物主义绝不是只注意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对于理想、进步一点也不过问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都不是这样，就是庸俗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这样。19 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者也是科学家，如摩莱萧特等人，其中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生物学家，他们在科学的某一部门中有相当的贡献,并不是一些贪图眼前利益的小人。一般地说唯物主义讲理想、人类进步这方面要比唯心主义强。唯心主义者形式上讲理想、人类进步，可是唯心主义把理想的内容变成一种空想,用空想来欺骗人,使人看不到真正的理想和进步。唯心主义的理想是空洞的。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有理想的，相信人类的进步。每一个时期的唯物主义者都代表着进步阶级的思想。唯物主义者不仅不是专门为眼前利益而工作，相反地只有唯物主义者才是真正为理想为真理而工作。真正为真理为正义而牺牲的人在历史上首先是唯物主义者。

所谓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并不是说物质利益第一。物质利益第一与物质第一性不是一件事情。物质利益第一，这是庸人的思想。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物质是根源，物

质在精神之先，精神是物质的属性，精神的内容仅仅是物质的反映。绝不能说唯物主义者对于精神的作用不加重视，唯物主义者是有理想的。所谓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即是说我们的思想主要根据客观存在来规定。世界是怎样发展的，我们在思想上就应该怎样考虑问题，思想意识应该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唯物主义者非常重视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真正理想和真正的人类进步。唯物主义不仅赞成而且重视这种理想，唯物主义者用一切力量去追求这种理想，且为了这种理想的实现，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理想必须要以客观世界为根据。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并不是反对讲理想，而主要反对把理想看成是从思想本身自然产生的。理想应该要以客观世界为根据，要根据科学的研究，根据世界发展规律来规定。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第一性，因此主张理想应该根据客观规律来规定，理想应该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唯心主义者主张精神第一性，因此主张理想应该凭人的脑子想出来，凭人的主观意识随便想出来，凭人的自由意志任意制定。唯心主义者凭主观认为是好的理想，就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理想，而对于客观世界却不加以注意，因此各人有各人的理想和真理。他们认为只能说，人的理想各有不同，但不能说谁的对了，谁的错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有这种思想。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仅仅是在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这一点。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本来的意义也就是不过如此，或者是物质第一性，或者是精神第一性，除此之外，如果用别的办法来区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就要犯错误，史达克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理想。这种区别是错误的，是荒谬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理想，而是要注意到理想是从精神来、还是从客观世界来。认为唯物主义只是追求

眼前的物质享受，而没有任何理想的庸俗的见解，这是对唯物主义的诬蔑。事实上，这种见解是一些最腐朽的剥削阶级才有的。

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第一种曲解，在唯心主义的理论著作中最为流行。社会上有这样的人开这种玩笑说：要去好好吃一顿，讲讲唯物主义吧！讲唯物主义的人跟自己开这种玩笑是不好的。可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人在社会上就常常是这样开玩笑的。这种曲解太荒谬了，是一种太明显的捏造，所以一般的唯心主义并不采用它，而多采取另一种曲解来反对唯物主义。这种曲解是把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成是单纯的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还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像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还不是这样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机械决定论仅仅是承认物质对于思维，存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至于意识能不能反过来也有它的作用，机械决定论则完全否认了人的意识的任何能动作用。

否认人的意识对于世界能起改造的推动作用，这些思想归根到底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跟宗教迷信相通的。它与宗教上的宿命论只有一点不同，即宗教上认为一切事情都由上帝或鬼神安排好了，人的生死是由阎罗王的生死簿规定好了的，一点也不能更动，而机械决定论虽撇开了神灵，可是其思想实质是类似的。机械决定论认为客观世界有着一个机械的安排，人的意志对世界完全没有作用或能力。机械决定论这一类思想不一定公开去讲宿命论，但可以用其他方法表现出来。

在前两年苏联曾反对过分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这种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产生一种对客观规律的偶像崇拜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当然也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但是如果说人的意识没有作用，那么人就用不着运用规律而去听天由命，等待社会发展就行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完全消极的

思想，破坏着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积极性，这种观点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与个人英雄崇拜是互相配合的。等待伟人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一种消极的观点，也是破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过去在反动统治下的剥削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就是宣传宿命论的思想，宣传一切安排好了这种思想，并且利用这种思想使人在行动上变成完全消极的，以便好被反动统治者来统治。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宣传这种思想，那么对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会起很大的破坏作用。偶然崇拜的观点就是机械决定论的一种表现。

崇拜偶然性的观点，就是不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加以区别，以为偶然性可以与必然性起同样的作用。胡适这样讲，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会引起一件很大的灾难。通过这种崇拜偶然性的思想就可以取消人们认识和掌握必然性的这种积极性，使人把一切看成是由偶然性决定的。这种思想表面看来好像是否认上帝的存在，反对宗教，也反对灵魂不灭，可是把偶然性夸大的结果，那么人在世界上好像一切由偶然性决定了。一切由必然性支配，人在必然性面前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消极思想。可是一切由偶然性支配，任何偶然的原因我们都没有办法把它消除，这也是一种消极思想。认为只要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偶然事情，历史就要转弯了。这样的观点就使我们根据历史一定的规律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这些思想同样是机械决定论的不同表现。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唯心主义。

过去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有类似崇拜偶然性的观点。法国唯物主义一般是相信规律、相信人掌握规律就能够改造世界。英国第一个近代的唯物主义者培根有一句名言，他说：知识就是能力。人有了知识，那么人对于世界就有了改造的能力。十七、八世纪的

唯物主义并不就是机械决定论。18世纪唯物主义者在个别问题上也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特别是历史问题。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对历史问题有这样的观点，一个皇帝的个人的偶然特点，有时候能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甚至皇帝的一个姨太太，因为她得到皇帝的宠爱，那么姨太太有些什么想法，也可以决定历史的发展。过去有这样的说法：路易十六有个姨太太和一个将军谈恋爱，由于这样的结果，路易十六在战争中常常遭到失败。因为那个将军老是打败仗，很多人到皇帝那里去上告，但是姨太太却在皇帝面前替将军辩护，皇帝听了姨太太的话，将军就免了罪，因此路易十六在战争中老是打败仗。

法国唯物主义者根据这种事情便说：皇帝的姨太太个人的情欲也能对历史起决定作用。这种根据是似是而非的。因为这种偶然事情涉及到战场上的胜败问题，但如路易十六这样腐朽的统治，即使没有姨太太的倒乱，也是必然打败的。路易十六的打败仗是必然的，而姨太太情欲的关系只是加重了这种必然性。

过去的唯物主义者不能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区别这偶然的和必然的原因，因此旧唯物主义常常陷入机械决定论。唯心主义往往利用这一点硬说唯物主义把一切看成是物质决定了的，客观决定了的，人的意识不起任何作用。这种曲解在唯心主义者的著作中很普遍。唯心主义不仅对旧唯物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也是这样来反对的。胡适和梁漱溟不约而同地就是这样地来反对唯物主义。当陈独秀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曾经和胡适有过争论。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陈独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生观是历史决定的，但胡适说：一切由物质决定这是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但那时的陈独秀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反驳，相反的，好像在回答胡适的著作中还承认了这种观点。那

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不很高明的，把来自别人的批评、曲解，无形中也承认了。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唯物史观是否认意识的作用，而我恰恰相反，我是否认客观的，我是佛家的弟子，我不承认客观而说主观第一。

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完全否认主观作用的，这是一种曲解。用这种曲解的方法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来说是可以蒙混和欺骗的。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去了解，而是从唯心主义如何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去了解，因此，就会受其影响。这种人以前还不少，但是在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看来，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显然完全是捏造的。辩证唯物主义绝不是这种片面的机械决定论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者首先肯定存在决定意识，存在、物质、客观是第一性的东西，任何时候对这一点也不动摇。但是另一方面它绝不否认精神、意识、主观的作用。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意识、主观是第二性的东西，这是说存在是根源，意识是从存在这个根源中产生，这是讲意识从哪里来的问题。但是这还没有涉及到意识的作用问题，讲到意识有没有作用，就不应该说意识没有作用。当然要肯定意识的作用也还是物质的作用，由存在产生的作用。这不仅是意识本身的作用而且反过来对存在起一种能动作用。所谓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就是说，它能够影响存在的发展，对于存在的发展可以起很重大的影响。但却不能决定存在的发展。物质存在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机械决定了的，虽然物质发展的规律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必然的，不能改变的，但这并不是一切都规定好了，从外面一点也不可能加以影响的。意识对于存在不能起决定作用，意思是说，最后决定的是存在本身而不是意识，意识不可能根本改变物质发展

的规律。物质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这句话是指根本规律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社会要达到共产主义这个方向是任何人的意识不能根本改变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改变它，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愿意改变它。即使反动派不愿意共产主义实现，也不能改变它，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意识不能改变物质发展的根本方向，但不是说意识对于存在一点影响也没有。如果讲到影响，就要肯定意识对于存在可以发生很重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两种：一种是使物质的发展加快，方向、规律是根本不变的，但意识是可以使物质的发展过程加快，可以促进存在的发展；另外一种是对于存在发展起阻碍作用，虽然规律、方向是不能改变的，可是有些意识大大阻碍了存在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说，意识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一种是反动的。进步的意识对于社会发展能起推动作用，加速社会的发展。和平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高度加强，特别显著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和平阵营的发展道路，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这几年来和平运动充分发展了进步意识的作用。我们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在整个世界面前是陷于被动的，美国到处在倒霉。落后的意识是阻碍社会进步的。

意识有这样两种作用，但讲到意识的作用时，归根到底还要讲到意识来源的问题。为什么意识有进步的和落后的？意识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客观存在是有矛盾的。客观世界上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意识本身的作用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作用来源，还是决定于存在本身。物质存在反映为意识、存在的矛盾反映为意识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在意识的作用方面也是有矛盾的，因此意识中间有斗争。如果进步的意识占优势，那

么客观世界的发展就快一些。如果落后的意识占优势，那么社会的发展就受到阻碍。

意识的作用是怎样产生或者怎样表现的呢？我们刚才讲过两种意识有两种相反的作用，进步的意识能够使事物发展进程的速度加快；而落后的或者反动的意识则会阻碍事物的发展进程。但是，这两种作用是怎样发生起来的？两种意识为什么会有两种相反的作用？这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们的回答是：因为进步的意识能够使人民群众提高他们在行动中和实践中自觉的能动性，而反动的意识或者落后的意识则阻碍人民群众提高自觉性，阻碍事物的发展。

进步的意识为什么能够提高人民群众在行动中和实践中的自觉性、能动性呢？原因是凡是进步的意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多多少少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需要。因此这样的意识如果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开来，就能使人民群众的眼睛亮起来，能够看清周围世界是如何发展的，这样，人就会感觉到自己在行动上工作上特别有信心，也就是有了自觉性。有了自觉性，就有信心，就有能动性。能动性就是在行动中能够有主动性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能够主动？这是因为我们看清楚了发展的趋势，所以就能够主动地安排计划。我们国家的一切计划所以能够计划得很好，这是因为计划是在客观规律的指导下在自觉的情况下面来制定的。有了这个计划，行动上就主动了，就知道主要的力量应该做什么，步骤如何，并且可以避免那些临时发生的事情的扰乱，不至于受临时的偶然的影响而把我们的方向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或者发生偏差，而能够主动去处理周围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了一种进步的意识就有这样的好处，即能够多多少少反映客观存在发展的需要和方向，使我们的眼睛很亮，有计

划地规定我们的步骤和目标。这就叫做有能动性或主动性。凡是进步的意识都有这种作用。

凡是落后的意识或反动的意识其作用就是相反的，一切落后的意识或反动的意识都是把现实的情况歪曲了的。落后的意识也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不是凭空产生的，不过落后的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歪曲的反映，有时甚至是颠倒的反映。唯心主义就是一种颠倒的反映，对于世界的秩序颠倒的反映。本来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可是唯心主义却颠倒过来说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本来意识只能对存在起影响的作用，而唯心主义却把意识说成是决定的作用。个人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个人的作用决不能离开群众，个人只有在他的思想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他才能起很大的作用，而这样的人，则必须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能够集中群众比较好的意见，能够把群众分散的经验，有条理地整理出来，把一些错误的东西撇开。因为任何人的思想不会是天生的，如果他脱离了群众，那么他的思想也不会是正确的。相反地，如果他能够联系群众，就能把千千万万人的经验总结出来成为有系统的最正确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能够形成一种意识，就能够指导人民群众自觉地改造世界。个人的作用是和群众分不开的。个人崇拜是把个人看做是天生的，不需要群众和集体也可以指导一切的。这样就把个人的作用歪曲了、夸大了。

歪曲现实，这是所有落后的和反动的意识都具有的特点。为什么人的意识要歪曲地来反映现实呢？因为有剥削阶级的偏见。所谓剥削阶级的偏见，就是人反映现实不是那种直接的反映，不是简单的直观的反映，人的意识反映现实是通过他的立场来反映的。反动派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来反映世界存在的，即通过了他那反

动立场走到歪曲现实的真面目，就变成了一种虚假的东西和意识。这种虚假的东西和意识如果散布到人民群众中去，就使群众变成盲目的，阻碍了群众的自觉。譬如我们说客观的存在本来是有规律的，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但必然性中间又有偶然性，偶然性可以加上个人的作用，个人的偶然性可以影响必然性，这样虽然发展的趋势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人的意识影响上去，必然性可以加快也可以减慢。而宿命论者就把必然性夸大成为绝对的必然、命定的必然，结果就成为宿命论。宿命论再进一步夸大就会认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和神的支配，人的能力是丝毫没有作用的。这样的意识散布到群众中去，就会使群众变为盲目的和感到自己毫无能力，群众的认识也就发生错误了。如果必然性决定一切的思想影响了群众，就会使群众觉得一切都是由必然决定的，那就不需要去考虑将来了，这样就打消了群众的能动性，使群众成为被动的。所以，落后的意识或者反动的意识就能使群众盲目和被动，因此它就阻碍了客观事物的发展。

我们讲客观存在主要是讲人类社会生活，在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界它本身是没有什么意识作用的，它的发展完全是自然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人类的产生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是完全可以受意识的影响的。人可以改造自然也可以改造社会，特别是在有关人的行动中，意识就起很大的作用，进步的意识和反动的意识的作用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在社会上一定要掌握进步的意识。

进步的意识在各个时代不同，因此它反映客观存在的正确性也有所不同。我们说一切进步的意识都是或多或少反映客观世界，其意思是说不是任何一种意识都能完全反映客观世界的。因为意识是有阶级性的，任何一种意识都是某一阶级的意识，所以这种

进步意识反映客观存在的正确程度就要看这个阶级是什么阶级了。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进步意识多半是由剥削阶级的进步的集团代表的。过去只有在剥削阶级中才能够有人出来做这种工作，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培养做思想工作的人。这些人有时也倾向于劳动人民，倾向于农民，所以有时也反映农民的生活。但是不管怎样，无产阶级以外所有的阶级都有若干保守性，剥削阶级有保守性，农民也有保守性。这种保守性或者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性，就限制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性，使认识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完全地反映客观世界，所以过去的进步意识虽然也能使社会发生自觉性，使人发生自觉性，但是这种自觉性是不充分的是有限制的。在过去来说，反映自然界比较容易，所以自然科学发展就比较早。资产阶级要发展工业就需要自然科学，因此资产阶级也能够培养一些人对自然界进行科学研究，使对自然界的研究成为有系统的全面的东西。但是对于社会则不行，因为统治阶级总是把它的剥削制度看做是永久不变的。这种偏见就使它不能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对社会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从来没有成为完整的科学。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才有一些科学的因素和萌芽，如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历史学。英国的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学说，初步发现了价值规律；法国的历史学家懂得社会有阶级斗争，但是不能全面地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于自然界是能够有一些正确的认识的，因此在对自然界作斗争时就有若干程度的自觉性。

人和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自觉性的实践，有自觉性就能多多少少正确反映客观真理。除了最初的原始人不算，人类自从发现了火以后就能多少制造一些工具，这时的人就能够多多少少地

认识自然界的规律，知道摩擦就会生火等等，在打猎时也懂得了一点野兽的行动规律，这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有点自觉性。后来人类社会越发展，人的自觉性也就越高，因为人的自觉性能够更多地反映客观存在，特别是社会的变革。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生产中人的自觉性是逐渐增长的，每一个时期的生产总是要懂得一点规律才能进行，片面的自然规律知识是人类很早就有的，当然，自然科学是后来发生的。但是对于社会来说，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常常是盲目的。一般的情形都是一定要到社会变革的时候才有自觉性，当进步的势力要推翻反动的势力的时候才产生新的社会思想。在新的社会思想中就反映了若干正确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使得革命时期新的阶级在行动上有自觉性。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必须打倒封建制度而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是有自觉性的。在这一点上来说它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规律的，所以资产阶级才能够在革命中得到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不论对自然界、对社会都能在意识中正确地反映出来，而且可以说是完全地反映出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是无产阶级的意识。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偏见的，因为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要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意识，不管对自然对社会，只要是当前的历史条件所允许的都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出来。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会犯错误，但是总的来说，他对于我们当前必要的一些客观规律知识都能够正确认识。对于自然界，马克思主义者依靠自然科学的同时又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把自然科学的一切新发现都加以肯定和充分地利用，只要自然科学所允许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让它充分地发展。对于社会也是一样，只要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能够允许我们认识的，而且是我们必须认识的，都一定能够完全加以掌握。在

个别、部分的情形下面当然也会有些错误，但是错误迟早会得到纠正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是一种最进步的意识。这种意识能够帮助人民群众在一切行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自觉性，在生产中不仅是充分发挥自然科学的力量，而且发挥生产中应有的组织力量。因为生产中有社会的一方面，运用我们的知识很好地去组织生产，就能使生产很快地尽量地发展，使生产能够发挥主动性。由于在发展生产过程中充分地利用自然科学，使自然科学也尽量发展起来了。

所以，意识的这种能动作用就告诉我们必须努力掌握进步的意识。在今天来说，就是应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任何人要想成为当前社会中在行动上有充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人，就应该很好地去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

第七讲　认识过程的规律性

关于认识过程的规律性这一题，原来的题目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那样的题目是不太恰当的。因为认识论这个题目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大，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也是认识论的问题。所以撇开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问题，而在认识论这个问题上单讲认识的过程，这是缩小了认识论的范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仅讲认识的过程，而且还要讲认识的根本原理，因此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问题也应该包括在内。

认识论的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问题。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研究认识论，就是辩证法也要与认识论结合起来了解，在我们研究辩证法时要着重地把它当做认识的

方法。当然，辩证法是客观的规律，是客观的辩证法，但是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把它当做认识的方法，特别是分析矛盾、研究发展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把认识论当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

这一题是讲认识过程的规律性而不讲认识论的根本原理。

认识的根本原理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中我们已交代了一个认识方面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正确的认识总是把物质摆在第一位，总是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来进行研究。一切的科学研究都是根据这个原则作为根本的指导方向的。

任何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是从事实和实际出发，研究实际的材料和根据事实本身的情况找出它的规律来。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的意义，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一个科学方法的原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把我们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位。科学家们是懂得这个方法的，但并不是任何一个科学研究者都能坚持应用这个方法。他们也许在实验室里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个方法，可是把某种科学技术应用到实际生活，应用到工业、农业里面去时，又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的了。在苏联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关于威廉士的牧草轮种法的应用问题。这个牧草轮种法的方法本来是实事求是研究出来的原理，在发现这个规律时是根据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的原理研究出来的。可是在应用这个方法时，有些人却是从主观出发，从死的公式出发，而不根据各个地区的土地情况是否适合于这种方法而到处应用，结果就造成了损失。

所以，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根本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到处应该坚持的一种思想方法的根本原则，即认识方法的根本原则。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只能走一条路，就是首先注意客观存在，注意物

质，从物质中引出一些我们的认识、知识来。而不能相反地走另一条路，那就是从我们的主观里从公式中引出结论来。这是我们研究物质和意识这个问题时最主要的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哲学上任何一个问题都要着重地把它做出认识论的结论来。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题目就是直接讲认识的规律性的问题。认识必须从实际出发和必须研究客观的存在，从客观存在引出正确的知识和认识来。我们如何才能够从客观事物找出正确的知识?找出正确的知识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个过程有些什么规律？这就是今天这个题目所要讲的问题。现在我分四个部分来讲述。

一、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认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认识要依赖于实践。我们要从客观事物中找出正确的认识，首先是通过实践，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认识，这是这一部分要讲的中心思想。

承认认识对于实践有依赖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特点。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还有旧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唯物论，这些唯物论在哲学的根本问题——认识的根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致的。不管是哪一种唯物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承认正确的认识必须从客观中引出来，而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的，这是一切唯物论共同的观点，是唯物论最根本的观点。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以外所有的唯物论在认识论问题上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论，可以说都不了解认识必须依赖于实践这个原理，或者说几乎不了解这一点。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偶然

接触到这点，但不能系统地申述出来，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实践当做认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把实践当做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总是从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更广泛一点来说，人的认识是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社会实践的产物。认识绝不是个人的直接观察的结果，不是凭个人的聪明直接观察周围的对象产生的结果，而是人类整个历史实践的社会总的产物。旧唯物主义者有这种看法，认为一种科学的发现是某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的，或者是在观察、研究某一个自然现象时由于他个人的聪明而发现的。例如万有引力的学说，旧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他就凭对这种现象的观察，凭他个人的聪明来直接观察，研究这个现象，结果就得到了这种很了不起的发现。这种看法就是把科学的发现看做是一种偶然的、个别天才的人头脑中产生的东西，这种观点归根结底会倾向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样的，它认为一种科学的发现从形式上看来是个人的研究的结果，但是认真地研究起来这种发现绝不会仅仅是个人研究的结果。为什么在17世纪末才出现了牛顿？为什么万有引力这个学说在那时候才产生？要了解这些情形绝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和个人的观察研究这点所能说明的。因为我们不能说古代的人没有牛顿那样聪明，可是古代的人就不能发现万有引力，而要到十七八世纪才产生这种学说，可见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科学和生产发展的结果。生产发展到十七八世纪时有了资本主义，那时开始有了工业，有了很发达的商业和海上的交通，在这许多实践中要求人们对于力学、数学、天文学的知识更进一步发展起来，许多实践的经验汇合起来经过牛

顿个人的努力，于是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学说。其他许多科学的发现也是如此。例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发现微积分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与那时的工业、科学、航海的发展分不开的，与研究这种变动的数学的需要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与实践分不开的。

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如马克思主义不早不迟的就在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而且不是在东方产生，却偏偏在西方产生，在西方还是特别在德国产生，这不是纯粹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天才的结果，而是由于整个历史造成的。因为在东方没有大工业，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东方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有了工业，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英国法国都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而在德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那是有原因的。因为德国在当时恰恰是革命的中心，而且德国成为革命的中心时实践的情形又不同，阶级斗争的情形与英法革命时都不同。英国和法国革命时的工业还是手工业时代，而德国革命是在大工业发展起来的时期产生的革命，这时期各国都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德国也有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已经独立起来在历史上行动了。由于这种历史的实践，人们的社会实践，无产阶级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才能总结这些实践的经验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始发现了历史唯物论，恩格斯考察了英国的工业，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里面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了英国的历史状况。同时，马克思在德国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建立了历史唯物论。恩格斯曾说，在美国有一个摩尔根当时到印第安人中去生活了几十年，后来也是不约而同地用社会发展的观点解释了印第安人的状况。这些都说明了一种学说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凭天才而产生的，而是历史发展、社会的实践发展到了这样的时期，比较有

天才的人就能够把历史实践的经验加以总结,建立有系统的学说。所以,如果不承认认识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实践,是人们的历史的行动,那么有许多问题就不能解释了。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把实践思想放在认识中,并把它当做认识论中很重要的环节,这才能对人的认识的规律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论都不懂得认识的规律,有了马克思主义后才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才懂得认识的规律,才能正确地掌握认识的规律。所以,实践是认识过程中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环节,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是讲认识过程的规律性。这一著作名之为《实践论》,可见实践的重要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是否有些哲学谈到实践和认识与实践的问题?当然也有的。中国有个别的哲学家就不断地谈到知和行的问题。知和行的问题就是认识和实践的问题,行就是实践。在哲学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都不大谈实践问题,相反的,唯心主义者却经常谈到这个问题。所以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讲到: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关于行动的问题,唯物主义者不去发展,唯心主义者却去发展了。同时又讲到唯心主义者如何发展了行动方面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讲知行关系讲得很多的是宋明的理学,特别是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是最有名的且影响很大。这些讲行动的问题都是唯心主义者。中国的唯物主义者讲行动这个问题的不多。但是唯心主义者谈到行动的问题其了解是不正确的。他们使用的名词是类似的,譬如用“实验”或者“行动”,中国的一些旧唯物主义者的表现方法是“践履笃行”。这些都同样是实践的意思,但其内容与马克思主义者所了解的不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唯心主义者对行动方面是抽象地发展了的,唯心主义者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

行动。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唯心主义者是使用了实践的名词，但实践的内容是什么，它是不清楚的。人类社会实践主要的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唯心主义者恰恰对这点不了解，唯心主义者讲行动、实践时，恰恰是除开了生产和阶级斗争。如孔子是很讲究行、实践的，但孔子恰恰对生产毫无兴趣。所以在唯心主义者看来，行动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些道德原则和某种理想所采取的一些行为，某些个人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为了生产和阶级斗争的行动。所以行动是个人的行动。而且是主观的行动，而不是客观现实的一种生产过程。这样的一种对行动了解当然是唯心主义的。在这种行动中，认识和行动的关系就颠倒了，或者说认识和行动的关系片面化了。

认识和行动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首先有实践然后才有认识，人们从实践中得到认识，然后认识又去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实践应该是第一位，认识应该是第二位，由实践产生认识，认识又去指导实践。而唯心主义者所讲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完全颠倒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首先有实践然后才有认识，唯心主义者则是相反地认为首先要有认识，然后才有实践。中国过去争论这样的问题：是“先知后行”，或者是“既知既行”，或者是“先行后知”。过去主张“先行后知”的人是很少的，多半是主张“先知后行”，或者是“既知既行”。王阳明的学说是“知行合一”的，即是“既知既行”，可是他的“知行合一”实际上仍是先知后行的。因为他是把知摆在第一位的。照王阳明所说的知行的关系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所以开始是“知”，然后才有“行”。这实际上是先知后行的观点。因此他这个观点是用诡辩的方法巧妙掩饰了唯心主义的知行关系的一种观点。一般的唯

心主义者对知和行的关系都是如此颠倒的，或者是片面的。为什么说是片面的？因为从知到行这是对的，但这是认识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第二个方面。首先是实践产生认识，然后是认识指导实践。即开始的行动是比较不自觉的行动（没有认识客观规律时常有盲目性的行动），然后通过实践的总结找出规律和理论来，才进一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使实践带有自觉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辩证的看法。唯心主义是把这个辩证关系片面化，只注意行这方面——认识指导实践这方面，而撇开了和忘记了实践首先产生认识，所以是片面的也是颠倒的。

现代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如实用主义，也是经常讲实践和标榜实践的。实用主义仍然和过去的唯心主义一样，把实践看做是个人的活动、冒险的活动和自由活动的，而不看做是社会的实践。在实用主义哲学中与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所不同的是它好像也承认知识是在行动当中产生的。这就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以为实用主义把行动看做是个人的行动，在行动中间就产生了知识。实用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实用主义不承认在实践当中我们所得到的知识是客观的知识，它认为我们在实践当中所得到的任何的知识都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做出来的一种假设。这种观点就把正确的认识与骗子的造谣的行为混淆在一起了。做生意的人为了欺骗顾客可以制造一套骗人的理由来进行欺骗，使顾客受到蒙蔽，而奸商也就达到了目的。照实用主义者看来，奸商骗人的一套理由是与科学同样有用的，因此就同样是真理。所以照实用主义者看来知和行的关系不是在行动当中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在行动中任意捏造一种自己随意的假设。不管是骗人的东西也好，是迷信宗教也好，只要是对自己有用的都可以当做是一种知识，不承认知识的客观性，而认

为知识纯粹是在行动中由人捏造出来的主观的假设。这是实用主义对于认识和行动的关系的观点的一种特点，这个特点使实用主义既与过去的唯心主义有所不同，同时又较过去的唯心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为它表面上好像是承认行动中产生知识，可以利用科学作招牌，科学就是在实验里面得到知识，实用主义者把科学从实验当中得到知识曲解了，认为商人的骗人行动也是一种实验，从骗人行动中制造的一套理由也是知识，这样曲解了科学来适应于资产阶级投机欺骗的目的。这是实用主义者对实践的看法的特点。这些就是唯心主义发展行动发展实践观念的一般情形。这种发展当然是错误的、抽象的，完全符合于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道理。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有没有讲行动问题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系统地注意到实践和认识结合的这种哲学是没有的，但是接触到实践问题的这种哲学是有的。中国有"行知"，这也算是唯物主义。西洋哲学也不是完全不接触实践的，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也谈到费尔巴哈也涉及实践的问题，问题在于旧唯物主义者对实践也是曲解了的。如果说是唯心主义者好像很注重实践，而唯物主义者讲到实践时是采取轻视的观点来论述的，如费尔巴哈讲实践时是把实践看做是一些吃饭穿衣的行为。因此这种看法就与世界上俗流的看法有点接近了。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虽然接近实践，但他是轻视实践的，把实践了解为犹太人式的一种行为——专门注重物质享受。

孙中山的著作中有一部分是比较正确地接触到行动和知识的问题，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孙中山在革命里面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中国旧的学说翻案，说：行是容易的，知是难的，不知也能行。这种说法并不是很正确的。因为知固然是不容易，行也不是

容易的，知和行是结合着的。说行就容易知就困难，这里面有些积极的因素，这就是承认科学知识的困难，科学知识是要经过劳动才能认识的，可是，如果因此就反过来说行就容易，那也是不对的。总的来说，“知难行易”的学说是有很大的毛病的，可是，也有些地方是正确的，那就是承认知识是在行动当中得到的。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讲到：最初是不知也能行的，后来行了以后就知道了，最后因为有了知识才进一步的使行动能够发展下去。这种观点是把行摆在第一位，这在哲学史上也可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比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是大有进步的，问题是孙中山对什么是行也是不大了解的。在孙中山看起来，行仍然是一种个人的活动，而且好像是一种冒险的活动。他的“孙文学说”里面有很多地方都讲到冒险活动，即任何事情都先要冒险然后才能得到知识。但是究竟冒什么险，他又没有一定的概念，搞不清楚人类的社会活动究竟是什么，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是旧唯物主义者。

旧唯物主义者对于历史是不能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旧唯物主义者都不能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解释社会，不能发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旧唯物主义者能发现生产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条件。孙中山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是生产，所以他就笼笼统统的讲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活、人的行动。他既然不了解社会的真正实践的主要的东西，因此也就不了解实践，不能指出实践的内容。所以，孙中山的实践观还是一种盲目冒险的个人行动，特别是他把广大人民的行动都看做是不知而行的盲目的行动。他认为人民是“阿斗”，是不知不觉的。他不能了解人民虽然有时对于整个社会是没有知识的，可是人民对于生产的行动是很有知识的。如农民对种庄稼在

一定范围内是有很多经验知识，当农民起来斗争时，在斗争当中也会取得经验、知识，问题是农民不能把它总结、概括成为科学的知识。如果说这些人是不知而行的一些盲目行动者，这完全是对人民的诬蔑，是对人民行动的一种曲解。这种曲解反映了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人民是不够了解的，特别是把人民看做“阿斗”这个思想是反动的（当然，孙中山与共产党联合后这种观点是有所改变的）。

这种思想后来就被蒋介石利用来作为法斯西主义的基础。因为法斯西的思想是提倡盲目的崇拜领袖，只有领袖才知道一切，人民是不知道什么的，于是蒋介石就公开的讲：知是很困难的，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要枉费时间去追求知识，只要跟着领袖走就行了。邹韬奋写过一篇文章，描写国民党中一个法西斯分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哲学是领袖的脑壳论，是跟着领袖的脑壳走。这就是把人民群众与自己都看做是无知无觉的阿斗，只有一个人的脑壳能够知道一切。孙中山自己当然不是法西斯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有进步方面和反动方面，其反动方面就被法西斯所利用了。

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涉及到知和行的情形。这些哲学思想对于行的了解都是不正确的。不管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都是不懂得真正的实践是什么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跟一切旧唯物主义所不同的地方是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认识绝不是由于个人直接观察的产物，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任何一种知识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的发现（当然也应该承认个人的功绩和努力），可是如果把某一种知识某一种新的发现完全归功于个人，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知识的发现都是要依赖许多旧知识作为基础的。在发现微积分以前，先要有几千年的人类的数学知识的

发展，没有过去已经有了的数学知识作为基础，新的数学的发现是不可能有的，而数学知识又是过去人类实践的产物，每一种新知识的出现都是过去知识的汇合，因此也是过去人类历史实践的成就。资本主义社会中讲个人主义，因此每一种发现都把它完全看做是个人的东西，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有了什么发现就要有什么专利权，这种法律制度更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任何一种新的发现都是个人的。实际上个人仅仅是在社会实践中尽了一定的力量，而并不是一个人独立的可以产生或创造一种新的知识。所以总的来说，在不否认个人的一定的成绩和功劳的条件下，我们说一切的知识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坚持这个观点，把认识看做历史的现象、社会的现象，而不看做个人的现象。这种观点能够正确地告诉我们认识是怎样发展的，怎样才能正确地发现认识过程的规律性，并且把实践的内容也正确地规定了。从来的哲学家都不了解什么是实践，都是抽象地了解实践，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真正的指出了实践的意义和实践的内容是什么。实践首先就是生产，是阶级斗争。然后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如政治斗争、文化活动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实践是生产，是阶级斗争。

各种实践首先是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实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造社会的实践；一类是改造自然的实践，所以实践又叫做变革的实践。实践总是有变革的意义，或者是变革自然，或者是变革社会。

生产的实践首先就是改造自然的实践。在生产过程中间人和人发生关系，所以生产中间也有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的意义。发展生产力就是改造自然，改变生产关系就是改造社会。我们的社会

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方面要实现合作化，这就是改造社会，将个体农民改变为集体农民，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布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中大部分是改造自然的纲领。

阶级斗争主要是改造社会的实践。阶级斗争分两方面，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革命阶级就是为了改造社会而斗争；反革命阶级是为了阻碍社会的改造。反革命阶级的实践也算实践，因为它和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人的知识就是从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

所以，实践基本上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这两类。知识也大体上是这两类的知识：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哲学知识是兼有自然和社会这两方面。有些知识是可以兼有自然和社会这两方面的性质的。例如，数学可以应用于自然，但也能应用于社会。这种兼有两方面的性质的知识也可以说是两方面的实践的共同产物。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说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我们如果研究自然科学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某一种科学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每一种自然科学几乎可以说都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至于社会科学就更明显了。真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指出一种知识的产生总是在变革中产生的。因此只有改造世界，只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产生新的知识。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是生产力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是革命阶级实践的知识；反过来说，凡是阻碍改造世界的实践同时也是阻碍知识的发展。所以，反革命阶级的行动一般是倾向于阻碍知识的发展。例如，在社会上资产阶级要阻碍科学的发展，同时还要阻碍科学的产生和传播。对于自然科学，资产阶级根据其需要有些东西不让它发展而有些东西又让它发展。因为资产阶级虽然腐朽了，但对自然方面还可以

在某种范围内因为其阶级利益的需要而去改造它，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原子能工业。所以，可以这样说，自然科学在历史上受到阻碍比较少，因为自然科学直接跟阶级利益的关系少些。在封建末期，封建地主阶级曾用残酷的方法来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天主教对哥白尼的学说的传播采取了残酷的迫害方法，可是资产阶级出现后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比较顺利，特别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历史上都是很困难的，因为过去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是剥削阶级，由于他们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和永远保存这种利益，因此就反对人民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一切的力量来阻碍真正科学的建立。所以毛主席说，在过去阶级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是停止在片面的阶段，其理由有两点，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生产规模很小，人的眼界小，因此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理解得很少，对整个世界的联系不大清楚，因而不能有完全的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知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剥削阶级的偏见，剥削阶级由于自己的偏见就阻碍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他们并不了解人类阶级斗争的规律，而只能了解由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是由几个阶级的斗争决定的，即由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决定的。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的规律，但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的结果会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始终没有发现这一点。

能够全面地发现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和理论家。有了无产阶级以后才有真正的社会科学，所以，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发展的进度和差别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实践、人类历史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要研

究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如何通过实践，人的认识由不知到知，由比较低级的知识到比较高级的知识，由知道很少变为知道很多?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是研究这个问题。这种研究是把认识当做辩证过程。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认识依赖实践，不懂得任何一种知识都具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旧唯物主义把任何知识看成是不经过发展过程，而是天才人物对事物直接进行观察的结果，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和力学的三大基本定律，依旧唯物主义者看来，是牛顿个人发现的。依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些发现是人类长期历史发展的总结，是人类历史经验汇合的结果，是经过一定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才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把认识当做辩证法的运动来研究，认识论也就是一种辩证法，辩证法包含认识论，这是列宁讲的原理。辩证法与认识论是分不开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辩证过程。认识过程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一部分旧唯物主义是完全没有的。

第一节主要意思是讲认识依赖于实践，认识从实践中产生。这些理论原则对于我们工作、生活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这一点。我们的任何知识都是在实践中求得，自然科学通过实验，但单靠实验还不行，要通过社会实践、生产，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能主动地从生产中间、从广大人民中间去总结经验，那么他们的经验比起个人在实验室做实验更广泛些，发展地盘就会更大些。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人，要在社会问题上求得一些知识那就必须到实践中间去研究，因为社会生活不能拿到实验室来实验的。自然界的一些变化，可以拿到实验室里来处理，而生产、阶级斗争却不能拿到实验室里来实验的，所以，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要直接到生产里面和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才能得到结果。毛主席说

的干起来再学习就是这种意思。

认识依赖实践这种思想，我们有许多人在实际行动中往往忘记了，不注意在实践中去求知识，相反地常常在实践之外求知识。先把知识准备好，然后去实践，这种思想的顺序和唯心主义是一样的。先有知后有行，先有某种道德原则，后有行动，先有知的主意然后做行的工夫，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在许多干部中间是常有的。一种新的工作来了，自己没有经验，就不愿意去干，理由是没有这个知识或者说没有这个经验，想要学好了知识和经验之后再来干。事实相反，从工作之外求知识至多求得书本知识。还没有知识经验或几乎没有大部分知识和经验以前，就投入到行动中去与行动相联系，从行动中学到知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就是很显著的例子。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些人认为干部经验知识水平不够，而老百姓要搞合作化，因此有些干部为了这事不敢和老百姓接触。到了农村碰到有合作化运动的地方就绕开社走。不敢直接接触实践，就永远没有办社知识。

中央这次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认识论提供了许多很宝贵的材料。第一篇“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我想推荐给大家看看，因为在研究认识论时这是一篇很好的参考材料。这篇文章用具体的、实践的例子证明了如何通过实践由不懂到懂。由于书记不懂，委员也不懂，所以开始有点害怕，就绕开社走。后来知道这不是办法，才下决心参加合作社，参加合作社前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先要把农业合作化的文件、理论弄清楚。先学习再参加合作化固然好，这样就可以懂得政策、懂得原则。可是办社的实际经验还是没有，后来还是大家投入合作社里面去，干了一个时候，解决了几个社的问题，大家就有了经验，有了知识。真正的、全面的、具体的知识，还是要投入到行

动中才能得到的，这是认识依赖实践的最好的例子。这本书有些文章能帮助我们了解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原理。

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刚才讲过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人的知识如何在实践当中产生和发展，如何通过实践人们由不知到知，由知道很少到知道很多，由低级的知识变为高级的知识的问题。

由不知到知的过程究竟有些什么规律，其基本规律是什么？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回答是这样的：在实践当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规律，就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基本规律。人们由于接触实践得到感性认识，可是这些认识是很不够的，必须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算是完成了认识的任务。认识的任务是为了要得到理性认识，有了理性认识就可以算是有了知识。感性认识也是一种知识，因为感性知识是比较低级的，只了解表面的片面的东西，只有感性知识还不能有自觉的认识，还不是能够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的知识，有了理性认识才能掌握事物的规律，才能真正完成认识的任务。有了理性认识就能指导行动，使我们的行动带有自觉性。

我们在这里，要解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以及如何由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问题。

什么叫做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就是采取感觉印象形式的一种认识。认识是一种主观形式，用一种主观形式来认识客观事物。感性认识的形式就是感觉印象，感觉印象按心理学分析分三个步骤：一、感觉；二、知觉；三、表象。在哲学上谈到的感觉知识是概括整个感性认识的。但在心理学上说，感觉知识只是感性认识上的一个阶段，此外还有知觉和表象。

所谓感觉，是直接接触外界所得到的认识。看到一个电灯，感觉到有光，光的感觉就是感觉器官接触外界所得到的认识。这种认识基本上是被动的，因为能动性在感觉阶段是没有的。知觉阶段就进了一步。知觉是把当前得到的印象和过去的记忆结合起来，对于事物有一个具体的认识。如看见一个水果，眼睛上看见的本来只是水果的颜色，而鼻子还没有闻到什么。可是看到了颜色之后，就联想到过去的记忆，这些东西有香气、甜味，只看到颜色并不直接闻到气味而脑子已经把颜色感觉与过去的香味结合起来了。这就使我们对当前的刺激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具体的认识，认识到这种水果是香蕉或是别的东西。表象，不一定直接依靠刺激，可以完全凭自己过去的感觉记忆、构成对于一个事物的具体形象的认识。譬如，提起一个人的名字，尽管当时没看见那个人，可是就可以联想到他的样子。表象可以反映一些具体事物的形象，也可以反映范围狭小的事物中间的一种联系。譬如说，我们从“狐狸”与“乌鸦”这个电影里看到狐狸是有表象的。狐狸看见树上有一只乌鸦在飞，狐狸就闭上眼睛装死来引诱乌鸦，乌鸦看到了一个不动的东西，以为是死尸就飞了下来，当乌鸦走到狐狸的嘴旁时，狐狸就跳起来把乌鸦抓住了。这就说明狐狸有一种表象。狐狸看到乌鸦就会想到，倘若闭上眼睛睡下来，就会使乌鸦觉得它是死了，就可借此机会来引诱乌鸦并把乌鸦吃掉，这种联系在狐狸脑子里是可以构成的。

知觉和表象，表现感性认识也有一种主动性，因为它不仅可以借外界刺激而且凭靠主观的记忆也能够构成对一件事物的认识，能够用主观感觉、印象能动地来构成一种事物的形象。这种能动作用一方面是有好处的，就是比较感觉更能全面地认识事物，另一方面有时会构成幻想、构成错觉。知觉是会构成错觉的，市

场上卖的腊壳果子，我们一看时也很想吃的，这就是错觉。表象，一方面可以使人能够独立构成事物形象，能够在脑子里构成某些联系。这些联系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对人就有帮助。表象能帮助狐狸欺骗和战胜乌鸦。凡是高等动物都有这种表象。另一方面，表象也会构成一种错觉，譬如，小孩子有时怕鬼就是因为他有了一种错误的表象。有一些很巧妙的虚假的表象，如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猪八戒，都是一些虚假的表象，可是，这些表象变成了艺术品，具有艺术价值。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感性认识可以说是具体的、生动的、直接的，这是感性认识的特点和优点。但是，另一方面，感性认识的能力是有限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的现象、表象的联系，因为感性认识的范围狭小。感性认识依赖直接感觉，有时也依赖间接的感觉，但它不能超出感觉的范围，只有感觉能够达到的东西才能认识，如果感觉达不到的东西是认识不到的。譬如人走路的快慢是可以感觉到的，甚至飞机的速度也可以通过感性认识感觉到的，可是光的速度就不可能通过感性来认识。范围和速度太大以及时间太长久的事物运动，感性认识就不可能达到。感性认识只能掌握有限范围内事物的关系。如果单凭感觉来认识光，那么光好像是没有什么速度，其速度好像是不可计量的，因为任何远的距离，光是可以立刻来到的，这样就很难设想光的速度。只有依靠理性去认识，即把 30 万公里和一秒钟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才能了解光的速度。范围太大、时间太长的事物的联系，除了靠理性认识之外，无论如何不能用感性来认识。感性认识的最高阶段就是表象。表象只能表象出如狐狸与乌鸦这一类范围比较小、关系比较直接的一些表面联系。所谓表面的联系就是能够暴露到感觉器官的联系、感觉器官可以感

觉得到的联系。感觉器官感觉不到的联系，感性认识就没办法去掌握的，这是感觉器官的局限性。但应该承认，感性的认识还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只要感觉没有错就多少能够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客观性质，这一点是不可以怀疑的。否认感性认识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这就不是唯物主义。由于感性认识是比较片面的、表面的，因此就否认其可靠性，这就是唯心主义、不可知论。

感性认识是有限的，它的能动范围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可靠性是不能怀疑的。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首先从感性认识的可靠性这方面提出怀疑。不可知论者一般都是认为感性认识纯粹是主观的东西，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性质的反映。这种观点表现得比较最突出的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康德认为，人的感觉纯粹是人的主观感觉器官所产生的现象，他一方面承认感觉是由物质来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感觉与物质本身没有关系。康德所谓物质本身不可知的观点，就是把人的认识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机械地、形而上学地割断了。感觉是一种主观形式，可是其所反映的内容还是客观的，应该承认感觉形式有许多主观性，譬如错觉幻觉都是主观的。如声音听起来是耳朵的主观形式，根据科学的研究，声音也是空气的一种波动。像这种情况就使不可知论找到一些理由把事物的客观内容与感觉的主观形式根本加以割断。唯物主义者反对这种看法，费尔巴哈曾经很机智地、聪明地批判过这种看法。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机智和聪明主要是指这一点，即费尔巴哈并不把感觉看成是百分之百客观的。费尔巴哈承认：感觉一方面是一种主观的形式，感觉是依靠感觉器官，是感觉器官的产物，可是另一方面，感觉正是客观事物本身性质的结果，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刺激我们的感觉器官，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了我们感觉的认识。所以，感觉虽是主观形式，可是不能绝对看

成是主观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客观的刺激也就不会有感觉。感觉的主观形式是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的一种主观表现，在我的“讲课提纲”中引了费尔巴哈一句话：“盐味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的表现”，这句话是很机智地反驳了唯心主义。如费尔巴哈反驳说，感觉绝不是主观的，感觉纯粹是客观的反映，这就笨了。因为感觉中是有许多主观性的特点，如果完全不承认感觉是一种主观性的表现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费尔巴哈说盐的味道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表现。不能把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的东西等同起来，意识和存在不是一个东西，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这是有原则区别的。如果简单说，感觉完全是客观事物百分之百的反映，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就把主观和客观混淆不清了。所以，要承认人的主观认识不是绝对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可是另外一方面，绝不能说人的认识是纯粹主观的，与客观事物没有关系。把主观认识完全看做是客观的或把主观认识看成与客观内容没有关系，这都是偏向。唯物论者狄慈根对不可知论的反驳也是巧妙的，他做了一个比方说，人的感觉与感觉的对象有区别，但这区别绝不是原则的，而只是部分与全体的区别。客观事物有它的现象和本质，我们的感觉只能认识现象的表面联系，因此感觉对于客观事物来说，只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感觉可以认识事物的部分，不能认识事物的全体，但这绝不是说感觉根本不能认识事物。

刚才讲过了，感觉只能认识表面的片面的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感觉只能对某些范围有限，时间有限的表面的东西有所认识，但不能深刻地去认识那些就范围和时间上说都是比较广泛和长远的东西。费尔巴哈与狄慈根只是从理论上批判了不可知论，恩格斯指出，纯粹从理论上批判不可知论是不够的，驳斥不

可知论最好的根据就是实践、工业。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人的认识的可靠性由实践来证明。譬如，我们说布丁可以吃，那么，就要证明布丁可以吃这是事物客观特性的反映，如何证明这一点？只要吃就行了。实践上能吃了，当然“可以吃”的认识就是真实的了。恩格斯在这点上指出旧唯物主义不懂得实践，所以旧唯物主义不能最后驳倒不可知论，尽管旧唯物主义可以巧妙地驳斥不可知论，但不能用最有力的道理来驳斥不可知论。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把认识的证明最后放在实践的基础上，实践是认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有力的证明。

感性认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尽管感觉的形式本身是主观的，但它还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唯物主义者首先肯定感性认识是可靠的，除了错觉外，如果正确地运用我们的感觉器官，在某一范围内是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和联系的。但另一方面要指出，感性认识是不够的，不注意感性认识的有限性，那么我们也要犯错误。如果认为感性认识已经能认识一切客观事物，感性认识是惟一可靠的，如果我们这样去认识就犯了经验派认识论的错误，也就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哲学史上经验派就认为感性认识是惟一可靠的知识，因此否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经验派的哲学一般都是这样来看问题的。唯物论经验派肯定，感性认识是真正客观事物的反映，感性认识是可靠的。讲到理性认识，他们认为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与客观事物的本身没有关系。所以，结果走到了一个极端，否认科学规律的知识，否认抽象理论的知识，把经验的规律看做一切，这种经验派的唯物主义很快就转变为唯心主义。

英国 17 世纪哲学上的经验派唯物主义，到 18 世纪初就变为唯心主义了。因为经验派唯物主义否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同时

就否认人能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就把世界看成好像由感觉结合成的东西。因此，唯心主义者就抓了这个空子来进行破坏。贝克莱这个唯心主义者首先提出这样的主张：世界是感觉，世界不是什么物质。这种思想一直继存到现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唯心主义把世界看做是感觉，感觉就是一切。理性是抽象的、空洞的、不可靠的，所以，科学规律不能反映客观事物，是没有内容的。实用主义者说：科学知识是一种工具。

这种经验派的观点，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表现为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的特点是只相信自己的经验，不相信由经验总结成的理论知识，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不肯相信，也不肯学习。科学家受经验派的影响是不少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评说：科学家由于只相信经验，结果做出许多荒谬的事情来，由于只相信经验，因此许多理论上的东西就不能理解，有许多理论原则是不能完全用经验来证明的，但用合理的推理可以推测出来。譬如世界的无限性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有限的经验就是说，人类世世代代是没有穷尽的，科学地观察宇宙始终是没有边际的。如果认为世界是有限的，那么有限的宇宙应该有个开端，世界开始以前是什么，这就还要问它的开始，这样问下去，归根到底还是无限。整个世界是无穷尽的，是不能设想它是有限的。世界的无限性可以根据合理的推理来肯定。将来的东西也这样。没有实现的事情我们能不能预见呢？譬如说，共产主义。现在只有社会主义还没有共产主义，那么只相信经验的人，按经验看就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我还没有经验，那么共产主义会不会实现，就不一定能做肯定回答。马克思主义通过科学的分析和研究，预见和论证了共产主义将来会实现的，而实验主义者就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实验主义者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反对共产主义。如果把感性

认识过分夸大就会走到经验论方面去，就会犯片面性的错误，这种错误也是唯心主义。实际上使我们的认识与客观事物脱离。感性认识是不够的，人的认识必须从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入到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是怎样一种认识？理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本质、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是一个东西。本质是讲事物的性质，以及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的内部联系。所谓内部联系就是指感觉器官不能直接认识到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暴露在感觉器官上。如光速就不能暴露在感觉器官上。又如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一件一件事情来看，是可以感觉出来的，要想理解整个过程却是感觉器官所不能达到的，而只能用理性认识去理解的。客观事物有很多方面，特别是范围很大、时间很长的事物联系是不能直接凭感觉去认识的。事物内部的联系，即使范围很小，有些也不能靠感性来认识的，因为它是内部联系，就必须依靠理解来认识。很微小的东西，如微观世界的东西，可以经过仪器的方法，把它的活动暴露在感觉器官上，但是，原子、电子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仪器还是看不到。像大的分子是可以看到了，可是微小到电子的东西，在电子显微镜下也看不到的。要理解这些东西，就要靠理性的认识。这是一些内部联系的认识。事物全面的关系也不是由感性认识直接认识得到的，通过眼睛可以看到事物的全体，可是像人这样一个有机体的内部联系，无论如何不能感觉到的，只有经过各种科学的研究才能理解人的身体内部的各种联系。人的生理关系、大脑活动的关系、大脑皮质与全身的关系，我们可以用狗来做实验，实验一些个别现象。但整个脑神经与全身的关系，只能够通过理性去认识。事物的规律性多半是内部联系，不是感觉器官所能直接认识的。自然

界的规律，我们只能片面地感觉到它的表象，至于规律的整体只能是加以理解。社会的规律更是这样，譬如，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规律是不可能凭感觉得到的。我们要想在一个农村里直接了解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那么参加土改就可以感觉到，可是总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是感觉不到的。

表象只能表象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能表象一切阶级斗争。人的本质，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地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概括了大人、小人、老人、原始人、共产主义的人，各种各样的人的本质，这句话，能不能感觉和表象呢，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表象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小人，或者是白种人，而不可能形成一个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表象。我们如何去设想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贯串全体事物本质和内部联系的认识。这些认识不是凭感性认识所能反映，只能靠理性认识来反映，这就是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高明的地方。不过理性认识必须从感性认识里产生。要对一件事物得到一种理性认识必须从各方面观察感性材料。因为理性是全体的知识，不观察各方面材料就不能综合它的全体。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不经过对大量材料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到的，能够说出这句话是要事先把人类历史的材料经过周密的研究，使我们了解这句话的确可以概括我们的感性认识。所以，在没有理性认识之前要先有感性认识，在没有理论之前要先有充分的经验，理论就是经验的总结。如果有人认为理性认识比感觉认识高，因此说，理性认识是惟一可靠的，那么，可以撇开感性认识直接得到理性认识，这种看法又是片面的、错误的。这种片面性在哲学史上叫做唯理派。

17 世纪欧洲的唯理派认为，用不着通过感性可以凭自己的思维能力认识事物的本质、直接认识哲学真理。这种哲学家第一个就是 17 世纪中叶法国的笛卡儿，他第一次提出用理性论的方法去认识真理。他认为人们要想认识真理，首先要从怀疑一切模糊不清的东西开始，他认为凡是感性的东西，大体上是模糊不清的。只有把模糊不清的东西排除了，然后凭自己的理性来思考，如果思考到理性对于某一个道理自然而然觉得清楚明了时，这就是真理。所以认识真理的方法，就是使理性直接追求自己认为清楚的东西，这种方法的提出是利用了数学上的一切特点，因为数学是从公理出发的。数学的公理，我们一般认为是用不着证明的自明之理。笛卡儿说，数学之所以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自明之理出发的，自明之理是用不着经验和感觉认识去证明的，因为只有凭我们理性直接觉得清楚明了就可以了。数学公理不是从经验来的，笛卡儿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建立他的理性论、认识论。笛卡儿、斯宾诺莎，还有一些理性论哲学家都认为，用不着感性知识而可以凭理性去了解真理。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错误的。认为数学上所谓自明之理是完全不依靠经验而得到的真理，这是错误的。数学上的之所以是自明之理，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在自己没有证明之先，已经被人们经常的经验证明了的。两点间的距离以直线为最短，并不是绝对不需要证明的，对于初生的小孩来说，两点间的距离以直线为最短就要证明。其实任何原理都是经验的概括，认为没有问题的真理都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经过了许多经验证明了的。唯理论认识论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任何一种理性的认识都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综合了大量感性认识才能够概括成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的知识来。理性派的哲学思想现在没有了。但这种思想倾向还是有的，这种倾向就是

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认为只要在书本上抓住几条道理，再加上主观的思考，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教条主义的路线是这样的，盲目信仰一些现成原则，不经过任何经验证明，就主观地推断这些原则，这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对革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错误，我们用不着解释了。

认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过程中的统一，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由没有知识而在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而成为理性认识。这一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向对立方向转化的过程。所谓由量变到质变就是说由具体的认识到比较抽象的认识，由表面的认识到更深刻的认识，由部分的认识到全体的认识，这也是向对立方向的转化过程。感性认识是具体的，理性认识是比较抽象的，这些转化使认识提高一步。人们的认识过程经常是通过这种辩证过程发展的，在实践过程中，首先有感性认识，然后有理性认识，这种认识过程是不断反复的，这是认识的基本规律。

什么叫做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研究认识过程中弄清楚。感性认识是用感觉、印象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不同，不只是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

从形式上来说，感性认识是采取感觉、印象的形式，而理性认识可以说是采取概念的形式，或者详细些说是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或者用另外的名词可以叫做思维的形式。所谓思维的形式也就是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也叫理论或逻辑的形式。所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由于形式的不同，内容也有所不同。感性认识是一种直接的反映，是直接反映外界现象的，因此它所反映的范围比较有限，从感觉、印象一直到表象都

需要通过一种直接的印象来反映外界事物的，或者是直接观察的印象，或者是直接印象变成记忆，记忆和眼前的印象结合起来。它的反映是生动的、具体的。因为它要具体，所以其所能反映的范围就比较狭小，对于时间太长和范围太广的联系就不能反映，只能反映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如两个人站在一起照相，站在一起这种外部联系是可以用感觉来反映，可是两个人站在一起时他们内部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要站在一起照相？这就不是感觉、印象直接所能反映的。如杜勒斯和莫洛托夫在一起照一个相，我们的感觉、印象就觉得这两个搞外交的人在一起照相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照相，感觉印象无论如何不能反映出来，使得他们在一起照相的原因，使得他们联系起来的根本原因这不是感觉印象所能感觉得出来的，只有通过理解。这个理解是要靠我们平日关心整个世界的政治，了解世界各国的联系，然后才能从他们两人的照相中看到它的内部联系。所以，感性认识是无法了解内部的东西，内部的联系除了理性认识以外是无法知道的。因此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高。从形式上来说它是逻辑形式，或者叫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

从内容上来说，理性认识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来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全体。其实本质、内部联系、事物的全体这三个名词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即本质这一个名词就可以包括这三方面。什么叫做本质？本质是指事物的性质以及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是指内部联系，所以本质这个名词就概括了性质、事物各方面的内部的相互联系。各方面的内部联系综合起来就是事物的全体。所有各方面的联系无非是指历史的联系、环境各方面的联系。我们认识一件事物如果已经认识其历史联系环境联系，就算认识全体，也就是认识本质了。

理性认识的中心和根本任务就是抓住本质，就是把握本质和把握事物的客观的内部联系。例如，认识农业合作化的本质就是认识由于农民的特点、性质，使他们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合作道路、农民既有这种性质，因此对农民各方面的联系就可以得到了解。从历史上来说，过去是个体农民，可是自从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个体农民一直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化运动，全国胜利后逐渐比较多地组织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到了最近，运动进入了高潮，这就是历史的联系。所谓环境的联系，那就是农民和富农的联系，和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工人阶级的联系。农民是受富农、资本家影响的，可是一般的农民还是反对富农和资本家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相同的地方同是劳动者，社会主义道路对农民更有利，因此他们要跟着工人阶级走。我们把各方面的关系弄清楚并综合起来，这才能认识全体农民的本质。认识了这本质以后有些错误的思想就可以得到克服。去年有人认为农民对农业合作化是动摇的，不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合作化的道路，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表面的，这是一些做工作的同志到乡下去偶然碰到几个不满意合作化的农民，于是就根据这点感觉印象做出结论说农民不愿走合作化道路。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没有抓住本质。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去农民跟工人阶级走的历史，没有研究农民与各个阶级的关系，只凭一点感觉印象就下结论，所以这种认识当然是片面的、表面的，结果就会犯错误。这种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不能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理性认识就是要通过逻辑的思维形式来理解事物的本质，它的历史、环境各方面的联系，认识它的全体，把握它的本质。这种本质是很广泛的东西，它的基本东西是概念，以概念为单位结合成为推理，根据逻辑思维来抓住本质各方面的联系。这就是理

性认识的任务。所以，我们研究理性认识时，就要注意它和感性认识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区别。

过去有些哲学家认为概念就是一个名词。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唯名论就有这种主张，认为概念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是个别的事物，概念仅仅是人对于个别事物所加上的名词。这就叫唯名论。唯名论对中世纪末期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因为它肯定世界上一个个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否定抽象东西的真实存在。这种理论就间接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所以，在中世纪时，唯名论与唯心主义宗教主义正统观点的斗争是起了作用的。马克思曾说：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论的萌芽形式。因为它肯定具体事物的存在，肯定客观世界的存在，所以它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可是这种哲学又偏向经验主义，它否认了理性的作用，把理性看成名词。

这个传统从英国开始，所以英国后来就发展了经验主义的哲学。从十六七世纪直到现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正统哲学就是经验主义，一般是否认理性的重要作用而着重强调经验的作用。他们否认理性作用的理由之一，是认为理性只是一些名词的结合（思维、逻辑上是名词的结合），其本身没有什么客观内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它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理性认识的形式方面。理性认识在形式方面当然是通过概念来认识的，只从形式上来看，逻辑思维只是概念的关系，又可以说是名词的关系。因为概念就是用语言形式来表现的，思维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用语言来表现的，所以说得更显著一点就是从思维的形式与外部的表现来讲是一种语言形式。如果认为思维就是语言，思维就只是概念的关系，那就错误了。思维在形式上是语言，是概念的关系，更远一点来看，思维就是用语言来表现的一种概念的关系，但绝不能说思维就仅仅是概念的关系，更不能说仅仅是语言的关系。资本主义国

家最反动的哲学——语义派就是把思维与语言看成相等的东西。说思维是语言或概念的关系，那仅仅是讲到思维的形式，理性认识的形式，还未讲到它的内容。我们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概括和掌握内容。

每一个概念在形式上是语言，是一个名词，但我们使用这个名词时并不只限于这个名词，而是为了利用这个名词帮助我们概括事物的一些本质，用名词作为本质的记号。巴甫洛夫的心理学讲得很对，他说，我们的大脑中有第二信号系统。第二信号系统就是思维系统，我们的语言以及概念只是一些信号，这些信号是帮助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当我们讲到一个名词时，我们的脑子里就得到一个信号，通过这个信号我们就联想起一串有关事物的本质。例如讲到人这个名词时，我们听到人这名词的声音，于是脑中立刻就想到一般的人，立刻就有一种概括的作用，想到这个人字是概括了各种人，如老人、小人、东方人、西方人以及各时代的人，而这些人都有共同点，就是都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它的本质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当我们说出人这个名词时，不仅仅是说出这个名词，而且使我们立刻联想起一大串关于人的本质。但是同样是讲“人”这个名词，但因为“人”的不同，对它的了解也就不同。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只能想到人的一些不太深刻的本质，如人都能讲话、思维，人能组织社会等等。有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虽然还没有出现，但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把人看得更深刻一点，如英国的佛兰克林讲到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种说法就能把人概括得更全些，概括了自有人类以来所有人的全体，所以就比我们中国以前所说的是圆颅方趾，能说话能思想这样的概括更深刻些。马克思主义比佛兰克林概括得更深刻更全面，它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但能够制造工具，更

重要的是在制造工具的基础上组成各种的社会关系，由有阶级的到没有阶级的，这样就更深刻了。

所以，思维形式虽然是概念名词，但是如果说思维就仅仅是名词那就不对了，名词只是一个信号，是帮助我们认识的一种形式，主要地是在这个信号中所包括的内容。这个内容要看人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如何，内容的掌握也就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反对唯名论的那种看法。实用主义是利用它来取消逻辑思维的作用，认为除了经验以外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这是纯粹从形式上来看的理性认识。这种错误的思想我们要批评和反对。

我们可以把理性认识看做是利用概念的一种形式，可是不能把它仅仅看做概念的关系，而且，对它的形式的看法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地不是在于它采取概念的形式来认识，而是它认识什么？它比感性认识更高明的地方在哪里？它所反映的东西比感性认识深刻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对于理性认识特别重视，是重视它的内容。理性认识是人的特点，因为人有理性认识，所以人的认识就能够比任何高级的动物更深刻更全面，更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本质就是全体，因为本质就是贯串全体事物的性质，就是包括事物的全体。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或者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判断是贯串一切人的全体，包括了人的各方面的联系。所以，理性认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全体、本质，它比感觉认识更高，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未来，认识环境各方面的关系。这些关系就是规律，本质这个概念也包含规律，规律也就是一些内部联系。科学的任务是要认识规律，所以科学也要认识本质，认识事物的联系，由此可见实用主义的谎谬。实用主义否认本质的联系，否认理性的认识，想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停止于经验，可是它又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哲学，这是矛盾的。

科学的认识是不能停止于经验，而是要通过经验的研究逐步地深入，全面地去认识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凡是本质都是有普遍的、全体的意义。规律也是如此。要是正确掌握了的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它是能够适用于有关的事物的全体，凡是这种事物在这种条件下面，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表现出这种规律来。例如凡是水在标准气压的情况下面加热到一百度一定沸腾，这样的规律不管是在地球上或是在宇宙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水处在这种条件下就一定表现出这种规律。所以规律是带有全体性的。理性认识能够使我们有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所以它是重要的。

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定要认识全体，认识本质？理由是这样的，理性认识对于我们的实践有很大的帮助。感性认识虽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一些表面联系，能帮助高等动物适应环境的生存活动，但问题是感性认识所能认识的是很表面的，认识的范围是狭小的，它只能认识到具体形象所能涉及到的一些关系。这种认识对于动物来说是了不起的，可是对于人来说这点认识是很不够的。因为动物只要能适应环境就行了，它是依靠自然生活的，不管多少只要能利用自然条件来谋生存就可以了。而人则不是这样的，人类的实践与动物的活动不同。动物只是为了谋求生存，而人的实践的意义是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因此仅仅依靠感性认识是不够的。

人要改造自然就要多少能够认识规律，认识事物变化的规律，要了解和观察相当长时期的变化规律。最早的人能够发明用摩擦来取火，这不是很容易的，这就要有很高的理解力，经过很多的观察和思考才能了解这种规律，按规律去实践，使没有火的木头变成有火的。理性认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主要地是它能使我们理解的范围扩大。照毛主席的话讲就是

通观全局。一件事情来了，不是只看到其表面，而是能够考虑到它的过去、将来，考虑到它的各方面的关系。例如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如此。毛主席的文章就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全面清算了一下，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全部概括了，这就是抓住了整个事物的本质。通观全局的好处是使我们对事情发展的将来有预见性。如果单凭感性认识只能做出片面的估计，而理性认识则能帮助我们对事情从各方面做出估计，这样不但使我们能够规定正确的实践的目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制定一些计划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不同。

经验主义和事务主义是理性不高，基本上停留在感性阶段。他们对一件事情是有计划有目的，问题是整个复杂的工作应该有一个长远的安排，应该照顾到各个方面有步骤地来安排，而经验主义者和事务主义者就不能做出这样的安排。因为他们没有照顾全面的这个理性认识，因此他们就做不了比较复杂的工作。所以，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对事物能够有本质的认识，使我们能够通观全局，因而对我们的实践有很大的帮助，它使我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不但能规定出比较长远的目的，而且能帮助我们为了达到更远的目的做出周密的步骤和恰当的计划。如我们的五年计划，在规定它的目标和指标时是经过反复思考的，为了达到完成这个计划的任务，使全国的生产及各方面的事业按比例很好地配合进行，这除了运用很高的思考力以外，还要采取下面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做出这个计划，而在实行这个计划时，每一部门的安排，以及为了达到这个计划的一年年的安排，也是需要有比较远大的眼光才能做到的。这些都不是感性认识所能解决的，不是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所能解决的。所以毛主席说：我们

认识的任务就是要达到理性认识。

当然，没有感性认识就不能得到理性认识，我们要认识本质先要有很多经验和观察，综合了很多材料和经验，才可以把事情各方面的联系提纲挈领地把握住。所以，没有感性认识不可能有理性认识，但是，认识的任务不是感性认识而是理性认识。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使我们的认识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指导实践的作用。

三、理论和实践

为什么我们说认识的任务是要达到理性认识呢？这个原因并不在于理性认识的本身，不能说我们为理性认识而认识。我们之所以把认识的任务放在理性认识上，就是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我们认识世界也不是为了认识而是为了实践。

教条主义者有这样的观点，说人的认识是为了安慰自己，人有了很高的知识就觉得很快乐，所以要去求知识。康德的哲学有这种思想，好像人就是有这种寻求知识的冲动，人有知识就很满足了，所以求知识是为知识而知识，人追求真理是超越利害之外的，有一种超功利主义思想，研究真理是为了得到一种超乎利害的感性，为了满足真理的欲望。在我们一般知识界中有没有这种人？受过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会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他说，你要注意到你的研究要有实际目的，他就会不高兴地说，我的研究是为了真理，没有什么实际的目的，我能发现真理就满足了。这种思想与我们国家对知识界的要求是有抵触的。这种自由主义超利害的真理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是一种反对的倾向。如果这种观点不加以改变，它会无形中阻碍我们的事业，有这种思想的人会阻碍他发挥自己的力量来为伟大的社

会主义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者要坚决地肯定这一点，就是认识是为了实践，认识是为了一定的功利的。但是我们所讲的不是那种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而是讲人民的功利。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但是不能因为反对功利主义就连人民的功利也一笔抹煞了。我们讲功利主义，但我们的功利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那时有人说，文艺应该反功利主义，有些人讲功利主义是不对的。他用反功利主义思想来破坏我们的文艺事业，想反对我们为工农兵服务这种方向。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回答说：我们还是要功利主义，要为人民服务的功利主义。

理性认识是为实践服务的。所谓为实践服务就是为人民的事业服务。因为实践就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这样的一种改造事业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只有反动派才反对改造社会。当然，反动派也去改造自然，在一定的情况和它的利益所需要的情形下面，它是需要去改造自然的。如美国也能发展原子能科学，这是因为反动派也利用原子能。不过他们不是利用原子能来生产，而是以它来威吓世界上的人们。所以反动派也要改造自然，但是改造社会他们是不会干的。因为改造社会的实践对资产阶级是有妨碍的(当然不是指所有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接受改造)，一般的反动派是妨碍实践的，至少是妨碍改造社会的实践。理性认识是能够帮助我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所以其任务是指导实践。如果有人认为自然科学不是为了实践而是为了真理本身，那是错误的。

当然，科学的每一研究不是都能直接的去解决某一个问题，如高深数学的研究有时是研究题目的本身，还不是在研究题目本身

时就直接解决某一些生产的问题。所以把实践看做太直接这又是太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的看法也是会妨碍科学研究的。因为科学研究有时是要暂时离开它所研究的题目，比较深入地去研究理论的问题。虽然我们要注意理论和实践复杂的联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就是理论的任务归根结底是实践，或者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最高深的理论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后它又运用于实践。所以，理性认识归根结底是为实践服务的。我们反对理论不运用于实践这种观点。

任何时代的理论发展的总的方向是实践规定的。任何时代的新发现如果只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科学家研究的结果，但是把它的各方面的联系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任何一种新的发现归根结底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工业发展的产物。它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产生后，反过来又对工业的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认识的任务在于实践。毛主席说：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的一种飞跃，同时，由理性认识再到实践，也是一种认识的飞跃。为什么？其原因是：第一，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第二，在实践中还可以检查理论。所以实践不仅仅是理论的运用，而且是认识过程的继续。关于这个问题，在哲学界有所争论，到底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抑或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三个阶段；后来在苏联有结论说是三个阶段，我也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到：实践就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同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讲到：做出精密计划之后再执行计划，去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端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把实践当做认识的一个继续一个阶段来看待才是合乎规律的。

这就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般原理。如果分开来讲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用理论指导实践；第二，在实践中检查理论；第三，在实践中使理论继续向前发展。这是理论与实践的全面的关系。现就这三面加以说明。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是一方面能为实践规定正确的目的，另一方面为实现这个目的规定各方面的周密的计划。总的来说，有了理论的指导，实践就能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当然，没有理论指导我们人也会有行动，在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以前，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工会组织，有了无产阶级的各种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可是在19世纪的20年代已经有了工人运动。1824年在英国开始有工会的组织，于是就有经济运动了，1830年在英国有了一个工人党的组织叫“宪章党”，这个“宪章党”开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提出了许多的工人的经济要求，写成了一个请愿书，许多工人集合起来到英国国会要求实现他们提出的这些条文，并且把它规定到宪章里面去。工人群众既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要使它变成宪法，这就有政治意义了，所以那次运动一开始就是政治运动了。这些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产生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在“宪章党”运动后十三四年（约1843年），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才产生。马克思的最初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的法律哲学批判》都是在那时才产生的。对无产阶级来说，在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以前也开始有实践的行动。实践总是在先的，实践在理论产生之前就会有的。

自然科学上把一种实践变为理论，常常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之后很长时期才产生的。如摩擦生火这件事情原始人就已经懂得了，他们懂得这样做也可以说是在脑中有了一点理性认识的

萌芽，但还不能说原始人把摩擦生火的经验变为理论了。摩擦生火的经验要变为普遍的理论，那是后来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这种经验要充分变成完整的理论，也可以说是在能量转变法则出现以后才达到这一步。19世纪时的能量转化法则，可以说是最全面地把摩擦生火变为完全的理论。人类在未掌握完全的理论以前已开始有了行动了。例如，在苏联有米丘林的理论，可是米丘林理论中的许多东西在我国农民中早有实行了的。巴甫洛夫学说把神经系统的作用全面概括了，可是在实践当中符合于这种学说的行动，在我国医学界长久以来就有所发现，像我们的针灸法和气功法（气功法还没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如果将来加以概括还是巴甫洛夫的方向），这些在没有巴甫洛夫学说以前我们早已在医学上运用了。所以实践不一定要等到理论产生后才有。

可是，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或者全面理论没有发现以前，实践虽然有了，但是这种实践是缺乏自觉性的，或者是没有完全的自觉性。按照理论指导程度的不同，实践的自觉性也不同，理论指导的程度愈低，自觉性也愈低，完全没有理论去指导的实践，实践就是自发的。理论指导不一定是很全面的，但是经过实践观察以后，可以把感性材料概括成丰富的理论。

不能说过去完全没有理论，过去也是有些理论的，不过片面得很，有些是猜测的，还带有迷信性质，掺杂了许多神秘主义的成分，所以，不能当做正确的理论去指导行动。以前人的行动是带有自发性的，至少带有很大部分的自发成分。所谓自发性，就是盲目性，盲目性的意思就是说，行动是对的，但往往在行动中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行要往哪里行，如何有步骤地达到目的，这一点是搞不清楚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以前，工人也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求经济上的权利，要求在法律上规定自己的权

利。过去有政治运动，有经济运动，但运动的目的何在，却是搞不清楚。只有一个眼前的目的，就是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工人应该有适当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工人应该有过好生活的保证。这些目的不过是比较眼前的，是感性能设想到的，表象能表象到的目的。工人阶级更远的目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在没有马克思主义以前，工人阶级只能提出比较眼前的、表象能够设想的、以切身的经验能够涉及到的目的，不能够提出理论所达到的结论，共产主义那样远大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不能设想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以前也有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为工人阶级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些思想家不是工人运动的思想家，而是有些资产阶级出身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他们观察了工人运动，观察了资本主义的许多矛盾，他们觉得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可是，这些空想的社会主义，即使有了目的，但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安排实现这目的的道路。凭空想来规定目的，而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是空想，希望资本家发点慈悲，捐点款，办些实业。这样，虽然有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还是盲目的。工人自己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工人运动也没有为实现这个目的做些行动上的安排。没有理论指导，其行动总是自发的或者是盲目的，这样一来，在行动中就很容易发生错误。方向不明确，没有很好地规定计划，所以，常常是走错路的。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常常受资本家所利用，有些工人的自发运动还变成了机会主义。

资产阶级不怕自发的工人运动，而害怕的倒是自觉的工人运动。自觉的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成为可能，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运动，就很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

利用。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都尽力想办法使马克思主义不要普及到工人运动中，使工人运动陷于自发状态。工人起来提什么要求，资产阶级是不害怕的，因为工人提出来的经济要求，资产阶级可以用改良主义办法，打折扣地给予一些满足，还可以收买一部分工人，然后用这部分工人来压制和分裂另外一部分工人，使工人运动垮台。但是工人运动集中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资产阶级就没办法分裂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也有罢工的，但资产阶级对他们有时还有办法。如美国、英国现在的工人运动有时也有罢工，但资产阶级对这些罢工有办法，因为共产党势力比较小，机会主义工会的领导占优势，这就是原因所在。

革命运动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就要犯错误。中国革命在过去就犯过好几次错误，后来有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才不至于再犯错误了，在自然科学的问题上就更加清楚了，如果没有正确的科学规律的指导，要想在工业上、农业上能够很好地完成改造生产，改造自然的任务是不能的。没有自然科学以前，人们也在改造自然，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改造自然了。但改造自然的活动常常有错误，进步是很缓慢的。近代生产力为什么发展得很快，而过去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又发展得很慢呢？原因就在于原始社会的人没有自然科学，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普遍地利用了自然科学，有了科学，有了理论指导，那么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就大大发展了。有了自觉性，那么失败和困难就比较少，进步也就比较快了。这就是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使实践由自发的、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使实践变成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句话是很深刻的。

第二，理论要在实践当中受到检查。理论不仅要指导实践，理

论的正确与否要在实践中去检验，理论最初的产生，是要通过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总结各种经验之后才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凭人的思考，总结出的一套理论，其中可能有错误的，也可能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什么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会发现有错误呢？因为理论要通过人们经验或感性认识的概括才能产生，但这概括的过程有时是会有错误的。

根据一点片面的经验和材料，就做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自以为掌握了理性认识，这是一种概括方法。另一种概括方法是，把所有感性材料和经验材料，全面地加以仔细的研究，然后很慎重地概括出一些理论结论来。这两种概括方法，所得到的理论结论是不同的，虽然可以叫做理性认识，但前一种理性认识是错误的，后一种理性认识是正确的。

革命历史上，有过这种问题，陈独秀在1927年提出了一种机会主义的理论，这就是不能和资产阶级斗争，而要向资产阶级妥协，要投降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应该把这方针作为行动的指导，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陈独秀的理论是根据片面经验和材料制定的。如资产阶级也可以联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要和资产阶级斗争，那么资产阶级就会离开革命。实际上是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是要经过斗争才能更好地联合的，当然也有这种情形，要是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话，资产阶级有时也会因此而离开革命。1929年时，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威胁下的资产阶级，不管是与它斗争或不斗争，也是离开革命的。陈独秀没有注意到这些新的情况，只根据片面的材料就做出结论，认为不应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认为与资产阶级斗争会破裂了统一战线，因此对革命就有危险。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陈独秀未能概括当时全面的情况。这些错误的理论是因为在概括经验

过程中犯了片面的毛病。

自然科学也有这种情形，根据摩尔根派的孟德尔关于遗传规律的实验结果，遗传中有什么隐性、显性，这些规律在后代中有一定的数学上的数量关系。这些实验成绩应该说是对的，其所概括的隐性、显性规律，在一定范围内也是正确的规律。但如果根据这一部分的实验，就做出对整个生物的普遍结论，认为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形下，生物的遗传的过程永远就是这样的。这就否认了进化论的学说，因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整个变化是怎样来的就没有得到说明。

如果对资产阶级国家所产生的这些生物学上的学说加以批判，就必须指出：那种把部分实验的成果所掌握的规律看做是普遍的东西，从而做出普遍的结论来，这是错误的。因为那种部分实验成果与整个进化论发展是发生矛盾的，当然在其实验中也有正确成果，如果一笔勾销了，也是错误的，这也应该反对的，因为批判了摩尔根学说的某些观点，就认为这个学派一点成绩也没有，这是片面的。如果拥护米丘林学派的人在对摩尔根学派进行批判时做出这种根本加以否定的结论，这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产生不管哪一方面都是由于在概括时或在概括过程中，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在苏联有许多人反对和批判李科森学派也有这种原因，就是理论有片面性的毛病。如果对米丘林生物学的方向没有信心，因而对物种可以跟着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事实就找不到任何说明了，那么进化论就要垮台了。当一种理论在有争论或批评时就很容易看出如果概括问题犯了片面性，那么概括成的理论也是片面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这样。

建立一种理论时，往往在概括过程中会遗漏某些东西而犯片面性的毛病，因此概括成的理论就有错误，或者全部错误，或者

基本上错误，或者个别错误。那么怎样来检查这种错误呢？纯粹凭理论本身的争论来检查理论是否正确，这是不可能的。理论是否正确，最后还是要在实践中去检查。这种经验是在这种实践中产生的，就要回到这种实践去检查，经过这种检查，然后可以看出这理论在概括过程中有无片面性的毛病。如果有片面性毛病，那么在实践当中经验会证明这到底是不是片面的。科学方法的程序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辩证过程的规律，先经过观察研究，然后做出假设，这假设尽管是经过周密研究的结果，但暂时还是假设。这假设要拿到实践中去反复检验，证明的确是行得通了，然后把假设变成规律，变成公理，并肯定它的真理性。一般自然科学都采取这种研究程序，社会科学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最初建立时也是这样，列宁曾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本著作中讲到，马列主义者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建立历史唯物论时，本来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已经相信这是正确的结论了，但马克思、恩格斯暂时还是把它当做假设，然后再去研究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工人运动中，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的。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写出了《资本论》这本著作，也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经过观察和研究之后再行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全面的客观真理。所以，凡是科学的理论，在做出假设时已经有真理性了，但科学家还不能轻易地最后肯定它的真理性，还要进一步通过实践再肯定它有真理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对这个问题特别认真地讲到了。毛主席说：许多自然科学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创造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为尔后的实践所证实了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仅在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本人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还在于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这些道理，研究科学的人是很熟悉的，用不着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把实践当做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

旧唯物主义认为：只要一种理论被哲学家所认识，就是真理。或者说，一种理论，只有在人的头脑中被认识就叫做真理。马克思主义坚决主张：真理要通过实践才能够得到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是客观真理、普遍真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是按照辩证的客观规律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和科学的发展史，恩格斯写了一本《自然辩证法》，证明了自然界的发展也是辩证的。通过对整个自然科学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研究，然后得出结论说：辩证唯物主义是最普遍的客观的规律。这些规律不仅被确定了它有真理性并且还更进一步把它运用来进行观察和解决问题。一百多年来，这些规律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到实践当中都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充分的信心肯定，辩证唯物主义不仅在现在就是在将来，都同样是一种普遍真理。因此，我们不需要考虑以后如果发现有一次的经验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又怎么办的问题，经过人类实践千万遍的证明，再加上理论上合理的推论，我们可以肯定，辩证唯物主义是永久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者无论确定任何原则都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经过反复证明之后，对于所确定的原则的准确性也就不再怀疑了。

这一点又是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不同的地方。经验主义认为即使有一千次经验证明了的东西，但还不够准确，还不敢相信，因为以后要有一次经验违背了这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会被根

本推翻。经验主义者会这样看的，几千次实验证明了的真理，还是不敢相信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了几千次经验证明了的理论也就是普遍真理了。普遍真理，不是简单的在于证明，而是经过证明之后再加上正确的逻辑的推论，就可以肯定它是有普遍性了。经验主义是不相信逻辑推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相信在经验的基础上加上逻辑的推论，就可以肯定一种普遍真理。并相信这个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去预见将来。

有些真理在某些具体条件下才是准确的，这里面重要的是在于条件问题。一种比较具体的真理都是适应于一定条件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无条件地准确的，然而它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有条件的。量变到质变究竟要不要通过爆发这个具体表现是有条件的，但是量变到质变这个根本原则是无条件的。所以讲普遍真理有没有普遍性，不是讲它的具体表现的问题。要把真理的普遍原则和具体表现分开。从真理的普遍方面看，在实践当中会碰到一些经验可能会推翻这个普遍真理的某些具体方面，但不会推翻这个真理根本的普遍原则。列宁说过：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基本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可以说是科学认识论的观点。任何一种理论原理，都应该在实践中经过考验，经过实践考验以后，再加上合理的思维、逻辑推论，就可以肯定真理的普遍性。

第三，要在实践过程中使理论能够得到继续发展。实践不仅具有检查理论正确与否的作用，还有产生新的理论的作用。

这个原因，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是很自然的，因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出现新的东西，实践本身也是发展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不会永远停留在旧的状态下，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行动也是经常进步的。因此人们在实践过

程中所能得到的经验和感性认识也不是简单地重复旧的东西，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人们不断得到新的经验，这些新的经验就是客观事物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感性材料。因此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时候就不仅通过实践、检查原有的理论，而且通过实践不断发现新的材料和经验，又成为进一步概括新的理论的基础，所以可以说，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到实践，实践成为认识的第三阶段，而且实践又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取得新的认识的开始。因为在实践当中又产生了新的感性认识，又开始了新的第一个阶段，又在新的阶段上再加以概括而得到新的理性认识，又再去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要注意到认识的反复性以及认识的反复的不断发展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在实践当中去发展理论，这是认识的规律中一个重要方面，注意到这个方面，就使我们不至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死的公式，变成教条。我们在实践当中要避免教条主义就不是简单地应用原有理论或把原有理论加以修正，而是要在实践当中把原有的理论加以创造性发展。发展理论并不是要把原有的理论完全推翻，如果由于发展了新的东西就把旧的东西一笔抹煞了，这种观点就叫做相对主义，这是不对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点就是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昨日的事，今日非了。今日找到一点真理，就把过去的真理完全否定了。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必须反对的。

在实践当中发现了新的理论，不等于把旧的理论一概推翻，而是在旧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内容。列宁是这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之后，特别在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新原则。这个原则就否定了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的社会主义革

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原则，但是，否定了这个个别原则，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取消了。列宁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上补充了一个新的原则，补充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的原则。

在哲学上列宁也补充了许多新的观点，尽管其基本观点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如在辩证法里，列宁就特别强调了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和对立的同一是相对的这个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已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奠定了的对立统一法则里了，但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具体地把它阐述出来。而列宁却把这一点特别指明了，为什么要指明这个原则，因为它具有实践意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为了推动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跟机会主义斗争，机会主义的哲学原理之一就是片面地把对立的同一性看成是绝对的。

在自然科学上这种问题更清楚了，自然科学通过了研究实验和实践的总结，肯定和发现了一些新的科学规律，但并不因此否认了旧的规律，爱因斯坦学说出现以后，也有人认为牛顿学说要根本否定了。实际上不是的，而是在更高的阶段上把牛顿学说包含了，这也是更进一步把牛顿学说发展了。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出现后，不是说欧几里德几何学根本没有用处了，而是在更高阶段上包含并发展了欧几里德几何学。

只要是科学，就必须不断进步，除非是反对科学的教条主义，就会停止在一点上。科学的理论永远不能停止在一点上，而是要不断展开新的东西，因为科学是永远发展的。新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新的理论方面也是无穷无尽的，因为科学必须是要反映客观世界的，而客观世界又是永远要发展的。因此，随着客观世界实际情况的发展就必然产生新的理论。产生新理论的方法是在不

断的发展的实践中间去观察新的材料去总结新的经验，总结成新的理论。

科学要发展也只能跟着实践过程来发展，经常注意实践当中新的要求和经验以及新事物的新的方面。这种配合着实验室的研究以及科学家个人思考的工夫，就能使科学前进。脱离实践能不能使科学发展，脱离实践专门在房子里研究，也可能使科学理论在某一方面的个别问题上做出有限的成绩来，但是搞科学的人，如果这样做，就会使科学发展受到严重的障碍。要使科学不断的发展，惟一的道路就是：使科学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要经常注意实践发展的情况。每一部门的科学家所注意的实践，要与其他研究部门相配合，如果要使科学家平均用力，要注意生产每一部门的工作，又要注意另外部门的工作，各方面都要注意，这是不可能的。每一部门的科学，其联系是要有一定的重点，也要注意到各方面，因为各方面的实践与本部门的实践有关系，其他部门的实践经验会对本部门的实践有所启发。既有重点而又全面地注意实践当中各方面的经验，是很必要的，科学家能这样做，科学发展就比较快。因为这样做，那么在科学家面前就会涌现出许多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概括就更容易发现新的东西，因此，不管直接或间接都要经常与实践结合。用苏联科学家的话讲就是经常倾听实践的声音。尽管苏联科学还是不断在发展，也可能有些部门还有缺点或者还差一些，但总的说来，因为它能够经常注意实践，所以，苏联科学的发展比起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发展是较快的。

中国的科学现在也走了这样的道路，科学家了解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关系，科学要为人民和实践服务。可是在刚解放时，还有人认为可以关起门来在房子里去研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观点了。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到中国的科学也

会很快的发展，中国科学家也会创造出许多理论来。旧中国无论是改造自然或社会实践都是停顿的，而新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是很快的。实践发展得很快，就迫使科学家要在研究方面赶上去。只要是不甘心脱离实践的科学家，就能够在科学上有许多新的创造。

四、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前面讲过的几段都提到真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科学研究就是要掌握真理。

真理对于实践有很重大的意义，真理是帮助我们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什么是真理，应该要弄清楚，真理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真理，在历史上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会有过长时期的争论：一方面，真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第二方面，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们讲真理问题主要就是讲这两方面。

另外还有抽象真理和具体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一般是不争论的，只有马克思才特别提出真理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这个问题。任何一个理论原则把它抽象化就不一定是真理了，任何抽象真理只有具体化才叫真理。仅仅是抽象原则，最多是真理的一些方面，而不是真理本身。譬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有人说这是绝对真理，那就要看怎样了解了，有些人以为书本上的那几个公式就是绝对真理，只要记住了这几个公式就了解了绝对真理，这种了解是错误的。如果只记住辩证唯物主义几个公式，嘴上背得出来，算不算掌握了真理，这是不算的。因为尽管背出那些公式来，但实际上处理问题时还是不懂得的。有些人很可以口头上念千百遍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意识

是存在的反映，可是碰到具体问题，又不管客观情况怎样而把主观的东西搬出来，先由主观决定然后再说别的。一个工作摆在面前，自己脑子想一想就做出计划，订出方针来，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在批评和教训人时，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不懂得思想是存在的反映这个原则，可是自己在做具体工作中，自己的思想又不去反映存在，这就叫做抽象真理。抽象真理不是真理，因为真理被完全抽象化了。真理要是脱离具体的东西就变成死的东西，就不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政治原理，都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的原理。恩格斯说，在一个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这个结论是在恩格斯那时的条件下的真理，但离开了那个条件把它到处运用那就错了。所以，普遍真理一定要具体化，也只有这样，才算掌握了普遍真理。

如果不肯把真理具体化，只是背诵一些普遍的原则，那么就会使真理变成空洞的东西，就不是真理了。具体的原则是与一定的条件结合的，真理如果离开了具体条件把它抽象化而到处运用又会使真理变成谬误。普遍真理不具体化或者个别原则脱离了条件，都叫做真理的抽象化，因而也就会把真理变为谬误。

抽象真理和具体真理的问题过去的哲学界是没有意识到的，在过去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是主观真理、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我们讲真理论时，在这里只是把抽象真理和具体真理的问题提出来，抽象真理与具体真理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里都讲到的。如讲《矛盾论》时，讲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也就谈到抽象与具体相结合，所以在这里不特别讲这问题了。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真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真理的标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和有些客观唯心主义以及主观唯心主义争论的问题。主观唯心主

义者主张真理是主观的，没有什么客观真理，真理的标准存在于人的主观里。只要我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我认为不是真理就不是真理。过去有这种思想，譬如欧洲希腊，有个与苏格拉底同时的哲学家普洛太哥拉斯，他主张人是万物的标准，意思是说人的主观是万物的标准，人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件事情是白的也可以被看成是黑的，这是主观真理论的一个主要典型。中国历史上庄子这一派哲学，也属于主观真理论。庄子在讲到自己梦见蝴蝶时说，到底是我梦见我变成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变成我，这个事情不能绝对肯定，我可以认为我梦见变成蝴蝶，但也可能蝴蝶觉得是它变成了我。这是主观唯心论的观点。

近代实用主义这种哲学派别，认为真理是主观的，胡适就是这样主张。胡适说真理是有用的假设，只要我认为是有用的就是真理。任何道理我把它假设起来，目的是在于它有用，有用到什么程度，其真理性就到什么程度。鬼神迷信对于我有用，应该说它也是真理。胡适一方面假仁假义地主张无神论，但另一方面又说，灵魂不灭学说倘若有什么证明还是可以肯定的。

凡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一般都认为真理标准是主观的，因为它根本不承认有客观世界，所以，它就不承认有什么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反对把真理认为是主观的，这种荒谬的学说不仅唯物主义者反对，有些客观唯心主义者也反对。黑格尔的学说就肯定了真理有客观性的。因为它承认有个客观世界，不过它的所谓客观世界是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者肯定真理有客观性，这是对的。但也有错误的地方，因为它认为客观真理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而认为客观世界就是一个理论的真理。因此认为主观所认识的真理也不过就是一种客观的理论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有人主张客观世界就是真理，我觉得这种观点不妥当，这种

主张与客观唯心主义是一致的。真理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唯心主义把客观世界与人的认识过程看成是一个东西，把客观世界与人的思想看成是一个东西，那么世界就是一个思想，思想认识思想，有什么不可以认识呢？把人的思想与客观世界看成是一个东西，把客观世界看成是真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唯物主义用反映论的观点来看真理，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有客观标准。但是真理并不就是客观世界，真理是人的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内容的结果。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也即是说，人的认识有没有客观内容的问题。人的认识所反映的内容是不是在人认识它之前已经客观地存在着了，这是唯物主义真理论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人所认识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真理的内容在未被人认识以前，已经客观存在，后来被人所认识，这才叫做认识了真理。凡是真理，只能是人的主观对客观世界正确的反映。真理只能是客观的，不能是主观的。如果人认识的不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而客观存在的实在，这就不是真理。

检查真理和谬误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客观标准。要检查是不是客观真理，就要看这种认识是不是跟客观的世界具有一致性。认识正确与否以及认识的是不是真理，它的标准就要看是不是与客观世界相一致。如果人们的认识与客观世界是一致的，就是真理。如果人们的认识与客观世界没有一致性，那么这个认识就没有真理性，这个认识就是谬误。所以认识的真理标准是客观的。真理只能是客观真理而没有主观真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真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的基本原理。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争论已久的，几乎自从有哲学以来在真理这个问题上就有争论。以前关于相对真

理与绝对真理的争论是片面的，有些哲学家主张真理都是相对的，因而就否认任何真理的绝对性，不承认有任何一种带有绝对性的真理；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真理是绝对的，只要是真理都是绝对的，根本否认真理的相对性。这种争论成为两个片面的极端：一种主张真理仅仅是相对的；一种主张真理仅仅是绝对的。

主张真理是相对的这种哲学派别，同时大体上也是主张真理的主观性的这种哲学派别，他们认为真理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它是主观的，真理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照中国的老话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句话既适用于主观真理派，也适用于相对真理派。因为我以为怎样便怎样，因而不能不承认你以为怎样便怎样，各人有各人的真理，这是相对真理派。这种思想在古代的欧洲主要的代表是希腊的普洛太哥拉斯，他是跟苏格拉底同时的一个诡辩学派的一个领袖，他主张人的主观的感觉就是万物的尺度。

古代还有怀疑主义者的怀疑论。怀疑论的思想是对任何问题都不加以肯定，如果你这样提出主张来，他就提出反对的理由把你驳倒；另外再有人又提出相反的主张时，他又提出理由来把他驳倒。怀疑主义者就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在诡辩学派中有这样的怀疑主义者。罗马时代有些政论家也是专门善于播弄怀疑主义的论调的，这与当时的政治投机有关系，有些人是专门学过诡辩法作为政治投机的方法的。

中国同样也有这种情形。我国的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也有相对主义。其中像庄子这种思想虽然不完全是相对主义，但至少有相对主义的成分。相对主义这个名词在我国又翻译成相对论。但这相对论不是自然科学的相对论，自然科学的相对论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哲学上的相对论就是相对主义，即不承认真理

有任何客观标准，认为真理都是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

我在“讲课提纲”中引了中国明朝的李卓吾的话，李卓吾也是主张相对真理的人，他在历史上有一定作用。他是王阳明学派的人，他后来否定了孔子的学说。王阳明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主张真理是凭人的良知决定的，要找真理就从人的内心中去找。李卓吾把他这个学说发挥成为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他给相对主义从政治上、从具体问题上做出一些进步的结论来。从前的人总是相信孔子的道理，以孔子的学说为标准，这是不对的。而李卓吾主张是非要以人为标准，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样一种思想在封建时代是一种很勇敢的思想，可是他们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相对主义的。我们这里引了他的几句话，他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此是彼非，亦并行而不悖矣”。所以在我国也有这种相对主义。

这种相对主义思想在中世纪还不很流行，最流行还是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在真理观上差不多都是相对主义的。实用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它认为真理就是有用的假设。胡适说：一种道理它有用到什么程度，它就真到什么程度，所以对于我是有用的，我就认为它是真理，如果对你没有用，你就认为它不是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科学的真理看成谬误的了。因为某种科学真理对我没有用，我就可以说它不是真理，而另一方面即使是错误的思想，但因为对他有用，于是错误的思想也可以当做真理。实用主义者一方面标榜它的思想是科学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它这种思想又可以做出最反科学的结论来。因为如果宗教迷信有用，那么宗教也成了真理。所以实用主义的领袖之一詹姆士就主张人是需要宗教的，在他看来

宗教应该是真理的一种。相对主义观点是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最反动最腐朽的哲学思想的主流，是现代最腐朽的主张唯心主义的真理观中的主流。所以在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及他的一些哲学笔记中反复地批判了这种相对主义思想。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的一篇短文——谈谈辩证法里讲到相对主义（或叫相对论）的问题，他说：相对论的特点就是不懂得相对的东西包含绝对的东西，片面地把相对性夸大。

在我国因为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所以这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在知识分子中相当流行。所谓自由主义、自由思想的观点就是相对主义。在从前的大学里研究学问的人，如果你与他争论问题时表示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他错了那就不行。金岳霖先生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把相对真理观和自由主义观点简单明了地概括得很好。他自己过去也是这种相对主义者。他说：我过去是这种情形，如果与别人谈话时，承认自己的意见与别人的意见不同是可以的，但是承认自己的意见有错误就不行了。即我承认我的真理，你承认你的真理，彼此互不侵犯是可以的，但不能说谁是错的。这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头脑中相当普遍的情形，这种观点就叫多元论的真理观。

我们在批判胡适后，台湾的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说共产党批判胡适要想反对多元论的真理观，树立一元论的真理观。他们用一元论的真理论来代替我们的说法，这其中有他们的诡辩的阴谋。因为他们说我们是一元论的真理观，是承认一个人的真理，这样就与他们污蔑我们的政权的一些言论联系起来。多元论的真理观就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它要我们承认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是真理，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也是真理。我们就不能批判唯心主义，如果批判了唯心主义就是一元论的真理观，就是不承认唯心主义是

真理，违背了多元论的真理观。我们批判唯心主义是应该的，不能说批判唯心主义就是没有思想自由，我们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总方向下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为了发展唯物主义，克服唯心主义。

从前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替这种将来统一天下的人想办法，为了服务于将来的统一的君主。我们现在的百家争鸣仍然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否认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并不见得就阻碍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也要有一定的方向。实用主义者主张真理观不是使思想自由，而是使思想走入迷途，使人找不到道理。因此结果就会受到反动派所支配所利用。我们也主张思想自由，但是这个思想自由有一个方向，就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不断地克服唯心主义服务。

另一种是主张真理完全是绝对的东西，真理没有丝毫的相对性。这种绝对真理观的主张就是这种看法：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出现，他就可以一次在他的身上把全人类的知识都掌握住了，发现了这绝对真理以后，将来的人就可以不用脑子了，只要按照他所发现了的来想问题就行了。

过去这种片面的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是很流行的。每一时代的统治者都要把它所喜欢的思想叫做绝对真理。如中国汉朝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把孔子学派某些著作中的道理当做绝对真理，从此以后社会上的人凡是运用思想时都应以孔子的某几部书为标准。后来宋朝时的“四书”、“五经”由朱子亲自来作注解，他的注解也成了绝对真理的注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凡是讲“四书”、“五经”都是以朱子的为标准。这种绝对真理观是反映了过去的剥削阶级在统治社会时保守的性质。剥削阶级掌握政权后就要用一切方法来把现成制度看做是绝对不变的，同时它又要把某些为现

成制度辩护的思想看做是绝对真理，不允许在这种思想以外再展开自由思想的。

我们可以说相对主义是在自由思想的假招牌下面来迷惑人民，使人民的思想混乱，这样来帮助统治者维持统治。自由主义表面上好像是反对绝对主义，实际上是帮助了绝对主义，用自由主义的形式迷惑人，使人失去方向以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胡适所讲的：让人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是相对主义的作用。而绝对真理的观点是公开的反对自由思想，公开的肯定统治者的思想，否定人民的自由思想。反对人民自由地争论问题，所以，过去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曾长期的在哲学史上进行过斗争。但是，这种片面的争论都是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因为过去的哲学一般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思想。所以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完全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过去历史上争论的两方面都有所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对真理的看法是认为真理又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凡是真理它一定有绝对性，但也有相对性。真理一定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在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这个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客观真理没有主观真理。但是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是主张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的。

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有绝对性？因为真理有客观性，因而它就有绝对性，而不能用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真理。这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理的话，那么这个真理就不会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真理只有一个，不能说我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你的意见也是真理，不能有两种相反的意见都是真理的。只有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绝不是真理。绝不能说我认为唯物主义是真理所以它就是真理，而你认为唯心主义是真理那么唯心主义就是真

理。因为是不是真理这是有客观标准的。唯心主义是颠倒的解释世界，全部人类的科学发展都证明它是错误的。所以真理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真理是被人认识了的道理，但它的内容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的反映，其内容是客观的。资产阶级不喜欢唯物主义，但是唯物主义绝不会因为它的不喜欢而变成不是真理，同样，资产阶级喜欢唯心主义，可是唯心主义并不因它喜欢而变成真理。所以，真理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不依赖阶级的爱恶为转移的。政治观点可以依照资产阶级爱好为转移。如有些资产阶级主张民主制，有些资产阶级则主张独裁制，作为上层建筑的观点可以因为阶级的利益而转移，这个阶级消灭了，它也就消灭了。政治观点、宗教观点是可以随着阶级产生而产生，阶级的消灭而消灭，而真理则不是如此，它不依赖某一个阶级的利害和爱恶为转移。这是讲真理的内容。当然，真理的揭发是受到阶级限制的，但是它的内容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真理有绝对性。即它有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标准。任何大大小小的真理都有绝对性。

但是，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真理又有相对性。为什么？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说真理有相对性的意思并非说真理可以因人而不同（相对性与相对主义的看法不同，相对主义是主张真理因人而不同的），而是说真理的发现，对真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真理的内容是不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可是真理的发现，对真理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是依赖于历史的条件。

这个历史条件主要是人的实践，当然还有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历史条件，真理要暴露在人的面前是在一定的时候的。如阶级斗争中的真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一直没有暴露出来，因为那时把阶级和等级混淆起来，我们在社会上一般是看到等级，阶

级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始终没有人发现阶级斗争的学说，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阶级斗争的学说就被发现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出现后阶级就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取消了等级，任何人在法律上、形式上是平等的，工人和资本家在法律上形式上来讲是没有什么等级的差别，彼此在市场上互相交换，以交换者的资格互相接触。可是，等级制取消以后阶级就暴露出来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形式上好像是平等的，资产阶级在法律上好像没有什么特权，可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就可以剥削无产阶级。从这一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前因为等级掩盖了阶级，所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就没有发现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客观矛盾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等到马克思、恩格斯出现以前就已有人初步发现了。法国的历史学家初步发现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不过这还是片面的，未能指出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出现无产阶级的专政等，只是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这个历史看到了有阶级斗争。所以客观事物的暴露程度是真理的被人揭发的历史条件，再加上人自己本身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认识事物的，他们的阶级立场对他们认识事物就有所限制。如中世纪时的封建地主阶级站在封建地主的立场上就限制了它对自然界的某种认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是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才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资产阶级是不能发现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这个规律，资产阶级的学者是不能发现的。

因此，所谓真理的相对性这个意思并不是指真理因人而异，而是指真理被人认识的程度、广度和深度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它是相对于历史条件，依赖于历史条件的。这种历史条件一个是客观条件，即事物本身的暴露程度；一个是主观条件，即人的阶级

立场、人的实践。这些历史条件限制了真理发展的程度。

所以，真理一方面是有绝对标准，它不因人而异，是有客观标准的，因此它有绝对性；但另一方面，真理的暴露程度，它的被揭发程度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的，因此它又是相对的。所以，真理又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讲绝对真理时，与过去的形而上学者所讲的意思不同。形而上学者认为绝对真理是人一次就能够掌握得干干净净的东西。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出现，一次就能把所有的东西完全掌握。绝对真理就是要使后人再不用脑子的真理。这种看法是一种幻想，因为这样的绝对真理是没有的，这是过去的形而上学者的夸张。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两个地方批判到这种幻想，他指出黑格尔以前的哲学有这种幻想，可是自从有了辩证法的真理观以后，这种幻想就要打破了。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真理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人不能一下就把什么都认识完，因为客观世界是无穷无尽的，人的认识仅仅是反映客观世界。既然客观世界是无穷无尽的，那么，反映客观世界的真理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讲绝对真理时不是过去那种一次掌握真理的意义而是另外的意义。

绝对真理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我们对某一种真理的认识的标准是绝对的，是客观的，不因人而异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真理都有客观标准，不能以人的主观意识、爱好为转移的；第二，绝对真理是对这样一种客观过程——无穷尽的过程的认识。总的绝对真理是无穷无尽的，一个部分的真理也是无穷无尽的，它也是绝对的。例如，二加二等于四这个数学的公式在整个数学中是很小的一点，数学上的全部绝对真理应该是数学发展的全部过程，可

是，二加二等于四也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客观的，所以它也是绝对真理。

所以，我们对任何一种认识只要是实践证明了它的确是客观的，那么它就是绝对真理，或者说这个真理就有绝对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具体真理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段落，因为我们对于整个绝对真理的认识总是有界线的。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不能够达到最后的一天，只能经过不断的发展过程无限地认识，而对于一个个绝对真理的认识是可以的。我们虽然永远不能把真理认识得干干净净，可是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所认识得到的真理也有绝对性，也就是绝对真理。但同时它又是相对真理，因为它受我们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真理又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这样的真理观有什么意义？它对我们科学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起一种思想推动的作用。第一，我们承认真理是有绝对性的，真理的绝对性是由于它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就可以克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因为怀疑主义者想取消科学真理。如实用主义、马赫主义，都是想用相对观点来降低科学的标准和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使我们丧失对科学的信心。我们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也就巩固了我们对科学的信心，把科学与宗教加以严格的区别，坚决地为科学服务；第二，我们承认真理有相对性。真理的认识是受历史界线的限制，具体的认识是不能穷尽的，需要我们永远努力，这观点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有好处。它能使我们永远也不会为现有的成绩而骄傲自满。科学发展最大的动力就是科学家不满于自己的成绩。巴浦洛夫在临死时还对青年人说：每一个人要有这样的品质，即要有勇气说出我没有知识这样的话来。这样的一种思想是推动人们永远前进的一种很好的思想。承认真理

的相对性就是承认我们要永远努力不断地求新知识。在科学的领域中没有任何的权威，不能说某一个伟大的人把一切都掌握得干干净净了，以后的人都要听他的话，不能有不同的意见。苏联最近批判了个人崇拜这件事对科学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反对个人崇拜同时也反对了科学上的权威主义。我们现在也正在开展百家争鸣，反对科学上的垄断思想。在我们中间有些资格老的人不接受别人批判，这种态度是完全不符合科学态度的，而有些人又有迷信观点，认为有威信的人所讲的话每一句都是对的，这样一来，权威观加上迷信观两者结合起来科学就完了。科学要反对迷信、反对权威主义。所以关于真理的相对性的认识是推动科学不断发展的一种思想泉源。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绝对主义，但我们又要承认真理有绝对性，这样来巩固我们对科学的信心，明确地划分科学与迷信的界线；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反对相对主义，但又要承认真理有相对性。反对相对主义是反对那种不论是非任意颠倒黑白的相对主义，我们承认真理的相对性是跟承认真理的绝对性结合的。真理是客观的，是绝对的，真理的认识是有历史界线的，真理的相对性仅仅是真理的认识有历史界线。因此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科学的发现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任何人在科学领域中只要努力总会有成绩、有新发现的。有了这种思想就可以使科学不断前进，就可以克服权威主义和迷信。这些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的实际意义。

我们应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我们之所以要讲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我们要了解这些意义，在于说明这种真理观点后使我们对科学有信心，不断努力去进行科学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广播稿*

(1956)

第一题　哲学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今天我们开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广播。

我们估计，各位听众同志们首先会要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哲学这门学问究竟是要研究什么东西的？

现在让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然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

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同时也是关于方法论的学问。

所谓方法论的学问，也就是关于我们认识事物最根本的方法的学问，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关于认识方法或思想方法的学问。

什么叫做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观点，也就是对于一切事物的总的看法和观点。我们说某种思想观点带有哲学的性质，这意思就是说，这种观点是能够普遍地适用到世界的事物上来的。例如我们观察了世界各方面的情况，看见各种新生的进步的势力不断在生长，腐朽的反动的势力一天天

* 1955年，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1956年，艾思奇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前去讲课。这是一份手稿，没有标明具体时间。整理时只做了一些文字加工。

衰亡，于是在我们的思想里就形成了一种总的看法和观点，这种看法和观点就是：世界的一切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新的东西总是不断地起来战胜和代替旧的东西。我们的这种看法和观点是可以普遍地运用到世界上一切事物上面来的，因此这种看法和观点就是一种世界观，就是一种哲学观点。

哲学既然是研究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既然是关于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观点的学问，因此，哲学所要研究的各项问题，都是最普遍的问题。哲学和一般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只研究自然界或社会的某一种运动形态或某一方面的问题，如化学只研究自然界中的化学运动形态这一方面的问题，经济学只研究社会现象中的经济部门的运动形态的问题，这些科学都不研究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最普遍的问题。只有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才是涉及到世界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问题。例如下面这一类问题，就是哲学的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从来就是物质的世界吗？或者在物质世界之前，先有某种精神力量存在在世界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不是永远处在运动变化的状态中？如果是处在运动变化状态中，那么，它们是怎样运动和变化的？人们的主观意识和客观世界有什么关系？人的意识是人的主观凭空自生出来的，或者它只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的主观意识能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如果能够，它是怎样去认识世界？等等，哲学的研究就是要对这一类的问题给以系统的回答。我们的这个讲座，就是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答这一些问题。

为什么哲学又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关于认识方法或思想方法的学问？因为任何一种世界观，都有着方法论的作用，也就是

都可以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根本的方法原则。我们既然有了某种世界观，既然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一切事物有了一个总的看法和观点，那么我们在研究任何具体问题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观点当做我们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的总的指导方向，当做总的方法原则。例如我们现在肯定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运动变化的，那么我们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会把所要研究的东西看做运动着的状态，而不会把它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在考察它的时候就要注意其中有些什么新生的东西，又有些什么衰亡着的东西，我们就要去研究它的运动变化的各种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研究问题时在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的一个总的指导方向，或总的方法原则。我们的世界观能够成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总的方法原则，这就是它的方法论的作用。我们研究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要解决认识方法或思想方法的问题，就是为着要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以及科学研究中，能够掌握正确地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善于发现我们所要考察的各种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便于应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各种工作，指导我们的革命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人们的世界观，人们的哲学观点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们的答复是：世界观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经验的最高的总结，是人们对于周围事物的各种知识的最高的概括。要了解这个道理，需要把人们对于周围事物的认识的发生情况简单地说明一下。原来客观世界里的每一件具体事物都是具体的事物，每一件具体的事物都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和其他事物不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它又一定有着某些和其他同类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质。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接触到各种具体的事物，并且首先认识到它们本身独自的特点，同时，由于人们在多次的实践中不断

反复接触到同类的事物，因此又能从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的认识中，在思想上下一番概括和总结的工夫，进一步再去认识它们的共同的普遍的性质。我们在工作中常常要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我们工作中所获得许多关于周围事物的具体知识加以概括，找出它们中间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原则。例如我们的国家有了几年工业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各项不同的工业建设中得到了不同的具体知识，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一切经验加以总结，概括出一个普遍原则，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要坚持把重工业作为建设的重点，同时对轻工业的建设也必须要给以充分的重视。这些普遍原则的普遍性质，是全部工业建设所共同具有的，因此这一个原则的认识是能适用于全部工业建设的。但是，这个原则的普遍性质是有限的，它不能应用到世界的一切事物上面，而只能应用到工业建设上面，在工业建设的范围之外的事物，就和这个原则没有关系，因此它不能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它还不是哲学的原理原则。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经验和原理原则再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如果我们根据上面所说的原理，指出整个工业建设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统一的体系中间，包含着相互对立同时又是密切地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包含着重工业和轻工业两个方面，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认识和工业建设以外的许多事物和知识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概括，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事物都在自己的内部包含着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依赖着的对立方面，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时我们就对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做出了一个最高的概括和总结，因为我们从这个总结里所把握到的原理，已经不是仅仅在工业建设范围内才能适用的原理，而是对于世界一切事物都能适用的最普遍的原理了。这样的原理就具有了哲学世

界观的性质。所以，哲学的原理，是我们从自己的各种具体知识中概括出来的，能应用于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原理，是我们对自己的实践经验做出最高的总结的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例如在某一地方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工作中凭着自己的主观要求，做出了客观情况所不容许的过高的计划，结果这样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而且造成了许多的损失。当他们最后来总结这一项实践经验的时候，他们首先自然要具体地检查那计划在什么地方超出了客观情况，也就是要对于错误的缺点的独自特点取得一些具体的认识。但是，如果他们愿意把认识提得更高一点，他们就应该从这一个错误和缺点中间找出最普遍的意义来。他们就应该获得这样的认识：这些错误和缺点之所以产生，有一个思想上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周围实际存在的客观事物不一致。他们应该了解到：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事物是不依赖我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所以凡事都不能把我们主观的要求和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不能够心里随便想怎样办就怎样办，这样做一定会失败的。要想在一切工作中不至于失败，那么，在制定主观方面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要首先认识清楚客观的情况，客观的条件，然后依据这些情况和条件制定主观的计划，才有可能做出不犯错误或错误很小的计划。这样一来，他们在工作总结中就概括出来一条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原理：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哲学世界观的原则，而且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

在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除了这里所说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外，还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哲学世界观都可以归结到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两大党派之内。全部人类的哲学思想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历史。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党派的对立和斗争的过程中，又包含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在许多哲学派别中，怎样区别哪些是属于唯物主义党派，哪些是唯心主义党派？区别的方法，就是要看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回答一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前面说过，哲学研究的问题都是一些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普遍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或客观和主观哪一方面处在第一性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人们的认识方法的最根本问题。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是用自己主观意识、精神去和客观存在的物质发生关系，这里就有一个首先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正确的认识是应该把物质、存在、客观放在第一位呢？还是应该把精神、意识和主观放在第一位？一种哲学如果肯定应该把物质、存在、客观放在第一位，这种哲学就属于唯物主义的党派，相反地，如果这种哲学肯定应该把精神、意识和主观放在第一位，这种哲学就属于唯心主义的党派。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派别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对于认识方法上的最根本的问题的回答，对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只能有上述两个。所以一切哲学派别都可以大致归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党派之内。其中虽然还有二元论的派别，但那只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的倾向，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

人们可能要问：世界只有一个，为什么人们对于它的看法和观点却会发生这种互相对立的情形呢？发生这种互相对立的世界观的原因，主要地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过去的哲学历史主要是在阶级社会里发生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革命的阶级和反革命的阶级，这些不同的阶级是站在不同的实践地位上来认识世界的。就是在阶级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首先在生产过程中，仍然有着先进者和落后者的区别，先进者和落后者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处在不同的地位上。此外，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生产规模的大小，也是影响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产生不同世界观的社会实践因素之一。

例如，在阶级社会里，站在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希望它所统治的那种社会制度长久巩固下去，并且要用一切力量来使它巩固下去的，这样的实践地位使它们很自然地要把自己的阶级意志，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点看做是支配一切事物的最高原则。这样就会产生它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把它们一个阶级所喜欢的某些主观的精神原理看做是第一性的，而把客观世界的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又如小资产阶级，由于它们联系的生产过程是规模狭小的，又由于它们在旧社会里生活极不稳定，这种实践地位使他们观察事物时眼界比较狭小，容易在思想上犯表面性和片面性的毛病，遇事容易左右摇摆，总之，容易在行动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在实际行动中把人的主观意识放在第一的地位上，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思想方法的反映。

一般来说，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处在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地位上的人们，他们不能满足于现状，他们需要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要改造自然界，就首先要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改造社会，就得首先要认识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情况。否则，不论改造自然界

或改造社会的斗争都不可能得到胜利。这样的地位使他们就有可能从自己的认识中概括出唯物主义的真理，也就是把客观的事物放在第一的地位上，把人的主观意识放在第二的地位上。

所以，哲学的世界观，并不是从什么聪明人的头脑里凭空地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中产生的。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世界观也会有所不同。哲学史上有着互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党派，反映了互相对立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地位：在阶级社会里，反映着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利害的对立和斗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反映着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进步与落后，新与旧的不同倾向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一种哲学思想和根本方向是由它所反映的某一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益决定的，并且是为这个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所以，一个阶级在哲学思想上要坚持一定的倾向，这是它的阶级政治性和党性的表现，是它的阶级政策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情形，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来说，常常是不自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以外哲学者，常常以为哲学似乎是研究所谓“纯粹真理”的学问，在他们眼睛里，哲学好像是和阶级的政治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者，虽然多少自觉到哲学和阶级政治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故意掩盖了这种关系。例如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需要唯心主义来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在思想政策上就用一切力量支持唯心主义哲学的散布，压制唯物主义的宣传。像胡适一流的唯心主义者，不管他们自己是不是自觉到，在实际上总是在那反动的思想政策支持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其他的哲学相反，它不需要掩盖自己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相反地，它公开地、自觉地指明自己的阶级性、政治性、党性，指明自己

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指明无产阶级在一切革命斗争中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工作中都不能离开这个武器，离开了这个思想武器就有犯错误的危险。所以无产阶级的战士在任何时候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都必须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善于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思想武器。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怎样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所需要，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可以找到最有力的证明。在 1935 年以前，由于党的领导者不能够正确掌握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思想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党性原则，走上了主观主义的道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造成了重大的政策和路线的错误，其中包括 1927 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 1935 年以前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在 1935 年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左”的机会主义错误以后，就不断地在干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在 1942 年展开了整风运动，把反对主观主义——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作为运动的中心任务，使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认识到人的主观意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以后党在领导工作中就不再犯重大的路线错误，革命就比较顺利，比较迅速地走向胜利。这些历史的事实，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如何重要，特别对于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干部是如何的重要。

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为什么会这样重要？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中起着正确的方法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引导我们正确地走上科学的道路。它使我们随时注意到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去观察和研究

我们周围存在着的事物的具体情况和规律性，使我们有可能依据这些认识来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规定出正确的方针、办法、计划等等，因此就能够帮助我们的事业获得胜利。如果我们的思想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影响，那么这种唯心主义就会在思想方法上把我们引到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道路上，它从理论上肯定我们可以单凭主观的意志和现成的思想公式来解决一切问题，而不对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这样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研究中就会对于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陷入盲目无知的状态，使我们在行动上不能够做出正确的适合于客观情况的方针、办法、计划等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把我们的工作引到失败的地步。由此可见，我们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正确了解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研究中，能够掌握到科学的思想方法来正确地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我们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能够得到正确的思想指导，使它们能够较为顺利地迅速地走向胜利。也就是为着这样的目的，我们才有学习哲学的必要。

第二题　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

前次讲过，我们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着要正确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为着要正确地了解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首先需要把全部人类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做一简单的回顾。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不是凭空地偶然产生出来的，它是全部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的成果，我

们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哲学发展的历史，才能了解它为什么是最高的成果。

全部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党派斗争的历史，在这斗争的过程中，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一直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和下面两个条件密切联系着的。第一是阶级斗争的条件，各个时代的进步阶级需要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反对反动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武器，因此它们就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第二是科学知识发展的条件，每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个时代的科学知识的全部成就作为建设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据，他们的唯物主义，也可以说就是从当时全部科学知识里概括出来的最普遍原理，因此每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的形式和成长的程度，都受着当时科学知识水平的限制。研究哲学发展的历史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到这两个条件。

恩格斯告诉我们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曾经经过三个阶段或三种基本的历史形式。第一是古代的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阶段；第二是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阶段；第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同时，曾经出现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它已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由于当时俄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它远没有发展到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完善的形式。

古代的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奴隶占有制社会或由奴隶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情况可能属于后者）。它反映着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反映着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的初步成就。它是在与当时服务于反

动贵族阶级的原始的宗教迷信观点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最初都假定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由某些原始的物质发展变化的结果，而一切事物又可以还原为这些原始的物质。例如在中国，老子的著作中就有把气作为原始物质的因素，以后齐国的邹衍学派又发展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思想。这种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两千多年中间一直是中国人民中间用来综合和说明各种自然知识（特别是中国的医学、天文学等）的理论基础——虽然其中日益附加了许多牵强附会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在古代希腊，有的哲学家认为这原始物质是水，有的认为是气，有的认为是火。在印度和稍后的希腊，认为是土、水、火、气四种元素。古代希腊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学说，他把在虚空中不断向下运动的，性质相同的细微原子（不可分的意思）作为最原始的物质。不同形状和不同重量的原子构成不同的事物。德谟克里特是代表主张民主制度的工商业奴隶阶级的哲学家，他的原子论总合了当时的科学成就，说明了许多自然现象，严重打击了当时传统的宗教观念，他的哲学世界观一直到十六、七世纪以前，都被欧洲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所崇奉，但却受到了反对民主制度的贵族奴隶主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反动利益的柏拉图之流的唯心主义者的高度憎恨。古代西洋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德谟克里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的斗争。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者是儒家的孟子，他当时所坚决反对的“杨朱”（即老子的学派）“墨翟”的学说，以及后来和孟子对立的儒家的荀子学派，都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

古代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一）它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并且力图用物质本身的原因来

说明世界的变化，否认宗教迷信中的神造世界的观点，否认唯心主义者把“理性”看做世界创造力量的观点。在古代中国，就是否认一切决定于“天命”的观点。（二）这些唯物主义者已初步估计到事物发展过程中有着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如赫拉克里特说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的永恒的火。”老子用“道”这个概念来指示客观规律，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三）它的唯物主义是辩证法的，因为它承认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发展的观点常常有陷于循环论的缺点。（四）它的辩证法的特点还在于它初步估计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估计到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一切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对立势力（冷和热，阴和阳，正和反等）的相互作用和斗争。如赫拉克里特明确地指出“斗争是万物之父”，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

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带有原始的素朴的性质。它产生在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还只是萌芽的时代。那时自然科学和哲学还混淆不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某些方面的规律只有比较幼稚的认识，还没有能够分门别类地对自然界做精密的系统研究。它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只能依靠笼统的直接观察来做出粗略的臆测，不能依靠精密的科学知识作为概括的基础，因此，它的这个总的看法虽然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对于变化发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却不能真正理解，它在这一方面的解释是幼稚的，就现代的眼光看来甚至于是荒谬可笑的。这就是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古代的这种唯物主义形式不能不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让位于另一种形式。

唯物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形式——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形式，作为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阶段的出现，是在欧洲的十七八世纪，也就是资本主义开始了相当有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起来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时期，同时也是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形成离开哲学而独立的科学的时期，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后半期才开始"，就是指的这样的时期。

近代唯物主义的最初的祖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17世纪就获得全国胜利的英国，它的第一个代表人是17世纪初的培根，在17世纪中叶和末叶是霍布士和洛克。培根的主要功绩是第一次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做了唯物主义的概括，肯定人类知识的真正来源是感觉经验。肯定物质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具有自己运动的能力。霍布士把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进一步加以系统化，严格指明人的思想、概念仅仅是客观事物的一般的反映。洛克是处在英国资产阶级已经获得统治权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是二元论的，他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互相平行的世界本质，他在认识论上也肯定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源泉，但没彻底坚持感觉是外界事物的反映的原理。他把人的感觉机械地分为第一性的感觉（如触觉）和第二性的感觉（如声色嗅味）两种，认为前者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后者仅仅只是人的纯主观的表象，不含有任何客观的内容。洛克的世界观反映了开始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向反动方向发展的倾向，它在思想上开始对宗教观念、唯心主义表示了妥协的趋向。

上面说的三个英国哲学家，开创了所谓经验派的唯物主义哲学派，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因为第一，他们用机械力学的观点来解释物质的本质，以为物质具有着某些永远固定不变的力学的特性，如质量、伸张性等。十七八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初步走向胜利的时期，它的主要成就还只限于力学、数学、天文

学的方面，当时的唯物主义者也就只能主要地依据力学方面的成就来建立自己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所以，十七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观，始终都带有这种机械论的性质。第二，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同时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既然把物质的某些根本特性看做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它就不能理解物质自己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把世界的发展仅仅归结为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否认事物本身的实质的变化。第三，英国经验派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片面地主张只有感觉经验是认识的真正来源，不能理解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不能了解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辩证运动。

英国的经验派哲学到18世纪就完全转到了唯心主义方面。18世纪初期出现了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不但根本不承认人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反映，相反地却把一切事物看做是存在于人的感觉领域之内的幻影。“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就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公式。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世界观，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反动腐朽的唯心主义的主要学派——奥国的马赫主义，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英国的逻辑实证论，美国的实用主义等等，都是以大同小异的各种变相形式继承了贝克莱思想的衣钵的。

但在讲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前，得先提一提17世纪欧洲大陆出现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18世纪以前，除英国的经验派唯物主义之外，在欧洲大陆又出现了所谓理性派的或“唯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霍布士差不多同时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第一个在大陆上创立了近代的哲学。他的哲学是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平行的世界本质的二元论哲学。在认识论上，他认为要认识真理，不必一定要依靠感觉，只需要直接诉诸人们自己的理性，只要人们从自己的理性

上觉得完全“清晰了”的思想，就一定具有真理的性质。从笛卡儿开始的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唯理论”的学派，在认识论上“只承认理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不了解感觉经验是真理认识的根源，不了解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认识论的实质来说，唯理论的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是，笛卡儿第一次指出了物质永恒存在的性质，也就是物质不灭的原理，这是他的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但他对于物质的看法，也是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他不能理解物质运动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他想用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解释高级物质运动。他的著作中有《动物是机械》一书，说明了他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思想。

比笛卡儿稍后一些，还有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斯宾诺莎生在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荷兰，他认为物和精神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就像凸面和凹面是同一曲线的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一样，他用这个比方来说明精神是物质的反映，肯定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他明确地指出自然界的变化是由于“自己原因”，而不是由于自然界之外的精神的原因，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有一定的必然规律。他第一次提出了“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个包含着辩证法思想内容的原理。斯宾诺莎是17世纪欧洲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他的唯物主义，从总的方面说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在认识论上他仍然是属于“唯理论”派，和所有唯理论派的哲学家一样，以为人的理性可以直接认识事物的真理，不必依赖感觉经验。

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学派中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站在唯心主义方面的主要代表人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无数的、各自独立的、具有

理性特征的精神“单子”的自我发展。莱布尼兹的关于“单子”思想虽然带有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因素，但他的唯心主义是反映了当时德国的落后——封建贵族和基督教势力的顽强统治。

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到了法国，唯物主义发展的中心也转到了法国。法国唯物主义，在思想方面是英国经验派和欧洲大陆理性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点。它包括一整批的杰出的哲学家，其中有拉美特里，爱尔维修，荷尔巴赫，狄德罗等人，他们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公开地提出了无神论的主张，反对灵魂不灭的迷信，向宗教世界观举行了最坚决的思想斗争。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发展了英国经验派的唯物主义观点，明确肯定感性的知觉是可能的，而感性知觉是由外界自然作用于我们的器官而引起的，狄德罗的观点已开始超出了经验派的狭隘性，初步理解到理性认识的实在性，他认为不仅感觉，而且复杂的推论，推理，都反映着自然现象的客观的实在的相互联系。

在对物质世界的理解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基本上和17世纪英国以及大陆上的唯物主义者同样地保持着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观点，并有所发展。拉美特里的机械论观点比笛卡儿更进一步，他写了一本《人是机械》的著作。他们公开主张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人的肉体结构决定人的精神生活，他们主张物质和自然界是永远存在的，谁也不能加以创造和消灭，物质运动的原因是在物质自己本身，运动是物质所固有的运动。物质的运动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人和一切自然物一样，受着自然规律的支配。狄德罗的观点已具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他认识到自然界各现象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初步考虑到了生物进化的问题及物种变化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狄德罗是法国唯物主义者

中最杰的出代表，他对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所进行的尖锐批判，列宁在《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的《代序》里，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17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各国革命中间最彻底，最深刻，震动最大的一次，它根本消灭了法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使法国变成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法国唯物主义的高度战斗性，反映了这次大革命以前的阶级斗争情况。法国革命胜利以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就转到了德国。随着法国唯物主义之后出现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就是1848年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夜的思想准备。

德国的革命思想因素不是在唯物主义的形式下面，而是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面准备起来，这是和德国的特殊条件密切联系着的。第一，这反映着当时德国经济的落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封建势力的比较巩固，使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勇气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对封建统治者举行革命的斗争，德国资产阶级是趋向于向封建贵族妥协，并希望通过君主贵族的统治来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有限的要求。他们幻想政治自由，但是不敢企图在现实社会关系上实现彻底的政治变革。第二，德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法国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法国大革命掀起了劳动人民的无比强烈的斗争风暴，把德国资产阶级吓呆了，他们害怕劳动人民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因此宁可投靠宗教信仰和唯心主义，以便在思想上找到一些防卫自己的力量。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唯物主义采取了坚决敌对的态度。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是以二元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

曾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他承认物质世界的永恒存在，他把这叫做“物自体”并且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觉是“物自体”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是唯物主义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觉的内容，仅仅是我们的感官本身所形成的一些主观的影像，它和“物自体”并不一致；因此“物自体”的本身是不能被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只是我们主观领域之内的感觉表象。这样一来，康德又走到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去了。

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者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三个代表人物，他们批判了康德的二元论，把哲学引到完全唯心主义方面，并且在唯心主义的体系里发展了辩证法思想。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因素就在它的辩证法方面。黑格尔是它的最后一个最大的代表者。黑格尔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把世界一切事物看做是所谓“世界精神”的表现，认为世界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同时又认为理性的本质是辩证法的。他给我们描画了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图景：不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反映到人的头脑里而成为人的理性知识，相反的，整个世界倒反而是理性的辩证运动的表现。他认为世界最初只存在着一种“纯粹理性”，这种纯粹理性依照辩证法的逻辑程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方面，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这是世界理性自己的否定。自然界的盲目状态和理性的本质是对立的，所以世界理性的发展还需要使自然界再被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样就有人类的历史。人类在自己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克服了盲目的自然状态，在自己的思想中认识到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发展过程，实际上这是世界理性的自我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相信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世界精神的这个自我意识过程达到完成的阶段的表现，并且认

为产生这样的哲学的国家——当时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国家，也应该是和世界精神自我意识的完成相适应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就这样，黑格尔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里直接引出了反动的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结论。

但是，在唯心主义体系下面，黑格尔的哲学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自觉地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他把辩证法提到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地位上，对形而上学举起了鲜明的战斗的旗帜。按照辩证法原理，世界是无限的发展和联系的过程，任何事物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存在。事物由于内在矛盾而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人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里包含着这些辩证法的合理的核心。提出这些合理的核心思想是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巨大功绩。这些辩证法的思想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所引出的反动的结论，是显然矛盾的。根据上述辩证法原理来看，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认识是永远变更发展的过程，不可能设想有一个尽头，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就是革命的，它与任何保守的观点都不能相容。然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做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最保守的结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是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人类认识的顶点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是在唯心主义的体系之内被窒息了的。辩证法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完全的正确的表现。

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否定了十七、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替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辩证唯物主义阶段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时期是产生在19世纪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这时自然科学已不仅只是在机械力学方面获得成就，在化学生物学方面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恩

格斯指出的三大发现——能量转变的规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使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可以从科学上找到多方面的确凿的证明。综合这些科学的成果，人们可以看到，辩证法的规律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理性的运动，而是物质自己本身的客观发展规律。自然科学的发展说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必须受到批判，辩证法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获得它的正确的，科学的形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条件在科学发展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它在哲学史上的出现成为必然的了。

但是，仅仅只有自然科学的发展，还不能决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能够完全形成。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的高度发展的成果，而且它本身是一种彻底革命的世界观，它不仅是与一切唯心主义和宗教观念不能相容的无神论世界观，而且它的辩证法的观点与一切留恋旧事物的保守思想或反动思想也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要完全掌握这个世界观，必须有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立场，这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就是说，只有当无产阶级作为政治上的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完全形成的决定条件。19 世纪以后，一些国家的进步思想的发展情形，可以作为证明。

首先可以举 19 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情形来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赫尔岑起，到柏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在黑格尔以后出现的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的杰出的革命思想家，他们都曾以批判的态度从黑格尔哲学中采取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赫尔岑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代数学，并且坚持思想是从自然界的发展中产生的唯物主义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康德、黑格尔、贝克莱、休谟以至于实验论和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

知论哲学做了深刻的批判。但是，由于19世纪旧俄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封建农奴制的国家，由于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斗争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他们的世界观受到这个历史的，阶级的限制。所以，他们虽然从黑格尔取得了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并且也曾力图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改造黑格尔辩证法。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却不能进一步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他们就停止了脚步。因此他们就没有能掌握完全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哲学世界观只是向后者发展的过渡形式。

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情形，也可作为说明。

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特别长的。17世纪初满族占领广大汉族地区，阻止了中国已经具有萌芽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的侵入，又使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这样中国的中古时代就一直延长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七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中国是直到这时才开始出现。由1898年戊戌政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间，出现了许多代表资产阶级要求倾向的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等。这些思想家的世界观中都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们在说明世界的时候，极力采用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的各种科学知识。这时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已介绍到中国来了，特别是进化论的思想，由于严复的翻译，在中国知识界中很长时候都有着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些科学知识的介绍，并没有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间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的还没有完全超出古代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阶段（如康有为、谭嗣同等），有的仍带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性质（如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的世界

观，明确承认世界发展是由物质开始，物体是“体”，精神是用，承认人的认识必须随事物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时也肯定认识来源于实践（行），但他的发展观始终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不知道作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的矛盾规律，不了解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因此他的自然观也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例如他对于生物和社会的发展，就给予了唯心主义的理解，如说生物的细胞是“生元”，“生元”是具有“知觉灵明”的东西。他的社会观点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说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互助，说“心为万事之源”，说人类中有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区别等等。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中最革命的代表者，由于阶级的限制，他虽然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科学文明”时代，也没有能够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且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才开始为中国的先进人物所认识的。

第三题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特点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它比过去任何一种唯物主义哲学都更为彻底，首先是由于它把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第一次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据政治经济学中所揭发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社会主义

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现不是由于人的主观空想，而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具备着使它必然要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这就是大机器工业和无产阶级。由于发现了这些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使社会主义思想由先进人物的空想变为科学学说。所以，全部马克思主义包括着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二是政治经济学；第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诞生在19世纪上半期，它的故乡是德国。德国在当时，经济上比英法等国都落后，为什么竟能成为这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故乡呢？这是因为，当时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都已退出革命舞台，只有德国成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为什么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而只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才会产生呢？这是因为，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都是资本主义的工厂手工业时代，还没有发展大的机器工业，因此那时也还没有出现高度集中的和有组织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不能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它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只是资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一个革命势力。但在19世纪初期，情形就有了很大变化，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工业在各国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也就随着成长起来。从19世纪30年代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在政治上表现了独立的行动，其中主要有英国的宪章党运动，法国的里昂暴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的罢工运动等等。所以，在当时，德国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起以前英国和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是在资本主义矛盾更为发展的条件下提出的。19 世纪中叶的德国，虽然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比起 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关系上是更为成熟的国家。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德国革命的实际斗争迫切要求无产阶级解决有关自己的历史作用的一系列的理论的和斗争策略的问题。这些历史条件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的故乡是德国，而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地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自发地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形成，固然首先是由于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作为一套完整的科学，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必须综合以前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成就并加以发展之后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学术上都有着它的继承的来源，这就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些思想来源都经过详细的批判，把其中最有价值的成就加以发展和改造，这样来创立自己的完整的科学。就世界观方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对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批判改造的结果。

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发展的黑格尔哲学，包含着唯心主义的体系和辩证法方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着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重性：一方面有着进步和革命的趋向，另一方面，又有着向封建贵族势力妥协的趋向。黑格尔死后，德国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逐渐成熟起来，这

在社会思想上的反映，就是黑格尔学派的瓦解。它分为老年黑格尔派和少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坚持着黑格尔哲学的反动的方面，少年黑格尔派着重利用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因素，对德国的封建社会关系展开了思想批判。这种批判最初是集中在宗教方面的。在宗教批判的斗争中，少年黑格尔派的最激进的分子逐渐倾向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面，最后就出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著作，公开宣布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发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进步作用给予了很高的估价。但是，费尔巴哈的思想立场，还没有克服资产阶级立场的限制，他没有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并且，由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当时德国的反动社会势力不能相容，他被迫到乡间去过隐居的生活。这使得他既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也没有注意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因此他的唯物主义基本上自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时候，连带后者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他并没有使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更高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也是属于少年黑格尔学派的，但他们的活动不像其他少年黑格尔学派那样，仅仅限于宗教思想批判方面，他们更进一步地对普鲁士君主专制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斗争。例如马克思刚离开大学，就担任《新莱茵报》的主编，写了许多政治法律批判的文章，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的体验使马克思恩格斯终于离开了一般的少年黑格尔派的资产阶级立场，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个新生的最先进的革命力量，并为无产阶级创造了革命的思想武器，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创

造了它的革命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把握了它们中间的有价值的东西，把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的核心，加以改造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照现成的样子凑合起来，他们根据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根据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利用和改造了那些合理的核心，独立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使唯物主义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过去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彻底性，把唯物主义应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成为系统完整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仅仅在发展程度上比过去一切哲学更高，而且在性质上和过去的哲学有根本的不同。这不同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各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并自觉地使自己成为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武器。过去的哲学，总是把自己解释做“超阶级”的东西，而在实际上却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是为这个阶级服务的。过去的哲学为什么要掩盖自己的阶级面目，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些哲学，除了个别的例外，都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剥削阶级自私自利，需要在一切言论行动上，掩盖自己的阶级面目，也需要在哲学上掩盖阶级面目；另一方面，过去一切哲学都是在少数人的范围内钻研的，从形式上看，好像只是一些追求“纯粹”真理的学者们所从事的专门学问，和社会各阶级的利益斗争没有直接

联系的。它们是脱离广大人民的，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总是在人民面前保持着一种高深莫测的面貌。这种表面的假象一直到现在对于我们还有着影响，使我们的干部觉得好像哲学是一种神秘的，非常难于掌握的学问，好像连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是一种和实际无关的学问，好像它并不是一般革命工作干部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广大人民为着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目的服务的哲学，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不需要掩盖自己的这个伟大的目的，因此也不需要掩盖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阶级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要公开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人民性、而且要用一切方法使它普及到工人阶级和人民中去。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是能够领会而且必须领会的，是它们的战斗的思想武器。广泛地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使人民群众，首先是广大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作干部逐步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逐步地学会应用这些观点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提高我们的各方面的工作质量和保证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条件。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它以前的任何一种哲学不同的地方，除了它的阶级性、人民性之外，是为改造世界服务的一种科学研究工具。过去的哲学只是用种种方法说明世界。每一种哲学，都企图使自己成为说明世界一切事物的包罗万象的绝对体系，它们产生在科学比较不发展的时期，那时许多科学上的发现还未出现，自然界的许多方面，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客观联系和规律性还没有被自然科学所认识。那时哲学就把自己看做“科学之上

的科学”，它依靠了哲学家的主观的猜想，来补充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的各方面事物联系的知识，这样就构成一套说明世界的包罗万象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把主要的力量用在这种包罗万象的体系的结构方面。由于他们对于世界的许多说明，都不能够依靠科学的成就，所以就在很大成分上带有主观虚构的性质，每个哲学家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来建立自己的体系。如果说当时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对世界的看法，还能尽量概括科学的成就，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还给予了基本上正确的回答，那么，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回答就是根本错误的，对于世界所做的说明就完全是颠倒的。不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主要考虑到的只是如何构成一个说明世界的思想体系，而不考虑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来检验这个体系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哲学不同，它不仅仅要说明世界，而且把主要的任务放在变革世界方面，也就是把哲学世界观作为变革世界的科学工具，并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来加以考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特性，是由于它不把自己当做“科学之上的科学”，不用主观的虚构来代替应该由科学研究去加以揭发的各种事物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自然科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自然界许多主要的联系和规律已被科学所认识。因此就对哲学提供这样的可能条件：只要把现有的科学成就加以概括，从已经揭示的事物各方面的联系中找出它们中间的最普遍的东西，找出它们的最普遍的规律，就可以建立起正确的哲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在科学发展的这个高度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是从全部科学知识的成就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它是和过去一切哲学都不同的完全新型的哲学世界观。辩

证唯物主义不是所谓“科学之上的科学”，它所要钻研的不是凭主观的幻想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门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物质本质，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性的科学。旧哲学只是说明世界，并且不能完全正确地说明世界。其中旧唯物主义虽然在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上是正确的，虽然力图依据科学成就来了解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但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至于唯心主义哲学，就根本歪曲了，颠倒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只有严格地用各种科学成就作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彻底排除了一切主观的幻想的联系，才把握到世界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才对于世界的本来面目给予了我们一个完全正确的总的了解。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把握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它就不仅仅能够说明世界，而且能够成为我们观察问题的科学工具。因此也就成为我们改造世界的活动中锐利的思想武器。

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工具的作用表现在哪里？主要在于它可以作为正确的科学方法论。它本身既然是一切科学成就的总结，是关于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知识，因此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把它当做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应该采用的正确的、根本的科学方法。如果我们领会了辩证唯物主义，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善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就能够保证我们对问题的观察和解决基本上不至于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获得胜利，就是由于先进人物学会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国家命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为着要掌握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要认识其中所包含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利用这些规律知识来作为我们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向导,使我们有可能保证在各种工作中能获得胜利。

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变革世界，而不是像旧哲学那样仅仅要说明世界，这个原理规定了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个基本方法就是：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要努力在学习过程中使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避免教条主义的，也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方法。怎样叫做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是说要应用所学到的理论原理，来分析我们周围存在的实际事物，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有的放矢”的方法，把理论作为“矢”，应用它去射中实际问题的“的”。就哲学方面来说，就是要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作为方法，去分析实际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应用这样的方法，就必须对所要分析的实际事物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收集足够的材料，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这些材料中去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并根据这样找出来规律性的认识来决定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学习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方法。如果我们学习时不应用这样的方法,如果学习时只满足于记住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不应用它来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就会使理论成为抽象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领会理论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如果不应用这样的方法，就不可能使它成为行动的指南，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它是行动的指南。例如我们学习了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我们就应该运用它来分析一下我们思想中的矛盾问题或实际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并且根据分析的结果,找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这

样做的结果，就会使我们真正能够领会辩证法的实质。

学习理论和联系实际不能机械地分为两个阶段。必须领会理论，才有可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在学理论的时候，根本不要联系任何实际问题，而只能在学完以后再来联系。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学理论的时候，如果完全不联系实际，就不可能真正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初步的联系。当然，在初学的时候，是不可能联系得很好的，是可能有片面性的毛病的，特别是要想一开始就能解决某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妨采取边学边联、逐步深入的办法。因为联系实际的方法的掌握和一切其他事情一样，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训练才能够逐渐熟练起来的。

"实际"的范围是很广的，但在我们学习过程中，首先应该联系自己经历过的工作和思想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自己亲身体验了的，解决这些问题，最便于帮助我们亲切地领会理论的内容实质，使理论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所谓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就是要在所学到的理论原理指导下面来把自己工作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思想中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方面，加以全面的分析，从哲学上，也就是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寻求成功和失败的根源，检讨正确和错误的原因。这就使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思想中做出最高的总结，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提到世界观的高度，使我们从思想方法上找到避免错误、失败和保证正确、胜利的最根本的关键。

从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上来说，一切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和工作上的失败，首先是由于主观主义，由于主观的认识和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不能一致，或者简单地说，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分裂。所以，学习哲学的最主要的实际目的，就是要克服主观主义。要判

断我们学习哲学是否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就要看是否能够在一定实际问题上真正克服了主观主义,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矛盾。1942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第一个目标的，也就是把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第一个目标的。所以整风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并且是正确地运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学习哲学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基本经验，就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联系党的政策、经验，联系每个人自己的工作和思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主观主义。这些基本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在我们今天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仍然不能忘记这些经验。

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

(1957.1)

前　　言

这个提纲，是在去年从事辩证唯物主义的讲课过程中陆续写成的。为着供给全国各地哲学教学工作急迫的参考需要，把这个不成熟的初稿付印了。它在事实上是一个提纲性质的简单讲稿，内容着重扼要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必要的地方引用少数实例来帮助说明原理。哲学教学工作要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随时充实新的具体实际内容，在使用这个提纲的时候，应该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的政策，党领导广大人民的历史斗争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国内国际的各项新的问题，科学界的重要成就，学习哲学的人们的思想和工作情况，等等，进行必要的研究，结合着这样的研究来讲述和领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各项基本原理。因此，希望使用这个提纲的同志们只把这个提纲作为工作上和学习上的参考，创造性地应用自己

---

* 艾思奇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于1956年写成，1957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5月又重印。收入本书时，我们以这个版本为基础，并参照了1959年5月修改定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的版本。凡1959年改本《纲要》中，在文字、观点和联系实际的材料上，修改、增补得较好的内容，已尽可能吸收进这个《提纲》。

的思想，不要使自己的思想受提纲的束缚。

学习哲学的目的不是要死记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为着要解决世界观问题和认识方法、思想方法问题，是为着要做到真正领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各项原理，善于应用这些原理来作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科学研究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武器，使我们对各种实际问题和科学问题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掌握正确的认识方法或思想方法既是学习哲学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可以说，认识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中心问题。我们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地就是要在思想上明确地、深刻地解决这样的两个大问题：(1) 什么是正确的认识？(2) 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即要通过什么道路和采用什么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在回答哲学的最基本问题——物质和精神或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精神、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正确的认识，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正确的反映。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努力使我们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情况求得一致。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的研究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前半部分，即通过什么道路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问题：认识必须自始至终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实践，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这就是保证我们不断地能够获得对于事物的认识的正确道路。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的研究，回答了用什么方法获

得正确的认识的问题。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它指明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都在自己内部包含着互相对立的方面，并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和相互联系而向前发展。因此，对一切问题的正确的认识方法，把分散无系统的感性认识提高到有系统的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这个方法的主要之点，就是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

这些，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认识方法问题。这个提纲的结构形式，也就是按照这些问题的提出的基本顺序安排的，请读者加以注意。

研究哲学的主要任务既然是在于解决认识方法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提纲里，我们有意识地在说明每一项原理的时候都特别着重地指出它在认识方法上的意义。通常我们讲哲学原理的时候，都要提到它的实际意义。应该说，所谓哲学原理的实际意义，就是它的作为认识方法的意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各项原理必须作为方法来加以掌握，然后它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发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作用，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希望使用这个提纲的同志，也特别注意到每一项原理的方法方面的意义，并着重从方法方面来联系实际，联系当前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联系党的政策、党的历史经验、个人的工作和思想，等等。这就是说，主要不是任意举些例子来说明原理，而是要把原理当做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工作中和思想中存在着的各种实际问题。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根本的原则。列宁说唯物辩证法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认识的方法，也正是指这样的意思。

已经说过，这个提纲是不成熟的初稿，其中有些原理和方法的阐述可能都是不深不透的，也可能还有许多错误，希望各地做哲学教学工作的同志以及研究哲学的同志们给予指正。

作者 1957年1月10日

重印说明

趁这次印刷的机会，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上做了一点补充，另在几处地方做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这是应该声明的。还应该声明，这个提纲只是帮助教学之用的辅助参考读物，而不是研究哲学的主要教材。我们主张研究哲学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主要教材，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等等（当然，经典著作的选择应该依学习者的文化程度而有所增减），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作为主要教材，其中至少要包括《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此外，《人民日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等，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际应用和具体发挥的范例，也应该作为学习哲学的正式教材。望读者注意。

作者 1957年5月4日

第一章 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哲学？

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对于人的认识又具有着方法论的作用。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观点，就这样的意义来说，哲学又可以说是研究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道理的学问。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观点，明白了这个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道理，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方法上的总的向导，就掌握了一种认识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原理。这就是它的方法论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的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般地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正确的世界观，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则是错误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最正确的革命的世界观，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他们的最锐利的思想方法的武器。我们研究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就在于要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在于要能在斗争中、工作中、生产中应用这个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最根本的方法原理，也就是在于要正确地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工人、农民、共产党员以及一切愿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们，都应该研究哲学，都应该学习掌握正确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如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会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以及科学研究工

作中善于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我们善于总结斗争经验，善于从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中找出原因和教训，使我们有可能避免犯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或善于及时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从而也就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顺利前进。中国共产党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在“学风”方面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了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由此大大提高一步，因而就能够把以前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几次路线错误加以纠正，使以后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革命事业顺利地迅速地获得胜利，这就是一个明证。

哲学既然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因此它所研究和所涉及到的问题，就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问题。举例来说，如像下面这些问题就是哲学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世界从来就是物质的世界或者在物质世界之前还有某种精神力量最先存在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不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是处在运动变化发展状态中，那么它们是怎样运动、怎样变化和发展的？人们的主观意识、精神生活和客观世界，和他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有什么关系？人的意识是人的主观精神世界里自己凭空自生出来的，或者它只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只是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人们的意识能否正确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世界，要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世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给予系统的回答，是哲学研究的任务。

人们的世界观是怎样产生的？世界观是人们对自然斗争和人

们的社会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最高的总结，是人们在这些实践中所获得的各种事物知识的高度概括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因此，哲学所研究的那些最普遍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哲学的人凭空地任意提出来的，而是从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经验中，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中通过概括而提出来的。哲学中的那些普遍的问题，也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的最普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客观世界里实际存在着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具体的事物。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各自有其自己独自的特点，同时又包含着某些与其他事物所共有普遍的本质。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接触到各种具体的事物，并认识到它们自己独自的特点，同时人们的认识又能够不断地从许多具体的事物中去概括出它们的某些普遍的意义，或者从某些具体的典型事物中概括出能够适用于一切同类事物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性。这种概括的作用，就是人们对于自己在实践中和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的普遍化。如果我们从自己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中所概括出来的本质和规律性，是具有最普遍的东西，——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那么，这样的一种普遍化了的认识，就具有着世界观的意义，也就是具有了哲学观点的性质。而哲学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知识进行最普遍的概括时所提出来的问题。例如，19 世纪中叶自然科学有三大发现——能量转化定律，细胞学，进化论——使我们对于自然事物的三个方面获得了重要的具体的科学规律知识。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些知识中概括出其中的最普遍的意义：即这些发现证明，一切自然界事物都处在联系和

发展的状态中。这样的概括就是哲学的概括，这里所概括出来的原理就有世界观的意义。又例如，中国人民百多年来不断地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清皇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英、法、美帝国主义等等，从这些斗争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不同的敌人的不同特点，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方法，也各有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些斗争中，概括出一个普遍的原则：这全部的历史，主要就是中国人民和各种敌人斗争的历史，它自始至终，贯串着这些敌我之间的矛盾。同时我们又看到，人民中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问题上，也经常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经常需要把这些争论加以展开和解决，努力求得自己内部团结一致，才能够共同对敌，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些不同的意见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概括起来，不外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中间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是不断解决又不断出现的。这样，我们从自己的长期的历史斗争中，就可以概括出来这样一个最普遍的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两种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这些原理带有最普遍的性质，因此就是哲学的原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第一次深刻地全面地概括了我们的历史实践和阐述了这些哲学原理的伟大著作。再例如，在某一地方做工作的人，他们在工作中凭着自己的主观要求，提出了客观情况所不容许的过高的计划，结果这样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而且造成了一些损失。当他们在最后来总结这一项实践经验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要具体地检查那计划在什么地方不符合于客观情况，也就是要对于错误和缺点的独自的特点取得一些具体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要把认识提得更高一些，他们就

应该从这一个错误和缺点中间找出一些最普遍的意义来。他们就应该获得这样的认识：这些错误和缺点之所以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周围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不一致。他们应该了解到：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事物是不依赖我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所以凡事都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主观的要求和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不能够单凭自己的意志想怎样办就怎样办。单凭自己的意志去做工作，是一定会失败的。要想在工作中不至于失败，那么，在制定主观方面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放在第一位，而不要把主观的要求和意志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要首先认清楚客观的情况，客观的条件，然后依据这些情况和条件来制定主观的计划，才有可能制定出不至于错误或错误很小的计划。这样一来，他们在工作的总结中就概括出来一条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原则：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哲学世界观原则，而且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

前面说过，有各种不同的以至于互相对立的哲学观点或世界观，除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外，还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哲学观点，都可以归结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之内。全部人类的哲学思想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历史。为什么人们的世界观会有这种对立的情形呢？这主要地应该归于人们地位的不同。过去的哲学历史主要是在阶级社会里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分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这些不同的阶级是站在不同的实践地位上来认识世界的。就是在消灭阶级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在实践中，首先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永远有着先进者与落后者的区别，先进者和落后者在事物的认

识上，就处于不同的地位。此外，生产发展的不同水平，生产规模的大小，也是影响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产生不同的世界观的社会实践因素之一。总之，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所处的不同的实践地位，对于他们的认识是有决定的影响的。它限制着他们的认识的深度、广度以至于正确程度。它使他们从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角度上来概括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使他们获得不同的以至于相反的世界观。例如，原始公社的人，由于生产的极不发展、由于对事物的知识极端贫乏和公社生活的许多保守的性质，把世界的一切事物看做是受神灵的意志支配的，把人的肉体看做是由灵魂支配的，也就是，把神灵的意志和灵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世界的其他一切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萌芽因素的原始的宗教世界观。在阶级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力求要使它所统治的社会制度长久巩固下去，这样的实践地位使它把自己的意志、希望，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原则看做是支配一切事物的“天经地义”。这样，就产生了他们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即把某些主观的精神的原理原则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世界的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由于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常常要违背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向新社会制度拼命进行反抗。剥削阶级是企图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反对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位，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有了唯心主义的性质。又如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事物的人，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的狭小，又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不稳定，使他们的眼界也比较狭小，观察事物的时候容易犯表面性片面性的毛病，容易“左”右摇摆，也就是容易在行动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把人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的地位上，就是唯心主义世

界观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应该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就他们的世界观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错误根源之一，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思想方法的反映。一般地说，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处于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地位上的人们，他们不能满足于现状，他们需要改变自然和改变社会。要改变自然，就首先要通过生产的实践，通过科学的研究，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要改变社会，就得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认识当前社会的客观情况。否则，不论改变自然或改变社会的斗争都不可能得到胜利。这样的地位使他们或迟或早不能不从他们的认识中概括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肯定人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要想在斗争中获得胜利，必须使自己的认识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这也就是要肯定：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人的主观认识则是第二性的东西。

所以，哲学的世界观和人们对于世界的一切认识一样，不是从聪明人的头脑里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中产生的。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世界观也就会有所不同。历史上存在着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两大哲学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反映着互相对立的人们的实践地位：在阶级的社会里，反映着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利益的对立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社会实践过程中永远存在着进步与落后，新与旧的不同倾向的斗争，因此也还会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倾向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是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并且直接地或间接地为这个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服务的。所以，哲学中的一定的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阶级的政策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情形，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的哲学家来说，常常

是不自觉的，或者是虽然多少自觉到了，但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关系，力求要加以掩盖的。例如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需要唯心主义来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在思想政策上，就要极力散布唯心主义哲学，压制唯物主义的宣传。旧中国的统治者在大学里，是不允许唯物主义的课程正式讲授的，只有胡适一流的唯心主义者，才能在那些课堂上自由地讲授他们的哲学思想，因此不管这些唯心主义者自己自觉到或不自觉到，他们在实践上正是执行了这个反动阶级的反动思想政策的代表。无产阶级在思想政策上走着和资产阶级根本相反的路线，他们要自觉地公开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哲学武器，他们指出人民在自己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有犯错误的危险，因此一定要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我们新中国目前在科学研究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方针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允许各派学术思想自由地争论和宣传。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因为只有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辩论，才能使科学的客观真理得到充分的阐明，才能避免学术上的片面武断和教条主义。所以，这样的方针，正是有效地贯彻唯物主义和克服唯心主义的一个正确方针。

历史上有过多种多样的哲学思想，在这许多哲学思想中，要怎样才能辨别哪些是属于唯物主义，哪些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辨别的方法，就是要看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回答哲学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物质与精神（或存在与意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这一个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呢？因为人们在实践的时候和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是，而且任何时候始终都是以自己的精神、意识和主观来同整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相对立着的。这是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存在着的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人

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过程就是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解决的过程。因此当人们依据自己的一切知识去做哲学上的总结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首先就不能不回答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物质（存在、客观）和精神（意识、主观）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的问题。由于这里所涉及到的只是两个东西的关系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也只能有两个互相反对的回答：或者是把物质（存在、客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或者是把精神（意识、主观）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这两个相反的回答，就决定了哲学思想上的两条根本相反的路线：或者是唯物主义的路线，或者是唯心主义的路线。一切唯物主义的哲学派别，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有何不同，在回答这个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点，即是把物质（客观、存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精神（主观、意识）看做第二性的东西，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存在于精神之先，精神（主观、意识）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只是某种物质的特殊的属性，这种属性的特点就在于，它本身只是物质（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作用；而人的认识，就是客观外界世界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和这些观点相反，一切唯心主义，不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如何不同，在回答上述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方向，即是把精神（主观、意识）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物质（客观、存在）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认为精神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的客观存在）只是精神的附属物，或精神发展过程的某种表现形态。世界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它或者是人们的各种感觉的综合，或者是人们的理性、意志、欲望等等的精神过程的表现。物质、自然，只

是这一切精神元素所构成的幻想，或只是后者的表面的外壳。人的认识不是客观外界世界的反映，而只是人的精神、主观内部凭空自生的东西，或只是所谓世界理性、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等等。哲学史上的一切哲学派别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他们对于哲学上的这个最根本问题的回答只能有上述两个，所以一切哲学派别都可以从根本上划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之内。虽然历史上也还有二元论的派别，企图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互相平行的世界本质，不加以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别。但二元论在实际上只是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倾向，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第三种派别；因为在各项比较具体的问题上，二元论总是有时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有时又把精神看做第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够真正把物质和精神看做完全平行的两种世界的本质。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哲学？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正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各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影响，使我们能够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为在我们国内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服务，为争取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服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明确地肯定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公开地声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改造世界的哲学武器，公开地声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性是在于对一切唯心主义倾向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能够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目的服务，也就是要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能做到或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就是在

哲学上缺乏党性或党性不够。

要了解上述研究哲学的目的，必须对哲学的性质做进一步的研究。

前面说过，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同时，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对于人们的认识又具有方法论或认识的根本方法的作用。这就是说，哲学不仅仅是人们从各种事物的知识中抽引出来的最普遍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它又能够反过来对于人们的一切认识活动发挥指导方向的作用。一个革命工作者在实践中间遭受了挫折以后，他如果能够把经验总结到哲学思想的高度，能够认识到他之所以遭受挫折是由于自己只凭着主观愿望来进行工作，而不首先看清楚周围事物的客观情况，是由于在认识上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也就是由于犯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毛病。如果他能够由此取得深刻的教训，真正体会到一切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东西，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真正体会到了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原理，那么以后他在实际工作中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就能够自觉地把这个世界观的原理作为总的思想指导，就能够随时注意到，不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研究出发，而不要从自己的主观的愿望出发。也就是，在不论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细心谨慎地对周围的情况做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再决定自己主观的计划。这样他就在思想方法上掌握到了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掌握到了一个正确的根本方法，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就可以少犯错误，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人的主观意识或什么世界理性的表现，这样他在观察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以为只要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某种现成的思想原则出

发，就可以直接解决任何问题，不必首先对周围的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样一来，他就在根本上使用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即主观主义方法。所以，唯心主义世界观，就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理论基础，而主观主义则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学习哲学的目的，是在于要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以便我们能够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来为我们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和必须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研究哲学，主要地就是由于哲学思想在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具有的上述方法论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引导我们走向科学的认识方法的道路，使我们注意到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认识我们周围实际存在着的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和规律性，使我们有可能依据这些认识来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规定出适合于周围情况的正确方针、方案、计划、办法、战略、策略等，因而就能够帮助我们的事业容易获得胜利。唯心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助长人们走向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向，它用理论来支持那些只凭主观的意志或现成的思想公式来解决一切问题，而对于周围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熟视无睹的态度。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不坚决克服唯心主义的影响，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指导原理，我们在行动中就不能避免主观盲目性，就不能为我们的工作和斗争规定出适合于周围情况的正确的方针、方案、计划、办法、战略、策略等等，就使我们的工作容易遭受失败。所以，如果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让唯心主义扩大影响，对于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的人民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不利的。相反地，对于反对革

命阻碍进步的反动势力却是有利的。一切空想、幻想、妄想，和各种迷信思想一样，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基础上的，都是危险的，都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根本不能相容的。毛泽东同志论到主观主义（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危险性时，曾经用非常尖锐而明确的语调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通过哲学的学习来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原因。

我们有许多同志对于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不能够理解，其中有的人认为哲学只是一些哲学专家所从事的纯理论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是没有关系的。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理论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还不懂得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长期历史经验，还没有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什么，还没有真正领会党的各种政策决议的精神实质，还没有真正学懂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和策略，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如果不学习哲学，不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想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并善于把它应用于实际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各种政策决议，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不管是理论方面的或者是实际政策方面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表现。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时期，由于党的领导者不能够正确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在思

想方法方面走上了主观主义的道路(其中包括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1935年以前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造成重大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的损失。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批判了主观主义的领导以后，就不断地在干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在1942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党的干部中大规模地反对了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使干部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革命就迅速地获得胜利。这个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那些把哲学看做是和实际工作没有关系的人，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

还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承认哲学的重要性，承认哲学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有关系，但认为这只是对于高级的领导者决策的时候才是必要的，至于一般的实际工作者，一般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工农群众就不一定有研究哲学的必要。他们以为在一般的实际工作中，在一般的掌握政策执行政策的干部中，在工农群众中，是不会有在思想上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的。他们只要简单地跟着党的指示去做工作就够了。他们不知道，事实本身的情况和他们所想的并不一样。在思想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不但对于高级领导者决策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在一般的实际工作中，在一般的掌握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干部中，在工农群众中，也有必要在实际工作中，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贯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即主观主义)的斗争。

历史证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它的政策路线都力图严格地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制定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只要努力遵循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遵循

着党的政策路线去工作，就可以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哲学，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那么，一定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且也不可能保证不犯重大的错误。因为，如果他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他就不了解我们党所用以领导工作和制定政策的根本方法，也就不可能深刻领会党的指示和政策的意义。在一切具体工作岗位上，周围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要贯彻党的指示和政策，需要善于依据一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步骤、办法和计划来进行工作，这也需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干部要做好工作，必须“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而“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这个原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能够遵守这个原则做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否则就不可能做好，或者反而要做坏。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干部都必须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理由。

有两种不同的工作干部，和两种相反的工作方法：一种是，他们在执行任何政策的时候，总是细心谨慎地首先对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力求对于各方面情况获得正确的全面的了解，然后依据这样的了解，规定出最适当的执行党的政策的步骤、办法和计划。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是正确的，就其思想活动的根本实质来说，正是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路线的，因为他在实际工作中，在行动中是把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当做第一性的东西来看待，而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对于周围情况的认识，执行政策的步骤、办法、计划等等——摆在第二性的地位上。他们的这种工作方法能够使他们的主观认识比较经常符合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就能够正确地执行政策，能够保证工作的胜利。另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却和这相反。他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不是首先对周围的事物进

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以求得情况的正确了解，然后再依此规定执行政策的适当的方针、步骤、办法和计划。相反地，他们常常以为只要有了一般的政策方针，而不必去注意周围的实际情况，就可能解决一切具体工作问题，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种种主观的想法，自己的主观兴趣和意志，凭着书本上断章取义地引用的词句，或者个人的狭隘经验，或者只凭着一些根据周围事物中的片面的、表面的材料所做出的主观臆断，来任意规定工作的方针、步骤、办法和计划。我们知道，这样的干部的工作方法是不正确的，是会常常在实际工作中陷于错误，把好事办成坏事，并使党的政策遭受破坏的。然而，这样的工作方法，就其思想的根本实质来说，正是在实际工作中走上了唯心主义的路线，正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是错误地把自己的主观意识摆在第一性的地位上，而把周围的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看做第二性的东西。他们的这种方法使自己的主观意识不是正确地符合于客观存在，而是相反地使主观和客观分裂。因此他们就不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就不能保证工作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从事实际工作的一切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自觉到，都存在着世界观方面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问题，存在着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和反对唯心主义路线——主观主义——的问题。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赞成前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因为循着这条路线，就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周围事物的真实情况，保证我们在一切实际工作中不至于发生重大的错误。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141页）唯心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性，就在于它使我们在观察事物的

时候引入许多凭空地附加的主观的“外来的成分”，来使我们的认识陷于盲目状态，使我们的行动由于认识的错误而遭受挫折，使反对势力由此得到利益。我们反对上面所说的后一种干部的工作方法，就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的实质是依循着这种危险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路线的，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既然在干部中存在着，因此学习哲学对于干部就成为一件很必要的事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国家已走上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等等还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里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要努力争取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地消灭上述的差别，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后还需要对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就世界观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在旧社会里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有着广泛的影响的。并且，由于在当前社会制度下仍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存在，也由于在任何时代，哪怕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也好，人们中间永远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也永远还会有不断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所以，不能不注意到，唯心主义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我们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中表现出来，例如它会以教条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以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的干部不学习哲学，不学习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就不能认真克服唯心主义的这种影响。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并且

不单干部需要学习，而且工人农民，也有学习的必要和可能。只有使实际工作中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干部和群众逐步地通过哲学的学习，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唯心主义的影响，经常端正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这样，他们才能够充分正确地领会党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够善于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条件规定出最适当的执行党的政策路线的步骤、办法和计划等等，使党的政策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贯彻，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造成了广大群众能够直接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条件。而广大群众一旦直接掌握了自己的哲学武器，它又会反过来对生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发展给予更为强大无比的推动力。

第二章 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历史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全部人类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成果。

全部哲学的历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斗争的历史，在这两大营垒的斗争中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就在这两大营垒的历史斗争过程中，唯物主义世界观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来，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的形式。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人类的科学认识和宗教迷信之间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在哲学观点上的综合表现，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在世界观方面的反映。唯物主义的形式随着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到完善的阶段，各个历史发展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一般地都是为这一时代的进步势力服务的。各个时代的进步阶级在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在反对反动势力用来迷惑人民阻碍进步的各种宗教迷信和谎言武断的斗争中，锻炼出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哲学思想发展条件相适应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研究每一时代的唯物主义和它的实际作用时，必须注意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形。

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一）古代的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二）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同时，曾出现过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形式，它已走到辩证唯物主义，但由于俄国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止了脚步。

古代的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在奴隶占有制社会或由奴隶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情形可能属于后者）。它反映着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反映着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的初步成就。它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和当时服务于反动贵族阶级的原始的宗教迷信观点以及唯心主义思想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最初都假定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由某些原始的物质发展变化的结果，而一切事物又可以还原为这些原始的物质。例如在古代希腊，有的哲学家认为这原始物质是水（泰勒斯），有的认为是气（阿那克西

米尼），有的认为是火（赫拉克利特）。在印度和稍后的希腊（恩倍多克勒），认为是土、水、火、气四种元素。在中国，很早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就有把气和金、木、水、火、土等所谓“五行”作为原始物质的思想因素。这种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二千多年中间一直是中国人民用来综合和说明各种自然知识（特别是中国的医学、天文学等）的理论基础——虽然其中日益附加了许多牵强附会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并且有时也受到唯心主义的曲解。希腊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是德谟克利特所奠定以后又由伊壁鸠鲁所发展的原子论学说。他们设想一种在虚空中不断向下运动的、性质相同的细微原子（不可分的意思），把这看做最原始的物质。不同形状和不同重量的原子构成不同的事物。德谟克利特是代表主张民主制度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他的原子论综合了当时的科学成就，说明了许多自然现象，严重打击了当时传统的宗教观念。他的哲学世界观一直到十六七世纪以前，都被欧洲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所崇奉，但却受到了反对民主制度的贵族奴隶主阶级及代表他们的反动利益的像柏拉图之流的唯心主义者的强烈憎恨。古代西洋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最主要的表现是德谟克利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的斗争。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者是儒家的孟子，他主张“万物皆备于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他当时所坚决反对的“杨朱”、“墨翟”的学说，以及后来和孟子对立的荀子学派，都是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的。

古代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一）它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并且力图用物质本身的原因来说明世界的变化，否认宗教迷信中的神造世界的观点，否认唯心主义者把某些精神的东西（如孟子的“天命”、“诚”，柏拉图

的“理念”）看做世界创造力量的观点。在古代中国，唯物主义主要是和那种把“天命”当做一切事物的决定力量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在宋朝以后主要是和朱熹学派的认为“理”在“气”之先存在的唯心主义，或者王阳明学派的认为“理”在人的心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作斗争。（二）古代唯物主义者已初步估计到事物发展是依循着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如赫拉克利特说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的永恒的火”。老子的“道”这个概念中就具有着客观规律的意义，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东汉的王充把老子的这方面的思想发展成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三）古代的唯物主义是辩证法的，因为它承认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发展的观点常常陷于循环论的缺点。（四）它的辩证法的特点还在于它初步估计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估计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一切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对立势力（冷和热，阴和阳，正和反等）的相互作用和斗争。中国古代哲学把阴和阳看做宇宙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对立的力量，赫拉克利特明确地指出“斗争是万物之父”，等等。

古代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带有原始的素朴的性质。它产生在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还只是萌芽的时代。那时自然科学和哲学还混淆不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规律只在某些方面（天文、数学、物理等）有着比较初步的认识，还没有能够分门别类地对自然界做精密的系统的观察研究。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图画，只能依靠一般的直接观察进行粗略的臆测，而不能通过多方面的精密的科学知识，来做出准确的概括。因此，它的这个总的看法虽然在大体上是正确的，即在大体上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对于变化发展的具体内容

是什么，却不能提供准确的了解，而常常要依靠主观的臆测来给以说明。它在这一方面的解释是幼稚的，就现代的眼光看来有时甚至于是荒谬可笑的。恩格斯指出，古代人虽然把自然界“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但他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逐一地加以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乃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5—26 页）这就是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古代的这种唯物主义形式不能不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让于另一种形式。

在西洋，从古代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灭亡后就进入一个一千多年的长期的封建的中古时代。在中国，还在二千多年前周朝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向着封建社会过渡了（对于这个看法中国历史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到荀子学派，就形成了由地方割据形式的贵族领主制的社会向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转化（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一个大进步）的思想前提。帮助秦朝建立统一国家的主要人物就是荀子的学生。秦汉以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两千多年（中间有过几次的分裂），直到清朝末年为止。在欧洲的中古封建时代，基督教是当时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主要形式，哲学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附庸，被称为经院哲学。这时唯心主义始终居于统治地位，但唯物主义的思想并没有灭亡。在经院哲学里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思想斗争中，唯名论一派的思想就表现为近代唯物主义的先驱。实在论主张只有一般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而个别的事物只是容易消逝的幻影。唯名论坚持个别事物的客观真实性，认为概念只是人们用来概括个别事物的名词。在这一点上，它把客观存在的事物放在第一性的地位上，而把人的主观意识——概念看做第二性的东西。

中国的中古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主要是宗教化了的孔子学派

（儒家）的思想及其唯心主义的哲学，但在这个长时期内，唯物主义哲学也曾起来进行顽强的斗争，它是那些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横统治采取反对态度，并要求生产力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势力的世界观。汉朝的王充把老子学派的某些思想发展成系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当时的统治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唯心主义，反对“天命”、目的论和灵魂不灭的思想。后来的儒家学派中，在和佛教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念进行斗争的时候，也曾锻炼出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六朝时候的范缜肯定精神是物质的作用，北宋时的张载把“气”的聚散作为一切物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理，他们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者。明末清初的颜元和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肯定了认识是感觉与对象的一致，肯定了物质的永恒性和规律性，他们的思想是当时在中国已经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哲学上的反映。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封建时代生产力是规模极小的个体生产，它的发展很缓慢）和科学知识水平的限制，封建时代——至少它的前期和中期，没有产生离开哲学而完全独立的，以对自然界的分析解剖和精密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这使得中古封建时代的唯物主义基本上并没有超出古代的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形式。唯物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形式——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形式，作为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阶段的出现，是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即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有力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已经起来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时期，同时也是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形成为离开哲学而完全独立的，以对自然界的分析解剖和精密实验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的时期。据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二章）。

近代唯物主义的最初的祖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17 世纪下半期）获得全国胜利的英国，它的第一个代表人是 17 世纪初的培根，在 17 世纪中叶和末叶是霍布斯和洛克。培根的主要功绩是第一次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给予唯物主义的概括，肯定人类知识的真正来源是感觉经验。肯定物质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具有自己运动的能力。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进一步加以系统化，严格指明人的思想、概念仅仅是客观事物的一般的反映——“影子”。洛克是处在英国资产阶级开始获得统治权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具备着二元论的因素，他在认识论上把经验派的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但也表现了二元论的——向唯心主义让步的倾向。他肯定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源泉，但没有完全彻底地坚持感觉是外界事物的反映这个原理。他把人的感觉机械地分为第一性的感觉（如触觉）和第二性的感觉（如声色嗅味）两种，认为前者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后者则仅仅只是人的纯主观的表象，不含有客观的内容。这一点就是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的缺陷，这里包含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洛克的世界观反映了这个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的进步方面和它的向着反动方向发展以及对宗教观念、唯心主义表示妥协的倾向。

上面说的三个英国哲学家，开创了所谓经验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学派，他们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因为第一，他们用机械力学的观点来理解物质的本质，以为物质是具有着某些永远固定不变的基本特性（如质量，广延性，不可入性等）的实体。十七八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初步走向胜利的时期，它的主要成就还只限于力学（机械力学，水力学等）、数学、天文学的方面，一般来说，它还是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当时的唯物主义者，也就只能

主要地依据力学等方面的成就，来建立自己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所以，十七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观，始终都带有这种机械论的性质，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同时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第二，它不能真正理解物质的自己本身的变化发展，一般都把发展仅仅归结为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把发展的根源常常归结为外部力量的推动；第三，英国经验派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肯定感觉经验是认识的真正来源，这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这个思想有些片面化，不能理解理性认识的实在性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辩证运动。

英国的经验派哲学到18世纪就完全转到了唯心主义方面。18世纪初期出现的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不但根本不承认人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反映，相反地却把一切事物都看做是人的感觉的幻影。"存在就是被知觉"——这就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公式。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世界观，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反动腐朽的唯心主义的主要学派——奥国的、俄国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英国的逻辑实证论，美国的实用主义等等，都是以大同小异的各种变相形式继承了贝克莱思想的衣钵。

到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转到了法国，最初在英国产生，而后来又被取得胜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所抛弃了的近代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哲学，再由法国唯物主义者继承下来并获得了更高的发展。但是，在我们讲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前，还得先提一提17世纪欧洲大陆出现的唯物主义思想。

还在18世纪以前，除英国的经验派唯物主义之外，在欧洲大陆又出现了所谓理性派的或"唯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培根、霍布斯差不多同时，法国的笛卡儿第一个在大陆上使哲学

离开了经院的牢笼，创立了近代的哲学。他的哲学是把物质和精神看做两种平行的世界本质的二元论哲学。在认识论上，他认为要认识真理，不必一定要依靠感觉，只需要直接诉诸人们自己的理性，只要人们依据自己的理性觉得完全“清晰明了”的那种思想，就一定具有真理的性质。笛卡儿主张人们要凭自己的理性来寻找真理，这对于把基督教圣经当做真理标准的经院哲学来说，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但他——以及后来在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唯理论”的学派——在认识论上“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不了解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根源，不了解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在认识论方面的表现。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否认经验的实在性这一点来说是唯心主义的。笛卡儿第一次提出了物质永恒存在，即物质不灭的原理，这是他的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但他对于物质的看法，也是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他不能理解物质运动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他想用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解释高级物质运动。在他的著作中，把动物当做机械看待，这是表明他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思想的最显著的例子。

比笛卡儿稍后一些，还有荷兰(17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展的欧洲国家)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斯宾诺莎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就像凸面和凹面是同一曲线的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一样，他用这个比方来说明精神是物质的反映，肯定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他明确地指出自然界的变化是由于“自己原因”，并且依循着一定的必然规律。斯宾诺莎是17世纪欧洲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唯物主义著作中，有时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如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他的观点已接近了“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的辩证法思想，但

从总的方面说，他的唯物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在认识论上他仍然是属于“唯理论”派，和所有唯理论派的哲学一样，以为人的理性可以直接认识事物的真理，不必依赖感觉经验。在这一方面，又表现了它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性质。

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学派中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站在唯心主义方面的主要代表人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无数的，各自独立的，具有理性特征的精神“单子”的自我发展。莱布尼兹的关于“单子”思想和发展的思想虽然带有资本主义的、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思想因素，但他的唯心主义也反映了当时德国的落后——封建贵族和基督教势力的顽强统治。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在思想方面是英国经验派和欧洲大陆理性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集大成。它包括一整批的杰出的哲学家，其中有拉美特里、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他们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公开地提出了无神论的主张，反对灵魂不灭的迷信，向宗教世界观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思想斗争。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经验派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唯理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肯定感性的知觉是一切认识的来源，而感性知觉是由外界自然作用于我们的器官而引起的（爱尔维修、狄德罗）。狄德罗的观点已开始超出了经验派的狭隘性，初步理解到理性认识的实在性，他认为不仅感觉，而且复杂的推论、推理，都反映着自然现象的客观的实在的相互联系。

在对物质世界的理解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基本上保持着和 17 世纪英国的以及大陆上的唯物主义者同样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观点，并且有所发展。拉美特里的机械论观点比笛卡儿更进

一步，他写了一本《人是机器》的著作。他们公开主张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人的肉体结构决定人的精神生活（爱尔维修），他们主张物质和自然界的永恒存在，谁也不能加以创造和消灭，物质运动的原因是在物质自己本身，运动是物质所固有的运动。物质的运动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人和一切自然物一样，受着自然规律的支配（狄德罗、霍尔巴赫）。狄德罗的观点已具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他认识到自然界各现象之间的相互的联系，认为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初步考虑到了生物进化的问题及物种变化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狄德罗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中的最杰出代表，他对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所进行的尖锐批判，得到列宁很高的评价。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 1789—1793 年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各国革命中间最彻底、最深刻、震动最大的一次，它根本消灭了法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使法国变成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法国唯物主义的高度战斗性，反映了这次大革命前夜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法国革命胜利以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就转到了德国。随着法国唯物主义之后出现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就是 1848 年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夜的思想准备。

德国的革命思想因素不在唯物主义形式下面，而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面准备起来，这是和德国的特殊条件密切联系着的。第一，这反映着德国经济落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封建势力的相对的巩固，使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勇气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对封建统治者举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并把国家政权完全夺取在自己手里。德国资产阶级是趋向于向封建贵族妥协，并希望通过君主贵族的统治来间接地实现自己

的有限的要求。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他们幻想政治自由，但是不敢企图在现实社会关系上实现彻底的政治变革。第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法国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法国大革命掀起了劳动人民的无比强烈的斗争风暴，把德国资产阶级吓呆了，他们害怕劳动人民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因此宁可投靠宗教信仰和唯心主义，以便在思想上找到一些防卫自己的力量。就由于这些原因，德国古典哲学就发展了唯心主义，并且对法国唯物主义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是以二元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曾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他承认物质世界即所谓“物自体”的永恒存在，并且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觉是“物自体”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是唯物主义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觉的内容，仅仅是我们的感官本身所形成的一些主观的影像，它和“物自体”并不一致；因此“物自体”或物质本身是不能被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只是我们主观领域之内的感觉表象。这样一来，康德又走到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去了。康德一方面认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来源，而知觉是我们的感官接触到“物自体”而产生的。在这一点上他本来也可以趋向于唯物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感性知觉只是一堆混乱的主观表象，它本身没有任何秩序，要从这些混乱的感觉世界中找出秩序，只有依靠人们天然生就的一种理智能力，这种理智能力包含着许多不依赖任何经验而先天存在的主观“范畴”（如质量、时间、空间、因果性等），人们把这些“范畴”运用到自己的感性知觉中，就使这感觉

世界获得一定的严整的秩序。这样一来，康德又走到完全唯心主义的方面去了。照他的看法，人的理性认识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反映，相反地，我们周围的一切实际事物的秩序和规律性，反而是理性作用于感觉表象的结果。不是客观事物产生我们的主观认识，反而是我们的主观认识能力产生我们所认识的客观事物。他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在这一点上康德就陷入了极端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里去了。

康德的继承者费希特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元论的矛盾，根本抛弃了他的"物自体"的思想，走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的极端：整个世界就是"我"的"实践"活动，"我"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地为自己造出"非我"的表象，成为与"我"相对立的方面，一切实践活动就是为着克服这个"我"和"非我"的矛盾。康德的另一个继承者谢林，用客观唯心论的观点来否定二元论，认为整个世界——自然界的本质就是精神，这同一个精神到处表现着互相对立的两极性的特点，如磁石的南北极，电的阴阳性，我和非我等等。这样费希特和谢林就在唯心主义体系的神秘形式下初步展开了辩证法思想，接触到对立统一法则，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因素就在它的辩证法方面。黑格尔是它的最后一个最大的代表者。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把所谓"世界精神"赋予以理性的特征，同时又认为理性的本质是辩证法的。他给我们描画了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图景：不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反映到人的头脑里而成为人的理性知识，相反的，整个世界倒反而是理性的辩证运动的表现：世界最初只存在着一种"纯粹理性"，这种纯粹理性依照辩证法的逻辑程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方面，也就是"外化"为自然界，这是

世界理性自己的否定。自然界的盲目状态和理性的本质是对立的，所以世界理性的发展还需要使自然界再被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样就有人类的历史。人类在自己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克服了盲目的自然状态，在自己的思想中认识到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人类的思想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理性的自我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相信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就是世界精神的这个自我意识过程达到完成的阶段的表现，而能够产生这样的哲学的国家——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国家，也应该是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的完成相适应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就这样，黑格尔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里直接引出了反动的向贵族统治阶级妥协的政治结论。

但是，在唯心主义体系下面，黑格尔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自觉地企图系统地阐述辩证法。他把辩证法提到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地位上，对形而上学举起了鲜明的战斗的旗帜。按照辩证法原理，世界是一个普遍的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任何事物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存在。事物由于内在矛盾而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人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里就包含着这些辩证法的合理的核心。黑格尔在他的哲学里企图系统地阐述辩证法的思想，这是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巨大功绩。这些辩证法的思想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所引出的反动的结论，是显然矛盾的。根据上述辩证法的原理来看，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认识是永远变更发展的过程，不可能设想有一个尽头，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就是革命的，它与任何保守的观点都不能相容。然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做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最保守的结论：历史发展的最高点是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人类认识的顶点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是在唯心主义的体系之

内被窒息了的。这说明辩证法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完全的正确的表现。

德国古典哲学否定了十七、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期，为唯物主义发展的新时期——辩证唯物主义时期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时期是产生在19世纪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这时自然科学已不仅只是在机械力学方面获得成就，在化学生物学方面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恩格斯指出的三大发现——能量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等——使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规律可以从科学上找到多方面的确凿的证明。自然科学已不再是搜集材料，分类排列的科学，而是整理材料，把握自然界的运动联系的科学了。综合这些科学的成果，人们可以看到，辩证法的规律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纯粹理性的运动，而是物质自然界自己本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只要我们依赖各部门的自然科学成就加以综合和概括，找出其中最普遍的东西，就可以得到辩证法的规律。自然科学的发展说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必须受到批判，辩证法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正确的、科学的形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条件在科学发展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它在哲学史上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但是，仅仅只有自然科学的发展，还不能决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能够完全形成。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的高度发展的成果，而且它本身是一种彻底革命的世界观，它不仅是与一切唯心主义和宗教观念不能相容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它又是与一切形而上学的留恋旧事物的保守思想或反动思想根本不能相容的辩证法的世界观。要完全掌握这个世界观，必须有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立场。这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是说，只有当无产阶级作为政治上的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

台上的时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完全形成的决定条件。19世纪以后，一些国家的进步思想的发展情形，可以作为证明。

首先可以举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情形来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赫尔岑起，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在黑格尔以后出现的杰出的革命思想家，他们都曾以批判的态度从黑格尔哲学中采取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接近了辩证唯物主义。赫尔岑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代数学，并且坚持思想是从自然界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康德、黑格尔、贝克莱、休谟以至于实证论和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哲学做了深刻的批判。但是，由于19世纪旧俄国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封建农奴制的国家，由于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斗争只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他们的世界观就受到这个历史的、阶级的限制。所以，他们虽然从黑格尔那里取得了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并且也曾力图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改造黑格尔辩证法，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却不能进一步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他们就停止了脚步。因此他们就没有能掌握完全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的哲学世界观只是向后者发展的过渡形式。

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情形，也可作为说明。

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特别长的。17世纪初开始的清朝统治，延缓了已经具有萌芽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的侵入，又使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这样中国的中古时代就一直延长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七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中国是迟至这时才开始到来。由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1898年）到辛亥革命（1911

年）中间，产生了许多代表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的先进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等。这些思想家的世界观中都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们在说明世界的时候，极力概括了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的各种科学知识。这时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已介绍到中国来了，特别是进化论的思想，由于严复的翻译，在中国知识界中很长时候都有着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些科学知识的介绍，并没有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间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即使只是一些因素），并没有完全超出古代素朴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如康有为、谭嗣同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孙中山）的阶段。例如：孙中山的世界观，明确承认世界发展是由物质开始，物质是“体”，精神是“用”，承认人的认识必须随事物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时也肯定认识是来源于实践（行），但他的发展观始终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不知道作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的矛盾规律，不了解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因此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终究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特点特别表现在他对于生物的理解方面。他把生物的细胞叫做“生元”，认为“生元”是具有“知觉灵明”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细胞已具有着复杂的高级生物有机体的那种“知觉灵明”的特性，后者和前者似乎没有本质的差异。他的社会观点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说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互助”这个道德原则上的，说“心为万事之源”，说人类中有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区别等等。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最革命的代表者，由于阶级的限制，他虽然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科学昌明”时代，也没有能够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并且在俄

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才开始为中国的先进人物所认识的。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它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产生出来的。它比过去任何一种唯物主义哲学都更为彻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它贯彻到人们所考察的知识领域的一切方面，首先是把它贯彻到社会历史研究方面，第一次创立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据政治经济学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而出现，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现不是由于人的主观空想，而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具备着使它必然要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这就是大机器工业和无产阶级。由于发现了这些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客观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就使社会主义思想由先进人物的空想变为科学学说，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知识有步骤地争取它的实现。所以，全部马克思主义包括着三个组成部分：(一) 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 政治经济学；(三) 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

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它提供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观察一切问题的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诞生在19世纪上半期，它的故乡是德国。德国在当时，经济上比英、法等国都落后，为什么竟能够成为这种最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故乡呢？这是因为，当时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已获得了政权，它们都退出革命的政治舞台，只有德国成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为什么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而只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才会产生呢？这是因为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都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还没有发展起大的机器工业，因此，那时也还没有出现高度集中的和有组织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不能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它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是作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势力而行动的。但在19世纪初期，情形就有了根本变化，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工业在各国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也就随着成长起来。从19世纪30年代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在政治上表现了独立的行动，其中主要的有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里昂暴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的罢工运动等等。恩格斯说："自一八三〇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指英国和法国——艾注），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都被认为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关系已经如此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看不见，这三个巨大阶级（指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艾注）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才是整个近代史的……动力"（《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57—58页）。所以，在当时，德国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起以前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

产生的。19世纪中叶的德国，虽然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比起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关系上是更为成熟的国家。在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德国革命的实际斗争迫切要求无产阶级解决有关自己的历史作用的一系列的理论的和斗争策略的问题。这些历史条件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的故乡是在德国，而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地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自发地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形成，固然首先是由于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作为一套完整的科学，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必须综合以前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成就并加以发展之后，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学术上都有着它的继承的来源，这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些思想来源都经过详细的批判，把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发展，这样来创立自己的完整的科学。就世界观方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对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批判改造的结果。

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发展的黑格尔哲学，包含着唯心主义的体系和辩证法的方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着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重性：一方面有着进步和革命的趋向，另一方面，又有着向封建贵族势力妥协的趋向。黑格尔死后，德国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起来，这在社会思想上的反映，就是黑格尔学派的瓦解。它分为老年黑格

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前者继续坚持着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的方面，后者着重利用了它的辩证法的因素，对德国的封建社会关系展开了思想批判。这种批判最初是集中在宗教方面的。在宗教批判的斗争中，青年黑格尔派的最激进的分子逐渐走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道路上来，最后就出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著作，公开宣布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进步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费尔巴哈的思想立场，还没有克服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个人没有认真注意、也没有机会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由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当时德国的反动社会势力不能相容，他被迫到乡间去过隐居的生活。这使得他既不能理解 1848 年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也没有注意到当时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因此他的唯物主义基本上仍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时候，连带后者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他并没有使唯物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也是属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但他们的活动不是像青年黑格尔学派中的其他人那样，仅仅局限于宗教思想批判方面，而是更进一步地对普鲁士君主专制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斗争。例如马克思刚离开大学，就担任《新莱茵报》的主编，写了许多政治法律批判文章，参加了当时进步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的体验使马克思恩格斯终于离开了一般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资产阶级立场，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个新生的最先进的革命力量，并为无产阶级创造了革命的思想武器，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它的革命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把握了它们中间的有价值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加以改造和利用。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照原来的样子凑合起来，而是依据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经验，依据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利用和改造了那些合理部分，独立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使唯物主义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过去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彻底性，把唯物主义贯彻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成为系统完整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产生，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仅仅在发展程度上比过去一切哲学更高，而且在性质上和过去的哲学有根本的不同。这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并自觉地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武器。过去的哲学，总是把自己解释做“超阶级”的东西，而在实际上却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是为这个阶级服务的。过去的哲学之所以要掩盖自己的阶级面目，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些哲学，除了个别的例外，都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在一切言论行动上掩盖自己的阶级面目，是剥削阶级利益所需要的。同时，过去一切哲学都是在少数人的范围内钻研的，从形式上看，好像只是一些追求“纯粹”真理的学者们所从事的专门学问，和社会各阶级的利害斗争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一切哲学是脱离广大人民的，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总是在人民面前保持

着一种高深莫测的面貌。这种表面现象一直到现在对于我们还有着很深的影响，使我们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工农群众觉得好像哲学是一种神秘的、非常难于理解的学问，好像连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不是他们自己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当然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广大人民为着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目的服务的哲学，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不需要掩盖自己的这个伟大的目的，因此也不需要掩盖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阶级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要公开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人民性，而且要努力使它逐渐普及到工人阶级和人民中去，成为工人农民自己直接掌握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是能够领会而且必须领会的，是它们的战斗的思想武器。广泛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作干部，逐步地普遍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逐步地学会应用这些观点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提高我们的各方面的工作质量和保证更加迅速地实现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重要条件。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它以前的任何一种哲学不同的地方，除了革命阶级性人民性之外，还在于它是为我们改造世界的目的服务的一种科学研究工具。过去的哲学只是用种种方法说明世界。每一种哲学，都企图使自己成为说明世界一切事物的包罗万象的绝对体系。它们产生在科学比较不发展的时期，那时许多科学上的发现还未出现，自然界的许多方面（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客观联系和规律性还没有被自然科学所认识。那时哲学就

把自己看做“科学之上的科学”，它依靠了哲学家的主观的构想，来填补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的许多方面的联系和规律性的知识，这样来构成一套说明世界的包罗万象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把主要的力量用在这种包罗万象的体系的构成方面。由于他们对于世界的许多方面的说明，都不能够依靠科学的成就，所以就在很大成分上带有主观随意的性质，每个哲学家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凭着自己的许多主观的猜想，来建立自己的体系。如果说当时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对世界的看法，还能尽量概括当前有限的科学的成就，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还给予了基本上正确的回答，那么，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回答就是根本错误的，对于世界所做的说明就完全是颠倒了的。不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主要考虑到的只是如何从逻辑上来构成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说明世界的思想体系，而并不认真考虑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来检验这个体系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哲学不同，它不仅仅要说明世界，而且把主要的任务放在变革世界方面，也就是要把哲学世界观作为变革世界的科学工具，并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中来加以考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特性，是由于它不妄自把自己当做“科学之上的科学”，不用主观的构想来代替应该由科学研究去加以揭示的各种事物的客观联系和规律性的知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自然科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自然界的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规律性已被科学所认识。因此就对哲学提供这样的可能条件：不必像过去的哲学那样，一定要由哲学家应用自己的主观的构想，把科学所不曾认识到的许多部门

的事物联系人工地填补起来，来组织成一个仅仅说明世界的体系。科学的发展已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只要把现有的科学成就加以概括，从已经揭发的事物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规律性的知识中找出它们中间的最普遍的东西，找出它们的普遍的规律，就可以把握到正确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在科学发展的这个高度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全部科学知识的成就中总结出来的，与过去一切哲学都不同的完全新型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所谓“科学之上的科学”，它否定那些单凭主观的幻想联系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门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物质本质，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性的科学。旧哲学只是说明世界，并且不能完全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说明世界。其中旧唯物主义虽然在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上是正确的，虽然力图依据科学成就来了解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但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至于唯心主义哲学，就根本歪曲了、颠倒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只有严格地以各种科学成就作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彻底排除了说明世界的一切主观的幻想的联系，才把握到世界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才对于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给予我们一个完全正确的根本的了解。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把握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它就不仅仅能够说明世界，而且能够成为我们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工具，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工具的作用表现在哪里？主要在于它可以成为正确的科学方法论。它本身既然是总结一切科学成就所获得的关于世界一切事物的物质本质和最普遍的客观规律知识，因此它就可以替一切科学的研究方法规定出一个总的正确方向。

如果我们领会了辩证唯物主义，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善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就能够保证我们对问题的观察和解决在基本方向上不至于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获得胜利，就是由于先进人物学会了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为着要掌握这个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就是要领会其中所阐明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物质本质，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来作为我们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向导，使我们有可能保证在各种工作中都能获得胜利。例如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指明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这个原则，在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就必须贯彻这个原则。而贯彻的方法，就是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尽最大力量努力使我们的主观的思想意识能够确切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发展情况，避免主观的认识和客观存在的事物不一致。当我们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原理当做自己认识问题的总的方法，当做自己解决问题的总的向导，就有可能避免主观主义，避免重大的错误。

再说一遍，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为着要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并把它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运用它来指导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帮助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观察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在这个目的之下，我们的总的要求，就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使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能够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能够正确地全面地反映客观

事物的发展过程，使我们在进行研究和做实际工作的时候，保证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的实际发展情况能够求得一致。学习唯物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学会在观察事物的时候避免认识上的主观性，力求认识和客观的一致。而要避免认识的主观性，使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的实际发展情况求得一致，就必须努力做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事物，就必须力求避免观察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认识如果有了片面性、表面性，也就免不了要发生主观性的毛病。学习辩证法的目的，正是要学会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使我们能够全面地深刻地观察周围事物的发展过程，从而也就能够克服主观性的毛病。所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分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把握正确认识的基本原理，即主观和客观一致这个反映论原理，辩证法提供我们贯彻这个原理的正确方法，即全面地和深刻地分析事物、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又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矛盾论》）。观察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是分不开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辩证法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确的完全的表现，唯物主义也只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贯彻。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到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这个不可分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变革世界，而不是像旧哲学那样仅仅要说明世界。依据这个原理，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就必须注意使所学到的哲学观点成为我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行动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要力求在学习过程中使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避免教条主义的、理论脱离实

际的错误的学习方法。

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把理论原理看做一个现成的死的公式，随便拉一些实际例子来证明这个公式。这个方法对不对呢？如果在学习某些理论原理的时候能选择适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对于我们的理论上的了解，自然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这个方法在学习的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应用的，但如果认为这样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主要的学习方法，那就错误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主要的是要做到能够应用所学的理论原理，来分析我们周围存在的实际事物，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包括革命问题、生产问题、思想斗争的问题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有的放矢”的方法，把所学到的理论原理作为“矢”，应用它去射中实际问题的“的”。这就不是简单地用例子来证明原理，而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作为认识方法去分析实际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应用这样的方法，就必须对所要分析的实际事物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收集充分的有关材料，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丰富的材料中去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并依据这样揭露出来的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的知识来决定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学习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方法。不应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就会使理论成为抽象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我们的理论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行动的指南，要学会掌握武器，必须经常加以使用，把武器挂在墙上天天加以欣赏，而不把它拿下来使用，永远也不可能学会掌握武器。不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学辩证唯物主义，不把它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就不可能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就不可能使它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南，也不能使我们理解它为什么是行动的指南。例

如我们学习了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我们的方法就不应该是仅仅引用一些实例来证明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这个原理，而是应该应用这个原理来分析我们思想中的矛盾问题或实际工作中的矛盾问题。或者应用它来研究我们的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如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了我们的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各方面的事物矛盾。我们党的政策、决议是严格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一切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的结果，研究党的政策决议是如何应用矛盾规律来解决各方面的工作问题，对于我们的辩证法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只有依循着这样一些方法来学习，才能使我们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是我们的思想和工作的指南，才使我们有可能学会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武器。

学习理论和联系实际不能机械地分为两个绝对隔离的阶段。必须领会理论，才有可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在学理论的时候，根本不要联系任何实际问题，而只能在把全部理论完全学好了以后再来联系。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学理论的时候，主要的任务自然是要深思熟虑，力求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但如果完全不联系实际，就不可能进行有内容的真正的深思熟虑，也就不可能真正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所以，在一开始学习理论的时候，就应该适当地进行初步的联系。经验证明，学习哲学，凡是学得较好的，在学习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把自己学到的哲学原理用来分析和解决生产中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是，既了解了原理，又推动了生产和改进了工作。自然，正如初学使用武器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使用得很熟练一样，在初学哲学的时候，是不可能联系得很好的，是可能有片面性的毛病的，特别是要想一开始就能很好

地解决思想中工作中生产中的较复杂的具体问题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不妨采取边学习边联系，逐步深入逐步提高的办法，因为联系实际的方法的掌握，和一切其他事情一样，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训练才能搞好的。

“实际”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包括个人的思想和工作经验，包括党的政策路线、党的历史经验以及国内和国际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但在我们学习过程中，首先应该联系自己所经历的工作和思想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自己亲身的体验，应用我们所学到的理论原理首先来解决这些问题，最便于使我们亲切地领会理论的内容实质，最便于锻炼自己应用哲学武器的能力，使哲学理论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所谓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就是要在所学到的理论原理指导下来把自己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工作中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把自己思想中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方面，加以全面的分析，从哲学上，也就是从我们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寻求成功和失败的根源，来检查正确和错误的思想上的根本原因。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就能够从我们的工作经验和思想中做出最高的总结，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提到世界观的高度，使我们从思想方法上找到避免失败和错误、保证胜利和正确的最根本的关键。

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区别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即物质（客观、存在）和精神（主观、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也是检查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上的正确与错误的最根本的问题。工作上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要做具体分析。但从思想上来检查，归根结底是由于主观的认识和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未能求得一致，或者简单地说，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分裂。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主观主义，

克服这个唯心主义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要判断我们学习哲学是否学得很好，是否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就要看是否能够在一定实际问题上真正克服了主观主义，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主观主义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别。反对主观主义，应该着重在反对教条主义方面，还是经验主义方面？这就要看具体情形来决定。凡是曾经做过长时期的实际工作，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但缺乏读书和钻研理论的机会的老干部，他们中间的主观主义主要地就会是经验主义性质的，对于他们来说，就要着重反对经验主义，同时要附带地防备在学习过程中陷于教条主义。凡是工作经验很少，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曾读过许多书籍的人，他们中间的主观主义总常常是教条主义性质的，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哲学的主要目的就应该是克服教条主义。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时候区别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很重要的。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在方式上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于有经验主义毛病的人，主要的方式是要他们认真读书，掌握理论原理，并引导他们利用理论原理来总结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出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有条理性和综合性的知识。对于有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就要教他们首先注意研究人民的实际生活，研究实际材料，学习做实际工作，学习从事劳动生产，体验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力求避免离开实际生活单纯从事书本上的原理的抽象研究。学习哲学的时候，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从不同的方面来反对主观主义。

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用以教育全党，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纠正党员干部的错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根本方法——整风方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应用了这个方法，就能保证党内工作顺利发展，保证党在革命斗争

中避免重大错误，使党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最少的牺牲获得最大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反对主观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辉煌的明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同志曾总结了党在这一方面的历史经验。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党在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曾经犯过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后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下，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个历史的变化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刘少奇同志回答说："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在这以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全党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认真地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在工作中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说明党的广大干部如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掌握了理论和实际联系、人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如果广大干部都认识到主观主义的危害性，都学会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会起着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历史经验说明整风的方法需要继续加以贯彻和发展，说明我们需要应用整风运动的基本经验，不断地在党员、干部、知识界中和工人农民中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教育，推广理论联系实际、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教育，反对主观主义的教育，使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改造世界的哲学思想，日益普及到更广泛的人民中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日益成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所直接掌握的科学武器，这对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对今后的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章　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性

一、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和一切其他唯物主义一样，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世界具有物

质的性质。世界上存在着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现象，任何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表现形态。精神、意识现象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或意识现象，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如果要问：世界的统一性在哪里？首先我们就要回答：世界的统一性，就在它的物质性上，就在一切事物归根结底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表现这一点上。

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完全相反。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性，把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看做是某种精神的东西。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它把世界说成好像是仅仅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幻影。如说："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宇宙便是吾心"（陆象山），"天地万物皆在吾心中"（王阳明），"存在即被知觉"（贝克莱），"物质是感觉的复合"（马赫），"世界是我的观念，我的活动，我的经验"（杜威）。另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它把世界说成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世界精神"的表现。这里所谓"世界精神"，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名字，如"天命"、"天理"、"世界理性"、"意欲"、"生命力"等等。不管哪一种唯心主义，它对世界的看法，都是把世界的本来面目根本颠倒了。世界发展的本来秩序是先有物质，后在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精神现象。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而精神、意识，只是物质的反映。精神、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发展能给予一定的积极的影响，或者叫做能发挥一定的能动作用，例如人类能够利用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各种知识来改造世界，推动世界的发展。但在这里，首先还是需要人的认识正确反映世界，才能反过来改造世界。唯心主义却硬说是精神产生一切事物，精神力量是物质世界的创造主。这是把精神、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积极影响或能动作用这一方面孤立起来看待，把它绝对化了，抹煞

了它本身还是要以物质世界作为它的最后来源。精神、意识对于物质世界的作用，只是一种反作用，只是第二性的作用，而不是第一性的、最后根源的作用，而唯心主义正是把这种第二性的作用或反作用误认为第一性的、最后根源的作用。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作为思想方法来看时，它对于人们的认识就会起着这样的危害作用：（一）它把人的认识引到错误的路线上去：主观唯心主义既然断定世界是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幻影，因此就会在理论上肯定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人要怎样事情便会怎样。客观唯心主义既然把世界说成是某种“世界精神”的表现，因此它就会使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是决定于某种现成的、永远不变的、绝对的精神思想公式；只要抓着了这些公式，任何问题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了。总之，不论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都会从哲学的根本理论上把我们的认识引上主观主义的道路。（二）归根结底它要和神道主义、宗教迷信的观念——上帝创造世界或神灵支配世界的观念合流到一起，历史上大多数唯心主义哲学派别都公开地主张神的存在，灵魂的不灭，“天命”的存在，只有其中的少数在表面上表示自己与一般的宗教迷信有区别，而实际上它们仍是一种精巧的神道思想，因为精神产生世界一切事物的唯心主义观点，就是变相的上帝创造世界的神道观点，精神支配世界和神灵支配世界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错误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在人类变革世界的长期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和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日益有力的证明，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就会亲身体验到，世界上的事物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也不是决定于任何一种绝对不变的现成的思想公式，而是决定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因此，人们如果想要在社会实

践中得到成就，想要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和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中获得胜利，首先就应该认识清楚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应该了解有关的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并且善于在斗争中利用这些规律性。要想推动我们国家生产的发展，如果不研究当前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况和它的规律性，只凭我们的主观愿望或某些现成的公式来进行工作，那是一定要失败的。要想在农业上使粮食达到高产的目的，不认真研究和在耕作中利用“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规律，是不可能的。至于说到科学，那么，科学的任务本来就是要研究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规律性的，它在本质上和主观主义就完全不能相容。所以，只要依据人类的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依据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并加以哲学上的正确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就可以找到充分的根据来肯定：世界并不是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也不是某种“世界精神”的表现；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它是无始无终地永远存在着，它既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识或任何一种精神力量所创造出来的，也不能被这些力量所消灭，它依循着它自己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在发展着，它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世界的物质性的看法，和它以前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有所不同。它既不像古代唯物主义那样幼稚地把某种个别的具体物质形态（如水、火、气等等）作为一切千变万化的物质现象中的最根本的物质，也不像十七八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那样，片面地把某些机械力学方面的特殊的物质属性（质量、不可入性、广延性等）当做物质的永久不变的普遍本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在自然科学中间一直到20世纪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它的片面性使它不能说明自然科学上日益增多的

新发现，因此当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许多新发现（如电子的发现）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观念发生了矛盾时，这些自然科学家就陷于莫知所措的状态，结果有的人竟走到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做出了“物质消灭”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质真正会消灭了，而只是因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些物质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发生变化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曾批判了上述关于“物质消灭”的论点的错误，并指出自然科学家必须抛弃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对于自然科学上新发现的物质变化规律给予正确的理解，才能够避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物质的看法是这样的：物质具有无限的多样性。物质的形态、构造和属性，是千变万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把任何一种个别的物质的形态、或它的某些特殊的构造和属性当做最普遍的东西，并把它规定为物质概念的绝对不变的内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正确的物质概念只能有一个，即：物质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通过感觉、理性的形式反映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这就是物质的普遍的本质，一切物质都有这个共同的最根本的特点。世界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表现，所以，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但是，物质的形态、构造和属性又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世界的物质性的统一，又是多样性的统一。自然界的物质具有无限多样性，人类社会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世界是物质的多样性的统一这个观点，为我们指出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原理，即：当我们考察任何一种事物的时候，如果要想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要想使我们考察所得的认识符合于该事物的客观实际情况，那就必须用主要力量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该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具体特性，决不可

死死地抱定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一般公式来限制自己的思想。

二、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的根本属性

物质为什么会有无限多样的性质?物质的无限多样的性质,不是偶然出现的,这是由于物质自己本身不断运动、变化的结果。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的根本属性，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辩证唯物主义指明一切物质运动的根本原因都在物质本身的内部，而不在物质之外。因此，运动是物质自己的运动。在物质自己运动的过程中,物质的形态、构造、属性等等方面发生实质上的种种变化,这就产生了物质运动形态的多样性。所以，物质的多样的性质，就是它本身的运动形态的多样性的表现，就是物质的各种运动形态的互相转化的表现。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物质和运动的关系的基本看法。

唯心主义的观点否认运动是物质的属性，把运动设想为存在于物质之外的，某种精神力量的活动。中国的宋明理学中的程朱陆王学派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说成是“理”或“心”的“变化流行”的表现，黑格尔认为世界的发展在本质上只是所谓“绝对精神”的活动。而如果按照贝克莱之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那么，世界的一切事物变化好像只是存在于人的主观的感觉幻想之中，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叫做“人生如梦”。所有唯心主义者都否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着的世界的本质，因此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变化,好像竟是一种无物质的运动。这样的观点,不论唯心主义用多少精巧的遁辞来加以辩护，总不能掩盖它的荒谬的性质。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和科学的全部成就加以认真的检验和正确地给予哲学的总结,就更容易证明它的错误。人类的实践——生产和阶级斗争使我们亲切地体验到自然界和社会

自己本身的物质的运动，体验到这些运动都依循着事物自己所固有的客观规律，而不是来源于物质以外任何神秘的精神力量。原子能的解放产生巨大无比的热能发电等等，这是由于铀原子核受到中子的冲击而发生裂变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或者是由于重氢超重氢的原子核在几十亿度高温条件下发生聚变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原子里面有什么“世界理性”在起作用。封建社会的矛盾发展必然要发生民主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自己本身的运动规律的表现，并不是任何人的主观幻想所造成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正是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科学的全部成就告诉我们应该从每一种事物自己本身内部去找它的运动发展的根源，而不必求助于物质之外的神秘的精神力量；因为在实际上，任何与物质脱离的独立的精神力量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

辩证唯物主义明确地肯定一切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指出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思议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其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实质上就等于设想神话变成了事实：某个神仙只要心里一动，口中念念有词，就可以凭空地引起飞沙走石；或者设想只要闭着眼睛空想一阵或单凭嘴上空谈一阵，而用不着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就会使社会发生变革一样。

不但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运动的物质也是不能设想的。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就要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那种错误看法，即认为物质在本质上是永远不变的东西。这种看法的实质就是不承认运动是物质自己本身的属性。如果形而上学者也承认物质世界有运动的话，那么他们只承认一种运动形态，即只承认位置的移动和数量的增减（即机械的运动形态），而不承认在运动过程中物质自己本身会发生任何实质的变化，不承认物质

运动的多样性和各种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把物质的运动简单地看做走马灯式的机械的循环运动。因此，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世界在根本上说来是不会有什么变化发展的，物质在本质上是没有运动的物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这种看法的错误就在于：（一）它不能说明世界物质的多样性从何而来，并且索性就否认了物质的多样性，把一切复杂的物质形态都归结为某些简单的（如像机械力学的）属性的表现，结果就不能不把物质的许多复杂的、比机械力学的属性更高级的属性，看做仅仅是表面现象，甚至于看做是人的主观感觉的产物，而否认了它们的客观存在的性质。（二）由于不承认运动是物质自己本身的属性，因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就不能从物质自己本身内部去找事物运动的根源，而把事物运动的根源看做是从物质之外来的。归根结底，就终于不能不把事物运动的最后原因归结到上帝、神灵、精神或人的主观意识等等方面上。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以上两个弱点，使它把某些重要的阵地无形中让给了唯心主义，使它不能彻底地在一切问题上贯彻唯物主义。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一切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都在这个领域里完全陷入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性和物质运动形态的多样性，现代自然科学的每一个新的发现——从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细胞学、能量转化定律和进化论等三大发现直到20世纪的原子物理学的发现，都证明了自然界的运动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互相转化的事实，而这种多样性及其互相转化正是物质自己运动的表现。近代社会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历史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地显示：社会本身的物质生活的发展使社会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级形态。所以在物质的运动这个概念中，应包括物质自己本身的实质的变化，包括各种物质运动形态的变化，特别是由低级

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不能把物质的运动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位置移动和数量的增减。形而上学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理解为走马灯式的机械的循环运动，这是片面的、错误的。物质运动的多种多样的形态及其互相转化的事实是客观的实在的；物质的多种多样的属性决不能看做是人的主观认识方面的幻觉。

机械运动只是一种低级的基本的物质运动形式。在机械运动之上，如果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排列起来，那就还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等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每种基本的运动形式中包含许多更具体的运动形式。各种科学就是以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的不同部门的分类，就是按照它所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来做规定。每一部门的科学任务，就是要具体地考察它所要研究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和不同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揭露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世界上只存在着各种各样具体的物质运动形态，没有“物质一般”或“运动一般”。物质和运动的一般性质只是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质运动形态的共同点的抽象的概括。不对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做具体分析研究，就不可能对事物获得科学的认识，就要在认识上犯错误。所以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客观存在的具体的事物中，各种物质运动形态常常是互相交错地存在着，特别是在高级的运动形态里，必然包含着低级的运动形态。所以高级的东西总是比低级的东西更为复杂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高级的东西的存在，虽然要以包含某些低级形态作为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高级的物质运动形态有它自己所特有的本质和规律性，决不可用低级的运动形态简单地来概括高级的运动形态。简单地用低级运动形态的规律来说明高级运动形态，而否认或忽视了高级运动形态自己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存在，这

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般的错误观点。十七、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企图用机械力学的规律来说明动物和人类的有机体，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简单地当做一般的生物现象来研究，有些心理学者把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简单地归结为大脑组织的生理活动的规律，忽视了社会实践、阶级斗争对于人的心理活动的重大影响。有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企图简单地用人口增长条件或地理条件（即自然环境条件）来说明社会的变化发展，都是形而上学的。在研究任何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的时候，虽然必须注意到其他运动形态对于它的影响和联系，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抓着这种运动形态本身的特点。

三、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物质的运动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中，所以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不能设想有离开时间空间而运动的物质，也不能设想和物质的运动无关的时间和空间。时间就是物质发展过程的前后连续性，空间就是物质本身的伸张性。时间空间和物质是不可分的，因此也和物质同样是客观实在的。

唯心主义不承认时间空间是客观实在的物质存在形式，而把它们看做是人的认识主观的产物。（一）康德主义者把时间空间看做人类的感性认识中的直观形式。（二）黑格尔把时间空间看做是绝对理性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且否认自然界中有时间性的发展。（三）马赫主义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协调了的体系”。这些唯心主义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都把时间空间看做是人的意识从外部附加到事物上面的主观形式，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唯心主义的这些观点和它的否认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也是同样荒谬的。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也是不正确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存在，但它不能理解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性，以为世界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另外还有着一个与物质脱离的时间空间的空框子，而物质是被安放在这个空框子中的东西。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实际上只是纯抽象的主观的假想，并不是客观世界里实际存在着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在客观世界里，除了与运动着的物质联系着而作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三章第五节）不论从各方面的实际生活中以及科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要把握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离开了运动着的物质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设想一种事物的运动不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时间空间中的运动，也是不可能的。

时间空间和物质的不可分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1) 时间和空间的计量，必须依赖一定的具体的物质运动的属性作为计量的尺度，否则计量便不可能；例如计量年月日是依赖地球自转和公转的速度，计算宇宙的空间依赖光速一年的长度作为单位；(2) 空间的三度性，就是物质伸张的三度性；时间的一去不能复返，只能用物质发展过程不会倒退这一点来说明；(3) 时间空间的无限性只是物质的无限性的一种表现形式；(4)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握任何一件具体事物的发展的时间性（即它的发展速度）和它的空间性（即它的发展规模），必须依据这一事物本身的发展内容和它所联系的具体条件来确定，而不能由人的主观意志来任意确定。例如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速度和规模，就是曾经出乎我们许多工作干部的主观意料之外

的。毛主席党中央之所以能正确地掌握了这项工作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并且能够对运动给予正确的指导，这是由于依靠了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认真研究了这些运动的具体内容和条件，并依靠这样的研究，批判了不正确的保守主义的主观看法的结果。这一件事情，就足以证明时间空间是和物质运动本身分不开的，是物质自己的存在形式。它决不是从人的主观意识里产生的东西，也不是物质之外的空框子。总之，事物的现实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它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决定于该事物的性质、内容和它所联系的具体条件。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的思想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能够依据事物发展的具体内容来掌握它本身所固有的具体的空间形式，特别是时间形式，而是主观地把它们的空间规模估计得过大或过小，把它们的时间速度估计得过早或过迟的缘故。

四、物质的运动有它自己本身的规律性

人类的社会实践和一切科学的成就证明：物质不只是和运动不可分，而且物质的运动是依循着它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客观规律性的。当我们说到物质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也包括在自己的理解之内的。这就是说，物质之所以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其理由之一，就在于它的运动、发展不是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只是依循它自己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物质的运动规律，是和物质本身一样，不能为任何人所创造，也不能被任意地消灭。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依赖的具体条件，规律性只能随着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周围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由人的主观意志任

意加以改变。

唯心主义对于事物规律性的看法是完全颠倒的。唯心主义不承认客观事物有它自己本身的规律性，硬说规律性是“上帝”、“天命”或什么“世界精神”、“无穷的意欲”之类的神秘力量赋予自然界和社会的。主观唯心主义如实用主义之类，索性否认了事物的规律性，认为世界是由盲目的偶然性所支配，把科学规律硬说成仅仅是人们为着暂时的主观的利益而做出的有用的假设。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虽然承认规律性的概念，但把规律看做是人的理性能力的主观的产物，否认规律性为客观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康德主义把我们周围的现象世界看成是毫无秩序的一团混乱的东西，认为仅仅由于人的理性能力的作用，才使这混乱的现象获得一定的秩序，因此他们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这一切唯心主义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颠倒的。一切科学研究的成果都能证明，事物的规律性完全可以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周围的客观条件得到说明，规律在实际上就是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辩证的相互联系，只要我们能够具体地分析每一事物的具体的性质、内容以及它的各种条件，就可以准确地把握到这一事物的具体的规律性。事物的规律性决不是什么莫须有的“上帝”、“天命”或“世界理性”之类的神秘力量所赋予的。它既然是各种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所以决不是人们的暂时的有用的假设，也不是由人的理性能力主观地引申出来的东西。相反地，人们关于事物规律性的知识，只是客观事物规律性在人们的理性头脑中的反映。为着要正确地去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为着要避免主观主义，我们就必须要具体地去分析所要认识的事物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依赖的周围条件，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如实地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就要用一切力量避免轻率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或自己

的“理性”里“假设”出或引导出一些主观的臆测，来代替真正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

辩证唯物主义也要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于规律性的错误看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的观点，肯定事物的规律性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正确的，但它常常把某种低级的物质运动规律性知识当做解释一切事物的普遍公式——例如机械唯物主义把机械力学的规律简单地用来说明动物和人类的有机体的构造，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特别不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们中间有些人曾企图简单地用自然界的规律来说明人类社会生活，例如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人口论”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不知道社会这一种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态具有着它自己固有的特殊规律性。由于他们不能把握到社会历史发展本身所固有的特殊规律，因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解释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能认识到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因此就不能贯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原则，不能不在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时采取各种主观臆造的根据，并因此终归陷入到唯心主义的圈子里去。

第五章　物质和意识

一、物质是意识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质，自然也就要肯定物质对于意识居于根源的地位。既然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那么意

识、精神就只能是物质本质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就只能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问题，就做出了它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所应有的回答：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上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意识只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高级物质即人脑的一种属性，一种反映作用。这个原理，在今天来说，是已经得到科学的充分证明的了。

唯心主义者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客观唯心主义者凭着自己主观的臆断，硬说宇宙中先有某种纯粹精神的本体，然后由这种精神的本体产生出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它把人们的主观意识现象看做是这种宇宙精神的"自我意识"，不承认它是人们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作用。唯心主义的这些观点，和宗教里面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观点，以及人的知识是来源于神的启示等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唯心主义是采取了更精巧的诡辩形式罢了。主观唯心主义者——如马赫主义者，更是荒谬到了极点：他们干脆否认了周围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它不过是人的"感觉的复合"。他们中间有的人竟公开地做出反科学的极端结论，硬说在没有人类以前，自然界并不曾独立存在过。仅仅在人们"设想"自己是当时自然界的目击者时，它才有存在的意义。唯心主义的这些观点在实践上就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它会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这样一种危险的方向上去，即在我们不论解决什么重大问题时，都以为只要等待神的启示；或等待某些能够代表"天命"、代表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天才人物的出现；或索性凭着自己的主观的感觉、意识来任意决定一切，而不必对于周围事物努力去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必考虑如何使我们的意识去正确地反映周围的物质世界。

二元论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二元论想回避物质和精神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东西的问题，把两者看做宇宙间没有相互联系的两种平行的本质。这样的观点既然否认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法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在实际上，二元论者仍不能不说明这个关系，而当他们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时，就无法坚持二元论的原则，就不能不在一些问题上倾向于唯心主义，或在另一些问题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二元论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折衷主义的错误倾向，只有克服二元论，完全站在唯物主义方面，才是正确的。

前面已说过，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这个问题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基本的问题。要辨别一种哲学派别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就是要按照它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来确定，而不能按照其他任何别的标准来确定。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只能有两个回答，而不能有第三种回答。即或者是唯心主义的回答，或者是唯物主义的回答，二元论的回答只是这两种回答的折衷主义的结合，而不是第三种回答。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物质先于精神的原理，这个原理正确地概括了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成就，而科学的发展也日益有力地更加证明唯物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但是，过去的唯物主义观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在 19 世纪以前，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够，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成熟的阶级，因此当时的唯物主义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认识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总不能够完全正确地说明意识怎样从物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一些唯物主义者（古代的）以为意识是一种最精微的从来就存在于宇宙中的特殊物质的作用，如德谟克利特认为是最精

微的原子的作用，中国唯物主义者认为是一种“精气”的作用。又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意识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但不知道这只是高级物质特有的属性，认为似乎一切物质都有意识，连最低级的物质也有意识，动物和人类的意识和无生物比起来只不过是量的差别罢了。十七八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以及中国的孙中山（他认为细胞就是有意识的）的思想，一般都有这样的观点。19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则索性把意识和物质同等看待，也就是抹煞了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和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的这个原则的区别，把意识也看做是存在于我的主观之外的一种物质，说人的脑髓分泌出思想，就和肝脏分泌出胆汁一样。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是把意识看做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看做是脑神经这一种物质的作用，看做是由物质所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庸俗唯物主义把意识简单看做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这就把第一性的东西和第二性的东西混淆不分，也就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淆不分了。

辩证唯物主义依据近代科学的一切成就，指出意识是物质发展到高度完善阶段的产物。意识并不是存在于某种“特殊”的“精气”或精微的原子之中，它也不是任何低级的物质能够具有的属性，它只是人脑的一种作用。低级物质对于周围事物也有一定的反应的作用，但这些作用，和人脑的意识作用是有质的区别的。物质的发展是由无机物到有机物，由无感觉的物质到有感觉的物质，由没有意识的物质到有意识的物质的辩证发展过程。意识的作用是在于能够以主观的形式反映周围客观事物的存在。人脑是物质发展的最高阶段，人脑的意识作用的主要特点是在于具有思维的能力，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生产过程中——发展起

来并且受着社会实践的制约的。总之，人的思想意识是人的大脑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外就是一种反映的作用。或者说，人的意识的内容，就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正确的意识，就是自然界或社会的真实的客观情况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反映。所以，要获得正确的意识，必须努力使我们的主观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周围的客观存在。

二、意识是存在的反映

辩证唯物主义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首先肯定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即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它先于意识而存在，而意识则只是物质发展的产物，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所产生的一种属性。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肯定这种高级物质的属性的特点是在于能够反映周围事物的客观情况，也就是肯定物质对于人的意识具有着可知的性质。辩证唯物主义不但一般地肯定我们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而且指出人的意识有能力对于周围的物质世界获得近似的正确的反映，有能力做到使我们的主观意识的内容和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情况达到一致的地步。正确的认识就是这种正确的反映，就是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达到一致的表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反映论的观点。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采取正相反对的看法。一部分唯心主义者，肯定人们的思想能够认识世界，但照他们的观点看来，人们之所以能认识世界，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精神的、思想性的东西，而人的意识和世界精神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认识不是由于人的意识反映物质世界，而是精神、思想认识自己。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一般地都是

这样的。黑格尔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者。这些唯心主义者既然把世界的本质当做和他们的精神、思想完全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不把认识看做是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把认识看做世界精神在个人的意识里的体现，也就是看做类似神的启示一样的活动。这样，唯心主义就在实质上和宗教迷信观念合流起来了。黑格尔所谓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中国旧时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谓的“天人合一”，柏格森一派的所谓“直觉”，都是同类性质的看法。由于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看做世界精神的体现，因此也就把这个思想当成绝对不变的公式，妄想用它来安排和支配世界的一切事物。他们不知道，人们的思想对于世界的变化、发展虽然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只有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思想，才能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发生积极的改造作用，而唯心主义者自己的颠倒的、错误的思想却决不能起这样的作用。所以，人们首先只能用自己的思想去反映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并随着世界的变化发展使自己的思想也跟着发展，然后这样的思想才能对世界发生积极的改造作用。任何一个最聪明的哲学家的思想，也不能成为支配世界的一切事物的绝对不变的公式。

另一种反对反映论的观点是不可知论。有些不可知论者在认识论上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流派，他们一方面肯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例如康德），或者肯定我们所认识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如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休谟主义者赫胥黎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的感觉的内容是纯主观的印象，或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者叫做“物自体”）；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事物的规律性是否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我们没有能力加以肯定。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

很容易引导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理由是：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原理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观点是根本矛盾的。不可知论既然已经否定了我们的主观认识有反映外界世界的能力，也就没有理由再来断定这一个外界世界是否客观地存在着，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肯定我们不能认识的东西。这样一来，不可知论者最后就走到了主观唯心主义方面，把我们周围所看到的世界都当做只是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中的东西了。依照这样的看法，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就只是“原则同格”（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章第三节），不能设想它可以离开主观世界而存在。不是客观存在反映于人的主观意识，相反地倒是人的主观意识产生客观存在。唯物主义者说，人的主观意识反映客观世界，不可知论者——主观唯心主义者却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唯物主义者说，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可知论者——主观唯心主义者（例如实用主义者胡适）却说，实在好像是很服从的女子，她千依百顺地任随你怎样去打扮它。这种不可知论——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哲学的主流。美国的实用主义，奥国的马赫主义等等，都是以这一类观点作为基本思想的。

庸俗唯物主义也离开了反映论的原则，不把人的认识看做外界世界的反映，而把它看做和外界世界的事物同样的某种特殊的物质，把意识也看做是一种存在于主观之外的事物。前面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是违背了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的原则，把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界限混淆不清了。

辩证唯物主义者坚决反对不可知论，指出现实世界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我们的实践活动能够证明我们的一切正确认识都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真实情况在我们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反

映。实践使我们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也使我们能够肯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实在性，肯定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决不是仅只存在于我们的主观之中，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钢铁工人依据熔炼钢铁的规律的正确知识从矿石里确确实实地获得了钢铁，农民依据农作物生长规律的正确知识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了丰收，这些生产实践使工人农民完全可以肯定钢铁和农作物等物质的客观存在。如果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采用了主观的错误的计划，他们的生产一定失败，这又证明物质决不是存在于人的主观之中，决不是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同时，人们之所以能认识世界，并不是如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好像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和人的思想是同一的东西，人只要幸运地抓着了这样一个世界思想，就可以永远把它当做支配一切事物的绝对的公式了。事实上这样的思想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人的认识只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反映。客观实在怎样，我们的认识就应该怎样。客观实在的事物发生变化了，我们的思想也必须要跟着变化。人们如果预先为自己的行动定出一个死的现成公式，不管事物的情况如何变化，都硬要按照这个死的公式去工作，那就一定要使工作遭受失败或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不能说世界本来和人的思想是同一的东西，而应该说人的主观思想必须力求与客观事物一致。只有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而错误的思想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这种思想的内容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任务就在于启发人们去自觉地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意识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客观存在，避免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的分裂，避免主观主义的倾向，以保证认识的正确性。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自然辩证法》，第177页)又说唯物主义是“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上而不是从什么幻想的联系上把握的事实。”(《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这些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反映论的观点正是唯物主义的核心。恩格斯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是在于“首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基本点上——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同上)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研究一切问题的总的指导方向。例如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都不曾把唯物主义世界观真正运用到里面去,他们一涉及这个领域里的问题，一般都给予唯心主义的解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历史研究的领域去，指出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人的社会意识只是他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在一切学术研究的领域里应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即从客观事物本身的联系上去把握事实的原理,而且也要把这原理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努力使主观的思想正确反映或符合于客观的现实。我们有一些党的干部，在理论上、口头上是承认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研究或者没有认真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知道明确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是不能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按照事实本身的联系来把握事实，不能使主观的认识和客观事物求得一致，而是使自己主观的思想和客观事物的实际情

况相分裂。这种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必须努力加以克服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唯心主义，而对于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来说，主要的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必须认真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来学习如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和依据反映论的观点来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即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反对当时有些同志用“想当然”的方法和“以感想代政策”的方法来观察问题的错误倾向。以后在1942年整风运动的演讲中，又进一步指出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不知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为只要凭着书本上的一些现成词句或现成公式就可以直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不去认真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去注意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具体实践经验。经验主义是把个人的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简单地到处搬用，而不顾这些经验是否符合于所用到的地方的客观实际情况。不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使人的主观和客观分裂，使人的认识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使人在实际工作中陷于错误和失败。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以及许多关于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曾反复地用各种通俗的方式指出如何在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应用反映论的原理。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作为我们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的范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毛泽东同志说：“不论做

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这篇文章里又指出要怎样才能在主观上不犯错误，说：“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这样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号召对于周围的事物进行调查研究，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切问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符合于反映论原理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他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说“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

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里，毛泽东同志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他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工作方针”就是我们的主观的思想，“实际情况”就是客观事物。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就是要使主观的思想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

既然主观思想应该反映客观事物，那么，如果客观事物有了变化，主观思想也就必须跟着有所改变。在《实践论》里，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

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所以，人的思想必须反映事物的发展，这个原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里，又加以申述，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批评右倾保守主义，主要地就是指出这种错误思想在方法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反映论原理。

以上只是毛泽东同志著作中论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的一小部分例子。在我们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必须把这些论点结合实际工作的经验充分地加以说明，使得我们的干部由此懂得，我们学习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要在理论上、口头上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反对唯心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上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把反映论原理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武器，以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

三、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

许多唯心主义者在攻击唯物主义的时候，常常是先对唯物主义加以种种曲解。经过曲解之后，唯物主义就被他们形容成好像是很容易被攻破的非常脆弱的东西，于是唯心主义者就向着他们自己所幻想的这个对象进行攻击，并且也就自以为获得胜利了。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曲解有两种：一种是把唯物主义硬说成是专门追求物质享受，没有任何高尚的理想的庸俗行为，另一种是

把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曲解为单纯的机械决定论，好像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是不承认意识有任何能动作用似的。

第一种曲解是俗流的见解，同时也是哲学史上很古老的一种曲解。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已驳斥过了："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这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们自己"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的自画像，并不是唯物主义的真正的本来意义。历史上的唯物主义的代表者，恰恰是最能够为一定时代的高尚的理想，为反对腐朽的旧思想旧制度而进行忘我的斗争的伟大人物。"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第23页）恩格斯指出，上面那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的荒谬的曲解，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真正的区别抹煞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意义，主要地只是在于，在回答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前者把物质、存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后者则相反地把精神、意识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离开这个根本标准来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要达到荒谬的结论。

第二种曲解是在许多唯心主义者中比较流行的。他们认为，唯物主义既然肯定事物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并且肯定一切客观实在的事物都有着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也即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规律性，那么，好像唯物主义者是把意识看做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纯粹消极的反映，而对于客观事物是丝毫无能为力了。他们把唯物主义曲解为一种机械决定论，曲解为类似宿命论的观点，曲解为对于客观规律的偶像崇拜论。

其实，真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如唯

心主义者所曲解的那种片面的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这只是就意识的来源和根源说的。人的主观意识只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因此它的内容决定于客观存在，以客观存在作为自己的来源，它决不是凭空地由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上帝的启示或什么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人的认识的正确与否，只决定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而不是决定于它是否符合于黑格尔式的主观设想的“世界理性”，或是否符合于旧中国唯心主义者所谓的“天经地义”。但是，坚持这个原理，并不等于否认了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们的意识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方面对于客观存在又能够反过来发挥重要的能动作用。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意识如果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情况、本质和规律性，它就能够帮助人们去胜利地从事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就能够加快客观世界的前进运动的速度，就能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顺利地向着自己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意识不能正确地而是错误地反映了客观存在，它就会把人们的行动引导到盲目的、迷乱的境地，就会使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行动中陷于失败，就会使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受到障碍，就会使自己所预期的目的不能得到实现。

自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是不能够正确地解释意识的能动作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认识和社会实践的辩证的联系，他们不知道人们的意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历史地发生发展，又历史地作用于客观存在的。他们对于人的认识作用，是抽象地离开历史和实践来加以解释的。他们不知道，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能动地获得的，这就是说，他们把认识看做是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消极反映，不了

解认识是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了解认识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看来，似乎正确的认识不是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果，而是偶然地由一些特别杰出特别聪明的人们的头脑中产生，而它一旦产生之后，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这样的观点在实质上已离开了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里面去了。另外也确有一些唯物主义者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片面错误之中。他们不能理解意识对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不能理解正确的认识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积极作用，有时甚至于陷入类似宿命论的观点。例如对于客观规律的偶像崇拜观点，就是在一些不高明的唯物主义者中间产生的。

辩证唯物主义充分估计到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能动作用，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那种近似宿命论的错误观点。辩证唯物主义明确地指出：并不是任何人的任何一种意识都能够起积极的能动作用，只有多少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才能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能正确反映或者完全歪曲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的认识，就不能起这种作用，或者只能起相反的消极的作用，因为它会使我们的行动发生错误，把我们引到盲目乱撞以至于失败的境地。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反对有些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的错误看法。人的意识是在历史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反映客观存在的。意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意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人的实践地位。人在自己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行动中能动地去认识世界，依据自己的实践的要求能动地去开辟自己的认识的领域，而不是静静地坐着让外界的任何事物随便映到自己的头脑里来，因此随着人的实践地位不同，认识也有所不同。实践首先是指生产实践，在不同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们的意识发展程度就有所不同。另外，在阶级

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处于不同的实践地位，因此就有不同的意识。人类对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受到生产发展的规模和阶级的实践地位的限制的。阶级的矛盾使社会分裂为前进的势力和腐朽的势力，腐朽的势力是脱离生产的实践并和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处在相反的地位上的。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的意识趋向于保守旧的社会制度的方面，因此在一般的方向上就不可能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特别是不能反映社会的前进运动规律或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这就使得他们的意识只能起消极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只有进步的革命势力是积极努力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斗争的，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的意识能够更正确地——正确的程度依据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有所不同——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能够利用这些规律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发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变革世界的伟大作用，就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最进步的意识形态，是最全面最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具有最高度的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所以，在研究意识的能动作用时，必须注意到不同阶级的不同意识的根本区别，必须注意到新的进步的意识和旧的社会意识的根本区别。应该指出，反动阶级的意识，在总的方面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是最后一定要走向失败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任何具体实践问题上都不能认识一点客观事物的规律。不是的，即使是反动阶级的人，在一定的实践问题上也可能认识一定限度的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且利用这种认识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在战争中他们也能利用某些战术的规律来为自己的战斗服务。革命的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在和反动派斗争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是必须注意到，反动派的行动虽然在总的方面是违背社

会发展规律必然要失败的，因而我们在战略上有充分的理由藐视它，肯定它一定要灭亡。但同时又要注意在具体的战斗中它不一定是完全不能利用某些客观规律的知识来为自己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谨慎小心，也可能会暂时吃它的亏，因此在战术上就必须重视敌人，在每一个具体的战斗中必须谨慎地坚决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打败敌人。还应该注意，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掌握革命的、能够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包括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规律）的知识，才能使自己在斗争中和工作中处于自由的主动的地位，才能避免失败。反动阶级的思想意识有时也会影响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这种影响就会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实际斗争中陷于盲目性，就会走向错误的道路。所以，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过程中，必须和各种反动思想的影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必须努力使日益广大的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就是说的正确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的积极的改造的能动作用。正确的思想之所以能发挥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首先是由于这种思想正确反映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然后我们应用这些思想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通过群众的斗争，就能发挥强大的改造世界的作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固然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任意创造或消灭任何一个客观规律，但我们一旦认识了这些规律之后，就能利用这些规律来进行改变世界的巨大活动，就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作用。

磨擦生火的实践在原始人类中早已在进行了，这个实践经验被近代科学加以概括，在人的思想中作为能量转化和能量守恒的规律反映出来，人们把这个认识应用到近代工业生产中，就使生产力在各方面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这就是对于人的意识的主观方面的积极能动性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马克思所说的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就是说人的意识，哪怕是最正确的意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要使理论成为改造世界的力量，必须首先使它掌握群众，使它成为群众所掌握的武器。任何正确的科学的理论，如果它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或领导干部中间，它就是脱离实践的理论，就不可能发挥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主力。不通过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论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或改造社会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进步的、正确的意识，对于客观世界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的大小，决定于它影响群众和发动群众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辉煌的胜利，自然是由于我们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正确思想的指导，但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发动了最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不论是生产方面的发展，也不论是三大改造的迅速实现，都是掌握了正确意识的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没有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的发挥，决不可能有这些成就。

第六章　认识过程的辩证规律性

一、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肯定人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都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们不了解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事物的区别，不了解人的认识是在社会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他们把认识看做是离开了社会实践，离开了历史发展过程的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外界事物的纯消极的反映。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世界上偶然出现了一个"先知先觉"的人物，就可以正确地洞察到一切事物的真理；真理的认识好像不是通过历史的实践过程有规律地发展起来的，而是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一下子发现的。因此他们仅仅在基本上正确地肯定了认识的来源是客观事物，却不能理解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或者说，他们只能说明什么是错误的认识和什么是正确的认识，却不能理解人的认识为什么会发生错误以及正确的认识是怎样获得的；他们能肯定人应该使自己的主观意识正确地去反映客观事物，肯定人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但却不能理解人的认识要怎样——要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由于他们不能理解人的认识是在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规律性，因此他们虽然知道应该避免错误，避免主观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应该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不能完全解决如何避免错误、避免主观主义，如何克服唯心主义和如何保证使我们的思想能够经常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也就是保

证我们的认识能够经常地具有客观真理性的问题。

应该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关于实践或“行”的问题倒常常被唯心主义哲学所提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批判了以前唯物主义者不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接着就说：“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他的这段话就是指的上述的情形。马克思又指出，唯心论虽然常常提起实践的问题，但它们当然是不能正确地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因为，第一，唯心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实践这个概念的真正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唯心论那里，“能动的方面”“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例如当中国的唯心主义者使用“践履笃行”这一类字眼的时候，是把它抽象地解释成各个个人为了实现某种思想或道德原则而进行的自由活动，这种解释和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是毫不相干的。第二，唯心主义者的上述观点使他们在解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时候，也陷于完全颠倒的看法。对于唯心主义者来说，人们似乎并不是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而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才来进行实践活动。从康德直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都是这样的。中国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的说法，反对朱子的知先行后的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的所谓“合一”，是这样安排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很明白，这是把“知”放在更根本的地位上来和“行”加以“合一”，这仍然是把“行”仅仅看做“知”的体现，和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理解——人在实践行动中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现代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如实用主义之类，也标榜着好像是重视实践的，但是它

们是把实践曲解作各个人的盲目冒险活动，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不承认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可以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正确知识，他们把任何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都硬说成仅仅是对于人的主观的要求有用的方便工具。

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绝对没有人注意到实践的问题的。有一些个别的唯物主义者，例如中国的孙中山，在他们的思想中曾接触到知对行的依赖关系，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说：“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这比起中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对于知行关系的看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位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唯物主义只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理解范围之内，他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仍然不能真正了解人类社会实践的现实内容是什么东西。他所论到的“行”，只是指的抽象的个人活动，有时也看成是个人的冒险行动。特别是他把广大劳动人民的行动都看做是“不知而行”的盲目行动，把人民看做“不知不觉”的“阿斗”，在哲学观点上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历史的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在他们的创造历史的实践行动中能够提供极丰富的感性认识即经验知识，对于人类认识的发展起着首创和推动的作用。这些观点就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因素，这个方面曾被国民党反动集团利用和夸大起来，作为他们的法西斯思想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克服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即把认识看做是不需要通过实践的、主观对客观是直接反映——即把人的认识和人类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到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因此也就克服了唯心主义对于人的活动的抽象

的了解，指出了什么是作为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社会实践的具体内容。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生产是最基本的实践，它本身包含着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来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及对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除生产活动之外，人类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实践的形式，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和科学艺术活动等等。其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于人们的认识尤其有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论》）

人类的社会实践又可以归结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和改造社会的实践，在这两种实践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人类的知识，也可以归结为自然的知识和社会的知识，而哲学知识则是这两种知识的综合。毛泽东同志说："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行动（实践）在先还是理性原则（思想、知识、科学原理

等）在先？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行动在先，实践在先，人民群众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的创造活动在先，理性原则，科学原理，思想，知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实践产生理论，因此，如果人民群众的实践中间出现了现有的科学原理和知识等所不能说明的事物，那就必须依据新的实践来重新检查和修改或发展这些科学原理和知识。但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却和这相反，它认为不是行动在先，而是理性原则在先，实践只是现成的理性原理的体现，而现成的原理、知识，是一切实践行动不可逾越的根据。因此，如果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出现了现有的科学原理所不能说明的事物，那么唯心主义者就要根据现有的原理知识，对这些实践行动提出指摘，说这是不应该有的。

和唯心主义相反，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颠倒地把某种精神原理看做人的行动的基础，而是反过来把人的实践行动看做人的认识的基础，它指出人的认识是随着他们社会实践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而一步步地向前发展的过程，即由不知到知，由知的较低级阶段到较高级阶段的反映客观实在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把认识过程看做是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列宁说：辩证法“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这个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的认识运动过程，因此他们只是肯定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即物质是第一性的和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个原理，或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这个原理，但不能理解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也就不能解决如何保证使主观经常正确地反映客观的问题，如何避免错误和获得正确认识的方法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研究认识的辩证法运动的规律。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实践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论到如何认识战争规律时，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又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里，毛泽东同志驳斥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思想时，说：“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这一切都不外是说，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就一定不要离开实践，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又为实践的目的服务，并且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判定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这些就是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基本原理。

和唯心主义相反，辩证唯物主义不把实践看做各个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是看做人们的社会行动，首先是看做人民群众的行动，特别是劳动人民群众的行动。劳动人民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生产——的主体，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行动的主体，因此他们的斗争行动对于人类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起着首创的作用和根本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实践经验是人们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初的源泉。自然，他们的经验是分散的，没有系统的，是在基本上属于感性阶段的认识，需要有人进一步加以综合、提炼，才能成为有系统的知识。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经验是一切认识，包括各种科学知识的最根本的来源。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社会

斗争经验，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可能产生。因此，从最后根源上来说，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只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人民看做“不知不觉”的“阿斗”，而应该把他们看做我们寻找新的知识的第一个先生。一切做科学研究工作和革命领导工作的人都必须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反过来再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正是基于这一个认识依赖于实践的根本原理的。

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人的认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发生和发展呢?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首先获得对于周围事物的感性认识，然后认识再进一步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即感觉印象阶段。感性认识包含着感觉、知觉、表象等等的形式，感觉是外界事物直接刺激感觉器官所引起的印象。知觉，这是指当前的某种感觉印象和过去的感觉的记忆结合起来，构成对于某一具体事物的特点的认识，如听见某人的声音即同时想起他的面貌形状等。表象，这是指我们综合过去的各种感觉印象来在自己的头脑中构成对于某些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一切生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感觉能力，最低级的生物的感觉能力，即是对于外界直接刺激的有利有害加以区别的能力。知觉和表象，只是在具有中枢神经并能形成条件反射的动物中才能够获得的能力。人的感性认识比一般动物的感性认识复杂，并且也有质的不同，但总的来说，感性认识是人用感觉印象的形式来反映外界事物的一种认识作用。

感性认识既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因此这种认识形式有它一定

的局限性。我们的感性认识，只是对于事物外部联系的感觉印象，即只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的局部的现象，而不能更深入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内部联系。不可知论者夸大了感性认识的这个局限性，把感性认识看做人们意识中的纯主观的感觉形式，硬说这种主观形式和外界事物之间存在着不可超越的鸿沟，丝毫不能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客观特性。唯物主义者对于这种谬论曾从各方面加以驳斥。费尔巴哈曾很机智地论证人的表象虽然与所表象的对象有所区别，但在实际上终归是后者的反映，他说："盐味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表现"。唯物主义者狄慈根，反驳了那种把感觉现象和物质本身的差别看做不可超越的差别的谬论，说："'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以上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三节）这就是说，感性认识虽然不能把握事物的全体，但仍能反映事物的局部的客观特性。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把不可知论的谬论驳斥得最彻底的，"乃是实践，即实验与工业。既然我们能够用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对于这现象理解的正确，那么，康德所说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序言里，恩格斯还引用了一句成语说："布丁的证明就是吃。"

唯物主义肯定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感性认识所反映的事物内容和事物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在感性认识的形式里，人们"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而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

(《实践论》)。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必须在认识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事物的内容在人的感觉印象的形式里反复多次地反映之后，由认识的量的积累进到质的突变，即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阶段，它已不是用感觉印象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用概念或思维的形式。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在认识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概括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全部现状和它的历史的基本内容）。概念和感觉印象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把事物的具体的、生动的、同时又只是表面的现象反映到我们的意识里，而概念的认识则能够撇开现象的表面的复杂内容，抽出其中最基本的东西或贯串全体的本质的东西。比起感性认识来，它带有抽象的然而同时又是在认识上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性质。例如我们从感性认识上对于人类可以获得一些普通的感觉印象，如具有五官四肢、能言语、能思想等等。但不能从这些感觉印象直接把握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的阶级的，或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只能依靠理性认识来加以理解，而这种理解是要从多量的丰富的关于人的感性认识中加以抽象、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的研究中加以抽象，才能获得的。又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前，有许多人到农村去，对农民的情况得到了许多感性认识，他们的感觉印象是生动的、复杂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们认识到农村情况的本质。农村情况的本质是：农民一定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这个本质方面的认识，是不能直接在片面的感觉印象中把握到的（因为三户贫农在农村中最初好像只是少数，只从表面印象上来看，似乎并不是很重要的），而只能从复杂的感觉印象中，通过我们的理

性的思索，分析这些现象的原因，把握到某些重要现象之所以一定要出现和一定要发展起来的必然性（如三户贫农的方向一定要得到贯彻的必然性），这样，进一步地深入地去抽出它的最根本的东西，造成理性的概念，才能把握得到。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来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就是思维活动。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过程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人们必须首先在实践中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必须积累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然后才有可能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人们可以利用别人的间接经验来帮助自己认识事物，但一切知识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在感性认识中从来没有为人认识过的东西，在理性认识中也不可能认识到。没有任何革命经验或革命经验很少的人，要想真正完全了解或充分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不可能的。即使有革命经验的人，在学理论的时候如果不联系自己的经验以及党的政策实践，也不可能很好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出认识必须开始于感性的经验，认为理性认识可以不经过感性认识就能直接被人所把握的观点，这是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倾向。17世纪欧洲大陆的“唯理派”哲学家，否认感性认识的实在性，主张人们可以依靠思维的活动直接认识事物的真理，这些“唯理派”哲学中虽然也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唯物主义者，但在割断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联系这一点上是离开了唯物主义的。中国的王阳明否认认识应该从周围事物的观察中获得，主张人们可以凭着所谓生来的内心的“良知”直接把握真理，这是最明显的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典型。教条主义之所以成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倾向，就是由于它轻视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感性经验，妄想单单凭着一些从书本上片断地摘取出来的抽象的普遍原理就来直接解决

实际问题的缘故。教条主义者由于迷信现成的书本知识，常常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事物熟视无睹，甚至对于明明已摆在眼前的事物现象，也会悍然以书本上找不到根据为理由，而采取怀疑、否定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应该坚决相信，感性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并且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感性认识是可靠的，认识只要停止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就够了。感性认识是表面的、片面的，它不能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概括事物的全体，不能使我们获得通观全局的能力和预见事物的发展远景的能力。要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深刻地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概括事物的全体，要获得通观事物全体和预见事物发展远景的能力，必须依靠理性认识，依靠思维活动，依靠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来的各种概念，和运用概念所进行的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过程。列宁论到人的思维中的抽象概念的重要作用时，曾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哲学笔记》1956 年版，第 155 页）毛泽东同志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这一切都说明，人的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而不应该停顿在感性认识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同上）17 世纪英国"经验派"的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感觉经验在认识上的可靠性，而对于理性认识，却以为概念仅只是纯粹的名词，不了解概念的内容是贯串事物全体的事物的

本质和内部联系的反映。经验派这一个弱点，后来就被哲学上的反动派所利用，他们一方面把感性经验看做人的纯主观的形式，否认它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把理性概念当做纯粹的空名词，于是就把经验派的认识论发展成为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18 世纪的贝克莱、休谟、康德，都是把哲学引向这一条路线的代表人，19 世纪到 20 世纪出现了所谓“实证论”和“新实证论”的哲学派别，其中有法国的孔德主义，奥国的马赫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逻辑实证论等等，都是走的这一条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并且，这些哲学派别还以“尊重经验”、“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等等的好听的话作为标榜，狡猾地给自己装上了科学的假面具，在知识界起了很大的蒙混欺骗的作用。

理性认识是人类的头脑所特有的认识能力，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主要的意识现象。人类的思维活动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或思维的直接现实。大脑神经组织中的第二信号系统就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专司语言和思维活动的生理器官。理性概念就是通过许多的语言单位——词汇表现出来的，所以从形式上说，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名词。经验派的错误，就在于仅仅只注意到概念的形式，因此就以为概念只是名词。它们没有注意到更重要的是这形式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概念的内容是对于事物的更深的本质和贯串事物全体的事物内部联系的概括的反映。人们把这些内容用语言的词汇、名词作为标帜（或作为“信号”）而表现出来，这就是概念的形式。当我们谈到某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主要地是要领会它的内容，领会在它的名词标帜之下所反映的比感性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的客观实在的内容，而不能把名词看做主要地只是名词。我们常说我们和反动派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意思主要地并不是说我们和他们在说话的

时候不使用同样的名词，这意思是说我们和他们即使在使用同一名词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之间对于这名词所赋予的内容、意义常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同样使用“自由”这个名词，资产阶级指的是他们少数人的自由，而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则强调广大人民的自由，特别是工人农民的自由。所以，概念，科学的抽象，决不仅仅是名词，而是比感性认识更高级的认识作用。只有把认识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只有对事物把握住正确的概念，并且依据这些概念正确地进行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活动，才可以在认识上避免观察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才能通观事物的全体，了解事物的内部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才能为我们的实践活动指出明确的方向，才可能正确地规定行动的目的和计划。经验主义者之所以成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就是由于他们满足于一些直接的经验知识，甚至于仅仅满足于个人的狭隘经验知识，不能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阶段，只看见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事物的内部联系，把片面看做全体，把现象当成本质，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因此在处理实际工作的时候就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存在发生分裂，在实际上也就是把主观放在第一的地位，而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存在，这样就不能不使行动走到错误的方向去。毛泽东同志批评经验主义者说：“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

这样，认识的过程，由物质到意识的反映过程，由不知到知的过程，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过程。没有感性经验就没有任何认识来源，不使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不能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这个统一的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加以分裂，只注意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使认识和实践脱离，都有走到主观主义的错误道路上的危险。

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上的质的飞跃，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这样说明这个质的飞跃过程："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里指出要达到理性认识，必须使感性认识（感觉印象）由量的积累——反复多次，进到质的飞跃。这就是说，首先要有丰富的感觉印象，然后才有可能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等一系列的理性思维。同时理性认识又不是感性认识的简单的积累，要达到理性认识，除了首先要积累一定的丰富的感觉印象材料之外，还必须把这些材料在头脑里经过一番思想上的加工，这就是《实践论》里所说的"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如果不善于应用这一个改造制作的工夫，那么即使有了一大堆的感觉印象，仍然不能获得反映事物全体，反映事物本质，反映事物内部规律性的理性认识。有些人做调查工作，只会记录大堆的材料，不能从材料中做出主要的结论。有些人一生经历很多，谈起话来能够讲很多具体的故事，但却说不出任何能够贯串自己的全部经历的中心问题。这都是由于不能够对感性认识进行上述改造制作工夫使之

上升为概念的表现。有了调查的材料，有了实践的经历，如果不能够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工夫，就不能不使认识停顿在感觉经验的阶段，不能够把握到事实材料中的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不能把握到事情的正确概念，就不可免地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所以，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但又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改造才能获得。理性认识之所以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是因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现象，通过人的感觉印象才会暴露在外部，才会暴露到人的认识过程中。理性认识之所以必须要对感性认识进行改造制作工夫才能获得，是因为事物的外部现象，事物给予我们的感觉印象是十分复杂的，它不是直接地暴露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而只是间接地与各种复杂的外部现象混杂地暴露着事物的内部联系，它不会把本质的东西纯粹地暴露出来，而是混杂着各种非本质的东西暴露出来。所以要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的东西，要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必须把感性认识的丰富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必须把其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加以区别，把其中重要的、典型的东西和次要的、非典型的东西加以区别，必须研究各方面现象彼此的联系，把表面的联系和更深刻的联系加以区别。这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前，农民群众对于合作化政策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表现动摇的，也有表现拥护的。表现拥护的，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其中有最坚决的典型如像王国藩领导的“穷棒子社”，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里所提到的河北省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对于农民群众的各种表现不加以分析研究的人，把农民的动摇的表现看做主要的东西，忽视了一些贫农的坚决的表现，因此在认识上

就犯了右倾的错误。只有把农民群众的情况加以深刻的分析研究，抽出那些最典型的最重要的表现，撇开那些非本质的东西，研究那些使贫农下中农必然要坚决拥护合作化的各种决定条件（历史的条件和当前生活环境和生产的条件——如中国人口众多，时有天灾，等等；农民和共产党的关系、农民各阶层的关系，等等），研究农民中为什么又有人对于合作化运动有动摇甚至于反对的倾向（如富裕中农就是这样），以及研究农民各阶层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研究各方面的联系，这样就能从理论上确定农民群众是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的，这样就把握着了事物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把握了正确的概念，由此也才能够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才能建立起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的理论。经验主义之所以产生错误，就是由于这种思想方法只就局部的经验简单概括起来，就要做出全面的结论，而不把各方面的经验现象综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例如只抓着富裕中农对合作化动摇的倾向，就归纳出合作化不可能的结论。只根据过去农民种麦的经验，就简单归结出小麦不能高产的结论等等。

感性认识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直接的感觉经验。要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材料，必须对于所要考察研究的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工作。但感性认识的最丰富的源泉，是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千百万人民的眼睛所观察到的现象，比任何聪明杰出的个人孤立地观察到的东西总是更丰富得不可比拟的。所以，任何人要想对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要想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材料，作为把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的基础，就必须联系群众，通过群众的眼睛，来扩大个人的眼睛的狭小的视野。一切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领导者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想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必须善于倾听广大人民的实践的声音，尤其要注意在

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时期他们的实践斗争中所做出的新的创造发明。就历史发展的总的情形来说，自然科学无非是广大人民的生产经验（对自然界斗争的经验）的总结（即使常常是间接地，但归根到底它是反映了人民生产的实践），社会科学知识无非就是人民的社会斗争经验的总结。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普遍真理，总结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长期经验，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和革命领导工作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指出一切正确的领导在认识方法上都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群众路线的这些原则，是一切实际工作中为了保持正确领导，也就是为了保证领导方面能够经常把握正确的思想，避免错误的思想指导所必须遵守的根本的认识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一切科学的研究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正确的领导思想必须是群众的意见的集中，领导者如果犯了官僚主义毛病，在认识上脱离群众，只凭自己的主观独断一切，一定不能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相反地一定要发生错误的指导。另一方面，集中群众意见，并不等于完全消极地听从任何一部分群众意见，而是要把群众的分散无系统的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

见”。在这里，群众路线和尾巴主义是有原则的区别的。在过去革命工作中，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以为群众路线就是“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自然是错误的，这是把尾巴主义误认为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里这样说：“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用哲学的认识论的术语来说，那么，多数的无系统的群众的意见，基本上是属于感性认识的范畴(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群众的意见中，也有经过研究思考的、多少有综合性的，较成熟的，也就是具有理性认识的因素的见解)；领导者正确地总结和集中起来的系统的意见，是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要把群众意见集中为领导者的指导意见，也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群众意见是群众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群众由于它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主要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不同)，而分为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阶层(如农民中包含着贫农和下中农、一般中农、富裕中农等阶层)，他们的意见，反映着他们的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也可能会反映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影响——如农民群众的意见会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群众中必然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并且必然要有各种相反的意见。群众的意见终究是第二性的东西，他们的意见所反映的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才是第一性的东西。他们的意见只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而不是最后的根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才是人的认识(包括群众意见和领导的思想)的最后根源。因此，领导者一

方面必须集中群众意见，但这决不是说要消极地简单地反映群众意见，而是，另一方面，必须善于把大量的群众意见加以“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研究各种群众意见所反映的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依据他们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地位来辨别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哪些意见是错误的（如在土改、合作化运动中，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常常是比富裕中农的意见更正确些），哪些意见是成熟的，哪些意见是不成熟的（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来研究群众的意见），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对错误的意见加以批判，把不成熟的意见加以整理，使之成为成熟的，这样才能把分散无系统的群众意见变为集中的有系统的正确的领导意见。只有对群众的意见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制作工夫，把基本上属于感性认识范畴的意见提高到理性认识的范畴，才能把它再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

这些就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的要点。

三、理论和实践

前面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由感觉到达于思维，这意思决不是说，认识的运动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就完结了。认识的任务之所以在于要达到理性的认识，只是由于理性认识能够给我们以通观事物全体和为实践行动指出正确方向的力量。人们决不是仅仅为认识而认识，而是为了实践才要认识的。因此，人们通过实践而对于事物获得了理性认识之后，就必须把这些认识运用来指导实践，否则认识就是毫无意义的。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两个步骤：首先是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然后又由理性认识再一次能动地飞跃到实践。实践不是认识过程的终止，而

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实践论》),是使理性认识受到检验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论到执行军事计划的问题时,说:"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把作为认识过程之继续的实践放在比理论更高的地位上来看待的。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哲学笔记》,第 201 页)

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感性认识,也必须通过实践才能使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才能获得理论知识。当理性认识再向实践飞跃时,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发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用理论指导实践;第二,在实践中检查理论;第三,在实践中使理论继续向前发展。现在就这三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第一,不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行动中的盲目性和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什么叫做行动中的盲目性?盲目性就是不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能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定出正确的行动方针、方案、办法和计划,就是主观方面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不适合于客观的情况,就是主观和客观分裂。实践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斗争和各种社会的斗争,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指导行动的主观方面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不适合于客观情况,不是依据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随着客观事物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我们的行动就要发生错误,我们的斗争就有陷于失败的危险。要避免行动的错误和失败的危险,就必须努力克服行动中

的主观盲目性，也就是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

为什么有了理论的指导就能避免实践行动中的盲目性？因为只有理论，只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而不是错误的理论，才能够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才能使我们认清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预见事变发展的趋势。只有依据正确的科学理论，才能够为我们的行动定出符合于事物发展方向和事变发展趋势的正确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这种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的行动就是有了清醒的头脑指导的行动，就不是盲目的行动，就是具有自觉性的行动。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使我们的行动从领导方面到群众方面都具有高度自觉性，才能保证我们在实践中克服一切困难，使我们不论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各种斗争中都能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自发论”的思想，因为“自发论”的错误就在于否认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就在于不了解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要陷于盲目状态，并因此就有走向失败的危险。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就说明了理论对于实践是如何的重要。我们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彻底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农村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由于我们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遵循的政策路线，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缘故。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妄以为单凭个人的局部经验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就使行动陷于盲目性并把它引到“碰壁”的地步。

第二，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都能够对于实践起应有的指导的作用。能够起这种指导作用的，只有与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着的正确的科学的理论。理论也有错误的，也有部分错误的，依据这样的一些理论来制定的行动的方针、方案、办法、计划就可能也是完全错误的，部分错误的。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们的行动虽然好像有了理论的指导，在实际上仍然是全然处在或部分地处在主观盲目性的状态中，仍然没有解决或在某些方面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互相分裂的问题，仍然是主观主义的，或在某些问题上是主观主义的。要避免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主观盲目性，就必须进一步注意到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首先在运用理论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依据实践的经验来检查理论的正确性。即“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实践论》）如果实践的经验证明理论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就应该把理论原理连带依据它所规定出来的一切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毫不可惜的全部加以改正；如果理论是部分错误的，就应该部分地加以改正；如果理论原理只适合于一般的情况而不能概括当前客观事物的某些特点，就应该根据情况做出某些必要的具体的补充；总之，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使我们的理论、思想、方针、方案、办法、计划等等尽可能完全地适合于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理论原则的正确与否，不能完全由理论本身来证明，而必须由实践来作最后的证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

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即使是科学的原理，在没有得到实践的最后证明之前，也只能暂时称为假设，科学的假设是人的思维走向客观真理的必要的步骤，但假设还不能被最后确定为客观真理，只有经过实践的证明，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反复的检验、修正或补充之后，才能使假设成为确定不移的公理。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是具体多样的。一般的理论原理，即使已由实践证明了它的客观的真理性，但也只能反映事物的一般的规律性。这些基本的规律知识在我们的实践的指导上具有一般的正确性，也就是可以为实践指出一般的方向，但并不就能够解决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要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只能在一般的理论的指导之下，密切地注意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事物的特殊的规律性，依据不同的特殊的规律性采取不同的具体解决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我们善于把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这个道理，以为只要抓着几条一般的理论原理，就可以直接解决一切具体实践问题，而不注意实践过程中事物的特殊的规律性。这样他们就使自己的主观思想仍然和客观事物处于分裂状态，因而就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

第三，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要暴露出许多的新的方面和新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实践来不断地揭露这些新的方面和新的规律性。这就是说，理性的认识不应该长久停顿在一点上，而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全部科学的发展史，说明科学的理论知识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更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列宁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了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性，并总结了这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

的阶段。在这时候，列宁不怕抛弃某些过时了的个别的原理原则，用一些新的原理原则来代替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认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首先是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实践斗争，就一定要犯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但是，任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个国家、各个革命发展时期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它的普遍真理在表现形式上以及各个方面的原理原则上得到具体的发挥和发展。不注意依据具体实践来发挥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者死抱着书上的某些现成的词句或个别原理原则，任何情况下也不肯加以改变，这是教条主义者走向错误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结果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贡献了许多新的原理。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理论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逐步走向全国胜利的原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等等。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原理的很好的说明。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这是人们

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具体过程时所必须通过的全部认识过程。但是，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之后，认识运动虽告一段落，却并不由此就最后终结。在实践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人们又获得新的感性认识，也就是说，又开始新的认识运动过程。事物的新的方面，新的规律性，又通过由感性认识的积累到上升为理性认识，而反映为某些新的原理原则，这些原理原则又再通过实践的检验而被确定为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科学的理论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反复的认识运动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对于人类认识的全部辩证运动过程做了这样一个典型的总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

四、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上面我们已几次提到人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在认识上的任务就是要我们正确地把握客观真理和避免错误，所以真理的问题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专门的研究。哲学史上关于真理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第一，真理是否具有客观性，即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第二，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给予肯定的回答：肯定真理是具有客观性的，肯定我们的认识能够把握客观真理。我们说真理具有客观性，就是说它包含着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内容。辩证唯物主义既然指出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那么，它所反映的内容，自然是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它之前，早就作为不依赖于主体或人类意识的客观实在

而存在了。真理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正确的反映。要辨别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惟一的方法就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它的内容是否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相符合；能够符合的就是真理，不能符合的就是错误。所以真理只能是客观真理，没有什么主观真理。

但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也就是否认是非的客观标准，把是非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古代希腊哲学史中的普洛太哥拉斯曾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明朝的王阳明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的关于认识论的言论中，就有着把是非的标准归结到主观方面的思想。例如他说：“夫学贵及之于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在中国封建时代，对孔子的言论也敢于说到要依据自己的内心来衡量衡量，这里自然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但重要的是，他把衡量真理的标准归结为人的内心，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的真理观。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在剥削阶级的人们中）我们往往遇到这样一种狂妄地固执己见的人，他常常说：“我认为怎样就是怎样！”他们就是在实际生活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现代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硬把真理说成是纯主观的东西。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说真理是人的“经验的组织形态”。实用主义者说真理只是对于人有用的假设，“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胡适）。现代的主观唯心主义所以要伪造这样的真理观，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着要把真理与虚构，知识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加以搅乱，以便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迷途，为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真理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其错误就在于把

人的主观或“心”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过分夸大了。要学会善于辨别真理和错误，或善于辨别是非，必须通过主观的思维活动或内心的活动，必须善于独立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做“求之于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人的主观或“心”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并不是直接就能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我们重视独立思考，重视求之于心，即重视思维的作用，只是为着要能够认真地应用自己的心思去考察某种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主观、思考、思维、“内心”的作用只是一个媒介，一个工具，人们通过这个媒介和工具来求得客观真理；真理的是非标准最后是客观实践。唯心主义者把人们用以考察真理标准的思想工具误认为真理标准的本身。这就是它的错误的根源。

主观唯心主义者所虚构的这种真理观，同时也就是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既然不承认是非有任何客观标准，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承认有任何绝对真理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真伪、是非的标准既然是主观的，那就无异是说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真理：不同的人在同一时候对于同一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对于他自己来说都是真理。真理竟好像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是完全相对的，没有任何绝对性的。中国明朝李卓吾是一个反对传统儒学、反对封建腐朽制度的思想家，但他在真理问题上有着这种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很明显的思想因素，他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悖矣。……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胡适的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更为露骨，他认为真理只是对于人“有用的假设”，认为它“有用”到什么程度，就真到什么程度。如果真像实用主义者胡适所说的那样，所谓

“有用的假设”就是真理，那么，各人都可以对同一件事按照自己不同的利益做出不同的假设，并各自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真理”了。照这样来说，那么，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关于世界上只有雅利安人是惟一优秀人种的胡说，也算是“真理”了。帝国主义者把自己的侵略行为硬说成是自卫行为的滥调，也算是“真理”了，因为这些对于他们都是“有用”的。所以，在他们这些唯心主义者的眼里，真理也是根本没有任何绝对性，而是完全相对的。现代的主观唯心主义主张所谓“多元”的真理观，就是指的这一种纯粹相对主义观点。意思就是说真理不只是一个，真理因人而异，因此即使是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之下，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可以有许多个“真理”。这种所谓真理观的反动性质，它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否认有所谓的主观真理，因此也否认纯粹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即主张同一条件下的同一事物因人因时不同而可以有不同的真理的观点。凡是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它之作为某种客观事物的某些过程或某些方面情况的多少正确的反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加以承认，不能因人因时而有不同的。就这一点来说，凡是真理，都具有它的绝对性。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不是“多元”的。自然，世界的反动派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是不肯承认的，他们硬要说他们的一套违反世界发展规律的谬论才是真理，但这只是说他们在主观上自以为那是真理，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谬论真的就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只是他们的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人们把自己的认识主观地当做真理是一回事，他的认识是否真的具有客观真理性又是一回事。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真理观把这两回事混淆成一回事，把那些人们自以为是真理而实际上是谬

误的认识也硬说成是真理，这就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错误的来源。

自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人的认识，有着因人因时而变化的情形，但那只是由于以下的原因，即或者是由于：这些知识虽然有客观真理性，但原来是不够的，而另外的人在另外的时候加以补充、发展了；或者是由于：某些知识只能反映事物发展的某一过程、某一阶段或某些方面，等到过程发生了变化，或过程在阶段上发生了变化，或者过程又暴露了某些新的方面，这时人们就要用新的认识去代替旧的认识，而放弃与变化了的情况不相适应的知识；或者是由于：这种知识有一部分或甚至于全部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另外的人在另外的时候出来纠正了这些谬误。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形，某一项认识如果具有客观真理性，那么它之作为客观事物的一定过程、一定阶段或一定方面的客观情况的反映这一点，就有着绝对性。物质的客观存在的绝对性就是真理的绝对性的根据。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指的这种真理的绝对性，决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即好像人的认识能够一下子就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把握到全部客观真理，而不是近似地、相对地、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日益接近地去把握它。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无限的，客观事物的多种多样性也是无限的，人们又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把握这样一个无限的绝对世界，因此决不可能一下就完全地达到把握全部客观真理的目的，而只能通过不断向前发展的实践活动，日益接近完全地去加以把握。这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我们对于客观的绝对世界的认识，都要受到这个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客观事物本身发展条件和我们的实践条件的限制，都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灭和共产

主义必然出现的普遍真理，但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更具体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灭亡前夜——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规律性。只有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的列宁，才把握了这些规律。这样，一方面由于真理具有客观性，因此也就具有绝对性，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总是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真理又是相对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或者说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对立的统一，反对片面地把一个方面过分夸张而抹煞另一方面。但是，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注意到，辩证唯物主义在使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两个名词的时候，所指的意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解并不是一样的。这里还要再进一步加以解释。

辩证唯物主义说到相对真理或真理的相对性时，不是如主观唯心主义那样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和是非之间的任何界限，而只是说人对于客观事物的真理的认识能力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来认识不断发展的客观的绝对世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客观世界发展过程的内容在人们面前所能够暴露的程度有一定限制，同时人们的实践的地位——生产发展的规模，阶级立场等——对于人们把握客观事物过程的能力，也给予一定的限制。这些就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说明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能一次地完全地绝对地把握客观真理，也就是不能一次就把握全部绝对真理。但是，人们在每一时期虽然只能把握相对的真理，这个相对真理在此时此地却

一定具有它的客观正确性，它和错误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有着明白的界限，这一点仍然是确定不移的。如果说是非的界限也可以改变，那只是说当历史条件变化了的时候，客观事物本身的情况也有了变化，因此人们的认识也得要有所改变。至于说到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认识一定事物时，那么，这个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就有着一定的客观的绝对标准，是与非就有着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绝对标准，决不能说真理可以是因人而异的。例如说中国人民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不能因人而异的。因此我们说的相对真理的本身，就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因素。

辩证唯物主义说到绝对真理或真理的绝对性时，并不是如形而上学者所谓的一次就能完全地、绝对地把握到客观世界的真理的全部。这样的绝对真理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客观世界是永远不断地变化发展的无尽的长河，所以人对客观世界认识也只能是处在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说到绝对真理时，就是指人们对于这个无限地发展着的绝对世界的无限地发展着的认识过程。这样的绝对真理是存在的，因为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使自己的认识日益全面、日益深入、日益接近完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是绝对无可怀疑的。人们通过实践所获得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每一次新的认识，都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某些新的方面的反映，都使自己在把握世界客观真理方面更前进一步，这也是绝对的。

根据以上所说，就可以知道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两个东西，而是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发展过程的统一的两个方面。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获得的真理的认识，都是有历史条件限制的。从这一方面说，真理只能是相对的。但是每

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正确的反映，所以每一个相对真理都使我们把握到绝对真理的一粒，都是向完全的绝对真理的进一步接近。这就是说，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不能够一次地完全地把握到的，而只能在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中无限地去加以接近，只能通过一个个的相对真理的无限积累的过程加以接近，所以，绝对真理又可以看做是相对真理的无限数量积累的总和，绝对真理中又包括着相对真理，这就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首先告诉我们应该驳斥一切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的胡说，应该相信人类自己的认识能力，人们是绝对地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不断地更深入，不断地更全面地认识绝对的客观世界的一切本质和规律的。另一方面，这种真理观又告诉我们应该摒弃一切形而上学的那种妄想一次就穷尽世界绝对真理的空想，摒弃那种把某些现成的有限知识夸大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的谬想，要正视我们在实践中认识真理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任何时候也不要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不要把自己现有的有限知识误认做全部的绝对真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一点而造成错误的。教条主义把某些有限的书本上的原理原则误认做绝对真理，经验主义把人们的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都是由于用形而上学观点来看真理问题的结果。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也要不断地努力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来不断地增长和提高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真理的认识的总的规律。

变革世界的实践过程首先是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在不断变革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就不断地一重一

重地打破着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使我们的主观世界也不断地得到改造。认识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每打破一重，人类的主观认识能力和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就受到一次的改造，就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经过改造的主观世界反过来对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斗争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量。由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人们对于自然界获得了科学的认识，但由于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偏见以及生产规模的狭小等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很长时期中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始终是片面的，没有能够达到科学的水平，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的发展也还受到一定的阻碍。自从出现了与大工业生产结合的，以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天生的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以后，障碍人类对于社会进行科学认识的阶级偏见这个历史条件限制在这个阶级身上才开始被打破了，对自然认识的历史条件限制也进一步更彻底地打破了。工人阶级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斗争过程中，同时对于人类的主观世界也进行巨大的改造工作，使人类在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认识都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进步。社会的腐旧势力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是要用他们的反动行动来进行抵抗的，例如地主阶级要反对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为着要配合和帮助他们的行动上的抵抗，他们还要用腐旧的思想影响来抵抗工人阶级对于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是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斗争，他们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通过这双重的改造斗争来实现工人阶级自己和全人类的解放。反动阶级在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过程中终归要被消灭，他们中间有些人被迫地接受对自己改造——从阶级地位到思想观点的根本改造。也有些

阶级中的人们——如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道路。工人阶级是自觉地改造世界的力量，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知识的指导下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斗争来不断地改造自然界，通过社会斗争把阶级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自觉地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工人阶级自己的改造和其他阶级的改造有原则的不同，其他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逐步要被消灭的，所以他们的改造是阶级立场的根本改造。工人阶级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他们的改造是为着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克服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前进，又不断地推动实践获得进一步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和逐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随着其他阶级的消灭，工人阶级也自然而然地要逐步失去其作为阶级的性质，它自己的主观世界也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一、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及其研究对象

辩证唯物主义指明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无数的多种多样的事物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变化着和发展着。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地观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时，那么，在我们面前首先出现的是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运动

着，变化着，产生着和消失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的观点，是和辩证法的观点，即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不开的。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同时也是辩证的统一性。世界的一切事物不是统一在固定不变的状态中，而是统一在一切事物的普遍的联系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分割地密切联系着的同一个世界观的两方面。

辩证法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是相反的。形而上学把世界看做是无数固定不变的和各自孤立的事物堆积和凑合起来的总体，在这里，一切事物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并列，没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事物在实质上是没有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这样来了解，即世界上的每一事物、现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和其他的事物、现象有着交互作用，它们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事物、现象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就构成每一事物、现象的具体的、历史的条件，规定着每一事物的具体的历史的特点。同样的事物、现象，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会发生不同的特点。在我们观察任何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它与其他事物的辩证的联系，如果我们采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孤立地来看它，那就不可能对这一事物获得正确的理解，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一事物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发展的观点，和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是分不开的。当我们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做深入一步的观察时，就会发现事物的联系决不是存在于静止状态中，而是存在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状态，不断地推移

到另一种状态，没有任何停顿不变的时候。在这中间，任何一事物都不是以固定不变的特性来和其他事物发生交互作用的；在和其他事物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自己本身就不断地在运动着、变化着和发展着，就由一种状态推移到另一种状态。为什么事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特点，会表现不同的意义呢？首先就是因为在历史条件变化的情形下，事物自身也变化着的缘故。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新的东西的产生和旧的东西的消灭的过程；任何事物都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消灭的道路，并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为新的事物所代替。如果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没有这种发展的观点，不注意事物在互相联系中的这种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如果我们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任何一事物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那在认识上就一定要犯错误。

形而上学在形式上也不是完全否认发展的。不过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辩证法的发展观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把发展归结为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按照这种发展观来看，那么，事物在本质上是不会变化发展的，变化发展的只是事物的数量和位置，也就是说，只是一种外表的形式，只是一种走马灯式的循环运动，而没有事物本身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没有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的质变过程。同时按照这样的发展观来说，既然运动只是外表形式上的循环运动，因此它的产生也就不可能是由于事物自身内部的原因引起的，发展的原因只能是在事物之外，归根结底只能是在物质之外——精神、主观等等。辩证法的发展观和这相反，把发展看做是事物的对立的统一，看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发展是事物和自己的对立方面互相联系互相斗争的过程，是事物自己本身转化为另外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方面，是由旧的事物转化为新的事物，这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的过程。

发展不只是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不是许多一成不变的事物之间的简单的循环运动，发展是事物本身的实质上的变化，而这变化的原因，就在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这就是说，事物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在自己内部产生出自己的对立方面或自己的否定因素，产生出新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具有着一定要生长起来的优越条件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归根结底一定要形成为代替旧的事物而出现的新事物。

发展过程就是新的事物的产生和旧的事物的消灭过程。辩证法要求我们从发展的方面来观察问题，这样的观察方法，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要在各种事物和现象中间来辨别哪些东西在本质上是新生的东西，哪些是旧的、衰亡的东西，就是要培养我们对于新事物的敏锐的感觉，就是在观察某一事物的时候，要依据它所处的各种历史条件，来确定它在发展过程中间处于什么地位，是正在生长的呢？还是将要消灭的？我们所以要辨别什么是新生的东西和什么是将要消灭的东西，目的就是为着要把这种观察的结果应用到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来，就是要使我们的实际行动和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求得一致，就是要在实践行动中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的东西的生长和促进旧的东西的消灭。

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联系和发展的最全面最深刻的学说。从相互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来观察事物，这就是辩证法的总的特点。但是，仅仅承认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还不一定就是辩证法的观点，因为形而上学也有它的发展观。必须把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严格地加以区别。在这里，要紧的是要进一步了解事物是如何联系和发展的，也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性。要学会正确地运用辩证法观点来观察问题，不是仅仅一般地承认一切事物的联系和

发展就够了，要紧的是必须了解联系和发展的本质，它的普遍的规律，必须了解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一些什么样的秩序进行的。辩证法必须研究这样的规律。所以，辩证法又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45 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研究由自然、社会直到人类的思维的最基本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的学说，唯物辩证法则着重在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方面的研究。我们研究辩证法，不仅仅要肯定它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所包括的各项辩证的规律，这些规律有三条，即：一，矛盾规律——对立的统一规律；二，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辩证法的发展观是对立统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除了这些规律之外，辩证法还要研究客观事物中间存在着的某些最普遍的矛盾问题或对立面问题，即各种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哲学范畴的问题。

二、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

要了解唯物辩证法这门科学的特点，还必须要研究列宁所指出过的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同一性的原理。列宁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这样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哲学笔记》，第 233—234 页）。这应该怎样了解呢？

前面说过，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的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正确的世界观，又是正确的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之所以能成为最正确的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正是因为它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当我们应用辩证法

的方法来研究问题时，这就是说，我们把客观事物本身的普遍规律的认识作为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是从客观事物本身的联系上而不是从主观的幻想的联系上来把握事物，这就能保证我们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的认识，保证我们的认识符合于唯物主义的，使主观意识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要求。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是：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精神、意识只是物质、存在的反映。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指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正确的反映。但是，单单承认这些基本原理，还不能解决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正确的反映，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这样的正确的认识而避免错误。要解决这个如何反映和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正确反映的问题，必须研究和学会应用辩证法，而辩证法就是能够保证我们的主观认识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最正确的根本方法。学会了辩证法，我们就能够做到不是仅仅一般地承认主观意识应该反映客观存在这个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而且能够把这个原则变为具体行动，能够在解决各种具体的实际问题和科学问题的时候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经常符合于这个原则。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分的，要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要在一切研究领域上都能够贯彻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必须学会掌握辩证法，必须善于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运用辩证法的方法。

要学会掌握辩证法，第一就要了解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或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怎样了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一致性？这首先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考察人类的认识的时候，也依据辩证法的方法，注意到它的各方面的有机联系，把它看做是一个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不像形而上学者那样，或者根本否认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的联系，做出了不可知论的荒谬的结论，或者否认认识是发展过程，以为人们一次就能够完全地、绝对地把握一切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指出人的认识就和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一样，是历史的发展的东西，它以人类的社会实践为基础，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矛盾运动，由不认识到认识，由初级的认识发展到高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指出人的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认识的辩证运动的总的概括。在我们运用辩证方法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人的认识本身的辩证的规律性，必须注意在研究过程方面不要违背认识的运动规律。例如，首先必须不要违背通过实践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规律，也就是首先必须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去搜集大量的感性认识的材料，然后用辩证方法对这些材料加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制工夫，使之变为有条理的有综合性的理论知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论到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这里说的研究方法，便是依据着上述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指出观察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凡事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才能决定行动的方针、办法、计划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完全依据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规律的。

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还在于这样一点：即辩证法本身也就是认识的方法或认识的规律，是我们观察问题和分析事实材料的根本方法。列宁就是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当做认识的方法看待的。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曾批评普列汉诺夫不善于理解辩证法，他的批评主要地就是指这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的。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必须在大量的感性材料之上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制工夫，使之成为有条理性和综合性的、能够反映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或内部联系的理论知识。怎样才能够正确地进行这种加工改制？这就需要有正确的分析方法或认识方法，而辩证法就是这样的认识方法。辩证法的核心，就在于掌握对立统一的规律，就在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辨别事实材料的精与粗、伪和真、此与彼、表和里的关系，正是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研究辩证法，主要地不在于仅仅记住一些基本规律和原理，而在于把它的一些基本规律当做认识的方法来加以掌握，把它应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这才是研究辩证法的主要目的。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就是非常明确地把辩证法作为认识的方法来加以阐述的，《矛盾论》主要地就在于教导我们在一切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如何正确地应用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并且根据分析的结果来找出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这是我们学习《矛盾论》时应该注意的着眼点。

怎样了解辩证法和逻辑学的一致性呢？这里讲的逻辑，不是指的那主要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初步规律的形式逻辑，而是指的辩证逻辑，也就是指客观事物的联系和规律性在人的理性认识中的反映，这种反映是采取思维的、逻辑的形态，采取理论系统或

概念、判断、推理的系统的形态的。辩证逻辑指出人类认识的理论系统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规律性的反映形态，因此它和客观事物本身一样，也是要遵循着辩证法的规律的。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不仅只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的思维活动或理论认识活动的规律。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反映这种过程的人的思维活动就其形式来说就是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的矛盾运动过程。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另外的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反映这个运动过程的辩证逻辑在理论的形式方面也是由一个概念推移到另一概念，——推移到自己的反面的概念，由一个判断推移到另一个判断。例如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使失败的概念推移到自己的反面概念，这样来反映由失败到成功这个客观的矛盾运动。早上起来时我们说：“今天要加紧工作”，到了晚上我们又说：“今天不能再继续工做了”，这是由一个肯定判断推移到自己的反面——否定判断，这样就能反映我们一天生活的变化。辩证法要求人的思维活动的形式也要依据辩证法的规律来反映客观世界，要求应用矛盾分析方法来考察人的思维活动形式，要求我们考察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矛盾运动，就这一方面来说，辩证法又是逻辑。

人的思维要怎样来反映客观世界，才符合于辩证逻辑的规律呢？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答复是：思维的任务就是要用理论的形式把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有规律的过程概括地表现出来。理论的系统必须是和客观事物的历史发展和互相联系的基本过程相适应，必须把握着历史的基本发展线索。也就是要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的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更具体地说：辩证逻辑要求我们善于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把握一定客观事物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它的内部包含着哪些

矛盾，这些矛盾的诸对立方面如何互相联系和斗争，矛盾如何激化，如何通过一定的斗争而得到解决，并因此使事物发生质的变化，使新事物起来代替旧事物。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说道："黑格尔的思维方法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思维方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广大的历史知觉为依据。虽然它的形式是极端抽象和唯心的，但是它的思想发展进程却总是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平行不背，而后者本来应该只是前者的证实。"又说："历史的行程往往是通过飞跃和迂回曲折的，如果一定处处都跟着它走，那就势必不仅要去注意许多不大重要的材料，并且要常常打断思路。……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乃是惟一适当的方式。但是这一方式本质上也还是历史的方式，只是摆脱了它的历史形式和对它起着破坏作用的偶然现象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 350、351 页）

恩格斯在这里说得很明白，辩证逻辑的任务，就是要在逻辑的形态上，也就是在理论系统上把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出来。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逻辑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的，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两者当然也有区别，具体的历史过程包含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的因素往往掩盖了那过程中的本质的主要的东西，使得我们从表面上常常看不出在它中间起支配作用的必然的规律性。辩证逻辑的过程却舍去了那些错综复杂的偶然因素，使我们在思想上比较纯粹地把握着历史发展中的有规律的过程，把握着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把握着运动过程中的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所以逻辑思维对于我们的认识就有重大的作用。

列宁论到《资本论》的时候，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按照这种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方法把握资本的发展过程的。例如他

在《哲学笔记》里（第 334 页）做了这样的概括：

“商品——货币——资本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

可以说，全部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资本主义历史在逻辑形式上、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系统上的概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引用了彼得堡《欧洲通报》上对于《资本论》的评价的话，里面说到《资本论》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篇文章，在理论上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基本经验至少有五点：“（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

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我们仔细研究这五条经验的总结，可以知道这个总结正是在理论上概括地反映了一切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必须经过的基本发展过程和基本联系，这里的每一条都反映了全部发展过程和客观联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五条合起来，就在理论上综合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步骤，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首先建立共产党，然后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的国际联系采取相应的不同的政策。这就是辩证逻辑如何反映客观事物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所以，依据辩证逻辑的要求，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来认识任何事物时，必须注意应用我们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系统把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联系反映出来。例如我们总结工作经验，就是要使我们对于工作的认识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就是要求我们在逻辑形式上，理论形式上把工作的基本过程以及有关联的重要问题反映出来。正确的工作经验的总结，必须是要把工作中的问题（也就是矛盾）的发生、发展和采用什么斗争方法得到解决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在论理上加以正确的把握。辩证逻辑的要求，就是要我们的思维活动能够这样地符合于辩证法的规律。这就是辩证法和逻辑的同一性。

三、辩证法要求对于具体问题给予具体分析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正相反对的两种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研究辩证法的任务，就是要正确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反对形而上学；

因为辩证法是保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却相反，它妨碍着我们的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形而上学在长久时间内都是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世界观，十七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也有着很大的缺点。

形而上学的主要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形而上学把世界上的事物以及人的思想看做各自孤独的，没有变化发展的东西，它把发展仅仅看做是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不能够从事物的内部去揭发运动发展的根源，这些错误都使它不能帮助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正确的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相，或者说，即使有所反映，也只能够反映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的、静止的现象。认识的片面性、表面性、凝固性，就是受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所支配的人的认识的根本缺点。

客观世界本来是无限多种多样的事物在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中的统一体，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因此也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都要注意到它和周围事物的复杂的联系，注意到它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不要把它看做孤立的和固定不变的东西。辩证法把运动发展归结为对立的统一，指明事物发展的根源是在于事物自身的内部矛盾，指明我们研究事物运动发展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揭露事物的矛盾，分析它们所包含的各对立面。这样的方法，就能帮助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它的各方面的真面目，就能认识事物的发展根源和这个运动过程。和形而上学方法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相反，辩证法这个思想方法要求我们的主观认识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能具有着全面性和深刻性，并反映它的发展过程。研究辩证法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为着要学会对于所观察的事物的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深刻的认识，避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表面性。

辩证法把发展归结为对立的统一这个原理，在方法上的意义就在于：观察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把握事物的矛盾，事物的对立的统一性。所谓全面的、深刻的分析，这意思就是说要分析事物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包含着哪些重要的矛盾方面，这些矛盾方面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些相互斗争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些矛盾的发展怎样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事物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怎样引起事物的实质上的变化。这样的分析本来就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思维的任何片面性和表面性都妨碍我们完成这种分析的任务；因为这样的分析要求我们既要研究事物本身的一面，又要研究与该事物有联系的各方面，而就事物本身来说，又要研究它的内部矛盾的各方面，——既要注意它的正面，又要注意它的反面，既要研究衰亡的方面，又要研究新生的方面，既要着重注意主要的方面，也不能忽视次要的方面。马克思讲到辩证法的根本特点时说："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资本论》第二版跋）这就是要求我们既注意事物的正面，也要注意它们的反面。恩格斯把辩证法规定为"是——否，否——是"的公式，以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是——是，否——否"的片面的公式。这就是要求我们要把握事物的矛盾。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哲学笔记》，第361页）这也包含上述的同样的意思。

为着进行这样的分析，人的思维对于所考察的对象就必须由这面到那面又由那面到这面地反复多方面地进行思考，这样就使人的思维活动过程表现为一种循环往复式的类似螺旋的前进运动，而不是片面的直线的运动。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的（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

螺旋的曲线。”又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谈谈辩证法问题》)

辩证法的逻辑就是要求我们由事物的各个侧面的认识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发展成为对于事物的全体的认识。形而上学的方法的缺陷，就在于它使认识停顿在某些侧面上，而不继续向其他的方面推移，因此，就不免要把片面的认识夸大起来，以至于把片面误认为全体，这样一来，就会使人的认识不是接近于客观现实，而是与客观现实相分裂，也就是要把认识引到主观主义。例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既要认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必须同时抓紧轻工业和农业；一方面要认识到工业的发展可以供给农业和农民以生产资料和日用必需品，可以帮助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农业的迅速发展也可以反过来促进工业向前发展。这就是全面的、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辩证法的认识。形而上学的认识和这不同，形而上学者在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要的时候，就会忘记轻工业农业同时发展的必要，或者在注意农业发展的时候，就忘了抓紧工业的工作，这就是片面的、直线性的认识。由于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直线性使人的主观认识脱离客观现实，所以，在它里面就有着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因此，形而上学就是经常和唯心主义结合着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就是在形而上学认识方法的直线性和片面夸大（主要是把意识的相对独立作用的认识加以绝对化和片面夸大的结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列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又说：人的认识的“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谈谈辩证法问题》）

举例来说，如像经验派的唯心主义，就是把人的感觉经验的主观形式方面的意义加以绝对化和片面夸大，因而抹煞了它的客观的内容和来源。理性派的唯心主义把理性认识的普遍性方面加以绝对化和片面夸大，因而抹煞了理性认识和感觉经验的联系，抹煞了认识必须开始于经验这个必然的认识过程。在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是由于片面地夸大了个人的经验的意义（经验主义），或者片面地夸大了理论上的某些普遍原则的作用，而不知道这些原则必须与具体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缘故（教条主义）。

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里说：“为着真正地认识对象，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不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全面性的要求，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力求认识的全面性，这就是辩证逻辑的原则之一。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一点，即是辩证逻辑所要求的这种全面性的认识，并不等于把事物的各方面的分析观察的结果形式地加以凑合，而是要把各方面的有机联系加以综合的了解，要在总的联系中间区别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要从其中揭露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趋向。在这里，就应该把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加以区别。折衷主义在事实上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列宁

在批判折衷主义时指出，"辩证法要求在具体的发展中全面地去估计相互关系，而不是从这边摘取一点，从那边摘取一点"，不是"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同上）辩证法要观察这一边也观察那一边，同时又要依据具体的历史联系，来确定事情是向哪一边发展，确定事情的重点是在哪一边，我们在实践中间应该站在哪一边和反对哪一边。关于这一点，列宁的上述文章里也有详细的阐明，在论到辩证逻辑的全面性要求时，列宁又指出："辩证法逻辑要求在对象的发展上，在它的'自己运动'（如黑格尔有时所说的）上，在它的变化上去把握它。"并且，"必须把全部的人的实践——不管作为真理的标准也好，作为对象与人所使用的东西之联系的实际决定者也好——加进对象的完全的'定义'里去。"最后，列宁还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明辩证逻辑的认识的这个特点，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因此，唯物辩证法总的要求是：应该对具体事物给予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31 卷"共产主义"）我们学习辩证法的时候，必须经常注意到这一个总的原则。

第八章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甲）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辩证法把发展理解为对立的统一，从同一事物的内部对立性

中，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中，去揭发发展的根源。懂得了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就能够了解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真正原因，就能够正确把握运动、变化、发展的本质。所以，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首先指明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所以又叫做事物的矛盾规律。矛盾就是同一事物内部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东西的意思，依据这个规律，我们观察和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必须在肯定这一事物的同一性（或统一性，一致性）的时候，同时注意到它的内部各个方面的对立性。反过来说，在研究事物中所包含的相互对立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同时又要注意到它们之间所具有着的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在这里，辩证法要求我们的认识要具有这样的全面性：即不仅仅是一般地把事物所包含的各个方面加以分析和指明出来，而且要认识到这些方面之间是如何地互相对立着，同时又互相统一着。既要认识它们的对立性的一面，又要认识它们的同一性的一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我们对于事物获得全面的认识。这样的看法和形而上学的看法当然是相反的。形而上学的缺点之一就是，它对事物的看法不是把对立性和同一性联系起来的全面的看法，而是把两者完全分离的看法，即或者把同一性当做没有任何内在矛盾的绝对的同一性看待，或者把对立性当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有同一性的、片面的、绝对的对立性。既是同一，就不能有内部的对立，既是对立，就怎样也不能成为同一性。或者同一，或者对立，没有对立的同一性，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公式。例如曾经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动力之一是全国人民在政治上与道义上的一致，因此就否认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否认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种动力，否认人民在政治上道义

上的一致是通过矛盾的克服而获得的。这就是把同一性看做绝对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又例如有人认为根本对立的东西是不能具有同一性的，如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他们不承认这些对立的东西正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同一性的，这就是把对立看做绝对的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这个形而上学公式在政治上有着它的典型的具体表现，那就是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联合的方面，而不知道联合中应该有斗争，"左"的机会主义者却相反地只看见斗争的方面，而忽视了联合的方面。

要明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什么是正确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为什么是片面的，需要顺便提一下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区别问题。

形式逻辑是研究正确思维的形式及其初步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地是思维形式本身所应该遵守的初步规律。这些初步规律是人们为着要进行合理的思维时在思维形式上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律，但如果单单依靠这些规律，并不一定能保证人的思维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容。这当然不是说形式逻辑完全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及其初步规律也是客观事物的某些简单关系的反映，所以在研究和应用形式逻辑的时候也要适当注意到它的内容。形式逻辑的任务是在于考察：为着要构成正确的思想，即明确的、没有矛盾的、循序而进的、首尾一贯的、有充分根据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本身（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起码应该遵守一些什么样的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甲是甲），矛盾律（甲不是非甲），排中律（甲是乙或非乙）和充足理由律。这些规律的总的意义，就在于指明凡是合理的思想，自身必须是首尾一贯的、没有矛盾的、有充分根据

的。而自相矛盾的、没有根据的思想，必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规律，主要地是思维形式本身所要遵守的初步规律，而不是思想内容，即在思想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规律。这些规律说：当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时候，我们思想本身在论断上必须注意保持同一性和避免自相矛盾，否则就要陷于思想混乱，就不能明确地反映任何客观事物。可以知道，形式逻辑和以前我们说到的辩证逻辑或辩证法是有区别的。辩证逻辑的任务是在于要考察如何应用逻辑系统，如何在思想上、理论上来概括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辩证逻辑也研究正确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但它是把思维的形式当做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在人的理性认识过程中的反映形态来加以研究的，因此它的研究比形式逻辑更着重于和更密切地联系着人的思想所反映的客观内容。列宁论到辩证逻辑时，说："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哲学笔记》第181—182页）列宁指出，辩证逻辑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同上，第67页）。因此，辩证逻辑就是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运动在人的思维领域中，在逻辑形式中的反映，这样，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人的思维所要反映的一切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作为主观辩证法的辩证逻辑和作为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指示我们，要在思想上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必须首先考察它的内部矛盾性，它的各个对立方面，必须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来反映这些矛盾

和它们的各个对立方面。所以，就形式逻辑的要求来说，合理的思想首先必须避免对于事物的论断上的矛盾。就辩证逻辑的要求（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的要求）来说，合理的思想必须肯定和必须在理论系统上来反映事物的矛盾（只在日常生活及范围狭小的过程的认识上，由于可以把过程中的事物暂时当做不变的东西来看待，才不必一定需要去考察它的矛盾，虽然在实际上，日常生活范围内的事物，也是辩证的，也是包含矛盾的)。这就是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的基本的区别和联系。由此可见，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正确的思维所需要的东西，不能用形式逻辑代替辩证逻辑，也不能对形式逻辑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应该再说一遍：我们说形式逻辑的规律，例如同一律（甲是甲)，主要地是思维形式本身的规律，但这决不是说它仅仅只有纯粹形式的因素而丝毫也不反映客观事物的任何一点内容。上面说过，就是形式逻辑的规律也是反映了事物之间的某些简单的关系的，但它所反映的主要地只是客观事物的相对静止的方面，而不是反映事物的绝对的、运动发展的方面的规律。形式逻辑的规律之所以具有普遍的意义，就是由于事物的相对静止方面也是普遍地客观存在的。同时，形式逻辑之所以有局限性，它之所以不能成为客观事物及人类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主要地只是思维初步规律的科学，它之所以只能作为初级的思想方法的科学，而不能像辩证逻辑那样成为一种世界观和高级思想方法的科学，就是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观内容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的时候注意到它这个局限性，那它就不至于与辩证法相矛盾，就不至于陷于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错误，这样它就是一门具有一定实践意义的思维科学。所以，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并不是一件东西，形式逻辑是一门思维科学，而形而上学则是一种片面

的、不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错误，就在于把相对静止的东西夸大为绝对的东西，把事物的相对同一性夸大为绝对的同一性，因此在同一性中看不见任何对立，在对立事物中间也看不见任何同一性。形而上学把主要只应用于思维形式本身的规律夸大为一切客观事物的共同规律。依形而上学者看来，思想本身的论断形式所要遵守的规律，和我们在理论上去概括各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所要注意的规律，好像应该完全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不但在思想的论断上必须避免自相矛盾，而且在观察事物的时候也不容许揭露矛盾。这当然是错误的。

形而上学不能够依据事物的内在矛盾来揭发运动发展的根源，把发展的原因归结到事物的外部。和这相反，辩证法从事物内部矛盾中找到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源，这样就证明了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事物自己的运动。这就是说，要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只要在事物自己本身内部就可以找到说明的原因，用不着请上帝或其他精神的、主观的力量来帮忙。由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形而上学的方法不能保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彻底性，只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才可能成为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但是，辩证法虽然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的外因观点，或外因论，它并不因此就完全排除事物发展的外因的研究，以至于陷入到把内因看做发展的惟一原因的另一片面观点。辩证法要求我们在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和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事物，也就是同时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不过内因和外因不是居于同等的地位，事物的内在矛盾（如果广义地使用联系这个名词时，也可以叫做内部联系），是事物发展的第一性的原因，而事物的外部联系，只能算第二性的原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最后地经常地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外因对于事物的发展有或大或小的影

响，有时可以起很重大的影响，甚至于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情况下可以说也能起决定的作用，但外因的任何影响都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事物发展的最后决定作用是在于内因，而不是在于外因。

上面说过，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真正了解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在基本上理解了辩证法，也就是在基本上了解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科学。所谓真正了解辩证法的规律，主要不是在于能够举例来证明这个规律，而是在于——如列宁所说的——要把这个规律当做认识的规律，当做指导认识和行动的方法来加以掌握。这就是说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适当的斗争方法。

怎样叫做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主要地就是要把握住上面说过的“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这个原则。每一事物都有它的具体特点，而这具体特点归根结底是由它的矛盾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在观察和分析的时候就要把主要的注意力用来找出矛盾的特点，只有掌握了矛盾的特点，才能避免观察的表面性，才能找到适当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同时，每一事物的矛盾都是复杂的，所以在观察分析的时候，必须对矛盾的各方面都要加以考察，也就是必须注意分析的全面性原则。具体的分析和全面的分析是分不开的，没有全面的分析就没有具体的分析。

为着要在观察和分析矛盾运动的时候能够掌握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要保证分析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必须依照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所指出的，要弄清以下的一些问题：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问题。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二)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矛盾，或一切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表现为对立的统一。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矛盾的其他原理也是一样），并不是人的思想主观地凭空想出来的原理，而是全部人类的认识历史、特别是全部科学的发展历史证明了的事物的客观本质，这个原理本身就是一切科学成就的最普遍的概括或总结。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科学，都是研究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过程的矛盾运动的学问，科学的进步和事物的新的矛盾方面的揭露是分不开的。科学家一旦只要离开了矛盾的分析研究，把它的研究对象看做没有矛盾的东西，就要使科学的进步遇到障碍。列宁曾简单地概括过各种科学所研究的一些基本矛盾。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离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哲学笔记》，第 362 页）

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证明科学是要研究事物矛盾运动的。在生物学中研究遗传及变异的矛盾（同时把生物看做是与自然环境有机地联系的统一体)；大脑生理学研究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的矛盾，兴奋及抑制的矛盾；现代物理学中的许多新发现，如不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根本无法理解，如光的两重性质——波动性和粒子性，电子和光子的互相转化，原子中包

含电子和质子的对立，电子和质子又各有阴电子、阳电子，质子和反质子的对立；此外还有中子和反中子的对立；质子和中子又有内核和外壳的对立等等。

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就是充满了矛盾运动的过程，而首先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的矛盾运动过程和阶级斗争过程。不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矛盾，就不能把对社会的研究提高到科学的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力求掩盖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特别是阶级斗争。而一切否认阶级矛盾的社会学说归根结底都被历史的发展事实所粉碎。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有许多政治错误的思想原因，就是由于忽视阶级矛盾（如右倾机会主义）或不能够认真地具体地分析阶级矛盾，因而使主观的认识离开了客观实际，产生了主观主义的缘故。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根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表现。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就不可能科学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

不但一切事物都有矛盾，每一事物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贯串着矛盾。德波林派、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曾认为事物的发展开始时候只有差异而无矛盾，早已受到批判。差异就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差异已包含矛盾的因素，不能说差异不是矛盾。例如中农的各阶层的差异，就包含着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矛盾的因素，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速度上的差异，实际上已经是矛盾。矛盾可以表现为种种形式，差异、对立、冲突等等。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矛盾的运动，不过矛盾的表现在开始的阶段到最后的阶段，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形式而已。

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为着要使我们在考察一切问题的时候能够在方法上把握到一个正确的总的方向。这个总的方向指明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正视事物的矛盾，要肯定矛盾的存在，并认真地加以揭露；不要害怕矛盾，回避矛盾，否认矛盾，或掩盖矛盾。既然矛盾的规律对于一切客观事物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在考察任何事物的时候，都必须从分析矛盾着手，都必须从统一物中去揭露它的内部各方面的差异和对立性。能够这样做，在研究方法的总的方向上就符合于从事物本身的联系上去把握事物这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因此也就是正确的。如果忽视矛盾的分析研究，就要在根本方向上发生错误，就有陷于主观主义的危险。例如，既然知道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在人类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因此，对社会任何一部门的科学研究或对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的研究，都必须相应地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分析着手，否则一出马就会和科学的要求背驰。又例如，既然知道了阶级矛盾在一切阶级社会都普遍地存在，因此在研究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形态的时候，都必须首先注意到阶级的分析。忽视阶级分析就一定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农村调查》的序言）。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就解决了这个革命全时期的基本的战略策略问题，原因就在于此。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指示我们，矛盾不只存在于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存在于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人民自己内部。虽然必须注意到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之间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忽视这两种矛盾的性质的区别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人民内部也有矛盾，否认或掩盖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承认人民内部根本利益的一致，不去积极研究和解

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是违背了矛盾的普遍性原则，这当然是不对的。

还应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经常自觉地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唯物辩证法，首先就是应用矛盾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首先自然是要在思想上不害怕矛盾，不回避或掩盖矛盾，而要勇于去揭露任何工作中所存在的矛盾。而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行动上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来及时地揭露矛盾，使某些隐蔽的，或萌芽状态的矛盾，成为人人容易看清楚的显著的矛盾。就像自然科学上用显微镜来揭露不易看见的物质世界的秘密一样，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要在必要时采用政治的显微镜的方法来揭露事物矛盾的秘密。只有在群众面前及时揭露一切必须揭露的矛盾，才能动员群众共同来想办法为解决矛盾而进行斗争，才能迅速地推动工作前进。中国人民过去在三十几年的短短时期中，能够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之后又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能够及时地在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每一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并动员他们起来进行斗争以解决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一般的方法向导，但有了一般的方法向导，只是说走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不等于已经具体地解决了如何走法的问题。一般原理并不能直接地解决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问题，还必须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之下，对于所要研究的事物对象本身特点和复杂的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把握矛盾的普遍性这个总的方向之下进一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的复杂内容。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矛盾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使

它们之间互相有所区别。至于矛盾的普遍性，则是指各种矛盾的共同点。矛盾的特殊性又叫做矛盾的个性，矛盾的普遍性又叫做矛盾的共性。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既有其特殊性或个性，又有其普遍性或共性的。各种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本身都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或个性，但这些矛盾同样都是阶级矛盾，这就是它们的普遍性或共性。自然界的矛盾和社会的矛盾是大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特殊性的分歧是极大的，这是它们各自的特殊性或个性，但不管它们分歧怎样大，我们都同样地可以把它们叫做客观事物的矛盾，这又是它们的普遍性和共性。各个国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都有它们各自的特殊的道路，各自的特殊的问题或各自的特殊的矛盾，所以，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都有一定的个性。但一切国家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走一条共同的基本道路，也就是十月革命所开辟出来的基本道路。在这条基本道路中一切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或矛盾都有共同的性质，如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必须在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推动广大人民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等等。这些就是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矛盾的普遍性或共性。由于客观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所以矛盾分析方法可以作为研究事物的普遍的方法，由于事物矛盾同时又具有特殊性，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同时必须从实际事物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样才可以抓着事物矛盾的具体特点。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发自然界或社会的一定过程、一定方面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学问。科学研究必须以矛盾的普遍原理作指导，但科学分类中的每一部门的研究，都

必须要揭发这一部门本身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当然这是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一般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种科学，不过它和一般的科学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是世界一切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矛盾运动规律，而一般科学所研究的，是各种事物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人们研究任何一种具体事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把握它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这样的研究就失去科学的意义。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企图把一个科学部门的特殊矛盾规律，简单地移用到其他部门，而不注意其他部门所要研究的矛盾的特殊性。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有所谓“生物社会学”，它之不能成为科学，就是由于把生物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矛盾混淆不分。单纯用地理、人口等自然条件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社会学说之所以错误，原因也和这相同。

所以，科学的研究要求认真地区别不同事物的不同矛盾。如：不同的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矛盾（如自然和社会），同一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着的不同发展过程里也包含着不同的矛盾（如社会运动形式中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同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矛盾（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阶段和垂死阶段）。如果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不能把握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矛盾的特点，我们的思想就不能保持科学的正确性。不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都是由于忽视矛盾的特殊性而陷于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把矛盾的普遍原理当做直接解决一切具体矛盾问题的死公式，不知道在应用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来作为观察问题的向导的同时还应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具体实践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经验主义把局部地区的矛盾问题的特殊解决方法误认为普遍真理而到处搬用，不管被搬用到的另外地区的矛盾的特殊性。所以，不注意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然要走向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在政治上可以找

到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种矛盾各自的特殊性混淆不分的情形。这种主观主义者首先是不了解人民内部的矛盾，或不肯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因此一旦发现人民内部的矛盾时，就把它当做敌我矛盾来看待，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来处理。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时期中就有过这种主观主义的典型。另一方面，也有人忽视敌我矛盾，或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中国革命历史上历次的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路线和抗战初期的王明路线），就是这种错误的典型。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在一定的情形下可以看做是相对的。在事物运动的一定的范围内可以看做矛盾的特殊性，在另一范围内又可以看做是有普遍意义的。如阶级矛盾的规律对于全部人类社会历史来说，只是一个很短的历史过程中的特殊的矛盾，但对于各个阶级社会来说，一般的阶级矛盾规律又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较大范围内的某些特殊矛盾的规律，作为我们研究较小的运动范围内的特殊矛盾的一般的方法向导。例如我们可以把“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 55 页）这一个阶级社会的普遍的矛盾规律，用来作为研究每一个具体的阶级社会的方法向导。

普遍的东西是不能离开具体的东西凭空存在的，它是包含在具体的具有特殊性的各个事物中，作为后者的一个方面——作为后者的共性或共同点而存在着。矛盾的普遍性的知识，是许多具体的具有特殊性的矛盾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它们之间的共性或共同点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研究总是从具体的典型开始，然后从其中找出、概括或总结出一些带普遍意义的规律来。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之所以能作为指导具体问题的研究的工具，正是由于它本身是从大量具体历史事物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要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必须不要忘记认识的这一个正常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虽然必须以前人已经获得的许多矛盾规律的普遍知识作向导，但任何时候，都必须从具体实际事物的研究出发来求得对于普遍真理的具体化和真正的领会；同时还必须学会善于从自己周围的特殊事物的分析研究中，独立找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知识，作为在进一步的实践过程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导。例如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依据阶级斗争的普遍矛盾规律来研究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揭发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特殊性，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是敌人，其余的阶级是不同程度的朋友。这一个在当时阶级斗争中分清敌友的特殊规律，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具体发展时期来说，就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向性的原理。所以，认识矛盾的过程，是从实践中的具体的特殊矛盾的分析开始，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规律，又用这个普遍的矛盾规律进一步去研究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然后又从其中找出较为普遍的规律，作为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的指导。如此不断反复下去。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认识发展过程。依循着这个认识的不断前进运动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也要善于不断地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地不断充实和发展我们的知识，使我们的认识能够经常跟上和有能力指导不断发展着的实践行动。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必须遵守的认识运动规律。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只知道死守着一些现成的普遍原理，既不能够从有特殊性的具体事物中独立地概括出普遍原理，也不懂得应用普遍原理

到实际生活中时必须使它和实际生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如何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首先必须仔细分析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然后把各方面的分析综合起来，才能把握矛盾的整体，即矛盾各方面在总的联系上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这样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就是指的上述意思。

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首先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在革命运动中起着作用的各个阶级（买办、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本身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对各阶级之间的总的关系，即矛盾的总体的特点做出结论，肯定地主、买办阶级是和帝国主义勾结的革命的敌人，而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中产阶级的左派可能成为朋友，右派可能成为敌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从而规定了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这就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最好的范例。这个范例告诉我们，首先要有精细的正确的分析，然后才能够做出正确的综合。反过来说，不分析或不能认真地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也就不能了解矛盾的总的联系上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首先是就矛盾各方面的分析而言，同时也是就分析之后总的综合而言的。主观性是由片面性、表面性产生的。"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不懂得要把矛盾的各对立方面都加以分析研究，只注意矛盾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

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矛盾论》）这些都是观察的片面性的表现。目前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也可以找到这种片面性的例子，例如只了解发展重工业是重点，而不了解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性；农业生产中只注意到发展粮食作物的重要，不知道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的重要，或者是相反；有些人在文艺上重视提高，不注意普及，有些人注意普及，又忘记了提高；强调民主的时候不注意集中，强调集中的时候就忽视了发扬民主；等等。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的过程中，有的人只注意到他的错误的一面，而不注意到更重要的他的伟大功绩的一面。《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就是为了反对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在各国人民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普遍真理，不知道自己国家的革命的具体实践，看不见自己国家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面，以重视自己国家人民革命的具体实践和民族特点为借口，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在革命运动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的机会主义，也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因为不论“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都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只注意到对立面的一

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都不了解对立的同一性，都是思想的片面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反对片面性同时也要反对表面性。“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矛盾论》）所以，要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客观的矛盾运动，必须对事物的矛盾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分析。

如何分析矛盾的各方面？分析必须把事物放在相互联系中来分析。要“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同上）所以，矛盾各方面的分析决不是离开综合孤立进行的。分析是综合的前提，又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是以综合为目的的。所谓分析必须以综合为前提，就是说在分析各方面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所分析的是对立统一体的各方面，要注意到每一个方面都是在矛盾总体中间有机地和其他方面联系着的部分，而不要把任何一个方面当做孤立的部分来加以考察。例如研究生产力时必须注意到它只是整个生产方式的统一体中和生产关系对立的一个方面，研究一个阶级时必须注意到它是全社会阶级关系中与其他阶级对立的一个方面。因此，分析就必须在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就是说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某一方面的特点的时候，不外就是要研究它在矛盾的总体中的地位，研究它和矛盾的其他方面的关系的特点。例如要了解生产力的特点，无非就是要指出它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对于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要了解无产阶

级的特点,就是要指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被剥削的阶级,是担负着领导其他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阶级,等等。所谓分析以综合为目的,就是说我们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点,正是为着要通过这个分析来了解矛盾的总体的特点。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一个包含着许多矛盾的复杂的过程中，不仅仅要一般地研究其中各个矛盾的特点,而且要研究许多矛盾中哪一个是主要的。主要矛盾问题的研究,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一个不可少的方面。因为在许多矛盾同时存在的情形之下,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找着了主要矛盾,就能掌握解决复杂的事物的矛盾运动的中心环节或主要关键。所以遇到包含着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时，必须用全力找出主要矛盾。一般地说，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所遇到的矛盾，没有不是多少带有复杂性的。因此，寻找主要矛盾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的一切工作、实践中到处都要遇到的普遍而重要的问题。找着了主要矛盾，就抓着了工作实践的中心关键,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而工作就可以迅速地向前进步。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曾指出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有着三种情形：(一）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形；（二）人民大众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形；(三)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形。这三种主要矛盾的情形在中国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过程中，都曾出现过。

如何把握主要矛盾？研究主要矛盾的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各

点：

首先，说每一复杂的过程中主要矛盾只有一种，这并不等于说这种主要矛盾只是由一个矛盾所构成。主要矛盾只有一种，一种主要矛盾，通常自然是互相对立的两个矛盾方面所构成，但就中国革命的上述例子来说，在复杂的情形下面，这种矛盾的每一个方面也不是单纯的，它也可以由几个矛盾方面所构成：如人民大众包含工人和农民，人民大众的敌人方面包含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及其他反动派等等。

其次，要注意到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矛盾是随着事物的发展条件的不同而会发生变化的，它可以因时因地而有不同。要善于注意到这个变化，尤其要学会尽可能早地预见到这个变化，以便对我们的行动给予及时的指导，使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有准备地从容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否则我们在行动中就找不到中心任务，就要在工作中犯错误。例如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曾经历过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不同，就是由于主要矛盾有了变化，就是由于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具体的中心环节有了变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国内广大人民的革命势力与英日等帝国主义者所支配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矛盾，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是代表人民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转变为工农革命势力及其他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的矛盾，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多次“围剿”的反“围剿”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又转变为全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革命斗争的中心环节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的反动

势力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革命战争的中心环节是人民解放战争。这四个时期各有其特殊的主要矛盾，但四个时期都是同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不同时期，所以它们中间又有着一个共同的主要矛盾，即全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都贯串着的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某些时期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者不善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曾经在革命斗争中犯过重大的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是由于看不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主要矛盾的转化而发生的。“九一八”以后，主要矛盾已开始由国内的阶级斗争转为对国外帝国主义的斗争，王明等人看不见这个转化，这是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产生的原因之一。1949 年人民解放战争获得胜利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就转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最初一个时期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解决矛盾的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改变生产关系，是要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总的目标之下把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改造成集体的生产，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1956 年，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获得了基本胜利，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经济上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国内主要矛盾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斗争已得到基本解决。1956 年，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基本胜利，国内的主要矛盾又转化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集中

全国力量来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就成为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

再次，在特别复杂的矛盾问题中，要区别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谓基本矛盾，就是在过程发展长久时期中对于全过程的特点起决定作用的一些主要矛盾。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形成了全时期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过程的主要矛盾。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主要矛盾却各不相同，在这里所说的主要矛盾，只是全过程的各个阶段或各个时期中起主要决定作用的矛盾，这里的主要矛盾只是基本矛盾的一部分，或者有时是非基本的矛盾，而不是长时期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全部。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两个基本矛盾：（一）在国外，是帝国主义和我国人民的矛盾；（二）在国内，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些基本矛盾在新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未被打倒和国内资产阶级未被消灭以前，也是全过程的主要矛盾，但如果说的是这全过程的各个时候，那么它们是基本的矛盾，而不是在各个时候都是主要的矛盾。在全过程的各个时候，有时国内矛盾是主要的，有时国外矛盾是主要的。国外矛盾是主要的时候，也不是对一切帝国主义者而言，而常常只是对一个或两个帝国主义者而言，如在抗美援朝时候主要是对美国。就国际问题来说，在我们当前国际斗争中间，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注意到："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是，在这个根本矛盾的基础上，

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国家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也可以成为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问题，但这样的矛盾问题不带有根本性质，它只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同上）

在分析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或主导方面的问题。矛盾的各对立方面是具有着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的性质的，因此它们在统一体中通常都不会处于平衡发展的状态，在一定的时期或一定条件之下，其中必有一方面居于支配或主导的地位，这就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或主要的矛盾方面。认识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要性是在于：（一）它决定着事物的性质，依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认识事物的性质的变化。（二）它是我们决定解决矛盾的斗争方法的根据之一。

依据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在实质上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的过程，在旧事物的内部发生矛盾，出现新的东西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时期之内是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在量变过程中它的地位逐步发生变化，由于新事物具有一定要发展起来的优越性，因此它终于会改变自己的被支配地位而进到支配的地位，这样事物就发生质变。例如过去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后者在国家的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居于统治地位，那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了国家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社会变为独立自由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社会。自然界也有相同的情形，铁元素混合着较多的碳元素，就是生铁，用熔炼方法把碳元素的成分适当减少，生铁就变成钢。生物的品种在繁殖过程常发现新的变异，出现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如果发展起来，成为显著的优势的特征，生物就由一个品种变为另一个品种。

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矛盾论》）。关于主要矛盾的研究的意义，上面已经说过了。就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来说，这个意义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来：第一，为要保证我们的革命运动的一定的质，必须力求使矛盾的一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中，必须极力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向着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方向发展，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保持贫农的优势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使运动真正得到胜利。在农学上的定向培育方法，就是要通过人的努力，使生物的某些新的特征发展为固定的优势的特征，以保证人所希望的好的新品种的出现。炼钢的人要善于掌握火候，使得炉内的氧化作用主要地只限制在生铁内炭素方面，而不至于对铁的本身也发生显著的氧化作用，等等。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是我们规定战略战术或斗争方法的根据之一，例如在敌人统治强固的时候采取防御的战略，在相反的情形下采取进攻的战略等等。

根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来决定战略战术时，必须注意到

矛盾主要方面因时因地的变化。及时看到矛盾主要方面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保证我们战略战术上及时地采取相应的适当布置。全面地注意到矛盾主要方面因地点条件不同而不同的情形，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能够掌握照顾各方面的周密的指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在战略上它是经常能采取进攻、“围剿”的行动，这时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就采取防御、反“围剿”、内线作战的战略。但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的战役或战斗上，由于敌人兵力的分散和革命军队集中了优势兵力，又可以采取进攻和外线作战的行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互相结合的巧妙的指导（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种巧妙的指导的掌握就需要善于观察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时因地变化的情形。

四、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所谓事物的矛盾，就是同一事物内部分裂为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各对立方面。所以，我们研究事物矛盾的运动，主要地就是在于要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的情形，也就是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现在我们就要专门考察一下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要着重掌握一个普遍原理，即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对立的同一性（或统一性、一致性），有两方面的意义：(1)对立的两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同处在统一体中；这样，对立乃是同一事物内的对立，所以互相对立的方面具有同一性。(2）矛盾着的双方依靠着一定的条件，而向其对立的方面转化。研究对立的同一性的主要意义，照列宁的

说法，就是这样的："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哲学笔记》第111页）事物之所以能够向对立方面转变，正是由于事物内部原来就包含着矛盾。事物内部包含着矛盾，包含着互相依赖和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对立面，并通过斗争、能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这就是对立的同一性的基本意义。恩格斯说："辩证的思维，不过是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自然辩证法》第174页）这也是对立的同一性规律的概括的说明。

形而上学把对立看做绝对的对立，在对立中间看不到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又把同一性看做绝对的同一，而看不见统一体中包含着矛盾。辩证法的看法是："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矛盾论》）否认对立面的同一性和否认同一性中包含着对立性都是片面的，错误的。这在前面我们已批评过了。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体。没有矛盾的事物，不是作为对立面的统一体的事物，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最简单的事物，譬如一张白纸，也起码有它的正面和反面，复杂的事物就更不用说了。事物之所以能成为对立面的统一体，就是由于它所包含的各对立方面是在一定条件下有机地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彼此互为存在的条件的。首先它们是互相对立、

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着，但由于它们在一定条件之下彼此互相依赖，由于在这样的条件下对立的一方离了对方，自己也不能存在，因此，它们就不能不共同处在统一体中，不能不作为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存在着。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没有恶不能显出善，没有丑不能显出美，反过来也是如此。生与死，战争与和平，也有着这种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力学上的作用和反作用，电学上的正电和负电，化学上的酸和碱，生物学上的遗传和变异，微观世界的波动性和粒子性，原子内的电子和质子等，这些都是自然界中间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的对立方面的显著的例子。在人类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矛盾而又互为存在的条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互相对抗的阶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就有着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首先是资产阶级依赖剥削无产阶级为生），在新中国条件下又有着另一种的一定时期一定方面的相互依赖性。马克思主义有它的普遍真理，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但各国人民的革命有它自己的具体实践过程，这些过程又有它自己的民族特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在各国人民中必须通过各国民族的特点来实现，这也是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表现。专政和民主是互相对立的，但工人阶级专政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的民主，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不能真正建立强有力的工人阶级专政，反过来说，不坚持工人阶级专政，广大人民的民主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没有坚强的工人阶级专政，民主会要被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少数剥削者所利用。与专政和民主相联系的是权威和自治的对立的同一性。工人和农民联盟，中国的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都是社会生活中在一定条件下（首先是在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对立方面具有同一性

的重要的例子。对立的同一性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普遍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一定条件之下的某些对立方面的统一体。事物内部的对立方面既然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同一性的，都是彼此互为存在的前提，互相依赖的，因此，这种同一性，在一定条件之下也是事物发展的不可少的要素。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相反相成”，这就是说的对立的同一性。所谓相反相成（严格地说，相反的东西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相成），就是说对立的双方在发展过程的一定条件下面，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相互激荡的作用，一个方面的发展，往往有赖于另一方面的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得事物的顺利发展，就必须保持这个条件之下对立双方的一定的联系，如果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这个条件下所需要的适当的联系，那么，发展的进程就要受阻碍。所以，对立方面的互相依赖，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为一定的互相制约的作用：这一方面的发展，依赖另一方面的存在和发展作为条件。对立方面的斗争固然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对立方面的同一性，在一定情形下也是事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个原理，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要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地完成任务，较顺利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不但首先要注意到对立方面的斗争，要通过斗争来推动发展——这是根本的——而且要善于掌握和利用对立方面的一定条件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善于巧妙地应用对立的同一性的原理，也就是要善于依据一定条件的需要来掌握对立面的正确的适当的联系，使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都能充分发挥它可能发挥的积极力量，甚至于使矛盾的消极方面也在一定可能条件下（首先是必须通过斗争）和一定的程度上供积极的力量所利用。这样就可以使事物的发展获得最大的推动力，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中的阻碍和获得最多的成就。

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为例来说，例如轻工业和重工业是工业本身内部互相矛盾着的对立方面，工业和农业也是国民经济中的互相矛盾着的对立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但是，轻重工业以及工农业之间，不但有着互相对立的关系，而且又有着彼此互相依赖的关系。如果过分地强调发展重工业，以至于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完全忽视了，结果还是要妨碍重工业的发展。因为，轻工业和农业都需要从重工业获得生产资料，农村需要从工业获得各种工业品，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这种需要增大，这就能反过来促进重工业和一般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投资获利较快，能使国家迅速积累起大批资金作为建设之用，农业是城市和工业的粮食和原料的来源，这些都说明重工业的发展，又有赖于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国家的计划必须正确掌握轻重工业、工农业的相互依赖关系，既要保证重工业发展的优先地位，又不轻视轻工业和农业的重要作用，并依此原则在两者之间建立正确的发展比例或平衡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有其他许多矛盾，如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工农业与商业、运输业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矛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各方面中间都具有着对立的同一性。在我们制定国家计划，规定各种政策的时候，都必须依据上述对立的同一性的原则，来在这些矛盾的各方面之间建立在一定条件之下的某种正确的联系，保证充分发挥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作用，使它们中间的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出来。1956 年毛主席提出解决十大关系问题的

指示以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决议，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巧妙地应用了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原理。按照这个方针去从事工作，一定能够把全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使我国顺利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走上先进的工业国的道路，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事物的矛盾存在着两种情形：第一是新生的和衰亡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前进的积极势力和阻碍前进的消极势力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同一新生的、前进的势力或衰亡的、消极的势力内部各方面也存在着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工农业建设的矛盾，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的矛盾，就是前进势力内部的矛盾，在这些矛盾的内部各对立方面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我们在工作中之必须掌握这方面的关系，是很显明的。但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就是在新生的事物和衰亡着的事物之间，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事物的衰亡着的方面，在它未消灭之前，在一定条件之下和一定的程度上，在新生事物对它进行坚强斗争的情形下，也能出现某些因素可以为新生的方面所利用。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是衰亡着的方面，但在我们过渡时期就在反对它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各种丑恶方面的同时，又利用了它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因素。民族资产阶级的某种程度的爱国思想，在改造资产阶级的全部过程中一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因素之一。就是完全反革命的阶级，当我们和它们斗争的时候，它们内部的矛盾也可以成为我们战略策略方面争取胜利的因素。斗争失败使我们遭受损失，但在失败中可以取得教训，在这样的条件下，失败中就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说“失败为成功之母”。犯错误是不好的，但犯了错误就有可能学会

避免错误，错误成为我们的先生，在这样的条件下，错误里又有了积极因素。毒草是有害的，但把它锄了之后，又可以把它转为肥料，这就有了一定的益处；丑的东西是不好的，但它的存在，在一定情形下可以通过对比而使美的东西更为出色；坏事在一定情形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的进攻，自然是坏事，但它的进攻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凶恶面目，给人民做了很好的反面教员，推动人民提高觉悟，加强组织，昂扬斗争意志，这就恰恰又帮助人民来推翻它自己，所以，蒋介石集团的穷凶极恶是它自己垮台的一个原因。美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横行霸道，它的种种张牙舞爪的侵略行为，结果是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所以，对立的同一性是辩证法的普遍原理，是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应该而且可以广泛应用的方法原则。有的人否认对立的同一性这个普遍原理，认为根本对立的东西之间不存在同一性，这是完全违背辩证法的。其实一切矛盾着的对立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相互间都可以说是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而它们之间都是具有着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革命工作者首先应该有坚决反对敌人的斗争性，但同时也应该有善于利用和发挥一切矛盾方面的任何可以利用和发挥的积极因素这一种灵活性。不注意对立面的斗争性固然会陷于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应用对立面的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也有走向“左”的冒险主义的危险。中国革命史上的“左”的冒险主义领导，在方法论上就是陷入了忽视对立的同一性的错误。必须善于掌握和应用对立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作用，不能认识和掌握一定条件下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赖作用，或只看得见正面事物的积极作用而完全看不见反面事物的任何可以利用的因素（当然也要注意，这种因素，并不是反面事物本身的主要的东西，而

只是它的次要的方面，并且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的因素。例如毒草的主要作用是它的有害的方面，仅仅在把它铲除了的条件下它才可以发生肥料的作用)，这是思想的一种片面性、表面性，也就是主观性的错误来源之一。

对立面的同一性，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也表现在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上。或者说，由于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有着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的作用，所以，发展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出现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最明显的例子，如休息和工作，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工作时就不能休息，休息时就不能工作，但两者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不休息就不能工作，不工作也没有休息的必要，就由于这个互相依赖的作用，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必须在一定时候由工作转为休息，或休息又转为工作。人的左右两脚互为对立面，在走路的时候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这种相互依赖作用的表现，就是人们在走路过程中，两脚必须交替向前，而不是两脚同时向前。白天转化为黑夜，鸡蛋转化为鸡，失败转化为成功，合作化运动由量的发展转化为质的整顿巩固，战争转化为和平，被压迫的人民转化为国家的统治者，毒草被铲除后可以变为肥料，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反动派的阴谋活动被揭露后可以成为对人民有益的反面教员。在肃反运动中，首先着重指出要提高警惕（也要附带注意到防止偏差），在运动开展后紧接着又要着重注意到防止偏差（但仍然不能忘记提高警惕）。这是严肃和谨慎两方面的态度的对立同一性的表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的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它说明一切发展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要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如果不转化为对立方面就不能继续前进。因此，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必须遵守这个规律和善于应用这个规律，才不至于犯错误。这个规律

告诉我们必须注意以下的原则：一方面，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联系着的，由于这样的情形，在观察各对立面的时候就不要只看见其中一个方面事物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完全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挥的某些积极因素，同时，又要注意到对立的双方面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它们就不可能是同时平衡地起作用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这一个方面成为发展的重点，在另一个时期另一个条件下又必须比较着重于另一个方面，这样就出现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现象。我们必须自觉地把这个规律应用在工作中，主动地在工作中安排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的过程。譬如战争，在出击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主动地安排可能的和必要的转移或休整。又譬如生产运动，在苦战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考虑组织休息。应用这样的规律来安排工作，就能使工作有节奏地、同时又很顺利地向前发展。

以上所说的就是关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基本内容。但是，为着要能够正确地了解和应用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原理，必须认真注意到已经指出过的这个原则：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对立面共处于统一体中和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的情形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之下才能出现，对立面不是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能够互相以对方为自己的存在条件而共处在统一体中和互相发生转化。列宁说：辩证法是要“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就是指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这个原则。

对立方面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对方为自己的存在条件而共同处在统一体中。事物的发展有着相对静止或量变的状态和显著的变化或质的飞跃状态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在事物的相对静止的状态和量变的状态下面，对立面一般地是具有这种同一性的，而

在显著的质变的状态下，对立面的原有的同一性常常就不能继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这样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在事物的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存在的同一性，也不能成为绝对没有矛盾的完全的同一性，而只能有一定方面、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同一性。例如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但又具有同一性，思维任何时候也不能充分完全地反映存在（反映总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只能近似地反映存在，不可能达到两者毫无一点矛盾的地步，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把思维和存在看做完全同一的东西（唯心主义者常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个命题来表现他们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就是把思维和存在简单地、形而上学地看做完全同一的东西，而在实质上就是把存在归结为思维，把存在看做思维的表现，而否认了物质的客观存在）。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有着辩证法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对立的同一。生产关系是能够并且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但这种适合性的具体情形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过程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即使在有了最为适合的情形下，生产关系的发展速度还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因此也还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取得平衡，而且也可能取得这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发展过程中的平衡，绝没有任何静止的平衡。这个平衡是每年、每月、每日地不断地被突破，又不断地重新建立起来。由平衡到不平衡，再重新建立平衡，如此不

断地循环往复，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的真实过程。在这里，不平衡和发展是绝对的，平衡只是相对的，只是一个时候、一定方面的基本上的平衡。这样的平衡，要经常被破坏，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破坏后可以及时地由人们自觉地加以重新建立罢了。所以，上面我们说要善于依据一定的条件的需要来掌握事物对立面的正确的、适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这里说的“正确”和“适当”，并没有一个死的公式，而是要依据事情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联系的具体的内容和方法。要注意到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条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具体情况，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间的地位。同一矛盾的对立面，在不同的条件下，或者是在这一点上具有同一性，或者是在那一点上具有同一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同一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是在于资产阶级依靠它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来剥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为了生活不能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这种情况的主要条件就在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在我国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首先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这种情况的主要条件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资产阶级强大，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者并应用自己的统治权力对资产阶级的某些非法活动不断进行斗争。又如轻重工业的相互依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条件下是首先着重发展轻工业，然后进一步发展重工业；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下是必须掌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同时又对轻工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例子，说明即使在相对静止状态下面对立面的相互依赖也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具

体的。至于说到在显著变动的状态和质的飞跃状态下面，上述对立面的同一性就不可能继续下去，而要发生破裂。例如在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举行革命的决战的情形下，前者对于后者既然要经过决战使之归于消灭，这就在实质上失去了依赖关系了。自然，事物发生质的飞跃之后，又会在新质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质的飞跃就是由一种形式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但在质的飞跃的关节点上，旧质内部所包含的那种具体的对立的同一性在实质上就可以说是归于消失了。

再说对立方面的互相转化，这也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也同样是对立面的互相斗争的具体情况。《矛盾论》指出了石头不能转化为鸡，只有鸡蛋才能转化为鸡的例子，用以说明这个原理。革命势力在反动统治下只有把力量积蓄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由防御转化为进攻，而不是像冒险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以举行进攻。失败可以转化为成功，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失败者要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否则决不能转化为成功。一般地说，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只能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也就是说转化的因素或条件必须是预先在事物自己内部包含着和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准备起来的，因此对立面决不可能无条件地任意转化，例如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在新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劳动者（通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决不是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这样。在党所领导的“百花齐放”的政策之下，可以把“放”出来的“毒草”转化为“香花”生长的肥料，但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发生这种转化，而只是在有党的正确领导并与毒草作斗争的情形下才能如此。阶级社会可以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决不会再转化为阶级社会。唯物辩证

法决不会使希特勒和杜勒斯转化为工人阶级战士，不会使太阳明天要从西方升起，月亮明天要落到地球上来，因为在事物本身内部不存在着这样一种转化的客观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客观的具体条件来谈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也就是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讲辩证法，就会把辩证法曲解成颠倒黑白、荒谬绝伦的诡辩论。修正主义者就常常要玩弄这种诡辩论，例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硬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就是毫无根据的诡辩，因为这种企业仍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根本没有转化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条件。只有通过工人阶级革命的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它才有转化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条件，在资产阶级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说国家企业已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诡辩论。这就和我们中国古代关于“卵有毛”的诡辩一样，在卵还没有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有毛的东西（鸡等）时，就说它已经有毛了，这完全是脱离客观事实主观地玩弄对立面转化的概念的错误。列宁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灵活性，如果加以客观的应用，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哲学笔记》第 87 页）在研究对立面的同一性——对立面的互相转化问题时，必须特别注意列宁的这一段话。

对立的斗争性，即指对立面之间的互相排斥的性质。说对立面具有同一性，说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互为条件又互相转化，这意思决不等于说对立面互相间是完全处在折衷、调和的地位上，可以没有任何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情形。相反地，对

立的同一性中同时就存在着对立的斗争。“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矛盾论》)。不但如此，对立的同一性只在一定条件一定运动状态之下和一定范围之内(在某一方面或某些点上)才能存在，而对立的斗争性则是在任何条件之下和任何运动状态之下贯彻始终和贯彻各方面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对立的斗争性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停止斗争，即是发展的停顿，不与错误斗争，真理就不能发展，不与恶斗争，善就不能发展，不与丑斗争，美即不能发展，不与“毒草”斗争，“香花”就不能发展。对立的同一性之所以能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在于这同一性具有在一定情形下推动斗争、推动解决矛盾的作用。前面说过的反动派的进攻能刺激革命人民起来打倒反动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此外美和丑的对比，一方面使美得到丑的对照而益显其美，这是同一性，同时又使两者互相排斥，是斗争性。工作中的评比方法，使先进工作和落后工作通过比较而益更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这是相反相成的同一性，而这样的比较同时又是推动工作人员互相竞赛的方法，这又是斗争性。实际上，没有斗争的情形和发展停顿的情形在客观事物中是任何时候也不会真正存在的。“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矛盾论》)。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谈谈辩证法问题》)。

前面早已说过，所谓矛盾，就是事物自己内部分裂为对立的方面，其中包含着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方面和阻碍事物发展的方面。如果不通过斗争，使积极的方面克服消极方面，矛盾就不能解决，事物就不能前进。所以，发展的过程，主要地就是通过对立方面的斗争不断克服事物的消极方面的过程，是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矛盾不断地产生、不断地揭

露和不断地解决的过程。这就是对立的斗争性为什么具有绝对意义的一般的理由。资本主义制度里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是消极的反动的方面，不消灭资产阶级就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就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在它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共产主义的因素，这些都是它的积极的方面，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某些资本主义势力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于人们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灭，这就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方面，必须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中间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逐步地克服这些消极方面，才有可能保证将来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事物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具有互相转化的同一性。资产阶级在封建末期是革命的阶级，当它推翻封建制度自己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就逐渐转化为反动阶级了。再举民主集中制的矛盾来说，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积极的因素，但如果把民主过分强调，以至于脱离集中的指导，就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就变成消极的东西，这时就要强调集中，对极端民主进行斗争，以克服它的消极破坏性。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积极的指导力量，但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以至于脱离民主的基础，这样集中又会转化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消极的东西，这时就要开展民主，和官僚主义作斗争，以克服它的消极性。这里有两种解决矛盾的情形，一种是新生事物与衰亡的事物，前进的事物与阻碍前进的事物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情形，例如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矛盾的情况来说，当资产阶级转化为消极方面的时候，就必须通过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把这个方面消灭，才能克服矛盾。另一种是同一新生事物内部矛盾的解决情形，例如就民主和集中的情形来说，

它们任何一方面之所以成为消极因素，是因为和另一方面失去了必要的、适当的、正确的联系，这时就要通过斗争，使它们之间的正确联系重新建立起来，使它们通过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作用而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就能克服矛盾。世界上一切事物矛盾的克服情形，不属于前一类，就属于后一类，如真理和谬误的矛盾，必须消灭谬误，才能得到克服，这是属于前一类。轻重工业或工业农业之间的矛盾，必须使它们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系、适当的发展比例和平衡关系，才能克服，这是属于后一类。不管哪一类的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得到克服，这也是斗争的绝对性。

在对立的同一性破裂的情况下固然有着斗争，在对立的同一性还存在着的情形之下，仍少不了斗争。并且，对立的同一性还是在一定的斗争基础上的同一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论》）。没有斗争，对立方面就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共同存在于一定的统一体中。因为对立方面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的，它们的共同存在经常并不是在平衡状态下的存在，即使说有平衡状态，一般地也总是以一方面为主导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不通过斗争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即使建立起来了，又由于对立面的互相排斥而趋向动摇和遭受破坏，因此又要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在一定条件下再建立起来。因此同一性、平衡，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例如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历史证明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就是通过多次的斗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轻重工业之间的平衡状态，是在重工业的优先地位之上的平衡状态。没有一定形式的，随着矛盾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的斗争，即不能实现以一方面为主导的平衡状态。由于斗争发展的情况不同，矛盾的主

导方面会发生互相转化。只有在斗争的一定情形下，才能保持某一方面的主导。所以也可以说同一性是对立面斗争的一定情形之下的产物，同一性以斗争性为基础。例如在统一战线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必须经过斗争，才能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如果不进行斗争，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就有可能失去领导权的危险。至于说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问题，那么，没有斗争，就不能实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这是很容易明白，不需要多加说明的。

关于对立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以上原理，告诉了我们在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学会善于观察一定条件之下对立的方面的相互联系，善于掌握这种联系，以便充分利用和发挥它们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作用来推动工作的前进。（在掌握事物的相互联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到它是有条件的，同一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系更不一样。前者的例子，如同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就有所不同，后者的例子，如轻重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敌我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根本不同。轻重工业之间有着经常的相互依赖的作用，相互推动向前发展，敌我之间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常相互依赖的作用。敌我之间可以有一定条件之下的暂时的妥协，敌人的进攻可以激起我们的反抗情绪，提高群众的斗争觉悟，这虽然也是一种可以注意并且可以利用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作用，但和轻重工业的相互依赖作用是显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坚持斗争，要反对调和主义，要特别重视斗争的绝对性。在一定条件下掌握对立方面的具体的相互联系和坚持斗争这两者不但是不能分开的，并且也是互

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也就是说，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同一性。前面说过，对立的同一性在一定情形下也有推动斗争的作用，这是由于对立面的相互依赖的作用使双方的斗争力量互相促进，使斗争向前发展，使解决矛盾的斗争过程趋于成熟。同时，对立方面的一定条件下面的联系，其目的有时正是为了进行斗争。例如为了解决一个主要矛盾，打击一个主要斗争对象如帝国主义，就要联合次要矛盾方面（如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上规定了要争取“中间势力”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的哲学解释，就是指为了解决主要矛盾而联合次要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意思。同时，要使我们实际斗争中需要联合的对立方面能够正确地联合起来，在这些对立方面之间就必须进行一定的必要的斗争，没有适当的斗争，就不能达到联合的目的。联合中间势力就包含着斗争，这也是“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敌我之间固然要有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才能保证人民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的团结。问题只在于，敌我之间的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在方法上应该有根本的区别。敌我之间的斗争是采取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方法，外部力量冲突的方法，势不两立、谁战胜谁、你死我活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或者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是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团结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善于及时地揭露矛盾，并及时地想出办法展开斗争来解决矛盾。为什么要及时地揭露矛盾？因为只有及时地揭露矛盾，才有可能及时地动员人民来努力斗争，争取解决矛盾，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事物的客观发展过程通过人的努力而得到极大的促进力量，使工人阶级

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可能迅速地、顺利地得到最大的胜利。客观事物自己本来是会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但是，如果它的发展过程不经过人的自觉的努力来加以促进，那么，这个过程就必须发展得很缓慢，就可能发生很多曲折，就可能遭受许多破坏和损失，这叫做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过程。因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要经过人的自觉努力才能克服某些消极因素的阻碍，才能使事物的发展顺利前进。并且，由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作用，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各对立方面都会有所发展，不但积极的方面会强有力地向前发展，消极的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如果不及时揭露这些对立面的发展趋向，及时地通过斗争来克服消极的方面，那么，等到消极的方面发展到更有力量的时候，事物的前进就要受到更大的阻力，那时要来解决矛盾，就要费更大的力量和受到更大的破坏，这样事物的前进发展就会要被延缓、就要遭遇更大的困难。例如我们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后，如果不及时地揭露农村中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动员大多数人口的贫农下中农来进行合作化的运动，那么，等到富农的经济力量生长起来，那时合作化运动就要受到更大的阻力，两条道路的斗争就要花更大的代价，而合作化就要推迟了。所以，当我们研究矛盾的对立面的斗争性问题的时候，还要把握到及时揭露和开展斗争的原则。一个矛盾解决之后，立即着手揭露第二个矛盾，并及时展开新的斗争。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我们工作中的一切可以避免的曲折和损失，就可以尽量迅速地、顺利地实现我们的任务，实现我们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要把握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互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以事物发展的矛盾法则做基础的。这就是

要在斗争中、工作中不断地、及时地去揭露事物的矛盾，并及时展开斗争来解决矛盾，而在用主要力量解决当前阶段的矛盾的同时，又适当地注意到为下一阶段的矛盾的揭露和解决准备适当的条件。

五、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

对立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原理并不排斥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多样性。相反地，斗争的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应该依据矛盾的性质和各种条件的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表现的。形式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某一种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片面地看做绝对不能改变的东西，因而就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自然界事物的对立面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与社会现象中的对立面斗争形式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社会现象中的矛盾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解决方法和对立面斗争形式也依地方、时间和条件的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必须善于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工作中所遇到的矛盾，而不能用一种固定的形式和死的方法来束缚自己，这样才有可能把革命较顺利地引向胜利。例如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我们中国的方法就不是用强力一次剥夺生产资料的形式，而是主要采取和平改造即赎买的形式。

在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中，特别应该研究的是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对抗的与非对抗的。对抗的斗争形式，即是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外部冲突的形式。“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矛盾论》），都是矛盾的对抗性的表现。至于非对抗的形式，则是指一切不表现为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所以，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

争的一切形式。把一切斗争都看成对抗，这是“左”的冒险主义者的幼稚观点。对抗和非对抗这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是由不同的矛盾的性质以及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条件所规定的，矛盾的性质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对抗性的矛盾是指这种矛盾的对立面之间所处的相互地位具有可能爆发为外部冲突的性质，因此这种矛盾的解决主要地是要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对立面之间则不包含着必须爆发为外部冲突的因素，因此矛盾的解决也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对抗性的矛盾，例如阶级社会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由于两者之间在经济地位上相互处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地位，所以这种矛盾是具有对抗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属于对抗性质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两者之间的经济地位不是处在利害根本冲突的地位，相反地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种矛盾是没有对抗性的。一般地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具有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没有对抗性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除了有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个矛盾原是具有对抗性的，由于工人阶级采取了适当的政策和斗争方法，又由于在工人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下面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已不坚决抵抗，这个对抗性的矛盾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依据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不同的矛盾发展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来解决矛盾，这是保证实践行动的正确指导的一个必要条件。

研究斗争的对抗与非对抗的形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两者的联系和互相转化。对抗性的矛盾在解决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某种对抗的斗争形式（对抗形式也有各种各样，如炸弹爆发的对抗形式，军事对抗，政治冲突等等），但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之下也可以和非对抗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如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议会斗争和某些合法的公开的斗争。自然，即使是这一类斗争中也常常会包括外部冲突的形式),新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所包含的阶级矛盾，对于这个矛盾的解决,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采用批评教育的方法。但是这个矛盾本来是具有对抗性的，所以，为着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斗争形式仍免不了要包含着对抗的方面。例如“三反”、“五反”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以前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斗争。这次斗争是开始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举行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猖狂进攻，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为打退这个进攻才起来加以对抗。这次斗争就其重点方面说来就具有对抗的形式。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是经济力量极软弱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也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要求，并且长期地和工人阶级有着联盟的关系，由于他们在新中国是被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因此，即使是在“三反”、“五反”这样的斗争中，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重点的斗争——对于严重违法户的斗争——采取对抗的形式之外，又大量地把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说服教育的形式——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是说，这里又有非对抗性的方面。“三反”、“五反”以后，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主要是采取了说服教育这一种非对抗的形式。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的。但是，这种和平道

路并不是没有斗争的道路，而是自始至终贯串着种种斗争的道路。所以叫做和平的道路，只是因为矛盾的斗争不表现为军事的对抗，并且在一切斗争中都力求加强广大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而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这里说的和平道路，也决不等于说斗争形式仅仅是非对抗的形式，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是既有对抗形式也有非对抗形式，并且在决定性的斗争中，对抗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还是起着重点的作用。这里必须注意到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我们党的政策是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也就是说对他们是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的。由于我们的政策的正确，对矛盾处理的正确，所以矛盾的对抗性的表现，终归是小量的，而大量的情形则是非对抗性的。

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以对抗的形式来解决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时由于主观上的错误——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等——敌对阶级的影响之类），也往往会发生对抗的情形，甚至于矛盾的性质也由非对抗的变为对抗的。但这决不能成为主要的情形。

所以，矛盾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是能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矛盾的对抗性

或非对抗性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形下，斗争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就当然要互相转化。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已经指出过这个原理，那里面所提到的党内斗争变化为党外斗争的情形，就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城乡矛盾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例子。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毛泽东同志更进一步地总结了几十年来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国内和国际经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斗争的经验，把上述原理更加具体化和更加发展了。这个原理的发展，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它将会指导今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较顺利、迅速地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说："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矛盾论》)。这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解决矛盾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要善于依据矛盾的不同性质和它的具体发展条件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一方面不能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敌我矛盾，同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中错误地采用对抗的斗争形式，而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时候，除必须采取一定的对抗的斗争形式之外，还要善于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利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研究对立面的斗争性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原则。

（乙）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的规律

一、事物的质和量，质和量的统一

在前面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章中我们说过：事物由于自己

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正如列宁所说："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哲学笔记》209页）对立统一规律的这一个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最普遍的表现形态之一，就是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又由质变转化为量变的规律。或者简单地称做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量变和质变的规律等。这是辩证法关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第二个规律。

要了解这个规律，首先要研究一下什么是事物的质和量。

质是事物自己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事物具有它本身固有的特性，并在实质上与其他事物有所区别。所以，质又是事物之间的实质上的区别性。观察事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它的质的规定性和它对其他事物的区别性。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犯一系列其他的错误。例如在革命工作中不认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质的区别，就会犯一系列的政策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的意义，就在于要认清不同阶段的革命的质的区别，并根据这个区别来规定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政策。事物的质的区别往往在表面上是不容易认识清楚的。要认识清楚，常常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或虽然多少经过革命斗争但没有认真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锻炼的人，在一定的实际斗争中有时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的质的区别，错误地或者认敌为友，或者认友为敌，以至于造成斗争中的巨大的错误和损失。这种例子是不少的，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间，就有这种情形。质和性质、本质等是根本上同一意义的概念（参看本书第九章"本质和现象"一段）。质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表现为种种基本的

属性或特征。把握了事物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基本属性或特征，也就把握了它的质。所以，要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首先就在于确定它的某些基本属性或特征。例如说食物和毒物在质上有根本的不同，这是由于食物在被人吃下去时有供给营养的属性，而毒物则有破坏人体组织的属性。液体的水和蒸汽有质的不同，因为水有如像能溶解盐糖等物之类的许多物理属性，蒸汽则不能。钢和铁有质的不同，这表现在两者用来制造机械时有不同的属性，这种属性的不同，钢铁工人和机械工人是很熟悉的。又如个体农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阶级，因为它同时具有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等等。

质的规定性的来源首先是在于事物自己内部的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各方面以及主要方面的特点和由此形成的矛盾的总体的特点），这在我们讲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时，已经讲过了。事物与其周围的其他事物的联系，对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具体表现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是大国，这个地理条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这个具体特征就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中国不是大国，而是很小的小国，在反抗强大的侵略者时要使战争具有持久的性质就会有更多的困难。河水在水利工作不好的情形下，对于人民生活具有有害的性质，在水利工作很好的情形下，水害就会变为水利。这也是周围事物的联系对于质的影响的一个例子。因此必须研究事物的矛盾，然后再注意到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才能够对事物的质获得正确的理解。这里还必须注意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即外部联系的变化之所以能对事物的质发生影响，只是由于这种变化影响了内部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的缘故。河水本来具有着有利和有害的两个对立面，水利工作的影响只是在于使这两个对立面的一方居于主导地位。

事物除了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它的量的规定性。不具有任何质的规定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同样，只要有某种事物存在，就必定是具有一定的量的存在。质和量是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所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但质和量是不同的，质规定着事物自己本身固有的特性，因此质的区别，就是事物之间的实质上的区别。量的规定性只是指示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规模，量的不同不一定就意味着事物的实质上有所不同。同一类的事物可以具有不同的量，但仍然是性质相同的事物。量的变化，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影响质的规定性。在这种情形下，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和它的质——它本身固有的特性——似乎是不相干的，因此量的规定性有时又被称做外部的规定性，意思是说它与事物的本身实质在一定范围内似乎没有什么内部的必然联系。

但是，如果把量和质看做是完全没有相互联系的东西，那就错误了。首先，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的量，都是在一定的质的基础上的量，或者是与一定的事物的属性和特征相结合的具体的量。例如，物体的大小，温度的高低，运动的快慢，电力的强弱，波的长短，原子价的多少，生物发育生长期的长短，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产主义因素的大小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量，都是与事物的一定的属性相结合，并且是依赖着这些属性才有可能加以衡量和计算的，如量布要利用它的长短的属性，量温度依赖物体遇热膨胀的属性等，不与任何事物的属性相联系的量，只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主观中的量的抽象形态，在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没有这样的东西。抽象的一、二、三……不能作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而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个、二个、三个……具体的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的思维中关于量的抽象没有任何意义。合理的抽象使人们

能够把握到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性，科学的思维不能缺少这样的抽象。数学这一门科学正是通过思维上的抽象方法撇开事物的质的方面来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律的。数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科学。

不但实际存在的具体的量必须依据一定事物的质才能存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知道，质对于量也不是完全没有依赖关系的。在量变的一定范围内，质的规定性可以不受影响或基本上不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事物具有着质的安定性。但量的变化达到某种程度时，它就要显著地影响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这时我们就会看到它的质的安定要遭到破坏。水的液体的质的安定性在一个标准气压之下，它的温度的增减只能在摄氏表零度到百度之间，否则就要变为固体或气体。使用手工工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最高限度，要想超过这个最高限度，就只有使工具的质加以改变，即把手工工具改为机器。

这些情形告诉我们：一方面是在一定的质的基础上，量的变化有它一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说明事物的质规定着它的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一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又以一定的量的活动限度作为必要的条件，量变在这样的限度内保证着质的安定性。量变突破了这个限度，事物的质的安定性就要被破坏，就要转变为另外的质。在这里，质和量是互相依赖的，是具有着统一性的。事物的质和量的这种相互依赖的性质或质和量的这种统一性，在哲学上就叫做度。把握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性，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凡事要做到“适度”，这是说要正确地掌握事情的量的限度以保证事情能具有某种所希望的质。人们常常用“大师傅拿火色”作为比方来说明度的掌握的重要性。炼钢的工人要善于适当地掌握炉子里的温度和风

力的强度，否则就不能保证一定的钢的质量。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已能够把这样的原理做出哲学上的概括，如孔子说的“过犹不及”、荀子说的“物忌过盈”，就是很好的例子。

研究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的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也把它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指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一) 在解决有关量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它是一定的质的基础上的量，否则量的掌握也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当我们在生产中要求完成一定的量的指标时，决不要忘记一定的质的保证。如果不能保证质的规格，仅只片面的完成数量任务，那结果是在实际上也并没有真正完成量的任务，因为这里的量是空洞的形式上的量，是脱离了质的基础的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要重新返工，就是要使消费者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一方面。(二) 在担负某种有关于质的变革的任务时，又必须要注意到量的适当的掌握，因为如果不能掌握适当的量的范围，也就不能保证工作的质的稳定。这就是要注意到上面说的“适度”的原则。在掌握上过了一定的“度”时，就要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反过来说，如果“不及”一定的“度”，就有右倾的危险。例如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斗争的打击面必须控制在人口的百分之十以内，否则就不能保证斗争的反封建性质。又如国家对一切生产事业要求利润上缴的数量，必须依据企业生产发展的情形，保持适当的度。过少了国家不够开支的需要，过多了可能影响企业的积累和分配，从而影响它的发展，等等。这里要注意的是，事物的数量发展的可能限度，也是可以随情况不同而有变化的。

二、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

如前所说，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它一定的度，即它的量和

质的相互依赖关系或量和质的对立的同一性。依据量和质的这种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在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会不断地互相转化。首先，量变是在一定的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一定限度内，量变不影响质的安定性。但这也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情形，量的变化一超过这个限度时，质的安定性就受到破坏，于是就引起质的变化，旧质就归于消灭，而出现了新的质。这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或简单地叫做量变为质。由质变而产生了新的质后，又开始表现了它的安定性，于是在新质的基础上，量变的过程又再度进行下去。这就是由质变又转化为量变，或简单地叫做由质变量。由量变质，又由质变量，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构成事物的无限的多样的变化发展过程，这就是事物的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就是量和质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立统一规律。

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量的逐渐进化和质的根本变革交错进行的过程，而不是如形而上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有单纯量的增减的过程，量变采取渐进线的形式，进化的形式，是缓慢的不显著的变化形式。在量变的过程中，事物不发生实质上的根本变化，从事物的质的方面来说，可以看做事物是相对地不变的。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质变，把仅仅存在于量变过程中的事物实质的相对不变性夸大为绝对的不变性，这种片面夸大的观点是错误的。质变的形式和量变相反，它采取突变即飞跃的形式，也就是迅速地使事物发生显著的变化形式（即使是逐渐过渡式的质变也仍然是一种比较迅速的显著的变化形式）。质变说明事物在根本上实质上发生了变化，它使量变的渐进线发生中断，形成发展的渐进线中间的关节点，在无限延长的渐进线中反复出现使渐进线中断的关节点，这就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

发展的最简略的图画。

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说明，量变的过程在一定范围内虽然似乎与质无关，但它在实际上就是质变的准备，在量的进化中不断地发生着许多细微的变化，这些细微的变化中就生长着质变的或新质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大机器工业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逐渐生长了起来。所以事物的质变在形式上虽是突变，但突变决不是毫无根据地突然出现的意思。质变是通过量的渐变过程有规律地准备起来的，这个规律性是可以被人认识并且加以利用的。形而上学者中间有一种所谓“突创论”或“倏忽进化论”(Emergence）的思想，把新事物的产生看做是突如其来的，不承认其中存在着可以为人所认识的客观规律性。这种谬论当然是完全反科学的。恩格斯说：“自然界的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自然辩证法》47页)

另一方面，质变虽是在量变过程中有规律地准备起来，但它本身是事物的根本的迅速的变化。这说明事物的渐进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就必须经过革命式的或根本的变革，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质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旧质对于量变的活动规模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不通过质的根本变革，量的变化就不能超出这样的限制。例如旧社会制度——阶级剥削制度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等，对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有一定的限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使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消灭剥削制度及小私有制度，也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社会进

步和生产力发展就要受到阻碍。因此，事物的量的发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必须发生质的突变，然后在新质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进一步的量的发展。这样就使事物的发展过程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阶段式的上升形态。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在19世纪下半期以来采取一种庸俗进化论的形式，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的正常秩序都是渐进性的，否认根本的变革的必要，硬说革命式的突变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种观点在实际上和以前形而上学只承认量的增减，否认质的变化的观点是一样的错误。

要深刻地理解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的规律，要揭发量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规律地引起质变，质变为什么又使量的变化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基础，这就需要涉及到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要在发展的内部矛盾中去找它的根源。前面说过，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的变化，是事物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的具体表现，而事物之所以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原因就在于内部的矛盾运动。不能把量变的过程看做仅仅是表面现象上所显示的数量增减的过程，在量的积累过程中，事物的矛盾，事物内部的各对立方面的相互关系就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虽然一般地说，这只是不显著的，非根本的变化。在《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到一个社会有了适合需要的制度（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适合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时，就不需要对于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但在这时，仍然有着许多日常性质的、非根本性质的矛盾需要调整。并且指出，这种日常性质的经常需要调整的矛盾，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这就说明在量的变化过程中，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量变过程中的矛盾的变化，是比较不显著的、非根本性质的，但这变化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即形成新质的条件、因素或方面逐渐

在生长起来，而原有的质的因素或方面则愈接近消灭。所以，所谓不显著的变化，也就是矛盾关系的潜在的变化。起初代表原有的质的因素、方面是居于支配地位，居于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新质因素、方面则不是主要方面，随着量的增减过程的发展，新质因素的作用愈加增大起来，最后矛盾的主要方面终于发生了根本改变，于是原有的质的因素、方面由主要的地位退为非主要地位，而新质的因素、方面却起来代替了它的主要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这种根本变化，就是事物的质变的内在原因。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液体的水的分子之间，具有着凝集力和扩散力这两个矛盾方面，在一个大气压的压力下面，水的温度由摄氏零度增长到百度的过程中，扩散力的方面逐渐增长，但凝集力始终是居于支配地位，这时液体只显现为量的渐变过程，但达到了摄氏一百度的界限时，扩散力就变为主导的力量，水的变化过程中就出现了叫做沸腾这一种突变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变，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社会化的范围日益扩大起来，把资本家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冲破的结果，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生长起来，把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打倒，自己掌握了统治权的结果。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就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关节点的内在内容。

量和质互相转变的规律的基本实质大体上就是这样。认识这个规律对于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如何利用这个规律来作为我们实际生活中观察问题和指导行动的科学方法呢？这主要地应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既然发展是由旧质到新质、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段式的上升过程，而每一阶段的转变都必须通过革命式的根本的突变，必

须经过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地位的根本改变。因此我们首先就必须用革命的眼光和革命的精神来观察和对待一切问题。这就是说，要敢于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事物进行根本的变革，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注意准备着这样的变革，要善于及时地揭露在量变过程中生长起来的矛盾，及时地展开斗争来推动事物的质变，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在一个质变的任务完成的时候，接着就准备另一个质变的任务。要勇于在工作中提出并坚决贯彻那只要经过艰苦努力就可以实现飞跃的任务，为此就要反对庸俗进化论和爬行思想，庸俗进化论和爬行思想害怕飞跃，不承认飞跃，不承认对事物进行根本变革的必要，更不承认我们在工作中有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的必要。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在实际上是具有着庸俗进化论观点的性质的。

第二，既然质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地偶然出现的，而是在量变过程中逐步地有规律地准备起来的，因此我们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地注意事物由量的积累进到质的飞跃的具体规律。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勇于对事物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精神，而且也要有实事求是地对于事物的发展从事精确的量的计算和细致的准备工作的精神。这就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没有足够的在日常具体工作中所进行的艰苦的量的准备，不要轻易对旧事物举行革命的决战，虽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在精神上准备决战；一切工作要注意到量的方面的精确的计算和恰当的掌握，凡事要做到真正“肚里有数”，反对粗枝大叶地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把革命事业变成盲目冒险行动，反对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或“左”的机会主义的态度，虽然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只要有了一定的可能，我们就要不怕困难地、毫不迟疑地采取革命的步骤；反对那种不愿做日常的具体的、

细致的准备工作，只希望革命变革在一个偶然机会下面侥幸降临的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虽然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地主动地进行争取实现革命的变革的准备。

第三，把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就是要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善于把量的发展工作和质的变革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并交替地加以应用。正确的工作发展过程，必须是符合于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这个渐进线中包含许多关节点的规律的。如在群众运动中，紧张的劳动之后，必须继之以适当的休息，以便准备精力进行下一次的紧张劳动；军队经过一个战役之后，必须争取休整的时间，以便组织再一次的战斗。领导各种群众运动，在组织上的一定程度的量的发展之后，必须转入质的巩固工作，然后再做进一步量的发展的措施。必须把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结合起来。善于掌握这样的规律，就能够指导工作健康地强有力地同时有节奏地不断向着胜利的方向一步步前进。

三、量变和质变过程的具体分析

实际生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当我们把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当做科学方法，用它来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要避免简单化、公式化，对于所要研究的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具体情况，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

首先就量变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事物的量变的时候，多半只是依据它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特征的量的增减，来作为它的总体方面的量变的标帜。如说水的温度升高了，生产力提高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了，某人在思想上工作上有进步了之类。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包含着对立的各个方面的，事物的量变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代表总体方面的量的发展某些量变标帜上，还

表现在它的各个对立方面的不同情况的量的变化上。如果只看到一个代表总体方面的量的变化，我们的认识仍不能脱离表面性和片面性。要深刻地了解事物的量变过程，必须进一步具体研究它的各对立方面的量变的不同情况。在量变的总的过程中间，事物的各对立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不但是极不相同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例如前面说过，当水的温度增加（这是代表总体方面的量的增加）的时候，它的分子之间的扩散力量是逐步增强了，然而凝集力却相对地减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在经济上政治上增强起来，但无产阶级力量也在增长，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还会更大的增长。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是具体地深入地分析事物内部各对立方面的量变的范例。例如他指出，在抗战的第一阶段里，我方是处于劣势的，但在这个阶段我方的这种劣势就有两种不同的变化：一种是向下的，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但“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另一种是向上的，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而“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样的具体分析，就使我们能够深刻地把握事物的量变过程的内在内容，即量变过程中事物内部矛盾的变化，并且把握到量变和质变的密切联系，也就是把握到事物的新质在量变过程的矛盾运动中如何准备起来。这个方法我们应该普遍用于我们的工作中，在从事革命的斗争过程中，要经常注意各阶级和各种社会集团的不同的变化情况，在生产工作中，要经常注意对生产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对比的变化，等等。形而上学把量变看做好像是与事物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的单纯外表的

量的增减，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于不能够把量变的观察和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的研究结合起来，不知道研究在量变过程中事物内部各对立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就是在于对量的观察的片面性和表面性。

其次，单就理论上来说，就人的思维里所反映的纯粹形态的规律来说，量变和质变有着根本的区别，量变不是质变，也不包含质变。但在实际生活中，量变的过程和质变的过程是交错地存在着的。在总的方面来说只是量变的过程中，就其局部或某些方面来说也存在着质变过程。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开始萌芽，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总的来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的质是不变的，在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可以说始终是量变的过程，是资本主义日益增长和生产日益集中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前期，自由竞争占居支配地位，在帝国主义时期，支配地位却被垄断所代替。由自由竞争到垄断，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方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还未最后完成社会改造以前，可以说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在这个时期中，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在中国就有几个阶段：互助组织、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一定方面的质的不同。就这样的情形来说，在实际生活中，量变的总的过程是包含着某些方面的质变过程的。同一事物在它发展的各阶段之间有着某些重要方面的质变，不注意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同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各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就不能具体地认识和利用各阶段的特殊规律性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例如，机会主义者利用恩格斯关于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一国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胜利的论断，来否认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时期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得到胜利的思想，就是由于犯了

这一种认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把某些方面的质变夸大起来，误认为这已是总的根本的质变，忘记了总的方面仍然只是在量变的过程中，这又会发生另一种错误。例如，另一些机会主义者把帝国主义叫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为不必经过革命的变革就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又例如，有些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可能仅仅通过议会斗争的方法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准备革命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者甚至于硬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了。这些都是由于忽视了这个原则，即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虽然和自由竞争时期有某些方面的不同，但总的来说它终究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根本有区别的，不经过革命的质变，它决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

再就质变来说：一切事物的质变都具有着飞跃或突变的共同点，也就是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其内在的内容来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根本易位。但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情形不同以及周围的条件的不同，飞跃过程所采取的形式也会是多种多样的，飞跃过程所采取的形式是因事因物而有不同的，必须就具体情况来作具体分析。有经过新旧事物的激烈冲突的形式，即新事物通过暴力来代替旧事物的形式，也有新事物和平地代替旧事物的形式；有不需要任何过渡，只要量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立即实现飞跃的形式，也有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仅仅开始进入飞跃过程，但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过渡或中间阶段才能使飞跃完成的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只是就最主要的、基本的类别来说的，其中自然还包括着无数更具体的不同的形式，也有以上各种形式错综结合着的形式。

恩格斯论到新事物如何代替旧事物时，这样说：“如果旧的东

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便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便暴力地代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7页）这说明社会的质的变革由于内部矛盾的性质和所处的情况不同，就有不同的飞跃形式。在矛盾不具有对抗性的社会生活过程里，例如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质变和革命一般地不需要采取暴力的形式。通过暴力形式的飞跃通常是对抗性的社会生活（如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的质变形式。但是，就在具有对抗性矛盾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暴力的飞跃形式之成为必要，也是由于旧的势力不肯自动地不加抵抗地归于灭亡，只要能够用暴力来抵抗时，它总免不了要用暴力来抵抗这个“必然性”的缘故。如果在特殊的条件下，旧势力对于变革已不能采取暴力抵抗的态度，而采取“充分理智”的态度，飞跃的和平形式仍然是可能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然，在这里也不能忘记，这种情形之能够出现，终归还是斗争的结果。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采取了适当的处理方法，这个斗争不是或主要不是采取暴力对抗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和平的形式，采取了批评教育的形式罢了。

自然界事物的质变，就存在着有无过渡状态的两种情形。水结为冰是在温度降到摄氏零度的时候立即实现的；元素周期表的变化，也是在量变的一定关节上立即实现质变。这是没有过渡状态的飞跃的情形。另外，如像玻璃由液体变固体或相反的转变，铁块变为铁水或相反的转变，中间就有着一个粘质的过渡阶段。就社会现象来说，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变，是在资产阶级从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中间就不再需要一个过渡的时期，但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

并不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的时候就立即完成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开始，要完成这个飞跃，需要相当长的一整个过渡时期。在这里，质的飞跃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来完成的。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也可以肯定是通过逐渐过渡的形式。语言的变化，也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实现质变的很好的例子。

逐渐过渡也有种种情形。首先是过渡时期如何开始的情形，就有种种不同。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是在经过十月革命的爆发式的暴力斗争，从下而上的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时候开始的。中国的情形却有不同。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用暴力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当这个爆发式的革命任务完成时，工人阶级已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在事实上已建立起工人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专政），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代表参加国家机关，但并没有居于掌握政权的主要地位。因此，在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后，不必再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其次，逐渐过渡的本身也有种种形式。逐渐过渡的共同特征是新质的逐渐积累和旧质的逐渐消灭。但新质的积累和旧质的消灭规律在不同的事物里有不同的表现。在语言的变化过程里，新质的积累和量的变化几乎是不能分开的，与量的增加同时就有着新质因素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由旧质到新质之间的过渡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什么时候终结的明显的界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和终末，却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从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的时期。这一整个时期，就是由有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向消灭

阶级剥削制度消灭贫穷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这个总的质的飞跃，是通过逐渐过渡的形式而实现。这里的逐渐过渡的形式，和语言变化的情形就大有不同。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每一点量的增加都有着新质的增长的过程，在这里，整个过渡时期的总的飞跃过程，是通过若干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步骤而完成的。在苏联，工人阶级经过十月革命取得政权后，立即在一切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部门把生产资料从资产阶级手里剥夺过来，以后又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其他工商业部门战胜了资本主义，至于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到了1930 年才进入集体化运动的高潮的。中国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在农业方面的总的飞跃，是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等这些步骤来完成的，在这里，每一个步骤都是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经历着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而完成的，每一步骤同样也是一次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所以中国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是由几次由量变到质变的步骤汇合而成的一个总的逐渐过渡的过程。因此，逐渐过渡的飞跃形式，也有种种不同的特殊情形，要求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对具体事物要做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此外，事物的质变，是在质变实现以前通过一定的量的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量变和质变，在原则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就是说，质变决不是量变，质变这个范畴的本身决不包含量变的意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要注意到这样的情形，正如量变的过程中包含着某些方面的质变一样，质变的本身，虽然在原则上决不是量变，但却也伴

随着一种量的扩张的过程。什么叫突变或飞跃呢？这意思就是说，新的质或新的事物在较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出现，迅速地占领广泛的地盘，并代替了旧的质或旧的事物的支配地位。不论是在量变的一定关节上立即实现质变也好，或是采取逐渐过渡形式实现质变也好，都有着新质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占领广泛的地盘的共同特征。不伴随着这种量的扩张的质变是没有的，这种扩张并不是质变以前的量的积累，而只是质变时候表现飞跃特征的一个不可少的量的标帜。

伴随着质变而出现的量的扩张过程，也具有着一定的规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且这样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个规律就是，新质的出现，是由个别到特殊再成为普遍的。新事物或新质因素的出现，最初只是在旧事物的广泛地盘中某一些点上突破出来的，这时候，新的事物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就说是个别地出现了质变的情形。这时新质只是作为新事物的萌芽因素而存在，还远没有取得支配地位，也就是还没有造成事物的全部质变。个别出现的新质因素，多半是极不稳固的，甚至于出现之后，又归于消灭的情形也是有的，因此它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但新事物终究具有着不可战胜的性质。个别出现的新质，经过与旧质一定时期的斗争，迟早要进一步扩展起来，由个别的点，形成为特殊的面，这就是新质已作为一个比较显著的特殊力量表现出来。通常在这样的情形下，新质就能明显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和稳固性，因此就会很快地由特殊向普遍推移，这一推移的结果，新质就迅速地占领广泛的地盘，在全部事物中取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质的飞跃过程的主要阶段。就社会革命来说，这就是革命的高潮。

由个别到特殊又成为普遍的，这是伴随着新事物或新质出现

时的量的扩张过程的重要基本规律。虽然复杂的实际生活中也往往有不一定按着这样的发展程序的特殊情形，但一般地说来，新事物的出现总是采取这样的程序的。这个规律对于我们实际工作有很大的意义。第一，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决不要忽视任何初生的新事物，哪怕它是微弱的，个别的点的存在，也要加以极大的重视，要经常注意什么地方发生了这一类似乎只是出于偶然的新事物，一旦发现了这样的事物，就要认真努力去培养它，创造一切条件来帮助它的发展，使它由个别变为特殊以至于获得普遍的胜利。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经常保持对于新事物的高度敏锐感觉，尽可能早地在旧事物中看出新的积极因素的出现，从个别中看出它的普遍意义，从偶然性中看出它的必然的前途。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行动的前途做出科学的预见，并给予正确的指导。列宁在1919年革命极困难的时候，看见莫斯科附近少数工人们在星期六休假的时间自动地从事义务劳动，立即就写了一篇叫做《伟大的创举》的文章，指出这是工人阶级做了国家主人以后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开始出现。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最初的一两年间，把当时出现的很微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看做是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指出它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55年毛泽东同志考察了新中国的农村情况，看见了有三户贫农坚持合作社的例子，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上这些，就是关于如何重视个别出现的新事物的一些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范例。一般地说，社会中的这类个别的新生事物，通常都是人民群众自发地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及时地发现这些创造，指出它的普遍意义，并加以培育推广，是领导者贯彻群众路线、使领导与群众密切结合

的不可少的环节。第二，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曾创造了一套培养新事物使之由个别向普遍方向发展的方法。这就是“个别突破”、“典型试验”、“普遍推广”的方法。例如先进生产方法首先常常是个别的劳动者或技术人员创造的，领导者发现了这种创造以后，把它拿到一定的特殊的范围内加以试验，经过这个试验过程，把试验的结果加以总结，把握了这个先进生产方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然后按照这些原理加以推广。这个方法就是完全符合于上述新事物的量的扩张规律的方法，也是我们在各种工作中到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这个方法的胜利，也证明了我们对于这个规律的认识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规律的重大实际意义。最后，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方法，一般地说，也应该是首先抓着一些个别的典型事物来加以研究（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从典型研究中找出一般的规律，来作为工作的指导，这样的方法也是和新事物发展的上述规律相适应的。

（丙）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第三个规律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个规律的根本内容归根到底仍然是对立的统一规律，它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又一个普遍的形态。事物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使它的某些特征、特性、方面在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这种转化过程的反复出现，就使过程采取了否定之否定的形态。这个发展形态的特点就在于：向对立方面

的转化，在形式上就是对于原来事物的否定，而第二次再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在形式上就成为前一次的否定的再否定，也就是被前一个否定所排除了的最初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方面在外表上又好像得到了恢复。恩格斯论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时，这样地指明了它的特点："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自然辩证法》第 3 页）否定之否定既是"矛盾引起的发展"，所以必须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为依据，才能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概括了事物发展的这样一种普遍的情形，即发展不仅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进到质变的前进上升过程，而且是采取曲折道路或螺旋式的道路的前进上升过程，从某些方面看来仿佛是不断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的过程。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这样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点，说："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哲学笔记》第 210 页）。这就是说，向旧东西的回复，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的外表形式上的情形，而不是实质上回到了旧的事物；是在发展的更高阶段的基础上重现了旧事物的某些外表特征、特性等等，而不是简单的循环。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黑格尔哲学里被看做是制造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杠杆。他把否定之否定规律理解为理性构造的三段公式，并且力图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纳入"三段式"的现成的理性结构中，因此也就免不了常常要用"削足适履"的方式牵强地这样做。黑格尔虽然是第一个猜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人，并且利用了他当时所能掌握到的丰富的知识来证明这个辩证规律，但他使这个规律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公式主义的严重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硬说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法就是仅仅照样援用了黑格尔的三段法公式（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等——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诬蔑。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这条规律时，只是援用了黑格尔的术语，而所阐明的内容，则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质。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当做由思维所产生的强加在事物上的现成的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只是客观事物自己本身所固有的普遍的发展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在不同的事物中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人的思维只应该依据客观事物本身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来揭发这个规律，而不应该预先设想一套死的三段公式，用来硬套到一切事物上。正如一切普遍真理一样，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知识对于我们只可以作为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作为硬性的“证明的工具”（参阅《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三章）。

二、辩证法的否定和形而上学的否定

要了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先要研究什么是否定——辩证法的否定。辩证法所理解的否定和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否定不同。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否定只是简单地否认某一事物的存在或简单的指示某一事物已经消失，是单纯的片面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不与任何肯定因素有任何相互联系的否定。在辩证法上使用否定的名词时所包含的意义则不是这样片面的，它是反映事物发展的这样一种客观内容：在发展过程中，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依一定的规律要转化为它的反面。所以否定并不是简单的否认或失去一件事物，而是指事物的发展和转化。转化的原因是由于事物内在矛盾的发展，由于某些内部条件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失去了在发展过程上值得肯定

的积极意义，而成为阻碍发展的应该被否定的消极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只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之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才是应该肯定的东西，超出了这个发展条件之外，它的这种积极意义都会丧失而转化为消极的东西，转化为应该被否定的东西），因此必须转化到它的反面，必须取得另外的，与它自己相对立的特征、特性或另外的形式，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否则发展就要受到障碍，就要成为错误或偏向。鸡蛋的蛋壳有保护蛋黄蛋白发展为小鸡的积极作用，等到小鸡孵成了，蛋壳就变成阻碍进一步发展的消极的东西，它就要被小鸡所否定，而转化为独立生活的小鸡。一种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候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适应，就要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的东西，它就要被否定，并转化为另外的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否定是指发展中的新事物、新阶段或新的环节对于旧事物、旧阶段或旧环节的否定，一方面是否定了旧事物，旧阶段或旧环节中的某些消极的、过时的、不中用的东西——在发展过程上失去了积极意义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等东西，另一方面却又是旧事物、旧阶段或旧环节内部生长起来的一切积极因素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于这些因素的肯定。否定和肯定在这里是互相联系着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同时又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一切文化发展的成果。辩证法的否定指明发展中新旧事物（新旧阶段、环节）的辩证的联系，新的东西既否定了旧的东西，又继承了和发展了因此也肯定了旧东西中发展起来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所以，否定是向前发展的一个环节，否定是由过去的肯定转化而来的，否定又包含着新的东西的肯定。

区别形而上学的否定和辩证法的否定，在方法上有很重要的

意义。这意义就在于我们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认识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对旧事物的批判不要采取割断历史过程的否定一切的态度，要了解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级的东西总是低级的东西的发展的成果。应该坚决否定的是旧东西中的一切消极的因素，一切已经腐朽的、必须要归于消灭的方面；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丝毫动摇调和的态度的。同时，又应该注意保护和继承过去的一切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本来就是继承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积极的东西才能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否定之中又包含着肯定，对于一切积极的东西的肯定。当然，应该着重的是要把这些积极的因素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要原封原样地像古董家一样地把它保存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否定了过去一切企图创造包罗万象的体系的哲学形式，但如果没有过去全部哲学史的发展中所提供的积极内容（例如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的合理核心），也不会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核心加以改造发展的结果，正是过去哲学史上一切辩证法因素的最高发展的成果。不但哲学是如此，一切事物的发展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来的大工业生产力，也不会产生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把这些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但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文化、技术以及经营管理经验被我们当做民族遗产批判地接受下来，自然，这种遗产在社会主义的更高级更丰富的人民文化中只能算是很为微小的一个因素。旧文化的糟粕是应该坚决否定的，但其中有许多精华，许多具有人民性的和可以纳入科学的成就，是必须加以肯定、继承和发展的。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我国民

族艺术的蓬勃发展，中医的无限丰富的宝贵经验得到发扬，就是很好的例子。批判任何旧事物，都要注意到这辩证法的否定原则，注意这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原则，否定和肯定的对立同一性原则。正如列宁所说的："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哲学笔记》第 214 页）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反对了"五四"运动后所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把斯大林领导工作中更为主要的那些伟大的功绩一笔抹杀了，甚至连带把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抹煞了。这些都是违背了辩证法的否定原理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表现。

三、否定之否定

了解了辩证法的否定的意义，也就可以了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事物的发展由于内部的矛盾运动而有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并因此向着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向对立方面转化，是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的消失，同时又是在它自己的反面的特征、特性或形式之下的发展过程的继续。然而，这个另外的特征、特性或形式在发展的进一步继续前进过程中，又由于过程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再失去积极的意义，于是又会再一次引导到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在事物的一定的有规律发展的条件下，

事物向对立方面再一次的转化，会使发展的最初阶段或最初的环节上已被否定了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在外表上再一次重复出现，因此就有了“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的情况。我们把最初的发展阶段或环节称为肯定的阶段或肯定的环节，把第一次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叫做否定的阶段或否定的环节，把再一次的向对立方面的转化叫做否定之否定，这些转化过程总合起来就叫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普遍地存在着：在自然界，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麦粒——植物——麦粒的例子；在人类社会，如原始公社——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类认识方面，如感性的生动的直观——抽象的思维——实践（参阅列宁：《哲学笔记》第 155 页）；在哲学史上，如古代辩证法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普遍存在着：如工作——休息——工作，发展——整顿——发展，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团结。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特别指明了这个规律的意义，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揭示了防御——进攻——防御和反“围剿”——“围剿”——反“围剿”的有规律的过程，就是很好的例子。

前面说过，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的表现形态。它在发展过程上清楚地表现了列宁所指出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这个根本原理。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互相联系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之间，一方面有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有着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互相依赖的关

系。所以，工作和休息必须联系，但工作和休息只能在生活过程中轮换进行，革命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必须联系起来，但不能同时同地用主要力量来兼顾发展和巩固的工作，而必须轮流地以一方面为工作的重点。在肃反工作中必须把“提高警惕”和“防止偏差”两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但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在一个时候比较着重号召提高警惕，另一个时候比较着重注意防止偏差。这样，由于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是事物通过自己内部的矛盾斗争而不断地向自己的对立方面的转化，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上就必然出现向对立方面转化和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即事物的某些特征、特性或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被否定之后又在更进一步的发展过程、阶段或环节中仿佛重复出现的形式；这也就是发展的曲折上升的形式或螺旋的形式。

这里有一个问题：向对立方面的转化是不断出现的，也就是否定是不断出现的，为什么不把这规律叫做连续否定的规律而叫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呢？自然，把发展过程看做连续不断的否定过程，看做肯定和否定的互相联系和不断转化过程，这个规律也可以表述为肯定否定规律。但在一般正常的条件下，通过两个否定，在一定意义上即可以看做完成了发展的一个段落，也就是可以看做由发展的一个出发点进到另一个更高的出发点。就如走路，左右脚各前进一次，即可作为一步，再向前进，就成为新的一步了。经过一个白天的工作再加上一个夜里的休息之后，一日的生活即告一段落，第二天就从一个新的出发点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指出了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过程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恩格斯指出阶级社会否定了原始公社，阶级社会再被

共产主义社会否定时，就结束了人类史的序幕，而开始出现完全成熟的人类的历史。因为这时“人才第一次——在某种意义上最后地——脱离了动物界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转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一切环绕着人并且至今统治着人的生活条件，现在处在人的支配及统治之下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这些例子都是符合于上述所解释的意义的。

事物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形式，被形而上学曲解为一种简单的循环过程。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反驳了这种循环论，指出旧的东西在否定之否定阶段上的回复只是表面的局部的现象，只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在实质上，否定之否定是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出发点的上升，是螺旋形式或曲折形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循环。毛泽东同志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进攻与防御的不断的反复的规律时，曾说到这是“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指出反复的现象只是就形式而言，“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87页）这就是对于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上升运动内容的肯定的论证，也是对于循环论的很好的反驳。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或环节否定了第一个阶段或环节的某些特征、特性和形式，并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个阶段或环节的积极内容。第三个阶段或环节对于第二个阶段或环节也是如此。第三个阶段或环节并不是仅仅在外表上重复了第一个阶段或环节的某些特征、特性和形式，这种外表形式决不是主要的东西，主要的是它继承和发展了以前两阶段或两环节的一切积极成果，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第三个阶段或环节又可以算是综合了前两个发展阶段或发展环节的一切积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论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次战略上的变化时说："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全面应用的范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它表现了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说明它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的前进过程；每一次否定都是经过对立面的斗争克服了前一发展阶段或者前一发展环节的消极的东西并肯定、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积极的因素。因此，发展的第三阶段或第三环节，决不是简单地综合了或调和了前两阶段的内容，而是克服了前两阶段的一切消极的东西并把一切积极的因素提升到更高的阶段，使之成为更高级的新事物的内容的组成因素。

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由量到质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规律是辩证法的两个不同的普遍规律。它们是对立的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上的两个不同方面的普遍表现形式。不能把这两个规律简单地混同起来，但两个规律既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同一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方面的表现形式，因此它们又是密切地联系着和交错着的。它们的联系有着以下几种基本的情形。(一)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规律本身也可以看做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即量变和质变在发展过程上的对立的统一：量变——质变——量变。不过，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的互相转化规律主要地只是表现了事物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特别是由渐进的量变到根本的质的飞跃的过程，而主要地不是表现事物发展的曲折

上升或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所以由量到质又由质到量互相转化的规律虽然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但并不能包括否定之否定的一切形式，所以也不能代替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可以表现在连续出现的不同的质的阶段之间，如原始公社——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由于发展始终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的，所以即使是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在没有出现质变之前，也常常要通过多次的否定之否定的反复过程，也就是要通过对立面的波浪式的交替起伏过程。如地球上无数次寒来暑往的反复过程积累成地质上的一次大变化；种子——植物——种子的反复过程要经过千百次才可能发生植物的比较显著的种的变化；革命战争中处于劣势的革命人民方面须经过长期的“围剿”与反“围剿”，防御与反攻的不断反复过程，才有可能把革命力量积蓄到足够的程度，使革命由战略防御阶段上升到战略反攻的阶段，即引起战略上的由量到质的变化；（四）同样地，由于发展始终是要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的，所以在事物的质变的关节点上，也常常要出现新旧事物之间的波浪式的起伏现象，也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形式的变化过程，才能实现根本性的质变。《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说到：“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年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经过几次的起伏，如“三反”、“五反”等，然后社会主义制度才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得到重大胜利。这就是上述情形的具体例证。

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只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之下才能实现某种转化过程。因此，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每一具体事

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需要在这一事物发展的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在一定方面表现出来，不能主观地任意把连续出现的三件事物都装进否定之否定的公式里。蛋变鸡，鸡又生蛋，就是否定之否定，这是在蛋的生命发展的正常客观条件之下才实现的。如果人把蛋吃了或打碎了，鸡的生命发展的正常过程就被中断，下一变化过程即不可能重复出现蛋的特征。革命人民的力量在战争中可以不断地反复表现为进攻与防御的过程，并且这反复性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可能转入战略反攻。反革命的势力由进攻转入防御和退却之后，到最后就不可能再恢复进攻的力量。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原始民族，不必经过阶级压迫阶级的社会即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等等。这里应该指出：我们说要在一定条件下来揭发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作用，这并不是说否定之否定已不是普遍的规律，它在特殊条件下就不起作用。应该肯定，否定之否定是发展的普遍规律，正因为它是普遍规律，所以它在事物发展的特殊条件下也会特殊地起作用，例如生物的进化由鱼类变为两栖类再变为爬行类、兽类等，在这个过程中要把连续出现的三阶段任意地安排在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公式里，当然是很牵强的，不可能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仍然特殊地起着作用。首先，由鱼类变两栖类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前面已说过的了。此外，生物由水中的鱼类进化为陆地上的爬行、兽类之后，在进化的长久过程中又屡次出现再变为水中生物的发展过程，如爬行类中的鱼龙，兽类中的鲸鱼就是，这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些特殊表现形式都要通过事物发展过程的具体研究去具体地加以揭示。又有人举例说，人类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发展——由石器到金属工具，由铁器到机器，

这中间不能说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不论由石器变为金属工具或由铁器变为机器，都是量和质的互相转化规律的表现，因此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殊表现。其次，更重要的是：石器是一种集体劳动的工具，由石器进入金属工具或手工的铁器，就转化为个体劳动的工具，由铁器转化为机器，就再一次转化为集体劳动的工具，在这里，不但有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且是这个规律的典型表现之一。

所以，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和一切其他普遍规律一样，都可以作为——也应作为我们研究具体事物的一般的方法向导，但又由于它在具体事物中的作用是具体的，因此，我们决不能把它当做从外部公式主义地强加到事物发展过程上的硬性的“证明工具”。这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依据客观存在的实际条件对某一事物进行了各方面研究之后，来揭示这个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在什么条件下和在哪些方面表现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作用，而不能在未曾做具体研究之前，就拿出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来，主观随意地说某些连续出现的三件事物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装进现成的三段公式里。

研究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实践意义，就在于要我们认识到一切发展过程（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或人类思维）的曲折性，反复性或非直线性，并根据这种认识，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实际行动。既然事物发展过程要常常在一定条件之下，一定时期之内和在某些方面采取否定的——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或曲折的甚至于似乎是倒退的形式，才有可能继续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前进，那么我们在研究问题指导行动的时候，就应该努力依据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具体分析研究，来争取预见到这个发展的曲折过程，并主动地及时地循着这样的曲折道路有节奏、有起伏地来指导我们

的行动，而不要把事物的发展看做片面的直线式的发展，不要主观地片面地只顾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如果我们看不见事物发展的这条曲折规律，并一定要违反着这条规律去行动，那么就可能最后在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前面走到绝路上，那时仍然要被迫地再绕更大的弯路。在这里，就有着两种相反的对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态度：前一种是努力使主观的思想和客观规律求得一致的态度，即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指导就像最高明的舵手一样，能够带领实践的航船正确地通过各种复杂曲折的航道，能够主动地绕过一切应该绕过的暗礁，能够避免应该避免的一切困难和损失，顺利地实现工作和斗争的任务。后一种是主观思想与客观规律相分裂的态度，即主观主义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要使人们的实践行动盲目地直线前进，不能预见到事件发展的必要的曲折性，等到困难临头，就不得不被迫转向，因此也就一定要使我们碰很多本来可以不必去碰的钉子，要多绕许多不必要的更大的弯路，甚至于遭受失败。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不肯采取暂时主动退却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结果招来了一个大的退却——长征。“曲则全，枉则直”，中国《老子》书中的这句话在发展的一定情形下是正确的。为着更有力地向前跳跃，就得稍稍向后退一下；为着达到更好的团结，就必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着使领导工作更能集中人民的意志，更正确和更有力，就应该开展广泛的民主，而不能片面地只顾强调集中；为着使工业的生产更强有力地进一步发展，就要在一定时期着重推动农业的发展，以农业的大发展来促进工业的发展，而不能一味地只去注意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发展。这些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上常常需要注意的事物发展的辩证曲折过程的比较明显的例子。

毛泽东同志指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善于在反攻敌人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主动地转入防御，因此就有可能找到足够的时机来准备力量，打破敌人再一次的“围剿”。紧张的生产战斗之后，必须继之以一个休整的间隙，然后才能进入进一步的紧张战斗。研究问题在进行调查掌握材料之后，必须转入应用思考和分析的工夫，由具体生动的直观转入抽象的思维，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性，才有可能回过来把现实材料的全体贯串起来，更好地来具体解决问题。

只有肯定，不懂得否定，只知道向一条直线前进，不知道在一定条件之下必要的曲折或后退，这是“左”的冒险主义。冒险主义者由于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主观地不肯走曲折的道路，结果却被迫走更大的弯路。党史上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失败结局就是证明。只讲团结，没有批评，团结就不能真正巩固；只注意工业，不注意农业，工业的发展也就要延缓。只有战斗，不注意休整，战斗就不能持久。只知收集事实材料，不知道运用思考和分析工夫，被大堆的材料压得不能透气，只有感性的直观，没有理性的抽象思维，知识就不能真正前进，就要走到“碰壁”的地方。

另一方面，片面地了解否定，把客观事物辩证法的否定，误认为形而上学的“否定一切”，或纯粹消极的否定，不懂得否定是发展的环节，不懂得在否定中要着重发展积极的因素并准备再进一步的否定，即再进一步的发展，这又会走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在“左”的冒险主义者遭到碰壁之后往往又会走到一个右的极端。如过去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失败之后又走向单纯防御以至于退却逃跑主义的方面，这也是“否定一切”的片面观点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和这相

反的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了长征，长征在“左”倾冒险主义失败之后，使革命力量转移阵地，这也是否定，但不是退却逃跑的消极否定，而是通过转移阵地这个否定过程，积极创造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终于在陕北找到了再一次对敌前进的阵地。农村合作社一度大发展之后，需要作一番整顿，整顿是发展的否定，同时也是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的肯定，并且是更进一步发展的准备。对旧事物的批判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是一种“左”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对革命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是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不承认其中有应该被否定的某些缺点或消极的东西，虽然这些消极的东西只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只等于十个指头中的一个。不论片面地肯定一切或片面地否定一切，都是违反辩证法的。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要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善于具体应用对立方面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排斥的原理：在行动过程中要掌握两只脚交替走路的原则，不要只顾用一只脚走路，不要把重点永远只放在一只脚上（虽然也要看到，两只脚中间，终归有一只脚——如右脚——是始终比较有力的），只放在对立的一个方面，而不善于两脚并用；要善于在必要时主动地由一只脚转到另一只脚上，由相互依赖的对立方面中的一个方面转到另一个方面。这里必须再一次指出，辩证法的这种曲折过程，只能看做是前进发展中的曲折过程，或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因此决不能把我们行动中的必要的转向，看做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前进的立场的放弃。相反地，在行动中的任何曲折、转向，以至于形式上的必要的倒退，从总的方面来说，正是为着前进。党的组织任务之一是要加强团结，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是团结的“否定”，但这个否定正是进一步加强团结的动力。所以，走曲折的以至于暂时倒退的道路，是为着前进得更顺利，不是任意转向，不是单纯的倒退。这是在指导实践的

时候必须遵守的原则，违背这个原则的曲折道路，就要坚决反对。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应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就是要善于在实际行动中通过辩证法的否定过程把工作推向前进，要善于依据客观事物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任凭主观随意地），把两次否定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一定条件之下联系着的对立面双方正确地建立起互相依赖的关系，使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力量都充分发挥出来，并及时克服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因素，使各种工作迅速向前发展。

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作为研究问题和指导行动的向导，依据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具体条件，预见到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曲折道路，在前进运动的适当时机主动地把斗争过程引到必要的曲折方向，引到某些特征、特点和形式的“否定”方面，使事物的积极因素能够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防止一味走直线所必然要产生的消极作用。在“否定”的进程中又进行再一次否定的斗争准备，以便到了适当的时机，及时地把运动提高到更高的出发点。在肯定和前进的时候注意防止无止境地盲目前进的主观主义倾向，在否定和转折的时候防止否定一切和完全消极倒退的主观主义倾向。这就是研究否定之否定规律时在实际应用方面所必须掌握的根本要点。

第九章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一、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反映

唯物辩证法不仅要研究事物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以及量和质互相转化的规律和否定之否

定规律（或肯定否定规律），而且要研究一些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范畴，这些范畴反映客观世界一切事物中存在着的某些最普遍的矛盾性，或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些普遍的表现形态。必须研究这些范畴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我们才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事物的矛盾运动，才能够善于运用辩证逻辑，在理论上概括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联系和运动的客观过程，使我们的实践获得正确认识的指导。

范畴，就是各门科学的一些最高的概念，也就是人的思维用来反映和概括客观事物的某些最普遍的本质（最普遍的性质和最普遍的联系）的概念。列宁说："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界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哲学笔记》第 65 页）科学的各部门都有着该部门所特有的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如经济学上的价值范畴之类。哲学上的范畴，则是反映整个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些最普遍的本质的概念。从思维的逻辑形式方面来说，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范畴的研究，来反映客观世界的物质本质及其矛盾发展的普遍规律性的。物质和精神，就是我们首先研究过的两个最根本的哲学范畴，通过这些范畴的研究，我们认识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的第一性的地位和精神的第二性的地位。此外，我们还通过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等范畴的研究，来指明人的认识是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的反映过程。我们又研究了对立性和同一性，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等等的范畴，这些研究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些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范畴：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和自由、因果性和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如前面所说，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反

映着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某些最普遍的表现形态，也就是反映着事物的运动过程本身所固有的某些最普遍的矛盾，即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和自由、因果性和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等等。

必须再一次强调，范畴是人们用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的性质和联系的思维形式，范畴所反映的内容，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东西，这些内容决不是由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主观自生的东西。离开了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来讲范畴或使用范畴，就要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本质这个范畴，无非是指明客观事物本身包含着与现象相对立而又有联系的本质方面，因此也就指示我们应该注意在事物自己内部去揭发它们所固有的本质的东西，而不要满足于事物的某些非本质的表面现象的认识，更不要只凭自己主观的空想去设想事物的本质。只凭一些非本质的表面现象来对事物下结论（例如凭着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不居于主要地位的缺点，在十个指头中只能算一个指头的缺点，就要抹杀社会主义的全部成绩，或者把缺点当做主要的东西），是会犯错误的。不具体研究客观事物本身的过程，就要设想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例如不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就要妄自断定中国革命的本质是什么，不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要妄自断定人的本质是什么等等），也是一定要犯错误的。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唯心主义对于范畴的错误看法。唯心主义把范畴看做是在客观事物之外的某种精神力量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范畴是在自然界之前存在着的绝对精神的属性，是创造世界的原动力。中国宋朝主张“理”在物质之先就存在着的朱子思想，是属于这一类的。黑格尔的哲学则是这种思想的最典型

的代表。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如何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时，这样说："蒲鲁东先生……把抽象和范畴看成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创造历史的就是它们，而不是人类。抽象、范畴，只就它自身来看时，也就是，把它从人类和人类的物质活动分离开来看时……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 页）除了这种唯心主义者关于范畴的看法之外，还有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看法，他们把范畴看做只是存在于人的主观里而不是存在于客观世界里的东西。康德认为范畴是人的思维中先天存在的认识形式，自然界的秩序，规律是由于人们把这些范畴应用到现象世界中才产生的。例如事物的因果性，在康德主义者看来，并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着的内部关系，而只是由于人的理智中有着因果范畴，它要求把各种现象看做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各种现象看起来才好像有了因果性。马赫主义者把范畴看做感觉的种类，而物质则只是感觉的复合，根本否认物质世界和范畴的客观实在性。不论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都把范畴看做变相的造物主，而不看做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和联系。这种观点如果作为方法来看，那就是认为人们只要纯粹凭着某些"理性"的现成公式，或者凭着自己纯主观的思考，而不必先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具体状况，就可以把握各种各样的范畴的内容，并且依据这样的主观的范畴来安排客观事物的秩序，来创造客观世界。有着这样观点的人，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常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先给这些概念、范畴下一个主观的定义，然后根据这个主观的定义，再去解释具体的事物，而不是首先研究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来实事求是地理解有关的概念和范畴。很容易明白，这样的方法论，只能是为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树立理论的基础，只能使我们的思想

走向反科学的方向。

列宁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哲学笔记》,第68页)所谓和自然分离出来的“自觉的人”,即是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运动发展规律或自然界的复杂联系的“网”的人。而人们认识自然界的运动发展规律或自然界联系的“网”,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思维上的概念、范畴的形式来进行的。每一概念、范畴概括事物的某一个部类、方面、特征、性质、联系和关系,多种多样的概念、范畴的系统的结合——采取判断推理的形式的、正确的、以客观事物所提供的充分的感性材料为依据的、经过实践的检验的实事求是的结合,就能够反映“自然现象之网”。所以,列宁又说:“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同上书,第184页)唯心主义颠倒了这个认识的秩序,把本来是自然界客观事物在人的理性头脑中的反映的范畴,误认为是离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的并且创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这就是唯心主义对于范畴的错误看法的根源。

再说一遍,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本质,即普遍的性质和内部联系的思维上的反映形式。相互对立的哲学范畴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的矛盾运动。研究这些范畴必须依据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既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又要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形而上学把各个范畴孤立地理解,不把它们看做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反映,这是应该反对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来研究范畴问题的。这一点必须要时时记住。

二、本质和现象

人的认识必须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通过各种现象的观察研究，进入到认识事物的本质。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的、片面的现象，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它对于我们的认识有什么重要性，它和现象有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什么是本质？本质和质在某一方面具有同一的意义，但本质又是较为广泛而深刻的范畴。事物的性质，对于它的量来说叫做质，对现象来说叫做本质。同时，本质的范畴是指“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实践论》），所以本质的范畴包含着质的意义，比质的范畴意义较为广泛而深刻。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具有对抗性的性质，这种经济上的对抗性质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文化上的对抗性的斗争，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集团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对抗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国际之间的内部联系，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它的本质。为什么事物的性质以及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能综合到一个本质的范畴里面呢？因为事物的性质及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不能分开的，事物的性质规定着它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各方面的表现。不认识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也不可能充分认识事物的性质。

这里还要附带谈到规律性的范畴。规律性是和本质同列的范畴，并且也是包括在本质的认识之内的。列宁说：“规律和本质是

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哲学笔记》，第133页）又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同上书，第135页）实际上规律性也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事物的本质的联系，是事物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所表现的各种基本联系。所以我们说要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包含着要认识它的规律性的意思。个体农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阶级，这就是说它可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这是个体农民（解脱了封建奴役的）的性质。在工人阶级的坚决领导这个条件下面，农民就能够克服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而向着合作化方向发展，这是个体农民发展的规律性，这也就是个体农民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我们说要认识工人阶级领导下面个体农民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意思也就是说要认识农民能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规律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些农民对于合作化的动摇现象，并不是必然的规律，所以这是非本质的东西。帝国主义必然要没落，这是它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正是把握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那些害怕帝国主义的人，都是被帝国主义表面强大的现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的本质的东西。

什么是现象？现象就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所谓外部表现，就是暴露在事物的表面而能直接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器官来的意思。我们的感觉器官所能够加以认识的一切客观事物，都叫做现象。决不能够把现象看做纯主观的东西。只有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才把现象看做是纯粹主观的感觉，而没有任何客观内容。我们对于事物现象的认识，当然只能通过感觉这种主观的形式，但这种主观形式所反映的内容，又只能是客观

事物的本质的外部的各方面的表现，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本质一定要作为现象表现出来，本质并不是现象之外的另外一种特殊的东西，它就存在于现象的内部，它是贯串着各方面现象的、现象总体的根本性质和各方面现象的内部联系。所以，本质虽然不能够直接由感觉器官所把握，但却可以而且必须通过现象的分析研究，通过思维的工夫而加以理解。哲学上的唯理派的错误，就是把本质和现象形而上学地加以割裂，以为本质是现象之外的孤立存在的东西，并认为不需要通过感性认识所提供的现象材料的研究，仅仅只要依靠理性认识，就可以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就在认识论上陷于唯心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者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大量的感性事实材料中去进行刻苦的分析研究，仅凭书本上引来的片言只字，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观的猜想，就要对事情做出原则性的论断，这种错误和唯理论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注意，现象是本质在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各方面的表现，它并不直接就是本质。现象和本质是有差异的，因而也是有矛盾的，本质是贯串着现象各方面的现象总体的性质及其各方面的内部联系，而每一现象只是本质的某一方面的表现。所以，本质和个别现象之间，首先就有着贯串事物全体的东西和局部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也就是矛盾；局部的东西只能片面地表现贯串事物全体的东西，而不能以自己的片面把后者完全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仅仅看见局部现象及其个别的某些外部联系，我们就不可能认识本质，如果我们使自己的认识局限于个别现象之内，以为这就是认识了事情的全部及其本质，那我们的认识就一定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真面目，就一定要发生错误，一定要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相分裂，一定要走向主观主义。经验派的哲学认识论以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

现象材料就是惟一真实的知识，形而上学地割裂了本质和现象的联系，否认进一步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本质的必要性。这一派的认识论思想最初虽然是唯物主义的（如英国的培根、霍布斯），后来却出现了唯心主义的经验派认识论，把现象看做不具有任何客观本质的纯主观的现象。这一派唯心主义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成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潮流，如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只相信个人的经验，把个人经验中所看到的局部的现象误认为事物的全体，误认为普遍真理，这样就使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陷于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现象中到处包含着许多假象，这种假象虽也是本质的表现，但却是歪曲地反映着本质，因此就给我们一种与事物的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掩盖了本质的真相。把一根直棒的半截放水里，外表上看起来它好像是弯曲的。地球自转，给我们日常所看到的是太阳每天从东方出来的假象。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从日常的现象上看好像决定于供给予需要的关系。新生的革命势力看起来是很弱小的，但它在本质上却包含着不可战胜的伟大的发展力量。没落的帝国主义者，在作临死前的拚命挣扎过程中，也会给人一种似乎很强大很稳固的假象，如像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也能吓唬认识不清的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现象中却有一种“英雄造时势”的假象。所以，如果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只凭局部现象来论断，我们就常常要为假象所迷惑，而看不到事物的真正本质。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夸大了感觉、经验的意义，以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等等的好听名词作为标榜，装出好像是要认真掌握科学方法的样子，而在实际上则是要想引导人们把自己的眼

光局限于片面的现象的认识，是要使人们的思想容易受到假象的迷惑，不能在行动、斗争中正确地辨别敌友、辨别是非，使反动派所散布的谎言的网罗容易收效，这就是这些经验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实际危险性。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就思想方法的实质来说，也是属于唯心主义性质的。

人的认识必须由现象进到本质。列宁在讲辩证法的特征时指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是："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哲学笔记》，第 210 页）。所以，仅仅从现象上来观察问题，而不进一步去揭发事物的本质，这也是反辩证法的，即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征之一。由于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并不是直接一致的，并且现象中常常包含着许多假象，所以就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才能揭发事物的本质。而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也就在这一点。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话，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 卷，第 1069 页）

怎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认识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呢？为要解答这问题，首先还要再把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事物的本质，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表现为多方面的现象，假象也是事物的本质在运动中的表现，假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其运动发展的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内必不可免的表现，是本质的歪曲和颠倒的表现，但是，假象的东西，在事物的运动中虽然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但却不是稳固的东西，不能成为事物运动的主流。只有本质的东西，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主流。列宁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哲学笔记》，

第 111 页）又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同上书，第 108 页）列宁的这些话，就包含了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意思。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由于本质就是在现象中表现出来的，所以首先必须通过现象的观察，才有可能认识本质。但是要能够在认识上通过现象的观察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被假象所迷惑，首先就必须注意到不要使我们的观察局限于片面的现象，而要把大量的，各方面的有关现象纳入我们的考察之内。假象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都是存在于片面的现象之中，如果能够把各方面的现象加以观察研究，把事物的过去现在以及它和周围事物的联系中所表现的各方面的现象加以观察研究，通过分析、比较，就有可能区别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什么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的东西和非主流的东西。

应该指出，我们说要观察大量现象，这并不等于说要对一切现象，不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都同样地平均用力加以观察研究。这样做是不成功的，也是人的精力所不允许的。在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必须以"去粗取精"的精神从大量的事物中找出其中的几种典型的现象来加以考察。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所说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典型的事物是包含着所有同类现象中的普遍的本质的。能够依据适当的典型来加以考察，弄清楚它的性质以及它和周围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马克思写《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作为典型，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毛泽东同志研究合作化问题，以三户贫农的一个合作社为典型，就指出这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但是，观察大量现象和选择适当的典型来进行深入研究，固然是揭发本质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仍然不一定能辨别什么是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这是因为，第一，科学的研究常常要求在事物还处于新生的以至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去揭发它的本质，而在这时候，本质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辨认的，其次，即使在事物已相当发展的情形下，它的本质仍不一定是直接暴露在现象表面的，仍是常常出现迷惑人们的假象的。所以，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对典型事物加以分析，而主要的，就是要依靠辩证的矛盾分析法。因为事物的本质，首先是由它的内在矛盾规定的。如果我们善于从感性材料所提供的现象中，从典型的事物中去观察和分析它所包含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研究它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再研究它和周围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我们就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到事物的本质，把握到事物发展的主流，而把它和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了。

三、形式和内容

研究了事物运动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之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

事物的矛盾运动，采取无限地多种多样的形式。形式是区别客观世界形形色色的现象的外部标帜之一。通常我们说这一类现象和那一类现象不同，常常就是指它的运动形式的不同。自然，我们决不能说形式是事物运动的纯粹外部的东西。形式是事物的矛盾运动自己本身所需要和所产生的形式，而事物的矛盾运动，就是它的内容。没有任何形式的纯粹的内容，不采取任何形式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能设想的。不能用瓶子和酒的关系来作为形式和

内容的确切比喻，形式不是外部的容器，作为液体的酒在物理上有它自己的液体的形式，它的形式是自己的内部分子的矛盾运动（扩散力和凝集力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例如一定温度条件）所自然产生的形式，不是外部容器所赋予的。

所以，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中间，首先是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内容决定形式，也就是说，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点，决定它所要采取的形式。事物的矛盾运动有它的现象方面和本质方面，内容就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这个统一体在运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采取与它自身在一定条件下相适合的形式。但如果从根本方面来说，内容决定形式，首先就是事物的本质决定它的形式。因为不同的矛盾运动，具有着不同的特殊性，规定着事物的特殊本质，也就是规定着事物的特殊性质以及这事物和其他事物的特殊的内部联系，而它的形式就必须适合于事物矛盾运动的这个特殊本质，适合于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生产关系作为形式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使用一定工具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在不同的民族存在的条件下面，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这也是它的本质（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尊重各民族自己的特点的，社会主义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后，才能完全消灭民族的区别）决定的。革命斗争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这是决定于革命工作在各种条件下的特殊的本质。不同的矛盾，固然有不同的本质，需要不同的解决矛盾的斗争形式，同一种矛盾，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也会有着不同的特殊本质，这个特殊的矛盾本质就规定着解决矛盾的斗争形式。解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依据不同的条件，可以采取暴力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和平的形式。列宁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也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哲

学笔记》，第 125 页）。

内容决定形式，并产生自己的形式，这决不是说形式只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相反地，形式对于内容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着形式与内容的本质相适合的时候，它就能够对内容的发展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就为内容的活动开辟广阔的地盘，当着形式与内容不相适合的时候，它对于内容的发展、内容的活动就发生阻碍的作用。内容之所以要求与自己相适合的形式，正是由于要使形式来为自己服务，使形式帮助推动自己的活动和发展。一定的形式，是为一定的内容的发展所需要的，而决不是毫无意义地纯粹消极地由内容产生出来的。形式和内容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虽然首先是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辩证法要求我们不要片面地只看到内容的决定作用。

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有两种基本情形：或者是形式与内容的发展情况（它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相适合，并能积极帮助内容的活动和发展的情形，或者是形式与内容不相适合，因而消极地阻碍着内容的活动与发展的情形。为什么形式对于内容的作用会有这两种相反的情形呢？这是由于形式和内容互相矛盾的结果。也就是说，两者不只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而且又是互相对立的。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中间，内容虽然是居于决定的地位，但一种形式一经产生之后，就成为相对固定的东西，它对于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容，对于不断地活动着的事物矛盾来说，是比较地不活动的、比较地落后的东西。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落后于内容，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发展中的速度的差异就成为矛盾。这个矛盾就会产生如下的情形：内容已经向前发展，并且在本质上已经发生变化了，而形式仍然基本上没有改变，内容已经具有了新的性质，而形式仍然处于旧的状态。新的内容最初只

能在旧的形式内部发展，结果终于形成新内容和旧形式的尖锐的对立。矛盾是这样发展的：起初仅只是形式落后于内容，后来却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对立；起初形式虽然落后于内容，但还是在本质上与内容相适合的，后来由于内容的变化，形式就不适合于内容了。由适合于内容并能帮助内容发展的形式变为不适合于内容并阻碍内容发展的形式，不适合于内容并阻碍内容发展的形式，经过根本的变革，又变为适合于内容并能帮助内容发展的形式，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的过程足以说明内容和形式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上述两种相反的关系。

形式和内容虽然具有着适合与不适合的上述两种情形，但是，由于内容对于形式居于决定的地位，它是不容许与自己不相适合的形式长久存在的。例如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容许生产关系长久处于与自己的性质不相适合的状态的。所以，当形式已经与内容成为不相适合的东西了的时候，这个形式迟早就要被抛弃，并产生与内容相适合的新的形式。由于形式在发展上落后于内容，因此，内容的改造，新的内容的产生，一般地说，不可能与新的形式的形成同时，更不可能先产生新形式，然后才在它内部出现新内容。除了某些特殊情形之外，新的内容总是在旧的形式之内开始产生，并且最初总是暂时在旧形式之内生长起来的。这是一般的规律。但是，当新的内容在旧形式内生长到足够的程度时，就不可能在旧形式内继续向前发展，就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于内容发展的需要，就不能不破坏旧形式，创立新形式。列宁说："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哲学笔记》，第 239 页），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给我们的实践提出这样方向，就是：（一）观察问题不要偏重形式，而要首先注意到事物的内容。要依

据内容来确定事物的性质，而不要只依据形式来确定它的性质；（二）要善于应用各种适合于内容需要的形式，在行动上决不要拘泥于一定的呆板的形式而不顾内容的需要。总之，要反对形式主义。

由于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同一内容在不同的发展情况下可以采取种种形式，这些形式虽然是内容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本质决定的，但它并不就是内容和本质。如果只凭形式来观察问题，就常常会把形式误认为事物的本质，而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例如资产阶级国家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但在形式上它有时采取议会民主制，有时采取君主立宪制，有时采取法西斯制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议会民主制误认为是这些国家的实质，因而看不见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我们今天的艺术上所采用的民族形式，有些是从封建时代的民间艺术中继承下来的，只从形式上看问题的人，误认为我们采用民族形式的艺术也是封建的东西，忘记了它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内容。有人曾故意夸大这种片面的错误观点，来反对我们在艺术上采用民族形式的正确方针。

所以要正确地认识一件事物的真面目，必须首先研究它的内容，研究它的内部矛盾运动，研究这矛盾运动所规定的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别的事物的内部联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考察它的形式的意义，即它的形式是否与内容相适合，这样才能避免认识的片面性、认识的错误。

观察问题偏重形式的片面观点，在实践行动上就表现为拘泥于一定的呆板的形式，而不能灵活地依据矛盾运动的具体情况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形式。这种观点把事物的矛盾运动形式看做死板的公式，即一定的内容在任何情形下只应该有一定的形式，如果

没有这惟一的形式，似乎内容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反之，只要有了这个形式，好像也就有了一切了。这里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根本违反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个最根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它硬造成一个完全颠倒了的原则，即好像是形式决定着内容，好像在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不是内容占决定地位，而是形式占决定地位。这是在形式和内容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这一篇著作，就对实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

唯物辩证法首先肯定内容对于形式的决定地位，同时又充分重视形式对于内容的服务作用。依据这个相互的辩证关系，指出内容在不同的发展情形下必须和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同一内容，同一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征服和利用各样的形式。例如新内容不但要求新形式来为自己服务，而且在一定情形下，例如在新事物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形下，也可以在旧形式中发展，并利用旧形式来为自己服务。马克思主义者和书呆子的不同，就在于在斗争中决不用任何一种形式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列宁对于在过渡时期消灭资本主义的方法的有名的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论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时，曾对于形式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一方面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把“和平”时期工人运动的形式奉为神圣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左派”拘泥形式的另一方面的偏向，他说，“从国际共产主义底发展方面看来，我们现在业已有了这样巩固、这样强大有力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足以使这一内容无论在或新或旧的形式中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来，都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

胜与征服一切的形式，不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旧的形式，——但并不是要与旧形式调和，而是要善于把所有一切新旧形式变为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坚决的和彻底的胜利所运用的武器。”（见该书第十章“几个结论”）

四、必然性和偶然性

当我们深思地观察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时，可以看到其中具有两种相反的趋向。一种趋向是：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依着某种一定不移的秩序稳定地在全过程中贯彻下去：两个物体磨擦一定生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后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个体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一定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结果一定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些联系和发展过程的秩序都是一定不移的，我们如果认识了这个秩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某些事情还没有出现以前就准确地预见到它的出现。例如我们现在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这些一定不移的性质普遍地存在于世界一切过程中，我们的思维的认识通过多次实践检验之后，用一个范畴来把它概括起来，这就是必然性的范畴。这种必然性是由事物的根本矛盾以及和它相联系的某些重要条件所决定的。但另外一方面，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还要受其他多种多样的周围事物的大大小小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又看到，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这样的情形：事情的出现并没有什么一定不移的秩序，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我们不能确定它一定会怎样。我们既然无法从这些事物中找出一定不移的秩序，因此我们的思维对于这些事物仅只能够在它的出现之后做事后的记述，而不能对它的将来变化趋势做出事前的预见。例如某人对于

自己在最近一年内是否会遇到一次传染病，某一块田地上今年夏天是否会遇到冰雹的灾害，这就是不能预料的。事物的这样一种联系和发展的情况，我们在客观世界也到处可以看见，我们的思维用一个范畴把这种情况概括起来，这就是偶然性的范畴。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具备着的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的普遍属性，这就是说，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过程的这种矛盾性质，是由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复杂性和具体性使然的。事物的根本矛盾以及和它相联系的某些重要的条件，规定着它的发展规律性，并使这种规律性作为一定不移的秩序，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统治的趋势贯彻在全过程中，这就使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具有了必然性的方面。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的矛盾斗争，这些斗争在敌小我大，敌强我弱（抗战初期），敌孤立而我有世界人民同情等等重要条件影响之下，就规定了这次战争一定有持久性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胜利的规律，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一个例子。但是，另外一方面，事物的发展过程决不仅仅只是受到它的根本矛盾及某些重要条件所规定，还要受到此外的其他多种多样的周围事物的大大小小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受这样的影响的事物发展过程是不能设想的。这些影响不会大到使得发展的一定不移的秩序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对于全部过程却不断地引起各种程度的摇摆和偏差（不是指带根本性的偏差），这些摇摆和偏差是无限地复杂、多样，它们的存在使得事物发展的一定不移的秩序不能够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结合着无数的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因素表现出来的。抗日战争是一定持久的，一定可以胜利的，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某一个战场上有某一个时

候由于个别的条件的影响而完全失败或得到意外的特别大的胜利，这就不是一定不移的。这里说的个别条件所引起的结果就具有偶然性。所以，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

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两个绝对对立而没有任何联系的范畴，并因此对于事物的联系提出两个极端相反的看法：或者是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做必然的，否认有任何偶然性的作用，把偶然性看做是由于人们对于事情发生的原因的无知而产生的纯主观的范畴。机械论的关于必然性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这种观点把世界的发展看成了一种神秘的，近似宿命论的性质。一切既然都是必然的，那么，人对于世界的发展就无能为力，只有坐着等待必然性的支配了。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极端是把偶然性看做支配一切的范畴，否认客观世界里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存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就流行着这种错误观点。在中国贩卖实用主义的胡适就公开主张“偶然论”，把任何细小的偶然事件都看做对于历史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原因，借此来抹煞历史发展的真正决定原因。“偶然论”把历史的一切事件都看做出自偶然，因此就否认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任何可以为人所认识和利用的客观的必然规律。这就是说，归根结底人们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前途都只能凭盲目的偶然性去支配，人们不可能希望对于事物的发展前途有任何确定的预见，并依照这些预见来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行动，人们的生活只能是依靠盲目冒险，而冒险的结果如何又只能依靠偶然的命运来决定。这是从偶然性这一个形而上学的极端又引导到宿命论。这种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在市场竞争中的盲目投机冒险行为的哲学上的反映。

唯物辩证法反对上述两种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事物的联系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的统一。必然性是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种趋势，是在过程中一定要使自己贯彻下去的倾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趋势，它是暂时的，易逝的，它在过程中没有一定要贯彻下去的坚强的倾向。偶然性决不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原因而产生的主观范畴，它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原因也可以为我们所知道的，即使知道了它的原因，它仍然是偶然的，因为这些原因只是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居于统治地位的趋势的原因。机械论的观点把这种偶然性也看做必然性，这在实际上是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使两者混淆不分，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能够从偶然性影响中把必然性揭发出来，使我们的行动陷于宿命论或盲目冒险的泥坑。但是，我们把偶然性和必然性加以区别，指出偶然性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统治的趋势，这并不是说偶然的东西在发展过程中不起作用，偶然性对于事物的发展虽然不能形成统治的趋势，但对于事物发展的过程能引起种种的偏差，能使发展过程加速或延缓。由于事物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过程中时时刻刻都有偶然因素的存在，必然性是在无数的偶然性之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第78页）。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必然性。现实事物中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作为补充的。偶然性经常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就个别的事物或初生的事物来看，其存在的形式常常好像是偶然的，然而这偶然性的背后总隐藏着必然的联系，隐藏着铁一般的规律性。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能够从初生的、个别的、形式上似乎是出于偶然的事物中揭发出它的背后隐藏着的必然性。这个任务，和科学的研究需要从现象中去揭发事物的本质的任务是相适应的。

实际上必然性也可以说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趋势。

所以，科学是盲目的偶然性的劲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看起来是偶然性的东西中间，揭露出它内部隐藏着的必然的规律性。科学不能向表面现象屈服，不能向偶然性屈服。否认必然性，认为一切由偶然决定的实用主义及其他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不管它们在外表上挂着怎样好看的科学的招牌，在实际上它们的观点是完全违反科学的。科学的研究任务不仅只在于要从偶然性中揭露出必然的规律，而且还在于帮助我们善于利用必然性的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里包含着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要善于从形式上是偶然出现的个别事物中发现它的某些必然要发展起来的因素。例如毛泽东同志从三户贫农坚持办合作社这一件表面上似乎有点偶然性的事实中，看出了全国五亿农民都一定要依循的前进发展的必然方向。要善于从偶然出现的事物中看出必然性，除了首先要对于新生的个别事物的出现经常保持着高度的注意之外，就是要分析事物的矛盾，事物的内部联系。例如研究了农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研究了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常有天灾等等重要的条件，并且考虑到新中国有着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政权，就可以看出三户贫农坚持办合作社的个别典型事例中所包含着的合作化发展的必然性。第二，要善于利用必然规律知识来正确地规定我们的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使我们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避免盲目的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在进步势力的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胜利在当前不会是必然的，这时如果对反动势力采取最后决战性的进攻的行动，就是冒险主义。在进步势力已取得优势，只要加劲努力一下，胜利就是必然的，这时如果不敢于对旧势力发动进攻，不勇于向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此外，还要善于在行动中利用一切有利

的偶然性因素来加速事情的发展，加速斗争的胜利，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使事情的发展，斗争的胜利尽可能地顺利，尽可能地少受阻碍。这就是我们研究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的主要的实践意义。

五、必然和自由

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范畴的矛盾关系密切相联系的，是关于必然和自由的范畴的矛盾关系问题。必然性的范畴说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具有客观的决定性质，它所规定的发展的客观趋向是一定不移的，不容许人们的主观意识有任意地自由选择的余地，因此必然和自由这两个范畴是包含着明显的对立意义的。形而上学把这对立看做绝对的对立，认为如果把事物发展看做必然的，那就是说人们的任何自由也不可能存在，人的行动只能受宿命的支配。反过来说，如果人的自由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依据后一种看法，把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说成是完全受人的“自由意志”支配而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客观规律性，这是现代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社会学的流行论调之一。

其实，形而上学所了解的那种与必然性绝对绝缘的自由，那种纯主观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自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人类社会生活中也常常有像自然界一样地受到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的情形，人们在这种情形下不能主动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例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这样的。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却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人们能够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规律，因此就能够为着

社会的福利，来创造条件，为某些必然规律性的活动开辟广阔的地盘，或限制另外一些必然规律的活动地盘。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的行动就解脱了盲目被动的状态，能够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有着自由的意义。自由这个范畴的真正的客观的内容也就在这一点。自由不是形而上学者所说的那种与必然性完全隔绝的纯主观的意志自由，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然性在没有被认识到的时候是完全盲目的，当它被人们认识到了以后，它就成为人类手中用来为社会谋福利的武器，人们认识了必然性，就能够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能在革命斗争中，建设工作中取得自觉的、能动的地位，就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规定正确的计划、步骤，使自己的行动能够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在行动中的自觉性能动性，就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11页）所以，必然性和自由不是没有联系的，必然性能够转化为自由，这个转化的决定条件是在于必然性要被人们所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对客观事物进行改造。研究必然性和自由这两个范畴的主要的实践意义，就是要我们注意到：我们如果要在行动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首先认识必然性。主观主义者不注意首先去认识客观的必然性，只想凭着自己的主观的“自由意志”任意行动，以为这才是自由，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自由”，这恰恰是一种主观盲目性，这种主观盲目性只能把人的行动引导到最不自由的结果，引导到一败涂地。资产阶级社会学里的那种与必然性完全绝缘的绝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正是这种主观盲目性的行为的理论上的表现。

这里有必须注意的一点：不是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必然性

这个范畴而仅只侈谈主观的意志自由的。有些唯心主义者也谈论到必然性的范畴。问题是在于唯心主义不把必然性了解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自己本身的规律所固有的必然性，而把事物的必然性看做是某种精神的、思维的力量所赋予的属性。例如说社会的发展是必然地依循着某种永恒的道德原则之类。黑格尔虽然在哲学上明确地提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辩证法的命题，但他也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必然性了解为世界理性发展的属性，而不承认必然性是物质世界自己发展的属性。唯物主义从客观事物本身引出它自己的发展所固有的必然性，唯心主义从主观、精神、思维中引出必然性，这就是在必然性问题上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区别。（参看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如果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加以唯物主义的理解，那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自由不仅仅只是认识，更重要的，自由还在于驾驭必然，对客观世界进行成功的改造。

人类之所以能离开自然界和动物状态，就是由于人类能够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的盲目状态之下解脱出来，一步步地取得改造世界的自由。人类最初制造了石头工具和发明了火的使用，就是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能够加以认识并由此取得支配自然界的自由的第一步。随着生产的向前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自由地盘日益扩大，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必然性也开始片断地有所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由于（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是剥削阶级，剥削的偏见妨碍着人们对于社会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人类在社会生活方面，总的来说是受到自发的盲目的必然性支配的，只在革命转变的关头，革命的领导阶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并依据此种认识来给行动以自觉的指导，这就使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生活掌握了一定程度

的自由。当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在反对封建制度束缚的意义上，这个“自由”的口号是有一些积极性的。但他们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只是资产者的自由，即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来经营买卖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的口号实际上包含着不自由的一面，即包含着人被物质财富支配和劳动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的消极面，这个消极面使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很容易就变成空洞的而在实际上是反动的口号。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反动的口号是要坚决反对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所谓“自由意志”，也是空洞的反动的术语，其实质是指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疯狂反对人民的自由，法西斯兽行的自由。这种所谓“自由”，只是垂死者对于必然规律的绝望挣扎，并非真正的自由。所以，一般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们对于社会本身的必然规律，是基本上处于盲目的不自由的状态中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无产阶级。这是与大机器生产相结合的，以消灭剥削及私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阶级，因此也是彻底革命的，没有任何保守的偏见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无产阶级进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和动员广大劳动人民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党和国家依据客观必然规律知识来对全社会劳动人民的行动给予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的指导。在这里，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方面才脱离盲目的必然性的支配，并反过来能够自由地利用自己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必然

性的知识，以为全社会谋福利。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

六、因果性和目的性

与必然和自由的矛盾有连带关系的，是因果性与目的性的范畴。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哲学史上曾长期地引起过争论：世界上的事物是依据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因果的必然联系而发展的呢?还是按照某种预先安排了的目的而发展的呢?唯物主义坚持前一种观点，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思想则以后一种看法作为自己的基本信条。唯心主义中间也有在形式上肯定因果性的存在的，但不是把因果性看做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因果性，而是把它曲解为某种主观的产物。如，休谟以为因果性是由感觉经验反复继起的习惯形成的，康德把因果性看做是人的理知的范畴之一，宗教迷信把“因果”和“善恶报应”联系起来，这里所谓的因果关系被曲解为神灵的意志的作用。因果性与目的性的对立和争论，和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和争论，有着类似的情形，它们也是同列的范畴。

唯物辩证法肯定因果性的范畴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联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而决不是人的意识里引出来的纯主观的范畴。因果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事物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永远都可以看到两种情形：有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动的方面，另外的事物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的思维把前一种情形概括到“因”的概念里来，把后一种情形概括到“果”的概念里来，这就有了因果性的范畴。

世界是无限复杂的事物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着的总体，而

“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的、(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列宁:《哲学笔记》，第 142 页) 因果性的规律只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一种因素，甚至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同上) 因此只能从联系和发展的全过程中来看事物的因果关系，而不能离开这个过程来孤立地研究因果关系。从这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的因果关系，就要避免对于因果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理解。这里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实际生活中，一个结果决不会仅只是由一种原因所引起的，而常常是多种原因的综合所引起的。研究事物的发生必须全面地揭露它各方面的原因，并且还要在各方面的原因中区别主要的原因与次要的原因，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一般都是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第一性的原因)。形而上学常常片面地认为只有一种原因引起一种结果，并且往往把次要的原因误认为引起一定结果的主要原因，这就不能不使认识发生偏差。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常常把历史变化的原因归结为某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把偶然的一件小事，看做世界大事的原因，这就是形而上学因果观点的一种典型。又例如，如果把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的形成仅仅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责任(个人无疑是有责任的)，而不注意到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的形成还有它的一定的客观的社会原因，结果就会走到用个人崇拜的观点来批评个人崇拜这个偏向上去了。这也是一种片面的因果观点。

第二，也由于上述理由，同一个原因，在实际生活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哪怕这个原因是根本的，但是，这个根本原因引起一定结果的过程中，除了根本的原因本身的作用之外，还不可

避免地有其他条件的参预。由于所参预的条件不同，结果也就会有所不同。忽视了这些条件（哪怕只是构成次要原因的条件）的不同，对结果就不能做出正确的估计。经济条件是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同一经济原因由于其他条件的影响可以发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不估计到经济以外的因素，仍不能正确理解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真实的具体的情况。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存在一天，由此，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一天，我们要时时警惕战争狂人“狗急跳墙”的危险。但是，只要各国人民提高了警惕，紧密团结起来，做好了准备，进行坚决的斗争，那么就有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三，唯物辩证法指出因果之间有着互相转化的关系。一种原因产生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在另外的关系之下又可以成为原因。在这一种关系上可以看做原因的，在另一种关系上又可以看做结果。还有，一种原因产生一定结果，结果也可以反过来又影响原因。忽视了因果的这种相互转化以至于相互作用，也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联系。这种情形在社会生活上特别重要：如政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政治反过来又对于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的原因。形而上学不能理解这种因果的相互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经济是最后的根本的原因），因此对社会生活的了解不是偏向于机械决定论（由于忽视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就会偏向于唯心主义（由于忽视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把政治、思想的因素作为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

唯物主义反对目的论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好像都是为着实现某种预先安排好的目的。目的论的世界观和宗教迷信思想是密切地结合着，而和科学的思想是不能相容的。从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出，科学愈发展，就在愈来愈

更广阔的地盘上使目的论世界观遭到破产。自然科学一开始出现就在它所研究的领域里揭发了自然界自己本身所固有的因果联系，因此也就在这个领域里排除了目的论的解释。每一时代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都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来和宗教迷信以及唯心主义者的目的论世界观进行战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生物界的因果联系没有得到自然科学的证明，宗教迷信的目的论世界观在这个领域里坚持着阵地，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后，生物界的目的论观点就破产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曾被认为是依循着某种永恒的正义或理性的目的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后，目的论在社会领域就完全破产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企图在微观世界的领域里否认因果规律，为目的论开辟地盘，也在自然科学上遭到破产。

唯物辩证法反对目的论的世界观，但这并不是说要否认自然界和社会中有任何目的性现象的存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目的性的现象，这是应该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唯物辩证法指出目的性并不是客观事物的最根本的属性，并不是一切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的最普遍最根本的原因，如像目的论的世界观所夸张的那样。目的性只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生物和社会）时在某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属性。生物的有机体是符合于适应环境的目的的，这是生物界的目的性现象，但这种适合目的的性质是生物的进化规律的产物，是由于不能适应环境的有机体已被淘汰这一种因果关系的产物，所以目的性并不是生物界的最根本的属性，这是很明显的。目的性对于人类社会有很大的意义。人类的生活和行动，就其主观方面来说，不论个人也好，或是一个社会单位如团体或国家也好，都是依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

但每个人每个社会单位的主观目的都是他们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最后决定于他们所依赖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整个社会、首先是它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联系和发展都依循着一定的客观的因果关系，这因果关系是不依赖个人的主观的目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发展归根到底仍是受着一定的客观因果规律的支配。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目的，这不同的目的，是由不同阶级所处的不同的物质生活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目的是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是由不同的阶级地位的原因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它们本身就是因果关系的产物。这里有两种目的，一种和客观世界发展的道路完全一致的目的，如工人阶级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正确的，是一定能实现的。另一种是不符合客观世界发展的道路的目的，如资产阶级的目的，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地位，并不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道路，所以这种目的是错误的，是一定要被粉碎的。研究目的性范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握什么是正确的目的。要把握正确的目的，就要根据上述的因果原理，首先站稳正确的阶级立场，工人阶级的立场，努力学会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把自己的行动的目的规定得符合于这个客观规律所指示的事物发展趋势，这样人的目的就成为自觉意识的目的，这种自觉意识的目的使人能够在工作中生活中取得能动性，能够按一定的自觉的计划去改造世界，推进世界的发展。归根到底，要想获得这样的自觉意识的目的性，必须依靠两个条件：第一，要依靠科学的研究，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因果规律，然后依据这样的规律知识来规定正确的行动目的和计划；第二，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不同地位的并且依不同目的而行动的人们，因此为着实现正确的目的，必须进

行社会斗争，——阶级斗争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必须准备斗争的足够力量，使得社会的某些腐朽势力对于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抗，如果有所反抗，就会有更大的社会势力来打破这种反抗。欧洲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为了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规律，曾经用很大的力量打破过天主教所代表的封建腐朽势力的反抗。新中国的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进步人民共同打破了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及其他社会腐朽势力的反抗，才能够全面利用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自然界规律，来胜利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七、可能性和现实性

当我们在行动中为自己规定某种目的时，我们对于自己的目的总是这样看的：它在目前虽然还不曾实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随着条件的变化，总有一个时候会变为现实存在的事物的。这里，我们就涉及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了。

可能性是与现实性对立而又密切联系的范畴。可能性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这样一种情况，即它在发展的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现实，但在目前却还没有成为现实。如果它在发展的一定条件下已成为现实，我们就说可能性已转化为现实性。事物既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它的内部又产生新的事物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这样，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现实性中又产生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的同一性。

要正确理解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的联系，必须对于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两个范畴所反映的客观内容正确地加以把握。首先就可能性来说，对于可能性有一种抽象的看法，即以为只要是我们凭主观的设想认为可能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算是具有可能性，或

者以为只要是我们必要的，也就应该是可能的，而不必问这种设想、这种主观上认为必要的东西是否可以成为现实。如说月亮可能落到地球上来，明天世界就可能实现为共产主义世界，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立即废除国家政权等等。这种纯粹主观设想而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的所谓“可能性”，叫做抽象的可能性或虚假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绝对的对立观念，这样的观念是对于可能性的形而上学的不正确的理解。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避免从抽象的或虚假的可能性方面来思考问题，必须避免只考虑有无必要而不考虑有无实现的根据的这种片面观点，我们要把握的可能性必须是实在的可能性或现实的可能性，即与现实性有联系的，具有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根据的这种可能性。把握实在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特别重要。如果我们在行动中不能把握实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行动是从抽象的或虚假的可能性出发，我们的行动目的就要落空，我们就要遭到失败。怎样才算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把握了实在的可能性？这就是说要把我们行动的目的、计划建立在实在的可能性上，建立在有可能成为现实性的可靠基础上。主观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计划建立在有可能成为现实性的可靠基础上，因此就在斗争中工作中招致失败。

但这里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可能性还不就是现实性，要使事物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必须经过人的努力，有时要经过严重的斗争，而有些本来只要经过努力和斗争就可以实现的事情，在没有斗争之前，看起来往往好像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往往会把一种本来有实在可能性的事情看成不可能的，这又会出现另一种主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革命初期，革命势力的力量很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努力斗争，革命

一定可能胜利，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见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就产生悲观退却的错误思想。

现实性的范畴也需要我们加以正确的把握。现实性并不是指眼前存在的一切而言。现实性是和必然性相联系的。现存事物只有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才是具有现实性的。某些事物虽然是现在存在的（例如某项错误的政策的实施），但在发展过程中不但不表现为必然的东西，而且要被事物的必然规律所摧毁，这样的事件，虽然存在，但却不能说就是具有现实性的。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很像一些老虎，但它的实质很虚弱，它已不能挣扎很久，所以就总的发展方向来说，它究竟不是现实的老虎。毛泽东同志把它们形容做“纸老虎”，这是完全正确的。新生事物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软弱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常常易受挫折的，但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新生事物必然要失败，相反地新生事物包含着一种一定要发展起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终归要变为现实性，因此认为新生事物一定要失败的看法就不是现实的。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谈到1928年初生的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时，说它“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是把握事物的现实性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包含着发展和转化为另外的事物的可能性，这说明现实事物自己本身存在着矛盾，说明事物在肯定的方面之中包含着否定的方面。所以，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发展的实在可能性的根据。要把握什么是实在的可能性，就要从现实事物的矛盾的分析中去找这个根据，实在的可能性就是事物的否定方面克服它的肯定方面，将来的方面克服它的过去的方面，新的方

面克服旧的方面的可能性。“星星之火”，有着“可以燎原”的可能性，这是由于它是“布满了干柴”的腐朽中国情况之下的新的因素。中国广大人民希望把中国迅速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先进国家，这个要求有着实在的可能性，因为新中国目前已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工人阶级专政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政治法律制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是保证人民在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并从而克服落后农业国状态的最可靠的根据。

可能性之所以还不是现实性，也正因为它只是现实事物的矛盾运动中的一个方面的因素。在矛盾没有克服之前，也就是事物的某些旧的方面还没有被新的因素克服以前，特别是在新的因素方才开始出现的时候，这新的因素还没有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它的必然性（虽然它已包含着必然性），相反地，这时它有时还会表现出暂时失败的可能性。这样，可能性在未转变为现实性时，可能性本身也是矛盾的：这里至少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可能性，或者是新的事物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或者是新事物暂时失败和旧事物暂时巩固的可能性。估计事物发展的可能性时，我们必须依据事物内部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相互联系的研究，把各种相反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而不要片面地只估计一方面的可能性。在实际工作中规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办法等等时，不但要估计到比较顺利的可能性，也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从最坏的可能性估计出发，向人民群众指出斗争任务的艰巨性，从而推动人们做出最充分的准备，付出最大的主观的努力，做出尽可能周密完善的实际措施，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行动的目的和计划的安排方面

取得高度的主动性，因而也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斗争成就，这是领导斗争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就是经常应用这个原则，因此就能够在任何斗争中都使群众保持着充分的战胜敌人的条件，就能够不断地鼓舞群众的革命精力，能够不断地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使一个胜利之后，又接着得到另一个更大的胜利。不懂辩证法的人，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常常从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的可能性方面出发，不考虑任何较坏的可能性，不动员广大群众来为克服这种较坏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样就常常会在困难情形出现的时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就会弄得手足无措，甚至于一败涂地。

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依循着它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矛盾运动规律）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事物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一）转化的对象，（二）必要的条件，（三）有规律的运动。天空中包含着足够的水蒸气，就有了下雨的可能性，这就是转化的对象。但这种可能性必须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水蒸气转为雨滴（如空气中微尘，雷电的刺激等），才能够有规律地转化为现实性。植物的种子有长成为植物的可能性，但必须有适当的土地、湿度、温度等等条件，才能够使这可能性循着植物生长的规律转变为现实性。可能性是矛盾的，现实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各种可能性，因此，一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同时就是表示另外的可能性被消灭，就是可能性的矛盾被克服，在这里就不能不通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同时也就是矛盾的斗争过程。就如像种子要转化为植物，必须经过突破种皮的斗争过程。没有这个斗争，种子就不能生长成植物。

在人类社会中，主观因素对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促进某种可能性使之变为现实性的强有力的条件。——在一定的情形下，在一切客观因素已完全具备的情形下，往往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论到如何可能避免工作中的错误问题，指出我们首先需要建立正确的制度——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但在“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里所说的“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就是指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同一篇文章论到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错误的原因时，指出这些错误的成为现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党在领导国家方面还缺乏经验；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线的，它们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现象，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国内外的紧张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这篇文章接着又指出：“但是仅仅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足以使犯错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比斯大林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列宁却没有犯斯大林这样的错误。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里明确地说到了人们的主观因素的一定的决定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有可能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之变为现实，也依赖着主观因素的作用，即一方面是依赖着党处理这个矛盾的适当的政策，另一方面还依赖着资产阶级要明白“大势所趋”，采取恩格斯所说的“充分理智”的态度，愿意接受而不是像右派那样地反抗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在我们估计某项任务是否可能成为现实的时候，必须对于实现它的条件做全面的研究。条件是一定需要的，客观的物质条件是必须重视的。问题是不能仅仅只看见客观的条件，物质的条件，而不注意主观的、人的条件，而人的条件恰恰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里主要问题是在于要相信群众的创造力量，凡是经过人的努力确有可靠根据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就不管当前某些客观条件如何困难，都应该坚决地做下去。革命的事业就是克服了艰巨的客观困难条件才实现的，生产的任务也是如此。在建设工作中，要克服“见物不见人”的片面观点。当然也要防止只见人不见物的某种主观主义倾向。

人们为自己的行动规定某种可能的任务或目的，并为这些任务或目的的实现而努力创设条件和进行斗争，通过斗争就使可能的任务真正变为现实。这就是主观因素的作用的最一般的情形。这种情形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自觉性和目的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曾被唯心主义所夸大，以为人的生活是由所谓“自由意志”决定的。好像任何人只要抱定任何一种目的，坚决地做下去，不管是什么目的或什么情况都一定能够成为现实或能够有一定的现实的作用。唯心主义的这种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必然表现为主观主义，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事实上人们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或目的，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成为现实的。有些任务或目的具备实在可能的根据，它们是能够实现的，它们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正确的目的，有些任务或目的没有实在可能的可靠根据，它们只能以失败告终结，它们就是不正确的目的。在社会生活中，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人的主观因素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战斗的积极性，对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起着主要的作用，但主观因素并不能决定一切，事物的实在可能性的根据，归根到底仍是客观事物自己本

身所固有的规律性。要使人的主观因素对于事物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发挥强有力的积极作用，必须具备以下的几点：第一，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须使自己的主观任务或目的规定得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必然的趋势，也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内部存在着的实在的可能性。一定要用全力设法避免按照纯主观的、没有客观事实根据的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必要的观点来决定自己的任务或目的，任务或目的必须是事实上必要的也是真正可能的。否则这种任务或目的就一定要落空。例如反动派要想把旧的腐朽制度长久维持下去，这样的目的就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一定要失败的。冒险主义者提出超过客观现实条件所容许的目的、任务和计划，这样的目的、任务和计划只具有抽象的可能性，也不能转化为现实性；右倾保守主义者不能够充分估计和利用客观事物本身的实在可能性，不敢提出经过努力确实可以实现的较高的任务，不能指导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推动和促进事物的发展，这也不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正确的任务和目的。第二，要有计划地创设条件，努力改造对我们不利的客观条件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各种条件，使事情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能够有利于使我们所规定的可能任务变为现实，有利于阻止和克服其他各种可能性的实现；第三，要用最大的努力对阻碍我们的任务实现的势力和倾向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要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为创设各种有利条件和粉碎阻碍进步的势力而进行斗争。以上几点，就是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的运动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缺一不可的条件。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一点上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范例。他首先依据当时的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是战略防御的任务，是反“围剿”的任务。然后又

提出要使这个任务胜利实现，一定要在战争中采取主动灵活的行动，在一定情形下要采取退却的行动，以便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但是，单有以上两点，还不能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最后还需要决战的行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

中国人民现在担负着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完全依据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提供的实在的可能性的，因此它是一定有完全实现的前途，并且现在正在走向这个前途的。但是，为了完全实现这个前途，不是只有正确的任务就够了的，还必须要依靠已经创设了的和进一步再加创设的种种条件作为保证，这些条件包括着加强我们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加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调动和组织人民中间的一切积极力量来为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的残余，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因素而斗争。在创设和保证加强这些条件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和一切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对各种保守的、落后的势力和其他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伟大任务由可能性一步步地转化为现实性。我们已经有充分的信心这样说：通过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决的努力和斗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一定会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